



# 曾生回忆录

# 目 录

<b>第一章</b>	<b>青少年时代</b> .....	1
	在家乡和香港读书.....	1
	到澳大利亚求学.....	7
	接受革命启蒙 .....	10
<b>第二章</b>	<b>在广州参加“一二九”运动</b> .....	16
	“一二九”前夕的广州学生运动 .....	16
	中山大学“双十二”示威大游行 .....	22
	争取领导权 .....	28
	成立抗敌会 .....	35
<b>第三章</b>	<b>在香港从事海员工运</b> .....	53
	为找党组织当海员 .....	53
	建立惠坪乐善公所 .....	57
	巧遇抗日名将张炎 .....	63
	组建中共香港海委 .....	68
	“余闲乐社”的发展 .....	73
	成立香港海员工会 .....	79
	支援广东抗日斗争 .....	86

<b>第四章</b>	<b>开辟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b> .....	90
	日军入侵华南 .....	90
	接受任务 .....	93
	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	97
	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	110
	初步打开局面 .....	117
	侨胞和港澳同胞的支持 .....	130
<b>第五章</b>	<b>东移海陆丰</b> .....	137
	挫败顽固派阴谋 .....	137
	东移受挫 .....	145
	重返惠东宝 .....	156
<b>第六章</b>	<b>重建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b> .....	163
	上下坪会议 .....	163
	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	170
	阳台山抗日根据地艰苦创建 .....	181
	大败日伪军进攻 .....	186
	大岭山区反顽斗争 .....	195
<b>第七章</b>	<b>挺进港九和秘密大营救</b> .....	208
	日军攻占香港九龙 .....	208
	挺进港九 .....	211
	秘密大营救 .....	215
	文化界人士脱险归来 .....	224
	港澳青年大批上前线 .....	231

<b>第八章</b>	<b>在困难中坚持和发展</b> ·····	235
	白石龙会议·····	235
	大岭山区重新控制·····	241
	阳台山区持续反顽·····	249
	惠宝边恢复和发展·····	261
<b>第九章</b>	<b>独立自主开展新局面</b> ·····	279
	乌蛟腾会议·····	279
	路东部队的发展·····	287
	路西部队主动出击·····	302
	粉碎日军大“扫荡”·····	310
	港九根据地逐步扩大·····	315
<b>第十章</b>	<b>成立东江纵队</b> ·····	319
	公开高举党的旗帜·····	319
	加强部队军政建设·····	323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328
	统一战线成果·····	333
	乘胜前进·····	335
	海上游击战·····	350
<b>第十一章</b>	<b>反法西斯统一战线</b> ·····	360
	营救盟军人员和国际友人·····	360
	配合盟军作战·····	369
	成立日本反战同盟·····	375
<b>第十二章</b>	<b>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大发展</b> ·····	378

土洋会议·····	378
扩大武装力量·····	383
全面开展游击战争·····	388
罗浮山会议·····	410
开辟五岭根据地·····	416
受降斗争·····	430
<b>第十三章 自卫还击和北撤谈判·····</b>	<b>431</b>
自卫还击和分散坚持·····	431
谈判斗争·····	448
胜利集结·····	466
<b>第十四章 成立两广纵队·····</b>	<b>477</b>
北撤山东·····	477
成立两广纵队·····	495
<b>第十五章 转战华东战场·····</b>	<b>514</b>
参加豫东战役·····	514
参加济南战役·····	524
参加淮海战役·····	530
<b>第十六章 进军华南·····</b>	<b>561</b>
转隶四野和整编部队·····	561
赣州决策·····	568
解放广东·····	571
<b>第十七章 坚守祖国南大门·····</b>	<b>581</b>
进驻珠江三角洲·····	581

巩固海边防·····	583
建设人民政权·····	594
发展生产·····	598
新的岗位·····	600
<b>第十八章 在海军的日子里·····</b>	<b>603</b>
学员生活·····	603
到南海舰队·····	609
对军事训练的思考·····	612
广州湾演习·····	615
军官轮训·····	619
舰船修理·····	623
保卫西沙·····	628
中越友谊·····	634
<b>第十九章 在广州工作的七年·····</b>	<b>642</b>
受命于困难之际·····	642
市政建设的八件大事·····	648
公安政法战线的建设·····	674
市容卫生·····	680
发展体育·····	685
文化艺术·····	693
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	697
外事活动·····	705
统战工作·····	713

<b>第二十章 十年浩劫中的遭遇</b> .....	719
盲目“紧跟”.....	719
被秘密逮捕.....	721
关押在北京近郊.....	723
在秦城监狱.....	724
无中生有的罪名.....	727
颠倒黑白的诬陷.....	729
追查的背后.....	735
回到革命大家庭.....	741
<b>第二十一章 在交通部</b> .....	744
整顿直属企业 发展远洋船队.....	744
招商局和蛇口工业区.....	749
关心地方交通 增进友好往来.....	753
为“三通”而努力.....	755
<b>第二十二章 探望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b> .....	760
重访香港忆当年.....	760
丰富多彩的访美活动.....	771
加拿大侨亲的情谊.....	805
难忘的日本之行.....	813
宾至如归在澳门.....	822
<b>后 记</b> .....	827

# 第一章

## 青少年时代

### 在家乡和香港读书

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坪山乡石灰陂(现属宝安县)。

坪山乡(现坪山镇)位于大鹏半岛北端,东南濒临大鹏湾,与九龙新界山水相连,西南是深圳,东北接连惠州。这里是客家人居住的地方。由于交通近便,很多人到香港去做工,也有不少人去当海员或到外国当侨民。因为接触外来的新事物,这里的人,特别是青年,头脑比较开通。坪山是个丘陵地带,土地贫瘠。据传是“本地人”不愿在此居住,才由客家人来开垦种植,世代相传,这里的人能吃苦耐劳。更因为男人们大多外出谋生,留在家乡耕种,照顾老小,料理家务的都是妇女,所以人们都说客家妇女最能干。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东江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坪山和邻近各区乡都有农会的组织，这里的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坪山是我从小受到良好熏陶的地方，也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一个基地。我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就常常回到坪山来进行破除封建迷信，宣传进步文化思想等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广州后，我在香港接受了党所交托的到敌人后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任，也是首先回到坪山来组建抗日游击队的。坪山的人民，不怕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坚决支持我们的斗争。坪山成了我们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最早建立的一个坚强的抗日游击基地。所以，几十年来我对家乡坪山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对它十分热爱。

我的父亲是澳大利亚的华侨，名叫曾庭杰，小名曾生。我小的时候取名叫曾振声。因为客家话“振”与“曾”读音相近，而“声”与“生”又读者相同。我在香港从事海员工运时，就用“曾生”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我父亲青年时候没有读多少书，因为生活所迫，只身跑到香港，在英国轮船上当厨师，随船到过欧、美、澳、亚各洲的许多大城市，算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我小的时候，常听他讲述关于海洋的知识和世界各地的见闻，开拓了我的眼界，增长了我寻求新知识的欲望。我后来因在广州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通缉跑到香港去做海员工作，多少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一九〇〇年以前，父亲利用一次行船到澳大利亚的机

会,离船上岸,留居悉尼做厨工。过了一些时间,宝安县南头的袁绍麟来到了悉尼。袁是轮船的管理员,因为他不是合法入境,在澳大利亚没有户籍,就借用我父亲的名义租了一座房子,开了一间商店,取名“安和昌”。我父亲在这间商店当伙计,做些搬搬抬抬的力气活。经过几年的苦熬,父亲积蓄了一点钱带回家置了十几亩田,作为母亲和我生活的经济来源。我在香港搞海员工运时,为筹办一间招收海员子弟读书的海华学校,征得母亲的同意,卖了几亩田。后来,在东江纵队工作期间,部队经济困难,我又征得母亲的同意,把剩下的田全部卖掉了,把卖田的钱用来补充部队的经费。这也可以说是将我父亲的遗产贡献给了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造反派”到我家乡去调查,要找材料证明我家是“地主成份”。当地的群众出来说公道话:“曾生的家庭怎能说是地主成份?卖光田地支援革命的,我们这里就只有他一家!”

我的母亲叫钟玉珍,是坪山邻乡的龙岗圩沙梨园人。她也是客家人,是一位纯朴的农村妇女,虽然没有文化,但思想开明,通情达理,为人厚道,勤俭持家。她针线活很好,除了种田以外,还兼做裁缝。父母只生我这一个儿子,视为掌上明珠,但不溺爱,从小对我要求严格。父亲长期在外谋生,母亲和我朝夕相处。我对母亲的热爱超过对父亲。母亲勤劳善良,宽厚待人,同情贫弱的品德,对于我的一生都有很深的影晌。母亲对我不仅有养育之恩,而且积极支持我从事

革命工作。抗战时期，我们在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她跟着我们打游击。她还帮助我带养儿女，遇到情况紧急时，就用箩筐挑着我的儿女转移，历尽艰险。她真是一位平凡而高尚的女性，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母亲。她于一九六二年去世，骨灰被安放在广州市银河革命公墓。我现在虽然也年老了，但仍然经常怀念她。

广东是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的策源地。从我出生到十岁这段时间里，广东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时局动荡多变，斗争十分激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这个革命胜利果实，不久便被北洋军阀的袁世凯所窃夺。孙中山从广东发动第二次革命，结果又失败了。广东为袁世凯的忠实走卒龙济光所盘踞。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这三年中，龙济光为了镇压革命势力和人民群众，拼命扩充军队，而把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给人民。他不仅强征暴敛，盘剥百姓，还重开赌禁、烟禁，允许娼妓公开复业，以增加税收，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为了反抗暴政，惠阳地区的革命党人，曾经多次发动反袁讨龙的武装起义，规模最大的一次要算一九一六年初，陈炯明领导的共和军围攻惠州城之役。这场战斗进行了数月之久，激烈的战争殃及离惠州不远的坪山乡。龙济光的军队到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一九一六年底，龙济光被赶走了，却又来了桂系军阀。在桂系军阀统治广东五年的时间里，承袭了龙济光的劣政，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军费比龙济光时期还

要多,人民负担更为沉重。因而造成社会混乱,盗匪蜂起,人民纷纷外逃。那时我刚刚懂事,常常听到家乡的父老气愤地讲述这些事情,我虽然不能深刻理解,但却使我知道了封建军阀是坏人,军阀打仗,百姓遭殃的道理。

我六岁开始在家乡福音堂读书,一年后到知新书室(私塾)就读,以后又转到龙岗圩外祖母处的沙梨园小学读了两年。十岁那年我读完了初小。由于当时广东的政局十分动荡,我伯父曾学田便通过香港超然学校校长胡雨川的关系,叫我和我的孙子曾琮一起到超然学校去读书。曾琮论辈数是我的侄子,但与我同岁,我们从小就很要好,于是便结伴同行。我原以为香港的学校会比家乡的学校先进,没料想超然学校却十分落后,课程没有什么新知识,净是讲老八股文章,进行填鸭式的教学,老师随便体罚学生。特别是那位胡雨川校长,更是一个封建老顽固。他对孙中山的革命党很仇视,曾写过一副长对联辱骂孙中山。送孩子到这所学校读书的家长,大多数也是象我伯父那样的老古板人物。他们虽然在香港这个洋人统治下的殖民地生活,却仍然是满脑子效忠清朝皇帝,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我这个从乡下来的又读过几年新学堂的学生,对于这些陈腐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特别是对于常常在课堂上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孙大炮”的胡雨川校长,内心十分反感。由于我回答老师的提问时,讲的是客家话,胡雨川听不太懂,因而对我这个“客家仔”不存好感,这就免不了要发生冲突。有一次,胡雨川叫我

站起来背书，我的客家音重，他听不清楚，就说我不用功学习。我争辩了几句，他就用教鞭朝我的头上打来，打得我很痛。我从小就有一股倔强的脾气，受不了这个屈辱，就把他的教鞭抢过来，折成两段，往他的身上掷过去。那时我还不不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道理，但天真地认为他打我一鞭，我掷他一下，这是很平等很合理的事。没有料到这可闯了大祸，按当时当地的规矩，这就是“造反”，是会被立即开除学籍的。曾琮马上在伯父面前讲了一些袒护我的话，伯父又在胡雨川面前赔礼道歉一番，才把风波平息下来。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班里有个同学叫李冬虎，长得胖胖的，大我两岁。他自恃力气大，经常欺侮年纪小的同学，大家都恨他，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牛王头”。有一天，他又欺侮和我同书桌的李琦同学。李琦个子瘦小，斯斯文文，学习成绩很好。李冬虎自己不好好学，却妒嫉学习好的人。他借故突然揪住李琦的头发，把李琦的书抢去。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警告李冬虎，要他立即把书还给李琦。这个“牛王头”就挥着拳头冲着我骂道：“关你什么事，你这个客家仔，是不是要和我比试比试？”我也不服输，就回答他放学后在校门外较量。放学后，我们两人走出校门就挥拳踢脚地扭打起来，经过几个回合，李冬虎被我压在地下认输求饶，我才罢手。围观的同学无不拍手称快。从此，李冬虎再也不敢欺侮同学了。李琦同学因为我帮了他，就对我很要好，常常同我和曾琮一起玩，班里的同学也对我抱有好感。但是，胡雨川

校长却不问是非曲直,认为打架就是违犯了校规,声言要处分我们。我也不管他,照样上课学习和同学们玩耍。他就多次在我伯父面前告状,说我难以教化。伯父无可奈何,只好让我回坪山读书。

其实我对这所超然学校已经十分反感,早已想回坪山读书了。我觉得香港这个地方是有钱人的世界,在这里人们的生活太不平等。洋人把自己看得很高贵,把中国人看得很低下,中国人受了洋人的欺侮,只能忍气吞声。看到洋人动不动就打骂中国的工人,特别是一些外国水兵,喝醉了酒就在街上乱喊乱跳,见到穿着较好的中国妇女就追逐、搂抱,我幼小的心里就感到很难受,很气愤。所以,伯父叫我回坪山读书,我真感到像获得自由的小鸟,高兴地飞回了坪山。

## 到澳大利亚求学

我回到家乡在坪山小学继续读高小一年级,同原来相识的同学一起学习玩耍,过得十分愉快。不久,父亲来信要我到澳大利亚去读书。这时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舍不得离开相依为命的母亲;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是寻求新知识的好机会。当时,中国军阀混战,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之后不久,滇桂军阀入粤,把陈炯明赶出广州,坪山正处于交战的边缘地带,直接受到战火的蹂躏,很多青年人都想到国外去谋出路。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事,就说:“阿声,你放心去吧!到父

亲那里好好读书，有了知识将来才能找个好的职业，不要为了我而耽误了自己的前程。”于是，我便按照父母的意愿，于一九二三年离开故乡去澳大利亚。母亲为我收拾了行李，并亲自送我到香港，一直送我落了船，她才依依不舍地回去。父亲怕我初次坐远洋轮不习惯，就嘱托轮船管理员曾三叔照顾我。曾三叔是惠阳县淡水人，是父亲过去在轮船上的同事，为人忠厚乐观。我跟着他和十几个工人挤住在不大的船舱里，他怕我晕船，特地买了一些糖果给我吃。他怕我离开了母亲感到寂寞，就给我讲了许多行船中的见闻和故事。由于曾三叔的照顾，我在船上过得还比较愉快，也增长了不少知识。

但是，在船上我也看到一件令我很惊讶的事情。我见到一群人惶惑地蜷缩在船舱幽暗的角落里，我问曾三叔他们是什么人，他就向我解释说，按船上的行话，这些人叫做“屈蛇”。因为很多人在国内无法谋生，就到国外去寻求活路，但又买不起船票，只好靠相熟的船员掩藏在船舱里。当军警或船老板来检查时，这些人就象蛇那样，蜷缩到床底下或木箱里，由中国船员去对付检查人员，求得蒙混过关。倘若被查出来就要被抓去坐牢或驱逐出境。因而，这些人就得此“屈蛇”之名。听了曾三叔的解释，想到我们祖国的贫弱，看到我们同胞这样穷困可怜，我心里非常难过。这些“屈蛇”的形象，多少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船到达悉尼靠岸后，曾三叔带领我见到了父亲。父子相

聚自然十分高兴。我住在“安和昌”商店的一个阁楼里，设备虽然简单，但我这个刚从农村来的孩子已感到很舒服自在了。

遵照父亲的安排，我先到一所教会办的补习学校读书。不久，去读初中。初中毕业，就转到商业学院去学习。商业学院是一所自费的职业中专学校，主要课程有：会计、广告、打字、速记等。父亲所以未让我接着读高中就转去读商业学院，就是希望我早日学些商业知识，毕业后就能赚钱养家。由于“安和昌”商店主要是做华侨和中国船员生意的，夜间生意较旺。晚上我帮助商店做些事，所以接触到来自各处的中国船员。在和他们的接谈中，我又增长了很多见闻和知识。我还到附近的汽车行去，学习过修理汽车。

悉尼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居住着白人、黑人和中国人。在这里虽然谋生比较容易，但中国人很受白人欺侮和歧视。他们把中国人看作是“东亚病夫”、“劣等民族”。不出门感觉不到这个耻辱，一出去活动就被白人孩子讥讽嘲弄。他们用英语骂我，还以为我听不懂。这时我已经长大了，和在香港读书时不一样了。在香港只读了一些过时的八股文，见到洋人欺负中国人，只会感到难过和愤怒。而在悉尼，我学到了一些新知识，同时也增长了民族的自尊心，意识到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应负的责任，暗地里立下了效忠祖国，振兴中华的志愿。我希望自己长大了能为祖国多作贡献，希望祖国尽快地富强起来，使中国人能够在世界各地昂首阔步地走



路,不让别人看不起。

我在商业学院毕业以后,父亲就对我说:“我已年近花甲,俗话讲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我想回家乡去安度晚年了。”我听了很高兴,这也正合我的心愿。于是在一九二八年底,我便和父亲回到了坪山,与母亲团聚。

我离别家乡的六年期间,中国又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如国民党和共产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举行东征、南讨和北伐战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井冈山会师,等等。作为一个已具有民族意识的青年,我对于这一连串的重大事变既感到新奇,又引起了思考:它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将走向何处去?

## 接受革命启蒙

我回到坪山后,曾想过学父亲青年时那样去行船(即当海员),但后来考虑到自己年纪尚小,学识还很浅薄,便改变了主意,希望继续读书。父母亲也同意,就对我说:“你在澳大利亚读的是洋学校,英文有基础,去香港读英文学校,离家比较近,将来可以在香港找个好的职业。”但是,我的想法不同,便对父母亲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一个中国青年,应读中文学校,将来要为中国的振兴作出自己的贡

献。”我提出要到省城广州去上学。双亲见我说得有理，夸我有志气，就转为支持我的想法。于是，一九二九年我便到了广州。因为我从小就敬仰孙中山先生，所以一心想进入中山大学读书。但那时我的中文水平还只有初中程度，所以先要在中山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而由于我的中文程度不及国内的同学，要考高中也还需要补习中文。为此，我便到广州的惠阳同乡会馆去打听，很幸运地找到了“百粤补习学校”。我在那里虽然只补习了半年中文，但对我的影响却很大。这间学校的校长叫潘子湘，是一位不得志的大学毕业毕业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特别重视培养人才。他对军阀统治很不满，不愿与旧势力同流合污，因而自己集资开办了这间补习学校。潘校长待人诚恳，对教学认真负责，循循善诱，爱惜人才，乐于助人。我曾听到同学们讲述潘校长帮助贫困学生的许多故事，至今还记忆犹新。听说有一位学生因交不起学费，已决定退学，潘校长知道后，就把那位学生叫到他的房里，拉着那位学生的手说：“我知道你的家庭经济困难，你就免交学费了，安心继续学习吧！”这位得到潘校长帮助的学生，发愤读书，后来考上了大学，特地回来见潘子湘，激动得热泪盈眶，再三感谢潘校长的栽培和帮助。我到了这间学校，同样得到他的许多关照。他得知我是澳大利亚回来的华侨子弟，不愿继续上洋学校，而志愿上中文学校时，就对我格外关心和爱护。他针对我中文和数理化程度较差这个弱点，加班加点帮助我补习，并引用孔夫子“学而时习之，不亦

乐乎”的名言来鼓励我抓紧时间刻苦用功。在潘校长的严格而又热情的教导下,我不敢偷懒,珍惜每一分钟的时间,埋头补习功课。经过半年的刻苦补习,我的中文程度提高很快,暑假去报考中山大学附中预科,被录取了。我马上把这喜讯报告潘校长,并对他表示感谢,他亦为我取得这个成绩而高兴。

一九二九年冬天,中国的新军阀发生混战。广东的陈济棠最初依靠蒋介石的支持排除异己,独揽广东的党政大权,后来又与蒋介石反目。新军阀派系之间的斗争十分尖锐。这时一件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正当中山大学附中的学生准备期考之际,一天晚上,一批军警突然到我们住的“学旅”(专门租给学生住的旅店)抓人,我被莫名其妙地抓进了牢房。经过与同牢房的几个学生共同交换情况,分析被抓原因,才知道我们“学旅”的房东黄明堂是曾经追随过孙中山,后来成为张发奎的部属,由张发奎派回广州,做策反工作的。他秘密联络一些人,策划推翻陈济棠的统治。广东当局怀疑我们这批学生参加了黄明堂的活动,就把我们抓了起来。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参加黄明堂策划的活动,和黄明堂只是房客与房东的关系,除了交房租之外,和他没有任何其他往来。这完全是一起抓错了人的冤案。为了能够尽快出狱,去参加期末考试,起初我要求中山大学出面担保,竟遭到拒绝。后来我写信给潘子湘校长,请他设法担保我出去。信刚寄出三天,潘子湘便和一位英文老师来探望我,并

答应由他们出面为我办理担保手续。不久,我便被释放了,这件事使我感触很深。两个学校对我的态度竟这样截然不同。解放后,在我推荐下,潘子湘先生被安排在广东省文史馆工作,他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

通过这次坐牢,使我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之前,我对国民党的反动面目认识不清,还多少有点好感,曾经寄希望于国民党来领导人民建设国家,振兴中华。经过这次事件和进一步观察之后,才使我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新军阀之间互相争权夺利,对外各自向外国找靠山,出卖国家权益;对内则欺压人民,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横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依靠国民党,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但是,也就在这次事件中,我也发现了挽救中国的希望之所在。在牢房里,我意外地看到了许多刻写在墙上的革命标语、口号和诗词,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宁可站着死,不要跪着生!”“打倒国民党新军阀!”“共产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实现!”“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等。我了解到,这是曾经在这里坐牢的共产党员刻写的。他们的这种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了改造旧社会,建立新中国,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我非常感动,我开始认识到中国的未来只能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因此,这次坐牢,实际上是给了我一次最好的革命启蒙教育。从此,我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和信仰。出狱之后,就留心打听有关共产党的消息,注意阅读共产党和进步的书刊,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

主张。在共产党和进步宣传的启示下，我在学生中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活动。我和惠阳籍的同学出版了一个《铁轮》杂志，刊登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这个刊物不仅寄回乡下去做启蒙宣传，还邮寄香港和海外华侨，在惠阳籍的海员和华侨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旧社会，乡下经常搞迷信活动，如祭鬼打醮等。一九三〇年暑假，我组织同学回乡宣传，阻止了一次劳民伤财的打醮活动，对移风易俗，破除迷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在中山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后就直接升入中山大学读本科。这是经过一番斗争才得到的。过去中山大学附中的高中毕业生，不能直接升入中山大学的本科读书，还得与别的学校的高中毕业生一起再次参加入学考试。这个规定，我觉得很不合理。因为中山大学附中实际上就是中山大学的预科班，入预科班时已经通过考试了，现在又经过高中部的毕业考试，按道理就可以直接升入中山大学本科，不必再参加高校的入学考试。我一直想改变这个不合理的规定。正好在我们上高中三年级时，大学部的同学举行罢课。我就和一批进步同学发动附中高中部的同学发起向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请愿，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赞同。为此，我以班主席的身份，和邹鲁校长进行谈判，要求他答应附中的高中毕业生，可以直升大学本科读书，否则，我们全体同学就参加罢课。我们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邹鲁也怕罢课的风潮闹大了不好办，就同意了我们的要求，谈判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一

胜利,为以后中山大学附中高中毕业生直接升入中山大学本科读书开创了先例,得到大家的赞扬。由于我的个子比较高,又敢于带领同学们一起干,因而大家亲切地叫我“曾大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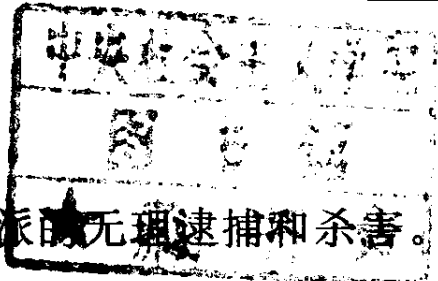
我升入中山大学本科第二年,家里发生了一件极为不幸的事。那学期,学校放寒假,我回到了家乡。春节那一天,全家正高兴地吃着丰盛的团年饭,父亲却回忆起过去的艰苦岁月,讲着讲着,流下泪来。母亲觉得吃团年饭讲这些辛酸的历史是不吉利的,便劝说父亲不要再讲这些伤心的往事了。不料父亲突然倒下去了,得了脑溢血症,过了一段时间,便去世了。从此,母亲就担负起了全部家庭责任。我牢记父母亲同意我到广州来读书的初衷,就更加坚定了我努力学习,振兴中华的志向。

## 第二章

# 在广州参加“一二九”运动

### “一二九”运动前夕的广州学生运动

一九三三年七月，我在中山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毕业后，直接升入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育系读书。中山大学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华南最高学府。据中山大学校史记载：该校在大革命时期，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有党员六七十人；一九二六年，有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三百人左右。有许多学生参加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著名的北伐战争。这时期，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许德珩等革命文豪和著名学者，先后在中山大学任教或讲课。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随即于四月十五日，在广州、汕头等地进行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和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的反动统治。中山大学革命力量遭受摧残，有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



年遭受反动派的无理逮捕和杀害。鲁迅先生为此愤然辞去中山大学教务长的职务,经香港到了上海。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血腥统治,广州地区的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和各种进步团体都遭到极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到我上中山大学时,广州已没有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但仍有何思敬、何干之等个别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的党员,在青年学生中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中山大学除何思敬外,还有邓初民等进步教授,向青年学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理论。

“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一段时间,广州的青年学生对蒋介石还认识不清,总希望他抗日。可是,事实上他对外一直是军事上撤退,外交上妥协;对内则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事实教育了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逐步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他们深感民族危机的严重。在这社会黑暗、民族危亡日益加深的时候,广大爱国青年不断追求进步,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共产党员及进步教师的影响和教育下,思想上有很大的进步,在行动上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和进行募捐支持十九路军抗日及宣传抗日等活动。一九三二年春节前后,我们中山大学附中的学生还组织过下乡宣传活动。与此同时,爱国青年还纷纷组织读书会、文艺社团等形式的进步群众团体,秘密地进行活动。这些组织,开始时是三五个人,或十多人自由结合,各自开展活动,各不相属。一九三二年下半年,我还在中山大学附中读书时,就与附中的同学



钱兴、粟稔、韩瑶初、钟远蕃、罗宗皇、禡万禾、张凤楼、黎伯枢、黎元杰等十多人，成立了学习进步书籍的读书会。据后来了解，除中山大学外，勳勤大学、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广雅中学）、执信中学等学校的进步学生也组织了类似的组织。学习革命书刊，交流学习心得，甚至出版进步刊物。饶彰风、杜埃出版了一个《天皇星》的进步文艺刊物。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间，从上海、北平、香港等地通过各种途径，大量的进步书刊在广州发行。如《读书生活》、《世界知识》、《文学月报》，特别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日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等书，都是当时进步青年喜爱的读物。我们读书会平时各自阅读进步书籍，定期交流学习心得，讨论时事。每周开一两次讨论会。为研讨救国的真理，我们经常从书本上的理论问题联系到中国革命的问题进行讨论，气氛十分热烈。在一九三三年前后，我们读书会曾多次请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的何干之（当时叫谭秀峰），参加我们在惠如茶楼等地进行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等问题的讨论。何干之对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精辟分析，对提高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信心很有帮助。我们这个读书会的成员都直接升入中山大学的大学部，我和粟稔、罗宗皇、禡万禾等读文学院；钱兴、韩瑶初、钟远蕃等读法学院。绝大部分成员后来都成为广州“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在读书会的成员中，钱兴对我的影响和帮助最大。每当我回顾青年学生时代的情景时，脑海里总

会出现钱兴的高大形象。

钱兴,原名钱发年,广西怀集县(现属广东)诗洞人。在家乡读初中时,由于他为人正直,勤奋好学,善于思考,成绩优秀,深得他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共产党员梁一柱的赏识。钱兴在梁老师的教育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立志要以救国救民,复兴中华为己任。因此,他到广州来读书时,即取名为“兴”,表示毕业后要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一九三〇年他初中毕业后,考入广州知用中学读高中。翌年,又转考入中山大学附中高中部就读。从此,我和他认识,并开始一起阅读进步书籍,经常一起讨论国内外形势和国家、个人的前途,以及争取参加中国共产党等问题。钱兴后来成为中山大学“中国青年同盟”的负责人和广州“一二九”运动的一位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主要搞学运工作。在一九三七年的三四月间,他发现放在文明路中山大学旧校宿舍的一些党内刊物突然不见了,便迅速转移到香港。由我介绍他与南临委接上关系。不久,他便接受南临委的委派到厦门任中共厦门市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决定派钱兴筹建中共广西省工委,并担任工委书记。后来广西党组织因叛徒出卖而遭到破坏,致使广西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中断了联系。在这情况下,钱兴一方面坚持党的独立工作;一方面积极设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钱兴这段时间的工作,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的肯定和赞许。解放战争时期,钱兴担任中

共广东省西江工委副书记、粤桂湘边部队副政委等职务。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在作战中牺牲，年仅三十八岁。

一九三四年冬，有一天钱兴约我到石牌中山大学新校的甘蔗园谈话，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已找到了一位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的共产党员。这位共产党员由于没有组织关系，他暂时还不能吸收党员，建立党组织。但是，他现在组织了一个进步的革命秘密组织叫“中国青年同盟”（下简称“中青”），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表示同意。钱兴就介绍我参加了“中青”。

“中青”的发起和组织人王均予，原是上海党中央秘密刊物的发行工作人员。在发行工作中以“读书会”的形式同一些进步青年建立了联系。由于上海党组织受破坏，他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从上海来到广州，找到勳勤大学的学生、“读书会”的会员邱萃藻。在邱萃藻的帮助下，王均予在广州开始了革命工作。王均予通过邱萃藻认识了一批进步青年，在广州建立起“中青”。他首先在中山大学、勳勤大学吸收了邱萃藻、钱兴等人参加。随后，以中山大学、勳勤大学和国民大学为主要阵地，在中山大学附中、勳勤大学附中、广雅中学、女子师范、执信中学、知用中学、教中、市一中及燕塘军校等广州许多学校都发展了“中青”的成员或组织。同时，在东莞、中山、新会、肇庆等地也先后建立了“中青”的组织。到一九三五年底广州“一二九”运动前夕，“中青”成员已发展到一百多人。“中青”成为发动和组织广州“一二九”

运动的骨干力量。与此同时，中山大学和广州市的部分大、中学校的一批进步青年，也先后成立了“突进社”、“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力社”等进步组织。在广州恢复了党的组织后，这些团体便成了党的外围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也是广州“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或骨干。

“中青”是以党的宗旨为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秘密组织。参加“中青”必须是政治面目清楚，信仰共产主义、严守组织纪律的进步分子。它是一个非常严密的地下组织。组织成员之间是单线联系的。中山大学的“中青”支部，当时我只知道钱兴是负责人，由他与我单线联系。后来，我才从钱兴那里和李驹良的回忆文章以及广州市青年运动史的资料中，了解到中山大学“中青”支部的成员有钱兴、粟稔、李驹良、金昌华、韩瑶初和我等人。

一九三四年冬，由于一批进步师生的信任和支持，我担任了在中山大学旧校高中部教室举办的中山大学平民夜校的校长。黄焕秋、刘秉钧等进步同学担任教员。学生有二三百人。该校不仅为贫苦大众子弟提供了学习文化的机会，而且成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场所。我参加了“中青”以后，组织上分工要我办好这间平民夜校，以夜校为阵地团结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中青”为了组织和领导中山大学乃至全广州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必须有一个秘密活动的场所。我就以中山大学平民夜校校长的名义，以教师中午或晚上休息的需要为理由，向学校当局要了几间木屋，作为我

们秘密活动的场所。我们就在这里油印宣传品，筹划学生运动。

一九三五年底，“一二九”运动前，广州的青年学生运动，由于当时主要是靠党的政策的影响和个别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及进步教师的积极宣传、组织和指导，还没有党组织的坚强统一的领导。所以，这时期广州的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还有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缺乏集中统一的组织领导，各种力量比较分散，尚未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但是，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逐步组织力量，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这个总方向是对的。它为广州“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动和组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准备。

## 中山大学“双十二”示威大游行

一九三五年秋，随着日军在华北侵略活动的加紧，全国抗日斗争的热潮也逐渐高涨。八九月间，广州的进步青年，从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看到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更明确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方向。“中青”组织发出指示，要求“中青”的组织和成员，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加紧工作。中山大学的“中青”为迎接全国

抗日高潮的到来，加紧在校内的活动，用各种宣传方式来激励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推动抗日战争。当时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就是把报纸上载有抗日救亡斗争或日军侵略暴行的消息剪下来，加以编排，用红笔加上醒目的标题，在各宿舍、饭堂、阅报室张贴。这些剪报两三天出一次，对同学们有很大的鼓励作用。有时也编写壁报，记得其中有一篇集体创作的《抗日问答》，由于有理有据，形式活泼，吸引了很多观众。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不断印发油印报，登一些较长的文章，把党的抗日主张，用通俗的文字写成文章，刻印出来。钱兴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并亲自去做。这些工作是在非常机密、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白天黑夜地干，没有拼命苦干的精神是做不出来的。有时白天刻写蜡板没有适当的地方，就到石牌的茶山去干。这座山在石牌中山大学附近，站在山顶能看得很远，有不可靠的人走来时，可及时转移或隐蔽。钱兴就经常在这里赶刻宣传抗日的文章，他以石头做桌子，坐在地上刻，在烈日下经常一刻几个钟头。这些宣传品的印刷，多数是在我们平民夜校教师休息的木屋内进行。这些油印报，在中山大学和其他学校的进步同学中流传广泛。对激发广州地区青年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情，推动抗日战争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一天晚上，我在平民夜校教师休息的木屋里休息，钱兴找我研究如何贯彻上级的指示，要

我们动员同学们起来反对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问题。他认为目前我们除了继续做好宣传工作之外，应立即开展组织工作。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经过一番紧张的活动，在中山大学文学院的社会系和教育系三年级、法学院法律系四年级、政治系三年级分别成立了抗日会。他们发表宣言，号召全校同学立即行动起来，联合全校、全市的爱国师生共同奋斗。政治系三年级的学生在钱兴等人的发动和组织下，还在石牌中山大学校内举行了一次抗日游行。这几个班的抗日会是随后中山大学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的先行组织，也是广州“一二九”运动的滩头阵地。在此期间，各进步团体还邀请进步教授邓初民、何思敬等来举行抗日演讲会。经过这些活动，广大青年学生日益觉醒起来，积极要求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国民党当局压制抗日救亡运动的斗争。

但是，广州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每前进一步，都必须和落后、反动的势力作尖锐复杂的斗争。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和组织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北平学生举行“一二九”抗日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广州时，在石牌的中山大学学生立即轰动起来。他们激动地奔走相告，各宿舍、饭堂门前到处出现了

加上红圈和鼓动口号的剪报墙报，报道北平学生示威的情况，号召同学们积极响应，立即行动起来。

十日晚上，中山大学全校各班的班代表在文学院宿舍召开会议，讨论全校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召开全校抗日大会问题。在这次会上，进步的同学和由中山大学校董、广东省民政厅厅长林翼中操纵的“抗声社”的成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抗声社”成员不愿意召开全校的抗日大会和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提出以班代表会议的名义发表宣言，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企图以此阻止中山大学大规模地开展抗日运动。但是，进步的同学早就估计到“抗声社”成员可能会这样做，所以在召集这次班代表会议时，就动员了许多同学在会场周围旁听。当会上发生争论的时候，旁听的同学一致呼吁代表们必须通过决议，在翌日（十一日）上午召开抗日大会，大规模地开展中山大学的抗日运动。在群情激昂的压力下，班代表会议一致决定在十一日举行全校抗日大会，“抗声社”成员也不敢提出反对意见。

据“抗声社”成员李树写的材料记载：“抗声社”是林翼中想兼任中山大学校长，指使他的爪牙在中山大学组织的一个半公开的所谓“抗日”群众团体的御用组织。他们在中山大学的活动，主要是由中山大学助教、“广东地方自治人员训练所”负责人张仲绛主持。他们经常所做的事，是研究如何竞选各系、各年级、各班的代表，和各系所组织的学术性的研究会、各地方的同乡会等组织的代表，借此把持这些



组织的领导权，逐步争取广大师生的支持，把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赶下台，由林翼中兼任校长。一九三六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倒台之后，林翼中、张仲绛相继出国，“抗声社”自动解体。但在“一二九”运动前夕，他们在中山大学网罗的人数已不少，分布在全校各个学院，各系许多班的代表都是他们的人。当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来，中山大学的抗日运动大规模兴起，并酝酿召开全校抗日大会时，他们就蓄谋破坏，立即开会“研究如何争当大会的主席，操纵大会，使运动不致扩大”。

十日深夜，文学院、法学院几个班级成立的救国会和各院系的进步同学组成的“夜呼队”，每队约二三十人，分别到文、法、理、工、农各学院的学生宿舍前，齐声高呼：“明天上午在大礼堂开抗日大会，请同学们一致参加！抗日救国，不落后人！”宿舍里的学生有的已经睡了，也从床上爬起来鼓掌响应，并高呼抗日口号，此起彼落，非常热烈。

十一日上午，中山大学各学院的学生纷纷向大礼堂集中，在市内的医学院和附中也派代表参加，一共三千多人，举行了隆重的抗日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通电全国，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吁请政府领导抗战，并决定十二日到广州市区举行示威游行。但在这次大会上，“抗声社”成员按照其主子的旨意，竭力篡夺抗日运动的领导权。他们事先串通一气，提名文学院的“抗声社”骨干李树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且当选。“抗声社”成员把持了中山大学抗日会主席团的

席位,对中山大学和整个广州市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都起到了阻挠和破坏的作用。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中山大学全体师生三千多人的抗日游行队伍,从石牌浩浩荡荡地向市区进发。当游行队伍经过沙河、黄花路到达东山时,医学院和中山大学附中的一千多学生也参加进来了。四千多人的抗日示威大军象一股洪流涌向市中心。由于多年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使得每一个具爱国良心的青年学生都积压着无限的悲愤,待机发泄出来,又由于事前做了大量的发动和组织工作,所以,中山大学的學生几乎全部都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了。游行队伍以“国立中山大学抗日示威大游行”的门旗为前导,同学们迈着有力的步伐,手持标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全国一致抗日!”等抗日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歌曲。游行队伍经过马路时,许多群众站在两旁,以兴奋赞同的目光凝视着我们,壮烈的口号声和歌声,扣动着每个人的心弦,很多人向游行队伍热烈欢呼鼓掌。当游行队伍经过长堤,进入六二三路时,同学们脚踏着帝国主义曾经屠杀中国人民的地方,当年“沙基惨案”帝国主义开枪扫射爱国游行队伍的惨景浮现在人们的脑海里,面对着帝国主义分子霸占着的沙面租界区,同学们义愤填膺,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妥协投降!”等口号,两旁的群众也一齐高呼口号,向示威游行队伍热烈鼓掌。示威游行一直到下午四

点钟。中山大学的学生徒步回到石牌时，已夜幕降临。

中山大学的“双十二”示威大游行，打破了广州几年来抗日运动沉寂的空气，使广东乃至华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走向一个高涨的时期。

## 争 取 领 导 权

中山大学“双十二”抗日示威大游行之后，“抗声社”成员原以为发表了宣言，举行了这次游行就算了。可是，广大同学的抗日热情却进一步高涨起来，纷纷要求再开大会，扩大抗日救亡运动。这时，“抗声社”成员眼看无法控制局势，害怕运动进一步扩大，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十三日上午，中山大学学生二千多人又在石牌新校大礼堂召开抗日大会，决定自动停课一周，联合全市学生自动停课宣传，联络全市学生扩大示威游行。对于大会决定要做的工作，把持中山大学抗日会主席团的“抗声社”成员消极怠工，不予执行。中山大学积极抗日的进步学生自动组织起来，到市内各学校进行联络和宣传演讲。从十三日到十六日，中山大学组织的抗日宣传队，分五个大队，一百三十三个小队，每队设队长一人，队员十余人，分头到广州市的主要街道、中央公园、近郊芳村和佛山等地进行演讲和张贴抗日标语等活动。经过几天紧张的工作，广州市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个宣传队、联络队在群众中和各学校中广泛深

入地播下了抗日的种子,不少学校如勸勤大学、广雅中学、市立女子师范等学校,都纷纷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对于广州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广东国民党反动当局怕得要死,急忙于十五日下午二时,在省参议会礼堂,召集全市中学生自治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拼凑成立了御用组织“广州市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推出市一中代表梁祖翘为主席团主席。他们鼓吹“读书救国”,妄图瓦解爱国学生的斗志,还指使中山大学“抗声社”成员继续把持中山大学抗日大会的主席团,敷衍群众,阻挠运动。在其主子的指使下,“学联”装模作样地召开所谓“抗日”大会,国民党省党部和教育厅的官员出席训话,胡说什么“游行无济于事”,“有效的抗日就是埋头读书”。他们拒绝中山大学的学生代表出席会议和介绍示威游行的经过。反动当局还布置各校的校长“要管好学生,不要让事态扩大”。于是,广雅中学学生由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被学校当局明令禁止。知用中学一些班级的学生召开抗日会,被校方勒令解散,发起人受到记大过处分。反动当局还通令各校,凡组织抗日会的,要经过国民党市党部的批准。同时,反动当局为镇压和破坏学生的爱国运动,还拼凑一个所谓“广州市学生救国会”,在一些大、中学校也设立了御用“救国会”,这些御用组织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收买的反动学生把持。这些被收买了的反动学生,平日专门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给反动当局打报告;当学生爱国运动高涨时,他们又利用“救国会”的招牌来竭力进行

破坏。我们中山大学联络宣传队的工作，就遭到过这帮反动分子的破坏。如中山大学的联络宣传大队到法学院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时，这些反动分子公然出来阻挠，不准中山大学联络宣传队进去。但法学院的广大学生却不顾这些流氓的阻挠，自动集合起来，热烈欢迎中山大学宣传队。“广州学生救国会”的头目、国民党公安局的“侦缉”黄培才更是猖狂。当中山大学和广州市各校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时，他四处出动，扬言要用手枪来对付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

十二月十六日，北平学生和市民一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地继续发展。十六日上午，中山大学全体学生再次召开抗日大会，通过了“停课十天，下乡扩大抗日宣传”的决议。这项决议是广东国民党当局授意他们的走卒提出来的。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个表面上看来是扩大抗日宣传运动的提案呢？原来，反动当局看见广州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蓬勃发展，十分害怕，但一时又不敢采取公开的镇压手段，于是想出一个“釜底抽薪”的诡计，想假借“下乡扩大宣传”的名目，把各学校的学生驱散到各县去，暂时扑灭广州市这个抗日救亡运动中心地区日趋高涨的抗日火焰，同时，再通过其爪牙破坏各学校到各县的抗日宣传队的工作，并指令各县政府和国民党党部禁止学生的抗日活动。“抗声社”成员认真执行了其主子的旨意，他们一方面赞成

停课下乡宣传的提案，一方面又实行怠工，不去组织队伍到各县进行宣传工作，任由学生自流分散回乡。有一些进步学生较多，真正进行抗日活动的队伍，在各县则遭到国民党党部的恐吓和驱逐。如有一个抗日宣传队在回到县里进行工作时，该县的国民党县党部委员竟带他们去“参观”县里的监狱，指着那阴森的监狱对同学们说：“你们如果不好好安心读书，听政府的约束，而要搞什么抗日运动的话，那你们就要准备尝尝铁窗风味。”中山大学附中有一队下乡宣传的同学，竟被国民党政府当局押解回校。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付爱国青年学生和爱国抗日救亡运动是多么阴险毒辣啊！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阴谋，继续推进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我和钱兴、粟稔、金昌华等进步同学认真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和如何进一步开展广州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我们都觉得广州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刚起来，为什么“抗声社”的成员突然又极力主张动员全部同学下乡去进行发动抗日宣传呢？既然他们主张下乡扩大宣传，他们又为什么不去组织同学下乡？这里肯定有问题。为了防他们借下乡宣传的办法，来扑灭广州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烈火，我们不能下乡，要坚持在广州继续做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我们还具体地分析了中山大学和广州市学生运动的情况，觉得存在几个明显的弱点：

第一、中山大学抗日大会的主席团为“抗声社”所把持，进步同学还没有完全掌握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权。而他们

把持主席团的位置,实行“包而不办”的消极怠工,这情况严重妨碍了中山大学和广州市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第二、中山大学广大师生目前已初步发动起来,尤其是广大学生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但没有建立全校经常性的领导机构,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来担负抗日救亡运动的动员和组织工作,使之能继续坚持和发展;

第三、目前主要是中山大学学生积极地投入了运动,广州市大多数大、中学校的学生,还是刚刚发动起来,只是分散地在进行抗日活动,还没有组成全市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机构和进行联合行动。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决定今后要努力团结全市爱国师生,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广州市的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运动,对把持中山大学抗日大会主席团阻挠抗日运动的“抗声社”成员,要给予彻底的揭露,把他们从抗日大会主席团中清除出去,把中山大学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权完全掌握过来。作了这样的决定之后,我们就紧张地行动起来,在学生群众和教职员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团结工作。为了争夺抗日大会主席团的席位,我们分头到各院系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同学中揭露“抗声社”成员把持抗日大会主席团席位消极怠工的情况,组织同学们选举各院的进步同学为院的代表。

经过十多天的紧张工作,我们认为条件成熟了,便于十二月三十日,在石牌中山大学礼堂召集全校同学开了一个

十分成功的抗日大会。会上同学们严厉责斥“抗声社”成员把持中山大学抗日会主席团的席位，实行“包而不办”，消极怠工的行径。大会一致决议撤销他们在抗日大会主席团中的席位，重新由各院分别选出代表组织主席团。当即由各院选出我(文学院)和钟远蕃(法学院)、李寿康(农学院)、张凤楼(工学院)、张万久(理学院)、陈柏昌(附中)和教师代表张农等人为代表，组成新的主席团，并推举我担任主席团主席。会议还通过了如下几项重要决议：①通电全国，反对对日妥协投降，反对华北自治；②筹组中山大学抗日救国会，以大会主席团成员为筹备委员；③定于三十一日举行广州市抗日示威大游行，继续扩大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鼓舞和坚定同学们的斗争意志，三十日晚上，在石牌中山大学文学院前面举行四五百人参加的野火会。会上由朝鲜籍同学金昌华作了沉痛的演说(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间，邹鲁为了装饰他的抗日招牌，曾收容了五六十个朝鲜籍的学生在中山大学就读，其中有不少优秀的革命青年，金昌华就是其中的一个。“七七”抗战爆发后，他到了西安，后在山西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中牺牲)。他详细地叙述了日本侵略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屠杀朝鲜和中国人民的惨状，说到悲痛处，讲演者和听众都流下了热泪。金昌华最后呼吁同学们一定要坚持抗日斗争，亡国奴当不得！同学们响应金昌华的沉痛呼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等口号。抗日救国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山大学的学生举行了第二次抗日示威游行。由于有部分同学下乡宣传去了，中山大学的学生参加示威游行的人数比上次少些。但游行队伍途经沙河和黄花路等地时，汇合了庚戌、执信女中、广雅中学、知用中学、中山大学附中、教中、女师等学校的部分同学参加，游行总人数仍达四五千。反动的广东省教育厅打听到中山大学的学生三十一日举行抗日示威游行的消息时，立即下令全市学校停课放假，有的学校封锁校门，不准学生出来参加游行活动。游行队伍在市内的主要马路示威游行，开展街头宣传活动之后，下午二时左右，游行队伍到达设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门前请愿，要求政府当局对抗日表明态度。西南政务委员会听到学生要来请愿，立即在门前布满武装军警，还摆出救火用的水龙头。游行队伍在门口等了一会，不见有人出来接见。当即推选包括我在内的六人代表（中大三人、执信、庚戌、市三中各一人），由我带领向当局交涉。在我们走到政府大门时，政府的官老爷怕得要死，指挥军警对我们一个个搜身检查。当我们代表全广州的爱国学生向政府当局提出为何禁止学生抗日运动和示威游行，要求取消一切压制民众自由的法令，给予学生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等的质问和要求时，当局的头头不见人影，只派了一位秘书谢宣邦出来接见我们。谢对代表们提出的质问和要求的问题，一个都不敢回答，只是口头上敷衍一番，说一定将同学们的意见转达常务委员们。游行队伍

早已不耐烦了，大家十分气愤，不断高呼口号。这次请愿虽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但使同学们进一步看清“西南政务委员会”当局的反动本质。当谢宣邦的话还未讲完时，就有同学高喊：“政府当局不理我们，我们走，向人民请愿去！”我回到了游行队伍，即带领队伍向市中心游行，沿途又有一些群众加入队伍。“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投降政策！”“消灭汉奸，收复失地！”的口号声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震荡五羊城！游行一直进行到夜晚。当中山大学的游行队伍回到石碑时，已是夜色苍茫了。同学们宣传和游行了一整天，连饭也顾不得吃，但大家的情绪非常高涨，都为以抗日救国的行动送走了一九三五年而感到快慰。同学们互相激励，要在新的一年里开展新的斗争。

## 成立抗敌会

一九三六年一开始，中山大学学生和教职员工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热潮的推动，和进步教师何思敬、邓初民以及广东“中青”负责人王均予等的影响和指导下，决定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更加尖锐复杂的斗争也随之而来：一方面，由于进步同学所掌握的中山大学学生抗日大会主席团（也就是全校抗日会筹委会）迅速和全市各校的学生取得联系，积极准备举

行全市学生的抗日示威大游行和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联合会。中山大学和广州市学生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另一方面，由于中山大学和广州市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续高涨，引起了广东国民党当局的恐惧和仇视，他们加紧策划加以压制和破坏广州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情况下，刚从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来的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充当压制和破坏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急先锋。

邹鲁，广东省大埔县人，是一个投机的反动政客。他一九〇五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一九〇八年参加朱执信等人在广州发动的起义，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和姚雨平等人为响应武昌起义，在广州组织北伐军并任兵站总监。一九一四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时，在东京出版《民国》杂志，邹鲁任编辑。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他先后担任孙中山在广东组织的护法军政府的财政部次长，广东省财政厅长，广东大学校长等职。在一九二四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但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对孙中山确立的三大政策即持反对态度，并着手进行破坏。孙中山逝世后，邹鲁即成为分裂国民党，另立中央，反对三大政策，破坏国民革命的“西山会议派”的重要头目。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大”，开除他的党籍。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同年九月，国民党组织特别委员会，邹鲁为该委员会委员。一九三〇年在新

军阀中原大混战中，邹鲁又参加了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京组织的“中央扩大委员会”，并参加组织政府。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内分裂为宁粤两方。粤方在广州成立反蒋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邹鲁任粤方中央党部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同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两派在上海召开所谓“和平统一会议”。会议决定，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邹鲁任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一九三二年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校长。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邹鲁是参与主持国民党西南党务和政务的骨干分子。他和广东军阀陈济棠等曾打起“抗日”、“倒蒋”的旗号，以欺骗群众，扩充势力。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蒋介石派戴季陶，马超俊到广州，邀请邹鲁等人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蒋介石积极拉拢邹鲁，在政治上安排邹鲁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及国府委员，在经济上答应给一百万元作为中山大学的建校基金。邹鲁被蒋介石收买后，即从“反蒋”转变为“护蒋”，他表示对蒋介石“非特不能再说推翻的话，而且应该极力拥护他”，<sup>①</sup>从而充当了蒋介石的走卒。

邹鲁政治态度的转变，加上中山大学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陈济棠对邹鲁的不满，指斥邹鲁办学无方，竟让学生“大闹学潮”。邹鲁为了讨好新旧主子，就卖尽气力来

---

<sup>①</sup> 邹鲁：《回顾录》第二册第544—457页。

破坏中山大学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位老奸巨滑的政客，对中山大学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采取这样的办法：一方面，他继续标榜自己一向“抗日”，强调全校师生员工必须在“抗日”的校长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否则便是“捣乱”行为；另一方面，他为了从组织上控制中山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企图取消由学生选举产生的中山大学抗日会筹备委员会，代之以教职员占多数，完全受他操纵的中山大学抗日会。为了迅速扑灭中山大学的抗日火焰，他刚从南京回来，即发出通告，决定于一月六日在中山大学大礼堂召集全校员生大会，由校长“训话”。他连夜召集教职员会议，策划如何扑灭中山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

邹鲁从南京回来之后，关于他被蒋介石所收买的消息，我们已有所闻。邹鲁召集全校员生“训话”的通告公布之后，进步同学已预料到邹鲁会来破坏抗日救亡运动，一场尖锐的斗争已不可避免。为此，钱兴去请示了王均予。他回来之后找了我、粟稔、李驹良、金昌华、钟远蕃等进步同学，认真研究并决定了要利用邹鲁“训话”的机会，召开全校员生的抗日大会，正式成立全校的抗日会，并决定举行广州全市学生的抗日示威游行，成立全市学生的抗日联合会等事宜。一月六日前夕，进步同学们彻夜紧张地工作，在大礼堂和各教室张贴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标语。针对邹鲁的干将、法学院院长郑彦棻平日破坏抗日运动的行为，同学们画了他的漫画像贴在大礼堂，题上“汉奸教授”四个大字，并在四周贴满了

“打倒破坏学生抗日运动的汉奸教授”的标语。这一方面是为了鼓舞广大师生员工的抗日爱国热情；同时，也是对反动教授和校长邹鲁的警告。为了维持大会秩序，防止特务分子捣乱，在抗日会筹委会的领导下，组成了一百多人的纠察队，由文学院学生冯道先担任总队长。五日晚，纠察队员彻夜守卫大礼堂，防止张贴的标语、漫画被坏分子撕掉。

六日早晨，中山大学的教职员工纷纷向大礼堂集中。在市区的医学院、附中的代表和部分师生也赶来参加大会。三千多人把大礼堂挤得满满的。同学们看到四周张贴的标语、漫画，心情激动，都预感到一场尖锐的斗争就要来临。九时许，邹鲁带着一帮亲信和警卫分乘几辆汽车来到大礼堂门前。他进入大礼堂后，一看那么多标语、漫画，这么多情绪激昂的学生，心里着实一惊，但仍故作镇定，迈步踏上主席台，进行对全校员生“训话”。

开始，同学们怀着急切的心情，想了解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邹鲁先说他到南京向蒋介石交涉中山大学建校基金的问题。以往凡大会讲话中提到蒋介石时，他总是破口大骂“蒋贼”。但这次“训话”谈到蒋介石时，则说：“蒋、蒋、蒋……”，老是说不出下文，说了好几个“蒋”，才说出“蒋先生”。我们一听，就相信“邹鲁被蒋介石收买”的传闻是确实的了。他吹了一通如何争取蒋介石答应给一百万元中山大学作建校基金之后，接着就讲到大家所热切关心的抗日问题。他吹嘘自己一向如何主张抗日，说这次“晋京”就是要

“催促”蒋先生实行抗日政策。当邹鲁替蒋介石宣传，说蒋介石也已经“准备”抗日时，同学们一听就恼火了，会场开始骚动，不断发出“嘘、嘘”声。邹鲁见用软的办法不灵，骗不了学生，就用压的办法，立即板起脸孔，摆起校长的架势，指斥中山大学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过火”了，“行为越轨”了。宣布会后他要亲自来“领导”中山大学的抗日运动，要解散由学生选举产生的中山大学抗日会筹委会，成立由学校领导的抗日会。他把话讲完，立即就宣布散会。同学们非常气愤，全场哗然，不肯散会，并高呼“我们要继续开抗日大会，成立中山大学抗日会”，“坚持抗日运动，反对包办抗日”等口号。邹鲁在主席台上非常狼狈，他再次宣布散会，要学生散去，但同学们不肯走，坚持要开抗日大会。这时，被进步同学指斥为汉奸教授的法学院院长郑彦棻，跳上主席台，为邹鲁帮腔，说什么学生要“服从”邹校长“领导抗日”。同学们平时已对这位郑某人的反动言行痛恨极了，现在他又出来为反动校长帮腔，更加气愤。没等他说上两句，全场就发出“赶快滚下去”的怒骂声。郑彦棻碰了个大钉子，不得不灰溜溜地走下来。接着文学院院长范琦硬着头皮走上主席台，摆起洋博士的架势发表演说，“劝告”学生要“服从”政府，要“服从”邹校长的领导，如何如何。说不到两分钟，也给愤怒的同学们轰了下去。邹鲁看见他的爪牙一个个被学生轰下了台，恼羞成怒，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在主席台上突然大肆咆哮，公然拍着桌子指着台下几千名学生辱骂说：“你们这是抗日爱

国吗？你们是亡国学生！”正在这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出现了僵局的时候，为同学们欢迎的邓初民教授站了出来，大声地面向同学们说：“同学们！请允许我向你们发出一个诺言，如果同学们因抗日救国而流血的话，那我一定要与亲爱的同学们流血在一起！”邓初民教授坚定的抗日态度，给同学们以极大的鼓舞，大会发出了热烈的鼓掌声。接着他又说：“同学们今天的抗日救国行动是正义的行动，你们的呼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呼声。但是，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大业，应不分党派，不分阶级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现在，谁不准抗日，谁就是全国人民的敌人，就要打倒谁；谁积极抗日，谁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就要拥护谁。邹校长和中山大学的教授们是抗日的，我们要拥护。邹校长什么时候不抗日，我们就什么时候打倒他。”邓初民教授这番话是很有策略的，他既肯定了学生的抗日行动，教育学生要注意斗争策略，争取了学生的信任；同时，又说：“邹校长和中山大学的教授们是抗日的，我们要拥护。邹校长什么时候不抗日，我们就什么时候打倒他。”这就套住了邹鲁和他的爪牙，同时又警告了他们。邓初民教授的讲话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它打破了会场的僵局，使会场的紧张气氛变得十分热烈，使大会得以继续开下去，而邹鲁也不敢溜走。我抓住这一时机，立即站起来，面向同学们，一边招手，一边走上主席台，一边高声地喊：“同学们！我们继续开全校的员生抗日大会，请抗日会的筹备委员上台来！”由进步同学组成的中山大学抗日会筹委



会的委员一个个迈步走上了主席台之后，我就宣布筹委会的委员是今天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我话还未讲完，邹鲁即站起来说：“我有意见！”我没等他讲下去，立即接着说：“邹校长也是当然主席团成员。”说完，我主动对邹鲁说：“请邹校长宣布开会。”但邹鲁不肯，他恶狠狠地摆手说：“你去宣布吧！”

我走到主席台前向全校的师生员工宣布：“中山大学员生工友抗日大会现在开始！”会场响起了一阵鼓掌声。接着，我作了简单的动员：“亲爱的教职员工们！同学们！目前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已到了危急的时刻了！北平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已经英勇地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但遭到各地政府当局的压迫，国民党南京政府继续执行对日妥协政策，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同学们！我们一定要坚持抗日救国运动，要动员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行动起来，一致抗日。为了祖国的独立和生存，为了全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我们要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内阻挠破坏抗日的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讲完，我就请同学们和到会的教职员工对今后如何开展抗日运动提出建议，让大会讨论，以决定我们今后的行动计划。同学们纷纷提出提案。主席团把同学们交上来的提案归纳为如下几大提案：

1. 立即正式成立中山大学员生工友抗日救国会，领导今后的抗日运动；

2. 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3. 停课一周,扩大抗日示威游行;
4. 联合全市学生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联合会;
5. 由学校在学生的保证金内,每人抽出一元作为抗日救国会的活动经费;
6. 为保证抗日运动顺利进行,抗日救国会成立联络宣传队和纠察队。

上述提案大会都一致地通过了。但是,在讨论第一提案,即成立中山大学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的人数和名额分配的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当这个关系到由谁来领导中山大学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大问题提出之后,邹鲁又跳出来,施展其卑鄙的政治伎俩,企图达到其操纵和破坏中山大学抗日救亡运动的目的。大会主席团根据同学们的意见,提出全校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学院和附中各选委员五人,教职员工也选委员五人,校长为当然委员,共四十一人组成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会的方案。邹鲁不同意,他提出学生和教职员工各选二十五名,校长为当然委员。这个方案的用意很明显,如获通过,邹鲁便会在教职员工中指派他的爪牙充当委员,加上他自己,便可以利用多数来控制抗日救国会,从而压制和取消中山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的方案一提出,不等师生考虑,就立即一手拉开我这主持大会的主席,而站到台前,使出国民党操纵会场的看家本领,大声说:“这个问题用不着多讨论,现在付之表决,就是学生代表二十五

人,教职员代表二十五人,校长为当然代表。”没有等师生发言,立即宣布:“无异议,通过!”当时,我感到这问题太重要了,它关系到中山大学今后的抗日救亡运动能否继续开展的大问题。于是,我就立即走到主席台前,用广大学生的力量来抵制校长的压力。我用征求意见的方式大声地对同学们说:“邹校长的意见是在三千多学生中产生二十五个委员,在四百多教职员中同样产生二十五个委员,这样合不合理?同学们赞成还是反对?”台下的同学们纷纷站起来,大声反对邹鲁的提案,坚持同学们自己的提案。邹鲁见他的阴谋不得逞,又大肆咆哮,气冲冲地走到主席台前,指着我大声地骂:“你这是乱七八糟,已经通过了我的方案,为什么又征求同学们的意见?”他气得似乎要发疯了,竟高高地举起他的右手,想朝我的脸上打来。大概他立刻感到这是做不得的吧,便将手用力地拍在桌子上,又气愤地指着我说:“你、你、你这个亡国学生!”我看再不反击不行了,我就回敬他两句:“我们开大会讨论提案,总要征求到会群众的意见嘛!”同学们看见邹鲁这样横蛮,非常气愤,高声地喊:“我们一定坚持学生的方案!”这时,邹鲁的亲信中山大学教务长萧冠英站出来为邹鲁帮腔,他说:“我赞成邹校长的方案,因为教师是学生的师长,不能跟各院的同学们一样只选五个委员。”萧冠英说话的声音很小,同学们听不清说什么。坐在大礼堂前排的钱兴同学十分机灵,他马上站起来面向着全体员生大声地说:“萧教务长也赞成我们同学们的方案,教

职员工只选五个委员。”同学们听到连萧冠英也反邹鲁的方案，就鼓掌欢呼起来。同学们的方案就这样全场通过了。邹鲁慑于群众的压力，也不敢再起来反对，就怒气冲冲地坐在一边。

方案决定下来，接着同学们就选出了各院的学生代表，教职员中选出了邓初民、萧隽英教授等五人，正式成立中山大学员生工友抗敌会执行委员会<sup>①</sup>，推举我为主席。选举完毕之后，我向大会建议：“请邹校长领导我们全校师生员工举行抗日宣誓。”同学们立即起立鼓掌。邹鲁无可奈何地站起来，举起右手，领导全场师生员工宣誓：“我们中山大学全体员生一致抗日，谁不抗日，天诛地灭！”于是，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这场斗争的胜利，同学们更加斗志昂扬。我连夜主持召开中山大学师生员工抗敌会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大会通过的各项提案和有关今后进一步开展中山大学抗日救亡运动的事宜。会议冲破了重重阻力，作出了几项重要的决定：1. 由我负责向校长交涉，按大会决定领取抗日经费；2. 推出代表负责组织联络宣传队，去联系全市各学校，准备组织全市学生的抗日示威游行和成立全市学生抗敌联合会；3. 定于一月九日联合全市学生举行扩大的抗日示威

---

<sup>①</sup> 由于南京政府还未对日宣战，为了争取合法存在，故公开不称抗日会，而称抗敌会。

游行,并成立广州学生抗敌联合会;4. 决定把中山大学的校车拨归抗敌会使用,以便利进行抗日宣传和联络活动。

七日上午,我到校长办公室找邹鲁交涉领取抗日经费问题。邹鲁看到我进入他的办公室,立即气冲冲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不吭声。看他这样子,我想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又要耍什么花招了。果然不出所料,他沉着气走了一二分钟之后,突然走到我面前,用手指着我进行恐吓和威胁说:“我接到报告,你昨晚开秘密会议。你做共产党,进行非法活动,要杀头的啊! 知道吗?”我立即反驳:“那是造谣。昨天我们开执委会,你没有来,但大家都清楚,不是什么秘密会议。今天我是根据大会和执委会的决定来向你领取抗日经费的。”起初,他不肯给,气愤愤地说:“学校没有钱。”我严正地对他说:“邹校长! 这是大会的决定,不拨款是不行的。如果你不给,我只好向全校的师生员工宣布你不肯给钱了。”他听后怕事情闹大,只好拿起笔批了一千毫洋作抗日的经费。有了这笔钱,又掌握了校车,我们开展宣传活动就好办了。抗敌会的人员赶忙写宣传大纲,印刷宣传品。钱兴一连几晚都在深夜二三点钟跑到广州市内,设法赶印出了大批抗日宣传大纲、传单和口号。中山大学的校车也忙碌地载着宣传队和联络人员往来于石牌和广州之间,紧张地准备九日的全市学生抗日示威游行。

九日上午,中山大学学生三千多人,早餐后集合在石牌新校孙中山铜像前举行抗日宣誓大会,宣誓仪式由农学院

教授张农主持。我代表主席团向到会的师生作了参加全市抗日示威大游行的动员报告之后，三千多人的示威游行队伍象一股洪流涌向市区。队伍到文明路中山大学操场时，中山大学附中学生一千多人加入了游行队伍。数以百计的宣传队随着游行队伍向市民宣传。纠察队沿途保护着游行队伍免受特务分子的袭击。反动的广东省教育厅知道这天全市学生要举行抗日示威游行，立即下令市内各学校放假，命令各学校的校长驱散学生，关闭校门，不准学生参加游行。但是，由于我们事先进行了大量的宣传、联络和组织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各学校的广大学生都冲出校门，陆续赶来加入了游行队伍。特别是广雅中学一千多学生冲出校门，全体赶来参加游行和抗日大会。到中午时候，示威游行的学生达一万多人。约下午二时左右，示威游行的队伍汇集到长堤新填地广场（今省总工会一带）举行广州市学生抗日大会。我和钱兴等人先后发表了抗日救亡的演说。大会一致通过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敌联合会，并推举我任主席。大会还一致通过了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学生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南京政府推行妥协投降政策等决议。宣传队深入到周围的市民、工人中去进行讲演，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大会和示威游行。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最热情的组织和领导者之一的钱兴同学，他不断地向市民发表热情的演说，动员了一批又一批的市民参加抗日大会和示威游行。由于宣传队员们不断地动员市民

参加大会,使参加大会的人数达到三万人左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妥协投降!”等口号声震动广州城,全城沸腾了。

广州市学生抗日大会结束后,同学们继续在市內游行示威,开展宣传活动。下午五时左右,游行队伍到了惠爱西路(即今中山五路),反动的广东省教育厅就在这条马路旁的将军西路内。我和扛红旗的钟远蕃等人在前面率领队伍游行。我们抗日大会主席团原来是没有计划要到教育厅门前示威的,但当队伍走近将军西路继续向东前进时,后面游行队伍的同学们大声呼喊起来:“到教育厅去示威!”“我们要质问教育厅为什么我们每次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就下令放假和封锁学校?”我听了同学们的要求之后,就停下来和其他几位领队简短交换一下意见,就决定率领队伍到教育厅门前示威。当队伍到教育厅门前时,教育厅大门关着。游行队伍在大门前不断地高呼:“反对法西斯奴化教育!”“我们要抗日爱国的自由!”等口号,和质问教育厅:“为什么我们每次举行抗日游行,教育厅都下令放假?”过了约十分钟,仍不见有人出来。因为教育厅一贯反动,一再压制和破坏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学们的心中积恨已深,这时更是气愤至极,队伍中有人大声喊道:“我们冲进去!”这话音未落,一位朝鲜籍的中山大学同学已跳墙进去,把大门打开了,几百名参加游行的学生立即象潮水般一涌而入。同学们一边冲,一边痛骂国民党反动当局和教育厅压制抗日救亡运动,一下

子把教育厅的办公枱椅捣得七零八落，玻璃也砸烂了。最后有的同学还把教育厅的招牌拆下来当作胜利品，抬回文明路的中山大学操场。下午六时半左右，游行队伍回到文明路的中山大学操场集中后，宣告抗日示威大游行胜利结束。

这次由中山大学学生发起组织的广州“一·九”抗日示威大游行，和前两次抗日示威游行相比较，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参加人数多。参加游行的学生一万多人，连同参加抗日大会的市民和工人共达三万人左右；

第二、发动面广。不仅全市各大、中学校基本上都有学生参加，而且还有一万多市民和工人参加了抗日大会和示威游行；

第三、组织工作比较严密。尽管教育厅下令“放假”，驱散学生，封锁校门，命令各学校的校长不准学生参加示威游行，但由于事前组织工作做得好，全市各校的游行队伍还是能冲出校门，按计划参加了全市的抗日大会和示威游行。在全市学生的抗日大会和示威游行过程中，秩序比较好，没有出现混乱现象和意外事故；

第四、统一指挥。不仅中山大学的游行队伍有统一指挥，全市的大会和示威游行，都在统一领导的指挥下进行。

上述特点不仅反映了广州青年学生抗日热情的空前高涨，而且也表明广州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由分散、自发地进行，发展到集中统一领导的新阶段。



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一·九”示威游行声势浩大,并冲击了教育厅,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极大的震动和恐惧。号称“南天王”的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听到学生群众冲击了教育厅时,大为震怒地咆哮:“这不是造反吗?学生既然今天敢打教育厅,明天就敢打我的总司令部。”立即召集他的文臣武将、政客学阀,申斥一番,要他们想办法镇压广州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果然,广东国民党反动当局很快就撕掉其“支持抗日”的假面具,使出屠杀手段来镇压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和过去血腥镇压革命运动一样,国民党反动当局马上派出侦缉特务四处查捕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骨干,通缉我和钱兴等主要领导人员。一月十日,我们听说广雅中学被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抗敌会的纠察队立即集合了三百多学生,分乘校车多辆前去援助。到达目的地和广雅中学的同学汇合后,才知道是一个谣言。大家热烈握手,相约以后紧密团结,互相支持。在中山大学的支援队伍准备回校时,忽然有一个自称是广州市“工会”派来的人,向金昌华打听我,说“工会”要和曾振声联系。金昌华见这个家伙神色慌张,一身流氓气,知道不是好东西。于是对他说:“你要找曾振声吗?我们带你去。”这家伙跟上车来,到了中山大学,金昌华等把他领到一个房子里,一连给他几个耳光,揭穿他是破坏学生运动的坏蛋,追问他找曾振声干什么?如不讲明,就交学生群众公审。那个特务被吓得求饶,承认他是公

安局派来的“侦缉”，并说公安局要逮捕曾振声。同学们知道抓到了特务，纷纷赶来要求痛打这个坏蛋。学校当局知道此事，赶忙通知公安局派人来把特务带走。从此，特务们天天到处追捕我和钱兴等人，我们被迫转入秘密活动。不久，我到了香港，去寻找党的组织领导及进行新的工作和斗争。

一月十三日，发生了“一·一三荔枝湾惨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侦缉、流氓、特务，打着“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的旗号，对国民大学等学校近一千名举行抗日示威游行的学生，大打出手，打死打伤爱国学生数十人。惨案发生后，陈济棠立即宣布全市戒严，到处通缉搜捕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骨干。邓初民、何思敬等进步教授被迫逃亡。中山大学学生粟稔、张凤楼、冯道先、朱文畅、禡万禾等多人陆续遭到秘密逮捕。经过钱兴、金昌华、黄焕秋、罗范群等进步同学开展营救被捕同学的斗争，粟稔、张凤楼、禡万禾等同学保释回校，但冯道先、朱文畅同学惨遭杀害。广州市学生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广州市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一·九”全市学生抗日示威大游行，给广州市的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激起了汹涌的抗日爱国热潮。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中山大学抗敌会印发的宣传品，不仅散发到广东各地，而且还散发到广西、湖南、江西、云南等地。广州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祖国西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它不仅对全

国的革命斗争起了积极配合的作用,而且对后来我党在广东和华南地区建立党、团组织和人民武装,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历史可以永远作证。

## 第三章

# 在香港从事海员工运

### 为找党组织当海员

我由于参加组织和领导广州地区一九三六年一月九日的抗日大会，并在会后举行的示威游行中冲击了压制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省教育厅，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接着，中山大学停止了我的学籍，广州的“中青”组织又停止了我们在中山大学“中青”支部的组织生活。我一心为挽救祖国危亡，满腔热情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不料遭来如此大祸。对于反动政府和学校当局可能对我的迫害，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可是，对于“中青”组织给我们的处分，我和钱兴都想不通。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开展，而我自己则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内心十分痛苦。当时，反动派到处通缉我，我为了坚持在广州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山大学广大师生的掩护下，仍在中山大学校内坚持了一些时间。为了

避开敌人的追捕，我不得不一个晚上换几个宿舍睡觉。后来，由于环境日见恶劣，加上我不能公开活动了，处境一天天困难。于是，我和钱兴认真研究了今后怎么办的问题。钱兴认为：“虽然现在反动派到处追捕你，‘中青’又停止了我们的组织生活，但抗日救国的斗争我们不能停止。怎么办？我们要分开活动，我继续留在广州坚持斗争，你立即到香港去设法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找到了党组织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了。”我完全同意钱兴的意见。

为了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我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旬到了香港。

香港（包括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是世界著名的海港城市。它位于我国广东东南沿岸、珠江口以东，背靠大陆，面临太平洋，为远东航运交通的中转站，航运十分发达，因而海员众多。由于我父亲是海员出身，我从小就和海员有较多的接触，对海员有亲切感。更重要的是，我想通过海员的关系来找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所以我到香港后就很关心海员的情况。

我到香港时，香港的中国海员有五万人，其中远洋轮的海员三万人。当时香港的航运和中国海员分布的情况大致如下：

（一）走太平洋航线的有英国的昌兴、太古、士利、亚细亚和渣甸公司，美国的大来公司，中国的招商、三比、政记、

永泰公司和挪威的轮船公司。约有轮船一百至一百五十艘，中国海员约一万五千人。美国大来公司的中国海员一千多人已全部被辞退，美籍华裔海员还留下。

(二)走南洋(即东南亚)航线的有英国的铁行、银行、咭行、和丰四个公司，荷兰的 KMB 公司和法国、意大利的轮船公司。约有轮船一百多艘，中国海员约一万二千人左右。

(三)走大西洋航线的，当时从香港直接到大西洋的船比较少，大多数是经过南洋，再开往欧洲。直接从香港去大西洋的船，主要是意大利和法国公司的船，其轮船和中国海员的数字不详。只知道意大利的船没有中国的海员，法国的船中国海员也比较少。

(四)走印度洋航线的主要是荷兰渣华公司的轮船，约有二三十艘，中国海员二三千人。

(五)走中国沿海航线的有美国太古公司、日本的轮船公司和中国的招商、三比、政记三个公司。走沿海航线的船一般吨位都比较小，约有轮船一百五十至二百艘，中国海员二万人左右。

上述轮船公司绝大部分是外国的，除了极少数是中国资本的小轮船之外，远洋的轮船、大型的轮船，几乎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他们利用廉价雇佣中国贫苦阶层的人当海员，并且利用封建性的行会(馆口)老板包办雇佣权，从中克扣海员的工资，进行封建剥削。当时中国海员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

香港的海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一九二二年初,香港海员已组织了工会,并举行了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一九二五年又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香港大罢工。因此,我认为通过海员组织可以找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由于我有不少同乡和亲友是当海员的,平时已对海员有所接触和了解。所以,我到了香港之后,就与香港海员的一个组织“余闲乐社”当时的负责人廖茂和黄修、肖春、方世林等取得联系。他们听说我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因为参加组织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被反动政府通缉而到香港来的,大家对我都很尊重。我问他们有什么工作给我做?他们研究后要我为“余闲乐社”办个刊物,叫《余闲》。过了一段时间,廖茂又找我商量,说新界九华径村的居民多姓曾,有许多海员,那里有一间招收该村海员子弟读书的“养正学校”,希望我能到那里去,帮助把那间学校办好。我接受任务到了九华径“养正学校”教书。当时的校长叫曾金先。

九华径是香港新界近海一个僻静的小村庄,山清水秀,风景宜人。这里的师生和村民对我非常热情友好,我很快和他们交上了朋友。我努力把 work 做好。

一九三六年约二月间,当时设在上海的赤色海员总工会写了封信给“余闲乐社”。“余闲乐社”的负责人黄修拿给我看,这封信的内容是关于如何开展海员工作的问题。我看了之后,以为这是共产党的指示。我向黄修提出,这封信留下让我今晚详细看看。黄修同意了。我马上把信的全文抄

下来，秘密回到广州，拿这封信给钱兴看，一起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当时，我们两人都认为这封信是共产党的指示，通过海员关系是可以找到共产党的组织的。最后，钱兴说：我们是知识分子，工人组织对我们不会太信任的。要找到党的组织，必须深入到工人中去，使自己成为工人中的一员，并在行动中切实为工人做好事。这样，工人就会相信你，党组织才会相信你。我觉得这个分析很对。于是，我决心去当一名海员工人。

前文已经说过，曾琮是我同龄的侄子。我们两人从小一起读书，感情很要好。他现在是“日本皇后”轮的二台亚头，在该轮船上有一定的威信。于是，我就通过曾琮的介绍，到“日本皇后”轮船上当了一名海员工人。

## 建立惠坪乐善公所

英国昌兴轮船公司的轮船，以“皇后”命名，叫“皇后轮”。当时主要有“日本皇后”、“加拿大皇后”、“俄国皇后”和“亚洲皇后”四艘邮船，称为“四大皇后”。“日本皇后”轮是一九三〇年出航代替“法国皇后”轮的，它是“四大皇后”中比较大的一艘，有三万多吨，船上有中国海员近千人。这些海员一半是从“加拿大皇后”轮上调来的，另一半是从香港雇佣来的。在“日本皇后”轮上本来是有中国共产党和赤色工会的支部的，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在我到船上



工作时,已经没有党和赤色工会的组织活动,甚至“余闲乐社”的组织活动也停止了。

在我后来任中共香港海委书记时,一些老党员向我谈到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对海员工运严重危害的情况。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间,赤色海员总工会由于执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在领导海员斗争时,不顾客观条件,提出了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要求,盲目号召罢工、同盟罢工。在斗争策略上,一定要打着赤色工会的旗帜,不肯利用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去团结和组织群众;在斗争中,片面追求大的胜利和影响,盲目地与敌人硬拼,特别是把“俄国皇后”轮搞成赤色堡垒,在香港罢工与武装警察硬拼;在“加拿大皇后”轮殴打乘船的买办梁源和,等等。结果,在各种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海员群众吃尽了苦头,许多人被开除,有的人被逮捕,严重挫伤了广大海员斗争的信心和勇气。特别是每逢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都要求党员和骨干分子带头动员和组织海员,上街游行或在船上举行集会。这样做虽然表示党的存在,表现了革命与不怕牺牲的英勇斗争精神,可是却暴露了自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每一次,都有不少革命骨干和海员群众,遭到敌人残酷的迫害。到后来,有不少海员群众,因害怕反动派的迫害,不敢接近海员总工会。总工会送去的宣传品,虽然当面接受了,等总工会的人走了,他们不是立即烧掉,就是扔到海里去。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情况

下,赤色海员总工会仍坚持“左”的错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日,海员们无比激动,自发地向十九路军捐献、慰问,并把抗日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看作民族英雄。可是,一些船上的赤色工会支部,却进行相反的宣传,说“蔡廷锴、蒋光鼐都是军阀,他们抗日是为了国民党,不应该支持他们。”在“总统号”船上的赤色工会支部,竟提出“工人无祖国”这种完全脱离群众的错误口号,反对海员向抗日的十九路军募捐,打击了海员的爱国热情。结果,船上赤色工会支部的负责人,被海员们指责为不爱国的人,受到孤立,被迫离船。这个支部也就垮下来了。这样做的结果,严重损害了海员工会的声誉,动摇了海员群众对它的信任。在“左”倾错误的折腾和破坏下,中国的海员工人运动受到了惨重的损失。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海员总工会转入地下初期,全国赤色海员总工会下属有组织的会员仍有一千五百人以上,仅香港就有八百多人。可是,到了一九三三年底,赤色海员总工会下属的会员不过三四百人。在工会基础最好的外洋轮上的会员,也只剩下一百零八人。在一九三三年海员总工会负责人廖承志、李大林等被捕之后,党的组织几乎全遭破坏,海员总工会几乎陷于瘫痪。

我到了船上之后,先安排我做听铃的“走钟仔”,工作很简单,那个客房的电铃响了,我就去问有什么事要办?按旅客的需要提供服务。每月工资二十元港币。当时,船上的海员中大学生只有我一个人。我利用空闲的机会向海员们讲

国内外形势，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大家对我很亲热，很尊重。特别是厨房的工人对我很好，我要吃什么，他们都给我吃。很快我就与海员们打成一片了。

在船上，有曾寿隆、张东荃等几位失去组织关系的老共产党员和一些赤色工会会员。他们了解到我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因参加组织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而被反动派通缉跑到船上来当海员的，便以为我是共产党员，都很信任我，主动找我谈心，向我介绍船上的情况。据他们介绍，以前“日本皇后”轮的“余闲乐社”是很活跃的。他们在船上搞文娱演出，向乘客进行募捐。所得的钱用来购买保健药品、书刊读物，添置乐器，还为死亡工友的家属筹备救济费用，很受广大海员的支持。后来，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搞了一些过“左”的行动，几次发生欧打外国管理人员的事件。结果，曾金先、黄修等一批骨干被轮船公司开除了，“余闲乐社”的活动也被船长禁止了。从此，船上冷冷清清，海员们十分苦闷，大家都希望能够恢复活动。

我了解这情况之后，就和曾寿隆、张东荃等人商量。我向他们提出，现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而我们船上则冷冷清清，大家都很苦闷，长此下去不是办法，我们要设法组织大家恢复活动。他们说，我们也想恢复活动，但船长禁止，搞不好又要被开除，对大家打击更大。我说，以前你们的斗争方式有问题，搞得太激烈，太红了，所以行不通。如果我们改变方式，注意方法，有可能争取大管事和船

长的同意,把过去的活动恢复起来。他们问:你讲讲有什么好办法?我提出:我们现在不宜公开搞有政治色彩的组织 and 太激烈的活动了,但可以用灰色组织的形式,比如以组织同乡会,搞慈善活动的名义组织群众,争取各方的支持。我们船上有一批惠阳的海员,坪山人也不少。我的老侄二台亚头曾琮就是坪山人,他在船上有威信,大管事和船长也相信他。我可以去说服他,请他出面,在船上成立一个由惠阳县坪山的同乡组成的慈善性质的组织,叫“惠坪乐善公所”。我想,这办法是行得通的。

我们统一了意见之后,我就去做曾琮的工作,争取了曾琮的积极支持。于是,由他出面去向船长提出成立“惠坪乐善公所”的申请,并发动大家报名参加。我和曾寿隆等人分头去发动海员报名。结果,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很快“惠坪乐善公所”就成立起来了。不仅惠坪属的海员参加,别的海员也参加,人数达一百多人。“惠坪乐善公所”成立之后,立即恢复了以前“余闲乐社”进行的活动。我们不仅组织演戏,进行募捐筹款,做一些慈善福利事业,而且还适当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和募捐活动,很受广大海员和乘客的欢迎和支持。“日本皇后”轮死气沉沉的局面打破了,出现了活跃热闹的气氛。见此情景,船长也满意。我们的工作迅速打开了新的局面。后来,我离开“日本皇后”轮后,在香港又租了一个房间作为“惠坪乐善公所”的办事处,出版了定期刊物《坪潮》。一九三七年八月,成立“香港海员工会”时,“惠坪乐善

公所”成为其中的一个发起单位。一九三八年冬，我回坪山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时，“惠坪乐善公所”又派出宣传慰问团回坪山来对我们部队进行慰问，并向家乡的抗日军民演出抗日救亡的文娱节目，深受观众的欢迎。

“惠坪乐善公所”对恢复海员工运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

由于当时赤色海员总工会的负责人丘金，曾经在“日本皇后”轮做过海员，他与曾寿隆是熟识的。所以，“日本皇后”轮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很快反映到丘金那里。当我在“日本皇后”轮第二次航程从加拿大返回香港途经日本时，我接到了钱兴的来信。钱兴告诉我：“现在陈济棠垮台了，余汉谋上台。你可以回来中山大学继续读书了。王均予已通过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关系找到了党的组织，现在他可以在广州发展党员了，你回来广州后，可以吸收入党。”我顿时心情激动，恨不得立即飞回广州，早日解决久已渴望的入党问题。回船又经上海时，丘金通过曾寿隆找到了我。曾寿隆向我介绍了丘金的情况之后，我们在旅店租了个房间，谈了一个晚上。他对我十分信任，把许多情况都告诉我。当我向丘金提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时，丘金说他自己也没有党的组织关系。他鼓励我不要灰心，要继续努力，参党的问题迟早是会解决的。最后，我把钱兴来信的情况告诉了丘金，他听后十分高兴，就把香港的赤色工会会员介绍给我，并写了封信给“余闲乐社”的负责人，要我去领导他们开展工作。从

此,我就开始负责香港海员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了。

## 巧遇抗日名将张炎

一九三六年五月间,“日本皇后”轮从加拿大的温哥华港开出时,正好抗日名将张炎和夫人郑坤廉乘坐该轮的头等舱。他在船上看了海员宣传抗日救亡的文艺演出之后,觉得这艘船的抗日气氛特别好,与别的船大不相同。于是,就向一位参加了“惠坪乐善公所”的海员了解情况。他问海员:“你们船上有没有读书人?”海员告诉他:“我们船上不仅有读书人,还有一位中山大学的学生,我们的宣传演出就是他搞起来的。”他听了之后就提出要那位海员介绍他认识这位大学生。

一天晚上,一位海员来找我,说住在头等舱那位旅客要认识认识我,说完就带我去见那位旅客。我到了头等舱的一间房门外,一位颇有风度的英俊青年即出来和我握手。他自我介绍说:“我叫张炎,请进内坐。”并介绍他的夫人郑坤廉女士(原中山大学的学生)给我认识。张炎将军的名字我听说过,但未见过其人。现在出现在眼前的这位大约三十二三岁的英俊青年,竟是血战沙场的十九路军抗日名将。他对我满腔热情,非常坦率和诚恳,没有半点架子。很快我们就交上了朋友。

在从温哥华到香港的航程中,张炎将军和我坦率、诚恳

地交谈,从国内外形势谈到个人的经历。他告诉我,他是广东吴川县人,出身贫农家庭,读了几年书就去做工,在药店和茶馆当过工人。二十年代初,他随堂兄张世德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粤军。在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南征邓本殷,北伐吴佩孚。由勤务兵晋升为营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非常愤慨。当时,他驻防南京,就与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等将领发起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推举蔡廷锴为总指挥,他和翁照垣为两个独立旅的旅长,请缨北上抗日。正当他们准备出发之际,“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了。他接到上海第十九路军总部的命令,连夜率领第六十一师(辖两个旅)开赴上海,参加抗战。他指挥的部队打得很顽强,与日军浴血奋战,重创敌军,并配合友军,击退日军“久留米”名牌师团主力的进攻。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第十九路军坚持了一个多月的英勇战斗,毙伤敌一万余人,多次粉碎敌人的进攻,迫使日军三易其帅。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致使第十九路军撤出上海,并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一九三三年初,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之后,又侵占热河和察哈尔北部,并向长城各口进攻,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为了抗日救国,他又与蔡廷锴、谭启秀(第七十八师副师长)组织“援热先遣军”,再次请缨北上抗日。但当先遣军到达湖南耒阳时,国民党政府已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命令先遣军回师,开赴福建进行反共内战,北上抗日的愿望终

于未能实现。在几经挫折之后，他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实现抗日救国，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是抗日救国的最大障碍。于是，他积极参加了一九三三年冬，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第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部李济琛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的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在福建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福建事变”前，他接任独立第四十九师师长。“福建事变”后，他任第四军军长。可是，在蒋介石重兵进攻和以重金、高官收买下，事变很快失败了。蒋介石派杨永泰做他的工作，答应委任他为第七路军副总指挥，替蒋介石进行反共内战。如不愿干，就给六万元让他出国“游历”。他拒绝了蒋介石的委任，被迫出国“游历”了。在海外漂泊期间，他深感身为一位军人，在大敌入侵的时候退出沙场，万分惭愧。当他听到绥远抗战的消息，立即动身回国。

他问我：“你为什么到船上来当海员呢？”我把自己从澳大利亚回国读书，到由于参加组织和领导中山大学和广州地区的青年学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而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然后到船上来当海员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他。他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又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目前敌人一步步入侵国土，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许人民起来抗战。所以，当前的民族危机是十分严重的。为挽救祖国的危亡，必须停止内战，一



致抗日，必须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抗战。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敌人随时都有入侵的可能，我们更应加紧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一旦敌人入侵广东，我就组织海员和港澳同胞回家乡组织民众抗日武装，进行保家保国的抗日游击战争。他听着不断地点头，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当船快到日本横滨停泊的时候，张炎将军提出要我陪他一起去东京玩。但在我们穿好了衣服，准备动身的时候，他考虑到怕日本特务认出他会找麻烦，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去了。船到达目的地香港的时候，我送他夫妻上岸。我们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他要求我给他留下地址，希望以后能经常联系。

一九三九年夏天，我从惠阳游击区到香港联系工作时，聂永年先生通过我母亲的义妹找到了我。聂先生是张炎将军的好友。我回国读书时，他在中山大学做庶务工作。他为人热情，乐于助人。我是在他的帮助下到中山大学附中读书的。多年未见，两人十分高兴。我们坐下，聂先生就说：“这回是张炎将军派我专程来找你的。张炎将军现在就任第一区游击司令，辖高州六属和阳江、阳春一带。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共合作的主张，渴望得到共产党的支持。他曾几次派人到香港寻找你，希望你能到南路和他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日武装。去年派人到香港找你找不到，后来通过廖承志、连贯的关系，由香港学生赈济会派了一个青

年回乡服务团二十多人到南路，协助张炎将军开展工作。现在，群众发动起来，已组织起一支武装，他非常希望你能到南路，助他一臂之力，共同搞好南路的抗日大业。”

我听了聂先生的介绍，对张炎将军的爱国热情和才干，甚为钦佩；对南路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感到十分兴奋。可惜，我不能满足张炎将军的要求。因为我已在东江建立了一支抗日部队，党组织已决定我在东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于是，我把这情况告诉聂先生，请他转告张炎将军，我感谢他的盛情邀请，并请他体谅。

一九四五年夏天。我的侄子曾天福（他在南路和张炎将军一起工作，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组织部长。解放前夕，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来见我。他是在张炎将军起义失败，脱险之后来找我的。他向我谈了张炎将军在南路热情支持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他毁家纾难，变卖家业，筹款抗日；他抗击权贵，惩办汉奸林绳武、许宝石；他热爱青年，义释爱国青年共产党员周崇和（现名罗文洪）、文允斌。他的爱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满。一九四〇年夏天，国民党顽固派以“赤化南路”等莫须有罪名，迫张炎辞职。张炎将军被迫避居香港。一九四四年秋，他在李济琛、张发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支持下，又回到南路，组织抗日武装，很快发展到六七百人的队伍。国民党顽固派对张炎将军大力发展群众抗日武装十分恐惧和仇视。于是，派特务监视他的行动，并于一九四四年冬调重兵进攻张炎将军的老家吴川

的抗日力量。同时，派兵围攻化县自卫总队，将张炎的得力助手化县自卫总队副文邵昌杀害。张炎将军为了反击顽固派的进攻，遂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在吴川举行武装起义，一度控制吴川全境，成立“高雷人民抗日军”，张炎任军长。“高雷人民抗日军”发布文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消灭日寇，反击反动势力而斗争。起义军在国民党顽固派纠集重兵进攻下失败了。张炎将军带领十多个随员进入广西，欲与李济琛、张发奎联系。不幸在博白县被捕。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由蒋介石命令杀害。张炎将军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刑场上，高呼“抗日胜利万岁！”“民主胜利万岁！”英勇就义。

张炎将军是一位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爱国将领，是广东著名的抗日民主战士。他为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永远被人民敬仰！

## 组建中共香港海委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党中央从北方局派人到广东，进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一九三六年下半年，中共中央临时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和中共临时广州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工委”）相继成立，“南临委”由薛尚实任书记，“市工委”由王均予任书记。

一九三六年九月，我回到中山大学复学读书。同年十

月,我和钱兴、粟稔三人,由中共广州市工委书记王均予介绍,一起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是我人生道路上最重大的选择,是我一生最大的转折点。我自从了解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并认定要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之后,就千方百计寻找党的组织,渴望能早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能在党的领导下为祖国的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现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就决心把自己交给党安排,党要我干什么,我就下决心努力把工作做好,用实际行动实现自己入党的誓言。回顾入党以后五十多年的历程,我能够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能够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自己的一点贡献,我深深体会到就是因为有党的教育和培养,有党的领导。在中国,象我这样的青年,要实现人生的价值,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做得到。对于我来说,能够做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入党以后,我虽然还在中山大学读书,但是,由于我在香港开展海员工人运动的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如果我马上离开,对工作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于是,我把这个情况向党组织汇报,提出我不参加广州学生运动的工作,宁肯辛苦一点,一边在广州读书,一边继续做香港海员工运的工作。党组织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市工委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了香港,由“南临委”领导。“南临委”书记薛尚实直接指导我的工作。所以,我虽然回中山大学读书了,但从一九三

六年秋天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十月回东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时止,我一直未间断过参加领导香港海员工运的工作。在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我回到中山大学读书期间,虽然身在广州,但我的主要精力仍然是放在香港的海员工运工作上。这期间,我既要应付中山大学的学业,又参加海员工运的领导工作,每月都要四五次往返于广州和香港之间(新中国成立以前,内地进出香港都不要办什么手续)。

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由于有党组织的领导,在工作中指导思想更明确了,碰到困难的时候,能及时得到党组织的指示和帮助,所以,工作开展起来更顺利了。我入党之后,就全力恢复海员中的党组织,以加强党对海员工运的领导;同时,通过“余闲乐社”把广大的海员和洋务工人团结和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六年初,我到香港寻找党组织时,香港乃至华南地区的党组织仍未恢复活动。由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来广东进行恢复党组织工作的薛尚实,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才开始在香港发展个别党员。在香港的海员中,有一批参加过香港大罢工斗争的老党员,但由于海总系统的党组织被破坏,他们没有党组织的关系。一九三六年秋,丘金同志因上海的赤色海员总工会解散,回到了香港。他立即与我和曾寿隆、廖茂、周石永、叶盘生、谭其科等人建立了联系。丘金由于尚未接上党的关系,就会同廖茂、周石永、叶盘生、谭其科等十余

人,建立了“海员抗日救国委员会”,团结了一批中断了党的组织关系的党员、赤色工会会员和爱国积极分子。我入党后,就把丘金介绍给“南临委”书记薛尚实,由“南临委”接上丘金的党组织关系。接着,又解决了叶盘生党组织关系的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经请示薛尚实的同意,由我和丘金、叶盘生三人建立起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下简称香港海委),丘金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直属“南临委”领导。

中共香港海委建立之后,首先对中断了党的组织关系的党员进行了解。在中断组织关系期间对党的态度好,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表现积极,群众关系比较好,要求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的同志,我们就恢复他们党的组织关系。其中记得的有曾寿隆、周石永、刘达潮、周才、方世林等。同时,吸收了一批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表现积极,思想品质好,群众关系好,有一定活动能力的积极分子入党,如肖春、曾文瑞、李秀等。

“芦沟桥事变”后,党中央派张文彬同志来广东,整顿和加强以广东为主的南方党组织。一九三七年十月,张文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改组了“南临委”,成立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张文彬任书记,薛尚实任副书记。张文彬从薛尚实那里接过了香港海委的关系,由梁广直接与我们联系。年底,党中央派廖承志同志到香港建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发动和组织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支持祖国抗战。廖承志同志参加过国际海员工运和全国海员总工会的领导工作,他到香港之后对我

们海委的工作很关心。虽然组织上互相没有联系,但他常到我们“海华学校”和“余闲乐社”来,给我们介绍国内外形势,谈有关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问题。一九三八年初,“南委”书记张文彬决定调丘金去延安学习。海委的领导进行了调整,由我接任海委书记,禡荣任组织部长,潘汉夫任宣传部长。海委还是由“南委”领导,和中共香港市委有联系。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和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周伯明、香港区委书记谢鹤筹带领一批党员积极分子,回东江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潘汉夫接替我的工作,调吴光任组织干事,协助潘汉夫工作。同一天,在香港成立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梁广任书记。领导香港、澳门、中山、番禺、南海、顺德、惠阳、东莞、宝安的党组织和人民的抗日斗争。香港海委由东南特委领导。

海委成立初期,组织发展工作进行得比较慢,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七年底将近一年时间,党员才发展到三十人。一九三八年以后,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我接任海委书记之后,总结了前阶段工作的经验教训,认真抓了党的组织建设,积极发展党员。到我离开海委回东江打游击时,党员人数已发展到三百余人。除了在香港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之外,还在船上建立了三十八个党支部。

## “余闲乐社”的发展

“余闲乐社”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海员和洋务工人的一个重要的群众性的进步团体。它表面上是一个慈善和文娱性质的团体，领导人也有上层海员参加，但实质上却是为我党所掌握，通过它来团结和组织广大海员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全面抗战爆发后，它对我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的成员，成了我党在香港广泛发动海员，开展抗日救国斗争和建立香港海员工会的重要骨干。

“余闲乐社”早在一九三〇年就出现在“日本皇后”轮上。在这之前，昌兴轮船公司的四个皇后轮都有过不同名称类似“余闲乐社”的组织。如“加拿大皇后”轮也有“余闲乐社”（有人回忆是“工余乐社”）。当时，在这艘船上做工的共产党员曾寿隆，是一位善于广泛团结群众，有经验的海员。他根据群众的需要，利用业余时间组织文娱积极分子搞演出活动。他们把演出收入的钱积蓄起来买戏服、道具，组办剧团，成立了“余闲乐社”。后来，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赤色海员工会组织在船上发动过“左”的斗争，致使一些海员骨干分子被捕、坐牢，还有一些人被公司开除，失业回到香港。一九三五年三四月间，曾寿隆等和失业在香港的海员酝酿在香港成立“余闲乐社”总社。在讨论总社的命



名时发生了争论。廖茂等人主张叫“余闲乐社”，另一些人主张叫“大众俱乐部”。<sup>①</sup>这时，曾寿隆在“日本皇后”轮到上海时，把这个争论向当时海员总工会的负责人丘金汇报，并表示自己同意廖茂的主张。丘金支持曾寿隆的想法，不同意用“大众俱乐部”的名称，认为用“余闲乐社”的名称为好。他说：“余闲乐社”已为各皇后轮的群众喜闻乐见，容易为群众接受，“大众俱乐部”带有赤色色彩，不容易取得群众的广泛支持，要争取在香港合法存在也比较困难。他们按丘金的意见，加紧进行“余闲乐社”总社的筹建工作。

经过几个月紧张的筹备，一九三五年七月，由“日本皇后”轮发起，以“四大皇后”轮的“余闲乐社”为基础，一个联合各船的“余闲乐社”总社在香港正式成立，社址设在九龙弥敦道，受中共香港海委的领导。总社以互助公益组织的名义向英国香港政府申请注册备案，港英当局同意了。建社初期以“四大皇后”轮的“余闲乐社”为团体社员。当时，个人入社的社员还不多，只有一二百人，主要是开展互助公益活动。

“余闲乐社”的组织章程是以海员利益为出发点的，规定海员个人入社的基金二元港币，每月会费只交一毛钱。社员逝世，除每个个人社员交“帛金”五分钱，另外船上“余闲

---

<sup>①</sup> 1935年春，由“四大皇后”轮的部分积极分子集资建立，因没有得到上层海员（工头）的支持，未用“余闲乐社”的名称，而叫“大众俱乐部”。到“余闲乐社”总社成立时，“大众俱乐部”就结束。

乐社”从向华侨乘客的募捐款中支付一部分，这样死者家属可得丧葬费百余元。此外，还为社员办各种福利事业，如家属生活困难，生病治疗，在条件许可下尽量给予支援。还利用通信系统，把家乡的新情况，国内的新闻及时告诉在外洋的海员。每逢船回到香港时，总社组织剧团为海员和家属演出，并开办海员子弟学校等。这些活动一开展，参加的个人社员的人数迅速增加，使“余闲乐社”成为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组织。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余闲乐社”还担负起组织和领导海员进行爱国反帝运动的重任。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接受了党组织交给负责组织和领导香港海员工运的任务之后，立即在海员中开展建立党组织的工作。与此同时，认真抓好海员的抗日救亡运动。我觉得，要抓好香港海员的抗日救亡运动，必须从抓好“余闲乐社”入手。因为“余闲乐社”不仅是香港海员中最大的一个群众团体，而且有一批老党员和积极分子在起着核心和骨干作用。于是，我就以“余闲乐社”为阵地，通过“余闲乐社”广泛地把广大的海员和洋务工人团结和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在运动中发现和考察老党员和积极分子，为重建海员中的党组织作准备。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海员的反帝怒火。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更使广大海员义愤填膺。在我党的领导下，轰

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兴起。香港海员的抗日热情不断高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绥远部队和当地群众在傅作义将军的率领下，奋起抗击日军的进攻，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百灵庙。绥远部队抗战胜利的消息，振奋了人心，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援。我和丘金商量，决定立即抓住时机，由“余闲乐社”公开以救济战区灾民的名义，发动海员和洋务工人开展一个支援绥远抗战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于是，由“余闲乐社”发起，联合了三十六个团体，共同组织了香港海员、洋务工人筹赈绥远兵灾联合会（简称“赈绥会”）。为了进行宣传，“赈绥会”成立那天，我们大造声势。把消息登在小报上，通知海员和洋务工人到弥敦道“余闲乐社”开成立大会。当天，到会的人非常多，会场上人头涌涌，群情激昂，盛况空前。虽然香港当局派来了警探监视，但并不能抑制群众的抗日热情。会上，各团体的代表纷纷发表演说，坚决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救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把敌人赶出国土，决不罢休，誓死不当亡国奴。大会当场行动起来，立即捐款，一下就募捐了五百多元。会后，将这笔款汇去绥远部队，傅作义将军还签了字，寄回了收条。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影响很大。从此，“余闲乐社”的抗日救国活动，便从秘密转为公开。

“余闲乐社”的抗日活动公开之后，影响更大了，威信更高了。我们组织了宣传队、演出队到各馆口、船上、街上、商店，四处宣传抗日，捐款捐药，并把捐来的钱和药物，及时送

往前线。很多群众及其他群众团体，都自发地开展募捐，并把捐来的钱物交到“赈绥会”来，由我们汇总送往前线。“余闲乐社”成为闻名全香港的爱国进步团体，威信大为提高。成批的海员加入进来，岸上的洋务工人也纷纷入社。社员人数从几百人，很快发展到二千多人，到一九三七年发展到一万七千多人。在香港、九龙成立了许多分社。仅九龙就有深水埗、旺角、红磡、尖沙咀等分社。各船上也纷纷成立了分社。后来，还在新加坡设立了一个分社。在海员和洋务工人的爱国行动的影响和推动下，香港、九龙的工人、教师、工商业者等各界爱国人士，也都积极行动起来，踊跃输捐和参加支援前线的各种活动。港九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共香港海委成立之后，为了更好地发挥“余闲乐社”的作用，我们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党对“余闲乐社”的领导。先后在“余闲乐社”恢复了一批中断了党组织关系的老党员的组织关系，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调整了“余闲乐社”的领导班子，安排了周石永、周才、方世林等几位党员去加强“余闲乐社”的领导。

为了配合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我们认真抓了三个刊物：“余闲乐社”的社刊《余闲》、“赈绥会”的会刊《赈声》和“惠坪乐善公所”的刊物《坪潮》。我们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海员抗日救国纲领》等文件，并把各船各单位抗日募捐的情况和个人捐献的数字详细登载出来，对推动募捐

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三个刊物,不但在香港广为散发,而且还通过海员带往澳大利亚和南洋各地。特别是《余闲》这个刊物,影响更大。因此,“余闲乐社”在澳洲、马来亚等地的华侨中有较大的影响。当我们发动抗日募捐之后,各地的华侨都纷纷把钱寄到“余闲乐社”来,要求我们转给抗战有功的部队和战区的灾民。

为了便于向海外邮寄我们办的刊物和进步书报,加强对海外华侨和在远洋轮船上工作的海员的宣传工作,和便于在香港推销进步书刊,我们在九龙庙街办了一间“新文化书店”。由林鹗、阮群英、郑满、何婉如负责。它既是我们在香港推销进步读物的书店,又是我们向海外邮寄宣传品的机构。同时,又是海委的一个秘密的联络点。当时书店出售的书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书和《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由于我们办得太红了,很快引起了港英当局的注意。只办了几个月,就被封闭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我在中山大学读书毕业了。从八月开始,我就搬到香港居住,全力开展海员工运的工作。我到了香港之后,“余闲乐社”的同志向我反映,建议办一间海员子弟学校,解决一部分海员子弟读书的困难。我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它同时还可以解决我正在考虑的问题。这就是我要长期在海委工作,必须有一个公开的职业作掩护,而海委也要有一个可靠的联络点。于是,我就下决心开办一间学校。但是,没有校舍怎么办?我回家说服了母亲,把自己家里的两

亩田卖掉，筹款五百元，在九龙弥敦道“余闲乐社”附近的南京街租了一层楼作校舍，办起了一间专门招收海员和洋务工人子弟读书的学校，取名“海华学校”。我以曾子屏的名字向香港政府申请办学，并亲自兼任校长。刘宣、沙克负责教学工作，罗文光、阮群英任教员。学校采用复式制教学，招收一至六年级的学生。由于师生的努力，学校办得很有朝气。我们利用这间学校的校址，开办英文夜校，招收海员、洋务工人到夜校学习英文，很受欢迎。我又以这间学校为阵地，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并组织了一个党的外围组织“救国十人团”，以考察和培养建党的对象，发展了一批党员。后来，“海华学校”的全部教员和部分学生先后回东江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教员刘宣同志，成为开辟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骨干。学生郑锦等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海华学校”办起来之后，我就以校长的公开身份开展工作，“海华学校”就成为海委的一个联络点。党内的同志有事，就到这学校来找我，开展工作很方便。直到我一九三八年十月离开香港时，“海华学校”还办下去，它仍然是海委的一个秘密的联络点。

## 成立香港海员工会

在支援绥远抗战的活动中，香港海员群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维护海员利益的斗争也相应地日益发展，海员群

众感到“余闲乐社”的组织形式已不能完全适应运动发展的需要。因而，提出了在香港重新建立海员工会的要求。这个要求，先是从“日本皇后”轮的“余闲乐社”反映上来的。海委召集在香港的有关党员开会，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群众的这个要求是正确的，从形势分析，也是有可能实现的。会议决定了建立海员工会的方法，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进行筹建工作。

首先，由“余闲乐社”出面，派人到各馆口（海员宿舍）活动，争取各馆口的支持。同时，聘请香港华人著名大律师、太平绅士<sup>①</sup> 罗文锦为顾问，向香港政府华民政务司申请恢复原来被封闭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但港英当局认为原来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是伦敦英国政府下令封闭的，这“十个字”的招牌永远取消了，是不能再恢复的。但是，如果你们换一个名称，则可以考虑批准。海委再次开会讨论，认为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名义问题可以让步。经过征求各单位的同意，改称“香港海员工会”。

工会的名称确定之后，我们又重新向华民政务司提出申请。但是，港英当局又提出条件：一定要有一千以上的会员，并且每个会员都要有职业和住址。同时，还要有一千

---

<sup>①</sup> “太平绅士”按英文原意是治安官或治安委员，香港早年的“翻译师爷”翻译为“太平绅士”，沿用至今。原来的“太平绅士”，是协助英军和警察维持殖民统治秩序，并参与行政工作，在香港政治上有一定影响的人士。但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太平绅士”这个称号只是港英当局赐予有地位和影响人士的荣誉头衔。

元以上的开办经费,才准立案注册,正式成立工会。为解决一千个会员的问题,我们派出共产党员、老工会会员刘达潮等十多位同志到各馆口进行工作,很快争取了六十一个馆口的支持,有一千多海员签名入会。

关于解决经费的问题,曾引起了一场斗争。我们在进行筹建海员工会的过程中,国民党派来的黄德混进来了,他掌握了几个馆口,以馆口代表的名义参加筹建活动,企图夺取工会的领导权。当港英当局提出要有一千元以上的经费才能成立工会,而我们“余闲乐社”又一下拿不出这笔钱的时候,黄德扬言他可以拿出二三千元来,但要由他来当工会主席。

海委对这问题再次召集有关党员进行讨论。参加筹建工作的“余闲乐社”的代表提出,要党组织拿出钱来作成立海员工会的经费,不然,黄德能拿出钱来,就让他当主席。我和丘金等多数同志认为黄德是国民党派来的人,他想当主席是和我们争夺工会的领导权,决不能让他的企图得逞。工会是群众组织,我们依靠群众,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这位“余闲乐社”的代表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态度很不好。同志们认为他是“余闲乐社”的代表,他的这种观点,将来在海员中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于是,决定向“余闲乐社”建议撤销他的代表资格。“余闲乐社”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后来另行推选我为“余闲乐社”的代表参加工会的筹建工作。我们接受了刘达潮提出的意见,与各馆口商量,每个入会的工会会员交



两元港币作基金费，先由各馆口垫支，一下子便筹到了二千多元。经费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召开各馆口和到香港来的轮船的海员代表开会，推选出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成员。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香港海员工会”在抗战声中正式宣告成立。从工作便利和统战工作的需要考虑，推举海员上层分子李发任香港海员工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共产党员、老工会会员刘达潮任副主席，我兼任组织部长。聘请了罗文锦大律师为顾问。香港海员工会的工作，直接由中共香港海委领导。

八月十五日，香港海员工会发表成立公告，公开宣告“本会多由海员之‘余闲乐社’、‘崇义工会’、‘叙兰别墅’等六十多个团体组成，本会执行抗日救国与提高生活的斗争，并实行上、下联合战线之策略”。接着又提出了《海员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包括：“各轮在业与各馆失业工人一致团结在工会的旗帜下，采取有效行动回答日本的封锁政策；破坏宗族地域观念，全国各海员团体大联合，扩大海员抗日救国运动；联络英美及世界海员实行制止对日交通，联络日本海员，加强其反战反法西斯运动；联络码头工人，扩大抗日运动；取消克扣制度，改善海员生活，加强抗日力量；要求战时保险，保障海员生命安全；扩大统一募捐运动，充实抗战经费；清除破坏爱国运动的亲日汉奸；……立刻武装全民对日宣战。”

在抗日爱国旗帜与海员工会的号召下，海员抗日罢工斗争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工会提出：1、在日本船上做工的中国海员自动离船，拒绝替敌人工作；2、在别国轮船工作的中国海员，拒绝运输任何军火赴日；3、要求公司改变航线，不要开赴日本。在这种号召下，所有走日本航线轮船的中国海员都起来进行过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到同年底，近五个月中，参加反日罢工斗争的海员就达五千四百七十九人。所有日本轮船公司的中国海员三千五百人全部离船回国。不仅在日轮上，在其他各国轮船上的中国海员，都拒绝运货到日本而罢工离职。如德轮“司亚号”，美国的“巴拿马”轮、“阿伦布”轮；华商的“无恙”轮；美国渣甸公司的“阜生”轮、“哥令那”轮和英国昌兴公司的“皇后”轮等，任何一艘运载军用品赴日轮船的中国海员都起来进行了罢工斗争。仅昌兴公司的“四大皇后”轮，就有八百四十五名中国海员，因反对运军用品赴日，而罢工离船。在香港海面，一时竟有四十多艘船只不能开航。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也有部分船舶，因海员参加反日罢工不能开航。张治中将军在一封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曾说：“从八月十五日到十月十五日，二个月中，就有在香港的日轮二十多艘，海员六百二十三人全部离船回国，参加抗战。”据一九三六年七月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香港职工运动工作报告记载：抗战爆发以后，“最少也有五千二百个海员工人为了反日斗争而失业。然而他们忍受着一切痛苦，不乞怜，不呻吟。目前，香港

还有一万六千多失业海员工人，没有一个回日本船去乞一碗饭吃”。由此可见中国海员工人在抗日爱国斗争中表现出多么崇高的民族气节！

中国海员不仅自己为抗日救国而罢工斗争，还团结和争取了各国海员支持中国抗战。在中国海员的呼吁下，九月一日，美国全国海员工会在芝加哥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表示同情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并号召美国各海员工会“竭即援助中国，主张对日实行经济封锁，直至全部日军退出中国而后已”。九月八日，英国轮船“茜温里号”的英国海员，因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反对运煤赴日，毅然罢工。船长控告他们不服从命令，海员们坚决表示：“宁做监狱牢徒，亦不赴日。”

在香港工人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广东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湛小岑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也插手香港的工人运动。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他亲自带了几个亲信来到香港，企图组织香港总工会。他了解到当时在香港工人组织中影响最大，威信最高的是“香港海员工会”。于是，亲自到“香港海员工会”找我们，和我们商量筹备成立香港总工会问题。此事海委曾研究过，我们认为如果能成立全港性的总工会，把全香港的工人组织和统一起来，会有利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因此，赞同湛小岑的建议，并同意把筹备办公室设在“香港海员工会”。此事，引起了香港当局的注意。后来，海员工会的顾问罗文锦大律师很不满意地对我们说：

你们为什么同国民党官员一起搞什么总工会？这是搞政治活动，香港政府是不允许的。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妄图独吞中国，这和英、美等国在华的利益发生矛盾。所以，港英当局在“七七事变”之后，对海员的抗日救国运动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并同意建立“香港海员工会”。但是，由于海员工会发动和领导的抗日救国斗争使日本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日本政府向港英当局提出了抗议，施加压力，要求对海员工会实行制裁。同时，海员工会发动的罢工斗争也影响了英国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他们也纷纷要求港英当局制裁海员工会。特别是在海员工会发动和领导罢工斗争的声势越来越大，港英当局害怕罢工斗争继续发展，会威胁到他们对香港的统治。于是，十二月初，香港政府颁布了紧急治安法。十二月三十日，就以所谓“企图组织非法总工会，煽动罢工，扰乱治安”为借口，封闭了刚成立三个半月的“香港海员工会”。

“香港海员工会”虽然建立的时间不长，但它在海员群众中的影响很大，在其他工会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甚至在它被封闭了六个月之后，还有整个船的几十名中国海员从欧洲写信和寄钱回来，要求参加“香港海员工会”。“香港海员工会”被封闭，对香港的海员工运，乃至对整个香港的职工运动，无疑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 支援广东抗日斗争

“香港海员工会”被封闭后，党内有些同志担心港英当局随后还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对我们进行限制和打击。海员工会主席李发很害怕港英当局会找他的麻烦。当时，有些海员出于好意，劝我暂时避一下风头，看看形势如何再考虑今后的行动。党内和群众中存在的这种思想，显然，对于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是十分不利的。

海委对这种情况，专门开会进行了研究。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认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等国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而我们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矛头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反对英国。今后，只要我们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时讲究方式，注意斗争策略，港英当局是不会进一步采取行动，限制和打击我们的。由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全国的抗日救国斗争进一步开展，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必然会继续高涨。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前阶段的经验教训，做好党员和群众的思想工作，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我们应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余闲乐社”，以“余闲乐社”为主要阵地，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心任务，来部署我们的工作。

事实证明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港英当局在封闭了香港海员工会之后，并没有进一步采取措施限制和打击进步团体。由于中国的抗战正积极地进行着，因此，香港的政治

环境基本上仍然是好的。港英当局还允许在赈灾慰问等名义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组织救亡团体,允许一些有太平绅士做担保的团体立案。如香港洋务工会和印刷工会,请了中华厂商联合会主席叶世泉和香港太平绅士杜其章做顾问之后,港英当局都同意立案,均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正式宣告成立。随后,戏院职工会等,也宣告合法成立。

在香港海员工会被封闭不久,我就接任海委书记。我接任海委书记工作之后,即把“余闲乐社”作为工作重点,派干部加强领导,采取各种形式把海员的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开展下去。由于全面抗战爆发,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港澳同胞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抗日救国的热情空前高涨。“余闲乐社”顺乎民心,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深得广大海员和洋务工人的拥护,其威信进一步提高,“余闲乐社”的会员人数很快增加到近三万人。

海委在抓好“余闲乐社”的同时,我还以惠阳同乡的关系,做香港惠阳青年会(简称“惠青”)的工作。“惠青”的主要负责人叶锋、严尚民、刘宣等与海委的关系都很密切。“惠青”在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迅速发展,很快达到一千二百人。

为了支持广东内地的抗日斗争,海委和中共香港市委从“余闲乐社”、“惠青”和“洋务工会”中组织回乡服务团,到内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参加抗日武装斗争。

“七七事变”后,我们就发动香港海员和“惠青”成员,参

加严尚民、叶锋等组织领导的“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救亡工作团”，回到惠阳县的淡水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准备。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入侵华南，惠州、广州失守后，我接受了党组织的委派回东江敌后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时，我又在“余闲乐社”动员了一批海员和洋务工人，和我一起回惠阳开展东江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他们成为我组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骨干。

我回到东江之后，海委又通过“余闲乐社”先后动员了几批海员、洋务工人回广东内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武装斗争。我了解的有：一批是参加回乡救亡工作团到汕头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批是参加由海委组织部长禡荣率领回粤中地区恩平县活动的回乡救亡工作团，很快把那里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起来；一批是参加老海员工运干部林锵云领导的回乡救亡工作团，回珠江三角洲活动，开展武装抗日斗争。禡荣和林锵云率领回乡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海员，后来，大多数都成了珠江纵队的成员，其中不少人成为抗日根据地或部队的骨干。

在“七七事变”后到日军入侵华南前，香港有一万六千海员失业，他们绝大部分是由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而失业的。他们大部分先后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乡的海员大都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救国斗争。广东省惠阳县和宝安县的沿海地区，海员比较多，所以，回东江开展抗日斗争的海员

也是广东全省最多的。从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共香港海委和市委先后动员了约一百人回惠阳、宝安沿海地区参加抗日战争。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我回惠阳组建抗日武装后的二十天内，海委和香港市委又紧急动员了二百余人回惠、宝地区参加抗日战争。他们大部分都是香港“余闲乐社”和“惠青”的成员。当我们回来东江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时候，“余闲乐社”为部队筹募经费、药品、棉衣等，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大力支持部队，洋务工会还特发回国工友的津贴费（每人十元）。在我们部队创建初期，相当部分的经费是靠“余闲乐社”提供的。“余闲乐社”简直成了我们部队的驻港办事处和后勤部。



## 第四章

# 开辟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

### 日军人侵华南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下旬，日本侵略军为了策应其进攻武汉的作战和切断中国的海上对外联系，实现其攻取武汉，摧毁或瓦解中国的抵抗力量，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投降的战略企图，发动了入侵华南的广州战役。十月十二日，日军在广东省惠阳县的大亚湾登陆，二十一日占领广州。从此，抗战烽火在华南燃烧起来了。

日军对华南的入侵早有准备。它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已先后侵占了华南沿海的蒲台、担杆、围洲、三灶、南澳等岛屿，在那里修建了码头、机场并以其海、空军封锁广东沿海。十月上旬，日军第二十一军团（司令官左庄干郎中将）辖第十八、第一〇四、第五师团，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各一部（飞机一百多架），舰艇和木船约五百艘，组成南支那派遣

军,总兵力约七万人,秘密集结于澎湖马公岛,准备入侵华南。当时,国民党在广东则拥有第十二集团军的第一五一、第一五三、第一五六、第一五八、第一八六师和独立第二十旅、独立第九旅等部队,担负广州和大亚湾、大鹏湾沿海地区的防御。虎门要塞有守备部队和海军防守,有七艘军舰扼守珠江口。

日军选择在十月十二日发动广州战役,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大亚湾沿海地区从海路去香港交通便利,途程也不远。十月十日是中国政府的国庆节,当天,国民党驻守大亚湾部队的高级长官都到香港欢度国庆去了。正当这些肩负守卫南疆海防重任的国民党军事长官在香港的国庆宴会上欢歌起舞,饭饱酒醉的时候,日军迅速调运部队奔袭大亚湾,打响了入侵华南的广州战役。

十月十二日凌晨,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一〇四师团和及川先遣支队分三路在大亚湾登陆。第十八师团担任中路和左路的主攻任务;及川先遣支队和第一〇四师团担任右路迂回任务。国民党守军由于指挥官去香港欢度国庆未回,部队失去高层的统一指挥,未能进行有力的抵抗,使日军得以顺利登陆,并在日军的进攻下,大批部队不战而逃。中路日军在霞涌登陆后,沿永湖、马安,向惠州进犯。左路日军在岩前、澳头、小桂登陆后,沿淡水、镇隆,向惠州进犯。右路日军在平海的玻璃沙厂登陆后,经稔山,平山到达平潭。及川先遣支队则继续沿横沥、杨村、公庄、平陵、龙华、永汉、正果、

派潭，直取从化，迂回广州北面，配合正面部队进攻广州。第一〇四师团沿马安向惠州进犯，十五日占领惠州。第十八师团直取博罗后，沿惠广公路进犯增城；到湖镇时，分兵一路，沿正果、福和，占领罗村。第一〇四师团组织水上机动队，从惠州出发，沿东江而下，占领石龙。十九日，第十八师团占领增城后，沿增广公路向广州进犯。第一〇四师沿湖口、径口、正果、福和，占领太平场，截击从广州向北撤退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团于二十一日十六时，占领广州。

在日军入侵之际，虽然国民党军队负责守卫大亚湾前沿阵地的高级将领未能指挥将士抗击敌人，甚至放弃阵地，率队溃逃。但是，仍有不少官兵是英勇抗敌的。坚守新桥和粉石坳阵地的官兵就是好样的。他们对进犯淡水的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负责守卫新桥阵地的王排长和负责守卫粉石坳阵地的凌连长，不畏强敌，率领本部士兵英勇抗击敌人。王排坚守阵地一个多小时，消灭大量敌人，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在阵地上。凌连除了连长带领十名士兵冲出敌人重围向大芒方向撤退外，上百名爱国官兵壮烈殉国。这些忠贞为国的勇士，是值得后人纪念的。

日军为了配合十月十二日在大亚湾登陆的行动，十三日，派海军舰艇一部，向汕头方向佯攻。随后派飞机把扼守珠江口的七艘国民党军舰全部炸毁。

二十二日，日军第五舰队进入珠江；同时，第五师团在珠江潭州水道入口处登陆。然后兵分三路，右路于二十三日

占领虎门，以一部警备虎门要塞，主力协助海军溯珠江作战；中路溯潭州水道经紫泥、陈村、石湾，二十六日占领佛山；左路二十六日占领三水，切断西江和北江水路，警戒西江。

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部及广东省政府仓促撤到韶关和连县，其军队大部分向粤北撤退，在英德至河源一线防守。来不及撤退的国民党军一万余人，则滞留在惠阳、东莞、宝安三县港九铁路两侧地区。

## 接 受 任 务

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由于国民党守军未能作有效的抵抗，仅十多天时间，广州市周围各县和东江下游地区的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广大同胞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东江两岸哀鸣遍野。领导东江人民进行抗战的重任，已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就在十月十三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的第二天，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同志，召集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同志和我（当时任中共海员工会书记）开会，传达党中央关于东江地区可能迅速沦陷，我们要在东江敌后开辟游击区的指示，研究回东江敌后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问题。廖承志同志说：

“党中央早已掌握日军要在广东沿海登陆的动向，鉴于国民党军队缺乏坚决抗战的意志，估计东江地区将会很快沦陷，要求我们迅速在东江敌后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我们要尽快从香港抽调一批得力的干部，由市委或海委一位负责同志带领回去。今天找你们两位来就是研究这件事。”当时，吴有恒同志立即表示：“我回去！”我也说：“我回去！”我们两人都争着要回东江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为了说服吴有恒同志，也为了争取廖承志同志的支持，我对吴有恒同志说：“老吴，回东江打游击我比你适合。第一，从个人来说，你是恩平县人，语言不通，人地生疏；我是惠阳县人，语言通，了解情况。同时，我在家乡坪山地区进行过抗日宣传工作，团结了一批青年，在地方上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第二，从组织上来说，惠阳县淡水、坪山地区的党组织是由我们海委直接领导的，我从任海委组织部长到任海委书记期间，负责指导他们的工作。现在家乡沦陷，乡亲们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有责任回去组织群众，开展救国救民、保家保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廖承志同志听后点头表示赞许，同意我的要求。他说：“曾生说的有道理，我看就曾生回去吧！有恒的积极性可嘉，但你们两人不能都回去，香港的工作也很重要，仍要加强领导。有恒同志留在香港的担子也不轻啊！你们要做好支持内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工作。”接着廖承志同志分析了我们回去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可能碰到的困难和有利的条件。

他说：“我们回去一时没有武器，没有经费，更重要的是没有经验，可能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也有很多有利的条件，比如东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人民群众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而今东江各地又有我们的党组织，有更好的群众基础；现在又是很好的时机，敌人在大亚湾登陆之后，国民党守军溃败，群众彷徨无主，在这情况下我们回去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群众必定会支持我们，估计国民党军政当局也不会马上反对或阻挠我们的。同时，敌人刚入侵，一时还难站稳脚跟，敌伪统治秩序也未建立。我们要抓住这一时机，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大力发动群众支持和参加抗战，努力做好统战工作，特别要做好争取国民党驻军的工作。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好了，是可以很快打开局面的。”最后，我们研究了如何组织干部回东江的问题，决定由香港市委抽调市委组织部部长周伯明和香港区委书记谢鹤筹两位同志和我一起回去组织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由我负责在海委抽调几名得力干部一起回东江。市委和海委很快就动员和物色了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回东江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周伯明同志是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人，一九三六年春在广州中山大学附中读书时，因参加广州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被广东军阀陈济棠通缉。这年十月，他由中山大学附中的语文教员谭希吕介绍，到北平与北平市委张苏取得联系。当月，由张苏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党组织

派他到张学良的东北军学兵队当二等兵。西安事变后，升任连的指导员。一九三七年二月，到延安抗大学习。“七七”事变之后，被派回广东，在中共中央临时南方工作委员会工作。同年冬，调到中共香港市委工作。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先后担任市委的宣传部长、组织部长。

谢鹤筹同志是广西省同正县(今扶绥县)人，壮族，一九二八年初入党后，任中共南宁市学生支部书记，参加领导南宁地区的学生运动。同年十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一九二九年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出狱，很快接上了组织关系，投入左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参加了著名的龙州起义。起义后担任左江崇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赤卫部部长。左江革命失败后，红八军撤离，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直到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才在香港接上了组织关系。一九三八年三月至十月，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干事、香港区委书记。

由于周伯明、谢鹤筹，既是香港市委的得力干部，又曾经在军队工作过，有一定的军事知识。所以，这次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回东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他两人自然成了理想的人选。

接受了新的任务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投入回东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

## 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和周伯明、谢鹤筹同志组成临时工作组，带领一支由共产党员、进步工人、青年和学生共六十多人的队伍，在香港分批出发，回到我的家乡惠阳县坪山。随后，中共香港市委又紧急动员了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六十八人，以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救亡工作团（下简称“惠青”工作团）的名义，由刘宣率领回到坪山和我们汇合。

刘宣同志是惠阳县淡水人。一九三五年在香港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我在香港负责开办海华学校时，他负责学校的具体工作。一九三七年初，我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在海员、洋务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爱国青年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七七”事变后，严尚民、叶锋、刘宣等同志在中共香港海委和市委的领导、支持下，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和一九三八年初，已经以“惠青”工作团的名义，组织了二批工作团员回到淡水，在惠阳沿海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在常柏田、横排塍、坑梓、坝岗、澳头等地，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成立了群众抗日团体；举办了读书会 and 妇女夜校；组织了抗日自卫队、游击小组等民众自卫武装；还争取了国民党军队在淡水驻军的支持，举办了惠阳沿海青年自卫武装干部训练班。他们进行的这一系列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



作,为我们组建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回到坪山初期,社会一片混乱,地主和富商纷纷逃往香港,土匪到处抢劫,国民党驻军军心浮动,广大群众思想彷徨。如何迅速打开局面,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呢?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们首先抓党的组织建设。十月三十日,我们在坪山羊母嶂李少霖同志家召开工作组扩大会议,成立了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我任书记,管全面;谢鹤筹任组织部长,主要负责党的工作;周伯明任宣传部长,主要负责组建武装的工作。前文已交代,在我们从香港回来的那一天,成立了由梁广任书记的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惠宝工委属东南特委领导。会议研究并决定了当前的主要工作是: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抓紧对干部进行培训;组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自卫武装;派人做当地国民党驻军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联合抗日。

根据会议的决定,我们抓紧了健全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建立了如下三个中心区委:

淡水中心区委:书记叶文华,领导周田、茶园、牛郎径、蔡溪子、常柏田、横排壑、滩头、矮岭仔等支部。

平山中心区委:书记卢伟如,领导平山、多祝、稔山、白花等支部;

坪山中心区委:书记陈铭炎,领导坪山,坑梓、龙岗、坝

岗、定南等支部；

陈铭炎同志是广东省合浦县人(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我在中山大学的同学。经我介绍到坪山学校教书。抗战爆发后,他以教师身分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共惠宝工委成立时他是工委委员。以后他一直在东江坚持斗争,为组建人民抗日武装和创建东江抗日根据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九四五年八月,不幸遇难。

根据会议的决定,我们还抓紧了对干部进行培训。我们从香港回来的一百多人,都是临时动员、组织回来的,他们虽然有很高的政治热情,但既不懂军事知识,又没有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这和他们现在所担负的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重任很不适应。所以,我们抓紧时间,由刘宣主持,在坪山学校开办训练班,组织他们学习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理论、军事知识和开展群众工作的方法。在训练班,我们还对参加集训的队员进行了认真的考察。训练班结束后,适宜做军事工作的留下来,作为组建人民抗日武装的骨干;适宜做群众工作的,以“惠青”工作团的名义,分配到各个区的广大乡村,开展群众工作;一部分则派去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

训练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效果很好。因为参加集训的队员政治素质好,政治热情高,能吃苦耐劳,学习认真努力,分配工作后很快适应新的环境,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干。

根据会议的决定，我们也狠抓了组建人民抗日武装的工作。要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第一，要有人；第二，要有枪；第三，要有钱；第四，要有一块活动的地区。为了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我们同时进行三方面工作。

第一，动员党员和群众献枪和参加“惠青”工作团，解决人和枪的问题。我们从香港回来的时候，仅有一支是我从家里拿出来的左轮手枪。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淡水和坪山的党组织动员了一批青年来参加工作团；工作团员叶维儒从家里拿来德国制造的全新长短枪七支；坪山党组织又送来四五支步枪。很快我们就组织了三十人左右的武装队伍，由周伯明带领进行训练。

第二，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支持。我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已与海外华侨建立了联系，美洲华侨曾从经济上支持我主持出版不定期的进步刊物《铁轮》。我在香港“日本皇后”轮当海员和在海委从事海员工运的时候，又与香港的海员和洋务工人建立了联系。我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时，一直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我们回来之后，也一直注意做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工作，通过各种关系和方式与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加强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我们安排“余闲乐社”的社长兼支部书记周石永和我一起回来，就是要他来多做港澳同胞，特别是香港海员的工作，经常保持与香港的党组织和广大港澳同胞的联系。在东南特委的领导下，又由于得到廖承志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大力支持，我们争取华侨

和港澳同胞支持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华侨和港澳同胞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

第三,做好国民党驻军的统战工作。当时,在坪山附近驻防有两支国民党的部队:一支是国民党正规军第一五一师温淑海旅,旅部设在龙岗大井村;一支是国民党地方部队罗坤大队,大队部设在在坪山附近。在日军占领淡水、惠州、广州之后,这两支部队与其上级指挥机关失去了联系,成了孤悬敌后的部队,经济困难,军心动摇,处境艰难。

我们回到坪山几天后,就派刘宣等同志以“惠青”工作团负责人的名义去拜会温淑海和罗坤,表明我们回乡抗日救国的决心,希望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开始他们提出要我们工作团全部编入他们的部队,一切费用由他们供给。刘宣按我们商量好的口径回答说:“我们是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不便编入军队,还是我们自己独立活动好。如果部队确实需要,我们可以考虑派一部分团员到部队来协助工作。”随后,根据他们的要求我们派李杰、李华带领二十名工作团员到温淑海旅部参加政治工作队,做部队的政治工作;派何武、黄业、黄佛光三位党员到罗坤大队,分别担任三个连的指导员。

罗坤是淡水人,早年曾追随邓仲元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带领一支武装在澳头沿海地区包烟包赌,包私走私。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罢工时,省港罢工委员会派共产党员聂平到淡水组织工人纠察队,封锁物

资运往香港，拦截香港进口的私货，触犯了罗坤的利益，罗坤就带领他的土匪武装奔袭淡水，杀害了聂平同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这支土匪武装被国民党当局改编为一个大队，驻防淡水附近。十月中旬，日军进攻时他一枪不发，率部撤退到坪山附近。当时由于他失去同上级的联系，孤立无援，所以对于我们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表示合作。

为了尽快解决组建部队的枪支问题，我们派刘宣和黄国伟以工作团自卫需要的名义，到罗坤大队借枪。刘宣对罗坤说：“工作团住在坪山学校，敌人驻淡水，相隔二十多公里，而坪山靠近公路，我们需要有武装放哨保卫”。罗坤表示同意，但只给我们五支步枪，每支枪配十发子弹。

十月底，开完成立惠宝工委的会议之后，我回香港向廖承志同志和东南特委汇报前段工作情况。我向廖承志汇报关于着手组织抗日武装的问题时，廖承志指出：“我们要在国民党军队驻防的地方建立自己的武装，先要争取一个公开合法的名义。这对发动群众有利，特别是对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支持有利。”我从香港回来，即向惠宝工委传达了 this 指示，并研究了组织武装队伍的名称和领导人选，准备同国民党驻军谈判。

十一月初，我和刘宣、周石永、陈铭炎及黎孟持（坪山学校教员）一行五人，到龙岗大井村温淑海旅部，要求他们支持我们组建部队，给予合法名义。由于温淑海正想通过我们取得群众和华侨及港澳同胞的支持，所以，热情接待我们。

不仅旅长、政训处主任和参谋长一起接见，而且还设宴招待。席间，政训处主任赞扬我们说：“内地一些人，平时空喊抗日，说什么要打到东京去，叫得很响亮，但现在敌人一来，却跑得最快，有办法的人，都跑到香港逃难去了。你们在香港的青年，却在敌人登陆还不到半个月，就组成回乡救亡工作团回来参加抗战，实在令人钦佩！”温淑海也说了许多赞扬和鼓励的话。在他们正说得起劲的时候，刘宣同志提出：“日军入侵，群众深受其害，老百姓纷纷要求抗日杀敌。我们工作团根据群众的要求，在沿海澳头、坝岗和内地山区周田、坑梓、常柏田等乡村组织有二三百抗日自卫队和游击小组。我们想把所有这些民众抗日武装，组成一支抗日武装队伍，既可配合你们部队作战，又可维持地方治安。希望温旅长给我们一个抗日武装队伍的名义。”

温淑海沉思了一下问：“叫什么名义？”

刘宣说：“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温说：“衔头太长了，不如改为抗日义勇军。”

我们坚持说：“这是我们大家商量决定的，还是用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名称好。”

温又说：“谁做队长？”

周石永指着我问：“曾振声是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在香港海员工会搞抗日救亡工作，大家叫他曾生，我们推选他为队长。”

温说：“好！就这样定了。我们先吃饭。”

饭后，温淑海当即给我发了委任书：“任命曾生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当晚天黑，温还派了一个武装班护送我们回坪山。

有了合法名义之后，我们加紧筹备成立部队，立即派人去香港刻“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印章。

但在我们还在筹备正式成立部队的时候，十一月中下旬，占领广州的日军为了巩固其占领区和保障其海上运输线，对滞留广九铁路沿线两侧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回师扫荡。我们抓紧这个时机，在二十一日又派刘宣带了几位工作团团员去龙岗向温淑海借枪。刘宣等人到达温的旅部时，他们正整装待发，准备撤退。刘宣见到温淑海时，刘永图团长（曾当过叶剑英同志的警卫员）也在场。刘宣说明来意之后，温淑海即叫刘团长借给我们十支步枪和一些子弹。

二十三日，日军向坪山、龙岗一带进攻。前两天我们已通知在坪山附近做群众工作的同志和派到罗坤、温淑海处工作的同志共约七八十人回来集中。这时虽然有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番号，又有一支约三十人枪的武装队伍，但部队仍未正式宣告成立，这支武装队伍又是刚组织起来才开始训练，不仅没有作战经验，有的人连枪都未打过。现在一百多人集中在一起，大部分人没有武器，其中不少是女同志。敌人来进攻，怎么办？我是个书生出身的人，未带兵打过仗，也没有打过游击，一时拿不出主意。当时对温淑海的部队还有点迷信，以为他们有两个团，可以和敌人打一

阵子。于是，就拉着队伍随温淑海的部队向碧岭方向撤退。但没有料到，温部听到日军来了，跑得比我们还快。当我们撤退到碧岭时，敌人赶上来了。这时，周伯明同志和我们有个红军出身的彭沃同志立即挺身而出，指挥我们的武装队伍，利用原来已挖好的战壕做掩护，向敌人开火。日军突然听到阻击的枪声，立即停止前进，但未发现我们，而是猛向往碧岭山上撤退的温淑海部队开枪射击。我们的人、枪、子弹很少，打了一阵，敌人一停止进攻，我们就撤出战斗。天快黑了，敌人在前面压过来，我们就向三洲田、盐田、沙头角方向撤退。半夜，我和周伯明、刘宣、陈铭炎等同志在盐田学校商量下一步如何行动。商量后决定：武装人员留下在靠近香港英界地区隐蔽，由周伯明指挥；其他非武装人员暂回香港，看形势如何，请示上级之后，再作决定。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了沙头角。这时温淑海部的两团人已沙头角拥挤攘攘，一片混乱。连长以上的军官都化装跑到香港英界那边去了，留下的士兵象热锅里的蚂蚁，到处走动不安。有的士兵害怕敌人打过来也往英界跑，结果一过界就被英军缴械扣留，送进集中营。我们按计划，由周伯明带领武装人员在边界找地方隐蔽；我带非武装人员到九龙，有家可归的暂时回家，从内地参加工作团的同志，住在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及海华学校。

到了九龙，我立即去找廖承志同志汇报。他听了我的汇报之后，帮助我总结这次跟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到沙头角，又



撤回香港的教训，并口头转达了党中央的指示。他说，党中央非常重视广东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在广州沦陷之后，十一月一日，党中央就及时明确指示广东省委，指出广州沦陷后广东党组织必须在广州及其他敌占区进行秘密工作；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游击战术和政治工作上帮助友军开展游击战争；在东江、海陆丰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利用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到处组织自卫队，发展人民抗日武装。根据党中央指示的精神，廖承志同志要我们迅速返回内地去，在敌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他特别指出：“你们回去要尽快正式成立部队，把抗日部队的旗号打出来，对群众就更有号召力。成立部队要有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你是总队长，叫周伯明当政治委员。”他停了一下又说：“叶挺来了香港，我带你去见他，我们一起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我和廖承志同志在香港九龙的新新酒店高兴地见到久已慕名的叶挺将军。廖承志把我介绍给叶挺之后，由我向叶挺汇报了我们回坪山开展的工作和这次撤回香港的情况。当我汇报到国民党军队一千多人撤退到沙头角溃散的情况时，叶挺将军立即指示说：“你们尽快去收容这些溃散的士兵，把他们带回去打日本鬼子。”我们随即研究了如何把队伍带回内地和尽快正式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等问题。

对于如何去收容沙头角国民党军队溃散士兵的问题，

我想起了温淑海旅刘永图那个团第三营营长麻玉标。在坪山时我和他认识，他与我们关系很好。平时谈起抗日救国，他总是慷慨激昂。于是，我就去找到了他，向他说明我们要立即回内地去打游击，希望他和我们一起收编溃散在沙头角的士兵，带回东江敌后去打游击。麻营长表示完全同意。

在回到香港的第三天(十一月二十六日)，遵照叶挺将军和廖承志同志的指示，我又带领四五十名“惠青”工作团团员回到沙头角和周伯明带领的武装队伍汇合。国民党军队不少士兵已由沙头角跑进了英界，丢下的枪支很多，我们不论男女同志，凡是没有枪的，每人都从国民党军队士兵丢下的步枪中挑选一支。这样，我们全体人员都武装起来了。我们离开沙头角时，又由刘宣带领几位同志留下来，他们很快又收集了一挺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和数十支步枪。

我们这次从九龙回来时，还带回来一位新干部，他叫郑晋，原名郑天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在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任团长，后来出走南洋。现在他又从南洋回来参加我们的抗日队伍。我为我们队伍增加了一位能带兵打仗的干部而高兴。

我们回到沙头角后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协助麻玉标营长收容溃散在那里的士兵。经过一番努力，才勉强把约一千名士兵收容起来。

十一月二十九日，我和周伯明带着我们一百多人的队伍，和麻营长带领收容到的约一千名士兵，从沙头角回到惠

阳县淡水附近叶挺将军的家乡沙坑周田村一带。淡水区的党组织为我们回来做好了准备，群众都很高兴地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的队伍住在周田村，麻营长的队伍住在附近的双田村。我们在回周田途中，在坪山马峦头村抓住了那里的伪维持会长黄宗宪，就地处决，并铲除了伪组织。回到周田，又处决了古礼园，古君敬两个汉奸，深得群众的拥护。

正当我们筹备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时候，温淑海亲自到周田来找我。他和我谈了一些客气话之后，提出要将他的部属带回去。接着就把麻玉标及其收编的约一千名士兵带走。事后我们才晓得，就在我们动员麻玉标和我们一起收容温旅溃散的士兵，回东江打游击的时候，温淑海、刘永图那时住在香港大中酒店，也在拉拢麻玉标回国民党部队去。麻玉标对我们耍两面派手法。在我们帮助他帮士兵收容回来后，他又跟温淑海跑了。

回想起来，此事实实在在可惜。假如在国民党军队撤退到沙头角，长官走光，士兵惊慌溃散的时候，我们立即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及时把这些国民党军队溃散的士兵收容起来，编入我们的部队，迅速拉回敌后进行整训。这样，虽然不一定能收容到一千人，但收容和掌握二三百或更多一些人枪，是可能的。可是，由于当时我们还很幼稚，没有这样的经验和胆略，错失了良机。

十二月二日，我们按廖承志同志的指示，在周田村正式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我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委

员，郑晋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部队一百余人。此时，日军驻兵淡水，我们就在惠宝沿海地区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

与我们筹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前后时间，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一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在东莞县城建立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王作尧同志担任队长。二十日，他们协同我党掌握的“东莞抗日常备壮丁队”，在峡口阻击了渡河进犯的日军。十月中旬，增城县的党组织通过统战工作，建立了“广东民众自卫团增城第三区常备队”，由阮海天同志负责指挥。十七日，他们在增城县仙村的竹园涌，伏击东江河上的日军兵船，击沉橡皮艇一艘，击毙日军十余人。二十日以后，又相继在仙村附近多次打击敌人。十二月上旬，中共东（莞）宝（安）边工委委员黄木芬同志，通过统战工作，组建了一支由我党直接掌握的，有三四十人的抗日武装，在宝安县的观澜、龙华一带活动。十二月中旬，中共东宝边工委，在章阁村建立了“东宝边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第二大队，黄木芬、蔡子培同志分别担任大队长。十二月下旬东宝边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和王作尧同志带领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员及各区地方党动员来的武装人员约二百人，集中在东莞县的苦草洞进行整编。一九三九年元旦，在这二百余人中（其中有阮海天同志从增城带来的部分人员）挑选了一百二十人，重新组成“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王作尧，政训员何与成，党总支书记黄高阳。

何与成同志是广东省东莞县人，一九三四年在上海参加共青团，任浦东区委宣传部长。一九三七年，他在中共东莞中心县委领导下，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工作。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参加组建抗日武装工作，任我党掌握的东莞抗日常备壮丁队政训员，并协助王作尧同志组建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领导下，惠阳、东莞、宝安、增城等地的抗日武装建立起来了，不断地打击日本侵略军，大大地鼓舞了东江地区广大群众抗日的斗志，点燃了东江人民抗战的烽火。党交给的开辟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任务，落到了我和王作尧等同志的肩上。对于我这个学生出身的人，是副很重的担子。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牢记党的教导，谦虚谨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和战友们一起，在抗日战争的熔炉中锻炼自己，尽最大的努力来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

## 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之后，我和周伯明带领一部分部队到坪山一带活动，郑晋带领一部分部队在淡水周围活动。我们部队所到之处，立即铲除伪政权，惩办汉奸，发动群众，组织自卫队，不断袭击敌人。

占领淡水的日军，在我游击队的不断袭击下，惶惶不可终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七日，日军为了收缩战线仓惶撤出

淡水。淡水附近常柏田村的我地方游击队高健、高宏、高固、高桥、高远等五位队员乘敌人撤退之机突进淡水，击毙伪警长罗贤和汉奸吴带，吓得伪维持会长曾庚在黑夜潜逃跌死在深山洞里。随即茶园、周田的抗日自卫队和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特务队(队长彭沃)进入淡水，铲除伪政权，肃清匪特，维护社会治安。九日，我和周伯明带领的部队从葵涌、坪山赶到淡水，马上开会研究成立抗日民主政权的问题。会议主要讨论政权名称、施政纲领的内容和产生政权的方法等问题。如何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对我们来说，是个新课题。大家希望我拿出个意见来讨论。我想起了在香港时曾读过有关八路军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报道，文章介绍了该政权的施政纲领和产生方式等问题。我就参照晋察冀边区建政的经验，提出我们成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名称叫“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应包括实行民主政治，保证民众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的自由，实行减租减息，优待抗属等内容。政府的人选应由民主选举产生。大家同意我的意见，并对施政纲领的内容提出了补充。

十二月十日，在淡水祖庙召开成立抗日民主政权的群众大会，到会群众五百余人。我们向到会群众说明会议的议程之后，群众分组议论，提出政府人选，大会集中候选人的名单，由大家举手通过，成立了“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主任严尚民；主办区员：黄达三、陈志期；区

员：陈永、古海生、叶特青等。办公地点设在淡水。

严尚民同志，原名严奎荣，广东省惠阳县澳头人，日本留学生。他在日本留学时，因写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诗，被驱逐出境，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回到香港。他在香港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八月和一九三八年年初，他先后两次率领“惠青”工作团回来，在惠阳县淡水、澳头、稔山、平海、坑梓及宝安县的葵涌、王母圩一带，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及组织人民抗日武装的工作。在惠阳沿海地区的广大群众，特别是进步青年中很有威望。

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 第一，重建乡镇政权。

日军入侵后，原乡镇政权的人员溜得无影无踪，除少数乡镇敌人建立的伪政权之外，许多乡镇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物色一批能为群众办事的乡镇长，恢复乡镇政权的日常工作，成为区行政委员会的当务之急。

为保证重建乡镇政权工作的顺利进行和达到预期的目的，行政委员会采取了如下的政策和措施：

(一)尽量挑选地方党的同志或我党的基本群众担任乡镇长；

(二)对比较开明或持中立态度的原有乡镇长继续留任；

(三)坏人执政者免掉；

(四)对一时找不到适合人选的乡，如原有的乡长不作恶，可以控制使用的，暂留用，做转化工作；

(五)乡镇长的任职，由各乡镇的群众提名，区行政委员会审批。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全区的乡镇政权机构逐步充实和健全起来，群众比较满意。部队乡镇长名单如下：

淡水镇镇长：梁鸿瑞(开明人士、商人)

秋溪乡乡长：叶 良(国民党员、统战对象)

长兴乡乡长：叶汉生(共产党员)

长安乡乡长：高 秀(共产党员)

新圩乡乡长：曾庆章(基本群众)

桂岗乡乡长：陈雁奎(进步人士)

万年乡乡长：刘玉书、赖玉基(进步学生)

澳头乡乡长：严荫荣(知识分子)

坑梓乡乡长：黄润洪(共产党员)

坪山乡乡长：廖期谷(共产党员)

定南乡乡长：许桂仁(进步人士)

第二，惩办汉奸、土匪，维护社会治安。

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开进淡水地区后，逮捕汉奸、土匪，由行政委员会交群众大会公审，加以惩办；同时，全区大力开展肃奸清匪和打击坏分子的工作，迅速恢复了社会秩序，安定了人心，赢得了群众的信赖。



第三,做好救济难民和处理伤亡的善后工作。

被日军践踏了一个多月的淡水,日军撤出后,尸横街头,难民饥寒交迫。区行政委员会迅速拨出专款专物,作为掩埋尸体、清理垃圾、救济难民之用。时值瘟疫流行,且因日机轰炸,伤病者甚多。行政委员会组织“惠青”工作团及地方的医务人员进行抢救医治,发动群众搞好公共卫生,防止瘟疫流行,以保障人民的健康。

第四,排难解纷,处理民事。

行政委员会是名副其实的人民政府,办事人员没有国民党官员那种贪污受贿、摆官架子的作风。他们待人热情,办事认真,群众有事,即来即办,群众十分拥护。民事纷争,家庭纠葛,夫妻离合等各种事情,群众都找上门来要求解决。

第五,废除苛捐杂税,恢复集市贸易。

行政委员会对商店、摊贩、农贸市场一律免税,买卖公平,群众十分拥护。因此,经常有商人和农民给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行政委员会送大米、蔬菜、杂粮以及其他生活用品,支持自己的军队和政府,拥政爱民的生动事例屡见不鲜。

第六,复办教育,组织生产。

淡水的学校,特别是崇雅中学遭受敌机的轰炸,图书、仪器毁坏无遗,校舍破坏严重,当时经费十分短缺,一时难以全部复办。行政委员会决定先复办崇雅小学,并在农村办

夜校和识字班。

行政委员会动员农民迅速行动搞好春耕，恢复生产。要求大小商店组织货源，供应人民生活 and 生产的需要。

行政委员会成立后，由于它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扎扎实实地为群众办好事，深得各阶层群众的拥护和赞扬。

日军撤出惠州后，国民党惠阳县的党政军人员又从后方跑回来，并恢复了各种办事机构。但由于日军进攻时国民党在惠阳沿海地区的军队都溃逃了，他们的力量还很薄弱，而我们则有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作后盾，故他们只好承认群众推选的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过了一段时间，惠阳县县长蓝逊提出要统一全县各地区政府的名称，在征得我们的同意后，将“行政委员会”改为“区署”。继续委任严尚民为区长，原来的工作人员不变。我们利用掌握的政权，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加速成立各乡村的抗日同志会，发展群众自卫武装，壮大人民的力量。同时，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各界人士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重新控制淡水地区，在日军退出不久，就派罗坤大队挤进淡水。罗坤回到淡水之后，就向我提出：“曾生，淡水原来是我的部队驻防的地方，现在我们回来了，淡水该给我们，你们到坪山去吧！”为了顾全大局，经过协商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旬，我们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又返回坪山。罗坤这次回到淡水，一时还不敢为非作歹；

对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工作,既不反对,也不过问,有时还说些好话。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战略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政策。这一政策很快就在东江逐步贯彻执行。原惠阳县县长蓝逊因任命了共产党员严尚民当区长,受嫌而被撤职。新任命的县长叫刘秉纲。此人曾任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团长,是靠打内战、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起家的,是个心毒手狠的家伙。他一上台就声言要撤严尚民的职。第二区人民群众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各乡镇长联名上书挽留严尚民,几千群众在淡水晒布岭举行大会,带来各种慰劳品慰问第二区区署,以表示拥护严尚民的领导。一九三九年五月上旬,刘秉纲和国民党惠阳县党部书记长、中统特务何泽宏,带了县里的大小头目,由一百多武装护卫,杀气腾腾地来到淡水“视察”。

根据东南特委的指示,我赶到淡水召开了有淡水中心区委和区政府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为预防不测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会议决定严尚民先离开淡水,区政府的工作由黄达三负责,陈志期、古海生两同志协助。为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进攻,会议还讨论并决定了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准备撤退的预防措施。

刘秉纲一到淡水,就大骂淡水抗日民主政府“不象话”、“乱七八糟”,制造舆论要解散抗日民主政府。接着就把我们

为阻拦日军进攻而发动群众破坏公路的行动，作为行政委员会的罪过，妄图以此为借口解散区民主政府。我们立即发动群众，三天内把公路全部修好，堵住了刘秉纲的口。刘秉纲找不到借口，最后只好以“年轻”、“需要深造”为理由，免了严尚民区长的职。同时，其他区员也被免职。就这样，惠阳县第二区的抗日民主政府被迫结束了。但是大部分的乡村政权仍然在我地方党的控制之下，继续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惠宝边我抗日武装的斗争。

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东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它虽然只有将近半年的建政时间，却为抗战事业、为淡水地区的群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深受各阶层群众的拥护。它是东江人民在抗战中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第一次尝试，为我们后来建设东江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 初步打开局面

坪山位于惠州、淡水以南，距离惠州六十余公里，距淡水二十多公里，是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东南距大鹏湾海岸仅十多公里，西南接近香港、九龙地区，是内地与香港物资进出口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旬，我们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一百多人从淡水返回坪山。

从此,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以坪山为基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与王作尧等同志领导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初步打开了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

我们返回坪山之后,全力开辟以坪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工作部署上,我们抓紧部队和党的建设。由周伯明、郑晋等同志抓紧对部队进行军政训练,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增强部队的战斗力。由谢鹤筹、陈铭炎等同志抓党的建设,健全和加强各级党的组织,抓紧对党员的政治训练。一九三九年初,由陈铭炎主持,在坪山开办党员训练班,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与此同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我们派出大批政工队员和地方党组织相结合,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在各乡村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通过发传单、写标语、办夜校、教唱歌、文娱演出,举行节日纪念活动乃至个别谈话等各种形式,向广大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广泛发动群众支持和参加抗日斗争。在做好宣传发动工作的基础上,以抗敌后援会、抗日同志会、抗日妇女会、抗日青年会、抗日儿童团、抗日自卫队等多种组织形式,把各阶层的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和健全各种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建立和发展群众抗日武装。尽最大的努力,最大限度地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投入抗日救国的伟大民族解放斗争。从而为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为进行人民战争创造了一个好战场。

前面已经提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叶挺同志到了香港，他是来为新四军筹集经费和物资的。国民党广东军事当局余汉谋想拉拢他，委任他为东江游击指挥。叶挺同志利用这个机会，在十二月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中共东南特委，在深圳鸿兴酒家建立起指挥部，以当时在深圳附近活动的东莞模范壮丁队为基础建立了指挥部警卫连；并拟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抗日游击大队为核心，发动群众，争取改造其他抗日武装，在短期内建立一支由我党掌握的拥有一万数千人的抗日武装力量。蒋介石知悉后，极力反对，命令余汉谋撤销对叶挺的任命。不久，叶挺同志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

十二月下旬，根据东南特委的指示，何与成、李燮邦同志率领叶挺指挥部警卫连七十余人到坪山，编入我们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组成第一中队。同时，香港九龙淘化罐头厂工人十八人也到达坪山，编入我们的特务队。

一九三九年春，惠阳的地方党组织从淡水、坪山、坑梓、坝岗、麻溪、蔡溪子等地，动员了一批共产党员和抗日自卫队员参加部队。部队迅速发展，又组成第二中队。这样，我们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战斗部队，就有第一中队、第二中队和特务队，共二百余人，装备有一挺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和一百二十支长短枪。

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召开了省

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讨论广东省今后的基本方针和主要任务。会议确定党的基本方针是：积极在抗战中发展自己的力量，准备在抗战最后阶段起决定作用。提出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扩大动员、组织群众；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建立真诚团结的范例和建立强大的党的基础，作为当前党的任务。会议要求把工作重点放在东江和琼崖地区，建立坚持长期抗战的根据地。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为了加强对东江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在一九三九年二月成立了中共东江特委，由林平（即尹林平）同志任书记，领导连平、和平、五华、紫金、兴宁、河源、博罗、增城、龙门、新丰、海丰、陆丰等县党组织和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九三九年春，日军由于兵力不足，撤出惠州等城镇和东江的部分占领区，加强对广州和沿海重要据点的防守，以巩固主要占领区，实行“以战养战”，因而整个广东，特别是东江地区，出现了暂时相对稳定的局面。这时，日军驻守南头、深圳、沙头角等地，我们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驻守离敌人二三十公里的坪山，在龙岗、横岗、梅沙、葵涌等地和沙头角、深圳附近，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日军进犯时溃逃到后方山区的国民党军队，在日军撤走后又重新回来，在惠州设立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下简称游击指挥所），香翰屏任主任。在惠阳、博罗一带，成立第四

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司令骆凤翔；在东莞、宝安、增城一带，成立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司令王若舟。

坪山虽然地处抗日前线，经常处于战备状态，但由于我们认真抓好党组织和部队的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加上我们的部队英勇杀敌，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干部战士帮助群众打柴、挑水、割禾、插秧和打扫环境卫生等，同群众打成一片，深受群众的爱戴。经过全体军民几个月的努力，坪山出现了军民关系密切，抗日热情高涨，社会治安良好，生机勃勃的大好局面，群众美称坪山为“小延安”。群众中流传着“边区到底好威风，人心所向淡、坪、龙（即淡水、坪山、龙岗）”的歌谣，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坪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衷心拥护的心情。

正当我们大力建设以坪山为中心的惠宝边抗日根据地的时候，中共广东东南特委书记梁广同志从香港来检查工作。他来到了沙窖村我们总队部的驻地，并带来了一位陌生的同志。我正在捉摸他是谁的时候，梁广同志即介绍说：“这位就是梁鸿钧同志，是参加过广西左右江起义的老同志，是党中央派来加强你们这里的军事指挥的，来这里之前是陕甘宁警备区的参谋长。”听了这个介绍，我马上感觉到党中央对我们东江敌后抗日斗争的真切关怀。对于我这个缺少军事经验的总队长来说，实在是很需要有一位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来具体指导。寒暄过后，梁广同志要我派人去通知王作尧同志来开会。



在此之前，我从各种渠道已了解到创建东莞模范壮丁队的王作尧同志。他是东莞县厚街镇人，广州燕塘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的派遣，先后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和在广州的学生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八年初，接受党组织交给回乡组建人民抗日武装的任务，担任东莞中心县委军事部长。

我非常渴望见到王作尧同志。交通出发后第三天，王作尧和何与成等同志来到坪山石灰陂我家里，经何与成同志介绍我们相识了。我说：“王作尧同志，非常高兴和你相见，我已盼望很久了。”我打量着这位名扬东莞、宝安的游击大队长。他身材高大结实，一派军人姿态，具有一副青年革命家的干练风度和英雄气概。“曾生同志，我们是一家人，要请你多多帮助。”作尧同志谦逊地说。我说：“哪里，哪里，你们的模范队搞得很不错，刚成立就打了胜仗，我应该好好向你们学习才是呢！”交谈了一会，我带他们到沙窖村去见梁广和梁鸿钧同志。我们东江地区两支人民抗日武装领导同志参加的第一次会议就正式开始了。

会上，梁广同志传达了广东省委关于成立东江军事委员会和以群众武装的面目去争取国民党军队番号等问题。

会议正式成立了东江军事委员会（下简称东江军委），成员有：梁广、梁鸿钧、曾生、王作尧、何与成，梁广为书记，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

会上，梁广同志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省委指示我们

采用“白皮红心”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他说：“省委指出：目前，我们的力量还很小，不能过早暴露党的面目。象当前八路军、新四军那样以党的武装向国民党当局争取公开合法的番号，对我们来说，目前还不合适。一方面，国民党看见我们力量太小，看我们不起，未必能接受我们要求合作的主张；另一方面，我们的面目公开了，国民党害怕我们发展壮大，就会趁我们还弱小之时消灭我们。因此，以抗日青年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的面目出现，去争取国民党军队的番号，是我们当前开展斗争的正确途径。”

大家一致拥护省委的指示。会议决定东江军委在我们总队部办公，还决定了我们两支部队以秘密的方式联系，指定了交通联络员。

坪山会议之后，我们惠宝边和东宝惠边的两支抗日武装，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紧密地携起手来，以新的斗争姿态，出现在东江的抗日战场。

我们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根据廖承志同志的指示，已争取到国民党军队的番号，但由于温淑海的部队在日军进攻时被打垮，温淑海给予我们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番号没有得到国民党第四战区的承认。现在，遵照省委的指示精神，我们必须争取一个新的番号。如何争取新的番号呢？正巧此时“南洋英荷两属惠侨救乡委员会”的代表回东江来调查灾情和慰问抗日部队，我陪同他们到博罗去慰问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我们到了博罗，在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

队的司令部拜会了司令骆凤翔。骆热情接待我们，亲自带领我们到部队的驻地进行慰问。我利用同骆凤翔在一起活动的机会，主动地向他汇报我们部队的情况，慰问团的成员也在骆凤翔的面前对我们的部队夸奖一番。我抓紧时机向骆凤翔提出要求，请他帮助我们部队向第四战区争取一个合法番号。骆凤翔当即表示可以帮我们办理。

过了一个月左右，番号批下来了，这个番号叫“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直属游击指挥所指挥。但是，骆凤翔给我们搞到的只是一个空头番号，既不给钱，也不给枪，而划定的防区只限在坪山，部队只能有两个中队的编制，人数二百人。他还要我们立即送交二百人的花名册。这样，我们部队二百指战员的军饷就进了他或者香翰屏的腰包。一九三九年五月，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正式改编为“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下简称新编大队），我任大队长，副大队长郑晋，政训员周伯明。比我们早一个月，王作尧同志领导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经过他们的工作，也改编为“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下简称第二大队），大队长王作尧，政训员何与成。

部队虽然改变了番号，但仍保持原来党的组织和独立的编制，在作战行动、军政训练、干部任免和经济上完全独立自主。这样，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下取得合法地位，就更有利于我们发动群众和争取华侨、港澳同胞的支持。

随着部队的迅速发展，我们在坪山建立了枪械修理、医

疗和被服等为部队服务的一些单位。我们以最大的努力，着手建设以坪山为中心的这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

为了解决枪械维修和武器补充的问题，急需有一个枪械修理厂。当时，原江西中央苏区兵工厂枪炮股股长周玉正好带领几个人在坪山打铁。梁广同志在中央苏区时就认识周玉。他和周玉研究之后，决定通过中共梅县中心县委，由周玉回去召集十几个有修造枪械技术的工人来坪山，建立起枪械修理所。这间修理所办得很好，不仅能修理枪支，而且还能造步枪。到一九三九年冬，除修理枪械，每天还能生产一支步枪。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我们在坪山还先后建立了医务室、鞋厂和被服厂，基本上可以解决部队指战员的医疗和军鞋、被服供应。

廖承志同志很重视我们这块根据地建设，千方百计地帮助我们建立电台。一九三九年春，他为了解决我们部队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系，不仅拨给我们一部电台和通讯密码，而且为我们培训电台人员。我们选调了戴机、王春红等同志成立电台小组。但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一直到一九四〇年春，我们的电台仍未能沟通与党中央的联系。

党中央和广东省委十分重视和关怀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一九三九年夏除调来梁鸿钧同志外，还把在南方局工作的卢伟良同志调来加强我们新编大队的领导。

卢伟良同志是广东省梅县人，一九二八年入党，曾任共

产主义青年团梅县委书记、东江团特委常委。长征时先后担任红军总部二局和一局参谋。到陕北后，任党中央延安至上海的交通员，后又随叶剑英同志到张学良部队担任联络工作。一九三八年任新四军东南局交通站站长。

卢伟良到达坪山后，担任我们大队的政训员，周伯明改任副大队长，原副大队长郑晋派往南洋做华侨的统战工作。九月，党中央和省委又派李振亚和邬强同志到坪山，主持广东军事干部的培训工作。

李振亚同志又名李松、李伯崇，广西省滕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百色起义，同年入党并参加红七军，任副官、营教导员等职。长征中在干部团任营长，后任第三十三军参谋长，到延安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任中队长。一九三八年随叶剑英同志到湖南，在国共两党合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教官。一九三九年调到广东省委，在省委党员干部训练班任教官。

邬强同志是广东省英德县人，一九三〇年入党；一九三一年参加英德县鱼湾暴动，任苏维埃秘书。一九三六年到中央军校南宁分校学习，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军任副连长北上抗日，参加过徐州、台儿庄大会战。一九三八年在党领导下，在英德县组织抗日自卫队任中队长。一九三九年夏，参加省委党员干部训练班学习。

李振亚和邬强同志到达坪山后，东江军委以我们新编大队为掩护，由他们两人负责，在坪山沙壘举办了两期军事

干部训练班,每期三个月,共培训了一百多名军事干部。党中央和广东省委派来的军事骨干,对我们部队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榜样建设部队,使部队能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建设成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队伍。我们新编大队为了迅速提高部队干部的素质,以适应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需要,还在这一年的十月,由范毅主持,卢伟良、周伯明、范毅负责上课,在香园墩村开办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军事干部训练班,培训了五十多名干部。到一九四〇年春,我们新编大队小队长以上的干部,大部分经过沙壘或香园墩军事干部训练班的军政训练。这对提高我们这支新建部队的素质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一九三九年秋天开始,我们新编大队在葵涌、盐田、沙头角、横岗一带,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与日军作战大小三十余次,揭开了惠宝边抗日游击战争新的一页。

一九三九年九月初,日军五百余人在惠宝沿海登陆,国民党守军罗坤部闻风而逃,退守淡水。日军占领了葵涌、沙鱼涌,封锁大鹏湾海面,并封锁中英边界,切断了内地与香港、南洋的国际通道,威胁惠州。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命令我们新编大队收复葵涌、沙鱼涌,并指定国民党军的张英大队和罗坤支队各派一个连归我们指挥。但张英、罗坤不派出一兵一卒。九月十二日,我们新编大队单独出击,夜袭葵涌,打击敌人。敌人于拂晓前仓惶从海上逃窜,我们部队一举收复了葵涌、沙鱼涌,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

三天后，驻沙头角日军二百余人经盐田、梅沙进攻坪山，企图歼灭我游击队，夺回葵涌和沙角涌。我新编大队在抗日自卫队配合下，在马峦头山地进行阻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接着，我们进行了一次深入敌巢的战斗，夜袭沙头角附近的沙井头村日军据点，击毙击伤日军数人。

十二月，日军一个大队在东莞县两渡河打垮了国民党军一个团之后返回深圳途中，我新编大队在横岗以北石岗圩附近的鸡心石伏击敌人，毙伤日军三十余人，毙战马三匹。

我们新编大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以来，虽然战斗的规模和战果都不大，但是它以勇战强敌的姿态出现在东江敌后战场上，打击了东江地区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惠宝边抗日军民的抗战热忱，锻炼了我们这支新建的抗日武装，尤其马峦头、沙井头、鸡心石战斗，在当时更具特色。马峦头战斗是日间阻击战，沙井头战斗是夜间袭击战，鸡心石战斗是日间伏击战。这三次战斗，都是面对着优势的敌人，敢于迫近敌人作战。通过这些作战的锻炼，提高了我们指战员的战斗意志，树立了勇于打近战的战斗作风，和进一步领会了游击战的战术手段。

由于我们新编大队作战英勇，主动出击敌人，收复失地，军纪严明，保护群众利益，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赞扬。国民党第四战区和游击指挥所也传令嘉奖，赞誉“新编大队最能执行命令，最能打击敌人，最能

得到准确情报，最能在军风纪上起模范作用。”

活动于东莞、宝安地区的第二大队，亦积极对日伪军作战，他们深入宝深公路沿线，不断袭击敌人。八月上旬，摧毁了宝深公路上南头以东三公里的大涌桥，破坏敌人的电话线，使敌人由南头至深圳的交通联络陷于瘫痪。同时，不断袭击敌军的车辆，逼使敌人龟缩于孤立据点。

十一月间，由于敌人抽调兵力进攻粤北，东宝地区敌人力量薄弱。第二大队便挺进南头外围，对南头包围封锁，断绝敌人的粮食供应。守城日军被迫于十一月三十日晚从海上撤走。十二月一日，第二大队收复宝安县城南头。这是广东省在抗日战争中首次解放县城的胜利。

由于我党领导的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取得了这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从而使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初步打开了局面。

我们新编大队驻守在敌人几个小时就可到达的坪山抗日前线，时刻在敌人的威胁之下。国民党军政当局要我们在前线抗击敌人，以保障他们在淡水、惠州的安全，但又不给我们粮饷、武器，而且还要限制我们部队的人数和活动的范围，部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坚决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广大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和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共同对敌。在广大群众、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战胜重重困难，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坚



决进行敌后游击战争，并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我们的队伍。到一九四〇年春，部队发展到五百多人，加上机关、宣传队和后勤人员共有七百人左右；我们以坪山为中心的惠宝边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也初具规模；我们部队的活动范围，也从坪山扩展到葵涌、沙鱼涌、盐田、沙湾、龙岗、横岗等地和沙头角、深圳附近。

## 侨胞和港澳同胞的支持

我回家乡参加抗日战争前在香港工作，又曾经是澳大利亚的华侨。我很了解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具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近一个世纪以来，广大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始终与祖国人民同命运、共荣辱。我们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得以在惠宝边建立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和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我在香港工作期间，香港的爱国同胞，就积极参加中共香港市委和海委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从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秋，惠阳县籍和香港海员、工人及知识分子中的爱国青年，踊跃参加由严尚民、叶锋、刘宣等同志领导的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服务团，先后分三批约一百人，回到惠阳、宝安沿海地区，他们以“惠青”工作团的名义，在淡水成立“惠阳县第二区抗敌后援会”和“惠阳县文化界救亡工作团”，把惠阳、宝安沿海地区的爱国青年

和中小学教师组织了起来，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东江地区沦陷，东江籍华侨惊悉这一国破家亡的消息后，纷纷行动起来，救国救乡。侨居南洋英荷属殖民地的惠州籍华侨，在黄适安（何友逖）、黄伯才、官文森、戴子良等发动和组织下，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日，在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了代表大会，成立了“南洋英荷两属惠侨救乡委员会”（简称“惠侨救乡会”），推举侨领黄伯才为主席，派出黄适安等三人为代表到香港，与香港惠州籍团体（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等）的代表，商讨决定在惠阳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确定以“动员东江群众协助军队及人民武装抗战，并救护伤兵，赈济难民及辅导民众组织各种救亡团体”为宗旨。十二月下旬，“东团”总团部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负责与“惠侨救乡会”联系，动员组织华侨和港澳爱国青年回乡参加抗战，保证团员的活动经费和物资供应。一九三九年一月，“东团”在淡水正式成立，原“惠青”服务团的主要领导人叶锋和刘宣被选为团长和副团长。

叶锋同志是广东省惠阳县淡水人。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在广州读书期间，参加了“中青”领导的读书会和广州学生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一九三六年夏，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同年九月出狱后到了香港，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参加组织学生生活社和香港惠阳青年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入党。一九三七年春，到“余闲乐社”工作，发动和组织海

员和洋务工人支援绥远抗战。以后他和严尚民、刘宣同志领导“惠青”服务团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初，“惠侨救乡会”回乡慰问团也回到东江视察灾情，并开展慰问和救济工作。他们一踏上国土，就是我们的游击区。他们首先到坪山慰问“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我们组织部队热烈欢迎，详细向他们介绍我们抗日杀敌、保卫家乡的情况。我陪同他们在坪山视察了几天，他们看到我们的部队纪律严明，军民打成一片，指战员们生龙活虎，倍加称赞，增强了他们的抗战信心和热忱。侨胞们的慰问，又进一步激励了我们部队的士气。

我们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收复淡水，保卫家乡的事迹，通过香港报刊的报导，和“惠侨救乡会”代表的实地视察，很快名扬海外，美国和南洋的华侨以及港澳同胞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信心，而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身上。他们不仅在精神上、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持东江人民抗日部队，而且把自己的儿女送回东江来，参加我们的部队。

我们这支部队，是以民众抗日武装面目出现的，无固定的经费和粮饷，经济非常困难。国民党虽然给了我们一个部队的番号，但从来没有给我们发粮饷。这时部队的经济来源，一方面依靠当地群众，自筹伙食费用；一方面依靠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支援。香港的“余闲乐社”、惠阳青年会、惠坪乐善公所、宝安青年会和“惠侨救乡会”等救亡团体和华

侨学校的师生，通过募捐、巡回义演、卖花劝捐等活动，进行筹款，支援我们。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惠侨救乡会”在吉隆坡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们的副总队长郑晋同志应邀出席了大会。为了进一步支援祖国抗战，大会决定发动第二期募捐，把募捐所得款项的百分之四十献给新四军，百分之四十献给我们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百分之二十作为惠州难民救济费。会后，南洋各地华侨积极响应号召，掀起了为抗日救亡捐献的热潮。富有的人一次捐出几百元至上万元；一般工人、店员、职员节衣缩食，献出每月工资收入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有的妇女把自己的积蓄、首饰甚至订婚戒指都捐献出来。一九三九年春，海外华侨寄给宋庆龄转交给我们这支部队的捐款，一次就达港币二十万元。以后还多次送回捐款和被服、胶鞋、药品等大量物资。直到一九四〇年三月，我们这支部队的经费和物资供应，还是主要靠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助。

我们这支部队组建之初，主要成员是我从香港带回来的爱国青年。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建立之后，又有一批爱国青年从香港回来参加。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南洋各地的华侨爱国青年，在当地华侨团体的发动组织和爱国侨领的支持下，纷纷组织团体返回家乡参加抗战。如吉隆坡爱国侨领黄伯才和张郁才先生出资，以黄志强为队长，由十三人组成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两才队”；爱国侨领官文森独资，以

王春红(王超)为队长,由七位女侨胞组成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吉隆坡各界侨胞集资,以黄义芳(黄炜然)为队长,由七十三人组成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吉隆坡队”和“加影队”、“星柔队”、“士毛月队”,以及“北马华侨回国服务团”等华侨子弟队伍相继回国,参加我党领导的东江人民抗日战争。与此同时,安南(越南)、暹罗(泰国)、缅甸,甚至美国等地的华侨爱国青年,也纷纷回东江来参加抗战。大批海外华侨爱国青年回国后,大部分参加我们这支部队,小部分仍以“东团”名义,在东江各地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华侨和港澳爱国青年仍陆续回东江参加抗战。据初步统计,先后参加我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港澳同胞和华侨子弟共约一千人以上。大批爱国青年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的锻炼,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有的成为支队(团)、大队(营)、中队(连)一级的领导干部,并且涌现了林文虎等一批英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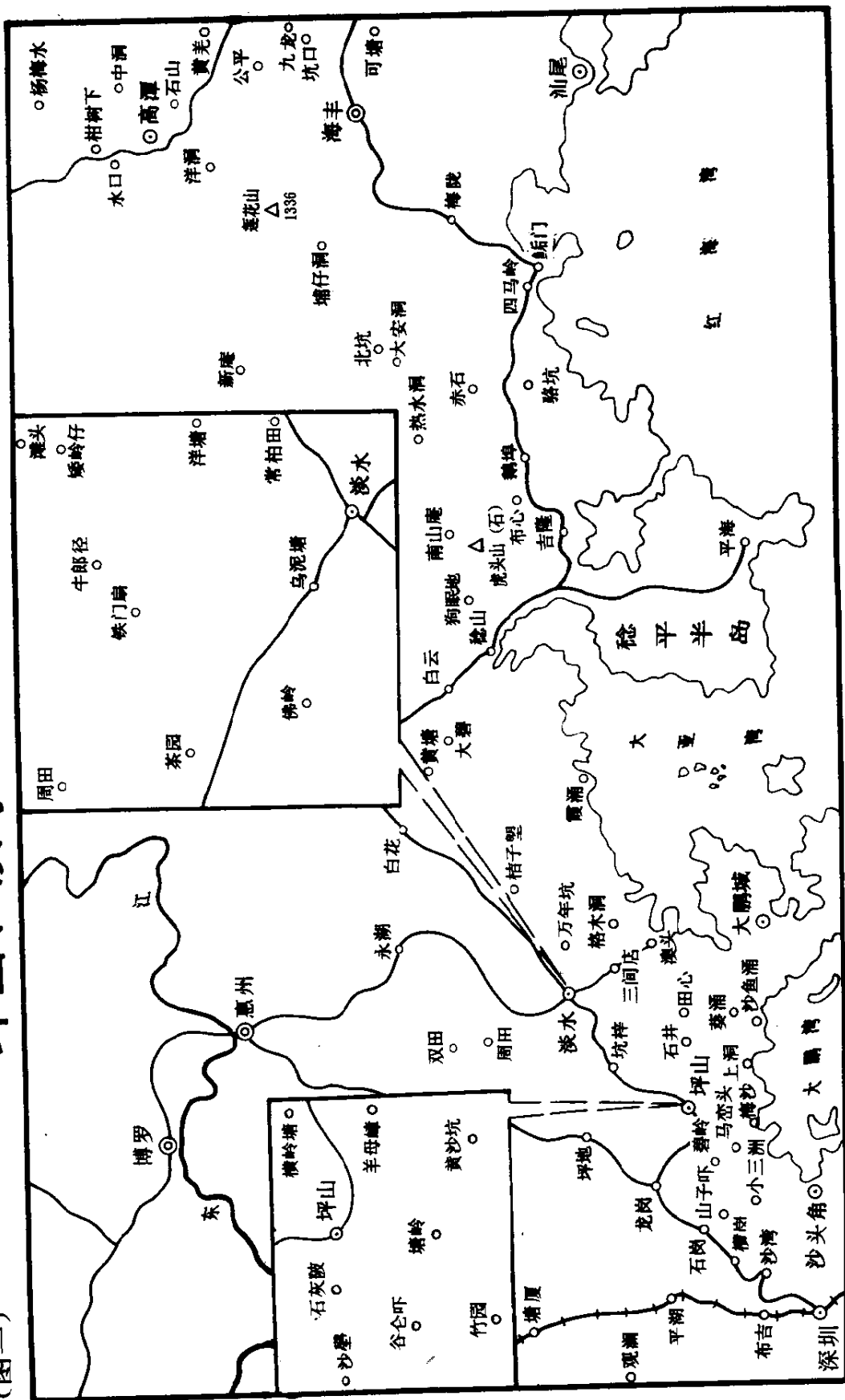
林文虎同志原为泰国华侨青年,抗战爆发后,回国参加我党领导的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从战士成长为团的指挥员。一九五〇年担任广东军区江防司令部海防大队副大队长时,在解放万山群岛战役中英勇牺牲。中央军委授予林文虎以海军战斗英雄称号。

在长期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还有许多华侨爱国青年的热血洒遍南粤大地,染红了祖国河山。独立中队政治委员李

中(钟若潮),中队长陈廷禹,政治指导员黄密、沈尔七,“东团”西方队队长、短枪队队长黄志强,“东团”吉隆坡队副队长、民运组长陈现(陈特),民运队长陈剑雄(陈德)、大队参谋陈胜、短枪队队长叶凤生,小队长杨仰仁、欧仲生,政治服务员颜金榜,交通站长陈耀光,交通员陈志奋,卫生员王丽和民运员、游击队员陈显、颜剑虹、罗一帆、卢鸿基、张兴、朱金玉等华侨爱国青年;以及大队长沈标,大队政治教导员冯克,宣传干事陈冠时,税站站长张金雄,小队长陈定安、杜宏超,民运队长张慕良、黎廷良,卫生队长张漪芝,班长李锋等港澳爱国青年,他们有的在作战中英勇牺牲,有的被俘时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烈士们用自己的鲜血,谱写出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爱国主义光辉壮丽的诗篇。

# 坪山、淡水、高潭地区略图

(图一)



## 第五章

# 东移海陆丰

### 挫败顽固派阴谋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全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迅速扩大，严重威胁着敌人的后方，日军不得不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以主要力量对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将战争初期对国民党所采取的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策略，改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加紧对国民党诱降。

在日军诱降、英美劝降之下，国民党开始走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随即在各地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活动，并发展为大规模的



武装进攻，掀起了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东江地区，两支由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我们的新编大队和王作尧等同志领导的第二大队，虽然都先后在一九三九年四五月间取得了合法的番号，对外一直没有公开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而是以爱国青年和华侨、港澳同胞自发组织的群众抗日武装的面目出现的。但是，我们部队的本质很容易就显现出来。因为我们的部队在真正同敌人作战，真正爱护群众，坚决反对囤积走私；我们的部队真正实现官兵平等，没有一个军官贪污腐化等等。这和国民党军队及那些挂名抗日、占地为王的杂牌、土匪部队截然不同。国民党一眼就可看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部队。

蒋介石要用各种方法来限制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部队自不用说，广东的地方实力派余汉谋也不容许在其势力范围内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存在和发展。在反共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广东国民党当局当时虽然承认了我们这两支人民抗日武装，给予合法番号，但对我们始终包藏祸心，处处限制，伺机消灭。国民党设在惠州的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就是个反共老手。此人素以诡计多端著称，很得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赏识，曾任陈济棠的第二军军长。他表面上温文尔雅，实质心怀叵测、口蜜腹剑。他的队伍平日最善于走私赚钱，腐化不堪，对日军则畏之如虎，但对我们人民抗日武装，却凶神恶煞，视如眼中钉。他对

我们采取软硬兼施，限制、利用、消灭的策略。

香翰屏一伙对我们处处提防，千方百计限制我们发展壮大。他们对收编的土匪队伍，既给地盘、番号，又供给武器弹药，每月发军饷。对我们这两支人民抗日武装，则另眼相待。除了给我们新编大队一个空头番号之外，既不给一支枪、一粒子弹，又不给一分钱军饷，而且规定了我们的驻地和人数，千方百计限制我们部队的发展。

开始，他们想利用我们这两支部队驻守坪山和天堂围一带最前线，作为挡风墙，日军一来进攻，我们首当其冲，这样可以保护他们的安全，又可以借日军的力量来削弱和消灭我们。但是，他们的这个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响，我们在广大群众、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支持下，不仅没有被削弱、被消灭，反而越战越强，不断发展壮大。

此计失败，他们又想了一条调虎离山之计。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香翰屏要我们从坪山地区调到增城去，使我们人地生疏，又得不到惠宝前线地区的人民和华侨、港澳同胞的支援，而借增城日军的力量消灭我们。他们的这个阴谋一提出来，我们就识破，于是向他们提出许多难题，要他们给子弹，给开拔费，而且只答应分一半的兵力去，另一部分和后方机关仍驻守坪山。他们这个阴谋又没有得逞。

八月间，香翰屏在惠州召集大队以上的干部会议，我去赴会，看他耍什么花招。他见到我，一开口就恐吓说：“曾生！你们的部队是有色彩的，人很复杂。听说叶挺派了许多人到

了你们部队里,是不是?”我说:“我们的部队都是当地的爱国青年和华侨组成,有什么复杂?我们抱着抗日救国热情,积极抗日,见到敌人就打,维持地方治安,一不走私,二不抢老百姓的东西,有什么色彩?”他回答不了,接着就说了一联串污蔑我们共产党的话,又问:“听说你们在坪山造枪是不是?”我们确实有一间枪械修造厂。我就说:“既然是一支抗日的游击队,总要有个修理枪械的地方。”他再问:“你们到底有多少枪支?”我说:“这个已经汇报给你们了。你看看花名册和枪械册就知道。”他毫无办法,最后只好公然威吓:“曾生!你们到底要走叶挺的路线,还是要走我们的路线?”我说:“我们要走的是抗日的路线。”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

香翰屏一伙对我们的态度是:日军一紧张,他们就松;日军一松,他们就紧。从九月到年底,敌情紧张,他们就要我们抗击日军的进攻,对我们暂时放松。这期间我们对日军进行了二十多次的战斗,特别是在收复葵涌、沙鱼涌,马峦头阻击日军,沙井头袭击日军和鸡心石伏击日军等战斗中,我们都取得了胜利,打出了我们新编大队的军威。这使香翰屏明白:他们自己的土匪队伍是不顶事的,我们的部队是不好随便欺负的。

香翰屏一伙见吓不倒我们,就改用拉拢的手段,企图用封官许愿和金钱美女来征服我们。香翰屏亲自出马,使尽封官许愿、美人佳酒的伎俩,妄图诱惑王作尧同志参加国民党。对我还算“赏识”,千方百计拉拢我和他们合伙走私,发

国难财。一九三九年底，香翰屏要我去惠州开一个军事总结会议。会议期间，香翰屏指使其侄子香某和罗坤出面找我一个人去茶楼饮茶，和我谈生意经，说什么走私钨矿、桐油、牛皮等如何赚钱，你们部队驻防坪山，控制一条国际运输通道，十分便利。劝我和他们合伙走私，共同发国难财。本来，我们驻扎在坪山地区，对国民党贪官污吏走私漏税发国难财，有很大的威胁，经济上的矛盾是很大的。他们要腐蚀我们的队伍，进而解除我们对他们的威胁。这一点我们是心中有数，当然不干。他们哪能理解我们为了抗日救国连性命都可以不要，何况几个臭钱！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蒋介石派其亲信陈诚到广东来部署反共，大造反共舆论。广东国民党东江当局立即行动，于十二月下旬下令限制“东团”的活动。悍然非法逮捕“东团”博罗队杨德元、李健行等二十三人。与此同时，积极准备以军事围攻，消灭我们的部队。

香翰屏一伙用软的一手失败了，就用硬的一手，准备用军事手段来消灭我们。从一九三九年底开始，他们以“协助工作”为名，派人到王作尧同志的第二大队担任副大队长、副中队长等职务。一九四零年初，派了三位军官到我们新编大队来“了解情况”，接着又派两个政治工作人员来当连的政治指导员。企图通过欺骗拉拢，逐步掌握我们这两支部队的情况，乃至控制我们的部队。如达不到控制的目的，则为其用军事手段消灭我们作准备。对于香翰屏这一着，我们与

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在内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组织上采取严密措施，使他们派来的人员无法施展其奸计。他们派来的指导员，在连队宣传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人领袖等法西斯谬论时，我们的战士以提问的巧妙方式和他作斗争，弄得他不能自圆其说，下不了台。国民党的政治官是吃不了苦的，我们就给他们出难题。我们每天不是搞军事训练，就是去帮助群众劳动，晚上进行夜行军露营；一天两顿粗米饭，除了青菜都是咸菜。搞了个把星期，他们便藉口回去汇报工作，就渺如黄鹤。这一着又失败了。

一九四〇年二月初，香翰屏命令我们新编大队到惠州“集训”，一天一个电话，还不时由罗坤转告催促，企图在集训时把我们部队包围缴械，一网打尽。我们洞悉其奸计，提出种种理由，表明不能去集训。香翰屏见我们不上钩，就以“军令必行”，迫我就范。形势十分严峻，一场我们想要避免而又无法避免的内战已迫在眉睫。为了试探一下是否有一线可以消除亲痛仇快的内战的希望，我们决定派周伯明同志去惠州“谈判”。

三月四日，周伯明以新编大队副大队长的身份，带了兩名战士到达惠州。第二天上午，他即到游击指挥所求见香翰屏。香翰屏不出面，由他的参谋长杨幼敏接见。一场面对面的激烈斗争在指挥所的会客室展开。

周伯明见到杨幼敏之后，即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马上向杨幼敏报告近日的敌情和我们同日军作战的情况，提出

迅速补充弹药的要求。杨幼敏听得不耐烦，未等周伯明讲完，就粗暴地说：“指挥所再三命令你们新编大队来惠州集训，为什么不来？”周伯明说：“听说有这回事，但因前方军情紧张，我们以抗日为首要任务，还来不及执行上峰集训的命令。”杨幼敏听后，打起官腔，提高了音调说：“前方作战自属重要，那有国军承担保土安民之责，你们大队新兵多，未经严格训练，是没有战斗力的，政府爱护你们，下决心调你们来集训，这是党国对你们的关怀。”周伯明听后气得沉不住劲，就接口说：“参座，你是知道的，从惠州、淡水到敌人驻扎的深圳、沙头角、南头一线，在前线的部队只有我们新编大队，并无任何国军。就以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来说，独立第二十旅、保安第八团、罗坤的第二支队，哪一次同日军正面作战过？哪一次不是闻风而逃？在坪山地区的老百姓信任的不是国军而是新编大队。我们要是离开了前线地区，老百姓要遭殃，我们也不放心。政府的好意我们心领了，希望上峰改变集训的命令。”

杨幼敏听后马上脸红起来，但又突然转成个笑脸说：“你们抗战有功政府是知道的，也向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了，战区长官不是传令嘉奖你们吗！惟其如此，才想把你们这支部队加强起来，使将来更有战斗力。来惠州集训，既可提高部队的素质，还可以考虑加强装备。”讲来讲去，还是要我们去“集训”。为了进一步说明我们不能到惠州集训的理由，周伯明十分诚恳地说：“参座！政府的关怀我们心里很明白。来

惠州集训的命令，我们实在难以执行。因为我们这个部队一部分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一部分是为了抗日救国而回国的华侨。政府没有给过我们一分钱，一粒米，一粒子弹，我们的经费全都依靠爱国华侨的捐助。他们要求自己的部队保卫家乡，我们没有胆量违背他们的意愿离开前线，拉到安全的后方来集训，万一那一带地方的人民因我们离开而受祸害，我们怎么交代？恐怕以后连饭也没得吃了。请上峰体谅我们的处境和困难。如果政府要提高我们部队的战斗力，我们请求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第一、给我们补充弹药，加强装备；第二、由上峰派几名教官到部队来加强训练，这既能体现上峰对我们的关怀，又使我们不致为难。”周伯明一口气把出发前我们集体研究如何说明不去集训的理由和让步的极限都说了。

杨幼敏见他的骗术失败，又提不出什么理由来说服周伯明，于是，恼羞成怒，暴跳起来，用命令的口气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新编大队也不例外，指挥所既然下了命令要你们来集训，军令如山，谁敢不服从？”看来，要摊牌了。周伯明回敬他一句：“抗战有利的事，我们坚决服从，否则我们不敢承担责任。”这一下把杨幼敏弄得火冒三丈，他进一步威胁说：“谁敢不服从？军法论处！”周伯明也不示弱，接着说：“日本鬼够凶了吧！我们什么时候怕过？谁要不讲理，我们也不怕，奉陪就是了。”说完，举手敬了个礼，回头就走。杨幼敏追上来说：“你好好想想！”此时周伯明感到如果顶得太

僵，杨幼敏下令把他扣押起来就不好办了。于是，想缓和一下气氛，来个缓兵之计，麻痹一下杨幼敏；同时也想进一步摸清对方安排我们去集训的具体部署和意图，就停下来，回答说：“好！我想去集训的地点看看！”杨幼敏以为被他吓服了，高兴地连声说：“好！好！叫副官带你去看。”

下午，指挥所的副官带周伯明到计划安排新编大队集训的地方。原来他们想把我们骗到惠州西湖中的一个湖心亭去“集训”。这小岛仅有一间空庙，四面湖水茫茫，仅有一条狭长的小道通到岸边。只要有一挺机枪就完全可以把小岛封锁，岛上的部队就插翼难飞。这个地方用来缴械是再好不过的了。香翰屏一伙的狠毒用心昭然若揭了。周伯明立即巧妙地脱身回来报告情况。

一九四〇年初，反共高潮从北南来。香翰屏一伙在其软硬兼施的阴谋诡计一一破产之后，加上深圳、沙头角日军暂时他调，他们不需要我们抗击日军掩护他们了，于是就部署他的最后一着：打！全力纠集优势兵力，向我们实行军事围攻。

## 东 移 受 挫

对于国民党的这个阴谋，我们是有所预料，有所觉察的。对于如何对付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东江军委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开始，先后进行过多次慎重的研



究。大家一致认为：不管形势如何发展，我们一定要高举抗日的旗帜，必须把抗日武装斗争坚持下去。但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下简称顽军）真的打过来，我们应当怎样对付的问题，未能作出正确的决策。由于我们当时的经验很少，还没有很好掌握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思想，完全没有想到可以坚持在原来的地区和他们周旋，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只想到当时的具体形势是敌强我弱，硬打打不过他们。同时，又认为现在是国共合作的抗战期间，也不好闹磨擦，最好还是自己走。那么走到那里去呢？大家的意见最初不一致。有的人主张去罗浮山；有的人主张去海陆丰；也有的人提出到敌后东莞水乡地区。由于大多数同志不能正确地估计当时的形势，认为国民党变本加厉地搞磨擦，统一战线不可能坚持下去的了。发展下去，必然是第三次国内战争，全面打起来，到那时，就没有前线后方之分了。所以，大多数同志认为，往海陆丰转移较为有利。因为海陆丰在大革命时期是农民运动的中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革命老根据地，成立过苏维埃政权，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的部队都是往海陆丰撤退的。那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且我们为了执行党中央关于在东江和海陆丰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从地方党、部队和“东团”抽调张绮如、李乃纯、黄琴等一批干部，到惠阳县靠近海陆丰的多祝和高潭地区工作，在那里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大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时那个地

区山多地广，有回旋的空间，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国民党发动内战，我们就可以利用那里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有利的地形条件与敌人周旋，坚持长期斗争，求得生存和发展。由于这个问题事关重大，而又争论激烈，所以，东江军委决定向省委请示。在省委未答复之前，先按向海陆丰地区转移的方案部署工作。

一九四〇年一月，省委派组织部长李大林到惠阳来向东江军委传达党中央、南方局的指示，指出国民党正在掀起反共高潮，我们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凡在蒋管区暴露身份的人员，立即调离或撤退到游击区工作。

二月底，在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担任作战科中校科长兼游击基干大队和政治工作大队两个大队长的共产党员李一之和与他一起工作的共产党员张敬人，给我们送来确切的情报：国民党顽固派加紧部署，围攻坪山、乌石岩，妄图一举消灭我们部队。据此，东江军委和新编大队、第二大队的领导人梁广、梁鸿钧、曾生、王作尧、何与成等，于三月一日在惠阳坪山竹园村，由梁广主持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再次研究如何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军事围攻的问题，会议决定部队东移海陆丰，并作了具体部署。为了加强军事指挥，还决定由李振亚、邬强分别担任东江军委正副参谋长。

会后，立即紧张地进行东移的准备工作。我们新编大队整编为三个战斗中队和干部队、政工队。第一中队由彭沃任中队长，陈力辉任政治指导员；第二中队由叶华任中队长，

黄业任政治指导员；第三中队由周伯明兼任中队长，陈一民任政治指导员；翟信任干部队队长；蔡国梁兼任政工队队长。大队部下设医务所和修械所。全大队共五百多人，另留下七十多名伤病员和非战斗人员交地方党隐蔽，有数十名干部留下坚持地方工作。第二大队下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由阮海天任中队长，卢克敏任政治指导员；第三中队由卢仲夫任中队长，黎崇勋任政治指导员。

一九四〇年三月初，广东国民党当局纠集第一八六师凌育旺团，保安第八团两个营，汕头、东江两个地区的李坤、罗坤、梁桂平、袁华照四个支队和各地方大队号称三个师的兵力，发动对我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的围攻。与此同时，香翰屏大造反革命舆论，并派了农工民主党人杨朴如来坪山，仍企图说服和威胁我们到惠州去“集训”。杨朴如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了。香翰屏还不死心，又派丘琮来坪山找我们谈判，劝我们一定要接受“集训”，否则就打。这时游击指挥所属下的罗坤、梁桂平支队和惠阳、博罗大队共千余人，已从北面和东面向坪山推进。三月八日晚，正当我们抗日军民在坪山圩举行“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时，顽军已从龙岗、坑梓、淡水三个方向进逼，便衣队已接近坪山。九日晚，新编大队由东江军委负责人梁广、梁鸿钧亲自率领，在夜色的掩护下，顺利穿过敌人的包围圈，经石井、田心向东突围。

与此同时，香翰屏指挥顽军在第二大队驻地乌石岩周围增添兵力。保安第八团调到梅塘，袁华照支队进驻观澜，

对乌龙岩、龙华形成包围态势。三月八日晚，第二大队在王作尧、何与成同志的率领下，从乌石岩出发，利用夜幕掩护，在观澜圩旁穿过了封锁线，向淡水方向突围。

顽军发现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向东突围后，立即调动兵力，前堵后追。国民党广东当局和第四战区司令部急电各部顽军迅速进行侦察截击。第四战区保安司令章远飞亲赴海陆丰指挥。

我们新编大队突围后，部队缺乏行军经验，走得很慢，三月十日拂晓才在三间店穿过澳(头)淡(水)公路，于午间到达桔子壑宿营。十一日进到白云西面的大碧村，翌日拂晓前在白云以北通过平(山)稔(山)公路，下午我们走到吉隆圩以北约五公里处时，顽军罗坤支队赶来堵住我们东进的通道。这些未见日本人就闻风先逃的顽军，对付我们人民抗日武装倒是异常迅速果断。我们刚刚煮熟了晚饭，战斗就打响了。在李振亚同志的指挥下，第一中队和第二中队登上附近的高地展开迎击敌人，掩护大队部和其他部队向北转移。战斗进行到天黑，敌人被我们打退了。我们损失了几十人，另有几十人失掉联络。但是，大家的斗志很高涨。经过游击训练班训练的干部，在这次战斗中成了部队的骨干。

我们摆脱敌人之后，决定放弃经由布心东进的路线，改由向北翻越虎头山。经过一天的行军和战斗，指战员们没有吃上午饭和晚饭，费力地攀登陡峭的虎头山，于十三日到达南麓的南山庵吃饭休息。再经过两天爬山越岭的艰苦行军，

于十五日下午到达大安洞。为了迷惑敌人，我们派出第一中队沿梅陇方向前进，掩护大队部和其他中队直上埔仔洞。十八日，全大队经由吊贡到达惠阳、海丰两县交界的高潭地区。梁广同志到高潭后，去了香港，向省委和党中央报告部队的情况和请示今后的行动。

高潭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苏区，群众对我们很好。我们虽然已和派到该地区工作的黄琴同志联系上，但一时还未能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我们到达高潭的三天（二十一日），顽军第一八六师凌育旺团从多祝、新庵方向赶来，罗坤支队从南面进抵公平，李坤支队从陆丰方向进迫，对我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二十二日，我们撤离高潭，向北开到水口地区，北靠笃麻嶂一带山地，作好抗击敌人的准备。大队部和政工队驻大夫第村，第一中队在左翼驻柑树下村，干部队在右翼驻草塘背村，第三中队在正面驻河对岸的黄头坝村，第二中队在高潭西北附近进行游击活动，担任外围警戒。二十四日下午，周伯明同志与顽军谈判后返回黄头坝村，当时下着大雨，视野模糊，顽军沿河跟踪而上，偷袭我第三中队。该中队设在高地上的军士哨未能发现，顽军偷袭因而得逞，全中队除两个“小鬼”外，其余三十多人全部被俘。

顽军偷袭第三中队得手后，随即向我大队部驻地进攻。我们全部登山投入战斗，第一中队和干部队隔河英勇阻击，打退了顽军的进攻。顽军见用武力消灭不了我们，改采诱降手段。凌育旺团派了一个副团长过河来，指名要我下去谈

判。我和李振亚同志都不同意去谈，梁鸿钧同志决定要我去试一试。于是我在第一中队掩护下，下山去和那个副团长接谈。他要求我们不要走，要服从命令，要我们先将部队带到他们指定的地点，然后派代表具体商谈。我拒绝了他的要求，要他们先行撤兵再说。他见我不上当，就以武力消灭来恐吓我们。我和他吵了几句就返回山上。当晚，我们摆脱了顽军，向杨梅水地区转移，但第二中队与我们失去了联络，情况不明，我心中十分不安。为了暂避顽军，我们决定向陆丰县境开进，二十六日经中洞进抵碣石溪附近的山坳上隐蔽。

陆丰县境的新田、黄羌等地驻有顽军李坤支队。当时我们认为李坤有进步倾向，想借他的防区暂时隐蔽，在水口时就派了大队副官李燮邦等前去联系。李燮邦同志在返回途中，与顽军凌育旺团的部队相遇，被无理扣押。我们到达碣石溪山坳上后，开了一个领导干部会议，分析了形势，讨论了部队的行动方向。大家认为，在高潭地区，占绝对优势兵力的顽军在围追着我们，李坤看来也靠不住，东去陆丰隐蔽已没有可能。留在高潭地区，虽然高潭人民想方设法帮助我们，但我们仍未能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而没有地方党组织的帮助，部队就没有坚实的基础。我们的处境非常严峻。过去我听说过在海丰县境内的石山村有一个党支部，我建议把部队拉到石山村去，依靠当时的党组织在海丰坚持斗争。会议决定停止向陆丰县境前进，转往海丰县境。

我们部队在开进途中经朝面山时，又发现前头有顽军。我们在山上占据了有利地形，顽军在山下隘路行进，未发现我们。李振亚同志提出给顽军以突然一击，我没有同意。因为一打我们就完全暴露，就可能遭到优势敌人的包围，而招致重大损失，甚至全军覆没。顽军过后，我们利用夜暗的掩护，继续向石山村行进。

三月二十七日，我们到了石山村，找到了该村的党支部，不久就与海丰县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海丰县工委书记郑重同志派出党员来帮助我们开展工作。当地的人民群众热情欢迎我们，都说“红军回来了”，给我们带路，帮助我们采购物品。这时，第二中队副中队长陈其禄同志带了十几个战士回来。原来第二中队在听到水口方向发生战斗的枪声后，就向水口靠拢，第二天与顽军遭遇发生战斗后，退上鸡公髻寨山上隐蔽。这时，顽军押了第三中队的同志们也到了山下的丹竹坑村。第三中队的同志为了表示对顽军打内战的义愤和表达英勇不屈的精神，动情地唱起了抗日救亡歌曲。第二中队的同志不知道第三中队的同志已经被俘，听到歌声就下山来会合；下山后即与顽军遭遇，而被包围，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突围中，中队长叶华等同志英勇牺牲，政治指导员黄业等同志负伤，还有部分同志被顽军冲散，部队损失很大。为了尽量减少损失，我们派了邬强等同志到水口地区，寻找和收容负伤及失散的同志。

我们新编大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行军，多次战斗和不断

地疏散非战斗人员，部队减员很大，从出发时的五百余人减少到一百多人。四月上旬，在石山村附近把部队整编为一个长枪队、一个短枪队和政工队。长枪队六七十人，韩捷任队长，韩藻光任政治指导员；短枪队十五六人，彭沃任队长，翟信任副队长；政工队三四十人，蔡国梁任队长。梁鸿钧同志率领长枪队到可塘至汕尾之间活动；我和李振亚同志率领短枪队和政工队，以石山村为基地，在梅陇、公平一带活动。由于经济困难和斗争残酷，我们把女同志和非战斗人员暂时疏散，政工队员分散在石山村一带做群众工作。随后，梁鸿钧同志解散了长枪队，把武器交给海丰县工委掩藏，队员转移到汕尾对海的矿坑隐蔽，他则到香港去向东南特委汇报和请示。梁鸿钧同志走后，卢伟良同志来汇报情况，我要他赶快回去把长枪队重新组织起来，转移到海丰北部山区隐蔽活动。

为了解决经济困难，我们通过海丰县工委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同志和已到了香港的东江军委负责人梁广同志取得了联系，要求尽快给我们送来一笔经费，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不久，一笔经费送到了海丰县工委。县工委书记郑重同志派交通员来带我亲自去汕尾领款，并一起研究部队如何开展活动等问题。我由交通员带到汕尾郑重家里和他见面。郑重同志非常热情地接待我。开始安排我住在他的家里，不久又转移到我党安插在公平区公南乡国民党乡政府任乡长的共产党员钟娘永的家里隐蔽。钟娘永同



志是一九二七年入党的老党员，他对我在各方面都安排得很周到。

钟娘永是个好同志。他利用当乡长的合法身份作掩护，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四月间，他和梅陇的共产党员谢贵同志，将我们部队在水口被顽军袭击时冲散或受伤的同志约二十人，接回公平隐蔽和治伤。由于他及时送来顽军要兵分三路围攻我驻九龙和坑口部队的重要情报，使我们避免了一场大祸。由于叛徒告密，顽军中队长黄汉杰以“窝藏共匪”的罪名，把公南乡的全部保甲长二十多人逮捕。钟娘永同志为营救被捕人员，变卖了自己二亩多地的田产作为经费。不幸，解放后他竟由于曾任过国民党乡长这段历史，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劳改十年；释放后又长期被管制挨批斗，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党中央批示，才给他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落实了政策。

第二大队从乌石岩突围后，于三月十一日到达惠阳县沙坑附近的黄巢嶂，十四日渡淡水河向东前进。当天，部队到达白花南面七八公里一个小村宿营时，敌人围了上来。部队立即突围。十八日，在海丰埔仔洞附近阻击了尾随而来的顽军，甩掉了敌人。十九日到达莲花山，大队部和第一中队驻在庙里，第三中队驻在对面的一个山峰上。二十日晨，顽军袭击大队部驻地，以一个重机枪连的火力封锁庙门。部队英勇突围。第三中队与顽军激战后撤出战斗。

四月十八日清晨，第二大队转移到斜嶂山的黄沙坑宿

营，顽军一个营尾追而来，被阻击于山下。顽军见在战斗中未能消灭我部，就改用政治欺骗的手段约我谈判。由于我们的同志经验不足，对顽军仍有幻想，希望能通过谈判，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共赴国难。于是应约派人下山。但是顽军背信弃义，于四月十九日，扣押了我第二大队政训员何与成、中队长卢仲夫等干部战士十余人。何与成、卢仲夫、罗尧、罗振辉、叶镜源和我们大队被顽军扣押的李燮邦六位干部，被押到惠州后惨遭杀害。他们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表现了无产阶级战士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黄沙坑事件后，第二大队七十余人转移到大安洞的北坑进行整编，将武装人员三十余人组成四个班，到海丰县骆坑东面一个当年红军住过的山洞隐蔽，其余人员在骆坑、鹅埠、鲘门的海边渔村分散隐蔽。

五月中旬，顽军千余人继续在海陆丰及惠阳东部沿海地区频繁侦察搜索，但我们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掩护下，巧妙地分散隐蔽活动，使顽军找不到目标。到五月下旬，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宣布“曾、王匪部均被歼灭”，于是陆续撤兵。

香翰屏一伙在围攻我们两支部队的同时，于三月中旬对博罗县我党的外围抗日武装陈文博大队下毒手，包围了该大队，逮捕了该大队副大队长、中共博罗县委军事部长、博罗县国民党政府军事科长胡展光同志。胡展光被押送惠州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审讯时，痛斥国民党当局反共分裂、

破坏抗战的罪行，驳斥国民党当局污蔑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的无耻澜言，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最后壮烈牺牲。胡展光同志被捕后，该大队的中共党支部负责人龙生、梁政、肖光生，当机立断，带领一个排的队伍，冲出敌人重围，转移到增城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成为日后建立增(城)、从(化)、番(禺)人民抗日独立大队的基础。

## 重返惠东宝

我们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东移后几遭挫折，从七百多人的队伍减到一百多人，处在国民党顽军的围追之中，军事上完全陷于被动，弹药缺乏，给养不继，处境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内和党内都发生激烈的争论。我们开过不少会议，老是争持不下。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主张放下武器，暂时隐蔽，保存人员；二是主张继续留在海陆丰，坚持斗争；三是主张返回惠东宝前线敌后去。开始，拥护第二种意见，主张在海陆丰坚持斗争最多。第一种主张放下武器，暂时隐蔽的意见，遭到大多数人的坚决反对。大家认为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怎么能自动解散呢？第一种意见实行不得，而第二种意见，继续留在海陆丰坚持斗争，又碰到重重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越来越证明我们撤到海陆丰，队伍无法发展，经济给养、武器补充都难于解决，困难极大。所以，第三种主张返回惠东宝前线敌后的意见逐渐被

越来越多的同志所接受。越来越多的同志认识到回到原来的地方，我们可以高举抗日旗帜，打日本鬼子，有广大群众支援，靠近香港容易得到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和取得各方面的帮助。

一九四〇年五月下旬，由海丰县工委书记郑重安排，我和王作尧同志在汕尾他的家里见了面。

自从三月九日突围东移之后，我们两支部队一直失去了联系。四月下旬以来，顽军搜索不到我们的踪迹，就四处放出风声说：“曾生、王作尧的叛军已经全部剿灭，曾生、王作尧被打死了。”这些一时真假难辨的传闻，使我一直惦念着王作尧同志和第二大队的安危。现在两人会面，真是悲喜交集，感慨万千。我们互相叙述东移以来的情况，诉说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暴行，反思东移以来我们损兵折将的教训，共商今后大计。当谈到由于我们领导决策的失误，使许多同志被捕和牺牲，造成了部队的严重损失时，我们都感到万分内疚和无限悲痛。

此时，我不禁想起了一年半以前自己感慨激昂，向廖承志同志请缨回乡抗日的情况，更是惭愧。我决心：要坚决依靠党，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全体指战员，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把部队带领好，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正在这关键时刻，六月初，梁鸿钧同志从香港带来了由廖承志同志转来的党中央书记处五月八日的电报。电报中指出：（一）目前全国尚是拖的局面，现不易整个投降分裂，

也不易好转。国民党当局尚在保持抗日面目，同时进行反共准备投降，但地方性的突变随时可能。在此局势下我们必须大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同时不怕摩擦，才能生存发展。

(二)曾、王两部仍应回到东、宝、惠地区，在日本侵略军与国民党军之间，在政治与人民优良条件下，大胆坚持抗日与不怕打摩擦仗。曾、王两部决不可在我后方停留。不向敌人进攻，向我后方行动的政策，在政治上是绝对错误的，军事上也必归失败。国民党会把我们当土匪剿灭，很少发展可能。如东去潮梅，人地生疏，顽固派仍可以以扰其抗日后方为借口打我，并将牵动当地灰色武装的暴露。电报还具体指示如何做好回防前的工作。党中央的指示，使我们在困境中获得了正确的斗争方向，它有如万丈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五·八”指示，梁鸿钧、王作尧和我一起研究，确定了部队回惠东宝地区的具体办法。决定两支部队先在海丰县的鲒门集中，再找个隐蔽的地方作短暂的休整，然后由梁鸿钧、王作尧、周伯明和邬强同志负责带回惠东宝敌后地区。我立即去香港办三件事：一是向梁广同志汇报我们的决定，请求速批准我们的行动计划；二是筹款，购买一批被服、药品等物品，送到海丰供部队急用，另再采购一批军需品，由我直接带回惠阳县的小三洲与回师的部队会合；三是动员和组织一部分疏散到香港的同志回来，参加重新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为了部队的行

军安全和保守秘密，由我路经坪山去香港的沿途，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布置好部队的行军路线和隐蔽的宿营点；在部队出发前，再由梁鸿钧、卢伟良同志带领设营小组先行，作具体安排。

会后，我从汕尾回到石山村，向部队传达党中央的“五·八”指示和我们这次会议的决定，并对部队的工作做了安排。为了迷惑和牵制顽军，我们决定把短枪队留在公平、石山一带活动。六月中旬，我和梁鸿钧同志率领长枪队六十多人，到达鲛门西北四公里的四马岭村，与王作尧同志率领的第二大队的三十多人会师。

经过三个多月艰苦的行军作战，加上缺医少药和给养不继，同志们都面黄肌瘦，衣衫破烂，不少同志患疟疾、烂脚和夜盲症。但是我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并没有被敌人消灭，现在两支部队胜利会师了，同志们的情绪很高涨。

在四马岭住了几天，部队转移到大安洞的北坑隐蔽整训和医治伤病员。大安洞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部队在北坑搭茅棚驻扎，日间进行军事训练，夜间下山走十多公里路背粮食，并积极做好返回惠东宝敌后的准备工作。

六月下旬，我在袁庚等同志的掩护下，带着负伤的黄业同志和王作尧同志派来负责尔后给部队带路的何通同志，从大安洞出发，经热水洞、狗眠地，穿过平山和稔山之间的公路到达黄塘，找到了平山中心区委的同志，向他们布置了

工作，又嘱咐何通返回大安洞去准备在部队返回时带路。然后，我们几个人继续向坪山前进。

我在回坪山的路上，沿途与淡水和坪山中心区委的同志取得联系，向他们通报了部队即将重返前线敌后的决定，要求他们及早准备，配合梁鸿钧、卢伟良同志，做好协助部队重返前线敌后的工作。当我们到达小梅沙准备上船往香港时，碰上了国民党军麻玉标的部队在检查旅客，我们立即分散行动。我只身到了上洞，在一位地方党同志夫妇的帮助下，在上洞乘渔船到达香港。

七月下旬，王作尧等同志率领部队开始西返，沿我勘定的路线到达黄塘，然后到淡水东边的万年坑休整。王作尧同志派了彭沃等两位同志到香港来和我联系。我和他们带了一批物资回到坪山附近的碧岭，通过地方党组织送给部队应急。随后我又返回香港继续筹集款项和物资。八月中旬，部队在地方党协助下顺利回到了坪山西南面的小山村小三洲，等待新任务。

李振亚同志在梁鸿钧同志带回党中央的“五·八”指示以后，就到了香港。我在香港期间见到了他，一起交换了我们部队东移的经验教训。省委已决定把他调到海南岛，去加强那里的军事指挥。对于他的走，我依依不舍，我们在东江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非常需要象他这样一位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员。但是省委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在海南岛坚持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也非常需要他。

在海南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坚持斗争保存下来的琼崖红军，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日本侵略军在海岛登陆，琼崖独立队立即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成为琼崖人民抗战的中流砥柱，鼓舞了琼崖人民的抗战热忱。这支抗日武装在党中央、广东省委和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得到琼崖人民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很快由三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三月扩编为琼崖独立总队，下辖三个大队，冯白驹同志任总队长，马白山、符振中同志任总队附。到一九四〇年底，创建了琼(山)文(昌)和美合(琼山、澄迈、临高边)抗日根据地。和我们东江地区一样，琼崖人民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对，从一九三九年冬开始，反共行动不断升级，琼崖独立总队的琼文和美合抗日根据地也遭到了顽军的进攻。李振亚同志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调到海南岛去的。李振亚同志到海南岛后，对海南岛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部队及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后来成为琼崖独立纵队第一副司令员。一九四七年九月，在前线指挥作战中，光荣牺牲。我永远怀念他！

在香港期间，对于这次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下，我们采取东移的行动，我想了很多。我们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在东移后的三个多月的斗争中，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很多同志牺牲或被俘，一些动摇分子逃跑了，部队的战斗骨干只剩下一百多人。但是我们并没有被消灭。我们的主要领导



成员和骨干仍然保存，部队经过这一段艰苦斗争的锻炼更加坚强了。除了这一百多个战斗骨干外，我们还有一大批政工、民运等人员疏散隐蔽在各地。我们今后继续坚持斗争仍然有很多宝贵的“本钱”。然而也必须老实地看到，我们毕竟是一支从零开始新建的部队。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战，既要坚持团结，又有尖锐的矛盾和激烈斗争的复杂情况下，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我们都缺乏经验，显得很幼稚。在军事上，对于顽军的进攻，我们还不善于给以有效的自卫还击，也不善于把战斗骨干组织起来分散坚持斗争。在政治上，一方面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认为全面内战将会爆发；另一方面一些同志对顽军仍存有幻想，以致上了假“谈判”的当，使部队遭到不应有的损失。改正错误才能更快前进。我想应该很好总结这次东移的经验教训，作为我们今后斗争的铭鉴。

## 第六章

# 重建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

### 上下坪会议

对于我们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生存和发展，党中央和广东省委都十分重视。根据党中央的“五·八”指示，广东省委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召开了扩大会议，确定今后广东党组织的工作重点放在敌后和前线，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决定将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和惠（阳）、东（莞）、宝（安）党组织移交东江特委领导，委派省委委员、东江特委书记林平兼任曾生、王作尧两部的政治委员。在香港，梁广同志向我传达了广东省委的这个决定，我衷心拥护。

林平同志是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赤卫队，一九三〇年参加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地方赤卫大队大队长，红军独立第三

团副团长、团长，闽南红军第二支队支队长，中共厦门临时工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从福建调到广东工作，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军事部长。一九三八年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任省委的军事委员会书记，现在是东江特委书记。他调到我们的部队来，我十分高兴。由他这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老同志来任我们的政治委员，给我们把握斗争的航向，我对今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更充满信心。

林平同志于一九四〇年八月中旬先到东移回来的部队，会见了梁鸿钧、王作尧等同志，然后到香港来。我在香港见到了他。他对我说，部队要找一个地方隐蔽下来，进行休整，然后召开部队的干部会议，根据党中央的“五·八”指示和广东省委的决定，很好总结东移的经验教训，研究和确定今后的斗争方针和工作计划。这正符合我的想法，我完全赞成。不久，我和他还有其他同志带着一批军需物品，一起离开香港，回到小三洲村，和梁鸿钧、王作尧等同志及部队会合。

为了给部队选择适当的休整地方，王作尧同志特地找来了他们东移时留下来坚持工作的曾鸿文。这是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同志。他是宝安县布吉乡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农民运动的骨干；以后，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劫富济贫的“绿林豪杰”。在宝安和香港新界、九龙地区颇有威望。抗战开始后，他激于民族大义，参加了我们的抗日队伍，

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宝安县龙华、布吉一带的每条道路、每个山头 and 村庄都很熟识，是宝安的活地图。根据他的意见和在他的带领下，九月上旬，我们部队向西越过广九铁路，到了宝安县的雪竹径村。这一带比较隐蔽和安全，部队就在这里休整。部队干部会议选定在这里南侧的鸡公头山畔的上下坪村召开。

鸡公头山海拔四百四十五公尺，属宝安县布吉乡，南距深圳只有十五公里。东面有一座巍峨的大山耸峙，那就是高达九百多公尺的梧桐山。广九铁路自北向南从这两山之间的谷地贯穿而过。布吉、深圳、南头一带都是日军的据点，是建有伪政权的沦陷区。在北面，顽军控制着樟木头、塘厦、观澜等地方。上下坪是鸡公头山上的两条小村子，一共只有二十多户人家，都是耕种山田的贫苦农民。这里地处日军和顽军之间，因为山穷水恶，一贫如洗，日、顽双方都没有来过，正好作为我们召开干部会议的好地方。

我们派出短枪队侦察敌情，在各条路口放了便衣哨，加强警戒，封锁消息。

我们这次干部会议的主旨，就是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五·八”指示，确定东江抗日游击队今后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会议在九月中旬举行，开了四五天，到会的有林平、梁鸿钧、曾生、王作尧、邬强、卢伟良、周伯明、蔡国梁、阮海天、黄高阳等同志。

林平同志主持会议，首先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党中央的

“五·八”指示,深入总结前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在会上,同志们坦率地发表了许多意见,倾吐了自己的心里话。经过认真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我们部队东移海陆丰的错误和挫折是十分严重的,创巨痛深,所得的教训是永不能忘的。早在一九三九年秋天,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以后,东南特委、东江军委和我们大队领导人都作了思想准备,考虑到广东反共顽固派向我们进攻时怎么办?也曾提出过就地坚持或转移到铁路以西等等方案,但我们多数领导人都主张东移海陆丰。这个决策之所以错误,是对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关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方针,学习不够,认识不深,和对形势估计错误分不开的。我们以为顽固派前来进攻挑起内战,结果就是“国共分裂”、“全面内战”。为了应付这样的局面,就必须选择一个宜于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根据地。大家觉得广九铁路以西(下简称路西)地方狭窄,水陆交通方便,日伪军控制着莞太、宝太公路沿线,顽军控制着广九铁路中段和东宝边地区,不适于我们建立长久的根据地。对海陆丰,大家认为最理想:一是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区,地方党和群众的基础都好;二是山区,地域广阔,有回旋余地。这些条件,都有利于长期坚持武装斗争。

作为一个大队的领导人、东江军委的成员,对于这次错误行动,我应该负很大的责任。我是积极赞成东移海陆丰这个方案的。检讨起来,我们的看法是片面的,国民党顽固派

无疑是要闹摩擦,但是,鉴于我党我军强大的力量,正值日军侵华气焰嚣张之际,国际国内条件使他们还不敢全面分裂。不管承认与否,民族矛盾仍然是当前首要的矛盾。我们把局部的事件看成全局的形势,产生了突围“东移”的错误,离开了敌后战场,丢了抗日的旗帜,从而处处陷于被动,造成了严重损失,幸得党中央明确指示,及时指出前进的方向,挽救了我们这支部队。

过去我也时常对同志们讲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但认识是肤浅的。直到经历这次错误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这个道理,只有在思想上对长期性复杂性有足够准备,才能做到胜不骄败不馁。接受了这个深刻的教训,我们对回师惠东宝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加深了认识,坚定了信心。

会议着重讨论了今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讨论了如何坚持统一战线以及部队的组织建制等重大问题。确定了这样的原则:

第一、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在惠东宝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人民抗日武装,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是我们部队的基本方针。

第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对顽军的进攻,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决不轻言退让,不怕打摩擦仗,要敢于击破顽军

的进攻。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

林平同志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部队抛弃国民党原先给的“新编大队”“第二大队”的番号，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整编为两个大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第三大队由我任大队长，邬强任副大队长，卢伟良任政训员；第五大队由王作尧任大队长，周伯明任副大队长，蔡国梁任政训员。东江特委书记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治委员，梁鸿钧负责两个大队的军事指挥。从此，我们部队在组织上完全摆脱了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受国民党的约束，不受限制地扩大自己的力量，做到独立自主。这样，我们部队更加旗帜鲜明地以人民军队的面目出现在广东人民的面前。

会议还决定，第三大队配备七十多人开赴东莞活动，建设以大岭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第五大队配备三十多人留在宝安（宝安县分广九路以西、以东两部分，这里指的路西部分。因当时的县城南头就在这边，故通宝安就是指这一边。下同），建设以阳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部队的领导机关设在东莞，林平、梁鸿钧随第三大队行动。

为什么要选择大岭山和阳台山为中心来建立抗日根据地呢？这是研究和分析了当时这个地区日、伪、顽军的形势而决定的。当时日军因为兵力不足，在东江地区的占领区非常狭小，只是在增城至石龙，沿莞石公路至东莞城，再沿莞太公路、宝太公路至南头、深圳、沙头角一线驻军。而广九铁

路从横沥至平湖,以及铁路以东(下简称路东)地区为顽军的占领区。由于顽军害怕日军,不敢西靠莞太和宝太公路。因而北起石龙,南止南头,南北长约六十公里;东至广九铁路,西至莞太、宝太公路,东西宽约十五公里;总面积约九百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是日伪军和顽军据点的中间地区。这一地区虽然没有丛山峻岭,但有一系列丘陵山地和丛林,可供小部队利用和回旋;这一地区内,我党在东莞和宝安的党组织比较坚强,群众有革命传统,为建立根据地提供了保证;这一地区南靠香港,便于继续得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的支援。在当时来说,它是建立根据地比较理想的地区,我们就从这里开始重建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

上下坪会议在部队东移受挫重返敌后的重要时刻召开,意义十分重大。它从战略上纠正了东移的错误,使我们部队领导干部提高了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关于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方针的自觉性。统一了干部的思想,增强了团结,提高了斗争胜利的信心。会议决定以“大岭山和阳台山为中心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为我们部队今后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已证明上下坪会议是我们东江纵队斗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当时我们白天在上下坪村开会,夜晚在山上露宿。入秋细雨绵绵,同志们有的撑把雨伞,有的向老乡借顶笠帽挡雨,蜷着身子缩成一团,却睡得很香。天明醒来,邬强同志笑



着说：“看啊，一个个都当团长了。我们有一百个团长，千军万马啦！”山头上响起了一阵响亮的笑声。我好久也没有这样开怀地笑过了。是的，眼前我们只剩下这一百多人，可是，经过东移的锻炼考验，素质大大提高了，都是坚强的骨干。最可贵的是大家保持着革命的锐气和胜利的信心。依靠这么多的好同志，我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一定能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担负起坚持抗战的任务。

## 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一九四〇年十月初，林平和梁鸿钧同志率领第三大队先到大岭山区，驻在大环村。我去香港结束了筹款和联络工作，随后也赶回部队。为了不过早暴露部队的行动，我对外暂时化名王彬。

大岭山区在东莞县西南部，广九铁路以西，东莞城以南。莞太公路从山区的西面边缘绕过，宝太公路在山区西南面，莞樟公路自西北边缘向东行。东南面与宝安的阳台山遥遥相对（相距约十二公里）。这个山区有大岭山、莲花山、水濂山、摊尸山（亦称红山）、莲花山等许多山岭，地势险要。我们活动的地区方圆一百三十多平方公里，八个乡，十多万人口。这个地区人民刻苦勤劳，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一九三八年冬，王作尧等同志带领东莞县模范壮丁队来到这里活动，打下了群众基础。一九三九年，建立了党的大岭山区委，

黄树楷(黄达三)、张英同志先后任书记。许多乡村都建立了抗日自卫队。这次我们部队开回来,东莞县委发动群众支援部队,大岭山区群众喜笑颜开,都说“老模回来了!”(东莞的人民都亲切地称呼模范壮丁队为“老模”,历久不衰)在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下,部队很快就安定下来。

为了统一领导东莞地区的武装斗争和地方工作,在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成立了军政委员会,成员有林平、梁鸿钧和我。在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开始了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建设和发展武装力量。经过前一段的斗争,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要建设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必须要建设一支坚强的骨干部队,同时还必须有广大的群众武装相配合。东移回来的七十多名勇士,是我们建设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坚强骨干,我从香港又动员了几十个同志回来,大岭山区委也动员了几十个青年参加部队,这样我们一共有了一百多人。十月下旬,我们着手组建部队,在大队下面编有两个中队和一个短枪队。第一中队代号“虎门队”,彭沃任中队长,陈胜(后韩藻光)任政治指导员;第二中队代号“大华队”,陈其禄(后符东)任中队长,陈明(后陈一民)任政治指导员;短枪队翟信任队长。各中队五六十人,有的战士还没有枪。但我坚信,在斗争中我们一定能够发展充实起来。

大岭山区的一些乡村在抗战初期就有自卫队,曾经对日本侵略者奋勇作战。我们部队回来后,又派干部去组织和

整训，各村都成立了抗日自卫队。在这个基础上，八个乡都成立了乡的联防自卫队，一共有五百多人。这些联防自卫队是脱离生产的，组织较严密，战斗力也较强。大沙乡的联防自卫队还配有轻重机枪。各乡联防自卫队组成的时候，在大王岭举行了成立大会，一队队自卫队全副武装整队入场接受检阅，一时轰动了东江一带，声势很大，竟传说大岭山有自卫队五千人之多。

当时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很高。我们每次和日军作战后，都有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前来参军；大岭山地方党一些党员坚决要求跟随部队战斗和工作；各乡村抗日自卫队更是源源不断地输送优秀队员到部队来；部队东移时留下的和途中受伤、失散的人员也千方百计地寻到大岭山来归队。

东移时被顽军逮捕，没有暴露干部身份的陈一民等同志出狱后也回来了；回家去养好伤的政治指导员黄业同志也回来了，还带回来十多位新同志。负责采购的女同志王雅宜多次从东莞城和厚街带人回来参加部队，一共带来了三十二人。

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们第三大队又建立了第三中队，代号“西征队”。中队长是由东莞县委调来的，曾在延安学习过的谢阳光同志担任，政治指导员由陈明同志担任。我们抓紧空隙训练部队，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部队的素质提高得很快。

林平、梁鸿钧同志和我都认为培训干部是部队建设的

大事，在部队迅速发展的时候，更为必要。于是，在大岭山办起了军事训练班，由符东任班主任兼军事教官，陈明任政治指导员。第三、第五大队都选送班、排级干部前来培训。

我们进入大岭山半年多来，第三大队在与日伪军和顽军的激烈战斗中发展壮大，从七十多人发展到三百多人，加上脱产的抗日自卫队五百多人，我们已经有了了一支八九百人的武装力量，这是建立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最基本的条件。

用战斗来打开局面。我们刚进到大岭山的时候，能不能在这块土地上站得住脚？能不能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来建设大岭山这块抗日根据地？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看我们第三大队能不能战斗，敢不敢打那些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

当时，在东莞城、厚街、太平、霄边等地，驻有日军长濑大队和伪军共三千多人，控制着莞太、宝太两条交通线；在水乡地区，还有伪军刘发如、李潮两部共两千多人；而在广九铁路中段樟木头、塘厦、平湖等据点，则驻扎着顽军保安第八团、徐东来支队，大岭山区的金桔岭和附近的大朗也有他们的据点，经常各有一个大队驻守。

我们第三大队开始时只有一百多人，一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显然处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形势之中。

按照上下坪会议确定的方针，我们坚决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我们人数少武器差，就坚持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小仗，打巧仗，多打袭击、伏击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避免打硬仗，

保存和扩大我们的力量。用对敌战斗来打开局面，建立和发展大岭山抗日根据地。

我们回到大岭山一个月，正在紧张地训练部队和开展民运工作的时候，十一月初，驻扎在莞太公路厚街、桥头的日本侵略军，调集了一个加强中队和一个炮兵分队约二百余人，开进大岭山区，向黄潭村进攻。

前几天，我们部队刚由东北边的大环村转移到黄潭村。这天早晨，有个农民打扮的人跑来对我们的哨兵报信说：“有十来个日本鬼子进了大径村，又来抢粮捉鸡了。”这大径村在黄潭村东北面，相距只有七八百米。为了保卫群众利益，梁鸿钧同志命令短枪队向大径出击。

短枪队穿过晨曦薄雾，迅速通过稻田开阔地，进入了大径村头，但遇到的不是“十来个日本鬼子”，而是遭到了猛烈的火力射击，敌人人数很多，而且有炮，短枪队被压缩在村口。我们立即命令“虎门队”掩护短枪队撤回，敌人尾随向黄潭村进攻，“大华队”从翼侧投入战斗阻击敌人。

面对着优势的敌人，同志们打得很英勇，激战达四个小时。我们考虑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已经取得一些战果，不宜恋战，便下令部队交替掩护撤退，同时保护群众向大环方向安全转移。后来敌人进入黄潭村，烧屋抢掠，遭到我们阻击之后，抬着伤亡人员撤走了。

事后才查明，起初向哨兵报告假情况的那个人原来是个汉奸。

这次战斗，日军伤亡了三十多人，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小队长陈定安，短枪队员李大红等五位同志光荣牺牲了，几位中队级干部翟信、鲁锋、陈其禄等负了伤。

这是我们部队重返东、宝以后打的第一仗。在军事上，我们不占上风，但政治上影响却很大，轰动了东莞一带。群众兴奋地议论：“老模回来了！”“打败了日本鬼子！”“共产党的部队抗日，保护老百姓。”我们人数少装备差，敢于打退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军，而国民党的大部队装备优良，遇到日军却仓惶溃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此，大岭山区的群众更加信赖我们，积极主动支援部队，送情报、救伤员、担茶送饭。远近的青壮年踊跃参军，大岭山根据地的局面就这样打开了。

黄潭第一仗打出了声势后，我们部队在抗日自卫队配合下，主动向莞太、宝太公路沿线出击，连续打了许多小仗，袭击霄边、锦厦、厚街、桥头、赤岭、篁村等日伪军的据点，狙击日军的军车，破坏敌人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惩罚汉奸，缴获不少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正当我们奋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国民党顽军不打日本人，却向我们进攻来了。一九四一年初，驻在东边大朗的顽军陈禄大队的一个中队，窜入大岭山骚扰和抢掠。这个陈禄原是土匪，后来被国民党收编，成为一支地方杂牌军，反共也是很坚决的。我们部队隐蔽在大环村左右两侧一带山地，待他们进来时，出其不意，突然出击，打得他们慌作

一团，消灭了他一部分，其余的狼狈溃退了。

三月初，顽军保安第八团一个营，偷偷开到大岭山，企图以优势兵力歼灭连平乡的抗日自卫队。原以为自卫队好对付，却不料战斗打响之后，连平乡各村的抗日自卫队自动集合迎战，髻岭、大公岭等几个抗日自卫队迅速赶到。南边一队，北边一队，西边一队，打得顽军无法向前。我们驻在大环的部队立即出动。机枪一响，自卫队员们知道“三大队”来了，斗志更加旺盛，打得越发起劲。军民配合击退了顽军保安第八团的进攻。

我们用战斗保护了群众利益，群众看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面目。于是，大岭山的群众都把那些不抗日专打内战祸害人民的顽军叫做“河呵鸡”，说他们“会吃不会啼”。从此顽军是“河呵鸡”这个绰号，很快传遍东江各地。而人民群众对我们则更加亲密了。

建党建政。要建设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必须加强党组织的建设和政权建设。林平同志对此很重视，他要我多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一向认为只有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革命才能开花结果。我们部队自创建以来，每到一处，必先向群众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这是建设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基础。东移前，我们在惠宝边的淡水、坪山地区，作过的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尝试，就是部队、地方党组织和“惠青”工作团，在群众中进行了大量工作的基础上搞起来的。我吸取了这个经验，认识到今天要在大岭山区进行建党建政工

作,首先必须要有一支坚强的民运工作队,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为此,我们大队成立了民运部。从地方党和“东团”调来一批干部,加强民运工作力量,部长就是原“东团”负责人叶锋同志。在民运部的领导下,一批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能掌握党的政策,作风艰苦朴素的男女干部,深入到大岭山区的各个乡村,进行细致的群众工作。他们和地方党密切配合,宣传抗日,宣传我党和我军的政策和主张,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广泛建立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建党建政。工作做得踏踏实实,卓有成效。

我们配合东莞县委改组和加强了大岭山区委,黄庄平同志任书记,在连平、大沙等乡建立起党支部。在各个乡村发展了一些地方党员,象大王岭的蔡焯,大雁塘的吴石娇、宋天生,牛牯岭的李长娘、大公岭的邝池秀等,都是坚决革命的好同志。有了大岭山坚强的党组织,我们建立根据地才有了依靠。

经过几个月艰苦的工作,在连平、大沙、大塘、同沙、治平、怀德、杨西和霄边八个乡建立起抗日兄弟会、姐妹会、夜校、识字班、农会等。通过这些组织,把绝大多数的群众都发动起来,团结起来了。这八个乡先后建立起民主政权,建立了政权机构——乡办事处。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全区性的政权机构——联乡办事处。按照党中央提出的“三三制”,民主政权的成员中共党员占三分之一。刘荫任联乡办事处主任。



我们很注意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不少开明士绅和上层人士共同抗日，民主政权也吸收了一些开明士绅参加。如连平的吴更稳，上山门的陈秋盛，榕树界的邓棠、邓茂父子，水浸朗的黎玉、黎堂、黎八福等。他们见到我们坚持抗战，注意团结，都愿意和我们合作，共同抗日，有的参加政权工作，有的在部队有困难的时候拿出钱和粮食来支援。邬强同志出面与吴更稳交朋友，吴更稳受到教育和鼓励，表示要坚决抗日。从此他始终和我们站在一起，担任连平乡联防自卫队队长，率领连平乡抗日自卫中队配合我们作战，和我们同甘苦，共患难。后来他牺牲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监狱中，他的儿子也被顽固派杀害。

办报纸、抓教育。我认为一支独立活动的部队，应该创造条件，出版自己的报纸。我找杜襟南同志商量。他原来是广东青年抗日先锋总队的宣传部长，一向从事党的宣传工作。我和他研究后确定了下面几点：第一、报纸是党和军队的舆论工具，它的主要任务是向根据地的军民宣传我军的宗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第二、报纸要有广泛的读者对象，不但要发动根据地广大人民参加抗日和支持部队，还要用以争取上层人士、国民党官兵、各行各业人士甚至“绿林好汉”；第三、报纸还可以作为地方党的宣传品，既可作为党员的教材，也可作为群众的读物。一九四一年一月，由杜襟南主持办起一个油印小报，我提议名叫《大家团结》，先是十六开，登载从新闻电台收来的电讯以及我们撰写的短文，后来

又改为八开。报纸出版以后，果然受到部队和党政部门的欢迎。那时，我们连油印机都没有，就自己动手用钉木屐的胶皮做刷子来印刷，摸索出了一套游击队的油印办法来。刻蜡纸的同志用手指头大小的角尺界线，飞快地写出整版的仿宋字，加上套红的手书体报头，黑体字的标题，比铅印的逊色不了多少。我们对油印工作同志提出一个口号：“刻一个字就是向敌人射出一颗子弹！”真是不谋而合，第五大队那边，王作尧同志也亲自抓新闻出版工作，三月份，他与曾经在马来亚共产党办过油印小报的李征等几位同志一起，办起了一张油印的《新百姓》报，八开四版，每周一期，除供指战员阅读以外，还向各乡村群众发行，宝安一带订阅这张报纸的也很多。

七月，我们把《大家团结》和《新百姓》两报合并起来，集中力量，组成了《新百姓》出版社，由沙克任副社长，杨奇任编辑，李征为驻宝安特派员。除了定期出版《新百姓》报以外，还编印了许多宣传提纲、部队的教材、识字课本、文化课本、标语、传单，翻印了一些文件、公告等，供部队和地方使用。

由于战争的影响，许多学校都停办了，这是我们根据地的一个大问题，也是群众的利益所在。我们的民运队员一进村，立即抓教育工作，白天办日学，晚上办夜校，青少年人人学文化，村村有歌声，到处是蓬勃向上的气氛。

七月间，我们在大岭山创办了一所学校，名叫“中山书

院”，由林耀鹜任院长，谭家驹、陈柏昌任副院长，调集了一些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干部任教员。校址设在牛牯岭天主教堂内。这个书院招收本地的中学生及港九、广州的青年入学，仿照陕北公学的办法，学习政治、文化课及时事政策等。学员经短期学习结业后，分配到部队或地方工作。办了一期，培养了几十名干部，可惜只办到九月份，由于大岭山战斗激烈动荡，未能继续办下去。

不久，谭天度、黄日东同志由粤北省委机关调来部队。谭天度同志是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带来省委的指示：在敌后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下简称文委）。文委由杜襟南、谭天度、黄日东三人组成，杜襟南任书记。文委成立后，办报纸、抓教育的工作，就由他们主管。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战斗和深入的群众工作，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了。有了它作为依托，我们第三大队就将会不断发展壮大。回想东移到海陆丰时，由于没有根据地，我们到处遭到顽军追击而损兵折将的情景，我更加体会到党中央“五·八”指示的英明正确。

挺进增城。一九四一年二月，东江特委为了进一步开展广州外围的抗日游击战争，从第三、第五大队抽调二十多人，由我们大队政训员卢伟良负责，组成小分队挺进增城敌后。

增城与广州接壤，在中共增城中心县委领导下，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成立了增（城）、从（化）、番（禺）边沦陷区工作

委员会，由郭大同任书记，刘志远任副书记，何洪川任武装部长兼增城抗日游击队基干队队长。卢伟良等到达后，发展部队，与基干队会合。四月，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增从番大队，卢伟良任大队长兼政委，郭大同、肖光生任副大队长。活动地区西至广州郊区的罗岗，北至从化的太平场一带，南至广九铁路北段。打击日伪军，破坏敌人交通运输。并以增城油麻山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我们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成犄角之势。

### 阳台山抗日根据地艰苦创建

上下坪会议后，王作尧等同志率领第五大队，留在宝安创建以阳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一九四〇年十月，中共东江特委为了统一和加强该根据地军政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宝安县工作委员会，王作尧任书记、刘汝琛任副书记。

阳台山区位于我们大岭山区的南面，宝安县的西部，东靠广九铁路，西临宝太公路至珠江口，南接宝深（南头至深圳）公路。第五大队的同志们所面对的敌人是强大的，日伪军三千多人驻在宝太公路沿线的松岗、沙井、西乡、南头和深圳、沙头角、布吉等地，顽军一千多人驻在广九铁路沿线的林村、塘厦、石鼓、平湖和观澜等地，对阳台山区形成三面夹击之势。因此，在阳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



据地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第五大队当时名为一个大队，实际上只有一个小队的兵力。他们为了打开局面，首先开展了锄奸肃特活动，在望天湖、乌石岩等地镇压了一批罪大极恶的汉奸、特务，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在宝安阳台山地区，我军弱小面对强大的敌人，摆在第五大队面前的战斗是很难进行的。搞得不好，不但消灭不了敌人，还可能被敌人吃掉。他们不能采取我们在黄潭打日军，在大环和连平打顽军的打法，只能十分灵活地运用，抓住战机打敌人的小分队；在敌人进攻时，主要和敌人兜圈子，打麻雀战，在战斗中保存自己。一九四一年初春，第五大队副大队长周伯明同志带领短枪队在上下坪一带活动。一天，十几个日本兵上山来捉鸡抢猪，我们的短枪队眼看上下坪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就坚决向敌人出击，打伤并俘虏了为首的日本兵，缴获了一支“三八”式步枪和一批弹药。其余的敌人仓皇逃回布吉。驻布吉的日军碰了这个钉子，不甘心失败，又出动一百多人，闯到上下坪来报复。第五大队预料及时，已经组织群众撤离了村子，短枪队隐蔽在山谷树丛之中，灵巧地向敌人开枪，神出鬼没，打得敌人无法应付，日军放火烧了几间房子之后，又败阵而去。

第五大队在上下坪捉到了日本鬼子，打跑了日军的消息传出去后，宝安县的人民群众情振奋，都知道抗日游击队又回来了。

顽军嗅觉也很灵。迅速调集了一千多人，向龙华、布吉地区和民治一带扑来，第五大队利用当地群山重叠，沟壑纵横的有利地形，打麻雀战，并转到日军背后去活动，使顽军象盲人骑瞎马，晕头转向，毫无所获，远远望着日军占领区，不敢接近，只好收兵。

半个月后，第五大队接到情报：一是顽军再次纠集部队，准备于近日内向游击队的驻地雪竹径一带进攻；二是清溪苦草洞有顽军的一座武器仓库，守军一个排，戒备松懈。第五大队的领导干部经过研究，订出了周密的作战行动计划。

等了几天，顽军果然气势汹汹地向雪竹径进攻来了。当顽军还未迫近雪竹径之时，第五大队已经轻装出发。王作尧同志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跳出了顽军的包围圈，转到大坪、白花洞一带敌人的背后活动。另以一支小分队，配上杨美村的抗日自卫队，一共五十多人，由周伯明同志率领，飞兵远道奔袭顽军在苦草洞的武器库。他们在地方党的配合下，迅速解决了战斗，缴获了轻机枪、重机枪和几十支步枪以及一箱箱的子弹。东移回来后，部队正缺少武器弹药，现在得到这批武器弹药，第五大队就如虎添翼了。

第五大队在艰苦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苦草洞战斗后，建立了第一个中队，代号“石龙队”，中队长阮海天，政治指导员卢克敏。接着，在清溪、塘沥地方党的大力协助下，动员了近百名青年参军，又组建了第二个中队，代号“铁路

队”，中队长沈鸿光，政治指导员黎崇勋。为了进一步发展部队，和协助惠阳地方党重建惠宝边以坪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同阳台山抗日根据地互相呼应。第五大队副大队长周伯明带领了二十多人的小分队，到惠宝边进行游击活动，在惠阳差池坳伏击前来进犯的顽军，缴获轻机枪一挺；在老大坑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在马峦头击溃了国民党杂牌部队梁永年部。他们在坪山一带，与惠阳县委领导的游击队会合，收容东移失散回乡的同志归队，动员老区青年参军，很快地发展到了五六十人，回到宝安成立了第三个中队，代号“惠阳队”，中队长陈力辉，政治指导员杨凡。到一九四一年五月，第五大队已从三十多人发展到三百多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大队了。

第五大队在发展主力部队的同时，也很注意地方武装的建设。他们配合宝安县工委，组建了有六百多人枪的八个抗日自卫中队，并成立了抗日自卫总队，由曾鸿文同志任总指挥，刘宣同志任政训员。这样，我党在阳台山区也有了一支八九百人的抗日武装，它和大岭山区的抗日武装，象两把尖刀插在东宝地区的日本侵略军的胸膛上。

中共宝安县工委在赤岭头、弓村、杨美、雪竹径、山厦、平湖等地都建立了党支部。不久，又成立了龙华区委，赵学、杨德元任正副书记，领导龙华、布吉、乌石岩一带党的工作。

第五大队也成立了民运队，先后由陈坤、卢克敏、刘宣负责，深入各个乡村，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活



动,动员青年参军,组织抗日自卫队,发展党员,建立民主政权。布吉、民治、龙华和乌石岩四个乡,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一乡办事处。在各乡办事处的基础上,又成立了联乡办事处,陈坤任主任。

在根据地建设中,第五大队也认真注意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团结开明士绅和上层人士,积极推动他们参加抗战。如龙华弓村老归侨、老国民党员卓凤康,担任了龙华乡乡长,积极为我军收集情报,筹集物资。被国民党顽固派察觉后,他即参加了抗日自卫队,不久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壮烈牺牲。

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在第五大队和中共宝安县工委的领导下,蓬勃地向前发展。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力部队发展壮大,地方抗日自卫队组织起来了,民主政权也建立了,到处呈现团结抗日,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 大败日伪军进攻

我们在斗争中逐渐站稳脚跟,各项工作迅速开展。在中共东江特委的统一领导下,大岭山和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已初具规模,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连续取得打击敌人的胜利,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壮大,声威大振,引起了日伪顽军的震动。他们沆瀣一气,相互勾结,从一九四一年五月开始,频繁地、反复地向我大岭山和阳台山抗日根据地进攻和

“扫荡”。我们两个大队互相配合，艰苦地进行着反“扫荡”和反击敌人进攻的作战。

杨西乡三败伪军刘发如。杨西乡(包括牛头、大雁圪、榕树界等村)和治平乡(包括黄潭、大径、横岗等村)在大岭山区的西北部,原是沦陷区,日军撤离后成为缓冲区,是东莞水乡大地主、伪军头目刘发如的势力范围,他利用亲戚关系控制着这个地区,并视为禁脔,不容他人染指。我们在这个地区活动,自然引起了刘发如和当地反动势力的恐惧和仇恨。杨西乡反动地主张玉衡、刘德,飞鹅岭的反动地主李积仓等,看到日军顽军都向我们进攻,他们错误地估计形势,撕掉了“抗日”的伪装,秘密召开所谓“十乡耆老会议”,企图拉起反动武装“联防队”,与刘发如和顽军勾结配合,公开进行反共活动,一时反共空气甚嚣尘上。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刘发如伪军二百多人,偷偷进犯杨西乡。我们有一个民运组驻在杨西。因为这里接近敌占区,开始时为了便于工作和安全,民运队员不公开身份,在乡村小学教书,以教师身份开展工作。他们发展党员,组织民兵,建立农抗会等团体,工作很有成绩。不久,杨西、治平也成立了抗日政权。这次,来偷袭的刘发如伪军,在当地反动分子的指引下,包围了民运组住地山门村的陈秋盛炮楼。民运队员颜剑虹冲出炮楼的时候负伤被捕,组长陈现(又名陈特)固守在炮楼里,终被伪军攻入,也落入敌人手中。陈、颜两位同志对革命忠贞,威武不屈,被伪军杀害分

尸。另一位女队员李荷满在敌人进村时到河边掩蔽，她抬头观察敌情，被伪军发现开枪击中头部，当场牺牲。伪军和当地反革命分子一共杀害了我们五位工作人员，野蛮残酷，令人发指。

这时候，我们领导机关住在百花洞村，听说伪军来袭，林平同志率领“虎门队”赶到山门村、飞鹅岭一线投入战斗。我带领重机枪排占领山门村旁边的制高点，以重机枪的猛烈火力掩护“虎门队”从正面进攻。邬强同志率领“大华队”从侧面迂回，抗日自卫队占据了附近几个山头，配合我们作战。伪军前后遭到我军打击，不敢久战，丢下十多具尸体和伤兵，掉头逃窜，我们的部队随后猛追，一直追到东莞城下，才收兵回防。这次战斗杀伤伪军一部，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五月二十八日，刘发如伪军又出动二百多人窜到大岭山区。所到之处，抢劫奸淫，群众恨之入骨。我们已作好了布置，在连平方向与敌展开战斗，伪军不支败退，我部趁势猛打猛追。这次战斗，共毙伤俘敌二十多人，缴枪二十多支。又给了汉奸刘发如以沉重的打击。

两次打退了刘发如伪军，保护了大岭山区人民的利益，群众很高兴。这时正值端午节，大岭山中心区大王岭到百花洞一带的群众挑了许多粽子来慰问。战士们饱吃美味的应节粽子，个个都笑逐颜开，意气风发。

六月一日，顽军黄文光大队也乘机来犯。他们出动二百

多人，八九挺机枪，向大塘村一带猛扑过来，妄图袭击大王岭我们领导机关。我们部队在牛牯岭一带迅速抢占了有利地形，布置好力量。黄文光本以为伪军刘发如正在进犯大岭山，他们一来就会对我们形成夹击之势。打响之后，才知道自己陷于孤军深入的境地，于是掉头撤出牛牯岭向后逃窜。

接着，六月六日，刘发如第三次进犯杨西，照样被我们打得狼狈逃窜，从此再也不敢到大岭山区来了。

我们部队十四天打了四次仗，粉碎了伪军和顽军的夹击。之后，我和邬强同志到杨西参加几千人的群众大会，对罪魁祸首两面派张玉衡，公审枪决。这个张玉衡是个汉奸地主，敌伪统治杨西时期是伪乡长。我们来后，他使用两面派伎俩，当上民主政权的乡长。后来，他同伪军刘发如和顽军密切勾结，刘发如进攻杨西时，又当了伪乡长，欺压群众。对他处决，是罪有应得，群众拍手称快。

第三次击退刘发如的进攻后，我们派了刘荫、张英、黄华等同志到杨西处理善后，恢复政权和各项工作。我们又派黄琴同志去警告也有两面派行为的地主刘德。这个刘德请求饶命，表示知错，我们只罚了他一些钱和粮食，给予宽大处理。平定了杨西的暴乱，镇压了反动势力，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了。

百花洞大败日本侵略军。我们刚刚在杨西击败了刘发如伪军三次进攻和顽军的夹击，粉碎了反动势力的捣乱之后，日本侵略军驻东莞城的长濠大队四百余人，还有一些伪

军,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分两路进攻我大岭山中心区。其主力从东莞城向南经上下山门、髻岭,插入百花洞;另一路从莞太公路的桥头向东经横岗、光头仔、伯公坳、大环而来,打算在拂晓时合击百花洞。敌人错误判断我大队主力和领导机关在百花洞,妄图一举予以消灭,摧毁我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我们大队和抗日自卫队密切配合,群众积极支援,打了个大胜仗。这就是闻名广东的百花洞战斗。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日,我同民运部长叶锋以及高云波、张英等同志在大岭山中心区百花洞村召开民运工作会议,当晚就在这个村庄住宿。当时林平和梁鸿钧同志带着领导机关住在大王岭村,我们的副大队长邬强带领“西征队”保卫领导机关。“虎门队”住在大沙乡的长圳村,负责对北面的日伪军和金桔岭方向的顽军警戒。“大华队”住在大环村,负责向莞太公路方向的日伪军警戒。

十日晚上,我们得到地方党送来的情报,说东莞城、厚街等地的日伪进行集结,可能要向我区进攻,因此提高了警惕。十一日将近拂晓时,我派了一位民运队员到大环村去联络“大华队”。该队员去后没有几分钟即返回报告大环方向发现日军,我和叶锋等同志立即率领抗日自卫队登上百花洞西南的小山头,并派人到大王岭去通知林平等同志。我们刚占领了阵地,敌人就出现在我们北面的小路上,我即命令抗日自卫队向敌人射击。跟随我的警卫员、当过红军的陈石甫同志,拿过了自卫队员的一支步枪也参加战斗。敌人原来

以为我们还在百花洞村中睡大觉，没有想到未进村就遭到我们的打击，一部分敌军慌忙就地卧倒，利用田埂进行抵抗，掩护另一部分敌军抢占北面山地。

枪声就是命令。住在长圳村的“虎门队”听到枪声后，在中队长彭沃率领下主动出击，迅速开到百花洞东侧的大公岭村，占领了村侧山头阵地。这时，从北面经上下山门、髻岭开来的日军，一部分占领了百花洞西北面的山地，一部分沿着田埂向百花洞左侧的荔枝园前进，中间一部分有一个军官骑在马上指挥。彭沃同志即下令瞄准那个骑马的军官射击，轻机枪和步枪以齐射的猛烈火力射向敌人，几个敌人连同那个军官和马都倒了下去。指挥官突然被我击倒，日军队形顿时大乱。惊惶中，一部分忙向荔枝园闯过去，另一部分卧倒在田沟里进行抵抗。

这时候，大公岭、髻岭、连平、大沙等地的抗日自卫队已闻风出动，占领了附近的山头，用猛烈的机枪、步枪火力压制敌人，配合作战。“虎门队”在大公岭抗日自卫队的火力掩护下，杨仰仁小队长带领他的第一小队，冲到荔枝园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一个日军军官举起马刀向我们的班长吴提祥劈来，吴提祥手急眼快，闪身躲过，一枪把那个军官打倒。我们的“小鬼班”冲过去，缴获了敌军官的战刀和手枪，其余敌人退向荔枝园北端的小高地。“虎门队”和大公岭抗日自卫队占领了荔枝园和百花洞村北面的一角，凭借有利地形，用火把小高地上的日军压制在棺材坑和茅草丛中，动弹

不得。

邬强同志率领“西征队”从大王岭赶来和我会合。我对邬强说：“这次日本鬼子来势汹汹，看来目标是我们领导机关，要打一场大仗了，你赶快指挥‘西征队’和‘大华队’配合‘虎门队’作战”。于是“西征队”在大环以南，“大华队”在大环以北山地，占领要点，在抗日自卫队的配合下，打击大环东北面山地上的敌人，堵截敌人西面退路。这时，驻在附近的第五大队的“铁路队”和“石龙队”以及其他各乡的抗日自卫队也纷纷赶来参加战斗。从髻岭、连平、大环到百花洞、大公岭一带起伏的山头上，全是抗日军民，不断地向被包围的敌人射击。

我和邬强同志在百花洞村西南的山岗上指挥战斗。我们的干部战士对日军作战，英勇果敢，越打越有劲。敌人发动了几次冲锋，企图会合突围，都被我军民打退了。

各乡赶来参战的抗日自卫队打得更欢。他们的子弹比我们部队多，打起来也不吝惜。大公岭的抗日自卫中队在党员邝池秀带领下，主动配合“虎门队”冲锋；髻岭方向的抗日自卫队冲上髻岭与畔山中间的三角山；连平方向的抗日自卫队占领了附近的鲤鱼山，堵住了敌人北面的退路。周围村庄的群众听说“包围了日本鬼子”，兴高采烈，像看大戏似地跑拢来，扛着尖头扁担、木棒或锄头前来助威。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响彻了田野山间。

下午，敌人疯狂地向我军民阵地开枪开炮，打掷弹筒，

又发动几次冲锋,都被我军民打了下去。敌人两次施放烟幕弹,企图掩护逃跑,反而暴露了目标,被我盯住开枪。敌人发现退路已被我军民切断,逃脱不了,只好就地在荔枝园北端的小高地及以北的山地挖掘堑壕,固守待援。敌人被包围了一天,仓惶焦急,放出军鸽向驻石龙的联队部求援。军鸽飞经大沙时,就被大沙的抗日自卫队打了下来,求援的报告和附图都被我们缴获了。

“虎门队”政治指导员韩藻光和副中队长祁和学会几句日语,趁着苍茫暮色,带了一个班摸近敌人,大声喊话:“日军士兵,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敌军循声打枪,韩藻光和祁和都负了伤。同志们气愤地向敌人猛烈射击,并组织小分队整夜轮流袭击,打得敌人胆颤心惊。

第二天上午,敌人出动飞机空投粮食弹药。我们的战士和抗日自卫队员高高兴兴地把拾到的战利品,交公处理。日军曾试图向连平方向突围,也被我抗日自卫队打退了。

到了这天下午,日军从广州、石龙出动步兵、骑兵一千多人前来救援,配有野炮和多种武器,在乱轰一阵之后,被围的敌人才在炮火和烟幕弹的掩护下夺路脱逃。真是来时像吃人的老虎,去时如同丧家之犬。有一小股敌人被冲散,跑到大径村,被我抗日自卫队包围在稻田里,打死了三名。

这次战斗持续了两天。被我击毙的那个骑马的军官就是驻东莞城的日军大队长长濑。我们共毙伤敌人五六十人和战马数匹,缴获长短枪十多支和一批弹药辎重。这一仗,



给了东莞的日军沉重的打击。事后，日军哀叹：“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

我们部队在这次战斗中伤亡了七位同志，班长张兴同志牺牲，他是泰国归侨，平时很沉着，作战很勇敢。

战斗后，我们在连平圩举行了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军民祝捷大会，几千人参加，公开展览了缴获的战利品。

百花洞战斗，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我们的指战员英勇顽强，敢打敢拚；抗日自卫队积极参战，不怕强敌；人民群众热情支援，使入侵之敌如同陷入汪洋大海之中，伤亡惨重，败阵而逃。对于我们来说，这一仗，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是重返敌后的一次巨大胜利，大大鼓舞了东江地区军民的抗日斗志，起到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阳台山区胜利反“扫荡”。东莞的日军在百花洞打了败仗后，暂时不敢到大岭山区来了。但宝安的日军，则从六月底至八月中旬，连续多次“扫荡”我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第五大队在抗日自卫队配合下艰苦地进行反“扫荡”作战。

六月三十日至七月十一日，驻南头、深圳的日军四次出动，企图在望天湖、龙华地区合围消灭我军。日军所到之处，大肆抢掠，放火烧房，并用野炮把龙华圩炸成一片瓦砾。我第五大队和抗日自卫队在游松坳、龙塘等地进行伏击和阻击，打死打伤敌军十多人和战马一匹，连续打破了日军的“扫荡”。

从八月十五日起，驻南头、深圳和布吉的日军又倾巢出

动,连续四天先后使用了一千五百多兵力,向我阳台山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的乌石岩、龙华地区,发动了“清乡扫荡”。我第五大队和抗日自卫队奋勇作战,在水黄田、板田、牛地埔等地与日军展开激战,共毙伤敌六七十人,其中有中佐军官一名,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战后,阳台山区军民在龙华乡的牛地埔开了祝捷大会。他们这次反“扫荡”的胜利,给宝安和东江抗日军民以巨大鼓舞,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在炮火中巍然屹立。

## 大岭山区反顽斗争

抗击顽军的进攻。百花洞战斗的胜利,对日伪顽军都是很大的震动,使他们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七八月的大岭山区,我们大队和抗日自卫队紧张地进行训练,书院、训练班书声朗朗,儿童团的歌声悠扬。抗日根据地充满了生机蓬勃的新气象。

这时候,国内外形势却极其动荡。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了进攻,日本帝国主义正密锣紧鼓地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国民党顽固派则在全国蓄意制造摩擦,发动了皖南事变,袭击新四军,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广东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也在处心积虑地策划阴谋活动,妄图消灭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八月份,我们正在大岭山区休整,不时以少量部队出击

宝太、莞太公路沿线的日伪军。林平同志从香港给我们来信，邀梁鸿钧同志和我去九龙新界“商谈要事”。早在六月份百花洞战斗的时候，林平同志已经患病，后来我们送他去香港治疗。接信后，梁鸿钧同志和我研究，安排他留我去。我和杜襟南还有警卫员陈石甫经过宝安第五大队驻地，然后由交通员带着通过深圳河日军封锁线，到达元朗，见到了林平。他告诉我：“廖承志同志接到从曲江来的一份重要情报，广东国民党当局已经决定，近期内要集中兵力进攻东莞，‘围剿’我们的部队。廖承志同志交代我们不要和顽军硬拚，不要拚光了部队的力量，要同它软磨。”林平同志叫我回去同梁鸿钧同志研究如何对付顽军的进攻。

我们部队驻香港办事处准备好了七八担军需物资，我们扮作商人，雇人挑了“货”，回到宝安。我和王作尧等同志交谈了一些情况，他们派了短枪队护送我们回到大岭山区，时已八月下旬了。

梁鸿钧、邬强、陈志强，叶锋和我开了个会（第三大队政训员卢伟良调到增城后，由陈志强同志负责大队的政治工作）。我传达了廖承志同志说的重要情报和指示，以及林平的意见。会议初步研究了准备反击顽军进攻的问题，大家认为首先要加强情报工作，通过地方党与各个情报站加强联系，尤其要密切注意塘厦顽军徐东来支队的动向；要加紧进行部队和抗日自卫队的训练，提高战斗力；要筹粮筹款，使部队有比较充足的供给；要加强保卫锄奸工作，要严防敌特

和奸细的活动,等等。同志们从各方面提出了意见,采取了措施。我们对反顽斗争的准备不能说不够,抗敌自卫的决心不能说不足。但事后检查,缺憾在于硬拚的劲头很足,而软磨的准备却很不够,更没有作“打不赢就走”的细致安排。

果然,到了九月,顽军向我们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了。顽军这次进攻,先向宝安下手。九月初,顽军徐东来支队,进犯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第五大队和抗日自卫队奋勇进行自卫反击。我们大队配合第五大队作战,牵制敌人,主动出击驻大朗的顽军陈禄大队,由邬强同志率领“虎门队”和“大华队”,采取突然袭击的打法,一直冲进顽军主力中队住的祠堂,“大华队”政治指导员陈一民冲锋时负了伤。我们歼灭了顽军的主力中队,三个小队长向我们投诚,缴获重机枪一挺、步枪几十支。这是我东江抗日游击队第一次全歼敌人一个连的战例。同志们抬着缴获的重机枪和其他战利品,押着俘虏,唱起得胜之歌,返回大岭山根据地。

转眼到了九月中旬,我们在一次工作会议上决定,举行大岭山区军民纪念“九·一八”十周年大会,宣传抗日,动员根据地军民反击顽军进攻,由我们大队民运部长叶锋、联乡办事处主任刘荫、区委书记黄庄平负责筹备和主持。十八日上午,在连平圩开了纪念大会,区、乡负责人出席,有五千多群众参加。各个乡的抗日自卫中队全副武装开进会场。联乡办事处主任刘荫代表政府讲话,号召全区军民紧密团结起来,保卫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大

会最后由我们检阅了抗日自卫队。我在台上看着一队队的抗日自卫队列队行进，动作整齐，威武雄壮，心情十分激动。

纪念“九·一八”大会开过后，地方党送来情报，顽军保安第八团和徐东来支队有向大岭山区进攻的模样。我们立即在党政军干部中动员进行反顽斗争，由报社起草和印发大量反顽斗争的标语、传单，揭露顽军不打日本侵略军，专打自己人的罪恶行为，号召全区人民团结战斗，制止内战。

九月二十一日清晨，从东南面靠近宝安的西牛陂方向传来了枪声，我立即派通讯员到大塘传达命令，通知《新百姓》报社立即转移到百花洞去。命令“西征队”从大塘转移到大王岭待命。顽军通过西牛陂，进入了大塘。“西征队”从大塘转移到大王岭途中要通过一段稻田开阔地，顽军已占领了大塘村外高地，以猛烈的机枪火力向我射击。“虎门队”立即用两挺轻机枪的猛烈火力回击敌人，掩护兄弟中队转移。

顽军占据大塘以后，三次组织力量试图进攻大王岭，都被“虎门队”和“西征队”合力击退。

下午，梁鸿钧同志命令“虎门队”迂回牛牯岭，攻击大塘顽军，“大华队”在瓮窑方向掩护，“西征队”从大王岭方向牵制敌人。顽军非常狡猾，固守不出，在村里抢掠群众的谷米油糖，杀鸡宰猪，待到黄昏，慌忙撤退，钻到金桔岭据点去过夜。

战斗结束，我们查明来攻的是顽军黄文光大队，是从宝安观澜调来的。翌日，报社印出了击退顽军进攻的号外传

单。我们分析，顽军这次进攻，没有出动主力，可能是试探性质，大战还在后头。

果然，就在中秋节的前一天，十月四日，顽军向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了。其保安第八团以及徐东来支队的刘光、杨参化和黄文光三个大队、一个炮连，共一千五百余人，由徐东来指挥，仍以黄文光大队为先头部队，进占大塘，又洗劫了一番。

顽军逮捕了我们派驻大塘办学的教育干部李淑桓同志，严刑逼供，以死威胁。李淑桓同志指着敌人痛斥道：“你们才怕死，畏敌如虎，听到鬼子来就逃跑。我是不怕死的，怕死就不来打游击了！”敌人凶性大发，当夜把她枪杀在村外。李淑桓同志牺牲时，已年近半百。她和七个子女都从香港回来参加了我们的抗日部队。她本人是在部队东移回来十分艰苦的时候来到大岭山区，坚决要求参加工作的。她生前未加入共产党，但在我们心目中，她是一位共产主义的女英雄。

第二天，中秋节，顽军分三路从大塘、连平和大公岭，向大王岭进攻。我们三个中队摆在大王岭到大环一线的山上，“虎门队”在大王岭后山阻击敌人后，退守更鼓楼山，警卫领导机关，掩护群众撤往大岭山上，“西征队”和“大华队”在南北两头箝制西路顽军。敌人从瓮窑村攻来，到了河边，被“虎门队”杀得纷纷倒下，无法向前。战斗到下午，群众已经转移到山上，“虎门队”留下第一小队坚守更鼓楼山，掩护第二、

第三小队转移。小队长杨仰仁指挥队员们打退了顽军几次冲锋,杀伤冲过来的几批敌人,正当第二、第三小队顺利撤出的时候,杨仰仁同志胸部中弹倒下了。接着,文化教员颜金榜腹部也负了伤,王秋声、陈广志、陈荣三位同志当场牺牲。我们命令“虎门队”派部队回去掩护第一小队撤出。杨仰仁、颜金榜两位同志抬回来,都因流血过多抢救不及而牺牲了。这两位烈士都是海外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却死在顽固派的枪下,怎能不令人悲愤填膺!

转出外线作战。连续三天,我们大队部、三个中队和连平乡抗日自卫中队都摆在大岭山的东北麓,阻击顽军的进攻。后勤部门、报社等也在山上的妈庙集中,全部露宿山头。我带领部队下山,绕道黄潭,因寻找不到适当的战机,只补充了粮食,又回到山上。

是应该冷静考虑的时候了。顽军猖狂进攻,我们奋勇迎战,阻击敌人,这种顽强勇敢的精神是可贵的。但是,面前的敌人数倍于我们,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在内线和顽军拼消耗,是我们所不取的。廖承志同志的指示非常正确,对,不要硬拼,要同它软磨。梁鸿钧同志和我以及邬强、陈志强、叶锋等几个领导人研究,一致决定,改用小部队和抗日自卫队在大岭山区牵制顽军,坚持内线作战,而主力则转出外线,到宝安和第五大队会合,集中兵力打击顽军的后方。于是由邬强和陈志强率领“大华队”留在大岭山区坚持;梁鸿钧同志和我率领“虎门队”、“西征队”和短枪队转到宝安寻找战机

袭击敌人，以解除大岭山的压力；杜襟南和谭天度、黄日东等一批干部到敌后隐蔽。

入夜，梁鸿钧同志和我率队下山。两天两夜行军，第三天拂晓前到达布吉乡的岗头村，找到了王作尧同志，然后一起研究共同向顽军主动出击的问题。

第五大队曾派人侦察过广九铁路石鼓车站顽军张林大队的情况，这个大队有两个中队，各守一个炮楼。我们考虑，由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各派一个中队共同去攻打。

十月中旬的一天夜里，一弯下弦月挂在天边。梁鸿钧、我和王作尧在石鼓以西的小山上指挥战斗。部队迅速接近敌人，原来确定两个主攻的突击队同时打响，突袭进去。但实际上很难办到。预定时间一到，“惠阳队”首先发起突然袭击，迅速解决了战斗，缴到轻机枪一挺，一部分守敌向铁路方向逃跑，在追歼中又缴了一挺轻机枪，俘虏了几十人，缴了三十多支步枪。而“西征队”在“惠阳队”打响之后才突击，这时守敌有了警觉，已突不进去，临时采用火攻，又因燃料不足，火烧不旺，攻击无效，只好撤退。这一仗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对顽军的威胁作用不够大，真是一件憾事。但总的来说，还算打了个胜仗，歼灭了顽军一个中队，拔除了顽军在广九铁路的一个据点，便利了我们铁路东西两侧的交通。

这以后，我们找不到袭击驻宝安顽军的战机，未能连续主动地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从外线去打破顽军对大岭山



区进攻的计划未能实现。

寻找不着战机，部队这么多人集中在一处，也很不利。我和梁鸿钧同志商量后，把“虎门队”调到路东坪山地区去整训，在惠宝边开展活动。之后，我又和梁鸿钧、王作尧同志开会，部署部队今后的活动。大家认为两个大队不应局限在宝安，应该恢复和扩大原来“新编大队”活动的惠宝边地区，使之与阳台山和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互相呼应。这既利于发展我们的力量，又便于各方互相支援，扩大回旋施展的余地。按照会议的决定，梁鸿钧同志带着电台和“西征队”、短枪队留在宝安，在黄田、固戍一带活动，配合第五大队行动。我带“虎门队”到惠宝边地区，恢复和发展以坪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对于策应在大岭山区坚持斗争的部队的任务，由梁鸿钧同志组织在宝安的部队实施。会后，我和叶锋同志率“西征队”一部开赴惠宝边，和“虎门队”在田心会合。这时日军占领着淡水，并不时到田心来抢掠。为了安全，我和叶锋同志及惠阳县委书记黄宇同志带着部队向石桥坑转移。不久，由叶锋同志带领“西征队”的一部返回宝安与梁鸿钧同志会合。

我在宝安的时候，就患了恶性疟疾，在到惠宝边的路上，发作得很厉害，连续高烧，全身浮肿，只好和叶锋同志带着卫生员和警卫员几个人在群众的帮助下隐蔽在布吉沙梨园，部队也在附近隐蔽。第二天一早，布吉的日军来骚扰，我们即转移到山中隐蔽，这时我仍在发高烧。坚持到晚上，日

军退走，我们才下山进入村中。村中一位老中医热心给我看病。我吃过药后，觉得好点又带领部队登程赶路，心里十分感激群众对我们的帮助和爱护。晚上行军，深秋夜静，月朗星稀，走出了一身汗，反而觉得神清气爽。忽然一阵橘子的香味，扑鼻而来，我正在诧异，前面两个小战士却吵起架来了，我上前一看，一个扭着另一个，批评他不该偷吃群众的橘子。我顿时生起气来，拉住那个违反纪律的战士，叫他跟我一起走，边走边批评他。我说：“保护群众利益还是损害群众利益，是人民军队和反动军队的区别。你现在是抗日战士，难道不知道我们部队的性质吗？”一个橘子为什么引起我那么多的话？是小题大作吗？不是。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处处爱护我们，我们更要时时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大岭山区军民坚持斗争。我们从大岭山区转移出来之后，企图在外线行动来打破顽军对大岭山区进攻的计划未能实现，对于坚持在那里进行艰苦斗争的同志们，我一直很惦记。那时，顽军已在大岭山区占领了东面连平、大沙、同沙、大塘等乡。反动、恐怖、黑暗代替了民主、进步、光明。顽军天天出动“搜剿”，捕杀游击队员、政治干部、地方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被杀害的有六七十人，被烧毁的房屋五百多间，被掠夺的耕牛二三百头，其他财物无数。连平和大岭山区西面的治平、杨西乡的民主政权被顽军破坏殆尽。当地一些反动地主、反革命两面派，如大径的李少华等纷纷出头，

拉起反动武装联防队，恢复反动的“保甲制度”，人民群众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次反共顽固派疯狂“围剿”中，出现了一宗惨绝人寰的血案，我们称之为“绒旗墩事件”。十月十日，联乡办事处和中山书院的负责干部刘荫、谭家驹、陈柏昌、黄坚等七位同志离开连平乡向厚街方向撤退，由联乡办事处的邓某带路，殊不知这个姓邓的却是混入民主政权的奸细，他把刘荫等带到治平乡绒旗墩他的家乡，村里的反动豪绅假意盛情接待，在吃晚饭时，预先埋伏的反动武装包围上来，七位同志全部被捕。反动分子将他们捆绑了手脚，有的被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沉到山坑“神仙水”深潭去，有的则被活埋在山洞里。反动分子又包围了我们隐蔽在绒旗墩的医务人员和伤病员，十多位同志在同敌人搏斗之后，也被敌人活埋杀害。

然而，大岭山区的军民没有被敌人的残暴所吓倒，仍然在坚持战斗。大岭山区委转移到虎门，继续领导大岭山区的工作和斗争。邬强和陈志强同志率领的“大华队”，分散为几个小分队，在大岭山区西南面的红山一带搭草寮住宿，深入莞太、宝太公路两侧的敌占区打游击。袭击日伪据点和来往军车，并出击小股分散的顽军，牢牢地控制着大岭山以西地区。做地方工作的党员暴露了的转移了，没有暴露的继续隐蔽下来坚持斗争。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更在妈山妈庙的石洞里隐蔽了二十多天，没有停止过进行情报工作。百花洞一位

十几岁的女孩子每天上山割草，捎了一份饭菜给他吃。

十一月下旬，进攻大岭山区的顽军大部撤走，只留下刘光大队驻在金桔岭。这时，林平同志已在香港治好了病回到宝安，听了邬强同志汇报的情况后，他和梁鸿钧同志决定：由邬强、叶锋率领第五大队的“石龙队”、“惠阳队”和第三大队的“西征队”到大岭山区去，在“大华队”的配合下，集中力量打击当地反动势力，以改变大岭山区的形势。

十一月下旬，部队汇集到了大岭山区。首先攻打驻在大石板村的反动联防队，敌人据守在炮楼里，我们没有攻坚器材，攻不进去，只好撤出战斗。接着，又在夜间突然袭击飞鹅岭李积仓的反动联防队，但李积仓已闻风带着联防队溜跑了。部队往回撤到张加山时，受到顽军刘光大队的袭击，邬强沉着指挥部队奋起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给予部分杀伤。但我们也受了一些损失，“西征队”中队长谢阳光、“惠阳队”副政治指导员何通等同志负了伤。部队转移到大王岭后，集中三个中队的兵力，准备去消灭连平的反动联防队，由于奸细告密，没有打成。顽军徐东来支队和反动联防队在拂晓包围了大王岭，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惠阳队”第一小队在小队长苏福率领下，奋勇抢占了大王岭后山的制高点，把敌人压下山去，打破了敌人的包围，使部队转危为安。但苏福同志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英勇牺牲。

连续几次作战，虽未达到消灭反动联防队的目的，但也杀伤了部分敌人，打击了反动势力，振奋了大岭山区抗日军

民的斗志。十二月上旬，叶锋同志率领第五大队的两个中队返回宝安，邬强同志率领第三大队的“大华队”和“西征队”继续在大岭山区坚持斗争。

我回到惠宝边后，住在石桥坑养病休息，大岭山一年斗争的情景历历在目。这一年，应该说是在艰苦的斗争中求得发展的一年。这一年，我们重建了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部队从一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在大岭山区，我们多次胜利地反击了日伪军的进攻，特别是百花洞战斗的胜利，更是威名远扬。对于顽军，我们敢于打磨擦仗。我们在大朗、石鼓等地的自卫反击战中，成连地歼灭了顽军。在顽军集中优势兵力大规模进攻大岭山区时，开始我们没有很好执行廖承志同志关于“软磨”的指示，没有贯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方针，受到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我以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大岭山区惨遭顽固派杀害的地方党的同志，和群众中的抗日积极分子，以及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指战员们。但是我们没有失败。第三大队的主力保存了下来，暂时转移到外线作战，留在大岭山的部队仍在坚持战斗。我坚信，只要我们坚决遵照党中央“五·八”指示和上下坪会议的精神，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不仅能恢复大岭山抗日根据地，而且定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 第七章

# 挺进港九和秘密大营救

### 日军攻占香港九龙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初，我回到惠宝边，刚要着手进行组建部队和恢复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由于抗日战争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又不得不放下这个工作，去迎接新的斗争任务。

就在我回到惠宝边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阴谋日益显露，太平洋上浓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而在广东，日军第三十六师团正在沿广九铁路南段以及惠宝沿海一带集结，观其态势，毫无疑问是要进攻香港。十一月下旬，我安排了惠宝边的工作，即赶回在宝安径上村的领导机关，和林平、梁鸿钧、王作尧等同志开了个紧急会议，分析形势。大家建议林平同志立即去香港向上级报告和请示。林平同志到香港后，向廖承志同志报告了日军的新动向。他很快就给我们来信，要我们作好应变的准备，一旦战事发

生，立即派部队进入港九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又说部队应即向九龙新界靠拢，以便接应在香港的同志转移。

面临日军的进攻，香港总督杨慕琦托澳大利亚藉的英国记者贝特兰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找廖承志同志。贝特兰曾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到延安访问过毛泽东主席。他转达了港英当局想和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会晤，讨论协同保卫港九问题的意愿。翌日，廖承志、乔冠华和夏衍同志和代表港督的辅政司负责人以及居间人贝特兰在香港大酒店三楼举行了会谈。我方表示：东江抗日游击队可以协同驻港英军保卫港九，但英方须负责供应必要的武器弹药，并开放民主，成立各民主党派联合办事处，武装港九人民，共同保卫香港。港英辅政司表示回去向港督报告，尽可能满足我方的要求。但当我们部队派周伯明等同志和驻香港的英军司令会谈具体协议时，英方提出许多不合理的条件，如要派军官到我军监督使用武器，和我军不能进入九龙新界等。这表明英方缺乏共同抗日，保卫香港的诚意。他们的不合理要求被我方拒绝，谈判不了了之。

十二月八日早上，深圳河边炮声隆隆，日本侵略军“南支派遣军”以第三十六师团为主力的一万五千多人，在海、空军配合下，分两路越过深圳河，沿广九铁路南段和青山道推进，突袭新界和九龙半岛。与此同时，日机三十多架对九龙启德飞机场实施轮番轰炸。

日本侵略军迅速突破了英军经营多年的防线，迫使英



军于十二日放弃了九龙半岛，退守香港岛。日军炮兵部队在九龙何文田进入阵地，架起重炮，日夜向香港英军炮台和阵地轰击，香港同胞的生命财产也遭到重大损失。

十三日，日军派了中佐军官驾汽艇从九龙过海向英方劝降，遭到拒绝。

十七日，日军飞机对香港岛狂轰滥炸。十八日夜，日军在香港岛北角登陆成功，占领了跑马地及浅水湾，英军试图反击，但未能奏效。在日军猛烈的进攻下，英军组织力量进行节节抗击，同时他们在香港太平山顶的炮台炮击九龙日军炮兵阵地和其他军事目标，位于大角嘴、旺角和官涌的油库中弹，烈焰腾空。经过十八天的进攻，日本侵略军终于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那天占领了香港。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无条件投降。

香港一百六十万居民陷于恐惧、寒冷、饥饿的深重灾难之中。

在日军大举进攻香港的过程中，我们这支还处于幼小状态的东江抗日游击队，也积极采取行动打击侵略者。例如，在惠宝边地区，我们命令茜坑、马鞍山抗日自卫队，在日军进攻香港前，连续几个晚上袭扰驻坑梓、坪山、葵涌的日军。在宝安阳台山地区，第五大队的“铁路队”，在乌石岩—龙华—布吉公路沿线，袭击向香港开进的日军后续部队，击毙击伤日军三十余人，缴获战马四匹，军用物资一批。

## 挺 进 港 九

日军进攻和占领香港,摆在我们东江抗日游击队面前有两项重大的任务:一是迅速抢救困留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二是抽调部队挺进港九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党中央从延安发来电报,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也发来电报,指示我党驻香港的负责人廖承志同志,迅速做好应变准备,将遭到国民党当局政治迫害而聚居在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经澳门、广州湾(今湛江)或东江转入大后方。廖承志同志当机立断,决定立即派人和我们部队联系,要我们尽快派出一支精干的突击队到九龙去协助进行抢救工作。这是我们当前最紧急的一项任务。

“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日本侵略军到哪里我们就深入到哪里去打击它。这是党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的方针。部队东移回来后,我们更加明确了这个指导思想。日军在广九铁路沿线集结兵力时,我和王作尧同志,根据林平同志的指示,已部署好应变准备。一旦日军进攻和占领香港,我们即抽调部队挺进港九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

抢救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挺进港九敌后,开展

游击战争，这两项任务是一致的，我们的工作部署是同时展开的。而首先是要建立和加强从我们东江游击区到港九的交通线。

从我们“曾·王”两支部队成立之时起，就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香港党组织的支持下，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在香港设立了后方办事处，派了何鼎华、柯平和何启明同志负责，有交通联络站、被服厂和药房。我们从香港取得了源源不断的后勤支援，部队的被服以及许多军需品都是从香港采办的。所以早在“坪山时期”我们就建立了通往港九的交通线。东移之前，大多是走沙头角和沿海这条线——东线，当时由我们“新编大队”负责。东移回来后，重心转到铁路西边的东宝地区，又开辟了通往港九的新交通线——西线，由第五大队负责。为了巩固这条重要的交通线，确保它的安全，王作尧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他们派出民运干部潜入深圳河北岸日军封锁区开展群众工作，争取统战对象，设立交通站、情报站；在上埗、赤尾、叶屋、皇岗、沙头、福田、白石洲等村庄都设立了我们部队的据点，巧妙地在伪政权“维持会”里面安插了“白皮红心”的情报人员，开辟了偷越敌人封锁线的许多通道。在九龙新界，我们也派有精干的民运干部去做群众工作。深圳河两岸的广大群众对我们这支抗日游击队是支持拥护的。这些工作，为我们执行抢救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挺进港九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日本侵略军于十二月八日越过深圳河，我们立即派出几支队伍进入九龙新界开展对敌斗争。我们从惠宝边派出茜坑、马鞍山抗日自卫队尾随日军之后，于十二月十一日进入西贡半岛的赤径、企岭下、深涌湾一带活动。随后为了建立从惠宝边到西贡半岛的海上交通线，自卫队由江水同志领导一个十多人的小分队留下，其余的人回到葵涌组成海上护航队，由刘培同志担任队长，担负由沙鱼涌、坪洲、塔门至深涌湾的海上交通任务。同时我们还从“虎门队”抽调约二十人组成一支小分队，又从惠阳短枪队等单位抽调了十多人组成一支精干的短枪队也进入西贡半岛。这两支小分队加上江水的短枪队联合组成一支类似八路军的武工队性质的短枪队，成立临时党支部，由黄冠芳同志领导，在西贡地区以及启德飞机场附近活动，一直伸展到狮子山、慈云山、牛池湾一带。不久，又派蔡国梁同志去加强对这个队的领导。在宝安，王作尧同志于十二月九日即派了曾鸿文同志带着助手紧蹙日军之后插入新界元朗地区活动，后来又派了黄高阳同志去加强领导。不久，第五大队副大队长周伯明又率领一支短枪队，从深圳附近越过日军封锁线，沿着广九铁路新界段以西的南涌、鹿颈一带开展活动。至此，我们进入九龙新界地区的队伍已有近百人，他们在这块长期被英国霸占，现在又落入日本侵略军手上的地区，开辟一个新的敌后战场，与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展开坚决的斗争。到了一九四二年二月，我们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后，立即在

港九地区成立了港九大队，任命蔡国梁为大队长，陈达明为政治委员，黄高阳为政训室主任，统一领导港九地区的武装斗争。

我们的部队开始进入港九敌后开展斗争，是既艰苦又极危险的。日军占领港九初期，其野战部队和宪兵部队在沙头角、大埔、元朗、沙田、粉岭等地设了据点。而山区乡村，土匪多如牛毛，很大一部分投靠敌伪，奸淫掳掠，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我们部队开入九龙新界后，对土匪展开了斗争，和乘日军尚未顾及之前，抓紧时间收集英军撤退时丢弃在九龙新界各地的武器弹药。很快就收集到轻重机枪三十多挺，步枪几百支，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曾鸿文同志带着短枪队去同占据大帽山的土匪头目黄慕容谈判，由于曾鸿文过去在这一带有声望，现在又有实力，宣传抗日义正词严，迫使黄慕容“让”出了大帽山这个地方。曾鸿文就在这一带建立据点，很快发展到几十人。他们发动群众，打击小股日军，惩治汉奸，打通了从九龙青山道经九华径到荃湾越过大帽山到元朗十八乡，进入宝安根据地这条最便捷又安全的交通线。这条线，是我们宝安根据地通往九龙市区的西线。另一方面，黄冠芳同志率领的短枪队，进入九龙市区，即与在九龙工作的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在西贡打土匪，发动群众，建立据点，打通了一条从九龙市区到西贡，然后乘船渡过大鹏湾，在沙鱼涌等地登陆的交通线。这条线，是我们惠宝边地区通往九龙市区的东线。

## 秘密大营救

遵照党中央要不惜任何代价，尽快把困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抢救出来的指示，我们党在香港的各个组织和我们东江抗日游击队，展开了一场秘密大营救的斗争。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同志，十二月七日接到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急电后，立即布置应变工作。八日，正当日军进攻九龙的上午，廖承志同志在香港召集了紧急会议，请文化界新闻界的一些同志和朋友参加。大家分析了形势，认为英军不可能长期坚守，必须立即组织疏散。决定住在九龙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赶紧转移到香港隐蔽起来，等候下一步布置撤退。

十二月九日，周恩来同志又急电廖承志等同志，对有关人员撤离香港的路线作了明确的指示：除了去广州湾、东江外，马来西亚亦可去一些；如去琼崖与东江游击区则更好。到游击区的人员，即转入内地，可先到桂林。接着，周恩来同志又来电急切地询问：在香港的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住九龙的朋友已否撤出？与曾生部及海南岛能否联系？周恩来同志对援救身陷危境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心情是多么迫切，考虑是多么周到啊！

在日军进攻香港前，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sup>①</sup>正在香港开会。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治委员林平、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到香港工作的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等同志都集中到香港。廖承志同志接到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电报后，即同与会的同志抓紧研究了营救工作。按照分工，刘少文同志负责香港方面的联络营救工作，林平同志负责布置九龙到东江游击区的护送和接待工作，廖承志和连贯同志迅速经东江游击区到韶关和老隆，布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掩护地点和交通线。

当时聚居在香港的爱国民士和文化界人士，大多是一九四一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而到香港去的。他们原在重庆、桂林等地办报著文集会，宣传抗日救亡，揭露和抨击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在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帮助下，撤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创办了进步的报刊和社团，如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以范长江为社长、胡仲持为总编辑的《华商报》；以邹韬奋、茅盾、夏衍、金仲华、沈志远、胡绳为编委的《大众生活》；茅盾主办的《笔谈》；以

---

<sup>①</sup> 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下简称南委）于一九四〇年九月间成立，方方任书记，张文彬任副书记，领导广东、广西、江西、福建等地区。南委归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南委成立后，广东改设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粤北省委领导广东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粤南省委领导香港和广东沦陷区的斗争。

俞颂华为总编辑的《光明日报》；救国会主办的《救国月报》；张铁生主办的《青年知识》；还有范长江、夏衍、黄药眠等主办的“国际新闻社”；乔冠华、胡一声、吴全衡等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以及夏衍、于伶、金山等组织的“旅港剧人协会”等进步文化团体。他们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争取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国际人士的同情和援助，起了重大的作用。当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蓄意制造“皖南事变”时，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等联名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公开信，表示抗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邹韬奋、茅盾、金仲华、恽逸群、范长江、于毅夫、沈志远、沈兹九、韩幽桐九人发表了《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这些抗日讨顽的檄文，震动中外。所以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都把这些爱国人士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在敌机猛烈轰炸之后，廖承志同志在香港告罗士打大酒店分批会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这时候我们游击队派出的短枪队已进入九龙，撤退的方案和途径已经制定。廖承志同志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决定了撤退时各小组的负责人，联系地点，并分发了隐蔽和撤退时的必须经费。

但日军在占领香港后，就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在全市挨户搜查，逮捕抗日爱国人士。香港和九龙隔海相望，这时却被日军严密封锁，真是咫尺天涯。林平同志在九龙我们部队办事处向干部和交通员作了护送的部署。他认



为,如果不能帮助廖承志、张文彬等同志先行撤离港九,整个营救计划将无法实行。他交代香港办事处的干部李健行说:“我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打通九龙至香港的交通线。这件事得由你亲自去一趟,要求你比任何时候都不怕冒险和不怕牺牲。”李健行同志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艰险的任务。这时,廖承志同志也急于和九龙方面联系,刚好在同一天派了廖安祥同志到九龙来。李健行就和廖安祥一起偷渡过香港,在铜锣湾避风塘的一艘驳船上见到了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同志,从而打通了九龙至香港的交通线。

营救工作是艰巨而复杂的。首先把营救的对象找到就很不容易。香港陷落后,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捕,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一再改变住处。刘少文和梁广同志留在香港领导这项工作,派出熟悉香港情况的潘静安等同志,根据廖承志同志提供的名单,通过各种关系,把营救对象一一找到,并帮助他们转移到较安全的住地,然后安排他们分批撤退。

九龙方面,在林平同志领导下,由何鼎华、李健行、何启明等同志建立了秘密接待站,解决食宿问题,然后按照不同的对象,安排他们进入我们的游击区或到其他地区。进入游击区的,由我们在九龙地区的短枪队负责护送。东线由蔡国梁指挥,黄冠芳、江水领导的短枪队担任护送;西线由曾鸿文指挥,林冲领导的短枪队担任护送。

一九四二年元旦,紧张的营救工作开始了。拂晓之前,

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同志，乘上小艇，在李健行的护送下，避开日军的巡逻艇到达九龙红磡。他们在九龙广东道一幢普通的房子里，同林平和何鼎华同志仔细研究了护送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到游击区去的路线、警戒和沿途食宿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由林平同志负责向我们部队作具体布置。

第二天早晨，黄冠芳到九龙接待站与李健行接上头后，给化了装的廖承志、连贯、乔冠华每人买了一些香烛、供品，扮着香客混出九龙，通过启德飞机场附近几个检查岗哨，出了封锁线，到达牛池湾。这时江水带着八个短枪队员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分成三个组，一个组在前面侦察开路，一个组在后面警戒，一个组居中掩护。翻过九龙坳后，走海边小路经北围、打蠔墩、沙角尾、山寮直到大环村，蔡国梁同志在这里接待了客人。夜幕降临，廖承志同志等一行，在蔡国梁等护送下，来到企岭下海湾，登上了由刘培同志率领的护航队的武装船，偷渡大鹏湾。他们既要避开日军海上巡逻队，又要提防海匪的抢劫。在配有机枪的前卫领航船的掩护下，悄悄地升帆出海，于凌晨三时到达沙鱼涌。然后由刘培等护送到田心交给惠阳短枪队。

一九四二年元旦前后，我和“虎门队”住在坪山东南的石桥坑。这里是一条偏僻的山沟，只有几间已没有人居住的、砖石结构的房子。我们准备在这里迎接廖承志等同志到来。好几天前，惠阳短枪队执行任务去了，我和彭沃等同志

焦急地等待着。元月三日中午，短枪队带回来一批人，为首的胖胖的身材，头戴鸭舌帽；一个长得矮小；另一个高高瘦瘦戴了一副眼镜。“啊，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同志，他们脱险回来了！”我们高兴地喊起来，悬了好几天的心才放下来。这是我们从香港接回来的第一批领导同志。接着，张文彬同志也从香港回来了。

我们在这个小山沟的砖石房子里欢快地叙谈。廖承志同志和我们开了个会，研究布置下一段的营救和接待工作。他说，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很快要到宝安根据地来。他要我到宝安我们部队的领导机关去负责接待工作。我们研究认为，惠州是个重要的中转点，要设立一个秘密接待站；连贯同志到老隆，负责那一段的接待工作；乔冠华同志到韶关，负责由韶关转到桂林的接待工作。然后，廖、连、乔三人一起到惠州、老隆，沿途布置接待工作。张文彬同志说，他打算在我们部队停留一个时期，视察工作。

惠阳短枪队送走了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同志后，我即赶到宝安白石龙村去，这时总部机关住在村南一座两层的小楼房里。我到达时，林平同志在部署好营救和护送工作后，也从九龙回来了。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同志也同时调回来，到我们部队工作。

杨康华同志是我在中山大学读书时的同学。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山大学秘密进步团体“马列主义行动团”的发起人之一。一九三六年春参

加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在广州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曾任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占领广州前夕,转移到香港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东南特委常委、宣传部长。一九四〇年夏,担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上级党组织派杨康华同志来参加我们部队的领导,我内心非常高兴。

为了做好接待和护送营救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林平同志召集我和梁鸣钧、王作尧、杨康华同志开会,传达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电报指示,研究并作出了如下决定:由我留在白石龙负责接待工作;梁鸿钧同志负责部队的军事指挥;王作尧同志负责从港九至我区交通线的警戒和护送工作。已集中了三个中队和一个独立小队,在龙华一带,随时听候调用。林平同志会后到惠宝边去,布置惠阳县委和惠阳前线工委建立秘密接待站,和由我区至大后方的交通线等工作。

根据林平同志的部署,整个惠阳地方党和惠阳县前线工委领导的各个部队都动员起来了。在惠阳县前线工委和短枪队队部所在地的田心村,建立了一个秘密的中心接待站,由高健同志负责。这个接待站担负接待由东线护送来的,和由西线护送到宝安后再转送来的人士,然后由惠阳短枪队护送到淡水西边的茶园村。“虎门队”和惠阳长枪队担负外围警戒。在茶园,惠阳县委建立了一个秘密接待站,他们的任务是把惠阳短枪队送来的人士转送惠州。在惠州,惠

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以“香港业昌公司”大老板的身分，包了“东湖酒家”的二楼建立了接待站，而三楼则是顽军第一八七师师长张光琼包作吃唱玩乐的场所。他们认为在敌人眼皮底下建立接待站反而更为安全。

正当营救工作密锣紧鼓地进行的时候，在香港的日本侵略军贴出布告，限令“抗日分子”立即到“大日本报导部”或到“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南支派遣军”特务机关“大东亚共荣圈事务所”在报上登出启事：“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一个日本文化特务在香港的电影院打出幻灯：“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半岛酒店会晤”。显然是企图诱捕，要下毒手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月九日午夜，三只小艇载着邹韬奋、茅盾等一批文化界人士从香港偷渡过九龙，来到了秘密接待站，踏上了脱险的旅途。十一日清晨，邹韬奋一行二十多人，由何鼎华同志布置的交通员带领来到青山道口。这时青山道上，由于香港粮慌日军实行疏散人口，而回内地的难民源源不断，他们即混入了难民的队伍，向北走去，经过九华径到荃湾。

离开荃湾不久，交通员带着这二十来个人，向北走小路进入大帽山区，山区的路虽然崎岖难行，却是我们游击队控制的地区。林冲带领的短枪队在这里警戒、掩护。

他们爬过山岭，穿过峡谷，走进了平坦的盆地，这是元朗十八乡，曾鸿文就在这一带活动。交通员带着这二十来个

人到达住宿地点。这是我们的接待站，已经聚集有由交通员带回来的一百多“难民”了。除了邹韬奋、茅盾夫妇这批二十来个人之外，还有几批文化界人士，以及来参加我们部队的工人和学生。当下杀猪相待，告诉他们，这一带没有日军，可以在这里安心休息，外面有我们的短枪队警戒。

第二天，接待站的干部把“白皮红心”的元朗乡长签署的难民回乡证明交给他们，然后分批上路，短枪队仍然暗中护送，经元朗、落马洲，到深圳河边，乘船过渡到北岸赤尾村。这里是我们部队设在靠近日军封锁线上的一个据点，但群众基础好。邹韬奋、茅盾等年岁大行动较慢的人，需在此过夜，而从元朗动身较早，行动较快的人，在这里吃过午饭后，就继续前进了。

从赤尾村往北要通过宝深公路，日军设有岗哨，不时有军车和巡逻队来往。但当时公路上从香港来的难民也很多。第三天，交通员带领邹韬奋、茅盾等顺利地越过了公路，进入了便于隐蔽的丘陵地带，再爬上梅林坳，往北下山就是当时我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部的驻地白石龙村，我们的一个班哨在坳口警戒。“到家了！”文化界的同志和朋友们高兴得喊了起来。

从一月底至二月底是营救工作最紧张的时刻，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批人从香港偷渡到九龙，每批少的十来人，多的二三十人。还有一些人，因为在香港逗留时间长，容易暴露身份，或因年老体弱，不适宜爬山涉水，另外安排他们由香

港偷渡到长洲岛,再过澳门转内地。梁漱溟、千家驹、李少石和廖梦醒夫妇、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金仲华等就是通过这条路线逃出虎口的。此外,何香凝、柳亚子等是由党组织派人护送先乘船到长洲,然后换船到汕尾去的。

营救工作持续到六月底才结束。在敌人的严密控制下,从香港这个孤岛,安全地营救出如此众多的、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人物,这是历史上的奇迹。在这场伟大的秘密大营救中,香港地方党员、我们港九短枪队员和交通员、接待站的工作人员们,勇敢机智,全力以赴,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重大任务。

## 文化界人士脱险归来

开完了领导干部会议,按照分工,我即着手接待的准备工作。我们抽调了一批工作人员,由敌后文委黄日东同志负责,建立起临时的接待机构。还多方筹集了一些钱粮,开拓税源,增加税款收入,号召部队紧缩开支,开源节流。为此,张文彬同志曾经去电党中央,党中央十分重视,汇来几十万元,解决我们的经费问题。

一月十三日傍晚,交通员带到的第一批脱险的文化界人士来到白石龙教堂里,他们就是邹韬奋、茅盾等,同一天到达的共有五六十人,把那间小教堂都塞满了。我们把邹韬奋、茅盾夫妇、沈志远、胡绳、戈宝权等十多人请到总部来住

宿。

林平、梁鸿钧、王作尧、杨康华等同志和我，高兴地接待了这些历尽艰险归来的同志和朋友。勤务员点上了煤油灯。开饭了，我招呼大家说：“真抱歉，山沟里搞不到好菜，只有狗肉和青菜，不知道诸位吃不吃狗肉？”多数客人叫好，也有的笑而不言。勤务员把几大盆红烧狗肉端上桌，他们尝试之后，这才一致叫好。茅盾说：“这顿饭吃得真痛快，虽然只有一荤一素，我觉比什么八大八小山珍海味更好，永远也忘不了。”

他们连日劳顿，饭后，我就招呼他们休息。扫净了的楼板，铺了稻草，再铺上几层日本军毡，打好地铺，大家安然入睡了。我转身到村边巡了一圈，看见加派了岗哨，警戒很严密。

第二天，我们在白石龙开了个小型座谈会，庆贺邹韬奋、茅盾等脱险归来，向他们慰问，并传达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关于这次抢救工作的指示。文化界的同志和朋友们谈了他们在香港历险的情况，无不衷心地表示感谢党和部队对他们的营救。韬奋说：“我们这支文化游击队，是在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卫护下，由香港转移阵地回来的，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打倒法西斯，必须有人民的枪杆子，也必须有人民的笔杆子。”茅盾称赞这次的营救工作：“是抗战以来（简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行动。”他深有所感地说：“这次回来，感受很深，特别感到这是作家



直接同抗战的实践结合，创造革命文学最好的机会。”

我们请龙华乡副乡长刘鸣周同志带领一些党员和抗日自卫队员在白石龙村后丫髻山的松林里搭了四五个山寮，和报社、医务所的山寮相邻近。我对韬奋和茅盾说：“白石龙这个地方目标比较突出，又住了一阵，怕不大安全，转移到山上隐蔽好一些，你们意下如何？”他们不嫌简陋，反称妥当。

白石龙村后这个山窝距离日军驻地较近，正因为这样，敌人不大注意。而顽军因惧怕日军也不敢深入到这偏僻的山沟来。这简陋的茅草棚便成了藏龙卧虎之地。我们部队的战士们在这里尽心守护着我国文化界的精英，国之瑰宝。

在白石龙村外的沙梨园里，举行了一次盛会，我和王作尧同志介绍了我们这支游击队的建立、发展和战斗的历程，概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剿”，部队东移海陆丰，又回到惠东宝前线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抗击日伪顽军的夹击，在党的领导下，在广大群众和港澳同胞、海外华侨支持下，部队迅速发展起来等情况。会上，表演了丰富多彩的节目，艺术家、名演员的演唱给大家留下美好的深刻印象。

我和王作尧、杜襟南陪同韬奋、茅盾、沈志远、宋之的、戈宝权、胡绳、黎澍等十多位作家、学者，参观了我们的“山寮报社”，观看《新百姓报》和各种印刷品。他们对我们这种简易的油印和刻写技术很感兴趣。赞扬报社工作人员艰苦奋斗的精神。韬奋不断地说：“真不简单，不简单！我们是同

行,我要向你们学习。”茅盾说:“百闻不如一见,看了你们的‘山寮报社’,我对游击队怎样在敌后开展抗日文化工作,了解得更具体了。我坚信,作家只有深入工农大众才能很好地开展革命文化运动。”我们请他们提出宝贵意见,指导我们游击队的文化宣传工作。韬奋说:“我有个冒昧的建议,如果将《新百姓报》改名《东江民报》,不是更有地方特色吗?民报代表人民大众说话,批评国民党顽固派的错误政策。”我们对这个建议都很赞赏,当即请韬奋题个报名,韬奋欣然命笔,写下《东江民报》的报头。茅盾笑着说:“我来给副刊起个名。”于是即席写下“民声”两个字。

茅盾等住了五六天,提出要走,我们派了向导和短枪队护送他们到惠宝边田心村去。林平同志到惠宝边后,已布置部队和县委作好准备。这一批人,有茅盾和他的夫人孔德沚、胡仲持、叶以群和廖沫沙。这是第一批离开宝安的文化人。韬奋也想和他们一起走,我们考虑到国民党顽固派对他十分仇视,感到需要布置好进入大后方以后隐蔽的去处,再动身为妥,就说服他留下,并且告诉他,他的夫人沈粹缜和孩子们日内就要到来,韬奋便同意留下来了。

在茅盾他们走的那天下午,著名演员凤子带了一批戏剧人员从香港脱险回来。为了避免驻地过于集中,我们安排他们住在杨美村的“山寮招待所”。以后,在雪竹径、水径的山窝里也搭了山寮,办起了临时招待所,把几百名抢救回来的文化界人士安置下来。荒僻的山沟里一时歌声飞扬,生机

勃勃，气象一新。

原来计划一批接一批地护送文化界人士过惠宝边，转入国民党统治的惠州。但是，情况起了变化，日军为了掠夺物资，又占领了惠州和博罗县城。茅盾等到达惠宝边后，只好滞留在田心一带隐蔽。先后到达田心的（包括从东线来的），还有沈志远、戈宝权、张友渔、韩幽桐、胡风等。

由于情况起了变化，陆续来到宝安的大批文化界人士暂时不能走了。我们又派人到阳台山四百米高处的蕉窝村搭山寮，建起一个比较安全而又坚固的招待所，把韬奋、于伶、胡绳儿对夫妇和袁水拍、叶籁士、高汾等二十多人转移到蕉窝，后来又转移到龙华深坑村的山寮。

张文彬同志从惠阳来到宝安白石龙，和我们一起研究了全部脱险人员的行止问题，根据他们到大后方去是否安全的情况，决定哪些人先走，哪些人后走，哪些人在国统区可以公开走，哪些人要秘密走，等等。张文彬同志对我们部队这次抢救工作表示满意。他对我们说：“你们虽然是一支小小的游击队，但是坚持了武装斗争，站住了脚，意义很大，假如没有你们在这个地区的工作基础，要进行这次有效的营救，是难以设想的。”

二月中旬，党中央得悉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已经安全转移到东江游击区，即发来电报向他们表示慰问，对东江游击队和港九党组织参加营救工作的有关人员给予了表扬。并同意在我们部队设立电台，用密码与党中央

和南方局直接联系。

张文彬、林平同志和我带了几对狮头鹅和几瓶酒到龙华深坑山寮招待所，慰问了最后留在宝安的邹韬奋、刘清扬、于伶、章泯、杨刚、吴在东等几十人，并和他们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会上传达了党中央的慰问电。会上发言十分热烈，党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同他们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深情感动不已。

进占惠州、博罗的日本侵略军，在抢掠一个星期后又撤走了。我们抓紧时机，安排护送文化界人士回大后方。到了春节前后，滞留在田心的茅盾夫妇、张友渔夫妇、宋之的夫妇、胡风夫妇、戈宝权、叶以群、胡仲持、廖沫沙、周钢鸣等由高健和他领导的短枪队护送到茶园，交由淡水区委书记蓝造等护送，经永湖三栋到惠州，然后由我们自己人开船送到老隆，交给连贯同志接待，转赴韶关、桂林、重庆等地。我们一批批地护送文化界人士安全进出惠州，这些工作都是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下进行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下令缉捕韬奋，“一经发现，就地惩办”。韬奋是最后一批离开惠州的，为了保证他的安全，由胡一声同志带他到梅县隐蔽，后来转到新四军去。

这次接待工作，持续半年，从香港分路营救出大后方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著名人士三百多人，他们当中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沈志远、张友渔、韩幽桐、范长江、胡绳、乔冠华、于毅夫、刘清扬、张铁生、张明养、羊

枣、千家驹、戈宝权、胡仲持、黎澍、吴全衡、叶籁士、恽逸群、廖沫沙、金仲华、杨刚、吴在东、徐伯昕、胡耐秋、黄药眠、胡风、周钢鸣、高士其、萨空了、叶以群、袁水拍、端木蕻良、蔡楚生、司徒慧敏、杨东蓀、于伶、沙蒙、金山、王莹、章泯、宋之的、许幸之、金乃华、华嘉、梁若尘、赵树泰、李枫、蓝马、凤子、盛家伦、郁风、叶浅予、特伟、丁聪、胡考、成庆生、叶方、戴英浪、俞颂华，以及梁漱溟、邓文田、邓文钊、陈汝棠、李伯球等民主人士。还有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女士、南京市长马超俊的夫人、著名电影明星胡蝶女士等。同时，还营救了英、美、印(度)等籍的国际友人近百人。

在党中央、周恩来同志指挥下，这场秘密大营救可以说是历史的奇观，体现了党和部队与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对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我们部队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参与这项工作，也受了深刻的教益。

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到来，对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很关心我们的宣传教育、文化和新闻出版工作。韬奋为《东江民报》创刊号写了发刊辞，后来又写了一篇社论《惠博沦陷的教训》，抨击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错误方针。女作家杨刚以通俗演义形式，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漫画家丁聪为报纸画漫画，木

刻家制作版画，诗人给副刊写诗。许多名家都为我们部队和训练班讲过课。韬奋讲《中国民主政治问题》，茅盾讲文学，胡绳讲哲学，沈志远讲政治经济学，黎澍讲中国革命史，戈宝权讲《苏联的妇女运动》和《社会主义苏联》。曾任军医处长的陈汝棠和病理学家吴在东教授给医务人员讲解解剖学、病理学等。美术家、戏剧家、音乐家都给我们部队作过专题讲演。这许多活动，使我们部队扩大了视野，增长了知识，鼓舞了斗志。

韬奋在离开白石龙前，为我题词留念：

保卫祖国 为民先锋

曾生大队长，以文士奋起，领导爱国青年组成游击队，保卫祖国，驻军东江。韬从文化游击队自港转移阵地，承蒙卫护，不胜感奋，敬书此奉赠，藉表谢忱。

韬 奋

一九四二年一月廿日于白石龙

韬奋的题词对我们东江游击队高度的评价，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 港澳青年大批上前线

在紧急营救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同时，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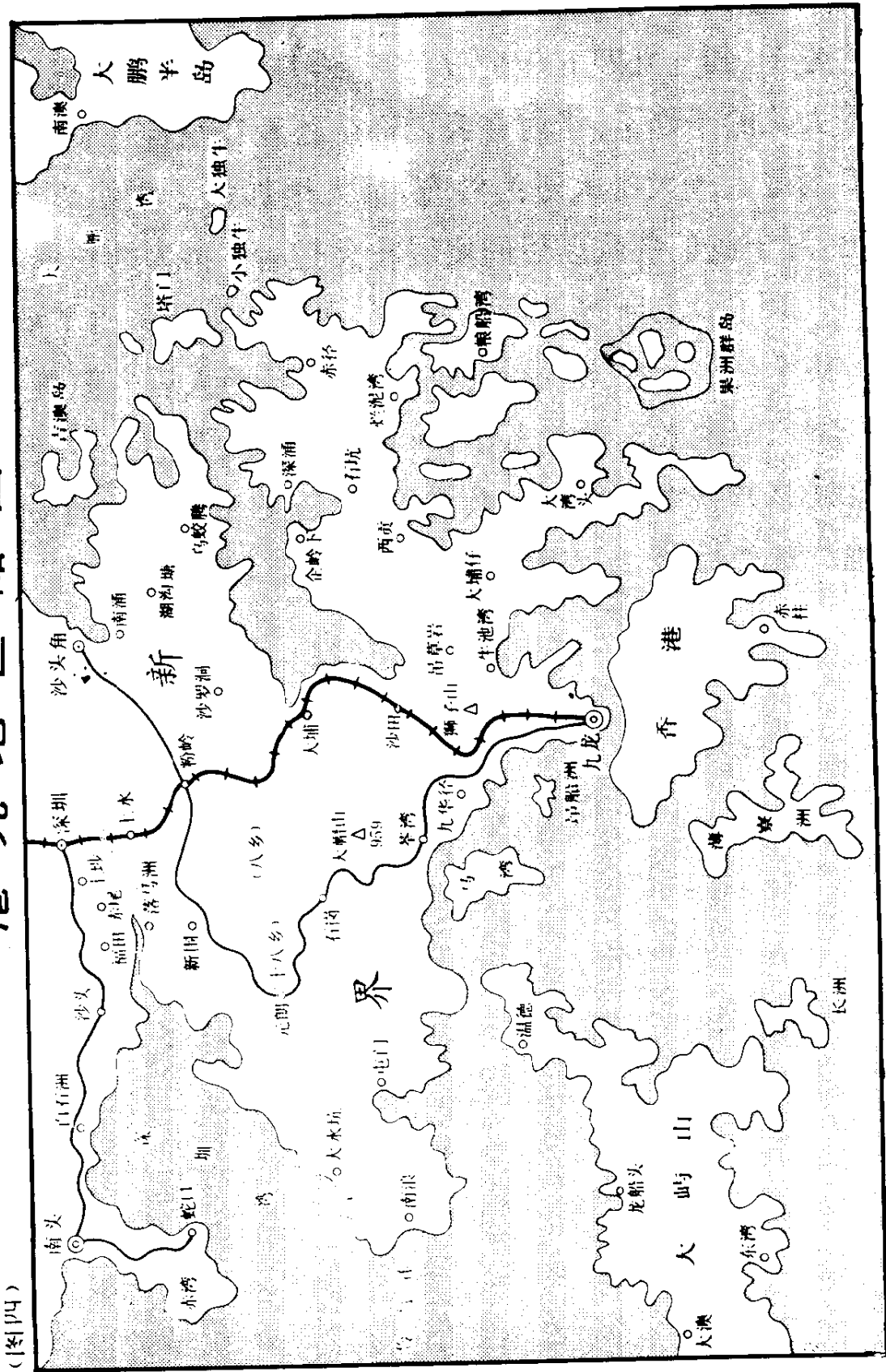
党组织还动员了大批坚决抗日的港澳青年回来参加部队。他们是有组织地，一批一批，或是随同文化界人士一起，或是单独地由交通员带领来到我们部队。从一九四二年一月到四月，一共回来有约一千人。他们中有工人、学生、职员、医务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人。他们的到来，受到我们热烈的欢迎。我会见了几批这些同志，表示热诚欢迎他们回来参加我们的部队，共同对日本侵略军作战。根据不同情况，他们的一部分回来后即陆续分配到部队，一部分集中起来，经过短期训练才分配。这两部分，大约各有五六百人。需要集中训练的这一部分，是作为干部进行了解和培养的。为此，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干部训练队，下分男子队和女子队，男子队由李东明、黄文俞负责，女子队由李静、方兰负责。训练队先是设在白石龙，后来转移到雪竹径。教育的内容是队列训练、站岗、放哨、游击战术、部队政治工作和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情况等。还邀请了文化界人士来作报告。在此期间进行个别谈话，了解各人的情况和对工作的意见。因为情况紧张，不容许长时间的集中，所以少则一周，多则半个月就分配工作。而且是随来随训，来一批就训练一批，流水作业，到四月份，基本分配完毕，训练队结束。他们大多是分配到各大队任文化教员或政治战士；一部分分配到民运队、医务所、报社、税站和交通站等单位，有的派遣回香港、九龙去工作。这些同志大多原来就是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很多是共产党党员。他们有文化，有的有专业知识，抗战意志坚

决,工作热情高昂,分配工作后,大多数很快就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其中很多人已成为中队或大队的干部了。当时在我们部队还处在艰苦斗争的时期,得到这么一大批人员的补充,很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干部队伍,对于我们部队以后的发展壮大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除了以上所述,在同一时间,我们部队还护送了港澳的青年学生一千多人,经过我们游击区转到大后方韶关、桂林和重庆等地去求学和工作。同时,还护送了不下一万名的港九同胞和侨商、侨眷脱离香港,经过游击区安全地回到内地。这些行动,也扩大了我们部队的政治影响。



# 港九地区略图



## 第八章

# 在困难中坚持和发展

### 白石龙会议

日军攻占香港之后，在东江地区的兵力有所减弱，但顽军的兵力则增强了，他们仍然占领着大岭山的大部分地区，并乘机从惠州、樟木头等地向前推进，重新占领了淡水、龙岗、观澜、平湖等地，伺机向我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因而一九四二年仍然是很艰苦战斗的一年。

张文彬同志从一月到四月，都在我们部队检查和指导工作。在这期间，他在我们部队总部驻地白石龙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林平、梁鸿钧和第三、第五大队领导干部以及杨康华同志。会议总结了三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对当前形势、任务、方针、政策，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部队的军政建设等问题，都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作出了重要的决定。

在白石龙干部会议上,张文彬同志作了多次重要的讲话,反复说明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反顽斗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坚持和发展东江抗日根据地和革命队伍的重要战略意义。他指出我军在强大的日伪顽军夹击之中,斗争是长期尖锐而复杂的,熬过困难就是胜利,熬过困难就会大发展。在军事上,我们要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机动灵活,避免硬拼和打消耗仗。要避敌锋芒,攻其弱点,扰敌、疲敌、挫敌,消灭其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他还介绍了赣南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概括为三个“能”：“能打、能跑、能躲”。即条件有利时,就用战斗去消灭敌人;不适宜打时,不能打赢时,就迅速转移;跑不了时,就隐蔽起来,保存力量,待机再打击敌人。张文彬同志的讲话,使我和我的干部受到很大的教育,使我们大大增强了在日伪顽军夹击下进行战斗的胜利信心,和懂得了更多的斗争方法。

在会议上,与会的同志们,根据张文彬同志的讲话,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同志们认为,在党的领导下,三年来,特别是重返惠东宝敌后,总结了东移的惨痛教训以后,我军紧密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经过艰苦的斗争,不断地打击日伪顽军,部队从一百多人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建立了东宝抗日根据地,大大地鼓舞了东江地区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同志们也检查了上下坪会议以来我们同日伪顽军作战的情况,认为我们打被动防

御的仗多，打主动进攻的仗少。大家认为，游击队只有主动进攻，才能打歼灭战；打不了大的歼灭战，但可以打小的歼灭战，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地歼灭敌人。例如，第三大队在大朗歼灭顽军陈禄大队的主力中队；第五大队在石鼓歼灭顽军张林大队的一个中队就是范例。今后应以奇袭、伏击等游击战的进攻手段，多打一些这样的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同志们还认为，应学会爆破技术，提高攻坚的能力，以便在奇袭不成时实施强攻，争取打更多的小歼灭战，以打开东江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在白石龙会议上，张文彬同志还谈到我们部队胜利发展中的挫折和教训。对一九四〇年部队东移海陆丰，中央有了明确的结论，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而对一九四一年九月以顽军占领东莞大岭山区以后部分反动地主反水，张文彬同志认为是由于我们执行统战政策有偏差，对地主斗争“过火”，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所致。我则认为当时总部在大岭山地区对统战政策还是注意自觉执行的，对地方士绅有联合有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应该深刻记取的教训是在于对敌斗争胜利发展时，我们滋长了自满轻敌的情绪，当顽军大举进攻的时候，以为硬拼就可以把敌人打出去，结果打了消耗仗，使部队受到一些损失。张文彬同志还认为，第三大队从大岭山区转移到阳台山区，以后又转移到惠宝边区去是“逃跑主义”。我则认为顽军以绝对优势兵力重点进攻我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我们打了几天错误的消耗仗后，即以

部分兵力在内线坚持,而将主力转移到外线,在第五大队配合下积极打击顽军侧后,以牵制顽军,解除大岭山区的压力,是符合游击战争的原则的。至于把一部分部队转移到惠宝边,是为了恢复和发展以坪山为中心的老区抗日游击战争,把我们的部队的活动推广到比路西地区更广阔的路东地区去,是积极的行动。而且日军自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二日在大亚湾登陆以后,一九四一年二月又一次在大亚湾登陆,再次占领惠州、淡水地区,在此前后还多次从石龙溯东江而上占领惠州,惠宝边地区多次沦为敌后,我们部队开回这个地区活动,在政治上也是有理有利的。以后的事实更是证明了不失时机地恢复和发展惠宝边抗日根据地,对我们东江抗日游击队的壮大和发展是多么重要和必要。我在后来学习了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战略问题》一文后,更加认识到这样做的正确性和重大的战略意义。张文彬同志来我们部队的时间不是很长,还来不及深入地了解全面的情况,因而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看法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当时从整个对敌斗争来说,这些不同的意见,是大同中的小异问题,不必要匆忙地展开讨论,而且当时的情况也不容许我们再坐在那里讨论了。因为当时在宝安,内战的气氛已经日趋紧张,在我们送走了文化界人士的时候,广东国民党当局已经调集部队,将要向我们大举进攻,集中精力进行反顽斗争已是当务之急。所以,对于张文彬同志对我个人的批评,虽然在认识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还是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

态度。以为来日方长,待以后有机会时再与张文彬同志商榷。不幸的是,四月中旬,张文彬同志离开宝安经惠阳转到粤北之后,六月份,在南委机关转移到大埔时,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他在狱中带病坚持斗争,凛然声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我永远怀念他。

在白石龙会议上宣布:经南委决定,为了加强和统一东江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军队和地方党的领导,成立东江军政委员会。由林平任主任,梁鸿钧、曾生、王作尧、杨康华、谭天度、黄宇为委员。

白石龙会议还决定: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曾生任副总队长、王作尧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李东明任副主任、邬强任参谋处长。对外则称曾生、王作尧为正副总队长,以地方人民抗日武装的面目出现。总队设总队部(参谋处)、政治部和军需处。部队进行整编,成立一个主力大队和四个地方大队:即在原第五大队基础上成立主力大队,大队长由王作尧兼、副大队长周伯明、政治委员卢伟良;东莞地区部队仍为第三大队,大队长曾生兼、副大队长翟信、政治委员陈志强;惠宝边地区部队编为惠阳大队,大队长彭沃、副大队长高健、政治委员谭天度;宝安地区部队编为宝安大队,大队长曾鸿文、副大队长阮海天、政治委员何鼎华;港九地区成立港九大队,大队长蔡国梁、政治委员陈达明。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后，部队经过了整编，建立和健全了各种制度，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为后来成立东江纵队，公开宣布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奠定了基础。

这时，总队的电台建立起来了，并沟通与延安党中央、南方局、南委和粤北省委的无线电联系。对于我们这支孤悬在东江敌后，在日伪顽军夹击下艰苦奋斗的抗日游击队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回顾三年来我们这支远离党中央，也远离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游击队，由于没有电台与党中央、南方局等上级组织沟通联络，得不到上级及时的领导和指示，就像聋子、瞎子一样，以致犯了像东移那样的重大错误，和遭到了多次挫折。现在好了，我们有了电台了，可以随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从此有关我们东江地区党政军的重大问题，就可以直接向党中央、南方局请示报告，及时得到党中央、南方局的正确指示，从而使我们避免再犯大的错误，保证我们部队在艰苦的斗争中能不断壮大发展。

为了建立这个电台，我们已费了不少时间，付出了不少辛劳。早在一九三九年秋，我们在坪山时，就通过香港党的关系买来一部电台的设备，并调来一些电台工作同志，进行电台的筹组工作。一九四〇年春，部队东移时分散隐蔽，把电台交给高潭地方党掩藏起来，电台工作人员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学习。一九四一年春，我在大岭山时，根据粤南省委拟建立部队电台的意图，派人去高潭取回电台设备，但那些设备尚不完善，电台未能建立。日军攻占香港后，八路

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机要和电台工作的康一民、刘澄清同志来到宝安，协助我们部队的戴机等同志进行电台的组建工作。他们在环境不安定，器材很缺乏的条件下，动脑筋，想办法，就地找来替用器材，昼夜苦战，终于把收发报机组装了起来，把电台建立起来了。他们为我们部队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立了一大功！

有了电台，也为我们进一步办好部队报纸创造了条件。三月底，总队机关报《前进报》创刊，由杨奇任报社社长。《前进报》打破了我们原来的报纸只报导我们部队和惠东宝及东江地区消息的范围，及时传达了党中央的有关决定和八路军、新四军、广东各游击区及全国各战场的情况，对东江地区军民起了更好的宣传教育和鼓舞作用。

以上所述表明，白石龙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当时东江地区的抗战形势，认真总结了我們三年来进行斗争的经验，明确了我们部队今后的任务，作出了加强我们部队建设的部署，从而大大推进了东江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 大岭山区重新控制

重返大岭山，楔入敌占区。一九四二年三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后，按照分工我又回到大岭山区去坚持斗争。踏上大岭山区这片熟悉的土地，我思绪纷纭，又想起



去年反顽斗争的教训。冷静下来思考,在根据地迅速建立,部队在对敌作战中接连获胜的时候,我的思想深处确实滋生了一些自满情绪,因而眼光不够远大,未能预先作好准备,向根据地外边开辟一两片可供回旋的地区,以便进退有据。当顽军大举进攻时,我们未能认真领会和执行廖承志同志应和顽军“软磨”的指示,仍然从正面去硬顶了几天,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拚消耗。后来又寄希望于到外线去打击敌人,以解大岭山之围,又因我们力量还不够大,打击顽军不够痛,而致落空。我认识到应该认真检查主观上的原因,深刻地接受这个教训。

我回到大岭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和充实部队。现在,第三大队的人数是比以前减少了,但是经过几个月来的艰苦战斗,部队锻炼得更加坚强了。我很有信心和同志们在这里坚持斗争,以求全部恢复和发展大岭山这块抗日根据地。

当时大岭山以东的中心区仍被顽军占领着,我们的部队主要活动在大岭山西南的北栅、太平一带的平坦地区和红山山区。去年我们大队主力撤出大岭山以前,主要是在山区活动,只是有时派出小分队到莞太公路的桥头和宝太公路的怀德、霄边一带游击一下,还没有深入到莞太公路以西、宝太公路以南的敌后去安营扎寨。我们过去只是学会了在山区进行游击战争的本领,而认为这一带都是平原水网地区,离公路几公里就是滔滔的珠江,在这无遮无挡的条件

下,游击队似乎很难立足。但是,在顽军进攻和长期占据了大岭山区以后,邬强和陈志强同志率领我们大队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部队,深入敌后纵深,在平原水网地区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闯出了新的路子,创建了新局面。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

去年冬天,大王岭战斗之后,有一批伤员不能随部队转移,通过地方干部送到南区北栅、怀德隐蔽治疗。接着,民运人员和非武装人员也转移到这一带隐蔽活动。以后,大队部带着短枪队也转移到这个地区来了。依靠党的太平区委的支持,大队部曾经驻在离太平镇二公里半的郭武村,迫敌而居。对这个地区的情况逐渐摸熟了,也取得了在敌后平原地区活动的一些经验。

太平这个地区连结大岭山,别是一番景象。这一带比较平坦,珠江从这里汇入大海,虎门山下是港口、要塞。莞太公路向北伸向东莞城,宝太公路自太平逶迤而南,通往宝安县城南头。放眼望去,尽是碧绿的田畴,濠涌纵横交错,围村星罗棋布。这里是有名的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

日本侵略军“南支派遣军”实行“以战养战”,对太平这个物产丰富的地方,早已垂涎三尺。虎门是海防要塞,日军派有重兵把守。在这个地区成立了各级伪政权,除了汪伪军之外,还拉起了“护沙队”和联防队。汉奸、土匪、恶霸趁机而起,占寨为王,时常火拼。人民群众在层层压榨之下,苦难深重。

但是，我们楔人这个地区活动，也有不少有利条件。首先，太平地区是一百年前林则徐进行鸦片战争，焚烧鸦片烟的地方。这里的先辈们参加了这一壮严伟烈的民族战争，当地的人民具有爱国反帝斗争的光荣传统。我们这支抗日救国的部队，很自然地也得到这个地区人民和各阶层开明人士的爱护和支持。二是在大革命时期，这个地区的农民响应彭湃同志的号召，掀起了农民运动的浪潮，受过革命的锻炼，有一定的阶级觉悟。三是抗日战争前后，东莞的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我们党和“模范壮丁队”造就了大批本地干部，他们和群众有密切的关系。四是地方党的力量较强，中共太平区委领导好几个支部，尽力支持我们部队。

我们进入太平地区以后，为了适应新的斗争环境，学会在平原水网地带进行游击战。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第一、加强短枪队，在平原水网地带以开展短枪队游击活动为主，长枪队留在山区休整训练，必要时长短枪队配合作战。第二、加强情报站的工作，建立情报网，派人打人敌伪机构，重点是及时掌握太平的日军情报，做到在日军出动之前我们已先获悉。第三，派出民运、统战工作人员，到各乡村开展群众工作和上层人士的工作。第四、对大股的伪护沙队和土匪，派富有经验的干部去做分化、争取的工作，使之不与我们对立，必要时能为我所用。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我们站稳了脚跟，在太平地区建立了游击基地，为恢复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集中兵力打杨参化。去年十一月以后，顽军调其第六游击纵队的杨参化大队驻在大岭山区的金桔岭。几个月来，它蹂躏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残害人民。我们留在大岭山的部队，虽然组织了多次反击，由于力量悬殊，收不到什么效果。一些地方干部也受到损伤，如大沙的殷天锡牺牲了，老红军刘若愚也在大朗的屏山、水口一带被追击而牺牲了。顽军找不到我们的主力部队，骄横不可一世，竟然宣称我军已经“被消灭了百分之九十几”，剩下的只是“残余的残余”，很快就要“完全消灭”了。

一九四二年四五月间，顽军开始了对我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连续进攻。总队部研究，认为杨参化虽然疯狂残暴，却是顽军薄弱的翼侧。于是决定集中力量到大岭山来打击杨参化大队，以打破顽军对阳台山区的进攻，并恢复大岭山抗日根据地。

六月下旬，梁鸿钧、王作尧、杨康华、邬强、彭沃同志率领第五大队、惠阳大队挺进东莞，在第三大队的配合下计划消灭杨参化大队。二十五日，部队隐蔽到达大岭山区的大王岭、百花洞、大环一带，布置好歼敌部署。二十六日，以原来在当地活动的第三大队的“大华队”故意暴露目标，引诱杨参化大队到大环以东地区，以便歼灭。顽军果然上钩，出动二百多人向大环村方向扑来，我第五大队即展开反击。顽军发现对手竟是我们的主力，慌忙逃窜。可惜，由于指挥上的失误，把担任堵击任务的惠阳大队的出击地区配置得过远，

又未能及时命令其出击,以致未能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杨参化大队遭我打击后,逃回金桔岭老巢固守,我未能攻下。第二天,我军与前来增援的顽军保安第八团展开激战,毙伤敌五十余人,我总队参谋处作战科科长符东同志负重伤,送到厚街医治无效牺牲了。“铁路队”中队长沈鸿光同志也负了伤。当天晚上,我军主力撤到大岭山西麓的水口庙休整待机,留下部分部队在大环警戒掩护。顽军在拂晓前包围大环,部队在突围时受了一些损失,随部队行动的地方党区委书记李守仁同志牺牲了。二十九日,我军又在红山地区与来犯的顽军激战,打退敌人几次冲锋,敌死伤多人,有一个连的敌人被我压制在红山南麓的半山腰,进退不得,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及时指挥部队反击,歼灭该敌。尔后我军转入追击,把敌人赶了回去。

这几次战斗,由于我们作战指挥上的失误,失去有利战机,未能全歼杨参化大队和顽军的其他部队。但是,我们集结三个大队的兵力,进行游击性运动战的尝试,这还是第一次,使部队得到了锻炼。同时,我军主动打击群众痛恨的杨参化大队,给了顽军以重大杀伤,击毙其第二中队中队长,在大岭山区重振了我军的军威,这对击破顽军对阳台山区的重点进攻,恢复大岭山抗日根据地,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恢复和发展。战争环境动荡多变,我重返大岭山的工作时间不长,六月份总队部又决定我到路东去,负责惠宝边和港九地区的领导工作。第三大队由邬强接任大队长,卢伟如

任政治委员。同时，总队部决定王作尧同志分工负责东莞大岭山地区的领导工作。宝安阳台山地区的领导工作由林平、梁鸿钧同志直接负责。十月，建立了莞太敌后工作委员会，由王作尧任书记，卢克敏任副书记，以配合主力部队恢复和发展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并打通与珠江三角洲各兄弟部队的联系，深入开展广州外围的抗日游击战争。

我离开以后，东莞大岭山区的斗争，在王作尧、邬强、卢伟如同志领导下，进行得有声有色。第三大队在莞太敌后工作委员会的配合下，打了一系列的小胜仗，牢牢地控制着大岭山西部地区，直到莞樟公路西段；并深入到日伪军占领的东莞城、厚街、太平一带活动，进一步摸索在敌占区斗争的经验。同时，不断派出小分队到大岭山东部地区活动，打击伪联防队。但是以大朗、金桔岭为据点的顽军，还不时向我进犯。十一月二十一日这天，顽军第一八七师出动了一个团的兵力，由大朗、金桔岭经莲花径出怀德，向我第三大队驻莞太公路北栅的一个中队进攻。中队长黄布率领部队同顽军一个先头连打了一个钟头，杀伤一些敌人之后，转移到大宁村。顽军被我打得昏了头，以为我军沿着公路向西撤退，也就沿着公路向太平方向追赶。这时，驻太平日军听到枪声，赶来配合顽军夹击我军。日军先头部队一个小队，乘汽车向北栅开来，正好与追赶我军的那个顽军先头连遭遇。日军占领了公路桥头的有利地形，以猛烈的火力，把顽军压制住，顽军攻不上去，退不下来。大敌当前，我军不忍坐山观虎

斗,即迅速迂回到日军侧后实施攻击,日军被迫后撤至官涌坳,被困在公路上的顽军才得脱险,惶惶逃至北栅。这时顽军整个团已经开到北栅,大肆掠夺,弄得鸡飞狗走。

随后,日军从东莞城调来一个大队,分乘十辆卡车疾驰而来,分路包抄北栅的顽军,顽军见了日军就胆寒,惶惶逃离北栅。日军在炮火掩护下急速直追。我军又在日军侧后发起攻击,迟滞日军行动,使顽军从容后撤。我军这一深明大义的行动,得到了抗日军民的高度评价,对国民党顽固派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干尽亲痛仇快的勾当,深恶痛绝。

眼看北栅的乡亲们在一日之间,受到顽军、日军两次惨劫,我军的指战员义愤填膺,在攻击日军的作战中,打得非常英勇,共打死打伤日军三十多人,收集到日军和顽军的军需品一批,还收容了几名顽军的伤兵。

我《前进报》对这次战斗发表评论说:“我队不念旧恶,奋勇增援,机动侧击,解顽军之危……牵制其对顽军之追击,使顽军获机窜退,顽军中下级军官深受感动。”

经此一仗,在东莞大岭山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从此,顽军在这地区“清剿”的锋芒顿挫,日伪军也不敢轻易离开据点。莞太公路沿线各乡的群众和开明绅士,更坚决地支援我军。我第三大队抓住这个有利形势,积极开展活动,到一九四二年底,部队在斗争中又发展壮大起来,并逐步地控制了整个大岭山区,我们的民运队又深入到各村庄,大岭山上又到处响起了抗日的歌声。

## 阳台山区持续反顽

一九四二年春节刚过，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奉蒋介石之命，召开广东的“绥靖会议”，声称“限期三个月内，消灭东江的曾、王匪部”。先后出动了第一八七师、独立第二十旅、保安第八团和徐东来、梁桂平两支地方部队，向我们东江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的进攻。

三月份，广东的国民党当局，通过他们在惠州的顽固派放出“收复深圳、反攻香港”的烟幕，把第六十五军第一八七师调到东江，以该师师长张光琼为“惠淡守备区指挥所”主任，师部驻在惠州，派出几个团推进到淡水、镇隆、新圩、樟木头、塘厦一线，对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形成包围之势。顽军完成了部署后，张光琼公开叫嚷：这次到东江“剿匪”，要用江西“剿共”办法，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围剿，经济封锁”三管齐下，“务必限期消灭”。

三月底，总队部在宝安开会。张文彬同志主持会议，总队的负责同志林平、梁鸿钧、王作尧、杨康华和我都参加了。会议分析了广东内战一触即发的形势，商讨了对付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问题。决定严守自卫立场，坚决予以回击；并决定从第三大队调一个中队的兵力充实主力大队，总队部率领主力大队和宝安大队在内线坚持战斗，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粉碎顽军的进攻。会议决定在干部中进行动员，迅



速开展宣传攻势,宣传我军抗日自卫的主张,呼吁社会力量反对内战,策略上要灵活,注意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张文彬同志提出用曾生、王作尧的名义,上书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和蒋光鼐,要求制止内战,团结抗日,停止抗日前线的内部磨擦,撤换通敌害民的军政官吏,要求给游击区坚持抗战、保卫家乡、维持地方治安的一切人民抗日武装以合法地位,要求明令承认我军名义,划分防地,发给枪械。张文彬同志指示,要把这封公开信广为印发军内外,散发到大后方,以形成政治攻势。我当时对这种做法,是组织上服从,思想上有怀疑。我感觉到在国民党顽固派已经蓄谋向我大举进攻的时候,发表致余汉谋的公开信,作为揭露和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内战阴谋的一种策略是可以的,但需要向我们的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讲清楚,否则会造成对国民党顽固派抱有幻想,反而得不偿失。

张文彬同志和胡绳夫妇四月上旬离开宝安前往惠阳。他们刚走,宝安的内战就打起来了。邹韬奋在顽军发动进攻之后离开宝安,亲眼见到顽军发动内战的暴行,使他痛愤不已。我为他饯行话别,他启程后我又回到大岭山敌后地区。顽军这次进攻我东江抗日根据地,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四月到六月,调动了数千兵力进犯我抗日根据地;第二阶段,从七月到十月,施用政治阴谋,借谈判为名,从政治上麻痹我军,以达到军事上突然进攻的目的;第三阶段,从十月到十二月,政治谈判阴谋破产之后,又转为疯狂

的军事进攻。

顽军这次进攻的重点，选在我宝阳台台山抗日根据地。因为从这一年的一月到四月，我们在这里接待大批文化界人士，比较暴露。顽军判断这里就是我们的总部和主力之所在。这时，林平、梁鸿钧、王作尧和杨康华同志率领总队部和政治部实际上也就驻在宝安。王作尧同志率领主力大队和宝安大队共同迎击来犯的敌人。

四月十四日，顽军第一八七师及挺进第六纵队邓其昌部共三千多人，向阳台山抗日根据地进攻，占领了龙华和乌石岩，作为他们实施“军事围剿”的前哨阵地。

十七日拂晓，顽军一千五百余人兵分三路向阳台山纵深地带的最高峰以及蕉窝村等地进攻。我主力大队第二中队被敌人重兵包围，他们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打到午后，乘顽军火力稍歇时突围下山。这一仗我们受了损失，有一个班撤不出来，共有三十多个同志牺牲了。但是顽军也被我们毙伤了几十人。

十九日，顽军又出动一千多人，分三路向驻樟坑我军进攻，我主力大队第一中队掩护大队部撤退以后，政治指导员颜庆增带领一个小队坚守阵地，掩护中队撤退，顽军集中机、炮火力轰击，几个连的步兵冲过来，颜庆增等二十多位同志壮烈牺牲。颜庆增同志是上海人，原来是香港大东书局的党支部书记，是日军进占香港后回来参加部队的。

顽军除集中兵力进攻我主力部队外，还不断派出部队

反复搜捕，破坏龙华、布吉、民治三个乡的民主政权，杀害我军后勤、地方工作人员，及群众积极分子，掠夺群众财物，放火烧屋。我们部队的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在和顽军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医务人员莫福娣、王丽、政治服务员陈笑影，在带领伤病员突围时，先后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为了给顽军以有力的回击，减轻阳台山区的压力，并恢复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六月下旬，总队部决定由梁鸿钧、王作尧、杨康华率领主力大队转到外线作战，会同惠阳大队和第三大队，集中兵力打击盘踞在大岭山区的顽军杨参化大队（已在“大岭山区重新控制”一节中详述）。同时由宝安大队派出小分队，不断袭击青湖、浪口、乌石岩等地的顽军驻地，到处打击小股零星的顽军。

顽军“剿共”，“三管齐下”之一的所谓“政治攻势”，其实就是制造谣言，诬蔑我们是“奸党”、“匪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扬言“剿匪”是“绥靖治安”。此外，还出了赏格寻求“曾生、王作尧首级”，并招降纳叛。不外乎就是这老一套伎俩。我们也积极开展宣传攻势，大量印制标语、传单，宣传我军的抗日主张和战绩，揭发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到抗日根据地烧杀抢掠，残害人民的暴行。除在本区散发以外，还通过税站发给过往客商，让他们带到惠州、韶关等地方去，以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顽军的另一“管”就是“经济封锁”，主要手段是组织“别

动队”专门袭击、破坏我们的税站，妄图断绝我们部队的主要经济收入。因此，在税收战线上展开了袭击与反袭击的激烈斗争。李朗税站站长邱乙、总队部总税站站长黄国平等同志，在和来袭的“别动队”搏斗中英勇牺牲。敌人把黄国平同志的头颅挂在观澜圩口，以为可以吓倒群众，却反而激起抗日军民对顽固派更加愤恨，对革命烈士无限崇敬。顽军破坏我们的税站，虽然在经济上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也没有因此而被困死。随着港九大队的建立和成长，税收日渐增加，又上缴了不少税款到总队部来。顽固派企图通过“经济封锁”置我们于死地，这一着诚然毒辣，却制不住我们，只好徒呼奈何。

到了七月份，广东国民党当局吹嘘的三个月内消灭我军的计划破产了。于是又使出了另一招。七月中旬，国民党当局派了少将参议黎越庭到宝安平湖来，通过我们后方办事处主任张作铭，要求与我们谈判。这个黎越庭曾任东莞中学校长，指名要见王作尧和何鼎华。黎声称他是在蒋光鼐、李济琛授意下由李章达派来的，说蒋光鼐和李济琛要为我军向余汉谋斡旋，他来商谈以后要向蒋光鼐、李济琛回报云云。当时我已经去了惠宝边，林平同志和在宝安的几位负责同志研究，认为蒋光鼐、李济琛不赞成打内战，要作斡旋并非无可能。经电报请示党中央和南方局，南方局周恩来同志于八月三十一日复电，同意我们进行谈判，但必须坚持以下原则：“独立番号，独立行动，不能受训人员，不能调训部队，

专在游击区打敌人。”同时，要了解国民党方面的情况，警惕他们的阴谋。

总队决定派王作尧、何鼎华同志前去谈判，谈判地点设在游击区内靠近顽军据点平湖的甘坑村。这是我们选择的地点。我们派了部队前去警戒。

黎越庭提出，关于我们部队番号、编制、划分防地等问题，都可以回去向上峰商量。王作尧、何鼎华同志根据总部事先研究的原则，回答说：为了抗日，重新要番号的问题，可以谈判协商，但是必须以我们独立自主的原则为基础。第一，我们的部队是个总队，如果给番号，要给整个部队，不能只给东莞或宝安的部队。第二、我们受编不受调，广九铁路以西整个地区应划分给我们活动，国民党武装必须退到广九铁路以东去。第三、要与正规军一样待遇，要定期发饷，发枪支弹药。黎越庭巧舌如簧地说：第二第三个条件，可以考虑，可以替王作尧说话，而对曾生却不了解，因此，让王作尧“先出来”，把部队整编为一个支队，“曾生他们将来再另编一个支队。”至此，国民党派人来“谈判”的阴谋已经昭然若揭，不但是要麻痹我们，还妄图分化瓦解我们，以达到各个击破、消灭我们的目的。王作尧和何鼎华同志义正辞严地驳斥了对方的胡搅蛮缠，然后客气地派人送黎越庭回平湖去。我方代表星夜赶回驻布吉附近的总队部。

谈判的人刚走，顽军就出动了。我军在大船坑、游松、石坳等地设伏，给顽军以迎头痛击后，主力转入纵深地区。另

以小部队打麻雀战，专打分散、薄弱之敌。非战斗人员则转到南面日军占领区边缘的麻山一带分散隐蔽。地方干部带领群众坚壁清野，上山躲避顽军的进攻。国民党顽固派一面谈判，一面突然袭击的阴谋就这样破产了。

为了抓紧战斗的间隙，分析目前形势，研究部队的组织和力量部署，八月，我从惠宝边来到宝安布吉附近的径上村，参加了由林平同志主持的总队部会议。会上王作尧同志介绍了和顽军代表黎越廷会谈的情况。大家研究了白石龙会议以来反顽斗争的情况和经验教训，认为顽军重点进攻我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已经四个月了，在第一阶段的反顽战斗中，我们的部队，特别是主力大队，打得很英勇，但是伤亡也较大，我们长期摆着过多的兵力在布吉地区一隅，既不利于反顽斗争，又难于开展对日伪军的战斗。会议决定以原主力大队为基础，再从惠阳大队调一个小队来重建主力大队，代号“珠江队”，调彭沃任大队长，卢伟良任政治委员。“珠江队”直属总队领导，下辖三个小队，主要在莞太、宝太公路沿线活动，也可以超越地区作战。周伯明调回总部任参谋处长。

“珠江队”于八月二十四日组建后，主动灵活地出击敌人，首先于东莞浪基胡向日军出击。随即又在赤岭伏击日军，接着在水口庙袭击日军。不久，又在宝安西乡袭击伪军排哨，并在应人石伏击顽军，都获胜而归。

顽军在九月间抽调兵力进攻惠宝边区我军后，重新部

署了进攻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兵力，并于十月间开始了第三阶段的进攻。“剿共”指挥官张光琼在惠州声称，这一次要坚持采取“勤剿、穷追、杜绝”的方针。他吹嘘这是“江西剿共”的经验。张光琼在给他的部队重新打气之后，又把几个团推到东宝前线，反复摧残我抗日根据地。

所谓“勤剿”，就是天天出动，向我军猛扑；所谓“穷追”就是直追到日军据点附近，使我们不能利用日顽之间的间隙来隐蔽；所谓“杜绝”，就是专门扑击我军税站，断绝我们的经济来源；加上搞“三光”政策，以烧杀抢来镇压群众，不准支持我军，疯狂搜捕杀害军民、干部和积极分子。

宝安阳台山区，树木葱笼，丘陵起伏。顽军为了不让抗日军民有藏身之所，叫嚷“草木不留”，放火烧山，条条火龙通宵达旦地吞噬了大片青山。总队部交通总站站长陈耀光带领交通、税收人员及伤病员共二十多人，上白石龙后山隐蔽，顽军向他们开枪，放火烧山，陈耀光同志带头奋力冲出，被机枪击中，当场牺牲，在场的大多数同志也都牺牲在烈火中和枪弹之下。陈耀光同志原是马来亚吉隆坡华侨机械工人，因从事抗日救亡工作，被英殖民当局递解出境而回来参军的。

龙华的乡村干部、地方党员、抗日自卫队员、积极分子，被顽军“搜剿”，越过乌石岩向沙河走避，龙华抗日民主政权乡长卓凤康老先生在山上隐蔽，被顽军包围。卓凤康先生是老同盟会员，原是华侨，他对顽固派枪口对内不打日本侵略

者非常气愤，热情支持我军抗日。此时他身陷重围，毫无惧色，拔枪对抗，被顽军残暴杀害，壮烈牺牲。龙华的干部群众沉痛悼念素所景仰的老乡长，痛恨顽固派灭绝人性的罪行。

十月，总队部转移到宝安西乡附近，林平同志召集干部会议，部署反顽斗争。当时我在惠宝边，惦记着总队部的安全。林平同志给我来信，讲了顽军冬季攻势的方针、部署和我们的对策。他们决定把“珠江队”放在宝太公路东面的黄麻埔、蔗园埔、铁岗等处的丘陵地带活动，并兼负保卫总队部的任务。总队部进入宝太公路南段的黄田、固戍、西乡一带敌后地区。这里沦陷多年，人民群众心向祖国，见到我们部队，热诚欢迎，尽力支持。

为了适应频繁战斗的新情况，总队政治部一分为二，由主任杨康华同志率领几名精干的人员，同总队部一起行动；由副主任李东明同志率领大多数同志转移到东莞，主持全军经常性的政治工作，并配合莞太敌后工委进行开辟新区的工作。

顽军一向不敢靠近敌占区。但是，他们侦察到我们的总队部在黄田、固戍、西乡一带活动，又将第一八七师主力从观澜推进到龙华、青湖、望天湖和乌石岩，然后分兵“搜剿”。十一月九日，第一八七师一个营和黄文光大队从三面向宝安尖岗山我军进攻，总队部驻在离此不远的上川村附近一座庙里，“珠江队”坚决迎击敌人，掩护总队部撤出，敌人死伤了十多名，退下去了。同一天，顽军袭击铁岗，包围了我们



的医院，“珠江队”的一个班为了掩护医院安全转移，和敌人拼到底。带队的小队长李惠钦、班长易祥、战士罗兴、郑炳坚四位同志为保护伤病员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医院治病的政治指导员、菲律宾归侨沈尔七同志也壮烈牺牲。

十一月二十四日，宝安大队第一中队副 中队长卢耀康、政治指导员黄密、副政治指导员王天锡带领两个班二十多人转移到黄田基围隐蔽。当天晚上，总队部派作战训练参谋陈炎、政治部组织干事李国玺到这个中队帮助工作。

顽军第一八七师发现了我军，连夜出动一个团和一个大队，包围黄田，分两路向大堤进攻。卢耀康等同志指挥部队，以大堤为依托阻击来犯之敌。同志们心里都明白，总队部就在离这里五公里左右的固戍附近，能否阻住敌人的进攻，意义十分重大。他们英勇地打退了顽军的两次冲锋。顽军又发动第三次冲锋，我们的人员伤亡过半，子弹已经打尽，同志们卸掉枪机，砸毁枪支，撕碎文件，埋在泥潭里。这时顽军蜂拥而上，勇士们誓死不当俘虏，投出了剩下的几颗手榴弹后，都倒在顽军密集的火力中。卢耀康、黄密、王天锡、陈炎、李国玺等十七位英雄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战后从珠江边的泥潭里救回七位伤员，另两人平安返回。司务长叶善松同志负伤被俘，顽军把他押送惠州后杀害了。消息传到惠宝边，我和同志们悲痛不已。黄田战斗英雄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坚决顽强，以少敌多，豪气壮山河。他们挫败了顽军的锋芒，牵制了顽军的进攻，捍卫了领

导机关的安全。

黄田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总队部在固戍的堤岸附近，处于日军和顽军夹击的危险境地。为了避免损失，总队部领导人各自带领一部分部队分散隐蔽。梁鸿钧、杨康华同志到西乡附近的盐田村，林平同志留在固戍。战斗打响时，林平同志命令参谋处长周伯明派警卫部队乘船去救援，但时值退潮，船无法靠岸。林平同志又命令机关人员登船出海，他自己却坚决不肯上船，而率领担任警卫的“珠江队”第三小队转移到固戍荔枝园的小山上。由于卢耀康等同志用生命完成了阻击任务，顽军没有再前进。日军坐山观虎斗，到了下午三时许，派了两架飞机到黄田上空盘旋轰炸，炸得顽军血肉横飞，惶惶逃遁。南头日军二百多人乘卡车赶到黄田、固戍之间，向着撤走的顽军开炮。但没有发现我们总队的政治委员就在附近。

接着，“珠江队”在尖岗山和顽军打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战斗。他们调集“神枪手”和“飞毛腿”共八人，在邱特小队长的率领下，用灵活的麻雀战搅得顽军疲于奔命，困扰不堪。然后出动主力，把顽军直追到乌石岩，一共杀伤了顽军四五十人。

这样东打西打，顽军再也不敢到宝太公路来了。这时，顽军也知道，经过了好几个“三个月”的“勤剿、穷追、杜绝”，我们的部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战斗力更加旺盛。至此，张光琼只好收兵，停止了第三阶段的进攻。

顽军这次持续将近一年的进攻彻底失败了。统率这次进攻的指挥官张光琼、邓其昌被免去“惠淡守备区”正副主任的职务，由叶敏予接任主任。担任进攻我军的主力第一八七师也被调回后方，而把独立第九旅全部调来惠州接防。

阳台山区的反顽斗争，以我军的胜利，顽军的失败而结束。但是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我们和后人将永远怀念在这次反顽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指战员、地方党政干部和群众中积极抗日的分子。我认为这次反顽斗争的主要教训，是我们总队部部署不当。当时情况已经很明显，顽军已经发现我们的总队部和主力集中在宝阳阳台山区，因而集中兵力来进攻。但是，我们在敌我兵力优劣悬殊，回旋余地又不大的情况下，由于去年顽军重点进攻大岭山区时，第三大队把主力转到外线作战受到批评，因而不是避敌锋芒，把总队部和主力转向外线，转到大岭山区或惠宝边区去，而是留在内线坚持，以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主力大队受到严重损失，宝安大队损失也不轻，总队部则经常处于危险的境地。当时虽然大岭山和惠宝边抗日根据地还没有完全恢复，但在大岭山区第三大队在那里坚持斗争，在惠宝边惠阳大队在那里展开活动，都有了一定的活动地盘，可供总队部和主力大队机动回旋。游击性运动战的基本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游击战更应如此。这在上下坪会议上就已经明确了。如果我们在顽军以重兵向阳台山区进攻时，把总队部和主力大队转到大岭山区或惠

宝边区去,抓住顽军的弱点,不断打一些小的歼灭战,我们就能够处于主动地位,和减少很多损失。我作为副总队长,没有明确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意见,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

## 惠宝边恢复和发展

东移后的惠宝边。惠(阳)宝(安)边地区,是指濒临大鹏湾从惠阳县的淡水、龙岗一线以南至宝安县的深圳、沙头角一线,包括大鹏半岛的这个地区。它是我们最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新编大队”东移之后,这里处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统治之下。一九四一年二月,日军第二次在大亚湾登陆,再次占领了这个地区。顽军闻风而逃,各种名目的部队乘机兴起。有国民党军官带领部分士兵携械拉起来的,也有土匪头目纠集社会上的流氓、无赖等闲杂人员编成的。这些杂牌部队在惠宝边各霸一方,各自控制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在那里设关卡,办赌局,开烟馆,走私贩毒,盘剥人民,使当地人民陷于深重的苦难之中。

在我们“虎门队”没有来到之前,惠宝边是第五大队活动的游击区,地方上有几支游击小分队,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着抗日反顽斗争。这些小分队包括:短枪队,长枪队,茜坑、马鞍山抗日自卫队和塘埔抗日自卫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动员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袭扰日军据点,打击日军零散人员和汉奸,打击土匪,维护

地方治安和护送来往于香港和内地的商人、旅客。

短枪队以高健为队长，有三十多人，是中共惠阳县委于一九四一年春组建的，后由第五大队领导，活动于坪山、龙岗、横岗和大鹏半岛，同日伪顽军和国民党收编的杂牌部队进行过一些小的战斗，并根据上级指示护送各方面的人员。

长枪队以叶基为队长，罗哲民为政治指导员，有四十多人，也是中共惠阳县委于一九四一年春组建的，由淡水区委领导，活动于淡水以东地区。六月间在横排壑村捕杀了由淡水出来的三名汉奸。翌日，日军一百多人洗劫横排壑，烧屋六十多间，活埋群众十人。但英雄的横排壑群众没有被敌人残酷的手段所吓倒，丝毫也不埋怨抗日游击队，反而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继续支持长枪队，并陆续有十多个青年参加了长枪队，使长枪队得以顺利活动和发展。

茜坑、马鞍山抗日自卫队以赖祥(后江水)为队长，江水(后刘培)为政治指导员，有四十多人。塘埔抗日自卫队以吴海为队长，有二十多人。这两支自卫队是第五大队于一九四〇年冬组建的，活动于坪山周围及大鹏湾沿海地区，经常利用夜暗袭击沿海日军据点，打击出来偷鸡摸狗的日军零散人员。保护从上下洞经茜坑至茶园的商旅，收取保护费，解决部队的经费。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我和“虎门队”回到惠宝边地区后，即与这些小部队会合，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打击、利用、争取国民党收编的散兵、土匪等杂牌

部队，扩大游击区，扩大部队，巩固和发展以坪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为了统一领导部队的工作，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成立了惠阳县前线工委，成员是谭天度、高健，“虎门队”队长彭沃也参加工委。在惠阳大队没有成立以前，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工委来实施对惠宝边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

那个时候，惠宝边的情况非常复杂，我们部队面临着许多困难。日军自从第二次在大亚湾登陆后，一直在惠宝边各要点驻军，并在其驻地外围，建立了伪军据点。日军在准备进攻香港时，沿广九铁路南段两侧集结了三万多兵力。在淡水、澳头、龙岗、坑梓、坪山、横岗、沙湾、深圳及从葵涌到沙头角的大鹏湾沿岸各点，都驻有大批日军。当时我们部队局限在横岗、坪山以南和沿海岸日军各据点的夹缝中的梧桐山至田头山山区，而且这里还有杂牌部队割据，处境是很严峻的。

顽军在日军攻占香港，收缩兵力后，又回到淡水地区，而且还把魔爪向前伸。他们为了消灭异己，限制我党武装力量的发展，打着抗日的招牌，给杂牌部队冠以“经济游击总队”的番号，各股头目均封以大队长的官衔并给他们划分地盘。如王竹青、梁永年、陆如钧三个大队盘据在葵涌及其以东至大鹏城、澳头一带；莫炯炎、吴斌大队盘踞在葵涌以西横岗、盐田一带。这些杂牌部队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操纵下，在惠宝边的一些地区占地为王，妨碍我军活动，缩小我

游击区；占据通往香港的主要港口和通往内地的通道，勒索商旅，杜绝我军的经济来源；收集我军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向顽军报告；更有甚者是配合顽军进攻我军时打头阵。因此，在惠宝边地区，呈现了日、伪、顽、杂、我多角斗争的十分复杂的局面。

争取外围武装。在惠宝边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如何处理好同杂牌部队的关系，是开展惠宝边工作的重要问题。如能做好工作，就有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和我们共同抗日，反对内战，成为我们的外围武装，或保持中立，或为我们提供顽军的情报。在白石龙会议期间，我向林平同志谈了我的看法，他完全赞同。我在宝安接待文化界人士和返回大岭山区工作期间，林平同志直接领导惠宝边地区的工作。惠阳县前线工委根据林平同志的指示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惠宝边我们部队的力量还较小，主力部队只有“虎门队”这支百来人左右的部队，其他几支小分队还没见过较大的战阵，我们的这些部队，从数量上和装备上都不如杂牌部队的一个大队。因此，对杂牌部队不可能采取军事消灭的政策。而且树敌太多，也不策略。同时也看到这些杂牌部队和顽军、日伪军之间以及杂牌部队各大队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可以为我们利用。因此决定，当前应在积极打击日伪军的同时，对杂牌部队采取争取、利用和斗争、打击相结合的政策。

为了争取和利用杂牌部队，惠阳县前线工委决定由高健同志主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当时考虑到，在杂牌部队

中,以梁永年大队实力较强,也较反动;王竹青大队比较接近我们;莫炯炎、吴斌大队处于中间状态;而且王竹青大队和莫炯炎、吴斌大队都同梁永年大队发生过战斗,有很深的矛盾。据此,决定首先从王竹青大队着手。第一步,由高健同王竹青谈判,谈了三点:一是晓以民族大义,要他坚持抗日,不当伪军;二是要他不敌对我军;三是要他不在我们的游击区内欺压老百姓。王竹青表示都同意。第二步,在一九四二年二月,联合王竹青大队和莫炯炎、吴斌大队,拟消灭梁永年大队驻葵涌的一个加强连。这次战斗由我们总队部统一指挥,第五大队从路西调过来两个中队,由周伯明指挥,攻击葵涌东面据点的一个连;由高健指挥王竹青大队和莫炯炎、吴斌大队及我们的短枪队负责攻击葵涌西面据点的一个加强排。由于情况了解和战斗准备不充分,特别是攻坚器材的准备不够,以及未能充分发挥袭击的突然性,两面的据点均未攻下。天亮后撤出战斗。但梁永年大队经此次打击后,第二天便撤出葵涌,跑回澳头;不久又从澳头撤向稔平半岛。第三步,为了进一步争取王竹青大队,和扩大我们的武装力量,进而建立和巩固大鹏半岛抗日基地,惠阳前线工委决定将以群众自卫武装面目出现的茜坑、马鞍山抗日自卫队,塘埔抗日自卫队和长枪队,以三个中队的名义,编进王竹青大队序列。赶走梁永年大队后,条件成熟了。经高健和王竹青商谈,王竹青基于其本身的利益同意了。那时林平同志在惠宝边。他找了准备编到王竹青大队去的这几



个单位的负责同志作了交代：必须保持我军的独立性，只受编不受管；要尽力把他们改造争取过来，绝不能被他们溶化掉；部队的管理必须保持革命队伍的一套，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应想办法搞到经费，支援主力部队。

我们的这三个中队编进王竹青大队的序列后，积极执行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四月十二日，在关湖海滩阻击企图登陆的日军，毙伤日军十人。第二天，在沙鱼涌缴获伪军陈乃秀部的机帆船一艘，俘伪军八人。这三个中队连续的胜利，引起了顽军和日军对王竹青大队的注意，不断派遣汉奸、特务来侦察收集情报。我们经过复杂机智的斗争，智擒了当过梁永年大队副大队长的汉奸韦铁铮，秘密处决了国民党女特务毛芝英，拔掉了国民党顽固派按在王竹青大队内的“钉子”、少校副大队长伍权等。我们这三个中队为了协助主力部队解决经费困难，积极开展海上缉私，转运货物和护送商旅，征收护航保护费，建立税站收税，以及对走私罚款等经济活动，筹措了不少款项。

在惠宝边地区，除了杂牌部队外，在大鹏城还有一支中国农工民主党（当时称“中华民族行动委员会”负责人是李伯球）的武装。它是一九四〇年秋建立的，当时称为“联防自卫队”，有一百多人枪。一九四一年春与我党领导的王母圩抗日自卫中队（中共党员张平任中队长）合编为“联防自卫大队”。我从大岭山区回到惠宝边以后，由总队政治部调来了曾源同志（原是中共和平县委书记）成立了一个“外围武

装工作组”，由我直接领导，具体负责杂牌部队和农工民主党武装的工作。工作组的任务是：团结争取外围武装共同抗日，反对内战，或保持中立。我们派到各个外围武装部队的人员，直接和工作组发生联系，工作组接收他们提供的情报转给我，并向他们转达总队部的指示。从而使我们争取外围武装的工作做得更有成效。如大鹏城的联防自卫队经过我们的工作，接受了我们的指挥，同我们的部队同进退，共同进行抗日和反顽斗争。

铜锣径伏击日军。日军攻占香港后，即从淡水、龙岗、坪山和惠宝边沿海各据点撤出，但仍占据着深圳、沙头角、横岗、沙湾、布吉等地。我惠宝边部队，经过前一段的斗争，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抗日觉悟，淡水、龙岗、坪山一带的青年，纷纷参加部队。加上香港回来参加部队的青年工人和学生，“虎门队”和惠阳短枪队成倍地扩大了。根据白石龙会议的决定，我们以“虎门队”和短枪队为基础组建了惠阳大队。

惠阳大队建立后，积极向日伪军出击。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在沙鱼涌击退了乘船登陆抢掠的日军。五月上旬，袭击了日军在沙头角附近的军事哨和沙头角日军营房。第二天在沙头角至盐田中间的九径口，阻击企图报复的日军，毙敌十余人。接着在铜锣径打了一个很有影响的伏击战。

铜锣径位于横岗东北约五公里，是打鼓岭北麓和拳禾嶂南麓之间的一条峡谷。北面是光山，山势陡峭，难于攀登；南面山上有茅草丛和小树林，便于隐蔽兵力。惠阳大队同日

军连续战斗后，大队部率两个小队在山子吓以东、打鼓岭西麓的山林里搭草寮驻扎，进行休整和做群众工作。日军驻在横岗，经常下乡抢掠，这一带人民深受其害，对日军切齿痛恨，希望我军痛打侵略者。

五月十四日上午，驻横岗日军的炮兵部队，出动了近百人马，经铜锣径到碧岭抢夺粮食和稻草。我惠阳大队在大队长彭沃、副大队长高健的指挥下，利用铜锣径的有利地形，严密地部署有限的兵力，在下午三时许，待日军抢掠后由碧岭返回时，发起了突然攻击。当日军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后，彭沃同志一声令下，步机枪和大队仅有的一门掷弹筒同时开火。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敌人猝不及防，顿时人仰马翻，乱作一团，驮马摔掉了抢来的粮食、稻草，在峡谷中狂跑，敌人进退不得，只好躲在水沟里拼命抵抗。

伏击战将近一个小时，日军人马遭到重大伤亡。我军兵力有限，战场离横岗日军据点又近，为了避免损失，迅速撤出了战斗。果然，我们刚撤出阵地，敌人的增援部队就从横岗开来了，疯狂地向我军阵地开炮，以图报复。战后，横岗的群众告诉我们，日军从铜锣径拖回十五具尸体回去火化。此外，我们还打伤日军二十多名，打死战马三十一匹，缴获三匹。我惠阳大队的黄明、张达生、林平三位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日军回横岗后，死不服气，写了战书通过维持会送给我惠阳大队，说我军偷袭不算数，约我军第二天在碧岭山坳会

战。侵略者既骄横又愚蠢，根本不懂我们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第二天，日军果然将炮兵步兵开到碧岭，疯狂地乱轰乱窜，而我们的部队，早已转移到三洲田山村里休息。

这次战斗，虽然战果不大，没有将日军全歼，但是政治影响非常大。日军连续两天炮击，等于给我军做了宣传员。惠东宝和港九各地的人民群众奔走相告：“曾生游击队打败了日本仔！”日军的炮声告诉我们的人民：“敢于作战，就能取得胜利”。

铜锣径伏击战，是我军在兵力火力均劣于敌人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能取得胜利，是我惠阳大队指战员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刻骨的民族仇恨，敢于“以劣胜优”。同时也是惠阳大队指挥员正确的战斗部署和作战指挥，他们选择了铜锣径这个险要有利的地形，使敌人无从发挥其优势；并且选在敌人到碧岭抢掠后疲劳回归时，突然发起攻击，正如兵书所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使敌人始终陷于被动挨打的窘境。

铜锣径战斗中，我军缴获的三匹日本军马也有了用场。这时候，根据张文彬同志指示写给余汉谋的公开信已经印好，惠阳大队把信和三匹马交由国民党的乡长送到淡水转到惠州国民党“惠淡守备区”指挥部。我惠阳大队政治委员谭天度还叫人在马背上写上了“曾生游击队缴获的战马”几个字。游击区和国统区的群众争相观看，拍手叫好。

在战斗中恢复和发展。一九四二年六月，总队领导同志

的分工重新作了安排,根据林平同志的意见,决定我回惠宝边来工作。回来后,听了惠阳大队的领导同志的情况介绍,脑子里反复思考着两件事:一是如何恢复和发展我们惠宝边这块抗日根据地;二是如何壮大我们的部队。

惠宝边抗日根据地,当时既不巩固,也还很狭小。中心地区是梧桐山以东、葵涌以西、坪山以南至沿海,面积约八百多平方公里。顽军一进攻,我军的回旋余地就很小。必须尽快扩展,我为此心急如焚。根据地形和当时的情况,我考虑首先应向西,向梧桐山周围扩展,以加强和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和打通与港九大队的陆上联络;同时还要向东,向大鹏半岛扩展。根据大岭山斗争的经验,开拓根据地主要有二条:一条是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民运队去发动群众;一条是有足够的武装部队去战胜敌人。

但是,那时在惠宝边区,我们还没有一支强大的民运队,惠阳大队的政训室还不健全,必须立即调一批比较强的政工干部来充实和加强大队政训室和民运队。在武装部队方面,我们只有惠阳大队这支部队,它既要同日伪军作战,又要进行反顽斗争,孤军奋战,力量显得单薄。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想方设法再组建一两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从那里着手发展我们的武装力量呢?我曾想到和我们联合打过梁永年的王竹青大队和莫炯炎、吴斌大队,能不能争取过来呢?考虑的结果是:不行。因为这些腐化惯了的杂牌部队很难争取,即使能争取过来,也不能巩固,更不能让他们

独当一面。于是我想到了我们编进王竹青大队那三个中队，他们虽然是地方游击队，但已经建立一年多了，也打了不少仗。对！应该适时把这三个中队拉出来，组建一支新的部队。

主意已定，我把加强惠阳大队政训室和民运队以及组建战斗部队的想法报告了林平同志。他和总队其他几位领导同志研究后同意了我的意见。

对于政训室和民运队的建设，很快从地方党抽调了黄秉、何武、黄达三、沙克等区委书记一级的干部来加强惠阳大队的政训室，并从地方党调来一批素质较强的党员、干部充实民运工作队伍，队长多是区委一级干部。

在大岭山区一年多的斗争，我深刻地认识到民运工作对开辟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为了提高和开展惠宝边地区的民运工作，我和惠阳大队党总支及政训室的同志，在一起研究讨论了民运工作的部署。根据在大岭山区开展民运工作的经验，和惠宝边的具体情况，以及我对开辟和扩大根据地的企图，讲了我的意见。经过充分讨论，决定由我和惠阳大队政训室主任叶锋来抓这一工作，民运干事黄秉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政训室的主要力量都投入到这一工作中去。

围绕着巩固中心根据地和扩展梧桐山周围及大鹏半岛等地区，我们组成了坪山、坑梓、横岗、西坑、田心、盐田、大鹏、龙岗、新圩、坪地等十个民运队，形成了整个惠宝边区的民运工作网。民运队的同志们，充分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

斗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他们深入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同命运，共进退。他们以自己的模范行动，通过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深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他们到哪里，就在哪里站稳脚跟，生根、发芽。为了开辟新区，民运队还要做部队的开路先锋。部队未到，民运队首先进入发动群众，以护路队、青苗队、联防队、姊妹会等政治彩色不是那么鲜明的形式，把群众初步组织起来，为部队的进入打好群众基础。经过一段时间巩固以后，进而组织抗日自卫队、青年抗日先锋队、妇女会、儿童团等进步倾向鲜明的组织。由于南委和粤北省委遭到破坏，南方局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一律暂时停止活动，惠阳县委转入地下。在这种情况下，民运队还要在群众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建立乡村基层民主政权，统一领导各种群众组织，开展各方面的工作。政训室还开办了民运工作训练班，集训新发展的地方民运队员，进一步扩大民运工作队伍，同时也为连队培训了政工干部。

一九四二年七月初，顽军在“三个月消灭”宝安阳台山区我军的计划破产，而改为耍“谈判”阴谋的时候，从第一八七师、保安第八团、徐东来支队集中了共约两个团的兵力，推进到淡水地区，准备向惠宝边我区大举进攻，因而形势顿时紧张了起来。惠阳大队只能担负一个方向的作战任务，对付顽军的一个团。怎么办？应该立即把编在王竹青大队那三个中队拉出来，组成一个作战单位，担负另一个方向的作

战任务。当时还想拉住王竹青和我们一起对付顽军。我经过考虑后,就把刘培、叶基、罗哲民、张东荃、吴海等同志找来开会研究。我分析了顽军进攻的形势后说:“能不能争取王竹青和我们共同反击顽军的进攻?如果能争取到,对其他杂牌部队也有影响。你们看可能性如何?”同志们谈了自己的看法,一致认为可能性不是很大,但可以试一试。我对张东荃(我们派给王竹青当秘书的党员)说:“你回去做王竹青的工作,告诉王竹青,张光琼(第一八七师师长)这两天就要来进攻葵涌了,要他接受上次张光琼借打我们之机,把他打垮的教训,要他注意不要让张光琼吃掉,最好配合我们一起行动,打垮张光琼的进攻。看看王竹青什么态度?”

当天张东荃回来汇报:“王竹青说,张光琼在淡水、龙岗增兵,是打你们游击队的,你们要小心。他不是来打我的,我会应付张光琼,请你们放心。”很明显王竹青已表示不和我们共同反击张光琼的进攻了。我们只有单独作战,于是当即决定按原来考虑的方案办。我对刘培等同志说:“张光琼就要来进攻了。根据情报,顽军分两路,一路从茜坑、坪山、金龟肚到葵涌;一路从坝岗、上下径心直扑葵涌,企图夹击我们于葵涌。你们三个中队今晚撤到金龟肚进行整编,编成一个独立中队,直属总队部,由刘培任中队长,叶基任副中队长,张东荃任党代表,罗哲民任政治指导员;陆上编三个小队、一个短枪队,海上编一个船队。整编之后,部队连夜转移到上下径心隐蔽待机,打顽军一个埋伏,给它一个下马威,



紧紧配合茜坑、坪山方向的惠阳大队作战，共同粉碎顽军的进攻。”停了一会，我又接着说：“你们中队今后的任务，在大鹏半岛和两湾（大亚湾、大鹏湾）活动，在战斗中壮大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开辟和巩固大鹏半岛抗日基地，开辟海上游击战场。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注意做好群众工作。”

就这样，惠宝边抗日根据地的又一支部队建立起来了，我心中很高兴。虽然这支新部队现在只是一个中队，但是我相信它很快就会发展成为一个大队。

独立中队成立的第二天上午，顽军开始进攻了。坝岗这一路是顽军第一八七师的一个营，独立中队在上下径心中间的山坳设伏。顽军这个营有五六百人，独立中队不足二百人。小部队打大部队，只能抓住机会咬他一口。前卫过去了，本队也过去了，当顽军的后卫部队进入伏击圈时，独立中队配置在山上两侧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打死打伤顽军数十人。后卫遭到我军伏击，顽军主力马上掉回头，向我阵地反扑过来。由于地形对他们不利，兵力展不开，攻不上来。独立中队边战边退，晚上撤至岭坳休息。坪山、茜坑的一路是顽军的保安第八团，遭到惠阳大队在田头山北麓节节阻击，进展缓慢，战至下午，顽军一无所获，只得收兵回巢。

独立中队初战告捷，士气高涨，活动很快开展。在陆上，他们同大鹏城农工民主党的联防自卫大队相配合；在海上，与港九大队的海上队相配合，有力地控制了大鹏半岛和大鹏湾。

十一月下旬，顽军在进攻宝安阳台山区的空隙，又拼凑了一个多团的兵力向我惠宝边区进攻，企图消灭我惠阳大队。这时惠阳大队按已定的向西发展的部署，把活动重点开始转向梧桐山地区，部队正集中在梧桐山北边的油田、西坑、桔子园一带休整。顽军也就跟踪而来，把进攻重点指向梧桐山地区。我回到惠宝边区后，大部分时间是和惠阳大队一起行动的，这时我正在大队部。顽军兵分三路，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向我军发起了进攻。惠阳大队在大队长高健指挥下，在西坑、桔子园山地展开迎击敌人。激战至午后，顽军占领了西坑、桔子园和通往盐田的大小坳等地。我军向梧桐山南麓的南山、庵上一带转移。我和大队政治委员谭天度来到庵上村。

庵上是一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半山小村，北距南山，南距大鹏湾海岸均约二公里，西南距沙头角约三公里。顽军占领盐田后，继续向南山我军进攻，高健组织部队顽强阻击了敌人。天黑以后顽军停止了进攻，驻扎在盐田一带村庄，等待着天亮后继续进攻。经过一天的战斗，我军的位置已经暴露，沙头角日军随时可能发动进攻。我军已处于日军和顽军夹击的危险境地，必须迅速脱出顽军的围攻圈，避开日军的攻击，以保存我惠宝边这支骨干部队——惠阳大队，再相机打击敌人。于是在夜暗的掩护下，全大队在盐田顽军和沙头角日军之间的空隙，悄悄地乘船渡过大鹏湾在九龙新界的榕树坳村登陆。晚饭后我和谭天度同志率领短枪队一部先

行,再渡大鹏湾到上洞村。随后,高健、叶锋同志率领大队也到了上洞登陆,我们在上洞海滩迎接他们。我开玩笑说:“高健,你们惠阳大队变成了海上陆战队,你也成了登陆专家了!”这虽是开玩笑,但也是事实。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在根据地还狭小的情况下,我们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有时就要利用大鹏湾和新界来机动回旋,成为“两栖部队”。部队登陆后,即转移到顽军侧后,以小队为单位,采取夜间扰敌,拂晓前突袭,杀伤敌人后迅速转移的打法,在马峦头、油田、山子吓、碧岭等地,打得顽军惊慌失措,防不胜防。到了九月底,顽军不得不撤出梧桐山地区。

惠宝边地区军民,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以“虎门队”和几支游击小分队为基础,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组建了惠阳大队和独立中队,积极出击日伪军,粉碎了顽军的进攻,恢复和发展了惠宝边抗日根据地,为尔后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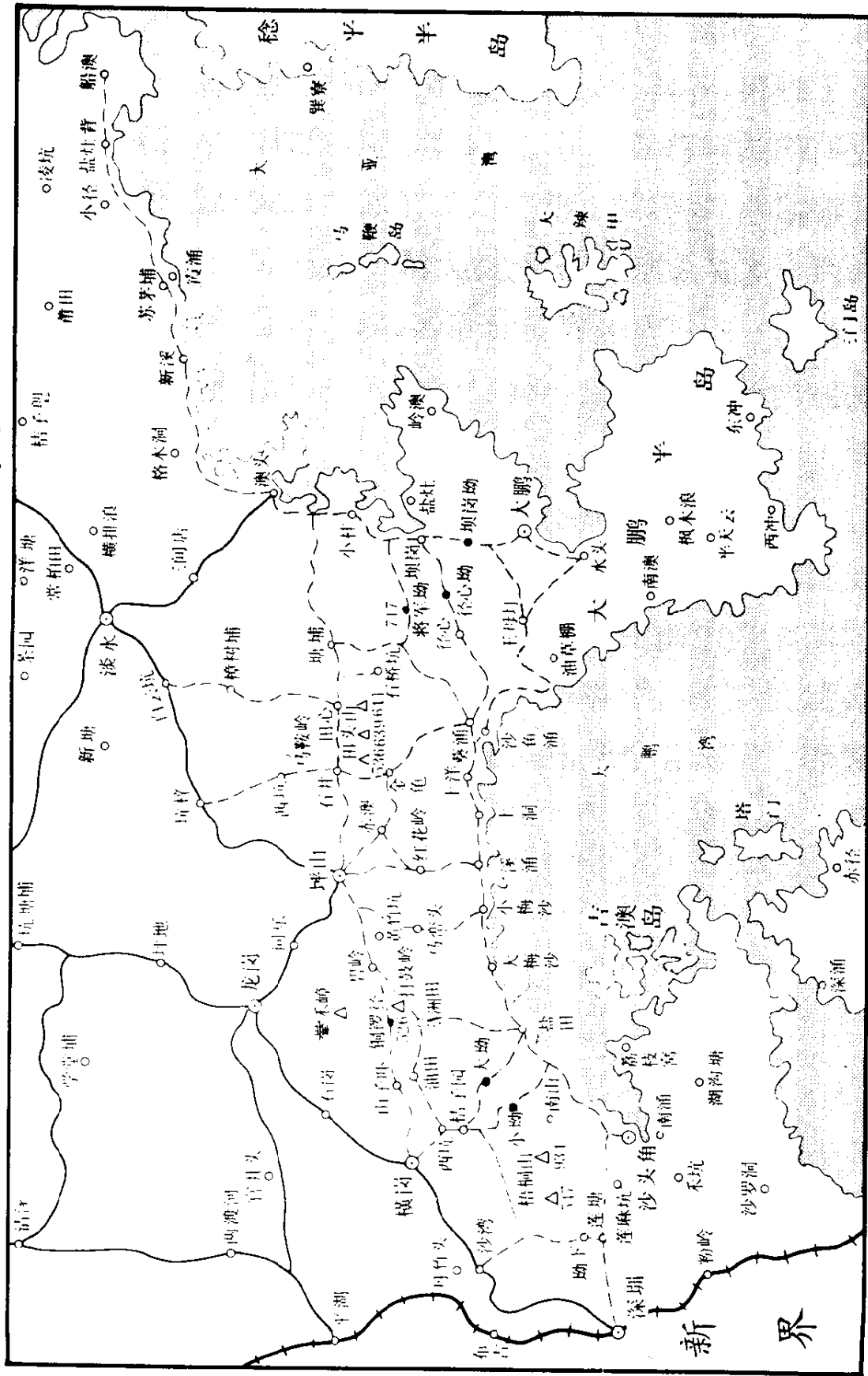
从一九四一年九月顽军先后大举进攻我大岭山和阳台山根据地开始,至一九四二年底,我们东江抗日游击队一直是处在日伪顽军的夹击下坚持艰苦的奋斗。由于我们根据地的军民共同努力,英勇作战,克服重重困难,付出了重大牺牲,终于粉碎了日伪顽军的进攻和“扫荡”。在东莞大岭山区,经过和顽军几度反复较量之后,抗日根据地逐步得到恢复,并且开辟了太平等敌后平原、水网地区的游击基地;在宝阳阳台山区,经过近一年的艰苦战斗,并付出了一定的代

价，终于粉碎了顽军持续的重点进攻；在港九地区，我们站稳了脚跟，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在惠宝边区，恢复和发展了我们部队东移后，一度被顽军占领了的以坪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我们的部队在战斗中壮大和发展起来了，由原来的两个大队发展为五个大队和一个独立中队，成立了统一的组织——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我们在东江以南，广九铁路两侧的抗日根据地已逐步形成了起来和开始走向巩固。

在这期间，全国抗战也是处于艰苦斗争时期，当时仍处在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还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制造“皖南事变”后，在全国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广东，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和广东粤北省委相继被破坏。广东各个游击区也都处在日伪顽的夹击中进行十分艰苦的战斗。

# 惠宝边地区略图

(图五)



## 第九章

# 独立自主开展新局面

### 乌蛟腾会议

一九四二年以顽军大规模进攻的失败而结束，一九四三年以我军积极主动反击日伪顽军而开始。我们熬过了十分艰苦的一九四二年，迎来了胜利的一九四三年。

但是，一九四三年的胜利，也是经过艰苦的斗争得来的。特别是上半年，天大旱，日军加紧封锁和掠夺，敌占区饿殍遍地，我们部队每人每天只有三两粮食，同志们还主动节约救济灾民。这一年，我军仍然是在日伪顽军的夹击下奋战，战斗更加频繁。经过一年艰苦的战斗，到年底，粉碎了日军成万人的包围“扫荡”。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不但全部恢复而且扩大了。我们之所以能够克服这样巨大的困难，获得胜利和发展，首先是解放了思想，对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这个方针和战略战术，加深了

认识,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南方局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决地反击顽军的进攻,摆脱了被动,争取了主动。

年前,正当大岭山、阳台山和惠宝边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艰苦激烈的反顽斗争的时候,我们通过电台向党中央、南方局作了汇报。十二月底,党中央转来南方局周恩来同志给我们的电报指出:“你们在任何时候都需准备好对付顽方及日寇两方面的可能进攻形势。”并决定成立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下简称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省临委由林平任书记,连贯、梁广为委员,负召集会议和统筹之责。军政委员会以林平为主任,委员待批准,统一领导和指挥东江和珠江三角洲部队的工作。

一九四三年二月,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为了贯彻南方局的指示,总结东江和珠江三角洲的斗争经验和部署今后工作,决定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在九龙新界沙头角区乌蛟腾村举行,故通称“乌蛟腾会议”。二月上旬,我正在惠宝边的三洲田山村部署了惠阳大队和独立中队袭击顽军纵深的据点,以牵制顽军对我区的进攻。林平同志派交通员通知我去开会。随后,梁鸿钧、王作尧、杨康华同志从路西,罗范群同志从中山都到我这里来了。我们一起下山乘船渡过大鹏湾,到九龙西贡,同林平同志会合后,转到乌蛟腾。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林平、连贯、梁广、梁鸿钧、曾生、王作尧、罗范群、杨康华、李东明等同志。林平同志主持会议。

会议一致认为,上述南方局的指示给我们指明了今后

还必须在日伪军和顽军的夹击下坚持艰苦的斗争，并恢复和加强了广东党和部队的统一领导。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将进一步加速开展全省城乡抗日游击战争和各项工作。

会议听取了各地区斗争情况的介绍，认真检查总结了东江和珠江地区对敌斗争的情况和经验教训，特别是反顽斗争的经验教训。大家认为，东江部队东移受挫的教训和接受党中央的指示重返惠东宝敌后地区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要在敌后地区坚持抗日武装斗争并求得发展，必须积极开展对日伪军的斗争，同时也不要怕同顽军打磨擦仗。回顾一九四一年九月以来，顽军集中兵力不间断地进攻我东莞大岭山、宝安阳台山和惠宝边抗日根据地，屠杀我抗日军民，血的教训擦亮了我抗日军民的眼睛，“坚持抗战必须反顽”。虽然我们各个根据地都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但是付出的代价则不一样。凡是按照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原则去进行的，付出的代价就小，反之则大。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会议期间，我们接连收到南方局周恩来同志发来的电报。周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电报批准了广东军政委员会成员的名单：林平、曾生、王作尧、梁鸿钧、杨康华、罗范群、林锵云。同时批准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领导干部调整的名单：总队长曾生，副总队长王作尧，参谋长梁鸿钧，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副主任兼组织科长李东明。



电报还指示：“加紧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缩小后方，充实战斗部队”。周恩来同志在二月三十日的电报中指示我们：在日伪军和顽军两面进攻的严重局势下，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应付险恶环境”，而且特别强调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对东江则势在必打，志在消灭”，要我们“万万不可忽略”。

会议一致认为，南方局一系列的指示，特别是“势在必打，志在消灭”这个八字的警示，进一步给广东党和部队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对于国民党中央的顽固派，他们要消灭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基本方针，我们是明确的。但是，对于国民党在广东的实力派代表人物余汉谋，我们有些同志的认识还不够清楚，若明若暗。广东是余汉谋长期控制的地盘，我们在这里生存和发展他怎么能容许？南方局的警示彻底地打掉了我们一些同志对余汉谋残存的幻想。回顾去年五月，我们按照张文彬同志的指示，上书余汉谋，提出制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发给番号饷械，划定防区。当时，虽然明确是作为斗争的策略，但是，当这封公开信草拟并刻印好，上送和散发的时候，顽军已经向我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疯狂进犯，我军民在反击顽军进攻中已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此时“上书”，即使不是希冀“与虎谋皮”，也是不合时宜的。这说明我们对余汉谋要坚决消灭我们的居心还认识不透，从而对顽军发动如此大规模，如此长时间的进攻也就估计不足，以致部署不当，消极防御，陷于被动，遭受损失。

从会议上和其他渠道了解到，四年多来，当我们在东江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珠江三角洲的兄弟部队,也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广州市及南海、番禺、中山、顺德等县沦陷后,珠江三角洲各县人民,在中共广东省委和各县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组建了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八年十月,吴勤(大革命时期南海县一带的农民运动领导人)在我党各级组织的指导和帮助下,在禺南(番禺县南部)组建了“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下简称广游二支队)。一九三九年二月,中共南(海)顺(德)工委林锵云同志组建了“顺德抗日游击队”。三月,刘向东同志任广游二支队政训室主任,在支队内建立了党组织,后与南顺工委合并,组成中共南番顺工委,书记林锵云,委员刘向东、严尚民等。一九三九年内,中共中山县委也先后在各区建立了抗日武装。一九四〇年六月,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成立,书记罗范群,委员林锵云、刘向东、严尚民等,统一领导珠江三角洲的抗日游击战争。九月,省委派了从延安调来的谢立全、谢斌同志来加强领导力量。同时,将顺德抗日游击队组成独立第一中队编入广游二支队。十一月,开辟了西海(位于顺德大良东北约九公里)抗日根据地,中心县委和广游二支队进入西海,从此西海成为领导珠江三角洲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心。

正当东江地区顽军进攻我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时,一九四一年七月,国民党第七战区长官司令部,即制定了消灭已完全置于我党绝对领导下的广游二支队的秘密计划,因而

那里的兄弟部队也进入了在日伪顽军夹击下的艰苦奋战时期。他们斗争很主动,很坚决。十月,他们在西海打了一场漂亮仗,歼灭了前来进攻的伪军第二十师的一个团,击溃两个团。接着日军一千多人进行报复性“扫荡”,也被他们粉碎。从一九四二年春开始,当顽军大规模进攻我阳台山抗日根据地时,珠江三角洲顽军配合日伪军,反复对我西海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广游二支队为了扩大回旋余地,和加强中山县的抗日游击战争,一九四一年九月派了一个中队到中山,与当地抗日游击队会合,一九四二年五月组成“中山抗日游击大队”,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开展五桂山周围的抗日游击战争。五月七日,广游二支队司令员吴勤同志遭国民党特务杀害,林锵云同志继任代理司令员,率队反击顽军挑起的内战。在六月中旬和七月上旬,两次攻击顽军驻顺德大良镇西北的林头据点,全歼顽军挺进第三纵队两个中队。十月至翌年二月,日伪顽军联合围攻我西海抗日根据地,广游二支队在强敌面前,根据南番中顺中心县委确定的“经营番禺,发展中山”的方针,将主力转出外线,一部分由谢立全同志率领挺进中山,加强中山的抗日游击队,发展五桂山抗日根据地;一部分由林锵云、谢斌和严尚民同志率领转到禺南,巩固大谷围抗日根据地。从而避免了重大损失,在新的地区求得发展。珠江三角洲兄弟部队的胜利斗争,对于我们东江是很大鼓舞。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确定,应该以积极主动反击日伪顽

军为我们部队行动的方针,以迅速改变被动地位,争取局势好转。为此,作出了几项决定:

第一、在全军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加强阶级教育,干部进行整风学习,进一步认清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本质,清除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幻想,鼓舞斗志,增强团结,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抗日力量。

第二、进一步深入敌后,发展新区,扩大我军回旋地带,积极寻找日伪弱点,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加强对日伪军的工作,作长期的布置。

第三、对顽军的进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第四、精兵简政,精简机关,充实下层,加强战斗连队。

第五、战斗队以精干小分队为战斗单位,加强主力部队建设,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增强战斗力,机动灵活地打小仗,掌握时机,适当集结力量,选择有利时机和孤立弱小之敌,给以歼灭性打击。

第六、加强外围武装建设。组织游击小组,建立和发展人民抗日自卫队,派出干部加强领导。

第七、干部进行整风学习,提高阶级觉悟,端正思想作风,提高工作质量和领导水平,加强党的领导作用。

第八、财政经济工作作长期打算,自力更生,开源节流,尽可能进行生产事业。

第九、建立和加强保卫组织,粉碎日伪顽军的破坏阴谋,正确执行锄奸政策。

第十、总队领导干部仍分散到各地区,加强领导。

省临委、军政委员会为了加强和统一领导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和适应珠江三角洲对敌斗争更加严重的局面,决定将地方党和部队的领导机构分开,成立中共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罗范群;并成立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指挥员林锵云,政治委员罗范群,副指挥谢立全,副指挥兼参谋长谢斌,政治部主任刘田夫,副主任刘向东。为了集中力量发展以中山县五桂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指挥部率主力从禺南转移到五桂山区。

乌蛟腾会议是广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进程中,克服困难,扭转被动,走向主动的重要会议。它使我们的干部在思想上消除了对国民党顽固派尚残存的幻想,确立了主动积极地进行反顽斗争和打击日伪军的方针,为打开东江和珠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尔后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会后,我回到惠宝边,向全体干部传达了乌蛟腾会议积极主动地出击日伪军和反击顽军,迅速改变被动地位,争取局势好转的精神。同志们也和我一样,精神振奋,信心倍增。

南方局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以及我们一年多反顽斗争的体会,使我们对国民党中央和广东地方实力派的阶级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思想上得到了解放,我们的精神面貌和斗

争方式也有了改变,主动积极,朝气蓬勃地开展各个方面的斗争,经过一九四三年一年的奋战,闯出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

## 路东部队的发展

胜利反击顽军的战斗。顽军对我东江各根据地进行了一年多的内战,以失败而告终。独立第九旅旅长叶敏予代替张光琼为“惠谈守备区”指挥官后,并调来徐东来支队,以及加强对王竹青大队、李乃铭大队、陆如钧大队、莫炯炎、吴斌大队等杂牌部队的控制。一九四三年我惠宝边军民,要与占绝对优势的顽军作战,斗争是非常艰巨的。

新年伊始,元月二日独立中队在反顽斗争中就打了一个主动进攻的胜仗,在坝岗坳歼灭了顽军陆如钧大队的一个中队。去年顽军的进攻屡遭失败后,又派出陆如钧大队等杂牌部队屯兵大鹏城、王母圩等地进行所谓“驻剿”,以切断我们进入大鹏半岛的陆上通道。我要求独立中队想办法去拔掉这个“钉子”,并对中队的领导干部说:“你们看哪块豆腐好吃就吃掉它”。独立中队在侦察到驻大鹏城顽军经常派出一个中队,到坝岗、小桂一带搜索、抢掠的情况后,决定吃掉这股顽军,选定在坝岗坳进行伏击。

坝岗坳是大鹏城到坝岗、小桂等地必经之路,地形险要,是打伏击的理想地方。二日拂晓,独立中队在刘培、叶基

率领下，按预定的作战计划进入阵地隐蔽。顽军果然出动，过坝岗坳后向坝岗、小桂方向开进。独立中队抓住顽军返回时，队伍稀拉、毫无戒备这个有利的时机发起了攻击。在机步枪火力突然猛烈的射击下，顽军乱作一团。副中队长叶基率领突击队一个冲锋，仅十多分钟即结束战斗，全歼该敌。我接到他们的战报后，十分高兴，立即写信表扬他们打得好，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多打这样的歼灭战。

坝岗坳歼灭战的胜利，对顽军震动很大。第二天，驻大鹏城、王母圩、澳头等地的顽军慌忙撤回淡水。顽军的“驻剿”被粉碎了，“钉子”拔掉了，大鹏半岛又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中。

顽军并不甘心在坝岗坳的失败，一心企图报复。从一月下旬开始，接连多次进攻我驻惠阳大队。第一次，顽军以两个营的兵力，经由西坑分两路向我驻盐田的惠阳大队进攻。一路经小坳，一路经大坳。经小坳的一路，遭到我们的一个小队阻击，不得前进。顽军遂将大坳的一路集中到小坳，进攻这个小队。当时我和惠阳大队大队部，在距离小坳约两公里的南山村。战斗从早上五时，持续到下午四时，顽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最后抬着十多具死尸和伤员狼狈败退。

一月三十日，顽军又向我驻梧桐山的惠阳大队进攻。这次是采取拂晓前偷袭的手段，我们的指战员在被动的情况下奋起抗击，将其击溃。这时，日军也出动配合，企图夹击我军，我们担任掩护任务的一个小队，巧妙地撤出了战斗，使

日军和顽军对打起来。这次战斗，顽军一个连长被击毙，全连伤亡惨重而致溃散。

顽军在连遭失败后，有半年多时间未敢踏入我根据地。坪山、龙岗、横岗地区已为我们所控制，惠宝边抗日根据地不但全部恢复，而且扩大了。惠阳大队和独立中队还经常深入到淡水周围活动。二月间，独立中队袭击了淡水镇以北约二公里半顽军设在洋塘的粮库，为部分基本群众解决了粮荒。惠阳大队先后四次出击淡水镇顽军据点，给顽军造成很大威胁，牵制了顽军对我惠宝边区的进攻。我们抓紧这段时间，巩固抗日根据地，开始建立基层民主政权，抓紧时间扩大部队。七月中旬，我们以独立中队为基础组建了护航大队。惠阳大队高健大队长率领一个小队和短枪队，采取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办法，将活动在沙湾、横岗一带的肖德青大队（自发组织的一支部队，他们不当汉奸，不以我为敌），改编为惠阳大队的一个中队（八十多人，重机枪一挺，长短枪数十支）。

八月一日，顽军独立第九旅又以一个营的兵力，向我盐田地区进攻。我惠阳大队以一个班的兵力，在梧桐山脚德光一带山地展开了麻雀战。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战斗，顽军不敢前进，只好收兵回巢。

九月十七日，顽军独立第九旅一个营和杂牌部队李乃铭大队、九龙大队各一个中队，向驻盐田的惠阳大队进攻。顽军的主力由龙岗、横岗而来，另一路独立第九旅的一个连



和李乃铭大队的一个中队，由坪山、三洲田向盐田迂回，采取钳形攻势。大队长高健率领一个独立小队和一个短枪队，预先埋伏在碧岭至三洲田的险要隘路，伏击迂回的顽军。他们放过了杂牌部队李乃铭的一个中队，采取“砍头，截尾、破肚”的战术手段，分割顽军正规连队的行军队形，分段歼灭，战斗历二十分钟结束，全歼独立第九旅的一个连。我政治服务员王定同志在战斗中牺牲。

这次战斗是一次出色的伏击战，是反顽斗争以来第一次全歼顽军一个正规连；它是敢于以少胜多的范例，顽军是两个连的兵力，而我惠阳大队只有一个小队和十几人的短枪队；它的特点是近战速决，伏击地区离敌人只有几米，二十分钟解决战斗。但是，战斗结束后，部队没有迅速远离战场，而是停留在三洲田村休息，做饭吃。四时左右，龙岗那一路顽军，由盐田迂回到三洲田，而我又疏于警戒，遭到袭击，展开激战，结果我们牺牲了大队参谋陈胜等五个同志。陈胜是一九三九年从马来亚回国参加抗战的同志。

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总队部通报全军吸取这个教训。教育我们的干部要认识到，游击战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无论进行伏击战或袭击战，都必须突然地打击敌人，迅速地解决战斗。战斗结束后，必须迅速脱离战场，正确地选择转移路线，转移到安全的地区，绝不能麻痹轻敌让敌人抓住。这样，我们才能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游击队所以要利用夜暗秘密而频繁地转移驻地，声东击西，迷惑敌人，都

是为了避免被敌抓住而陷入被动地位。因此，“走”是游击队避免被动或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方法。

顽军在三洲田受挫后，停止了对我惠宝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一九四三年惠宝边我军在乌蛟腾会议的精神指引下，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的胜利。

向梧桐山推进。梧桐山位于深圳东北面，大梧桐海拔九百四十四米，小梧桐海拔五百四十七米，山峦起伏，云山翠谷。山的东南濒临大鹏湾，与九龙新界的榕树坳、吉澳岛隔海相望；山的东麓是盐田、三洲田，与田头山毗邻；山的南麓是沙头角、莲麻坑、莲塘，与九龙新界相接；山的西面是广九铁路布吉至深圳段，紧接宝安抗日根据地；山的北麓是山子吓、横岗、六约、沙湾。

一九四二年夏，我们决定开辟梧桐山游击区后，惠阳大队政训室派出了较有经验的民运队，在政训室干事何武同志率领下，首先进入盐田、横岗地区开展工作。他们在盐田、横岗站稳脚跟后，向沙头角、莲塘、莲麻坑、沙湾推进。经过四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局面打开了，群众支持抗日的高涨。惠阳大队主力于十月初向西转移，十月十日首先在盐田坳背桥歼灭伪军一个班，驻盐田日军一个小队害怕被歼，缩回沙头角。

盐田解放后，日军在沙头角北面一公里的沙井头村，建立了一个外围据点，驻有伪军一个中队。它既挡着我军对沙头角日军的突袭，又卡住了盐田通往港九的咽喉，阻隔了惠

宝边抗日根据地和港九抗日根据地的陆上联系。为此，我们决定拔掉这个据点。一九四三年一月，惠阳大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争取了一名伪军作内应，突然发起了夜袭，结果只用了十多分钟即解决战斗，全歼伪军一个中队。这是一次不花老本打得干净利落的歼灭战。

二月中旬，为了开辟梧桐山西南面的新区，我要惠阳大队派出一个独立小队，由特派员王慕同志率领，深入到接近深圳的坳下村一带敌后活动，相机打击日伪军。坳下是小梧桐西南山脚的一个小村，东距沙头角约九公里，西距深圳约五公里，北距沙湾约四公里。二月十八日，独立小队到坳下已经两天，由于在该地收税、打土匪，目标已经暴露。驻深圳、沙湾日军根据坳下村伪保长的密报，出动近百人包围了独立小队，指战员们凭借山地丛林与日军展开了激战，英勇抗击敌人的进攻，战斗从下午三时进行到天黑，毙伤敌二十多人。敌人放火烧山，除少数突围、五人被俘外，包括王慕和小队长戴鼎在内，二十多位同志壮烈牺牲。被俘的五个同志被解押到深圳，遭严刑拷打，但他们坚贞不屈，一周之后趁天黑下雨全部越狱逃出，返回部队。

这次战斗，是我军重返惠东宝敌后以来较严重的一次挫折。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游击队的指挥员任何时候都不能麻痹大意，特别是深入敌后新区活动时，一定要及时地、频繁地、秘密地转移驻地，否则就有可能被敌抓住而陷入被动地位，遭受损失。

日军在沙头角外围沙井头的伪军据点,被我惠阳大队于一月间拔除后,又在沙头角与盐田之间,梧桐山东南角靠海边的陈贵村建立了一个伪军据点。六月初,惠阳大队经过周密侦察后,发起了夜袭,一举爆破成功,全歼伪警一个中队。从此日军再也不敢在这个地区建立外围据点了,而沙头角日军就直接暴露在我军的攻击之下。惠阳大队于夏秋间,在港九大队沙头角中队的配合下,曾数次攻击沙头角日军宪兵队和警备队以及莲麻坑矿山,虽然未能歼灭敌人,但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梧桐山周围的日伪军,不断遭到我军打击后,逐步收缩兵力,日军从横岗、沙湾等地撤走,只是在沙湾、丹竹头留驻伪军,作为深圳日军的外围据点。

十一月,我们为了进一步控制梧桐山西部和南部地区,并进一步打通同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决定由惠阳大队攻打丹竹头伪军据点。

丹竹头伪军据点在六月间遭我宝安大队袭击后,加强的兵力,沙湾和丹竹头共驻有伪军一个大队。惠阳大队进行的第一次攻击未能奏效。原因是侦察不够细致,和没有作好强攻的准备。战斗打响后,才发现敌驻地有一层很高的铁丝网障碍,攻不进去。

惠阳大队准备再次攻击。我在油田村召开了有总队部参谋处长周伯明、情报科长袁庚和惠阳大队领导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研究了再次攻击丹竹头的方案。

但第二次攻击亦未能奏效。原因是计算不准确，爆破用药量过大，又因地形限制，突击队距离爆破点过近，爆破后突击队全部被震晕，炸塌的墙又堵塞了突破口。调第二梯队投入战斗时，敌人已经惊醒过来，两个炮楼的敌人进行猛烈的火力封锁，我军一再冲击均未成功，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撤出战斗。

丹竹头两次袭击战没有打好，暴露了我们部队在战斗的组织指挥，战术、技术上都存在着问题。我要求指战员们不要气馁，要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提高组织指挥能力和战术、技术水平，打好以后的仗。

丹竹头战斗后，惠阳大队短枪队继续在丹竹头周围加强活动，而伪军遭我两次打击后，龟缩在据点内，再也不敢出来抢掠了。至此，惠阳大队向梧桐山推进一年来，虽然遭到一些挫折，但成绩还是很大的。梧桐山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已经和坪山中心区连成一片，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梧桐山西部和南部地区，除丹竹头、沙湾、沙头角三个据点外，广大地区已为我军控制。惠阳大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成熟，梧桐山上红旗高高飘扬。

挺进稔平半岛。稔平半岛在惠阳县的东南部，西濒大亚湾，与西边的大鹏半岛遥遥相对，东濒红海湾，隔海为海丰县的汕尾镇；半岛面积四百多平方公里，人口约九万，物产丰富，盛产鱼盐。稔平半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我们向东发展的重要基地。在我们控制了大鹏半岛之后，我就考虑到

我们下一步的扩展目标应该是稔平半岛。一九四三年的春夏之间,我就派了练铁、蔡端,曾城等同志到稔平半岛秘密开展工作,建立地下党组织,发展抗日自卫武装。

稔平半岛南端的暗街(现港口)等地,和大亚湾口的三门岛有日伪军据守。日军为了遏止我军进入大亚湾向稔平半岛及以东地区发展,收编了红海湾上龟灵岛的一批海匪,成立“中华民国广东省反共救国军海军第四总队第四大队”,从红海湾窜到大亚湾,停泊在马鞭岛一带海域,把整个大亚湾封锁起来,敲诈勒索大亚湾渔民和过往船只。大鹏半岛各地群众派代表到我独立中队,要求部队把这股伪军消灭,以解除他们的痛苦。中队长刘培向我反映了群众的意见,我同意独立中队去完成这一任务。

六月三十一日,独立中队转移到大鹏半岛东岸的岭澳村,群众纷纷控诉伪军的罪行,并要求参加战斗。群众说:“你们要船我们有船,要几条有几条;你们要人我们有人,要多少有多少。”群众高昂的战斗热情,大大增强了独立中队指战员打好这场仗的决心。依据侦察了解到的情况,独立中队领导根据指战员和群众的意见,决定组织短小精干的突击队,夜袭敌人。

七月六日晚,副中队长叶基率领十五人组成的突击队,分乘岭澳村六个渔民驾驶的三艘“小糟仔”渔船,伪装打渔接近敌船,突然发起攻击。经过四十多分钟的激烈战斗,全歼伪海军第四大队,击毙敌大队长陈强,缴获三艘“大眼鸡”

木帆船及全部武器装备，扬帆凯旋。我牺牲政治服务员叶振明、小队长魏辉、组长王健、政治战士刘光明四位勇士。

马鞭岛海上战斗的胜利，开创了我东江抗日游击队以三艘“小糟仔”吃掉敌人三艘“大眼鸡”，十六名勇士歼灭伪海军一个大队（百余人）的范例；写下了岭澳人民群众和部队一起英勇战斗的光荣诗篇。经此次战斗，我们建立和巩固了大亚湾的海上游击基地，粉碎了日军在大亚湾建立据点的企图，并为我军挺进稔平半岛创造了条件。

但是，要向稔平半岛发展，我们必须有一支大队一级的骨干武装，同时还必须有一支能控制大亚湾海域的海上武装。马鞭岛海上战斗后，我就考虑到应该把独立中队加以扩建，由它负责开辟稔平半岛。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游击队战略性的行动，必须向林平同志，向总队党委报告。正好这时总队部林平等同志来到了大鹏半岛，我向林平同志谈了我的打算。他十分赞同，立即召集在总队部的党委委员开总队党委会研究。会议决定把独立中队扩建为护航大队，迅速向稔平半岛挺进，并确定了大队领导干部的人选。

七月中旬，我带着总队党委的决定到了大鹏半岛的枫木浪，和独立中队的干部开会。在会上，我首先宣布：“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总队党委决定把独立中队扩建为护航大队，刘培当大队长，调曾源来当政治委员；叶基当副大队长，赖仲元（独立中队政治委员）调到大鹏区人民政府当区长。陆上部队编两个中队、一个独立小队，海上部队编两个中

队。”我明确指出：“护航大队的主要任务是以大鹏半岛为基地，向东发展，开辟稔平半岛，扩大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并打通至潮汕的路线，争取早日和韩江那边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联系起来。你们要团结新区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打击那里的日伪军，解放那里的人民，同时还要提高警惕，严防顽军的突然袭击。要注意做好群众工作，要不断壮大革命力量。”我根据总队党委的意图，对他们的行动计划作了规定：“叶基立即带第一中队进入稔平半岛，配合练铁、蔡端、曾城等同志，开展稔平半岛的武装斗争；独立小队，挺进到霞涌至稔山之间活动，保持与叶基的联系，调一个海上中队进入大亚湾，要牢牢地控制住大亚湾海域。”同志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表示坚决执行总队党委的决定，有足够的信心去开展稔平半岛的斗争。

要开辟稔平半岛，还必须有坚强有力的民运工作相配合。我决定从惠阳大队调出熟悉惠东地区情况的黄秉同志到护航大队来负责民运工作，把原属惠阳大队的大鹏半岛民运队划归护航大队领导。民运工作，根据我们给护航大队规定的行动计划，作了这样的部署：在稔平半岛，以巽寮为中心，向全半岛发展，配合第一中队的行动；在大亚湾北岸，以霞涌为中心，重点是澳头至霞涌，建立向稔平半岛推进的立足点，配合独立小队的行动，然后向蒲田、盐灶背、凌坑、大山口发展。各民运队应协同惠东党组织，迅速建立抗日自卫队等群众组织，在霞涌应建立海上抗日自卫队，配合海上



队在大亚湾开展活动。

叶基率护航大队第一中队进入稔平半岛后，以巽寮为基地，在练铁等同志组织的抗日自卫武装和民运队的配合下，团结争取了当地的开明士绅，建立了游击区，积极开展对日伪军的斗争。

九月上旬，顽军派王竹青率一个中队进驻澳头镇。一方面作为进攻我大鹏半岛的前进基地，同时企图阻止我军向东发展。我们先礼而后兵，派人去做王竹青的工作，希望他继续和我们共同抗日，保持以往的友好关系；或在顽军进攻时给我们通报；或让我们安全过往澳头。但王竹青这时已死心塌地跟国民党顽固派走，拒绝了我们的要求，于是我们决定消灭他。我从惠阳大队调了一个小队来加强护航大队的力量，由护航大队大队长刘培和新上任的惠阳大队政治委员会李东明统一指挥。作战方案确定后，部队在坝岗集结，我到了那里，作了动员，号召指战员们一鼓作气把王竹青部队消灭。然后部队开到盐灶海滩，我送指战员们登上海上队的武装船。

这是我们游击队进行的一次小小规模的登陆作战。我们游击队的“海军舰队”搭载着“陆军部队”，顺利地 在澳头以东的海滩登陆，白天隐蔽在离澳头约五公里的岩前村，封锁消息，进行战斗准备。晚上十一时，火力队占领了制高点，以火力控制敌人的营房，护航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赖祥率领突击队迂回接敌。被敌人发觉后，突击队即分为两个组冲

向敌营房。敌人企图顽抗，但在我突击队勇猛冲击和火力猛烈射击下，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举手投降。从战斗发起到结束，不到三十分钟，除王竹青本人逃走外，整个中队被我全歼。惠阳大队调来参战的那个小队的小队长李柯平同志在战斗中牺牲。这次战斗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大鹏半岛抗日根据地，打开了从陆上到稔平半岛的通道。

十二月，进入稔平半岛的护航大队第一中队，在暗街歼灭了伪盐警队，宣布暗街解放。这是我军挺进稔平半岛打的第一仗，虽然战斗规模不大，但政治影响很大。当地群众第一次听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到了稔平半岛并打了胜仗，兴奋地说：“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才是真正抗日救民的部队。”从而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我军出现在稔平半岛，国民党顽固派大为惊恐，一九四四年一月，调来了徐东来支队的两个大队配合驻稔山的杂牌部队陆如钧大队，对我进行疯狂“围剿”。徐东来的一个中队占领了霞涌，驻扎在苏茅埔小学内，卡住我军东进的陆上通道，进而企图集中兵力消灭我在稔平半岛活动的部队。为了粉碎顽军这一企图，巩固大亚湾沿岸基地，支援进入稔平半岛的部队，我决定由护航大队集中力量去消灭霞涌之敌。

护航大队集中了第二中队、大队部短枪队和海上部队，在刘培同志的率领下，于坝岗乘武装船在霞涌海滩登陆，会合已在霞涌附近的独立小队，占领苏茅埔后山后，即由赖祥率领担任突击任务的第二中队接敌。敌人发觉我军行动后，

依托围墙和房顶进行顽抗。我突击队三次冲击,都被敌猛烈火力所压制。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小队长范祥牺牲,大队长刘培、中队长赖祥相继负伤。天快亮了,我军被迫撤出战斗,乘船返回坝岗。

这次战斗,由于我缺乏攻坚器材,在敌人集中火力封锁大门的情况下,无法进入院墙内,因此未能歼灭敌人。但是顽军被我火力杀伤了四十多人,害怕我军再来进攻,第二天便慌忙撤回稔山,霞涌为我独立小队占领。顽军阻止我军东进的企图终于被粉碎。

斗争是有反复的。我军进入稔平半岛,消灭了暗街伪盐警队,对日军震动也很大,它为了继续控制稔平半岛和大亚湾,又调来了伪反共救国军第二大队重占暗街。我们为了与日军争夺大亚湾的控制权,和进一步开拓稔平半岛,决定由护航大队采取远道奔袭的战法,再次攻击又盘据在暗街的伪军。七月下旬,护航大队在代理大队长袁庚和政治委员曾源的率领下,从大鹏半岛的盐灶出发,搭乘海上队的武装船,隐蔽地渡过大亚湾,在稔平半岛的巽寮附近登陆,会合已进入半岛的第一中队,在夜幕掩护下进入暗街,占领了制高点,控制敌船出海口,包围了敌人。接着发起突然猛烈的攻击,经过约一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包括大队长黎强在内的伪反共救国军第二大队,第二次解放了暗街。这次战斗,对我们这支抗日游击队来说,是较大的一次歼灭战。它给了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进一步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

暗街战斗胜利之后,为了抓住这个有利形势,发展我军的胜利,我们考虑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消灭平海的国民党盐警中队。平海位于稔平半岛的东南部,是国民党在稔平半岛的政治经济中心。九月下旬,护航大队主力由刘培、袁庚率领,从坝岗乘海上队的武装船在巽寮以南登陆,会同已在稔平半岛的第一中队和独立小队,经过近一小时的战斗,全歼了盐警中队。

暗街战斗和平海战斗的胜利,不仅使我军在稔平半岛站稳了脚跟,进一步巩固了稔平半岛这块抗日游击区,而且使我海上部队得以把活动范围护展到红海湾,为我军继续向东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总队领导机关转移到路东,驻在大鹏半岛、土洋等地。自乌蛟腾会议以来,我们总队几个领导同志就没有集中过,王作尧同志在东莞,梁鸿钧同志在宝安,他们一直在领导着那里的斗争。而今我们在形势好转,惠宝边抗日根据地空前巩固的情况下汇合了。大家畅谈了近一年来斗争的情况。我谈到了路东部队经过近一年的艰苦战斗,虽然受了些挫折,有些仗没有打好,但是惠宝边抗日根据地的局面打开了。部队壮大发展了,护航大队建立了起来,惠阳大队得到了扩大,我们在惠宝边有了两支坚强的骨干队伍。抗日根据地不但全部恢复而且扩大了,从坪(山)龙(岗)横(岗)中心区,西到梧桐山周围,东到大鹏半岛和大鹏湾、大亚湾海域,已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中,并且

开辟了稔平半岛游击区,为创建惠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并展现了不断向东扩展的势头。

我从大家的谈论中也较详细的了解到,路西部队比路东部队在更加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指战员们奋战在宝太、莞太公路和广九铁路线上,主动出击日伪军,并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路西大岭山和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已经没有顽军的踪迹,两块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各个大队发展壮大。第三大队已经不是我在那里时的情况了,已经成为一个足数的大队。在广九地区,抗日根据地已经初步建成。港九大队不仅牢牢控制了九龙新界的广大乡村,并且进入九龙、香港市区和开辟了大屿山区。我们的部队和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了,对于同志们经过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得来的这些成果,我感到非常宝贵,也因而十分激奋。

## 路西部队主动出击

在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珠江队”在宝安大队的配合下,在阳台山以西地区,在反击顽军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向日伪军出击,捷报频传,战绩显著。宝安大队其余部队,在阳台山以东龙华、布吉地区,也在艰苦地坚持战斗,抓住战机打击日伪军。

“珠江队”在队长彭沃、政治委员卢伟良率领下,从一九

四二年十月起就活动在阳台山以西、宝太公路和珠江以东一条狭长的、日伪军和顽军据点之间的夹缝中(东西宽约十五公里,南北长约二十五公里)。在西面,宝太公路沿线的松岗、沙井和新桥、福永、西乡、南头等地都驻有日伪军;在东面,公明、乌石岩、龙华等地为顽军占领着,并经常到宝太公路上进攻我军。“珠江队”就是在这种敌强我弱,日伪军和顽军两面夹击的条件下,坚持斗争的。他们的斗争和生活很艰苦。但是,尽管环境这样险恶,“珠江队”的勇士们一直积极寻找战机,主动向日伪军出击。

四打西乡。西乡位于宝太公路南段,离南头约五公里,是南头日军的外围据点,驻有伪军“爱国义勇队”一个中队,每天派出一个班到桥头碉堡警戒,盘查勒索过往群众。一九四三年二三月间,“珠江队”四次袭击了这伙伪军。第一次,夜袭没有奏效。指战员们总结了教训,改变了打法,灵活地运用战术,第二、第三、第四次接连取得胜利。

第二次袭击,改在白天进行,突击队化装成担柴卖的农民接近桥头,一举歼敌一个班。这次袭击后,敌人提高了警惕,盘查更严。他们第三次袭击又改变了打法,夜间派突击队潜入桥头敌碉堡内,拂晓待敌接近时,突然攻击成功,再歼敌一个班。经过两次挨打以后,敌人拂晓出来时,改为以一个排的兵力,分两个梯队搜索前进。“珠江队”第四次袭击也变换了打法,突击队于夜间潜伏于西乡出口两侧的破屋内,待敌人出了街口,突然发起攻击,全歼敌一个排。

“珠江队”四打西乡伪军的战斗，是我游击队机动灵活作战的范例。他们在同一地点对同一敌人，每次的打法都不一样，使敌人抓不住我军的规律，防不胜防。这种经常变换战术的打法，是游击战灵活性的充分体现。

福永攻坚战。乌蛟腾会议后，为了贯彻针锋相对打击敌人的方针，总队部派参谋处长周伯明负责研究解决攻坚问题。周伯明同志从港九大队搜集了一些炸药，到“珠江队”抽调人员进行爆破试验，几经失败，到四月中旬，终于取得了成功。

我们全军各部队，开展“红五月战斗竞赛”。“珠江队”决心打个漂亮仗，作为红五月的献礼。对象早已选好了，就是驻在宝太公路中段福永的吴东权伪警大队一个主力中队。吴东权是死心塌地投靠日军的汉奸警察头目，去年曾经配合顽军卡断我队联系东宝的交通线，是我们“珠江队”的老对手。他们盘踞着福永这个重要据点，凭着炮楼固守，威胁着我们的活动。这个炮楼有两层墙壁、牢固的铁门，外面还围了铁丝网，“珠江队”打过两次都攻不进去。

五月二日，“珠江队”决定第三次打福永。在此之前，他们派出一个班长，化装进入福永住了一个星期，进行了反复的侦察。为了直接掌握情况，突击队长邱特又化装进入福永住了两天。从而把福永驻敌的人数、武器装备、兵力部署、防御设施、生活规律、哨兵位置、接敌道路、爆破目标等，摸得一清二楚。据此，他们决定采取夜袭、攻坚、打歼灭战的办法

消灭福永之敌，并制订了十分周密的作战计划。战斗从夜间十时左右发起，主攻部队很顺利地进入了福永，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冲进敌炮楼围墙，爆破组很快就找到爆破目标，一举爆破成功，敌炮楼的铁门连同里层的铁栅都炸开了，突击队冲进敌炮楼。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战斗，全歼守敌一个中队，缴获包括轻机枪六挺在内的全部装备。

为民除了一害，福永的群众非常高兴，纷纷走出来向我们祝贺。我们部队作了一番宣传，把缴获的粮食分给群众，便带着胜利的豪情踏月而归。

总队部通报表扬了以“珠江队”为主的这次战斗，他们在红五月战斗竞赛中首战告捷，获得了可喜的战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我军的斗志，增强了我军打歼灭战的信心。而且这次爆破攻坚的成功，全歼守敌，为我军普遍开展爆破攻坚战、地雷战，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从而提高了我军游击战术的水平，增加了我军歼敌的手段。

虎口拔牙。“珠江队”发扬连续战斗的作风，根据总队部的指示，又在五月二十六日袭击了沙井的伪军。

沙井是伪军一个重要据点，驻有伪军第三十师第一一九团八百人左右，配有迫击炮两门、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十余挺，战斗力较强。我们侦察到其中的第一营第一连和一个通讯排态势比较突出，于是决定袭击第一连，并尽可能消灭那个通讯排。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要歼灭敌人一个建制团中的一部分，谈何容易！更何况距离沙井约二公里多的新桥



驻有日军一个中队。可是，“珠江队”的勇士们就有虎口拔牙的胆量和决心。

这天夜里，部队在夜暗的掩护下接敌，担负主攻任务的第三小队向敌第一连进击，解决敌哨兵后，冲进屋里，将敌连长、副官等五人击毙。就这样，这个第一连被我们解决了。与此同时，第一小队也迅速地解决了敌通讯排。敌团部和其他连队听到枪声，赶来增援，担任警戒的第二小队，用火封锁敌人的来路，掩护第一、第三小队转移，待敌人向这边开炮的时候，我们早已撤出战斗了。这次战斗，由于计划周密，配合得当，只用了二十分钟，全歼伪军一个连又一个排。我们的班长何恩俊同志在战斗中牺牲。

反击顽军。在我军主动出击日伪军的时候，顽军又来向我们进犯，“珠江队”和宝安大队密切配合，击退了顽军的进攻，并且主动向顽军反击。

八月三日，驻乌石岩的顽军三百余人分两路包抄宝安大队第一中队，“珠江队”立即派出两个小队分路支援，配合作战，击溃来犯之敌。

九月三十日，“珠江队”指挥“钢铁队”（港九大队的长枪中队），在乌石岩附近的石龙仔伏击顽军，歼敌一个排。

十月十一日，总队部再次部署出击进攻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顽军徐东来支队，“珠江队”统一指挥宝安大队和“钢铁队”夜袭广九铁路塘厦车站徐东来支队部的通讯机关，歼敌一部，缴获敌人全部无线电通讯器材及电话总机。

十月二十四日上午，“珠江队”又袭击了观澜大埔巷的顽军。我们这次敢于白昼出击，对敌人威胁很大。但是，在战斗中，我们的小队长刁亮同志负了伤，抬回来以后经多方救治无效牺牲了。

松岗打“麦老虎”。十月二十六日，“珠江队”袭击了松岗伪军麦永中队。麦永盘踞在这个宝太公路上的重要据点，勒索欺诈，群众称他为“麦老虎”，要求我们惩办他。伪军内部一些人对麦永也很不满，愿为我军作内应。当晚，我军通过内应带路，包围了麦永的住所和炮楼，全歼守敌，缴获包括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的全部装备。麦永从屋顶逃出顽抗，被我们击毙。

我们原来计划是要生擒麦永，开大会公审的，现在却打死了，群众更加高兴，年青人放起了鞭炮，老年人到庙里谢神还愿。这次战斗胜利，进一步密切了我们的军民关系，鼓舞了斗志，瓦解了伪军，拔除了伪军据点。

“珠江队”不愧为我们的主力部队。他们在宝安大队和“钢铁队”的配合下，在那样狭小的地区，在日伪军和顽军的两面夹击之下，一个中队又一个中队地歼灭敌人，打开了宝太公路沿线的斗争局面，改变了敌我态势，夺取战场的主动权，提高我军的士气和歼敌信心。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能迅速恢复，他们是有很大功劳的。

宝安大队和其他大队一样，也转变了战斗作风，主动积极打歼灭战。五月上旬，紧接“珠江队”福永攻坚战之后，他

们夜袭固戍伪军，全歼伪警一个中队，缴获包括轻机枪七挺、驳壳枪二十四支的全部武器装备。六月下旬，大队政治委员何鼎华亲自率领三个独立小队和一个短枪队夜袭沙湾丹竹头伪军刘华部，歼敌一个排。两次战斗，取得了强攻打歼灭战的胜利，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对部队鼓舞很大。

在东莞，在王作尧同志的领导下，邬强、卢伟如同志率领第三大队在大岭山区，靠近宝安的霄边附近以及莞太公路沿线，积极主动打击日伪顽军，活动地区逐渐恢复和扩大，打了许多胜仗。

二月中，第三大队在莞太公路上对伪军展开袭击，并且挺进到莞龙公路温塘一带袭击日伪军。

四月，日军部署在东莞城区及莞太公路线两侧全面“清乡”，任命了东莞县汉奸土匪头子张葵寿为“清乡委员会主任”。我们总队部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经研究派保卫科长何维率领精干的锄奸队潜入东莞城，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惩处了张葵寿等汉奸，打乱了日军“清乡”的计划。

五月十日，第三大队出击宝太公路伪军第三十师的据点，歼敌一个排。十八日，又出击怀德伪军麦定唐部，再歼敌一个排。

七月五日，第三大队主力中队夜袭东莞城南边三公里的篁村，这里驻有伪军第三十师的一个连。中队长黄布化装侦察了两次，为了弄清伪军住地内部的情况，又派地方党员进入敌驻地内侦察。把情况摸得很清楚。因而战斗进行得

非常顺利，突击队摸掉伪军哨兵，主攻队跟着冲进伪军住的庙里，伪军在睡梦中就当了俘虏。只用十分钟就解决了战斗，全歼敌人一个连。

夜袭篁村的胜利，正好作为对“七·七”抗战六周年的献礼，开会祝捷，大队领导推广了主力中队打歼灭战的经验，同志们斗志更高了。

第三大队乘胜前进，七月底，又奇袭了东莞茶山，全歼伪军一个中队。八月中旬，又围攻北栅伪军麦浩、陈淇部，再歼伪军一个中队。

北栅战斗后，第三大队主力集结在治平乡休整。顽军黄文光、刘光大队及独立第九旅一个营分三路向我治平乡进攻。我军集中主要兵力，先击溃顽军向黄潭、大径进攻的一翼，接着，又打垮从怀德包抄我部的独立第九旅一个营。缴战了一天，毙伤敌四十余人，我方也伤亡了二十多人。

在我军的一连串的胜利影响下，经过我们深入细致的争取和教育工作，九月四日，伪军第三十师一个连，在连长李正的率领下，向我第三大队投诚。十一月十一日，伪军第三十师第八十九团代团长兼第一营营长梁德明，经过王作尧同志争取教育，黄琴同志深入策动，在厚街带领第一营和一个机炮连起义，开进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

为了加强东江北岸罗浮山地区及广州外围的游击战争，六月初，总队部从宝安抽调兵力，挺进博罗罗浮山地区，在增城、博罗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成立了独立第二大队，

由阮海天任大队长、何维任政治委员，在增城和博罗西边一带活动。七月中旬，日军一百余人和伪军李潮部二百余人乘船溯东江而上，袭击我们在上、下南的部队，我军与日伪军激战一天，毙伤日军二十余人、伪军三十余人。八月，独立第二大队主动袭击驻博罗西部铁场的博罗县伪警察第二中队，全歼守敌一个中队。九月，又袭击了联和圩歼灭伪联防队。他们以连续的战斗行动，在增博边打开了局面。

### 粉碎日军大“扫荡”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九月，意大利法西斯宣布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中也面临败局，它准备以中国大陆为基地进行垂死挣扎。为了发挥香港和广州两个中转站的作用，华南日军发动了打通广九铁路的战役。这个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占领广九铁路沿线各个据点；第二阶段，“扫荡”我东宝抗日根据地，以巩固它所占领的广九铁路各个据点。

从十一月十一日开始，日军发动了对广九铁路沿线的进攻，原先盘踞在常平、樟木头、塘厦、天堂围、平湖一线，专门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顽军独立第九旅、徐东来支队，一枪不发，向后溃逃。日军久留米师团占据了铁路沿线，准备修复铁路、桥梁、车站，打通广州到香港的铁路交通。

由于我活跃在铁路以西的东莞、宝安部队，不断地打击

日伪军,对敌人威胁极大。日军认为,要确保广九铁路这条交通命脉,必须先消灭我坚决抗战的游击队,才能解脱广九铁路的“治安之癌”。于是拼凑了大量兵力,向我们东莞、宝安两地进行空前规模的“扫荡”。

东莞军民粉碎日军“万人大扫荡”。十一月中旬,日军第五十七师团主力两个联队,驻东莞城、石龙、太平的日军以及伪军第三十师等合共九千多人,采取“铁壁合围”的战术,向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万人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们东莞地区的主力。

十一月十八日,我们在东莞的部队,主力集结在大岭山周围,寻找战机,打击进犯广九铁路的日伪军。拂晓,在三处发现日军。王作尧同志率领“珠江队”从东莞回宝安的路上,宿营于莲花山下,清晨发现日军,王作尧和彭沃同志立即指挥队伍登上山头,与敌展开战斗。激战到八点多,毙伤敌人十多名,我方牺牲了两位战士,彭沃也扭伤了脚,于是撤回大岭山区大王岭去。这时,第三大队的第一中队在怀德、远丰同从太平方向开来的日军展开战斗,在中队长黄布指挥下节节抗击,至下午三时,向大岭山顶撤退。邬强、卢伟如同志率领大队部和其他中队驻在大王岭,总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同志也随他们行动。这天早晨,发现一路日军从连平方向开来,同时,在大王岭前面杨屋村、大塘方向也发现日军向我方扑来。邬强同志集合队伍上到村后的山上,准备战斗。不久,王作尧和彭沃同志率“珠江队”来汇

合。几位领导同志立即分析当前的形势，认为日军重兵包围我们，情况很危急。为了保存抗日力量，决定黄昏后从日军接合部的间隙分路突围。

突围的部队分成三路：第一路，王作尧、杨康华、邬强、彭沃同志率领“珠江队”，翻越水濂山在大雁塘、山门之间出莞太公路，进到大埔村。第二路，卢伟如同志率领第三大队主力，经黄潭后面的小山从大雁塘、榕澍界之间向莞樟公路转移。第三路，黄布同志率第一中队经大径、张加山山沟转出，进入莞太公路的桥头、白壕一带隐蔽活动。

我们部队突围的方向，大大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原来他们估计我们一定会向南突围去宝安，已经部署伪军第三十师在霄边到梅塘一线准备堵击，截断我军的去路。但敌人的打算落空了。

日军成万人包围了我们的部队连同抗日自卫队上千人，而我们依靠群众的支持，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全部突围出来了，保存了部队的有生力量。我认为这是个很大的胜利，是游击队在敌人重兵“扫荡”的情况下，摆脱被动地位，恢复主动地位，粉碎敌人“扫荡”的一种有效的手段。

到了第二天拂晓，日军果真按时向其围困着的大岭山发起了总攻。在炮兵、航空兵火力准备后，分路扑上各个山头，所得的只是一堆堆沙石。一场苦心策划、劳师动众的“铁壁合围”，就这样破灭了。我军早已安全地转出外围，深入敌人的心脏，部署新的战斗了。

部队突出重围后,为了调动敌人,减轻敌人对大岭山区的压力,在敌后积极展开行动。在莞太公路沿线的部队破坏公路、桥梁和电线。短枪队进入东莞城一带活动,捉汉奸,撒传单,搞得东莞城满城风雨。在莞樟公路沿线的部队,袭击茶山、横沥、常平,直接威胁广九铁路。同时,总队部命令宝安大队配合行动。他们袭击了西乡敌人的飞机场,击毁敌机两架。这样东打、西打,迫使敌人把进入大岭山区的重兵撤回。

经过“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日军劳师无功,加上兵力不足,只好留下少数日军据守东莞的重要据点,把主力撤走,我军乘敌空虚,打下了许多日伪军的小据点,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部队。

宝安军民粉碎日军的连续“扫荡”。日军在东莞大岭山区的“万人大扫荡”失败之后,十一月下旬,又对宝安阳台山区发动了连续“扫荡”。

这时,我们在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有较多的兵力,梁鸿钧同志率领宝安大队一直在这里,“珠江队”由王作尧同志率领刚从东莞突围过来,在东莞起义的一个营正在这里整训,加上独立小队、脱产民兵,约有一千的兵力。日军“扫荡”东莞大岭山区落空,锋芒已大为减弱。因此,我军决定与敌周旋,伺机予以打击。

十一月二十二日,日军五百余人,分三路进犯布吉、龙华。第一路沿布龙公路向龙华推进,我军在板田附近伏击来



敌,打得日军狼狈逃回。第二路沿乌石岩和大船坑向龙华合围,我军预先占领了乌石岩至龙华之间的石坳山口,居高临下,截击敌人,敌人发动几次冲锋都被打退,只好撤走。第三路由梅林坳冲进了龙华,大肆劫掠,被我军包围阻击,敌军龟缩不出,到深夜才分路逃走。

十二月四日,日军五百余人由南头、布吉、深圳、天堂围、塘厦等地分路出动,以乌石岩为中心,对我军包围“扫荡”。一百多日军由天堂围经观澜、白花洞,大水坑向乌石岩推进,我军在大水坑进行伏击,激战一天,敌军被我们大量杀伤,被迫爬过白花洞山上逃走。这一天,布吉方面的日军二百余人,沿布龙公路向龙华进犯。到了雪竹径,分成两路,一路由板田推进,一路转向岗头仔。我军在岗头仔还击敌人,打得他们掉头逃窜,我军绕到青湖截击,敌人只好逃回布吉。

日军对宝安阳台山根据地的连续“扫荡”,就这样被我军粉碎了。

至此,作为日军打通广九铁路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目标的“扫荡”我路西东宝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就全部破了产。而我军在粉碎日军的“扫荡”后,主动向日伪军出击,加上日军主力他调,日伪军只能龟缩在宝太、莞太公路和广九铁路沿线各孤立据点,再也没有能力向我路西东宝抗日根据地进攻了。至于广九铁路,日军表面上是打通了,但始终未能对全线有效控制,而其“全线通车”的计划更是成了泡影。

## 港九根据地逐步扩大

日军占领香港后,就把它作为对太平洋,特别是作为对东南亚各国作战的中间枢纽,无论在兵力调动、军需补给、舰艇修理,飞机中途加油等都以香港为基地。为了控制这个战略要地,加强对香港的统治,日军占领香港不到两个月,即宣布香港为“占领地”,任命陆军中将矶谷廉介为香港总督,并加强外围防守和境内控制。日军在港九地区,在其总督统辖之下,有一支三千人的警备队和一支宪兵队,在港九各地遍设派出所和派遣队。每个派遣队约有宪兵三四人,辅助宪兵(警备队派出)十人八人。另外,还有在香港招募的军警和便衣宪查二三十人或五六十人。因而港九地区就成为军警林立之地。

我们港九大队成立后,开始时主要活动于西贡半岛、沙头角和大埔、元朗等地。我们挺进港九的各个短枪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把当地的土匪大部分消灭,一部分被我赶跑。通过这个行动,我们的部队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在各地获得了立足点;并发动了群众,建立了抗日自卫队,常备队、护村队等形式群众自己的武装组织。为了充实这里的干部和骨干,我们采取了很多办法,如陆续从内地各根据地抽出干部调进去;将日军占领香港后,到根据地来参加部队的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经过短

期训练后派回去；通过香港地下党组织继续动员青年工人、学生参加部队；粤北省委被破坏后，从后东地区撤出一部分共产党员调到港九大队；各个短枪队在各地区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培养为骨干；等等。到了一九四三年春夏以后，以各个地区以短枪队为基础，先后组建了西贡中队，沙头角中队、元朗中队、大屿山中队、海上中队、市区中队。

在港九这个地域狭小，回旋余地不大，而又是敌人军警林立的地区，港九大队进行的游击战争，主要采取隐蔽斗争的形式，着重发挥短枪队机动灵活的特点，运用奇袭、伏击等游击战术打击敌人。因此，各地区中队均编有短枪队，大队也直属一个短枪队。大队短枪队是一支十分精干的队伍，共二十人，队长黄冠芳，政治指导员李唐，副队长刘锦进（刘黑仔）。黄冠芳果断沉着，刘黑仔勇敢机智，十多名队员个个生龙活虎。他们采取高度灵活的战术，斗智又斗勇，来无踪去无迹，神出鬼没，声东出西。他们在沙田地区展开活动，以观音山、吊草岩一带为依托，频频出击，经历了数十次战斗。他们深入敌人的要害部位，发动奇袭，屡获战果，使敌人闻风丧胆。他们许多传奇式的英雄业绩，在港九广为传诵。

观音山、吊草岩一带是在日军包围中的小块三角地，共有十多个村庄，稍有麻痹就会遭到敌人袭击。为了安全，短枪队白天化装活动，派出自卫队到各个路口放哨，还在周围建立了十多个宿营地，经常变换驻地。日军在不少村庄安插了汉奸、密探，搜集我游击队活动的情况，短枪队把肃清当

地的汉奸走狗作为头一个任务。他们先后肃清了牛皮沙村、沙田围村，沙田头村的汉奸密探，拔掉敌人的爪牙，堵塞了敌人的耳目，发动了群众。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日军企图打通广九铁路和对我路西东宝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时，总队部命令港九大队进行牵制。港九大队决定由短枪队去攻打沙田到大埔之间守备四号隧道的敌人。他们扮作民工接近隧道，突然发起攻击，首先解决了印度兵，日军增援后又与之展开激战。击毙日军二名，缴步枪十支。接着又袭击了窝塘的日军兵营。由于侦察细致，短枪队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兵营，将十二个日军全部击毙于睡梦中，缴获其全部武器。

由于指战员们的英勇战斗，民运队员们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港九大队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展。初期主要的活动范围是西贡的赤径、嶂上、沙头角的南涌、乌蛟腾、元朗的八乡、十八乡等，和离市区交通要道、圩镇较远的山区。一九四二年夏，向沙田地区发展，建立了观音山、吊草岩一带为中心的基地，迫近了九龙市区。在沙头角地区发展到铁路线上的上水、粉岭、大埔等圩镇。到一九四三年秋，又开辟了大屿山区，并发展到市区，深入到敌人的统治中心。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展，港九抗日根据地逐步地建立了起来，与惠宝边抗日根据地和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互为犄角，当顽军以优势兵力进攻时，惠阳大队数次转移到港九的沙头角地区，增大了我军的回旋余地。一九四三年，总队部的电台一直架设

在乌蛟腾附近的石水涧村。我曾数次到港九大队去,代表总队检查他们的工作,对他们的斗争给予肯定和表扬。

乌蛟腾会议后,至一九四三年底,我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与日伪顽军进行大小七十多次战斗,原惠东宝抗日根据地已经完全恢复,并且向莞太、宝太等公路和广九铁路沿线以及大鹏湾、大亚湾沿海扩展,同时建立了港九抗日根据地。我们的部队已经发展到三千多人,脱产的抗日自卫队近千人,从而打开了东江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我们之所以能在重重困难中胜利发展,主要是我们各个部队,贯彻执行了乌蛟腾会议的精神。除了军事上力争主动外,大力加强了部队的、特别是战斗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是重要的因素。

乌蛟腾会议后,总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也以积极主动的新姿态出现。总队政治部抓了干部的整风学习。杨康华同志调来了很有宣传教育经验的林鸮(林之原)同志,在东莞办了几期整风学习班。后来在惠宝边又由原粤北省委的宣传部长黄康同志和李光中同志办了几期整风学习班。由各大队抽调干部去轮流学习,从而使干部提高了政策水平,端正了思想,增强了党性。五月,总队政治部在东莞召开了有各大队负责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参加的、全军性的政治工作会议,主要是研究和决定深入贯彻乌蛟腾会议精神,加强部队的阶级教育,加强各大队的政治工作机构,加强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 第十章

# 成立东江纵队

### 公开高举党的旗帜

一九四三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英美在太平洋战场加紧对日军进攻，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在国际和国内反法西斯武装力量打击下，被迫宣布投降，德意日法西斯联盟开始瓦解。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进攻。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敌后战场上遭到我解放区军民连续不断的沉重打击。在广东东江地区，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也粉碎了日军对东莞、宝安地区的“扫荡”，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并取得一连串主动出击日伪军的重大胜利，部队和抗日根据地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在国内国际上的威望更加提高，影响也更加扩大了。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新华社报导了我党发表的两个重要文件：《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和《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在这两个文件中，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了广九铁路地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抗击日伪军。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党中央指示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番号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发表成立宣言和领导人就职通电，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我和林平以及总队其他领导同志聆悉了党中央上述指示之后，大家都感到极为高兴！我们部队一成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战斗的，人民群众也都我们的部队就是当年的红军。但由于当时的形势和斗争策略上的需要，我们还没有公开宣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现在党中央要我们发表宣言，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对于远离党中央，在敌后孤军奋战的东江抗日军民来说，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

在筹备成立纵队的过程中，我们曾就发表宣言等问题请示党中央。周恩来同志就此进一步明确指示：东江纵队为中外共知的中共游击队，发表宣言毫无问题，而且应该强调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才能在敌后存在和发展。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研究了《东江纵队成立宣言》的内容，并商量了宣布正式成立的日期。我提议十二月二日正式成立，因为这一天是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的日

子。省临委同意了我的提议。于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以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林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的名义发表了成立宣言，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成立了！

《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庄严宣告：“东江纵队是人民子弟兵，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宣言》指出：“我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民主，反对法西斯一党专政和官僚资本垄断剥削。我军主张各界爱国同胞在团结抗日的目标下，互相帮助，互相忍让，以解决一切纷争，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各阶层合作。我军保护一切爱国同胞的人权、财权。欢迎伪军反正，欢迎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参加抗日。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是人民的抗日武装，除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之外，并没有其他利益。”《宣言》还声明：“我军坚决拥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愿与各盟邦及国际友人密切合作，希望能与国际友人在互相尊重，密切合作下，共同完成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任务。”

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我东江抗日军民分别在惠宝边、惠东、阳台山、大岭山、港九、增城等抗日根据地召开大会，庆祝东江纵队成立。这一天，还以我和林平、王作尧、杨康华



的名义发表了《就职通电》，我和王作尧又联名发布了东江纵队司令部纵字第一号布告。《就职通电》在回顾了五年来我东江军民艰苦抗击日伪军的业绩后指出：“为谋求更有效地打击敌人，捍卫祖国，保卫敌后前线人民，巩固抗日基地，凡属抗日部队，均应加强团结，一致抗日。本队同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之主张正确，为救国救民之唯一道路，故特诚恳接受中国共产党之领导，为彻底解放中华民族而奋斗。望全国各党派、各机关、各团体、各爱国人士，基团结进步之精神，一致协力，消除内战祸患，加强团结抗战，并对本队积极指教，使全体更能在群策群力支持之下，充分发挥力量，与全体抗日军民共同驱逐日寇，争取最后胜利，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第一号布告指出：“队伍成立五年，拥有光辉史迹，刻苦、坚定、勇敢，早为群众所熟悉。现为便利作战，各队联合一致，成立东江纵队，实行统一指挥。组织虽有改变，宗旨一如往时，凡属抗日部队，自当联合一致。”随后，我们将东江纵队成立经过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林平同志和我都在惠宝边土洋村召开的庆祝东江纵队成立的大会上讲了话。想到东江纵队的成立意味着部队将担负起更加重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我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在大会上，我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现在东江的局面是以我军为主抗击日本侵略军，这是我军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各个部队必须抓紧时机，乘胜前进，壮大我军力量，扩大抗日根据地，准备大反攻，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我们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

在这些日子里，我的思绪有如长河奔流，想得很多。我想起了一九三八年十月和周伯明、谢鹤筹等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回到坪山，建立中共惠宝工委，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宝沿海开展游击战争的情景；想起一九四〇年初，部队东移受挫，党中央指示回到惠东宝抗日前线，和林平同志会见的情景；想起与王作尧同志率领的部队并肩作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的许许多多的场面。将近六年了，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们在日伪顽军夹击下奋战，一个个情如手足的战友流血牺牲，我们的部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几起几落，斗争是多么艰苦啊！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我们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游击战争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在重重困难中，不仅没有倒下去，相反地我们发展壮大起来了，今天，我们公开举起党的旗帜，它将指引我们走向更大的胜利！

## 加强部队军政建设

东江纵队成立的时候，下辖七个大队：增城、博罗地区为第二大队、东莞地区为第三大队、主力“珠江队”扩编为第五大队、惠宝边地区为惠阳大队和护航大队、宝安地区为宝安大队、港九地区为港九大队。纵队司令部参谋处下设

作战科、侦察科、训练科、交通科、机要科和电台；纵队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保卫科、统战科、民运科、敌工科、报社和新闻台。此外，还设有军需处、卫生处，以后又成立了联络处。纵队已有人员三千五百人，机关和部队的组织都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了。一九四四年一二月，在东莞地区，第三大队扩编为三个大队，即第三大队、东莞大队、铁东大队，由第三大队统一指挥。

为了适应我军的发展，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纵队开展了以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四大技术，和班的战斗动作为主要内容的大练兵运动。遵照党中央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司令部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大练兵问题，我和王作尧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有大队军训干部参加的练兵委员会，王作尧同志是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又是军校出身，主管练兵的工作自然由他来担负。会议还决定以第五大队和惠阳大队为练兵的重点；并从惠阳大队、护航大队、港九大队抽调部分部队，由刘培、黄闻、何通负责，在坪山附近的沙壘村集中训练。我们参照八路军、新四军老大哥的练兵经验，实行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干部、战士自觉参加练兵，都懂得这是为战胜敌人而练兵，到处成为操场，到处成为课堂，骨干与群众相结合，官教兵，兵教官，互相帮助，互相竞赛，发现典型及时介绍推广。在练兵过程中，还注意总结带兵、养兵、用兵的经验。经过这次练兵运动，我们纵队进一步提高了军事素质，提高了战术、技术水平，进一步加强了部队的组织

性、纪律性，增强了团结。

坚持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是我军胜利的保证。东江纵队成立以前，我们就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榜样，并根据我们部队经常派出小队和班为单位活动的特点，建立了一套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大队设政治委员和政训室，中队设政治指导员，小队设政治服务员，班设政治战士，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政治工作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在党组织方面，大队设总支，连队和独立小队设支部，小队和班设党小组。在艰苦的生活环境，和频繁的作战行动中，要求各部队的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发挥带头和模范作用。东江纵队成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以提高部队战斗力，宣传党赋予的各项任务，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纵队政治部发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全军进一步深入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克服单纯军事观点，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艰苦奋斗的教育，发扬红军长征时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加强纪律教育，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军民关系。在战斗前、战斗中、战斗后都要及时针对不同情况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坚强的胜利信心。

为了加强党组织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纵队政治委员林平、政治部主任杨康华联名发表了《告东江纵队全体党员书》，指出：“东江纵队成立，正

式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表明我们的担子更重了,任务更大了。为了使党所领导的东江纵队完成巨大的历史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处处给群众以好的影响,事事做群众的模范。因此,每个党员,都要加强党性锻炼,培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要加强团结;要切实做好民众工作;要积极生产、厉行节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努力学习,力求进步。”我和林平同志还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东江敌后实施各项政策的谈话,强调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抗日党派、抗日友军,积极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肃清汉奸。

东江纵队成立后,还进一步健全和加强了保卫、民运、统战、敌工和文艺宣传等方面工作。纵队政治部先后成立了“拖拉机”文艺宣传队、鲁迅艺术宣传队,东江流动剧团及铁流队等,经常深入连队,活跃部队的文艺生活,对激励战士的革命意志,树立必胜的信心,起到了良好作用。他们还经常到各抗日根据地的村镇演出,鼓舞群众的抗日斗志,增强军民团结。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纵队政治部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出《关于在全队进行整顿三风的指示》,规定在整风运动中要深入学习党中央规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整风文件。各部队根据纵队政治部的指示,都进行了整风学习,开办了干

部整风学习班。这次整风运动，普及到中、小队级干部，对于加强部队建设，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它使部队的全体党员、全体指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进一步克服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军阀主义残余和游击习气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进一步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加强了团结，密切了官兵关系，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随着斗争的胜利，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军政素质优良的干部，和加强对全军干部和战士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训练，使部队成为具有坚强战斗力的，政治上巩固的部队。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一九四四年七月，东江纵队军政干部学校在大鹏城正式成立，由王作尧同志兼任校长，李东明同志任政治委员，林鹗同志任教育长，饶卫华同志任秘书长，并创造条件准备改为抗大第七分校。干校第一期设军事队和政治队，共训练连排干部二百人。学习内容：政治课主要学习《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党中央有关军队政治工作的文件等。军事课主要是学习队列、四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和爆破）、麻雀战、袭击战、伏击战和班排进攻防御等基本战术，以及简易地形学、简易通信等科目。学习方法主要是发挥学员的集体智慧，互教互学，同时采取沙盘作业，研究部队的战例，交谈总结实战经验等。我们纵队的领导同志也给学员们讲课。游击战的战术课由王作尧同志讲。我也抽空讲一般的理论课。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习方法，生动活泼，甚有成效。

学员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军政水平都有显著提高。一九四四年底,军政干校扩大招生,第二期训练班、排干部,同时招收一部分由地方党组织审查保送的中学生,学习时间为半年。

为了加强对青年干部的培养,一九四四年八月,纵队政治部在大鹏城又开办了规模较大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共举办了七期,每期一二百人,先后由黄文俞、张江明等负责。学员的来源:一是原粤北省委的一部分恢复了关系的党员;二是原派去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工作的部分党员;三是各地方党输送来的党员及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经过短期训练后就分配工作,为部队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

##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及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发展。东江纵队成立后,形势的发展急需建立统一的政权机构,以便行使人民的权利和进行各项支前工作。同时,东江抗日根据地毗邻港澳,也需要有个政权机构向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有计划地进行宣传,继续动员他们在道义上、物质上支援祖国抗战。因此,普遍建立民主政权的问题便摆在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的议程上来了。早在一九三九年,我们就曾有过建设淡水区民主政权的尝试;一九四一年在大岭山和阳台山抗日根据地,我们也建立了乡村民主政权;一九四三年七月建立了大鹏区民主

政府。以后各区乡民主政府相继成立，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在东江纵队成立了，我东江抗日根据地也已经发展巩固，大岭山、阳台山、惠宝边、惠东的抗日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了，不仅需要，也有条件建立高一级的政权，来统一领导各区乡政权。正在我们讨论成立统一的政权机构问题时，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及时发来了关于《建立东江抗日民主政权的原则》的指示。指示说：东江游击区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精神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三三制”的。但在实践上既不必以国民党形式，亦不必照抄华中、边区的办法，而要因地制宜，根据你们当地具体情况采取某些便于游击发展和军队转移的政权形式。选出的各级政府应实行民主集中制。关于“三三制”，一方面应注意我党领导地位的确立，另一方面应吸取党外联共的和不反共的人士多多参加。施政纲领可参照陕甘宁边区的纲领，联系实际情况制定。

我们遵照党中央指示的精神，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讨论，并决定以东江纵队政治部的名义向全军发出普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凡是部队所到之处，立即宣布废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和苛捐杂税，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建立民主政权。在老区凡未成立民主政权的地方，立即成立，有计划地组织地方武装，积极大胆地提拔地方干部，以民主政权为杠杆，进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使根据地成为有武装、有政权、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抗日根据



地。

我们还研究决定,在经过充分准备条件成熟时,分别在路西解放区(包括东莞大岭山和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路东解放区(包括惠宝边和港九抗日根据地)、惠东解放区(包括稔平半岛在内的惠阳县东部地区,即现在的惠东县)建立县一级的民主政权;并决定政权工作由纵队政治部负责,纵队党委分工由杨康华同志具体组织实施。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在路西解放区正式成立东宝行政督导处,谭天度为主任,何鼎华、王士钊为副主任。下辖九个区,属宝安县的四个区,属东莞县的五个区。人口约四十万。

一九四五年四月,又在惠东解放区成立了惠东行政督导处,练铁为主任,陈志期为副主任。下辖五个区和一个相当于区的梁化乡。人口共约四十五万。

一九四五年四月,经过较充分的准备,路东解放区参照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召开了首届参议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党派、无党派人士,有工人、农民、商人和教育界人士的代表。林平同志代表中共广东省临委作了《关于国际国内本区情况分析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政策的实行》的讲话,叶锋同志作了《关于路东区军事斗争情况》的报告,许章达、肖荫青先生等也发表了讲话。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由四十九名参议员组成的路东参议会,和由九名行政委员组成的路东行政委员会。彭东海当选为参议长,张兆昌、张持平当选为副参

议长；叶锋当选为行政委员会主席，肖荫青、李恩当选为副主席。全区五十八万人口，下辖六个区，还有一个特别区（港九地区）。同时还成立了路东人民抗日自卫队总部。

随着我军挺进东江以北（下简称江北）和北江，在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内，也相继建立了抗日政权。一九四五年一月，在建立了一批乡村政权的基础上，成立了增城永和区民主政府。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纵队政治部在罗浮山白鹤观举行了增（城）龙（门）博（罗）各界人士参加的国事座谈会。七月七日，博罗县民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通过各阶层人士的民主协商，选举韩继元为县长。当时县民主政权的辖区有长宁区和福田等十四个乡，人口共约十四万，占全县人口的五分之三左右。

在北江，以英德东部地区为中心，以及佛冈、新丰、翁源等县的部分地区，建立了乡村抗日民主政权，人口约二十余万。为了统率这些地区的各乡抗日民主政权，一九四五年七月在大镇召开了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国事座谈会，选举产生了北江东岸抗日动员委员会，陈仁畿为主任委员，陈自修、林栋材、朱小村、赖施民为副主任委员。

一九四五年七月间，成立了海丰县民主政府，县长吴棣伍。下辖三个区，人口达二十万。

此外，在抗日根据地边缘地区、游击区和敌占区，还有一些“两面政权”。

抗日根据地所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联合一致主张抗日的人们组成的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这个政权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权,人民群众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对汉奸和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保卫人民的民主权利,保卫根据地建设。

县区各级民主政权建立以后,首要的任务是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和参加抗战。在原有各种群众组织的基础上,乡村建立了农抗会,县一级政权建立农抗总会。到一九四五年春,路东区农抗会会员达二十余万,惠东区也达十余万。各地农抗会会员积极参加减租减息运动,通过减租减息,农民负担有所减轻,生活有所改善,农抗会更加广泛地发展,民主政权进一步巩固。

各地民主政权还广泛组织和发展抗日自卫武装,做到村有抗日自卫小队,乡有抗日自卫中队,区有抗日自卫大队,县一级政权有抗日自卫总队。到一九四四年底,全东江解放区的抗日自卫队员达一万多人。广大的抗日自卫队,在保卫解放区,在发展和壮大部队,在支援和配合部队作战上,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各级民主政权在领导生产建设,征粮征税;开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群众思想文化水平;拥军优属和锄奸保卫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 统一战线成果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总方针。东移前,我们曾、王部队就注意进行统一战线工作;重返惠东宝前线后,在东莞大岭山和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我们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继续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争取了一批开明绅士和上层人士,孤立打击了敌人。

坪山是我的家乡,惠阳县和惠宝边是我熟悉的地方。东江纵队成立后,这里成为东江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中心。我充分利用东江纵队司令员的名义,和同这些地区的人民群众、各阶层人士有密切联系的有利条件,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了许多上层人士和我们共同抗日。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大鹏半岛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朋友们和我们的密切合作。该党负责人李伯球先生几次同我们共商抗日大计,情意相投,肝胆相照。一九四三年秋,我们与他协商建立了大鹏区民主政府;同时把他们在大鹏城的武装改编为大鹏区联防大队。

联合中国农工民主党和国民党爱国军官组成“大亚湾人民抗日自卫总队”,是我们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又一大成果。国民党军官陈友芳先生是一个退伍团长,有民主爱国思想,他在澳头、淡水一带有一定影响。我地方党对他做了许多工作。在这个基础上,由我出面和他交换抗日意见,

把他动员出来。一九四四年秋，我们同李伯球、陈友芳先生协商，把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大鹏区联防大队同我们的护航大队和澳万乡抗日自卫大队，合编为大亚湾人民抗日自卫总队，由陈友芳先生任总队长，我们派了曾源同志去任政治委员，叶基同志任副总队长。这样，一支由我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形式的、团一级的抗日武装，就出现在东江抗日战场上。

大亚湾人民抗日自卫总队成立的那一天，在澳头镇举行了成立典礼，我们纵队政治部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到会的还有一些地方上的名流。澳头的群众挤满了会场。陈友芳先生在会上发表了《团结抗日，实行民主，反对内战》的讲话。当晚纵队政治部东江流动剧团演出了文艺节目，情况热烈，影响很大。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五年三四月间，我们以东江纵队政治部的名义分别召开了路西、路东和惠东国事座谈会，参加的有各界人士的代表，出席人数之多，情绪之高都是出乎意料之外。路东区国事谈会，原拟邀请百余人参加，但到会的却有三百五十余人，其中包括各阶层、各党派及名流学者，有港九的代表，有渔民的代表、青年妇女代表等等。有的是冒着危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前来参加座谈会的。其中有爱国知名人士张兆昌，彭东海；爱国军人陈友芳；爱国名流张友仁；教育界名流肖荫青、邓怀汉；中

国农工民主党负责人李伯球等。座谈会广泛发扬民主，听取各界人士对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减租减息以及对部队的意见、批评和建议。参加各处国事座谈会的各界人士代表，一致拥护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致谴责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独裁统治，通电全国呼吁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改组国民党所把持的旧政府和“统帅部”，成立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最后各界代表一致通过《对于建设东江抗日根据地施政纲领》，正式颁布全区实行。这个施政纲领，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结合东江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

## 乘 胜 前 进

在东江纵队成立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在全军开展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杀敌立功竞赛，纵队司令部和政治部联名颁布了《“游击队之英雄”给予条例》，规定在战斗中和实际工作中作出优异成绩的人员，分别授予各种光荣称号。号召全军乘胜前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主动出击敌人，巩固根据地，扩大游击区，壮大我军力量，迎接大反攻的到来。各地区部队指战员斗志昂扬，纷纷抓紧战机出击，机动灵活，英勇顽强地打击敌人。

东莞部队的战斗。自一九四三年冬日军进行打通广九

铁路战役后，顽军闻风远遁，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不但全部恢复而且扩大了。日伪军除了驻扎在广九铁路沿线（加藤大队驻樟木头地区，藤本大队驻塘厦地区，山下大队驻平湖地区）外，原来顽军在大岭山以东的金桔岭、大朗等据点现在驻有伪军第四十五师第一三四团。而我军在大岭山地区活动的部队比以前增多了，现在有第三大队、东莞大队、铁东大队和主力第五大队。第三大队活动于莞樟公路沿线；东莞大队活动于莞太、宝太公路沿线；铁东大队活动于广九铁路石龙至樟木头段以东、东江河以南的石排、企石一带；第五大队活动于广九铁路樟木头至塘厦段以西长山口一带。

第三大队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向广九铁路常平东站出击，歼灭伪军第三十师第八十八团一个连。一月二十四日，除夕之夜，又于东莞篁村全歼伪军第三十师一个连。在篁村战斗中，我突击队队长叶风生、班长李峰等同志牺牲，为表彰先烈，我们将缴获的重机枪命名为“风生机”；李峰烈士所在班命名为“李峰班”。

第五大队于二月初，夜袭广九铁路林村车站日军的物资搜集队。二月十三日，又奔袭宝太公路上的霄边，全歼伪军第三十师第八十八团一个重机枪连。霄边战斗是一次速战速决的歼灭战，引起敌人很大震动。

驻东莞的日伪军连续遭我打击后，不甘心失败，策划对我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三月三十一日，驻大朗的伪军第四十五师第一三四团共一千余人，进攻我驻黄寮坑的第三大队。

我第三大队登山迎击,我驻长山口的第五大队主动出击配合,以一个中队经黄岗圩向敌翼侧迂回,协同第三大队一部,展开钳形攻势,截断敌人后撤部队,在黄猿坑以北地区歼其两个连。这是我军以少胜多,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打得比较好的一次战斗。

敌人在黄猿坑战斗失败后,又妄图进行报复。五月七日,驻广九铁路樟木头的日军,侦得我纵队领导机关把东莞、宝安两地的一些部队集中在东莞梅塘地区整训,日军加藤大队和伪军约四百多人,即远道奔袭梅塘。凌晨,敌人摸到梅塘附近。我第三大队发现敌人后,立即命令独立中队抢占马山制高点,阻击敌人,掩护机关撤出。敌人用密集的炮火和机枪火力轰击扫射,并掩护其部队冲上马山,战况极为剧烈。中队长黎汉威,政治委员李中英勇敢地指挥部队,死守马山。李中同志(原名钟若潮,泰国归侨)以顽强的毅力坚持战斗和鼓动指战员英勇作战,不幸中弹牺牲。驻长山口的第五大队闻讯,主动从敌侧后投入战斗,向敌发动攻击。东莞大队一个中队和第三大队两个中队也在梅塘西北投入战斗,对敌人形成半月形的包围。日军遭我三面夹攻,被围在梅塘山坡上。战斗直至黄昏,敌人两次施放烟幕后,乘黑夜由汉奸带领从小路逃窜。这次战斗毙伤日伪军百余人。在战斗中,我军主动相互配合,发扬了敢打敢拚的精神,打得英勇顽强,敌人为之丧胆。加藤大队长逃回樟木头后剖腹自杀。



梅塘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军民斗志。东莞大队连续向敌人出击,五月十五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三次袭击厚街的敌人,全歼伪军第三十师的一个连和两个护沙中队。共歼敌三百八十余人,缴获轻机枪八挺、长短枪一百二十多支。

半年来,第三大队共进行战斗二十五次,共歼敌三百七十六人,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三挺、长短枪一百五十六支。第五大队共进行战斗十七次,歼敌一百七十九人,缴获重机枪二挺、轻机枪二挺、长短枪一百二十九支。第五大队在黄寮坑和梅塘战斗中,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主动投入战斗,支援第三大队作战,扭转被动局面,争取了战斗的胜利,这种战斗作风是很可贵的,是战斗积极性的表现。

七月一日,第三大队解放大朗圩和金桔岭等地。至此,莞太公路以东、广九铁路以西、莞樟公路以南、松岗至塘厦一线以北地区,全部纳入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的范围。

宝安部队的战斗。自一九四三年冬乌石岩、观澜等地的顽军撤离后,随即被伪军第四十三师所占据。我宝安大队活动于阳台山以西、以东、以南地区。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袭击了沙井伪军麦浩部,迫使其一个小队投诚;三月十三日,在白花洞反击伪军的进攻,毙伤其团附以下五十余人;三月十四日,争取伪军东路军一个营起义;六月初,在蛇口小南山袭击日军,全歼其一个班。

独立第三中队(由宝安大队独立小队扩编,直属纵队指

挥)活动于塘厦至平湖的广九铁路线两侧。二月十五日,在平湖车站附近的凤凰山,全歼日军一个班。七月二十一日,袭击驻平湖车站伪警察队,全歼其一个中队。战斗结束后撤退,途经山吓村附近的老虎山下时,与赶来增援的日军藤本大队四百余人遭遇。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小鬼班”班长黄友主动请缨带领战士尹林、赖志强、傅天聪、李查玲等五人阻击敌人,掩护中队撤退。他们不畏强敌,坚守阵地,打得英勇顽强,多次打退敌人的冲锋,胜利地完成掩护任务。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纵队政治部为了表彰他们的英雄事迹,正式命名这个班为“黄友班”。追授黄友等五位烈士为“抗战英雄”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军向他们学习。纵队的《前进报》登载了《老虎山下的英雄》的报导文章。延安新华社也向全国广播了他们的事迹。他们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激励了我们纵队全体指战员向敌人展开更坚决的斗争。九月二十日晚,独立第三中队为了给战友报仇雪恨,中队长何通组织精干的突击队,用自制的定时炸弹,在石鼓车站至天堂围车站之间的石马桥炸毁了敌人的碉堡,全歼日军一个班。

日军进行打通广九铁路战役后,东江地区的顽军都集中到铁路以东来了,把内战的锋芒指向我惠宝边抗日根据地。半年来,顽军独立第九旅、独立第二十旅、徐东来支队和杂牌部队李乃铭、陆如钧等大队,对我边区进行了三次进攻,规模一次比一次大。

东江纵队成立后,纵队领导机关驻在坪山及其周围和

大鹏半岛等地，中共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机关和电台设在大鹏半岛的半天云、油草棚、西涌等地。这样，惠宝边抗日根据地也就成为东江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而且也是广东和华南领导抗日的中心地区。因而顽军把进攻的重点就指向大鹏半岛和坪山，妄图消灭我领导机关。我惠阳大队活动于坪山周围，护航大队活动于大亚湾、大鹏湾和大鹏半岛、稔平半岛，他们除抓住战机主动向日伪军出击外，警惕地注视着顽军的动向，随时准备反击顽军的进攻。我一再给这两个大队的领导同志明确交待，省临委领导机关和电台的安全，关系着我们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命运，要不惜一切牺牲来保卫他们的安全。我们之所以把省临委领导机关和电台摆在大鹏半岛西海岸的油草棚、半天云、西涌等地，是因为护航大队和港九大队的海上队牢牢地控制着两个海湾的海域，情况紧急时，可以乘上武装船向安全地区转移。另外，在东江纵队成立时，我从惠阳大队和护航大队各抽调一个中队，组成一个加强的中队，作为纵队司令部的警卫部队，负责省临委和纵队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中队长赖祥，政治指导员邓汀。我为该队取名为“三九队”，用以纪念我们部队东移时的艰苦奋斗。我们部队东移是一九四〇年三月九日从坪山突围开始的。“三九队”随司令部行动，担任内卫和外围警戒任务。

一月十五日，顽军徐东来支队周义心大队，奔袭霞涌我护航大队海上队据点，揭开了顽军进攻的序幕。二月一日，

周义心大队和陆如钧大队，在龟令岛伪海军的配合下，进攻巽寮我海上队一个据点，被我击退。二月七日，我护航大队为争取主动，强袭霞涌周义心大队的一个中队，歼其大部，残敌窜走。二月十二日，顽军独立第九旅一个团、徐东来支队和杂牌部队，分两路向我大鹏半岛推进，我护航大队节节抗击。十三日，顽军窜进王母圩、大鹏城和水头，大肆抢掠后，于十四日退走。顽军的第一次进攻，毫无所获而告终。

三月六日，顽军周义心大队重占霞涌，独立第九旅一个营进占澳头，进行清乡，作为第二次进攻的准备。我护航大队力争主动，连续于白花、南边灶、岩背等地袭击敌人，共歼敌一个多排。三月二十四日，顽军独立第二十旅，由潮汕调到东江。二十八日，独立第二十旅一个团、徐东来支队和李乃铭大队，以我大鹏半岛为主要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进攻。顽军集中兵力由淡水直取葵涌，经下径心进入王母圩。顽军在经过的地方疯狂抢掠，群众的财物损失很大。四月一日，经澳头撤回淡水。我护航大队在下径心至王母圩、王母圩至坝岗圩的山地，和澳头至淡水的三间店，以麻雀战、伏击战毙伤七十余人。顽军的第二次进攻，虽然使用的兵力较大，但未敢深入我大鹏半岛腹地，又以损兵折将而结束。

顽军第二次进攻失败后，经过一个月的准备，又于五月份发动了规模更大的进攻。反动头子“惠淡守备区”的指挥官罗懋勋下了最大的决心，妄图摧毁我惠宝边抗日根据地，消灭我们纵队指挥机关和省委领导机关及骨干部队。他集

中了独立第九旅的四个营、独立第二十旅一个营、徐东来支队和李乃铭大队等共二千余人，分两路推进，企图将我军压缩到大鹏半岛一隅予以消灭。

面对着顽军的进攻，我们决定以惠阳大队和“三九队”由高健同志统一指挥采取机动防御的战术，抗击西线顽军的进攻。在东线，我们决定以护航大队等部队，采取阵地防御的战术，抗击顽军的进攻。考虑到东线是顽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我们从港九大队调来一个中队，加上大鹏联防大队、坝岗抗日自卫队、澳头抗日自卫队，由护航大队代理大队长袁庚、政治委员曾源统一指挥。他们周密地进行战斗的组织准备工作，决定采取阵地战与地雷战、麻雀战相结合的战术部署兵力，以澳头抗日自卫队在澳淡公路袭扰敌人，以坝岗抗日自卫队在澳头至坝岗间阻击敌人，主力在坝岗坳到径心一线进行阵地防御。为了防备顽军抢掠，我们动员群众坚壁清野。数千群众积极参加后勤工作，在坝岗坳、径心坳等地日夜挖工事。

五月二日，顽军开始进攻。从东线进攻的是独立第九旅的四个营、徐东来支队的两个大队和李乃铭大队。一出淡水就遭到澳头抗日自卫队的袭扰，在三间店中我地雷，死伤十多人。三日，顽军从澳头向小桂、坝岗进攻。坝岗抗日自卫队沿途袭击敌人，在小桂前我地雷杀伤其十多人。四日，顽军进入坝岗，又被我地雷杀伤数十人。五日，顽军向坝岗坳进攻，因我计时大地雷提前爆炸，把顽军吓退。六日，顽军改

向将军坳进攻。我们急调“三九队”进行了顽强的抗击。顽军无法攻上将军坳，反而被我地雷和火力杀伤数十人，只得停止了进攻。

顽军从西线进攻的是其独立第二十旅的一个营、徐东来支队的黄文光大队。我惠阳大队在当地抗日自卫队的配合下，于梓坑至茜坑地区节节抗击敌人的进攻。三日，顽军一个营，向防守茜坑河岸的我军进攻，惠阳大队顽强阻击敌人，战斗从午至暮，顽军始终未能攻破我军阵地，只得撤走。第二天顽军向坪山、田心一线进攻，遭到我惠阳大队和“三九队”的阻击，进展缓慢。

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挑动内战的罪行，纵队政治部于五月五日发布《告各界同胞书》和《告内战官兵书》，号召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的各界同胞行动起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挑动内战；号召顽军官兵拒绝执行内战命令，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做一个民族英雄，不要做内战的牺牲品。

五月七日，林平同志用电报向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军委报告了国民党顽军勾结伪军向我进攻的情况：国民党军惠淡守备区指挥部，于五月二日调集驻防军独立第二十旅一个营，又增调独立第九旅四个营及杂牌军等，共兵力约二千余人，向我惠阳、宝安沿海、大鹏半岛分路进攻，并勾结伪军进行三面夹击，五日来遭到我军民的猛烈痛击，各路均被击败，战斗现在仍进行中。

顽军第三次向我进攻，和前两次有不同特点。我们纵队

的领导同志和司令机关进行了研究分析后,于五月十一日以纵队司令部的名义向各部发出了《粉碎内战阴谋的指示》,指出顽军此次进攻兵力之多是空前的;惠淡守备区指挥官罗懋勋亲自出马统一指挥,并带领宝安县县长同行,以便军政配合;他们还进行政治欺骗,说不准部队抢老百姓的东西;所到之处组织自卫队、三家联保制。这些表明顽军这次进攻是下了极大决心要作长期打算,企图围困我们,伺机消灭我们。为此,我们在军事上要作全面活动。在正面以地雷战(在有利地形结合阵地防御)、麻雀战消灭之、纠缠之、疲劳之。要动员军民协同作战,扰乱他们,但使用兵力不要过度,要保存一部分主力,待机歼其一部。要以部分兵力转到顽军后方,袭击其小部、破坏其交通、夺其辎重粮弹,以牵制顽军。在敌后的部队仍应积极行动,打击和牵制日伪军。在政治上加强对部队和群众的宣传教育,鼓起军民对顽军的愤恨情绪,坚定胜利信心,把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配合我部队作战,防卫乡土,并坚壁清野,使顽军一无所获。在粮款供应,弹药补充和交通情报等方面,必须充分布置,做得更好,以应付顽军的长期封锁和围攻。只要我们在这些方面都做好了,就一定可以粉碎顽军进攻的阴谋。

按照纵队司令部的布置,各部队都积极行动了起来。在东线,顽军经过几天的休整和补充之后,十一日,改向上下径心一线进,“三九队”和港九大队一部,结合地雷战沿途节节阻击,顽军不得前进退回坝岗。十六日,顽军在进行调整

后,集中兵力向坝岗坳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企图一举突破我阵地。护航大队、大鹏联防大队和抗日自卫队,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以机步枪火力和地雷大量杀伤敌人。顽军进攻了六天,只前进到半山,参加挖工事的群众在山顶挖石头往下滚,砸得顽军无处躲藏,退了下去,战斗形成僵持。在西线,顽军遭我阻击后,徘徊在田头山一线以北的坪山、田心地区。惠阳大队一部转到外线,迂回到淡水敌侧后活动。五月中下旬,在良井袭击王竹青大队,歼其一个中队;在淡水河不断袭击顽军粮船,断绝了入侵顽军的粮食供应;并连续袭击了淡水东门和妈庙之敌。与此同时,澳头抗日自卫队不断在澳淡公路袭扰敌人,从而牵制了西线的顽军不敢问田头山以南深入。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持之后,为了创造战机歼灭敌人一部,我们决定放弃王母圩。二十九日,顽军进入王母圩后,摸不清我军的意图,害怕被歼,于三十日晨又慌忙撤走,窜回淡水。同时,西线顽军也撤了回去。至此,顽军持续了一个月的第三次进攻被彻底粉碎。

这次反击顽军的进攻,开创了我军以阵地防御和地雷战、麻雀战相结合的范例。地雷战第一次充分发挥了威力,它是使我们能够在东线各个阵地上坚守十多天的重要保障,它还提高了麻雀战的作用。同时,这次反击顽军的进攻,是真正打了一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抗日自卫队和人民群众协同作战的人民战争,数千群众日夜挖工事,一百七十多



名武装群众同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并肩作战，顽强地守住径心坳，坝岗坳阵地。阵地上群情激昂，这也是我们能够坚守阵地十多天的重要因素。

在增博地区，第二大队北渡东江后向西挺进，开辟新区，发展广州外围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挺进中，连战皆捷。首先歼灭铁场伪警一个中队。尔后又歼灭广九铁路石滩车站伪联防队和警察所。接着攻占博西上下南。四月三日，驻博罗长宁顽军独立第九旅一个营，包围源头茹屋村。第二大队和茹屋村一百二十多抗日自卫队员奋起抗击，多次打退顽军的进攻。第二天，日军二百多人和伪军李潮部三百余人，并出动飞机两架和炮兵配合进攻茹屋村，战斗持续两昼夜后，我军突围撤出战斗。此役，击毙日军少佐指挥官一名和毙伤日伪顽军共七十余人。第二大队撤出战斗后，迅速向广州外围挺进，在增城新塘附近全歼伪绥靖军一个连。接着进军广州近郊龙眼洞，消灭伪军一个连，继而活动到广州白云山下沙河、鱼珠一带，威胁广州的敌人。

在港九地区，港九大队的迅速发展，频频出击，使日军感到恐慌，因而对我进行频繁的“扫荡”。进入一九四四年，日军各种规模的“扫荡”几乎月月都有。在五月分，一个月内竟多达八次。上半年进行了两次出动兵力千人以上的大“扫荡”。

二月十一日，日军头目矶谷廉介，以搜捕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跳伞着陆的飞行员克尔中尉为契机，出动了一千多兵

力,陆海空相配合,对我沙田、西贡地区进行了“梳篦扫荡”,持续时间达十七天。他们采取了“投石惊林”、“远道奔袭”、“分区拉网”、“拉锯清剿”等战术,企图将我港九大队一网打尽。港九大队为粉碎敌人的“扫荡”,抢救克尔中尉,以西贡中队在内线坚持山地麻雀战,军民协同巧妙地与敌人周旋;长枪队进入宝安,短枪队插入九龙市区展开外线作战。

为了吸引日军的注意力,以牵制“扫荡”的日军。短枪队首先由副队长刘黑仔率领数名队员,化装成日军军官和士兵,直奔九龙塘日军宪兵司令部的陆通译(即翻译)家,将这个为虎作伥的汉奸押上大街枪毙。接着刘黑仔又率领两名短枪队员,化装成敌人的密探,进入九龙城金棠酒家,枪杀特务肖如九。

短枪队深入虎穴枪杀汉奸特务的行动,使敌人甚为惊恐,在九龙市区加强了岗哨,实行宵禁。但“扫荡”沙田、西贡的日军不但没有撤出,反而更疯狂地毒打和枪杀群众。短枪队员义愤填膺,决心袭击启德飞机场。黄冠芳、刘黑仔率短枪队,乘敌人警戒之隙,摸掉飞机场砧石山方向营门守卫的两名印度哨兵,进入飞机场内杀死值班的日军,在油库和一架飞机上按装定时炸弹,然后迅速退出飞机场到九龙山休息。十二时正,接连两声巨响,飞机场顿成火海,日军乱作一团。同时,市区中队展开了“纸弹战”(散发传单)、“地雷战”,扬言游击队要攻打日军南支派遣军司令部;并成功地爆破了九龙窝打老街四号铁路桥。启德机场被袭,四号铁路桥被

炸，日军惊慌失措，整天戒严，进行大搜捕，终于被迫把在新界“扫荡”的队伍撤回九龙市内。

四月间，从缅甸撤到香港来的日军二千多人，纠合驻垃圾尾岛的伪军六百多人，并出动舰艇数十艘、飞机四架，由一名将级军官指挥，对我大屿山中队进行大“扫荡”，持续二十一天，扬言不打死也要饿死抗日游击队。大屿山中队面对着十分强大的敌人，迅速作出了全面掩蔽和分散活动的决定。在二十一个日日夜夜里，他们分成若干个精干的小组，掩蔽在深山密林、人迹罕见的山坑洞穴里。指战员们历尽了生活上的艰辛，在群众的支援下，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了困难，保存了革命力量，使敌人的“扫荡”落了空。

在日军“扫荡”大屿山期间，港九大队其他地区的部队，积极主动地向敌人出击。大队短枪队于四月十三日，袭击了靠近九龙城区的牛池湾日军哨所，歼敌六人，缴长短枪六支；西贡中队于四月十七日，袭击了官坑庙日军驻地，歼敌二十人，缴长短枪二十支；沙头角中队于四月二十六日，袭击了元洲仔日军宪兵哨所，歼敌五人，缴长枪五支。这些战斗的规模和战果虽然很小，但在敌我力量悬殊很大，日军哨所林立，回旋余地很小的港九地区，能取得这样的战果，也是很不容易的了。

五月，日军在大屿山，用尽了各种手段，始终找不到我游击队的踪迹，只得撤兵而去。大屿山中队立即开展了锄奸活动，镇压了一批汉奸特务。六月中旬，袭击了塘福村伪军；

七月上旬，袭击了石壁村伪军，迫使伪军撤出这两个据点，扩大了游击区。接着，连续袭击了大澳镇伪警察局、马湾涌伪警察所、梅窝日军小分队，共歼敌五十多人，缴长短枪五十多支。

港九大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日军占领香港时，我们挺进港九的部队不到一百人，完成了肃清土匪，抢救文化界人士和收集武器的任务。以后我们又调了一批干部和民运队员去加强，合起来也只得有一百多人。三年多来，他们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相继组建了五个地区中队和一个海上中队，成为一支拥有八百多人的队伍。另外，还组建了两个中队调回内地编入其他部队。

港九地区人民具有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我军在港九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后，大批当地青年参加游击队，各个中队的队伍迅速扩大。例如海上中队，由于大批青年渔民的参加，发展到一百四十多人，增强了海上战斗力。其他中队也发展到各有一百人左右。

但是，为了争取胜利，港九大队也付出了不少代价。大屿山中队长刘春长同志、沙头角抗日自卫队队长曾春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宣传干事陈冠时同志，民运干事王月娥同志，因汉奸告密被捕，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 海上游击战

我惠宝边抗日根据地，区域不大，西面是日伪军，北面是顽军，东面和南面是大海。当日伪顽军进行“扫荡”、进攻时，我军的回旋余地很小。我当过海员，对大海比较了解。一九四一年冬，我从大岭山区回到惠宝边时，就曾考虑要把大海利用起来，把它作为一个灵活机动的战场，扩大我军的回旋余地。

日军占领香港后，我军挺进港九地区，为了建立惠宝边至九龙新界的西贡半岛等地的海上交通，和从海上护送文化界人士，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我们决定把茜坑、马鞍岭抗日自卫队改编为护航队，并在挺进港九地区的部队中建立护航小队。护航队向土洋村渔民借了一艘风帆小木船（当地人叫“槽仔”）和两个舵工，派了几个同志配备一挺轻机枪和几支长短枪上船，作为我们海上部队的第一艘“战船”，以沙鱼涌为基地进行活动。护航小队也向西贡半岛的渔民借了两艘“槽仔”和一艘拉网船（当地人叫“索罟”），配备十九个人、一挺轻机枪、十来支长短枪，组成一支“战船队”，以西贡半岛的龙船湾为基地。

海上部队组建起来了，但是我们的同志都是些“旱老虎”。要把这些“旱老虎”变成“深水龙”，就必须使他们适应海上生活，学会掌舵、摇橹、扯帆、观察气象等海上航行技

能,学会过船(跳过敌船或爬登敌船)、海上瞄准射击、投放“鱼炮”(渔民用炸药制成的用以炸鱼的炸药包)等海上杀敌本领。指战员们没有辜负人民的祈望,在老渔民的指导下,经过刻苦的学习和反复的苦练,很快克服了晕船,适应了海上生活,学会了海上航行技能和杀敌本领。

海上部队成立不久,即投入了护送文化界人士的任务。同时展开了剿灭海匪的战斗。香港沦陷后,大鹏湾海域海匪多如牛毛,大大小小的有十多股。这些海匪无恶不作,勒索渔民,打劫商旅,沿海渔民和商人恨之入骨,要求我军把他们消灭。一九四二年二月,我海上部队在渔民的配合下,经过半个多月的战斗,消灭了三股著名的海匪。其他海匪有的散伙,有的逃往别处,有的当了伪海军。护航队在剿灭海匪的战斗中,缴获了四艘匪船,装备了自己,扩大了部队。在我军控制大鹏半岛以后,我们又在南澳、羊槽湾等地建设了基地。

海上游击队和陆上游击队一样,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是不可能坚持海上抗日游击战的。为此,我们派出民运队会同海上部队的指战员深入到渔民中去,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帮助渔民解决粮食、食盐和渔需品缺少的困难,在渔村办起识字班和渔民小学。由于宣传教育和我们同志们的实际行动的影响,使广大渔民的民族觉悟和抗日积极性普遍提高。在民运队的帮助下,建立了渔民协会、妇女会、锄奸小组等群众组织,成批在海上生长

的渔民子弟参加了海上游击队。这不仅壮大了海上部队，而且由于他们在掌舵、摇橹、扯帆、过船等方面样样精通，更大提高了海上部队的战斗力。一九四三年六月，港九大队海上小队发展到近百人，扩编为海上中队。七月，独立中队扩编为护航大队，原来隶属于独立中队的海上小队扩编为两个海上中队，共一百多人。火力方面除配备轻机枪外，增加了平射机枪（12.7口径）和重机枪。以后，港九大队又在大屿山中队和元朗中队建立了海上小队。这样，我们的海上部队就拥有三个中队和两个小队的实力。

日军占领香港后，开辟了一条从广州至香港经汕头到台湾的海上运输线，把从华南抢掠来的战略物资运回日本，又从日本把武器装备运到华南战场和东南亚。大鹏湾和大亚湾的外海以及大屿山和内伶仃附近海域，是日军这条运输线的必经海区。我们的海上部队壮大起来后，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开始，就积极在海上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海上运输线，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海上斗争经验，开创了有自己特色的海上游击战。

在大亚湾、大鹏湾及其他海域，我海上部队的作战对象，主要是日海军的运输船、机帆船和伪海军的风帆大木船（当地人民称为“大眼鸡”）。这些船只，在排水量、机动性能、航速、火力等方面都优于我们的船。因此，我海上部队和陆上部队一样，也是在敌优我劣的条件下进行战斗，主要以袭击战作为消灭敌船的主要手段。把陆上游击队进行夜袭、化

装袭击、强袭等打法,根据海上作战的特点,运用于海上袭击敌船,在实践中创造了一套以小船打大船、木船消灭机动船的经验。

一九四三年七月,护航大队海上队,首先打响了消灭日海军运输船的第一炮。他们侦悉到大鹏湾黑岩角有一艘日海军运输船锚泊修理机器,于是出动了五艘战船,利用夜暗隐蔽接敌,突击队乘敌人在睡梦中,迅速从两舷爬登敌船,向敌人住舱投了两颗“鱼炮”,并以短火器猛烈射击,仅几分钟即全歼船上日军水兵。接着于十月上旬,又在大亚湾鹿咀附近,消灭一艘日海军锚泊的运输船。十月下旬,港九大队也打响了消灭敌船的战斗。他们的两艘“战船”在西贡以东果洲的外海巡逻,发现从汕头方向开来一艘挂着太阳旗的机帆船拖带着一艘大木船,逆风向香港方向航行。我们的一号船即顺风斜插敌船,二号船绕向敌船左侧截其后路,并集中火力向敌机帆船猛烈射击。敌机帆船一面还击,一面急忙砍断拖木船的绳索,开足马力向香港逃去,大木船为我缴获,船上的大批白报纸解决了我们纵队《前进报》的急需。

这年的中秋节,我和爱人阮群英来到护航大队大队部驻地枫木浪,交代刘培大队长准备些鱼肉,请省临委和电台的连贯、蒲特(饶彰风)、黄康等同志一起来这里过节,好给他们的肚子增加一点油水。我对大海的兴趣很浓。我们现在建立了海上部队,有了自己的“战船”了。我提议乘坐我们的“战船”出海赏月,连贯等同志十分赞成。天黑后,我们一



行来到海上队的“军港”南澳，登上了“战船”。月亮冉冉东升，“战船”徐徐向港外驶去。我们在“战船”上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当前的时局和战斗。我在想，我们何时才能坐上真正的军舰，在南中国海域游弋呢！我相信将来总会有那么一天。这时，刘培同志报告，渔船发出讯号，有两艘日海军炮艇出来了。我们的“战船”在海上是拚不过日军炮艇的，于是立即返航。当我们的“战船”刚靠上沙滩，两艘日海军的炮艇已驶到我们刚才游海的地方，当地的渔船正在应付日军的检查。走在路上，我对刘培同志说，你们海队一定要认真做好渔民群众的工作，没有渔民的支持，你们将寸步难行；只有依靠渔民，你们才能夺取海上游击战的胜利。

十二月，随着惠宝边抗日根据地向东发展的需要。我们为了控制大亚湾，加强向稔平半岛挺进的力量，决定将护航大队的海上部队，从大鹏湾调往大亚湾海域，以坝岗、霞涌、巽寮等地为基地，配合大队的陆上部队，开展对日伪顽军的斗争。大鹏湾海域由港九大队的海上中队接防。

护航大队的海上部队进入大亚湾海域后，立即支援陆上部队袭击了霞涌的顽军。一九四四年三月和五月，配合大队主力反击顽军的进攻，保障了大队濒海翼侧免遭伪海军的袭扰。七月，运送大队主力远道奔袭暗街伪反共救国军第二大队。九月下旬，又运送大队主力袭击平海顽军盐警队。

港九大队海上中队接防大鹏湾海域后，在日军的海上运输线上，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打得非常出色。他们击败

了日海军的机帆船，轰毁了伪海军“挺进队”，强袭和化装巧袭日海军运输船，勇歼日军运兵船，丰富了海上游击战的战术。

一九四四年五月，顽军第三次进攻大鹏半岛，我护航大队与敌激战于坝岗坳等地时，日海军派出一艘机帆船驶到坪洲海面，企图配合顽军夹击我军。港九大队海上中队出动两艘“战船”迎战，从上风接近敌船，敌船向我开炮，我船以平射机枪、重机枪火力还击。我们的船小，转舵拐弯快，敌船发射了几十发炮弹均未命中。我们的船从左右夹击敌船，打得敌船团团转，慌忙向三门岛方向逃去。

七月，港九大队海上中队的三艘“战船”出海活动，至大鹏湾黑岩角发现一艘锚泊的日海军运输船，立即散开从不同角度成三角形包围敌船。敌船向我船开炮射击，我担任突击的二号船，在一、三号船的猛烈火力掩护下，迅速靠近敌船，突击组强行爬登敌船。渔民出身的班长曾佛新同志第一个登上敌船，不幸中弹牺牲。突击组的勇士们怒火冲天，在火力组的掩护下登上了敌船，敌人凭借船舱顽抗，突击组向敌舱连续投放了几颗“鱼炮”和手榴弹后，冲进舱内，俘虏日军水兵七人，解决了战斗。

沙头角日军为了保护其海上运输线，截断我惠宝边至西贡半岛的海上交通线，组成了一支伪“海上挺进队”，由日军军官任队长。八月十五日，据渔民报告，沙头角对面海的黄竹角海面，有伪“海上挺进队”的三艘船锚泊。港九大队海

上中队即出动两艘“战船”，于八月十六日凌晨二时隐蔽接近敌船锚泊点，一号船直扑右侧敌船，二号船插向左侧敌船，轻重机枪同时向敌船猛烈射击。二号船首先接近左边敌船，连续向敌船投出两颗“鱼炮”，敌船燃烧下沉。一号船也接近右边敌船，迅速向敌船投出一颗“鱼炮”，敌船爆炸。中间的敌船企图起帆逃跑，一号船突击组迅速跳过敌船，降服了敌人，战斗胜利结束。共毙伤敌三十八人，缴获轻机枪二挺、冲锋枪四支、长短枪二十五支。这次战斗是在距沙头角几海里的地方进行的，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游击队的小木船竟敢虎口拔牙。天亮后，日军派出一艘炮艇向我追击，但我们的战船已进入南澳，“海军”变成了“陆战队”，登山摆开轻重机枪，以猛烈火力把日军炮艇打了回去。

一九四五年五月，日军运输船一艘、大木船两艘，锚泊于大鹏湾的水头沙湾。港九大队海上中队为了扩大歼敌战果，实行日间化装袭击。他们派出三人组成的突击组，渔民打扮，腰间藏着短枪，带着“鱼炮”，手中拿着钓鱼工具，摇着小艇，艇上放着活鱼装作赏鱼，向敌船接近，乘敌水兵接鱼时，将“鱼炮”投上敌船，“鱼炮”爆炸，敌人乱作一团。我隐蔽在距敌船二百米处岩石后的两艘主力船，立即集中火力向敌船射击，并全速冲向敌船。突击组迅速爬登敌船，再用“鱼炮”攻击，解决战斗。计歼日水兵八人，解放中国船员二十多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六支、二百多吨的铁壳运输船一艘、三十吨大木船两艘、药品等物资一大批。

八月,港九大队海上中队三艘“战船”出航巡逻,发现大浪口湾海面有一艘用油布覆盖的大木船。我船队即顺风接敌,距敌船三百米左右时成三角队形前进,敌船以火力阻击,我一号、二号船集中火力压制敌船尾部火力,掩护三号船接近敌船,接连投了两颗“鱼炮”,都从油布上滚到海里。第一次突击未成,反而牺牲了邱求、朱来两位同志,另两位同志负重伤,只得撤出。在包扎好伤员后,三号船的同志们,怀着满腔怒火,乘敌船忙于对付二号船时,又掉转船头迅速接近敌船,连续向敌船尾部投出两颗“鱼炮”,敌船被炸船尾下沉,接着又投出了三颗“鱼炮”,终将敌船炸沉。船上日军除被我俘虏二人外其余四十多人全部淹死。我从海中打捞回日式山炮一门、步枪六支、无线电收发报机一台。这次战斗是日间强攻,三号船的勇士们,在两个同志壮烈牺牲、两个同志负重伤的情况下,毫不气馁,顽强战斗,终将敌船歼灭。

活跃在珠江口海域的大屿山中队的海上小队,基地设在内伶仃岛、固戍及龙鼓滩,平时以打渔为掩护,避开敌人的“扫荡”,发现敌船后,突然发起攻击。从一九四四年五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这支小小的海上游击队,先后缴获敌人满载物资的运输船、机帆船二十二艘,破坏了敌人香港、澳门、广州的海上运输线,补充了我军物资供应。

我们的海上游击队,和陆上游击队一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战斗中锻炼成长。几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我们海

上部队共俘敌船四十三艘，击沉敌船七艘，俘虏日军三十六人，击毙日军五十二人，淹死日军四十多人，俘虏伪军五十多人，击毙伪军近一百人，缴获轻机枪五挺、步枪五十支、山炮一门、物资无数。对于在海上游击战争中，和敌人英勇搏斗而牺牲的同志们，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综上所述，我们东江纵队成立后，在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榜样，加强了部队的建设，以陕甘宁边区为样板，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正确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积极主动出击敌人，不断取得胜利，敌占区不断缩小，游击区不断扩大，广九铁路在我军不断出击下，处于半瘫痪状态，日伪军龟缩在铁路沿线的几个据点。东江纵队的威望日益提高，部队日益扩大，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延安对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中指出：华南敌军约有三个半师团，两个独立旅团，合计四个半师团，八万人。其中第五十七师团在广九铁路沿线，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抗击百分之七十。第一〇四师团在广州、从化、三水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抗击了百分之三十。八月十七日，延安《解放日报》以《东江纵队威震港澳》的大字标题，报导了东江纵队一九四四年上半年的战绩：东江纵队主力半年来与日伪军进行较大的战斗一百四十八次，攻克日伪军据点十个，破坏公路三百七十七里，铁路七十里，桥梁十二座，毙伤日军四百四十

人、伪军五百六十余人，俘伪军七百六十四人，伪军反正一百四十四人。东江纵队象一把钢刀插在华南敌后，威震港澳。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也给予高度的评价。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东江纵队和海南岛人民抗日部队全体指战员发来电报给予表扬和勉励，电报说：“自广州沦陷，迄今六年，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拯救华南人民的责任，不能希望国民党，而要依靠我党和华南人民。因此，你们在华南的作用和责任将日益扩大。”“为此，必须更亲密团结自己的队伍。加紧整风，打通干部的思想，坚持统战政策，加强与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坚持原阵地，并力求继续发展，扩大武装部队，建立广大的坚固的根据地。”

## 第十一章

#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营救盟军人员和国际友人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的指示》，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在东江纵队成立宣言中庄严宣告：“我们坚决拥护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以无限忠诚与各盟邦及国际友人密切合作。”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积极开展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坚决执行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的义务，配合盟军的作战行动。

日军占领香港后，把英军战俘囚禁于七姐妹、深水埗、

亚皆老街等三个集中营和启德机场；把港英政府的文员、英国侨民等囚禁于赤柱集中营；把印度籍官兵囚禁于马头围集中营。我们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在营救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同时，就展开了营救盟军人员和国际友人的工作。

一九四二年二月，为了加强营救盟军人员和国际友人的工作，我们调派了熟悉英语，又有合适社会关系的干部，在港九大队建立了国际工作小组，由黄作梅同志任组长。

日军占领香港初期，对于被禁囚的外籍人士监视还不太严密。因此，从一九四二年二月至四月，有一批英国军警官员和士兵先后逃离了集中营。他们是英军战地医院的赖特上校、英军海军军官摩利上尉、戴维斯中尉、都格拉斯中尉、夏斯特中尉、汤姆生中尉、英军陆军军官比尔斯中尉、怀特中尉、祁德尊中尉，香港义勇军的波生吉，香港警司的汤姆生、波利斯特屈特夫人，英军士兵霍支斯、格尔拉夏等。他们逃出集中营后，在我港九大队的帮助下，脱离险境，到达我游击基地，然后把他们转送到大后方。

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间，港九大队了解到有一批英军被囚禁在启德机场，即派江水率短枪队前去进行营救。短枪队员化装成小贩混入飞机场，看好地形，联系好英军，通过下水道救出汤逊上尉等四名英军。后为日军察觉，加强了戒备，只好放弃这种营救方法。

国际工作小组为了开展营救工作，在香港和九龙市区



设立了秘密的联络点。他们采取了很多办法与被俘的盟军人员和国际友人进行联系和设法营救，如通过教会的牧师、神父，深入到集中营去与战俘及港英政府官员秘密联系；通过被营救出来的人提供情况，或动员他们写密信去联络其他人，以扩大联络面；派出地下工作人员化装小贩为掩护，与在集中营外劳动的战俘联系，帮助他们隐藏起来，伺机转移；在靠近海边的集中营，短枪队员夜里乘船去喊话，或用木板写上英文，随水流入集中营，帮助他们悄悄逃出；布置他们伪装伤病，住进医院，然后帮助他们从医院逃出，等等。

在港九大队的领导下，从一九四二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国际工作小组、地下工作者、短枪队的同志们，在困难而又危险的情况下，以高度的责任感，勇敢机智地营救了英军葛荣中尉和十八名英军士兵、三十名印度士兵，以及三名丹麦人。但是被囚禁在集中营里的人有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国际工作小组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关系，曾经和港英政府辅政司詹臣、医务总监司徒永觉、上海银行总经理祁礼宾爵士等取得联络，准备营救他们出来，可惜他们顾虑重重，不愿意出来。国际工作小组又曾和赤柱集中营的盟国人士取得秘密联络，然而营中的港英高级官员对时局估计不足，认为日军不出半年必败，不同意营内人员冒险逃走。这就影响到本来可以营救出更多人而没有成功。

初期被我们营救出来并安全回国的盟军人士，对我军的情况作了介绍和宣传，使我们东江抗日游击队在国际反

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受到盟国特别是英国的重视。一九四二年七月,英国在桂林成立了英军服务团,在惠州设立了英军服务团前方办事处,由赖特上校指挥,办事处主任是祁德尊少校(原是中尉)。他们都是在香港沦陷初期被我们营救脱险的。

英军服务团成立的目的,就是要营救战俘和搜集情报。祁德尊少校给我们来信,要求合作,并派了何礼文上尉到我们总部来,要求我港九大队协助调查和拍摄香港集中营的情况及其他军事目标,并具体协助他们进行营救工作。我们经请示党中央批准后,并遵照党中央和南方局有关指示精神,派人把他们的工作人员护送到港九大队去,由国际工作小组帮助他们展开工作。按照他们的要求建立了情报站,制订了营救计划,布置了秘密交通线。国际工作小组的同志们经常是一马当先担负起最危险的工作,给了英军服务团工作人员以很大鼓舞。他们并真诚地帮助英方人员如何在敌人严密控制下进行工作,提高斗争艺术。

我们和英军服务团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除了情报工作外,从一九四二年八月至一九四三年四月,共营救了两名英国人、两名挪威人、一名俄罗斯人、一名菲律宾人、十二名印军,其中一名中尉一名少尉。

我们努力营救盟军人员和国际友人,赢得了盟国的赞扬,在国际上声誉日高。但是却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从中阻梗。因而一九四三年八月,英军服务团突然决定与我

们截断关系,停止一切联络。但我们仍然本着贯彻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继续营救了一些英军战俘,对英方人员秘密过境也给予协助。尽管我们和英军服务团的合作受到干扰,但英方对这种合作还是充分肯定并给予很高评价的。一九四六年二月,赖特上校返回英国前对我说:“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不会做出什么工作来的。”

据不完全统计,我们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先后共营救出英国人四十二名,印度人五十四名,丹麦人三名,挪威人两名,俄罗斯人一名,菲律宾人一名,合共一百零一人。这些被营救出来的各国人士对我们都是表示由衷的感激的。

英军海军葛荣中尉在离开我惠宝边抗日根据地时,留下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说:“这是一封表示对你们钦敬和感谢的信”。“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完全不能抵达安全地方的,在这里我希望再次向帮助我这样多的你们表示最深的感谢。你们底无畏的英勇,你们在敌人统治的地区中,冒着绝望的危险,进行了及进行着坚决的斗争,而获得任何人的崇仰,而他们会完全明白你们的英勇行为的,我在你们处所获的伟大的仁慈与殷勤的款待,我的心充满着极真挚的,非文字所能形容的感谢”。

其他被营救出来的英军陆军军官、海军军官、士兵、印度籍士兵,警司的汤姆生等,都给我们写信或发表谈话表示感谢和赞扬。如祁德尊中尉说:“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队员们的纪律,和他们全体共有的思想上的完全一致”。香港义勇

军麦尼民和巴拉斯加氏说：“他们是一群优秀的人，很客气的招待我们。同时我们也发觉他们对他们的事业是很忠诚的，如果我们能力许可的话，我们一定毫不迟疑地和他们一样去做”。英军士兵霍支斯和格尔拉夏被营救出来后，热情地要求参加游击队的工作，教会我们的队员如何使用英式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后来经过说服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我们营救英军战俘的工作告一段落后，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又开展了营救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遇难飞行员的斗争。一九四四年初，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命令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轰炸广州、香港等地日军的军事设施。二月十一日，该队第三十二战斗机大队第三中队的克尔中尉在轰炸香港启德机场时，座机被击中着火，他本人也受了伤，被迫跳伞降落在九龙山区，日军立即进行搜捕，幸得我港九大队交通员和民运干部及时救护，将他掩藏在沙田吊草岩一个山洞里。我港九大队为了营救克尔中尉出险，在西贡、沙田和九龙与敌人周旋了十多天，粉碎日军千余人的合围搜捕。经过几番艰苦的辗转，短枪队才把克尔中尉护送到赤径村港九大队大队部。大队的同志热情地招待了他，给他治伤。大队长蔡国梁和政治委员陈达明接见了，并派翻译谭天和他一块生活。谭天同志向他介绍了我们部队的情况。克尔中尉送到我们纵队司令部后，我同他谈了几次话，主要是介绍东江纵队的发展史，着重强调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

日根据地，部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以及东江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香港沦陷后如何营救盟军人员和国际友人，等等。克尔中尉听了很受感动，表示一定要把他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告诉全世界，一定要把东江纵队的战略地位向他的上级汇报，让全世界都知道东江纵队伟大的工作。克尔中尉在我们司令部住了一段时间，伤治愈后，才送他回广西桂林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基地。三月八日，他写给我们的感谢信中说：“我二月二十一日给你们英勇的人安全地舒适地在敌人中间藏匿起来，然后又送到敌人管辖以外地方去。”“我带着日益增长的奇异来看你们庞大的组织力量、机巧、认真、精力和勇敢。”“中国抗战已赢得全世界的敬仰，而我们美国人亦以能与你们兄弟般一同作战而自傲，在战争里以及在和平的时候，我们永远是你们的同志。”一年后，我们收到克尔中尉（回去后升为上尉）从美国寄来的杂志，里面刊登了克尔中尉画的漫画和他写的东江纵队英勇、机智地粉碎日军搜捕，抢救美国飞行员的惊险故事。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五个飞行员：勒夫哥中尉、拉忽累中尉、沙克上士、康利上士和利斯上士，驾驶 417 号 B25 型轰炸机，在袭击日军运输船时，被击中坠入大亚湾，被我护航大队救起后，送到我们司令部来。我会见了他们，和他们谈了话。休息几天后将他们安全地转送到桂林基地。他们回去后，给我们写了热情的感谢信。勒夫哥中尉在来信中说：“我们五个美国飞行员向拯救

我们的英勇的游击队由衷的感谢”。“我们美国人曾经读过、研究过历史上伟大的军队,但是在所有的历史上,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学问中,我们从来未见过象你们游击队那样勇敢的军队。”沙克上士的来信说:“我们五个美国飞行员答允你们,要将你们伟大的工作告诉给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钦佩你们的伟大的工作,并祝福你们将来获得更大的发展。”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我们又救护了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伊根中尉和美海军第三舰队飞行员克利汉少尉。当他们到达我们纵队司令部的时候,正值日军重新占领了惠州、博罗和东江沿海地区,他们不得不逗留到三月十一日才离开我们。因此和我们的接触比较多,我多次和他们交谈。当护送他们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前,伊根中尉把他的手枪和佩刀交护送人员带回送给我,以表示他对我们的报答。他们回去后多次给我和其他同志来信,表达了他们对我们东江纵队的感谢之情。克利汉少尉在来信中说:“只靠文字不能表达出我对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的感激,它们太不够了。我唯一能报答你们的办法是为你们的工作而说话,这,我保证我将在一切机会都去做。”“一路上,我见到你们的工作成绩,对你们能干的组织没有别的只有赞叹。”“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民将拥护你们,并且你们的努力一定获得成功。”“对你们抗日战争的和建立新中国的成就,我寄以一切可能的祝福”。伊根中尉在将要离开时写的信中说:“和共产党游击

队住在一起是快乐和得到教育的。在和你们短促的相聚中，我见到了真正的中国人，并且增加了我对他们和他们国家的尊敬。”“在十四航空队的工作人员中，共产党游击队有很多朋友和同情者。”

我军营救盟军人员和国际友人的事迹，使盟国人士对于在国民党长期严密封锁下的东江纵队和东江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渐渐有了较多的了解。一九四四年七月，美国的《美亚杂志》发表了题为《东江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文章除评述东江纵队的情况以外，并指出敌后战场的重要与援助在敌后作战的游击队的必要，论述了东江纵队在太平洋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文章写道：“许多月来，《美亚杂志》即已获悉关于东江游击队及中央军多次企图歼灭它的详情。显然地，这支游击队的真实力量，直至香港沦陷以后，很多中外人士都由于他们有效的战斗，才能从日本集中营里逃出来而到达安全地方时，才为人们所注意。”文章分析东江纵队所处的战略地位时指出：“日本军如果占领整个粤汉铁路，便能控制从北平到广州的陆上交通线，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不但将中国切为二段，在衡阳的盟国空军基地，不得不加以破坏，十四航空队在桂林、零陵、湖南、江西及浙江中部的其他机场，也将受到威胁和感到难守。日本还将获得其必需的陆路以补充其与东南亚交通不安全的海路，因而减轻其日益减少的商船后备的重荷，使盟国的作战计划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国民党中央军挡不住日

军打通粤汉线的进攻,唯一办法就是加强在华中华南敌后作战的游击队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以物质上、技术上及经济上的援助加强其抵抗力量。”文章还说:“东江游击队对于盟军将来在华南沿海作战具有极大重要性。盟军在中国海岸的登陆,将不仅需要一个友好的人民,而且需要一个受过训练,并准备积极参加抗日的人民。组织优良的游击队就成为这样的援助的基础。”文章最后提出:“立刻承认这些游击队的存在与潜力,包括派遣联络官,予以技术上与军火的援助,对于我们将来进攻日本的胜利,已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了。”

## 配合盟军作战

我们坚决执行党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营救英军战俘和国际友人及美军飞行员的行动,特别是被我营救的美军飞行员回到第十四航空队报告和宣传的结果,使盟国对我东江纵队和东江抗日根据地,在战胜日本法西斯作战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有了认识。因而驻华的美军司令部和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部决定和我们建立合作关系。一九四四年十月七日,美军派遣欧乐义博士来到我们纵队司令部。他是通过各方面关系,经过韶关和惠州来找到我们的。他来时带有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官陈纳德将军和该航空队驻韶关办事处联络官林露弼的介绍信及克尔上尉的感谢信。欧



乐义博士来我们纵队的任务就是要与我们建立联络和取得我们的帮助,拟建立电台收集港九和东江地区日军的各种情况、气象报告等。九日,我们将欧乐义来东江纵队的情况和任务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阅后,由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于十三日电复我们说:“与欧博士谈话可表示欢迎合作。关于建立电台搜集情报、侦察气象、训练爆破可以答应,如有其他要求,可先向延安请示。”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由我出面会见了欧乐义博士。欧乐义博士是美军战略部陆空作战技术研究处工作人员,他要求建立电台收集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所需的情报,和美军在关岛、菲律宾一线作战所需的情报。他负责的地区只限于东江南岸与广九铁路及香港一带,时间六到八个月。他带来了报务员唐小武(中国人)和电台两部。他以私人名义送我短枪一支,金鸡纳霜千余粒。林平同志把我与欧乐义博士会见的情况,于十七日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东江纵队从创建时起,就建立了一整套的情报工作,工作人员逐渐发展到二百余人,情报站遍布东江敌占区,南起香港,北至广州,东至海陆丰,西至珠江东岸。粤北沦陷后,又扩展到西江、北江。为了同欧乐义博士合作,向盟军提供日军有关情报,我们决定由袁庚组建联络处,具体负责与欧乐义联系。由于我方工作人员的努力,和付出了不少牺牲和代价(牺牲了郑重等同志),搜集了许多重要情报,其中包括日军启德机场和南头西乡机场的图例及说明,日军K型

(神风)攻击机的全部设计图,日军华南舰队的密码和虎门地区巡逻舰艇的报告,广九铁路沿线和稔平半岛、太平、虎门、新界等地日军工事图解,日军根据琉璜岛战败后改进的洞穴式工事构造图,日军第一二九师团南下全过程和作战部署方案等重要文件,日军在香港的机关、军火库、油库、船坞和战舰方位的详图及材料,等等。这些情报,都是先报请党中央同意后才向盟军提供的。对于我们提供的情报,盟军认为非常宝贵,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少将、驻华美军司令部,甚至华盛顿都极为赞赏,认为“第十四航空队驻东江纵队的情报站,是美军在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陈纳德少将,第十四航空队曲江办事处、昆明办事处负责人都给我们发来电报表示感谢。这些电报说:“我们对最近你们供给的特别情报很感谢。同时寄上来的文件,被我们认为:优越,奇异。”“我们这里对收到的文件表示最快慰的祝贺。”“我们对你们近来关于敌军及其活动、驻地和番号的报告特别感到喜悦,这些情报是重要的,实际上它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揭露了敌人的企图和活动,帮助我们的指挥当局取得更好的结论和计划。”“你们关于一二九师团的报告很优越,总部致以谢意。”“华盛顿对发现一二九师团及其消息致以庆贺。”欧乐义博士在调离情报站时给我写了一封告别信说:“你的经过袁(庚)先生的部门所做的情报工作是有显著的成绩的。”“对于你们曾做过的工作,我感到极大满意,请把我的深切情意向尊敬的袁先生及他的工作人员表达。”

我们给予盟军的合作,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贡献,赢得了很好的国际声誉,同时也使我们自己的情报、通信工作得到发展。我们在与盟军合作过程中,发展了许多新的情报关系,收集不少日军内部情况,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帮助党中央对全面情况的了解。同时,我们还通过盟军方面搞到了好几部电台设备,发给还没有电台的指挥部及独立行动的支队使用,扩大和加强了整个部队的通讯联络,还给海南岛,珠江纵队,韩江纵队送去了电台设备。这样他们同党中央和省临委的联系更方便了,这对全广东省游击战争的发展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在与盟军合作过程中,我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随时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我们发现欧乐义带来的报务员唐小武在进行特务活动,偷看我方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企图窃取我电台密码。经多方调查证实唐小武是国民党蓝衣社特务,电台分台长。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欧乐义博士,他把唐小武开除了,并交给我们处理。欧乐义博士要求再派一名美军报务员来,我没有同意,并说服了他,由我方派报务员去帮助他做报务工作。欧乐义博士在东江纵队工作一年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派戴维斯少校来接任,直至抗战胜利。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前,美军曾准备在我东南沿海进行登陆作战。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在华美军司令部派出美海军甘兹上尉率领一个工作组(两个美国人,四个中国人,这四个中国人是国民党军委会外事局派遣帮助工作的)来

到我们纵队司令部,要求协助他们进行沿海测量工作。我们请示党中央同意后,由我接待了他们。在了解到他们要到大亚湾霞涌一带海岸测量时,我派了武装和工作人员护送他们到第七支队部去,由该支队具体协助他们进行工作。第七支队由参谋长赖祥率一个小队的武装,掩护他们在日军警戒部队的空隙中完成了测量工作,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情报。完成任务回去时,甘兹上尉写信给我,感谢我们给予他们的协助。他在信中写道:“我要表示我对我所工作的地区中你的部队所给予的光辉的合作的真诚谢意,由于他们的努力,使我们能获得工作上必需的情报,我喜欢的说,你的部队组织给我很好的印象,他们能力高强,纪律甚好。”

这里还要说一件和英国方面合作的事。日本投降后第八天,英海军夏悫少将奉命率一个陆战旅进入香港接受日军投降。由于英军远在缅甸、澳大利亚等地,运输困难,到九月初,进入港九地区的英军还不足一个团。此时我港九大队,根据党中央指示的精神,正在撤离港九地区,因而九龙新界地区成了真空地带。九月上旬,夏悫少将派他的副官到沙头角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求和我们取得联系,并提出请我方派代表到香港商谈九龙新界地区的治安和有关问题。

我和林平等同志商量并报党中央同意后,决定以袁庚、黄作梅等同志组成代表小组,到九龙半岛酒店英军司令部,同夏悫少将会谈。英军方面希望我们港九大队继续在新界

地区停留一段时间,以保护那里的居民,维持社会治安。我们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留下了必要的干部和部队,组织各地的群众武装,负起了新界地区维持治安的任务。英军方面为了感谢我们友好的合作,和感谢我们过去对他们军政人员的营救及战时的合作,同意我们纵队在九龙设立一个办事处,并帮助治疗我军的伤员。

经过同英方协商,我们东江纵队驻香港办事处设在靠近英军司令部的九龙弥敦道一百七十二号。我们委任袁庚为办事处主任,工作人员有黄作梅、谭干、李冲等,一直到我们纵队北撤,都和英方保持联系。我们纵队北撤后,由黄作梅继任办事处主任。一九四七年党中央派乔冠华、龚澎同志到香港,将该办事处改组为新华社香港分社。

为了帮助治疗我军伤员,英方从缅甸调来一个医疗队,在大埔附近的康乐书院开办了医院,由英军的一位中校军医带领几名英军医生和一批印度籍的卫生兵进行医疗工作,外科的设备比较齐全。我们派了一个卫生队长冯慕贞带领一批卫生员去协助做医疗护理工作,派了一个大队政治委员邓汀去做我们伤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从一九四五年底到一九四六年的二月,这个医院开办了三个多月时间,先后医好了我们三百多名伤员。其中有些是我们自己的医疗队多年来治不好的伤员,经这个医院医治好了。这是我们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和盟国合作进行反法西斯作战的一个成果。

我们部队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和盟国合作抗战,是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并且是在党中央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的。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成绩,得到了盟国的称赞,为我党我军赢得了很好的国际声誉。

## 成立日本反战同盟

在战争的过程中,我们始终贯彻执行正确的俘虏政策。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形势下,一九四四年八九月间,我们纵队政治部专门设立敌工科,加强了对日伪军的政治瓦解和对俘虏的思想教育工作。

敌工科成立后,首批接待的是从广州日本广播局做翻译工作的台湾籍的王祥、方光,他两人由于对日军侵略中国不满和了解到东江纵队是抗日的部队,于是冲破重重困难,来到东江纵队。后来还有一名朝鲜籍青年韩青,他原是日本帝国大学学生,被日军强征入伍,当上了飞行员,驾机执行任务,飞到我们纵队活动地区上空时跳伞降落,被我部救起,也来到敌工科。我们通过他们三人,了解到不少日军内部不可克服并日益发展的民族矛盾、上下级矛盾和求生欲望与战死威胁等矛盾的情况,我们依据这些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

第一批送到敌工科的日军俘虏,是我们海上部队消灭敌运输船俘获的。随着战争的胜利发展,俘虏的日军日益增

多,敌工科的任务也越来越重了。对于这些日军俘虏,我们首先向他们宣传我党我军的俘虏政策。如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搜腰包、不侮辱,有伤病者给予治疗等,安定他们的情绪,生活上给予优待和照顾,供给他们的菜金、服务等标准,都高于我部队干部和战士的标准。他们知道后很感动。有的说,我们日本侵略军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重大灾难,现在被俘虏了,不杀不辱已感激不尽,而且还受优待,白吃饭,于心不安,要求做点有利于抗战军民的事。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他们进行了较系统的教育,如我党我军优待俘虏政策的依据,社会发展史概要,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法西斯必败,各国人民应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等等。

一九四五年五月间,我们纵队领导机关已从惠宝边抗日根据地转移到罗浮山抗日根据地,敌工科带着俘虏住在黄龙观。他们把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冈野进(即野坂参三)在延安组织日本反战同盟的消息向日俘传达,他们经过认真的讨论,自愿要求成立自己的反战组织。在战俘中除日籍的以外,还有朝鲜籍和台湾籍的。经过短期的筹备,六月十七日,首先成立台湾人民解放同盟。六月二十五日,成立了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南支部。六月三十日,又成立了朝鲜人民独立同盟华南支部。日共总书记冈野进来电祝贺,感谢东江纵队的帮助,使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南支部胜利成立。我和纵队其他领导同志先后去探望过他们,鼓励他们为消灭日本法西斯而共同努力。三个反战同盟成立后,反战同盟的盟

员积极要求参加反战工作，他们主动编制日文的反战传单，到前沿阵地进行喊话，开展政治攻势，号召日军反战。这些活动，对日军起到一定的宣传瓦解作用。

日军投降时，日本反战同盟、朝鲜人民独立同盟和台湾人民解放同盟的成员，和我一起到东江以南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有的到日军驻地进行劝降，有的协助安排投降的日本官兵，了解他们的情况，向投降的日本官兵进行解释说服工作，以及协助做好战俘的遣返工作。当日本反战同盟和朝鲜独立同盟的成员回国时，他们都依依惜别，表示感谢东江纵队对他们的挽救和教育。



## 第十二章

# 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大发展

### 土洋会议

一九四四年八月，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在路东解放区的土洋村召开了联席会议（简称土洋会议）。会议主要是贯彻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在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史上，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会议指明了全面发展华南抗日武装斗争的方向。会后华南抗日武装斗争普遍开展了起来，斗争的范围从局部性转为全面性，从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斗争形势由局限于一隅向梅花点式的全面发展。抗日武装不断壮大，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土洋会议当时是在什么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的精神是怎样贯彻执行的，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很为令人兴奋的。

一九四四年上半年，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这半年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苏军把德军赶出了苏联国土,把战争推到了德国境内。六月,美英盟军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使德军陷入苏联红军和美英盟军的東西夹攻之中,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战场上的地位摇摇欲坠。在亚洲战场上,美军在太平洋逐岛和越岛进攻,日本侵略者逐渐失利。德日法西斯已面临最后覆没的命运。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它在太平洋战场的防御力量,企图以中国大陆作为垂死挣扎的基地,实施了打通从东北到广东、南宁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使在中国大陆的日军与孤悬于东南亚的日军联系起来的战略计划。三月,日军首先发动了河南战役;四五月间,日军打通了平汉铁路,从国民党军队手里夺取了郑州、许昌。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六月至八月日军又占领了长沙、衡阳。日军还继续南下,进行打通湘桂铁路和粤汉铁路南段交通线的行动。

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于七月二十五日两次来电指出: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和游击根据地,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的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一旦日军打通湘桂铁路和粤汉铁路南段,华南将沦于敌手,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的作用和责任将日益增大。如果美英盟军在太平洋上继续作战取得胜利,接近中国南方海岸,实行对日反攻,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将成为一支与盟军直接配合作战的重要力量。因此,你们应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之方针,加强进行工作。(一)凡敌向北侵占之地区,

只要有久占意图,即应派出得力干部或武装小队到该地区与当地党员取得联系,尽量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并将现有武装扩大,提高战斗力;(二)对国民党军队所在地区,仍应坚持隐蔽待机之方针勿变,但可斟酌实情抽调一部份干部转到游击队受训,参加游击工作;(三)应派人设法与琼崖游击队打通电台联系,如有可能还应派人至广州湾附近发展抗日武装。此外,对港九市区进行武装斗争问题也作了具体指示,还询问了与潮梅、闽西南最近有无联系,潮汕附近有无发展游击战争可能,等等。

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就是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这个重要指示,而决定召开这次联席会议的。出席会议的有:林平、梁广、连贯、曾生、王作尧、杨康华、罗范群等同志;列席会议的有:饶彰风(蒲特)、邓楚白、黄宇、李嘉人、饶璜湘等各地区负责人。会议由省临委书记林平主持,深入讨论了党中央的指示,分析了广东和东江地区的斗争形势,并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在军事工作、政治工作、政权、财政经济、大城市工作以及恢复和加强地方党组织的活动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决定。

在军事工作方面,会议决定:

(一)在目前敌人的新攻势中,凡是敌人所到的或意图久占的地方,都应派遣武工队前去活动,发展新的游击区,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同时,必须巩固现有的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成为反攻的基地。东江纵队首先应创立罗浮山以

北、翁源以南、东江、北江之间的抗日根据地，并向东江、韩江之间（潮汕在内）伸展。然后，准备向闽粤边、粤赣湘边、粤桂湘边开展工作。中区部队则首先求得普遍发展，然后向西江、粤桂边及南路前进。东江纵队和中区部队两方面的发展要互相配合，取得对广州的包围形势，将来会合于粤桂湘边。

（二）大力发展武装，扩大部队。确定到明年上半年，东江纵队应发展四倍，中区部队应发展六倍。

（三）作战方针仍然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但不放松向运动战发展，主要打击对象是伪军，先消灭其最弱、最坏的部分。对日军避免打硬仗。对顽军坚持自卫的反磨擦斗争。在顽军准备向我进攻时，应主动出击，消灭其一部。

（四）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树立革命军人的思想。

（五）普遍建立不脱产的民兵和脱产的游击队，扶助其发展，加强其领导。

（六）为适应目前作战的需要和照顾将来发展，建立支队编制，下辖三个大队。今年底，东江纵队应建立一个主力团，中区部队应建立主力大队。

在政治工作方面，会议决定：

总的任务是巩固部队，动员群众，瓦解日伪军，粉碎反动派阴谋，迎接大变化的到来。

（一）在全军进行思想教育，开展整风学习，进行模范工作者运动。

(二)加强宣传工作,扩大我军政治影响。

(三)广泛进行组织群众工作。

(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争取中间人士。

(五)在职干部进行业务教育和整风学习。大量吸收和训练知识青年,培养成为干部。

(六)加强军队中党的工作,加强党员教育,严格组织生活。

(七)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使能起到根据地及后方的作用,并向新地区发展。

会议还决定恢复和加强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号召共产党员都要参加到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革命斗争中来,为在全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而奋斗。

为了加强抗日武装的领导,广东军政委员会由七人增加到九人,增加梁嘉和刘田夫两位同志。

我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对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是这样领会的:在广东全省范围内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发展游击区,把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战略决策啊!全国抗战已经七年了,我们东江的抗日游击战争也已经六年了。我们从零开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们的部队在艰苦曲折的斗争中已发展到四千人,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屹立在东江和港九地区。根据这次会议重大的战略决策,在我的脑子里呈现这样的画面:我们

的部队向着粤北、粤赣湘边，向着粤东、闽粤赣边，向着粤西、粤桂湘边挺进，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将从东江一隅脱颖而出，向四面八方扩展。

会后，省临委将会议情况向党中央和南方局作了报告。党中央复示：省临委的决议与中央精神相符，中央完全同意会议所提出的工作方针和任务，要动员全省党员为实现“八月决议”而努力，并要注意开展广西和向北发展的工作。

大力发展武装，组织部队北进、东进，并配合粤中部队西进，开展全省的抗日游击战争，这是土洋会议赋予我们东江纵队的首要任务。我们把会议的精神向干部作了传达，干部们欢欣鼓舞，积极准备为实现省临委的决议而战斗。

## 扩大武装力量

土洋会议决定要大力发展武装，扩大部队，要求我们东江纵队在现有四千人的基础上，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发展四倍，这是一个非常光荣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扩大部队，一要有兵源，二要有干部，三要有武器装备，这些从何而来呢？

根据会议决定的精神，我们纵队的兵源主要来自人民群众和抗日自卫队。会议结束后，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即派出黄宇、谢鹤筹、张持平、黄庄平等到“前东”（东江的前部地区），梁威林、饶璜湘到“后东”（东江的后部地区），黄松

坚、邓楚白到粤北，周楠、温焯华到南路，大力组织和发展武装，配合部队北进、东进和西进。这就为我们纵队挺进粤北、粤东的部队，准备了扩军所需的兵源。同时，我们要求东江老根据地的党和抗日民主政权，继续发展抗日自卫队，为战斗在老根据地的部队提供后备兵源。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伪军的起义将会增多，我们要求驻有伪军较多的路西部队，应特别加强争取伪军起义的工作，以扩大兵员的来源。

干部问题我们已经着手解决，东江军政干校已经建立了起来。我们计划集训现职中队级和小队级干部，争取培养为大队级和中队级干部；招收青年学生并抽调现职班级干部去成立学生队，计划每期二百多人，半年一期，争取一九四五年培养出五百名左右的小队级军事干部。青年干部训练班也已经开办，计划每期一百多人，两三个月一期，到一九四五年底办七八期，争取培养一千名左右的基层政工干部和其他干部。

至于武器装备，纵队要求各部队多打干净利索的歼灭战，多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自己。

根据土洋会议的决定，和部队迅速发展壮大的情况，我们纵队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从一九四四年九月起，陆续建立了支队的编制。在路西，以东莞大队、宝安大队和第三大队一部为基础，组建了第一支队，支队长卢伟良，政治委员陈达明。在路东，以惠阳大队、铁东大队、独立第三中队等部

队为基础,组建第二支队,支队长蔡国梁,政治委员张持平。以主力第五大队为基础并从路西调出一个新兵大队,组建了第三支队,作为超地区性作战的主力支队,支队长彭沃,政治委员陈志强。十二月,为了执行北进战略和开辟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以第三大队为基础,加上北江特委领导的地方部队,组建了北江支队,支队长邬强,政治委员李东明;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抽调骨干和兵力,加上北江特委领导的地方部队,组建了西北支队,支队长蔡国梁(第二支队由叶锋接任支队长),政治委员邓楚白;以独立第二大队和第三大队一部及增龙博独立大队等部队为基础,组建第四支队,支队长阮海天,政治委员黄业;以惠队大队一部和护航大队一部为基础,组建了第五支队,支队长刘培,政治委员饶璜湘。

在我东江纵队胜利发展的时候,广东大陆各个地区的抗日武装,根据党中央七月二十五日指示和土洋会议精神,在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先后成立了珠江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韩江纵队等兄弟纵队。

关于珠江纵队和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的成立。战斗在珠江三角洲的人民抗日武装,在一九四三年二月挺进中山县五桂山区后,积极向日伪军出击,在战斗中壮大了部队,巩固和发展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根据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在内部宣布成立广东人民



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司令员林锵云，政治委员罗范群，副司令员谢立全，参谋长谢斌，政治部主任刘田夫。中区纵队成立后，一部分向粤中（鹤山、高明、新会）地区挺进；一部分留在珠江三角洲坚持斗争。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为了便于领导和指挥，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留在珠江三角洲的部队正式宣布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政治委员梁嘉，副司令员谢斌，参谋长周伯明（一九四四年十月从东江调到珠江三角洲），政治部主任刘向东。纵队下辖两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大队，共二千七百余入。

一月二十日，挺进粤中的部队，正式宣布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亦称粤中纵队）下辖四个团，司令员梁鸿钧（东江纵队成立后在军政委员会任职，后调到粤中地区），政治委员罗范群，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谢立全，政治部主任刘田夫。

关于南路人民解放军的成立。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军在钦州、防城地区登陆，我党通过统战工作，在合浦、灵山、防城等地，建立了“灵山青年抗日游击队”、“灵山人民抗日自卫大队”等抗日武装，在南路开展了游击战争。一九四一年九月，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被迫转入地下，用分散隐蔽形式坚持斗争。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六日，日军在雷州半岛东海岸登陆，海康县、遂溪县、广州湾（现湛江）先后沦陷。中共南路特委领导南路人民，在雷州半岛恢复了抗日游击战争。一九四四年十月，成立了“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下辖三个大队。一九四五年一月，南路特委发动了高雷地区和

钦廉地区四属的抗日武装起义，在各地普遍建立抗日武装的基础上，在吴川县宣布成立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楠，参谋长李筱峰（即何维，从东江调去），政治部主任温焯华。下辖两个支队、一个独立大队，共三千人。

关于韩江纵队的成立。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日军攻占汕头后，中共潮汕中心县委组建了“潮汕青年抗日游击队”，在潮汕敌后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一九四〇年四月，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被迫解散，成立两支秘密游击小组，转入地下坚持斗争。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日军侵入潮汕腹地，揭阳、普宁、惠来等县相继沦陷。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潮梅特委恢复活动，积极领导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一九四五年二月，成立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在斗争中迅速发展。一九四五年六月，正式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简称潮汕韩江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美南，军事顾问谢育才。下辖三个支队，共二千余人。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兴梅地区的抗日游击队，又组建成了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简称兴梅韩江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碧山，共二百余人。

从一九四三年十月东江纵队成立，到一九四五年六月潮汕韩江纵队成立，在广东大陆先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七个抗日游击纵队。朱德总司令在党的“七大”作《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及以后新华社的有关报导中，都把广东各抗日游击纵队，包括琼崖独立纵队，统称为华南抗日纵

队。

华南各抗日游击纵队，在党中央、南方局、广东省临委的领导下，始终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榜样，坚持党的领导，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不断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提高战斗力，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努力奋战。

## 全面开展游击战争

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遵照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精神，全力贯彻土洋会议决议，在广东全省范围内发动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坚决把北进、东进和西进的战略决策付诸实施。

根据土洋会议的决定，和广东省临委及军政委员会的指示，我们东江纵队担负了北进和东进的战略任务。北进是我们纵队也是全省的主要战略方向，必须着重抓好这一环。为了实现北进的战略要求，首先要做好两件事：一件是派出一支精干的部队挺进北江英德、清远、从化地区，摸清日军的动向和顽军的情况；另一件是创建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以便把全省的抗日指挥中心和我们的纵队的领导机关从东江以南转到罗浮山地区，使即将建立的东江以北抗日根据地和东江以南的抗日根据地连贯起来。

挺进北江先遣队的行动。一九四四年八月下旬，我们决

定由邬强同志率领第三大队部分主力组成挺进北江先遣队向北江挺进,以弄清日军的动向。先遣队由东莞出发,打下企石,渡过东江河,穿过博罗,渡过增江,在福和同何维同志率领的独立第二大队一部会合后,继续向北挺进。八月底进入从化的高平、秋风洞、田心乡至花县狮前等地停留,派出小分队分头侦察日军动向。他们从各方面侦察调查的材料证实,日军在广州的第一〇四师团,为了打通湘桂铁路,抽出一部分主力向北佯动,然后转而从西江向广西推进。为了进一步摸清日军的行动意图,相机打击敌人,为尔后进入北江做好准备,先遣队尾追日军到清远,袭击其后续部队。当我部进入从化银村、石连、丁坑一带时,国民党第六十五军一个团会同从化自卫队及清远濠江自卫团向我进攻。我先遣队被迫奋起自卫还击,激战一天,打退了顽军的进攻,渡过北江,于九月九日夜袭清远城,截击日军第一〇四师团进攻广西的后续部队,解放清远城。随即召开几千人的大会,宣传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辉煌战绩,宣传我党的抗日路线、方针和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阴谋,博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拥护。三天后,顽军向清远城进攻。鉴于已摸清日军的动态和顽军的情况,同时粤汉铁路南段暂时还没有日军,于是先遣队撤回增城待命。十一月上旬,邬强同志回到司令部向我们汇报了情况,并建议迅速组织部队北进。我们考虑到日军还没有打通粤汉铁路南段,从化、清远还是国民党统治区,顽军的力量

还相当大,因而没有立即组织部队北上。后来才想到,我们当时过于慎重了。事实上,当时广州市以北,从化、清远以南,有一块相当广阔的敌后战场,如果当时就组织一支有力的部队进入该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好基础,就可以在不久之后日军发动打通粤汉铁路南段的作战行动时,不失时机地向北推进,从而为我们实施北进战略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创建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我们纵队领导分工由王作尧和杨康华同志领导这一任务的实施。罗浮山是广东省的名山之一,位于东江河以北,它的东面是博罗县,西面是增城县,北面是龙门县。日军的主要据点在其西南的石龙镇和西北的增城,外围据点驻有伪军。从其北面的正果开始沿永汉向东到平陵、公庄、杨村、柏塘、响水及到南面的长宁一带,驻有顽军的保安第八团、梁桂平支队等地方团队。我们纵队的独立第二大队活动于增城以西至广州东郊;新建立的增龙博独立大队活动于罗浮山的西北地区。为了加强我们纵队在罗浮山的力量,为了给创建罗浮山抗日根据地打下更好的基础,一九四四年七八月间,由韩继元、赖祥率领“三九队”和从港九大队抽调出来的一个独立小队,北渡东江,进入罗浮山西南、增江河以东地区,会同原来在这里活动的一个中队,组建了独立第三大队。大队建立后,对日伪军和顽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九十月间,袭击了盘踞鸾岗(距石龙约五公里)的伪军李潮“抗红义勇军”,用连续爆破炸毁敌炮楼五座,歼敌一部。日伪军八百多人从石龙

来增援,被我击退。这一仗,共歼敌一个连,我中队长陈廷禹同志等七人牺牲。十一月初,刚返回增城的挺进粤北先遣队和独立第二大队,袭击新塘火车站,全歼伪军一个连,俘日军站长阿南中佐。十二月,第四支队成立后,于罗布洞一带两次击退顽军别动大队的进攻,毙伤其数十人(包括击毙少校中队长一名)。我支队作战参谋肖光生同志英勇牺牲。

日军打通了粤汉铁路北段,结束了湘桂战役后,于十一月又着手进行打通粤汉铁路南段的战役,目的是将平汉和粤汉铁路全线打通,以支持其在太平洋的作战。十二月,驻湖南、广东和广西的日军一齐出动,夹击粤北,顽军退向粤赣边。一九四五年一月,日军占领韶关,整个粤北沦陷。同时,日军为了防止盟军在华南沿海登陆,出动了两个师团的兵力,攻占粤东沿海地区。在东江,日军两路进攻惠宝沿海地区,一路从樟木头沿惠樟公路进逼惠州;一路在大亚湾澳头再次登陆直取惠州,驻惠州的顽军又是闻风逃遁,惠州再度陷入敌手。为配合进攻惠州的行动,增城日军一部沿增博公路进占博罗城。顽军梁桂平支队逃向泰尾、柏塘一带和东江河以东地区。我独立第三大队尾随日军之后,进入罗浮山以南以东地区打击敌人,控制了东江河以西地区,扩大游击区。第五支队挺进惠阳紫金边,控制东江河以东地区。第二支队一部挺进东江河南岸,扫除伪军据点,占领了石排、企石、桥头。第四支队和独立第三大队相配合,控制了东江河北岸石滩至苏村一带地区,迫使日伪军龟缩于石龙镇。至

此,东江南北两岸交通已被打开,为我们纵队领导机关和大部队北渡东江河铺平了道路。

一九四五年二月,王作尧和杨康华同志率领北江支队、西北支队、第五支队和东江军政干部学校等,进抵罗浮山以南的长宁乡和以东的横河乡一带。同时,新组建的独立第一大队,也深入到博罗、河源边,发动群众,开辟新区,很快在古岭地区组织农民武装,建立了古岭大队。王作尧和杨康华同志抓住主力集中的机会,组织北江支队、西北支队、第五支队和独立第三大队,攻打麻榨、永汉、正果等地顽军据点,粉碎了顽军企图进犯横河的阴谋。由于北江支队和西北支队的任务是要迅速北进,因而没有让他们在这里参加更多的战斗。

三月,第三支队渡过东江,进入博罗,会同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和独立第三大队,扩展和巩固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罗浮山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横扫日伪顽军。三月中下旬,首先于罗浮山以北地区,清除顽军的地方团队,打开向增城、从化、龙门发展的通道。四月上中旬,于罗浮山以南,东江河北岸地区的礼村、马嘶、晋村等地,痛打伪军李潮、陈禄部,共歼敌一个团。五月中旬,先于福田击退增城日伪军千余人的进攻,横扫博西敌人;接着又击溃了进攻响水、横河的顽军梁桂平支队,追击中解放了公庄、柏塘。经过三个月的战斗,局面打开了,博罗全境(除县城外)以及罗浮山周围的增城、龙门部分地区牢牢地掌握在我手中,东

江河南北两岸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在胜利声中，五月下旬，省临委和东江纵队领导机关及直属队进入罗浮山抗日根据地，省临委机关和东江纵队司令部及电台设在有名的道教胜地冲虚观。从此一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里成了华南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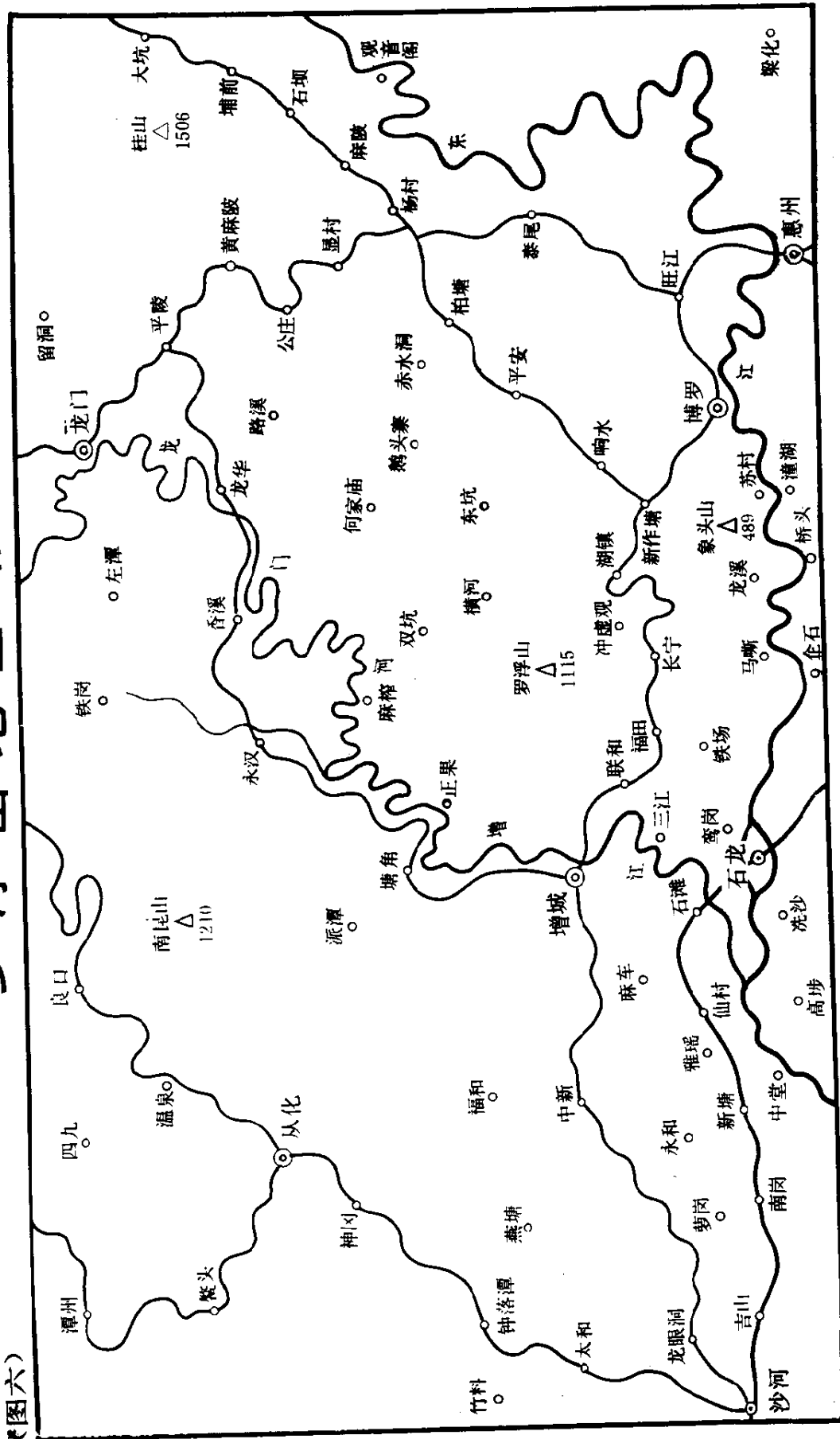
我们纵队领导机关转移到罗浮山抗日根据地后，为了统率东江以南地区（包括海陆丰和港九地区）的部队，建立了江南指挥部，指挥员卢伟良（第一支队长由黄布接任），政治委员黄宇，参谋长高健，政治部主任陈达明。

北江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一九四五年二月，邬强、李东明同志率领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北江支队，蔡国梁、邓楚白同志率领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西北支队，并肩由增城出发，渡过流溪河，经从化、佛冈向英德挺进。部队到达英德后省临委委员梁广同志在鱼湾坝仔召集了地方和部队领导人的联席会议，北江特委副书记兼路东工委书记谢永宽等地方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分析研究了北江形势，决定了部队的行动方针、政策以及地方配合部队行动等一系列问题。会后，按照我们纵队规定的方向，北江支队在粤汉铁路以东活动，稳步地沿铁路向北推进，发展粤赣湘边的抗日游击战争。西北支队突过北江河，进入英德、清远地区作为立脚点，然后继续向小北江前进，发展粤桂湘边的抗日游击战争。

在北江支队和西北支队未进入英德以前，根据形势发



# 罗浮山地区略图



(图六)

展的需要,北江特委在长期统战工作的基础上,以莫雄为司令,黄桐华(中共党员)为副司令的国民党第七战区挺进第二纵队(简称“挺二”)的名义,在英德东部成立了“挺二”的独立第四大队,活动于英德、翁源等地。同时从“挺二”中拉出第五中队、第九中队合编为“西北同盟军”,活动于北江西岸英德、清远边地区。此外,这个期间地方党已在北江各地组织了好几个抗日游击大队:如在始兴,组建了风度大队。在新丰、曲江、英德、佛冈和靠近粤汉铁路的沙口方向,亦组建了抗日武装。北江支队进入英德地区后,“挺二”独立第四大队改称的英翁边大队,新丰、曲江和英佛边的抗日武装扩编为新丰大队、曲南大队和英佛边大队,编入北江支队建制。

三月,北江支队为了打开局面,在粤汉铁路南段的望埠、沙口、大坑口一线展开破击战,消灭望埠伪区公所和联防队,在沙口和大坑口各歼日军一个班。接着,在金山径一带山地,击破了日伪军报复性的进攻。从而鼓舞了当地群众抗日斗争的情绪,为发动群众,发展部队,创建抗日根据地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四月初,英德“国民兵团”副团长胡杰夫在英东桥头召开反共会议,策划反动势力组织反动武装,妄图把我北江支队赶出英德地区。北江支队在地方党配合下,里应外合袭击了会场,一枪不发,将胡杰夫等三十几个反动分子全部活捉。经过对他们的教育和斗争,他们认了罪,并在群众大会

上坦白交待后，释放了他们。这次斗争不仅粉碎了反动势力的阴谋，而且对开展北江地区的统战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时英德东乡地区已全部解放，成立了七个乡的抗日民主政权——抗日动员委员会。四月底，英、佛、新顽军游击指挥官曾绍基指挥一个团，配合地方反动武装共约一千多人，从翁源、新丰向英德东乡地区进攻。我北江支队以少数兵力在正面牵制敌人，主力迂回到敌侧后，摧毁了佛冈县三江区公所、烟岭顽军留守处、英德白沙区公所等反动机构，共歼土顽一个中队，然后迫近顽军位于潭头的指挥所，进行前后夹击，经两天战斗，歼灭敌人一部，俘敌副指挥官廖毓清等三十余人，粉碎了顽军的进攻。五月，在望埠附近歼灭顽军别动队一个大队；在翁源县狮子岭伏击顽军，歼灭翁源县大队一个中队。七月中旬，在英德县大镇圩击退顽军曲江县大队的进攻，并追至打油岭一带，将其大部歼灭；接着向北挺进，在新江全歼土顽何子华联防大队，击毙何子华等，俘一百余人。至此，翁源县南中部大片地区获得解放，为向北发展打开了通路。

北江支队进入北江地区半年多时间，经过连续的战斗，发展到一千余人。活动地区由英德东部扩展到佛冈、新丰、翁源等地，在粤汉铁路以东成立了县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北江东岸抗日行动委员会，人口二十余万。北江抗日根据地在英德、佛冈、翁源、新丰边建立了起来，并在日伪顽军的夹击下屹立于粤汉铁路以东地区。

西北支队于二月下旬西渡北江后,与由“挺二”改编的西北抗日同盟军会合,并将其编为该支队的第三大队。随之在清远县黎洞召开了干部会议,分析了敌情,研究了行动部署。决定以清县的大罗山文洞为中心创建抗日基地,然后向英德西部、乳源、阳山、连山方向发展,配合粤中部队创建粤桂湘边抗日根据地。

三月初,西北支队向日伪顽军展开了攻势,首先向北攻占了鱼咀圩、鱼坝圩和樟木坑、珠坑等地,共歼顽军别动队和土顽两个中队,直迫顽军重要据点龙颈镇。接着向南打下横石圩、高田圩、石鼓墩、迳口等地,又歼顽军别动队两个中队,直迫清远城。从而打开了局面,并使从连江口至滘江口段的日军北江运输线直接暴露在我军火力袭击之下。三月中旬,出击日军的战斗首战告捷,在北江西岸南坑圩附近伏击日军运输船队,击沉敌机帆船三艘,全歼日军一个多小队。这是我们这支游击队,一次歼灭日军最多的一次战斗。至七月止,共击沉、击伤日军船只七十余艘,毙伤日伪军二百余人,使日军在北江的水上运输陷于瘫痪状态。

西北支队经过五个多月的紧张战斗,解放了二千五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二百多个村镇,迫使日伪军龟缩于清远城,顽军龟缩于龙颈镇。随着军事行动的胜利,和民运队深入进行群众工作,群众发动了起来,在已解放的地区,建立了乡村两级政权和抗日自卫队,在北江西岸开辟了以文洞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向东挺进。从惠宝边抗日根据地向东发展，是我们纵队早已确定的方针，从一九四三年七月护航大队建立后，就已开始实施。土洋会议更明确地提出了向东江、韩江间（潮汕在内）伸展，开辟闽粤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要求。因此，我们纵队在组织力量向北挺进和同时，也积极组织力量向东挺进。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占领汕头的日军第一三〇师团向潮汕腹地进攻，揭阳、普宁、惠来等县相继沦陷。一九四五年一月，日军再次在大亚湾登陆，占领了惠阳、海丰、陆丰等县的沿海地区，其第一二九师团驻淡水地区，第一〇四师团驻海丰地区。这样，粤东沿海各县全部沦入敌手。这个形势，也就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东进作战的敌后战场。为了执行土洋会议确定的东进的战略要求，我们纵队决定由吴海和黄秉同志率领独立第四大队（即护航大队）一部挺进海陆丰。二月初，到达大安洞与地方党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后，首先在流中圩抗击从汕尾来犯的日军，击沉敌船两艘，歼敌数十人，鼓舞了海丰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接着，在赤石、青坑、可塘、何大、上告、沙港等地，不断打击敌人，部队在战斗中很快发展到四百多人。

但是形势发展很快，粤东沿海各县敌后的党组织和群众，都热切要求我们纵队尽快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我们已经挺进海陆丰的力量还不大，亟需要加强。可是，当时我们手中已经没有机动力量可以派遣了，怎么办？唯一的出路就

是设法组建新的部队。

从一九四三年以来，以惠东地方党组织为主加上部队的民运队，在惠东稔平半岛先后建立了十三个乡的抗日自卫队、联防队、常备队等名目的群众武装组织，有的队伍经过了多次的战斗考验和锻炼，已经具备条件在惠东建立一支新的部队，坚持惠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一九四五年二月，我们决定撤销大亚湾人民抗日自卫总队，将原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武装改称江南大队，编入第二支队建制，继续在大鹏半岛活动；将原护航大队的海上部队和港九大队的海上部队合编，仍称护航大队，继续在大鹏湾和大亚湾活动；由叶基、曾源同志率领独立第四大队一部等部队东进，与独立第四大队已东进的那一部分和独立第六大队以及海丰县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武装，组建第六支队，支队长叶基，政治委员曾源。派黄宇、高健、黄闻同志率领原惠阳大队部分骨干到惠东的百花地区，在饶彰风同志指导下，抽调当地人员素质较强，武器较好的地方武装，组建第七支队，支队长高健，政治委员黄宇，任务是巩固惠东、稔平半岛，发展惠东抗日根据地，配合第六支队向韩江推进。

第七支队建立后，积极打击日伪军。二月上旬，首先在淡水东门外全歼日军运输队一个班。四月下旬，在稔平半岛的油甘埔，再歼日军一个班。接着又于淡水至百花之间的肖屋楼，全歼日军一个班；并在惠淡公路进行伏击战，毙伤日军二十多人。为了使惠东和海丰连一片，打通东进通道，五

月中旬,我们决定第六支队和第七支队各派一个大队协同作战,拔掉顽军建立在惠阳、海丰边的据点——赤石。经过一天激战,攻克赤石,歼敌两个排,余敌向北逃窜。我第七支队副中队长高山同志,第六支队政治指导员陈柏同志和五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第七支队这支全部由地方武装组建起来的部队,经过频繁的战斗锻炼,迅速发展壮大,在日本投降前,已发展到七个大队一千多人。他们在与日伪军作战的间隙,还大力协助惠东地方党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成立了四个区政府、十八个乡政府、三个镇政府,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县一级政权——惠东行政督导处。各级政权都建了抗日自卫队,乡有小队,区有中队。从而建成了有四十多万人口的惠东抗日根据地。

第六支队建立后,划分了各大队的活动地区:独立第四大队在海丰东南平原丘陵区可塘、青抗、汕尾等地活动;第五大队在海陆丰、惠阳边山区的公平、黄羌、高潭等地活动;海丰大队在海丰西部山区的大安洞、赤石、热水洞等地活动;独立第六大队在惠东的多祝、增光等地活动。为了发动和组织群众,壮大部队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各大队以小队(甚至班)为单位,配合民运队和地方党组织分散活动,进行小规模战斗,形成农村包围城镇的局面。同时亦视情况需要,集中大队或中队的兵力作战。支队建立以来较大的战斗有:赤石、梅陇、鲘门、大安洞、高潭、新庵等一系列战斗。由



于海丰人民受过土地革命的薰陶,有深厚的革命传统,加上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影响,人民群众抗日热情很高,到四五月间,先后在第一、五、六、九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各区建立了抗日救乡自卫大队(共约一千人)。第六支队的活动地区从而不断扩大并向陆丰县扩展,又组建了海陆大队、救乡大队和第七大队。海陆大队在海丰西南部的鲘门、园潭、鹅埠一带活动;救乡大队在梅陇一带活动;第七大队在海丰东北部的九龙山、公平一带活动。至此,全支队发展到七个大队,一千多人,并创建初具规模的海陆丰抗日根据地。

当我们纵队向东挺进的时候,潮汕韩江纵队在战斗中也已发展到二千多人,活动地区包括普宁、揭阳、潮安、饶平、潮阳、澄海、惠来等县的部分地区。一九四五年七月,成立普宁县流沙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大南山、南阳山、大北山、凤凰山等抗日根据地,与闽西南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相配合,开展闽粤边的抗日游击战争。我们纵队第六支队与潮汕韩江纵队取得联系后,互相配合并肩战斗,使潮汕地区成为华南敌后的又一个重要战场。

向西挺进。西进虽然不是我们东江纵队的主要任务,但我们的西北支队负有配合的使命。在我们纵队按照省临委的指示,执行向北、向东挺进任务的同时,珠江三角洲的兄弟部队也根据省临委的战略部署,一方面在老根据地坚持斗争,一方面组织力量向广东省的西半部,向粤桂边地区挺

进。

一九四四年十月，中区纵队在中山县五桂山区召开了会议传达土洋会议精神，决定组成五百余人的部队，由林锵云、罗范群、谢立全和刘田夫同志率领，向西，向粤中挺进。十月下旬，挺进部队在新会县塔岗西渡西江，于棠下与新会大队会合，向大泽、司前等日伪军据点发动攻击。随后进至高明、鹤山边的宅梧、更楼地区，与高明大队会合。十一月中旬，在反击顽军第一八七师和地方部队的战斗中，歼灭顽军挺进第三纵队一个中队，并争取一个中队战场起义。挺进部队一系列的胜利战斗，为创建新会、高明、鹤山边以皂幕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一九四五年二月下旬，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成立后，梁鸿钧司令员率主力四百余人继续向西挺进，执行党中央和省临委开展粤桂边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二月二十二日，部队途经新兴县蕉山时，遭到顽军第一八七师优势兵力的围攻，受到严重的挫折，七十余人牺牲，七十余人被俘，司令员梁鸿钧同志也壮烈牺牲。这个消息我们较迟才知道。当听说他已牺牲时，我和同志们都非常悲痛。回想在东移和在大岭山区的困难时期，梁鸿钧同志和我们在一起艰苦奋斗，令我深切怀念。他的牺牲是我们广东人民抗日武装部队的一大损失。蕉山战斗后，粤中部队分两路突围到恩平县清湾休整。然后第一团转回高明与第三团会合，在皂幕山抗日根据地坚持斗争，第一团和第四团在恩平、台山边地区开展斗

争。

一九四五年三月，珠江纵队为执行向西挺进的战略任务，决定由梁嘉、谢斌和刘向东同志率领第二支队和独立第三大队一部共四百余人，组成西江挺进大队。四五月间，珠江纵队分别在禺南和五桂山区，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西江挺进大队于五月十五日从南海县黄洞出发，向四会、广宁挺进。十九日到达广宁县罗汶后，与西江人民抗日义勇队（西江临工委领导的广宁、四会起义部队所组成）会合，粉碎了顽军的进攻，站稳了脚跟。仅两个月时间，就开辟了以广宁为中心的广（宁）四（会）清（远）高（要）怀（集）边抗日根据地。他们与我们纵队挺进北江在清远、英德边活动的西北支队遥相呼应，相互配合执行向粤桂湘边发展的任务。

在粤中的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向西挺进的同时，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在高雷和粤桂边积极开展斗争，配合粤中部队的行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省临委与国民党元老李济琛先生建立了抗日统战关系，从政治上、经济上支持李济琛先生的抗日活动。省临委还布置南路特委积极推动著名抗日将领张炎将军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在吴川县成立“高雷人民抗日军”，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雷人民抗日军成立后，与我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并肩作战，共同抗日和反对内战，迅速控制了吴川县全境。二月上旬，两军在中垌会师，向粤桂边进军，开辟廉（江）化（州）陆（川）博（白）边抗日根据地。

国民党顽固派对张炎将军的爱国行动极端仇恨，乘他离开部队去广西找李济琛先生联系时，在博白县将他逮捕，三月十二日在玉林县杀害。对于张炎将军，前文已经交代，我早在从事海员工作时就和他认识。对于他大义凛然的抗日爱国行动，我感到十分高兴和鼓舞；对于他的英勇就义，我感到非常沉痛！

国民党顽固派杀害张炎将军后，大举向我进攻，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决定分兵，一部分留在粤桂边开展抗日斗争，一部分转回高雷敌后，开辟遂（溪）廉（江）化（州）边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并继续配合粤中部队的西进行动。

海南岛人民的英勇斗争。南路人民解放军根据省临委的指示，开辟了雷州半岛西岩至海南岛的交通线，打通了与琼崖独立纵队的联系。一九四五年三月，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派了联络员符铁民（符气岱）同志到海南岛阜龙的文头山，转达了党中央对琼崖抗日军民的慰问，并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要求琼崖独立纵队迅速扩大部队，巩固中心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符铁民同志回来时，我们纵队和省临委领导机关已经转移到罗浮山冲虚观，听了他对琼崖军民斗争情况的介绍，心情激动。他们的斗争环境非常残酷，而又为海洋阻隔孤立无援。我们纵队虽然也是孤悬敌后，但是通过电台，经常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而他们那时还没有电台，不能及时得到

党中央的指示，全凭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在那里艰苦奋斗，实在令人钦佩！

一九四二年一月下旬，他们在文昌县大水村同顽军进行了一场，在琼崖革命斗争史上战斗规模最大，战斗时间最长（五昼夜），战斗最激烈、残酷（双方均伤亡数百人）的战斗。这场战斗，显示了琼崖的战友们不畏强敌，敢打敢拚的革命英雄气概。无疑这种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应充分发扬，但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游击队还是要尽量避免正面硬拚的作战。

从一九四二年五月至一九四四年一月，日军集中了四千余人的兵力，在顽军保安第六团、第七团的配合下，对琼崖独立总队的琼文等抗日根据地，分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蚕食”。他们机动灵活地采取了伏击战、袭击战、麻雀战等游击战术，执行了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结合，“坚持内线，挺出外线”的作战方针，一期又一期地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蚕食”，大批大批地消灭敌人。同时还打退了顽军三十多次的进攻。反顽斗争的胜利，保证了反“扫荡”、“蚕食”的胜利。到一九四四年一月，日军进行了两年的“扫荡”、“蚕食”，终于被琼崖军民彻底粉碎。琼崖独立总队在战斗中发展到三千余人，抗日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在琼西发展和扩大了儒万山和临高、儋县抗日根据地；在琼南开辟和发展了陵水、保亭、崖县、乐万边抗日根据地。但是抗日军民也作出了惨重的牺牲，日军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仅琼

文抗日根据地就有四千余间房屋被烧毁，近万群众惨遭杀害。我听了悲愤难平。

一九四四年秋，琼崖独立总队改称为“广东省游击队琼崖独立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副司令员庄田，参谋长李振亚，政治部主任马白山，纵队下辖四个支队。琼崖独立纵队成立后，确定了建立以白沙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发展琼崖全境的抗日游击战争。一九四五年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们决定以第一、第二、第四支队的主力大队组成挺进支队，由李振亚参谋长兼任支队长，向白沙腹地进军，击溃了顽军守备第二团，摧毁了白沙地方政权，成立了十三个乡和白沙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创建了以白沙为中心依托五指山区的抗日根据地，以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到抗日战争结束时，琼崖独立纵队发展到七千七百余人，建立了占全琼人口将近一半的解放区。

惠东宝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土洋会议后，我们纵队全体指战员坚决响应会议的号召，在惠东宝地区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巩固老区，发展新区。我们的部队在广九铁路两侧，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大量杀伤敌人，部队的人员和装备不断扩大充实，战斗力大为增强，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展。路西的抗日根据地向东莞水乡（东莞县北部、西部水网河汊地区）扩展，打通了与增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路东的抗日根据地扩展到惠州以西，东江河南岸。路东和路西，江南和江北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在路西,从一九四四年十月至十二月,第一支队配合第三支队,同伪军第四十五师和麦浩等伪地方团队,在宝太公路沿线的西乡、沙井、新桥、霄边等地,进行了八次战斗,共毙伤敌一百八十多人,俘虏近一百人。

第一支队为了开辟新区,派出“三龙大队”开进东莞水乡。十一月,于洗沙攻打伪军李潮的“抗红义勇军”,全歼其一个整营,俘虏伪团长李女,缴获包括轻机枪八挺的全部武器装备。这是我们纵队打得较好、战果较大的一次歼灭战。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至十九日,“三龙大队”和“猛豹大队”在低涌抗日自卫大队的配合下,采取“围点打援”并进而“集中攻点”的战术,在高埗地区歼灭伪军刘发如部近一个营。我抗日自卫大队正副大队长熊金枝、黄女同志,为解放高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三龙大队”抓住战斗胜利的有利形势,进一步发动和组织群众,广大水乡青年踊跃参军,部队从二百多人迅速发展到了四百多人,成为一支善于在水网河汊地区作战的出色的部队。

一月十九日,第一支队宝安大队在李朗、布吉、沙湾地区发动群众千余人展开破击战,摧毁广九铁路线上敌炮楼六座,剪断电话线,切断了日军的通讯联络,使日军火车相撞,死日军七人,其中少佐两人。四月至五月,第一支队在东莞地区的部队,在大朗、博头与日军进行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一百三十余人;在荫平和北栅与伪军作战两次,共毙伤伪军九十余人。在大朗附近竹山战斗中,我“猛豹大队”政治

委员李少清同志英勇牺牲。

在路东,当我军在路西积极打击日伪军的时候,顽军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至九日,出动了独立第二十旅两个团、徐东来支队和杂牌部队李乃铭大队、肖天来大队二千余人,对我路东解放区进行大规模进攻。当顽军沿淡(水)澳(头)公路、新(圩)龙(岗)公路和淡水至坪山开进时,由我们纵队王作尧副司令员统一指挥,以抗日自卫队、常备队,用麻雀战结合地雷战袭扰、疲劳敌人,以第二、第三支队和护航大队在正面机动阻击,诱敌深入,集中主力适时出击。经过五天的连续作战,顽军的进攻被粉碎。

顽军在这次进攻之后,风闻日军又向惠州进攻,即远遁博罗、龙门、河源等县,使江南我军得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一九四五年一月,第三支队在龙岗、镇隆、坑梓与日军进行了三次战斗,共毙伤敌七十余人。二月十七日,日军飞机一架,因故障迫降在东江河岸企石附近,机上日军少将田利喜雄等九人,被我第二支队全歼。

我们纵队活动在江南的部队,根据土洋会议首先消灭伪军中最弱、最坏部分的决定,不断成连成营地歼灭伪军,同时进行细致的争取工作,伪军起义投诚的消息不断传来。二月十五日,东莞县伪警察大队一百八十余人,在大队长麦定唐率领下携械起义,改编为第一支队的“新生大队”,使第一支队下辖的大队达到五个,加上五个大队级的“特派室”,全支队发展到一千七百余。六月十二日,伪军“东江自卫



队”司令黄松率部向我投诚，改编为第二支队的第四大队。这样，第二支队也有了五个大队（加上江南大队），共约一千人。

土洋会议以来，华南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党中央、南方局和省临委的领导下，已经超出东江和珠江三角洲，向四面八方迅猛发展，在各个战略区相继建立了抗日游击纵队。我们东江纵队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已拥有九个支队和六个独立大队，共一万一千余人。在北面，我们建立了罗浮山和北江抗日根据地，正在向粤赣湘边推进；在东面，我们建立了惠东和海陆丰抗日根据地，正在打通与韩江纵队的联系；在西面，广东人民解放军和珠江纵队正在向粤桂湘边推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已打通了与琼崖独立纵队的联系；琼崖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向全岛发展。

## 罗浮山会议

早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党中央根据日本侵略军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作战行动后的形势发展，作出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的战略部署。决定在华南建立一个坚强的战略根据地，使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互相呼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为此，党中央决定以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四千人，组成南下支队，在王震司令员、王首道政治委员率领下，于十一月从延安出发，挺进豫鄂湘

敌后,打开南北通道,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继续向南发展,力求早日开辟以五岭为中心的华南战略根据地。随后,党中央又决定将第三五九旅留在延安的部队,组成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以刘转连为司令员,张启龙为政治委员;将延安警备第一旅的一部分组成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以文年生为司令员,雷经天为政治委员。第二、第三支队共六千人,另加上从广东、广西等地到延安学习的干部二百多人,作为南下的第二梯队。

到了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六日,在我们党的“七大”刚胜利闭幕之后,党中央及时指示广东省临委:(一)要认真学习、贯彻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和《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二)要利用华南地区目前有利条件,迅速建立战略根据地,以便在敌人败退时,我华南武装,进退有据,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配合全国起来制止内战,成为制止内战之一翼。(三)华南战略根据地,不可以目前的东江为中心,依今日敌情及将来的变化,应以湘粤赣边为中心,这样可以东联闽粤赣,西联粤桂湘。党中央在指示中还说,即将电令现已到达湘鄂赣边的王震部队南下,以配合广东方面创造南方局面。为实现此战略方针,广东省临委应派大的有力的部队,由负责干部率领,随带大批干部,迅速向北江地区发展,直至坪石、南雄之线,扩大游击根据地,以至数月后与王震部队打成一片。在这之前的三月六日,党中央指示,将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合并改为区党

委,领导广东全省党政军民工作,并暂时兼管闽粤赣边党的工作。

为了贯彻“七大”精神和党中央的上述指示,广东省临委于一九四五年七月六日至二十二日,在罗浮山冲虚观召开了干部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东江前线特委,后东特委、西江特委、珠江特委、潮汕特委以及部队的领导人,东江纵队各支队的代表,两个行政委员会的代表等。海南岛、南路和粤中的代表因交通阻隔未能出席。会议由省临委书记林平同志主持。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和研究贯彻党的“七大”决议和党中央六月十六日的指示,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部署进军粤北、开辟五岭根据地以及建立广东统一领导机构等问题。林平同志代表省临委在会议开始时作了《目前形势与斗争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讲了:目前国际形势;目前国内形势;目前广东形势;当前的工作任务四个问题。他在讲到当前的工作任务时提出了九项任务:扩大和巩固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扩大军队,巩固现有军队,提高战斗力,准备建立主力军,普遍组织民兵游击队,开展对敌斗争;加强大城市地下军的工作;把梅花点式的根据地扩大起来,使之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具有战略性的根据地;援助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培养与改造干部,加紧整风,提高干部的业务水平;贯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组织路线;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和人民的要求加强《论联合政府》和《论解放区战场》的宣传工作;建立一个全广东(华南)的统

一的领导机构。与会同志根据党的“七大”精神和华南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工作上的经验教训，并围绕如何担负起重大任务和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一致通过如下重要决议：

一、遵照党中央指示，决定撤销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共广东区党委，区党委委员为林平、梁广、曾生、王作尧、杨康华、林锵云、梁鸿钧（实际上他已牺牲，但我们开会时尚未获悉）、刘田夫、罗范群、周楠、黄松坚、连贯、梁嘉。书记林平、组织部长梁广、宣传部长饶彰风、统战部长连贯、城市工作部长黄康。

二、东江纵队司令部负责研究指导全省军事工作，政治部负责研究指导全省军队政治工作。

三、成立与健全各地委的领导机构。

四、迅速北进，创立战略根据地。

五、大力发展党员，扩大主力军，巩固民主政权，积极领导人民群众自发性的武装斗争，发展华南民主运动，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

七月二十二日，会议最后一天，林平同志代表区党委作了《为创造强大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斗争》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讲了：华南广东局势的发展；广东党发展过程；今后的工作任务三个问题，提出了四项工作任务：

（一）在一年内创造一个背靠山面向大城市、背靠新四军、进退有据的战略性的根据地。这是工作的中心和出发

点。

(二)解放区的任务:巩固民主政权;增强人民武装力量;建立统一性的群众组织;认真执行党的各种政策;准备成立统一的政权机构;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彻底转变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大力培养干部;老区要在兵源、经济、物质上支援、帮助新区。

(三)敌占区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围绕为将来夺取广州打好基础,向群众宣传抗战必胜,揭发国民党的各种反动政策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宣传我党的政策,扩大我党的影响;建立城市郊区武工队,及各交通要道上的武工队;争取伪军警。

(四)国民党后方的工作任务:在农村普遍建立我们的生根基础,建立有战略性的据点;开展民主运动,帮助民主力量组织起来;建立武工队;改造赞成民主运动的友军;积极领导人民自发的斗争。

林平同志代表区党委号召全体干部和广东全体党员,通过和人民群众密切结合,完成我们在一年内打开广东新局面的伟大任务。

这次会议,是在广东党和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近年来获得很大发展,而且还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召开的,是在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结束,日本法西斯已处于孤立和接近死亡的情况下召开的,与会的同志们满怀胜利的信心,意气风发。

我参加这次会议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会议发扬了党中央提倡的党内民主的精神，过去我们许多干部互相间存在着意见不能提到桌子面上来，而在这次会议上都坦率地爽快地讲出来了。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消除了误会与隔膜，互相谅解，更加团结了。同志们给我们纵队领导同志在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上存在的不良倾向提出了批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决心在今后的斗争中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深刻地体会到，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干部，是做好工作，团结全党，团结群众的最重要和最好的方法。

罗浮山会议，在党的“七大”精神指导下，开得非常成功，是广东党的历史上又一次有重大意义的会议。通过这次会议，总结了经验，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克服了在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上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使会议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争取广东和华南革命斗争的更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会议期间，顽军独立第二十旅和梁桂平支队等地方团队共二千余人，企图夺取柏塘，然后再向罗浮山腹地进攻。第三支队奉命展开柏塘保卫战，他们在顽军可能来向的山头上，挖堑壕，建掩体，构筑防御工事，组织阵地防御。七月二十日，顽军从公庄分两路向柏塘发动进攻，我正面防御部队，多次打退顽军的冲锋，坚守住阵地。在左侧比较突出的三棵松高地，有第一大队一个小队负责防守，遭到敌人迂回

部队的进攻,小队的指战员英勇还击,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最后子弹、手榴弹打光了,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全小队二十八人,除三个同志负伤先行撤出外,小队长洗根,政治服务员丁顺等全部壮烈牺牲。当晚,第三支队因弹药所剩不多,转移到山前继续组织防御和补充弹药,顽军因伤亡消耗很大,也不得不撤出柏塘。这次战斗,保证了罗浮山会议的顺利进行。

## 开辟五岭根据地

开辟五岭根据地是党中央、中央军委重要的战略部署。在罗浮山会议之前,广东省临委在接到党中央六月十六的电报指示后,林平同志即和我们研究,决定由何通、张英率独立第一大队并指挥古岭大队作为挺进粤北的先头部队,先进到新丰、英德,再与北江支队协同向北发展。独立第一大队经新丰北上,在新丰进行了一些胜利的战斗后,向北江支队靠拢,配合北江支队又进行了一些战斗,然后向翁源、曲江推进,于八月中旬进抵韶关南华寺附近。

独立第一大队北进以后,由于没有携带电台(当时没有条件),我们一直无法掌握他们的情况,也无法给他们下达指示。他们只知道八路军南下支队要到五岭,但不知道具体位置,因而未能继续北上与之取得联系,而是西渡北江去寻找。待日军投降后,顽军向他们进攻,他们只得折回英德,靠

向北江支队。

七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又指示广东省临委：要迅速派出部队北上，配合王震部队行动，开辟五岭根据地。并强调要以极大注意力执行北上任务，派往北面的兵力与干部愈多愈好，并必须有强的党政军领导人前往。这时，罗浮山会议正在紧张进行，林平同志召集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的同志，挤出时间开会讨论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大家都意识到，党中央对于开辟五岭根据地，既是非常重视而且也非常着急。经过反复交换意见，会议决定组织力量分三批北上。第一批，由王作尧、林锵云、杨康华同志率领第五支队、军政干部学校和鲁迅艺术宣传队、“拖拉机”文艺宣传队以及政治部部分干部等共一千二百余人先行北上。第二批，以第三支队为主共一千人，一个月后北上。第三批，由林平同志和我率领一千多人，三个月后北上。会议同时决定，由珠江纵队抽调在广宁、四会的主力六百余人，会同我们纵队的西北支队向粤桂湘边挺进；南路和粤中打通后，抽调一个足数团兵力，增加到粤桂湘边。

我们纵队根据会议的决定，即令第五支队集中到横河地区整训，同时筹措经费，收集地图，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八月四日、十一日，中央军委继续来电催促：“要用极大的速度向粤北发展。”我们在接到中央军委八月四日电报时，就更意识到北上的紧迫性，本应命令北江支队和独立第一大队立即北上，但他们都没有电台，命令无法下达。于是



决定电令西北支队撤出清远，北渡小北江，迅速向始兴、南雄推进，与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师。

西北支队接到命令后，即集结部队沿北江西岸北上。当他们渡过小北江到达龙头山时，遭到英德、乳源两县众多的地方反动武装的堵击，伤亡了十多人而不得前进，乃折回英德以北，东渡北江到达大镇圩附近集结。我们接到中央军委八月十一日电报后，再次急电西北支队，令其急速北上。西北支队在东渡北江途中，接到我们的电报，但到达大镇后，无线电联络中断，支队长蔡国梁率一个中队南下东江，其余部队由政治委员邓楚白率领，于八月底到达鱼湾附近，与北江支队、独立第一大队和由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郑少康率领的“南三队”会合。各支队领导随即在倒洞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由李东明、郑少康、邓楚白同志率领西北支队、“南三队”、独立第一大队和北江支队的的一个中队，继续北上始兴、南雄。沿途遭到顽军一个团的阻击。到九月上旬才摆脱敌人到达始兴瑶山，但已错过了和八路军南下支队取得联系的宝贵时机。

八月十六日，王作尧、林锵云、杨康华同志率领第一批北上部队从博罗县横河出发，我和林平同志给他们送行。他们经龙门、新丰进入英德北江支队的根据地，然后继续向始兴、南雄挺进。渡过翁江后，不断遭到顽军第一二一师的阻击，加上非战斗人员队伍过大，行动缓慢，九月初才到达始兴与风度大队会合。

八路军南下支队，经过长时间的越山、涉水、战斗，冲破日伪顽军的重重拦阻，于八月二十八日到达南雄西北的百顺地区。但是，在八月十四日日本帝国主义已宣布投降，国民党这时集中了五个军的兵力，企图合围歼灭我南下支队。我们纵队北上的部队也处在国民党军的严重包围之中。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创建五岭战略根据地暂时已无可能。因此，中央军委命令南下支队立即北返向新四军第五师靠拢。我们纵队北上的部队进抵南雄后未能与南下支队会合，即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在粤北独立作战，坚持斗争。我们决定先后北上的所有部队组成粤北指挥部，下辖第五支队、西北支队、北江支队、“南三队”、独立第一大队、始兴风度大队和尔后北上九连山地区的第三支队，由王作尧、林锵云、杨康华统一指挥，同时成立粤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和粤北及小北江各县的地方党组织。

在事后来检查，我认为我们纵队在执行挺进粤北，建立五岭根据地这一战略行动中，动作迟缓了。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预料到日本会这样快投降，对北上的紧迫性认识不足，因此在罗浮山会议上，省临委还决定要求我们纵队在一年内完成这个战略任务；同时，我们过于强调要作好充分准备才行动，因而在中央军委一再催促下，第一批北上部队在日本投降的第二天才开始行动。另外，我们在组织工作上也有问题，北上先遣部队虽然及时派出了，北江支队离南雄也比较近，但由于他们都没有携带电台，我们无法掌握他们的情

况,因而也无法及时指挥他们的行动,先遣部队像“瞎子摸鱼”地去闯,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北江支队也使用不上。第一批北上的部队行动缓慢;西北支队未能迅速直插始兴、南雄,而在英德东部停留时间过长,也是原因之一。虽然由于日本投降,时局发生急剧变化,八路军南下支队奉命北返,但是我们未能赶上与老大哥会师,我觉得是件很大的憾事,我作为纵队司令员要负很大的责任。

党中央关于建立五岭战略根据地的决定,虽然由于形势突变未能实现,但是当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大批涌向我东江解放区,企图消灭我东江纵队时,我北上部队已经在粤赣湘边站稳了脚跟,在粤北的仁化、南雄、始兴、和平、连平和江西省的大庾、信丰、龙南、定南、虔南以及湖南省的汝城等十多个县完成了战略展开,开始创建了根据地。这个基础,为以后解放战争中粤赣湘边纵队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 受 降 斗 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日本关东军节节败退,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的消息,风快传开了。晴空一声霹雳,震动了整个广东大地,从东江到海边,从山区到平原,城市集镇,山

庄村寨，到处热气腾腾，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民欢喜若狂，百姓奔走相告，振奋人心。经过七年浴血奋战，历尽万苦千辛的东江纵队，更是人人心情振奋，个个欢欣鼓舞，许多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许多人高兴地唱着队歌，有的同志拿出仅有点钱煲糖水喝，有的“小鬼”高兴得乱蹦乱跳，高呼“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各地纷纷举行集会。我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也是高兴极了，真没想到胜利会来得这么快！八月九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时，还说：“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这个最后阶段，我当时还想最快也要一年半载，谁知只过了几天时间，胜利就来到了，怎能不令人高兴呢！但是冷静地想一想，根据党中央历来的指示精神，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今后斗争任务还很艰巨。当时的形势还是十分严峻，日本侵略军虽然宣布投降了，但是它的庞大的武装尚未解除，他们仍然盘据着许多城市和交通要道。再说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会和我们争夺广东，他们的军队已经大规模向我粤北部队进攻了。不能认为日本投降了，我们就可以顺利受降，就没有事了。决不能麻痹大意，要全力以赴，准备长期斗争。果然不出所料，与国民党在受降问题上的斗争就发生了。

八月十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了受降命令，命令我抗日武装部队向日军及其指挥机

关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如遇日伪武装拒绝投降缴械，即坚决予以消灭。十一日，朱总司令又连续发出六道命令，其中命令粤汉路、广九路、潮汕公路两侧之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积极大举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如遇拒绝，坚决消灭之。

根据朱总司令命令，八月十一日，以我和林平、王作尧、杨康华的名义向东江纵队各部发布了紧急命令，命令我各部队立即动员全体军民，开入附近敌占据点，解除日伪武装，维持治安，镇压土匪特务的破坏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千金一刻，不得稍有延误。

八月十四日，广东区党委发出紧急指示，命令广东各地抗日游击队，坚决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集中主力，动员民兵、抗日自卫队，向日伪军进行全面反攻，切断敌人交通，包围敌占据点，解除日伪武装和收缴其物资。同时指出对蒋介石绝不应有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群众中揭露其欺骗阴谋，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

实际情况也就是这样：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为了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垄断接受投降的权利，极力破坏我抗日军民向日伪军反攻和受降，无理地连续下达了要我解放区人民和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等三道命令，同时又命令日军只能向“正规军”投降，不得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投降。八月十三日，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表示坚决拒绝。朱总司令于八月十

五日给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的命令中指出：“你们应下令你所指挥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在广东的日军由你指定广东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

而在广东，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执行蒋介石的反动命令，在广州接受了日军在华南最高指挥官田中久一的投降，并委派田中久一为“联络部部长”，联络华南各地日军不得向华南抗日纵队投降，蒋介石还加速运送美式装备的新一军来华南各地“受降”，占领日军据点，对我东江纵队形成包围形势。

八月十六日，广东区党委在罗浮山冲虚观召开了会议，根据党中央关于收缴敌伪武器和准备反内战的各项指示，以及朱总司令八月十五日给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的命令，研究了部署。会议认为东江以南的惠东宝和港九地区是东江纵队收缴日伪军武器的主要地区，决定由我返回东江以南，布置部队收缴日伪军的武装，并部署沿海的惠阳、宝安、陆丰、海丰、惠来和紫金六县的部队，占据城镇，准备反内战基地。会后，我即率司令部部分人员和敌工科以及反战同盟成员回到坪山地区，召集各支队和港九大队领导作了具体布置。

这时，我们的各个支队都进行了紧急动员，集结主力分几路向东江两岸，广九铁路和沿海日伪军据点推进。同时，

我们以东江纵队的名义发表了《欢迎伪军反正，既往一概不究》文告，指出一切伪军只有立即向我部反正，才是光明的出路，如果再执迷不悟，仍然与人民为敌，就坚决消灭，决不宽贷。并以我的名义向日本驻军发出通牒，限令其解除武装，向我部投降。我们还组织反战同盟的日本友人，对日军进行劝降活动，把我们的“通牒”翻译成日文，向日军散发和广播。

为了便于领导受降和反内战斗争，林平同志率广东省区党委和东江纵队领导机关，随后也从罗浮山回到东江以南前线。

我东江纵队在各地的部队，根据广东区党委的命令，全线出击，逼迫日伪军向我投降。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立即向敌占城镇及交通要道推进。第一支队迅速行动，连续包围了厚街、赤岭、东莞城、黄岗、西乡、南头等日伪据点，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首先在太平镇附近的官涌坳歼灭拒绝投降的伪军第二十一师一个连。十九日，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营，从东莞城、篁村出来，企图救援被我包围于赤岭、厚街的日伪军，在新基的公路上被我第一支队一举歼灭。激战中我沈标大队长负伤后光荣牺牲。同日，收复广九铁路线上的常平，和宝太公路线上的北栅等重要据点；解放宝安县城南头，驻城日军一个班和伪军全部投降；在东莞翟家村迫使伪军第三十师一个连投降；在寮步包围从樟木头向东莞开进的日军一个中队，歼其一部；在宝安的西乡、固戍迫使伪军

两个连投降。二十日，解放广九铁路重镇深圳，伪宝安县县长连同第三区区长及县警全部投降；解放厚街；被包围于东莞县赤岭的伪军第四十五师一个营，在我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伪军营长、连长及以下官兵一百七十余人全部投降。二十一日，第三支队围攻博罗县城，与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展开激战；长洲岛和大屿山的日本宪兵队和伪自卫队被迫向我港九大队投降；驻澳门的伪军一部，窜逃到流浮山海面，被我歼灭；海丰县田墘十二名日军携带六挺机枪向我第六支队投降。二十二日，我第四支队包围增城县城，突进城内开展政治攻势，迫使日军投降。二十三日，我第二支队收复沙头角。九月三日，日军二十四人在元朗向我港九大队投降。二十七日，博罗县伪联防队一个连被迫投降。海丰县鲒门、马鬃港，惠阳县高潭等地，相继为我第六支队收复。在稔平半岛，我第七支队首先收复大亚湾三门岛和白花、平海、铁涌、暗街，再于九月八日包围稔山，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二百余人，拒不投降，我军发动进攻，歼灭敌军大部，收复稔山，同时收复澳头，缴获海岸炮四门，炮弹三百多发。我第六支队和第七支队在吉隆、平政歼敌八十余人，并收复海丰县的梅陇、赤石。惠阳县淡水镇是日军往海边转移集结必经之地，我第七支队派代表去淡水促日军投降，日军以未接到上级命令向东江纵队投降为理由，拒不向我投降，但日军为了缓和与我的矛盾，缴出了一部分武器、弹药和生活日用品，并释放在狱中的五十多名中国人。据不完全统计，从九



月至十一月，我们纵队共受降日军一百七十一人，收缴海岸炮四门、野炮一门、重机枪二十八挺、轻机枪二十一挺、步枪二千三百八十五支、短枪五十六支、掷弹筒三个（歼灭的日伪军和投降的伪军数均不在内）。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在党的领导下，我东江纵队和兄弟纵队一起，在日伪军和顽军的夹击下，坚持在华南敌后，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先后在东江、北江、粤东和港九地区创建了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总面积约六万余平方里，人口约四百五十余万。据不完全统计，对日伪军作战一千四百余次，毙伤日伪军六千余人，俘虏、投诚约三千五百余人，缴获各种枪六千五百余支，炮二十五门。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我东江纵队有二千五百余名指战员英勇捐躯，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东江、北江、粤东和港九的广大地区。他们永远活在广东人民的心中，我永远怀念他们，烈士们永垂不朽！

东江纵队在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孤悬在东江敌后的狭小地区，而且处在绝对优势的日伪军和顽军夹击之下，部队为什么能够生存？抗日游击战争为什么能够胜利发展？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有党中央、南方局、广东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从我们东移海陆丰时开始，在艰苦曲折的抗日战争中，每个关键时刻和重要关头，党中央、南方局和广东党组织都及时给予正确指示，这是东江抗日游击战争能

够胜利发展的最根本保证。一九四〇年，当部队东移海陆丰受到挫折时，党中央的“五·八指示”非常及时地给我们指明了返回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方向；一九四二年，当顽军纠集优势兵力向我进犯，妄图消灭我抗日部队时，南方局及时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对我是“势在必打，志在消灭”，使我们消除了一切幻想，指明了在反顽斗争中应坚持积极主动的方针；一九四四年，当日军发动打通平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交通的作战时，党中央及时指示，向敌人侵占的地区扩展抗日游击战争，等等。广东党组织则是坚决遵照党中央、南方局的指示，抓紧时机召开有关领导参加的会议，认真研究贯彻措施。如一九四〇年九月的上下坪会议，一九四二年二月的白石龙会议，一九四三年二月的乌蛟腾会议，一九四四年八月的土洋会议，一九四五年七月的罗浮山会议，都是正确地贯彻了党中央和南方局指示的精神，统一了干部的思想，作出了切实可行的部署，从而保证了我们的斗争一步一步向前发展。

其次，我认为我们有地方党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东江是我党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展武装斗争的地区，东江的地方党组织十分坚强，而且还有相当广大的外围组织。我们部队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壮大，都是依靠了地方党组织积极的大力的支持。部队壮大所需的兵员，大部分是地方党动员组织来的；部队的物资供应，大多是地方党筹措的；部队作战所需的敌人内部情报，很多是地

方党提供的；如此等等。东江地区的人民群众，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有高度爱国热情，热爱人民子弟兵，主动帮助我们部队解决困难，积极支援部队作战。在情况紧急，部队转移时，他们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们的伤病员。在日伪顽军的夹击下艰苦斗争的岁月中，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部队要取得生存和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

再一条，我认为是我们全体指战员有高度的抗战觉悟和积极勇敢战斗的精神。我们部队广大的指战员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革命战士。他们有坚强的抗战意志，崇高的革命理想。在艰险的游击环境中，部队经常行军转移，爬山越岭，露宿餐风。但是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困苦，我们的指战员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情绪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日伪顽军夹击下，战斗非常频繁，又非常激烈，每个同志随时都有受伤或牺牲的危险，但是我们的指战员们英勇无畏，坚贞顽强，都抱有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不惜贡献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的决心，因此能慷慨赴死，从容就义。我们就是依靠了这样的革命战士，团结战斗，去取得胜利的。

又再有一条，我认为是我们有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和培养了大批胜任组织指挥游击战争的军事干部。我们部队的班以上单位都配备有政治工作干部，他们不仅深入细致地进行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而且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战斗中做到“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因而保证了

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内部团结，军民合作，士气高昂，斗志旺盛。我们部队是白手起家，因而十分重视在战斗中培养军事干部。我们大胆放手，让他们在频繁、激烈的战斗中，和经常分散独立的行动中去受考验和磨练，并调送他们进训练班或军政干校学习提高。就这样，我们在数年间，培养了大批各级军事干部。他们熟悉游击战争的战术，懂得在游击环境中领兵带兵，和在作战中善于进行英勇顽强、灵活机动的组织指挥。我们就是依靠他们去领兵打仗，赢得胜利。

还有一条，是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我们从建队开始，就十分注意进行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民主人士，地方上的中间势力，各种外围武装的工作，并积极与盟军合作，争取尽可能多的力量来支持我们。

我们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通过香港来进行争取和团结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的工作。香港在我们进行抗日战争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一面连着祖国大陆，一面通向海外。广大的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热爱祖国，积极支援抗战。我们从他们那里可以得到人力物力的支援。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筹集资金和军需物资，可以通过他们转移和掩护我们的人员以及传递情报和各种信息。紧密团结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充分发挥香港的特殊作用，也是我们能够长期坚持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争取抗战胜利的有利因素。

我们还十分注意了解敌人内部的情况，充分利用日军与顽军，日军与伪军，顽军正规军与杂牌军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工作，或使他们之间的矛盾扩大，或者是使他们在进攻我们时互不配合，或者利用杂牌部队来掩护我们的部队。这些工作，对于我们坚持斗争，争取胜利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造就千百万干部的学校。我是书生出身的干部，一九三八年受命回东江开辟抗日根据地时，我对游击战争还是门外汉。经过八年抗战这场艰苦卓绝斗争的磨练，在党组织的培养和战友们的帮助下，我总算学会了一些关于建设抗日根据地，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本领，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下，我和我们纵队的指战员一起，完成了党所赋予的抗战任务。

## 第十三章

# 自卫还击和北撤谈判

### 自卫还击和分散坚持

抗战八年，人民忍受着艰苦的岁月，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人民，他们全力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坚持敌后，打击敌人，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历尽了千辛万苦，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抗战胜利了，人民欢欣鼓舞，迫切希望有一个和平环境来休养生息。党中央根据人民的愿望，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并且声明愿与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进行谈判，努力求得协议，以避免内战，奠定和平建设的基础。《宣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然而，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呼吁，不顾人民的愿望，梦想

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实现一党专制的黑暗统治。他们依靠美国的空运,把位于西南大后方的军队调集到我解放区的周围,准备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抢夺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

全国范围的内战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开始的,但是广东的内战早就开始了。还在日本投降前夕的一九四五年七月,原来龟缩在赣南的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军、第六十五军,就开始对我粤北解放区进攻。七月二十五日,第六十三军突然袭击我英德县的青塘,并相继占领了桥头、大镇、横石水、大洞、鱼湾、新江、炯岭等地,进行烧杀抢掠。他们烧毁了青塘的六间学校和大平围的全部民房,三十多名无辜群众被杀害,大镇、鱼湾、桥头等地的商店被洗劫一空。八月一日,第六十五军一千多人进攻始兴县外营村,企图消灭我风度大队。风度大队和该村群众奋勇迎击,战斗相持三昼夜,使敌人遭到沉重打击,但终因强弱悬殊,被迫撤出外营村。国民党军入村后制造了灭绝人性的“外营村惨案”,全村除撤走的壮丁二十余人外,其余一百二十余人全遭惨杀,财物被洗劫,房屋被烧毁。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我解放区人民处在深重的灾难之中。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第六十五军继续对我粤北解放区进攻。九月初,其第一六〇师大举进攻始兴县西北的下北山地区,在黄塘、宝峰、其心洞一带大肆烧杀。第六十三军则向我江北解放区进攻,先后占领博罗县的柏塘、响水、横河、

龙华、长宁，和增城县的永和、福和、均和、仙村等地。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反动派除了以第六十三军和第六十五军向我粤北和江北解放区进攻外，又从滇西等地调来了美式装备的号称“王牌远征军”的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下简称新一军、新六军）及第五十四军、第六十四军，共四个军十一个师，在准备从香港北运向我东北和华北解放区进攻以前，先在东江地区向我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妄图一举消灭我东江纵队。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预见到国民党军在广东全面进攻的严重情况，于八月十五日指示广东区党委，要在一个月內，迅速把各项工作和部队进行调整，以应付新的斗争。八月二十六日，党中央在《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又指出：“在广东、湖南、湖北等省的我党力量比华北、江淮所处地位较为困难，中央对于这些地方的同志深为关怀。但国民党空隙甚多，地区甚广，只要同志们对于军事政策（行动和作战）和团结人民的政策，不犯大错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完全有办法的。除中央给予必要的指示外，这些地方的同志必须独立分析环境，解决问题，冲破困难，获得生存和发展。待到国民党对于你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可能在两党谈判中被迫承认你们的力量，而允许作有利双方的处置。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



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

党中央的指示多么及时和重要啊！在认真阅读了《通知》之后，我充分了解到当前斗争的严重性，但对斗争的前途更是充满着信心。这时，我又很自然地想起了我们东移受到挫折后返回惠东宝敌后时，只有一百多的人枪，由于随时能得到党中央的正确指示，因而能在不断战胜日伪顽军的“扫荡”、“清剿”的严酷斗争中发展壮大了起来。现在，我们部队已有一万四千多人（日本投降前是一万一千多人，日本投降后又发展了三千多人），只要坚决遵照党中央在《通知》中的指示去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进攻。

九月十日，党中央、南方局又明确指出：东江纵队应采取分散坚持，保存干部的方针，主要应将主力部队分散成数十股，每股几十人至几百人，利用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及东江、北江、西江和闽西南各地的大山区及群众基础，分散活动与采用秘密方法坚持斗争，其余小部原地坚持，很好组织革命两手的斗争，并分散大批人员到城市工作。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完全符合东江及全广东斗争的实际，给我们纵队和华南其他兄弟纵队指明了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方法和方向。

十月中旬，林平同志率领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领导机关由罗浮山返回惠宝边地区，同我会合后，召开了区党委会议和干部会议。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联系广东和东江的实

际情况,讨论和决定了反击国民党军进攻和坚持斗争的部署,并于九月十六日电报党中央。我们的工作方针是:一方面坚持斗争,保存武装,保存干部;一方面长期打算,准备将来的合法民主斗争。在军事方面,除海南岛外,将活动地区划分为十一个区,分散坚持。这十一个区是:(1)南雄、始兴区;(2)翁源、英德、佛冈、新丰区;(3)从化、花县、佛冈、清远区;(4)增城、龙门、博罗区;(5)九连山(和平、连平)区;(6)惠阳、东莞、宝安区;(7)惠东、海丰、紫金、五华区;(8)南山(惠来、揭阳、普宁)区;(9)八乡山(梅县、丰顺)区;(10)中区(云浮山区);(11)南路(十万大山及勾漏山区)。在上列地区中,部署的武装力量,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都有地方党配合。干部和兵力重新调整,区党委中心暂仍在东江以南。有部队活动的地方,党政军统一领导。区党委领导干部进行分工:林平、曾生在东江,林锵云、王作尧、杨康华在粤北,梁嘉、黄松坚在西江,罗范群、刘田夫在中区,周楠在南路。梁广、连贯、黄会斋、饶彰风去城市工作。

十月十九日,党中央、南方局复电同意广东区党委这个分散坚持的方针和部署,同时指出:“为要隐蔽,必须以连排为单位分散行动,一区数百武装,还须分成许多小股行动,依靠群众、地形、党的基础、统一战线的关系等,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采取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斗争手段,是能够存在和发展的。”

为了执行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以及广东区党委的部

署,我们纵队决定将全区划分为粤北、东江以南、东江以北和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四个地区,建立四个指挥部,实行军事上的分区指挥。为此,除粤北指挥部外(粤北指挥部的情况已在第十二章记述),我们又组建了江北指挥部,并将原江南指挥部分编为江南指挥部和东进指挥部(即海陆惠紫五指挥部);并将我们原来为准备执行北上和东进任务,在八九月间于江南地区,由第一、第二、第六、第七支队抽调主力部队组成的第四、第五和第六团,分别划归江南指挥部和东进指挥部的建制。整编以后,这三个指挥部的情况是:

江北指挥部,指挥员周伯明,政治委员陈达明(兼任中共江北特委书记),参谋主任罗章友,政治部主任饶璜湘,下辖第四支队、解放大队(由珠江纵队东调的部队组成)、民主大队(即独立第三大队)、罗浮大队和增龙博独立大队。活动地区包括增城、龙门、博罗以及番禺、从化、花县、河源等县。

江南指挥部,指挥员卢伟如,政治委员黄宇(兼任中共江南特委书记),参谋长高健,政治部主任黄高阳(后来是叶锋),下辖第一支队、第六团(第二支队已全部编进第六团)、第七支队、港九大队独立中队(九月底从港九地区撤出)和大亚湾海上独立大队(由护航大队海上队和港九大队海上队、大屿山中队组建)。活动地区包括惠阳、东莞、宝安等县。

东进指挥部,指挥员卢伟良,政治委员张持平,参谋长黄布,政治部主任李征,下辖第四团、第五团、第六支队和独

立第六大队。活动地区包括海丰、陆丰、惠东、紫金、五华以及揭阳、丰顺等县。

党中央和南方局分散坚持的战略方针，区党委分散坚持的部署，和纵队对各部队的调整方案传达后，各部队抓紧在国民党军尚未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进行了整编和调整部署。纵队领导机关也进行了整编。两年来，随着部队的发展，纵队领导机关变得庞大了。现在为了适应分散坚持的环境，机关必须十分精干，决定将一批干部充实到部队，一批干部调去城市工作，并清理了一些勤务人员和老弱病残。整编后，区党委和纵队领导机关转移到大鹏半岛。

十月二十五日，已改任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的张发奎在广州召开“两广绥靖会议”。他们的中心议题就是在广东发动全面内战，限期三个月“清剿”完毕。十月底，国民党军就开始内战的行动，其第六十五军第一五四师一个团占领了稔山，另两个团开到白花、平山一带，摆开了进攻稔平半岛和大鹏半岛的态势。

为了还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削弱其进攻力量，迟滞其进攻速度，保卫区党委领导机关，我们纵队决定在稔平半岛、大鹏半岛和大亚湾进行一次机动防御作战。我们的部署是：以东进指挥部第四团、第五团主力防守稔平半岛；以江南指挥部第七支队防守稔山、白花以东地区，第六团防守大鹏半岛。十一月初，我分工到海上独立大队和东进指挥部去布置和检查工作，海上独立大队陈志贤大队长坐船到东涌（大鹏

半岛南端)来接我到三门岛的妈湾码头上岸。三门岛位于大亚湾的西边入口,该岛是三门列岛的主岛,呈三角形,面积约四平方公里,离大鹏半岛南端约三公里,整个岛屿四周陡峭,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日军从第一次在大亚湾登陆,直到它投降的七年间,一直据守着三门岛,可见它的重要性。我们现在防守三门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一支海上力量。海上部队没有港湾作基地是不能生存的。稔平半岛和大鹏半岛上的基地,在国民党军大规模进攻下,是很难守得住的,所以守住三门岛就非常紧要。而我们能够保持着一支海上力量,在国民党军进攻时,我们的部队,特别是领导机关依靠它才有可能在大鹏半岛和稔平半岛以及惠宝沿海回旋。我在海上独立大队的领导干部陪同下,巡视了三门岛一周之后,对干部们说:三门岛很重要,一定要坚守住,要使每一个战士认清守岛的重要性,要团结广大群众,特别渔民群众,共同保卫这个抗战胜利的果实,迎接新的斗争的到来。我在三门岛住了一宿,第二天乘船到稔平半岛的暗街上岸,步行到平海镇,见到了东进指挥部的卢伟良、张持平、黄布、李征,和第五团的叶基、卢克敏、赖祥,第四团的谢阳光等同志。稍事休息后,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我传达了党中央和区党委的指示以及纵队的部署。经过大家讨论,决定东进指挥部实行分兵的方案:由卢伟良、李征率领东进先遣队(由第四团第一营、第五团第二营和独立第六大队组成)挺进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边,开辟新区,扩大回旋余

地；由张持平，黄布率领第五团第一营和第三营、第四团第三营防守稔平半岛。

十一月中旬，国民党军第一五四师一个团，开始向稔平半岛北边的鹅埠我军进攻，在杀伤敌人一部后我军退守田坑、妈庙，隔海与敌对持。到十二月十五日，敌人经过一个月的准备后，为了配合其新一军等部队进攻我路西解放区的行动，在稔平半岛又出动了两个团的兵力，分东西两线向我发起进攻。西线敌军沿稔平公路向平海进攻，我军在王爷径、观音径等地节节阻击敌人；东线敌军沿东海岸侧击平海，我军在田坑、妈庙一线抗击敌人的进攻。经过两天激烈战斗，杀伤敌一百二十余人，我亦牺牲连长曾志强、排长陈象、刘国等五十多人。十七日晚，我军退守暗街。二十日，敌进攻暗街，战斗从早上打到下午五时，我军在杀伤敌五十多人后在大澳湾登船撤退。二十一日晨在霞涌登陆，敌驻白花的一个团袭来，我军且战且退，当晚向西转移到格木洞。二十二日，敌人进攻格木洞，激战一天后，我军向北转移到杨梅嶂北侧的桔子塍。当晚东进指挥部于半山罗发来了电报，我和林平等同志研究了他们的情况后决定，由张持平、黄布率第四团第三营、第五团第一营挺进惠阳、紫金边与东进先遣队会合；第五团第三营归还第七支队建制，叶基调任第七支队支队长，邓秀芳任政治委员；第五团第二营归还第六支队建制，谢阳光、卢克敏调任第六支队支队长、政治委员。

稔平半岛防御战，从敌人进攻鹅埠算起，历时一个多

月。我们给了敌人一定的打击，牵制了敌人一个师的兵力，减轻了江南部队的压力，保卫了在大鹏半岛的区党委和纵队领导机关的安全。保卫稔平半岛的烈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人民将永远怀念曾志强等为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烈士们。地方上铁涌乡女乡长钟笑同志为支援部队也英勇牺牲了。大砾村女民运干部张涛(玉桃)同志，不幸被俘，被剥光上衣到平海镇游街。张涛同志坚贞不屈，沿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东江纵队抗日有功，国民党打内战有罪！”“中国共产党万岁！”沿途群众为之落泪。惠东人民至今还传颂着她的英雄事迹。

国民党军在进攻我稔平半岛的同时，调集了新一军、新六军和第五十四军一个师，并收编了伪军麦浩、陈培等部，于十一月十二日对我路西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他们以部分兵力封锁广九铁路，防我向北和向路东突围；以部分兵力驻扎虎门、太平，防我向珠江口突围；在路西解放区内则采取所谓“填空题”战术，村村驻兵，严密封锁，断绝交通，反复搜索，来回“扫荡”。同时恢复保甲制度，扶植区乡反动政权，妄图彻底消灭我路西部队和把我解放区连根铲除。在敌人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我第一支队分散成几路突围，转移到路东地区。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敌新一军等部转向我路东解放区进攻，占领了沙头角、盐田、大小梅沙、葵涌等沿海地区，实行“填空题”。我第一支队又转回路西分散坚持。在突围转移中，支队政治委员古道同志负伤被俘惨遭杀害。

在此期间,第七支队在铁炉嶂击退敌一个加强营的进攻,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敌新一军进攻王母圩、大鹏城、澳头等地。我第六团一部击退敌人一个营的进攻后转向外线,我领导机关乘武装船向新界转移。二十四日上午,我海上独立大队第二中队两艘武装船,在中队长肖华奎率领下,在小桂东面的六克岛海面,与国民党“舞凤”号炮舰和两艘炮艇展开了激战,我海上勇士们不畏强敌,越战越勇,杀伤敌多人。战斗持续到下午四时,终因船舰性能和火力悬殊太大,我船被敌击沉,中队长肖华奎、副政治指导员陈华等十六位同志壮烈牺牲。烈士们的遗体被风浪吹到小桂村岸边,该村的群众把他们打捞起来,埋葬在小鹰咀,让烈士们的英魂永远守卫大亚湾。三月下旬,国民党军和港英海军勾结,派出四艘军舰围攻我三门岛,被我海上独立大队击败。三门岛直到东江纵队北撤,始终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在国民党军大规模进攻的面前,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分散坚持的战略方针。除了我和林平同志率领少数部队留在惠宝边沿海坚持斗争外,大量的部队分散在粤北、赣南、湘南和东江的江北、江南、江东四十多个县的广大地区,与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斗争。在斗争中,指战员们经受着极其艰难困苦的考验,频繁连续的行军作战,战斗减员和伤病员增加;没有正常的物资供应,生活极为艰苦;一部分指战员思想上存在着不少问题,非战斗减员相当严重。为了稳定部队



情绪,我们要求各部队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组织指战员深入学习党中央关于分散坚持的战略方针,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反动本质;指出我们有党中央的领导和关怀,有八路军、新四军做我们的坚强后盾,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有山区的依托和广阔的回旋余地,只要我们坚定不移,采取正确的战术,提高战斗警惕性,团结战斗,国民党军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我们是能够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同时,我们要求各部队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增加税收和战斗缴获,依靠地方党和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支援,逐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

各部队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以中队或小队为单位组成许多武工队和小分队,在地方党和群众的支持下,建立“梅花式”的作战基点,在斗争中互相配合。实行新老区间互相呼应,协同作战。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战术,力避强敌,专打弱敌。在老区坚持斗争的部队依靠基本群众,坚决镇压反动地主和反动势力,团结争取开明人士,逐步恢复根据地。挺进新区的部队,尽量避开同敌正规军作战,伺机歼灭反动地方军警,收缴反动团队武装,摧毁反动的区乡政权,在各地区站稳脚跟,开创新的根据地。

粤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在王作尧,林锵云和杨康华同志统率下,分散在南至从化,北至江南省崇义和湖南省汝城,东至和平、河源,西至粤汉铁路的二十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坚持斗争,开辟了粤赣湘边根据地。

第五支队、“南三”独立大队和西北支队一部统称粤北支队，由刘培、黄业、郑少康和何维同志率领，转移到南雄、仁化山区，并挺进到湖南省的汝城，江西省的大余、崇义、上犹等县。他们首先打下了南雄县的百顺，消灭了在当地统治了十八年的反动武装邬锡金部；接着在仁化县的长江、南雄县的白云等地，击溃了敌第一六〇师一部的进攻，毙伤其团长以下一百五十余人；并在江西省大余县消灭河洞、内良、游仙等地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从而在粤赣湘边打开了局面。在斗争中，西北支队第一大队政治教导员冯克和中队长刘锦进（刘黑仔）同志以及第五支队第一大队中队长邬振祥等同志光荣牺牲。

独立第一大队和风度大队由李东明同志率领，在南雄、始兴、曲江和江西省的龙南、虔南（今全南）各县之间，以澄江为中心的上、下南山地区分散活动。他们袭击了敌人的联防队，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建立了活动基地，坚持到北撤。

北江支队和西北支队一部由邬强同志率领，划分为三个地区（英德、翁源、佛冈边；新丰、翁源、河源边；新丰、佛冈、从化边）独立坚持，互相配合。他们在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全面开展消灭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战斗，和镇压反动势力的斗争；三月，还深入到连平县西边的曲塘坳伏击国民党军车队，俘虏交警总队长胡伟杰少将等七十余人，缴获长短枪七十多支。在斗争中，他们配合地方党巩固和扩大了活动地区，北江支队在北江地区又稳步地发展起来。

第三支队由彭沃、曾源和陈一民同志率领(与地方党组成中共九连山工作委员会,书记曾源,部队对外称九连山人民自卫总队),分散在和平、连平、河源、龙川和江西省的定南、龙南、虔南七县活动。他们在和平县的泷源、热水、青州地区粉碎了敌第一五四师和第一六〇师的进攻,袭击了和平县警察局,伏击了河源县警察局的运输船,消灭了虔南县大吉山矿警,击溃了定南县保安大队,在九连山地区站稳了脚跟。

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分散到博罗、增城、龙门、河源、从化、佛冈等县坚持斗争。第四支队由阮海天同志率领,在增城县的永和地区突破敌第六十三军五千余人的包围后,留下一个中队在福和一带坚持,主力转移到增城北部山区和龙门县南昆山一带分散活动。其他各独立大队在周伯明、陈达明、饶璜湘、梁奇达等同志分别率领下,在罗浮山东北博罗、龙门边的横河、何家田和桂山、象头山以及从化、佛冈边的莲花山等山区分散活动。他们在敌第一五三师、保安第十团、梁桂平支队的反复围攻下,十分艰苦地坚持斗争,不断粉碎敌人的进攻,但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解放大队在何家田地区与进攻之敌激战了一天,毙伤敌四十余人,当晚向桂山转移路经路溪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牺牲二十余人,失踪数十人。

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实行分兵,卢伟如、黄宇、叶锋同志率领第一支队一部(该支队主力已全部调出,仅有一个新

编的大队)、第六团(团部已撤销,各营改称大队,由指挥部直接领导)和第七支队,分散在惠东宝老区坚持斗争。他们在粉碎敌新一军等部队的“填空题”作战后,第一支队分散在东莞大岭山老根据地活动;第六团原属第二支队的部队分散在惠宝边老根据地和东江河南岸活动;第六团原属第一支队的的一个主力“银星大队”,返回宝安阳台山老根据地活动,曾与第一支队联合作战,在东莞县樟阁击退国民党军的进攻,大队长黄锡良同志在战斗中受重伤,抢救无效牺牲。第七支队由叶基、邓秀芳同志率领,在惠东根据地的稔平半岛和铁炉嶂、杨梅嶂、九龙峰一带山区坚持斗争,他们以中队为单位组成武工队,在根据地群众支持下分散活动,曾在桔子壟、大王坳等地用连环地雷炸死炸伤敌三十多人。

为了进一步分散兵力和便于指挥,我们决定由江南指挥部参谋长高健和政治部主任黄高阳,组成以“热河”为代号的临时指挥部,率领第一支队一个大队、第七支队一个大队、港九大队独立中队和民运工作人员一千多人,于一九四五年冬挺进东江河以东惠阳、紫金边活动。这里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根据地,有群众基础。一九四二年我曾指示惠阳前线工委派遣党员曾学修同志返回他的家乡紫金县上义乡卷蓬村开展工作。他在那里组织了一个抗日常备队,一直坚持活动,并与我们部队保持联系。“热河”指挥部到达后,即依托卷蓬山区,进行开辟新区的工作。他们开设税站,建立交通情报站,开办乡村进步青年训练班,发展地方党组织,并

在塘角村建立了一个地方武装大队。国民党军不断向他们进攻,战斗十分频繁。一九四六年初,在惠阳县大岚地区,连续作战三天,击退了敌第一五二师的进攻;并在紫金县文斗坑与敌激战一昼夜,毙伤敌连排长以下二十余人,击溃了敌第一五二师和反动地主武装的围攻,我亦伤亡五人,政治指导员何文同志光荣牺牲。在坚持艰苦的斗争中,黄高阳同志积劳成疾,染了重病,那时缺医少药,救治无效,不幸去世。他是一九三八年起与王作尧同志在东莞地区发动和组织武装斗争的领导人之一,是我们纵队以身殉职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于他的早逝,我们十分痛惜。

东进指挥部先遣队向东挺进中,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上旬在惠阳、紫金边的佐坑一带多次打退敌第一八六师的进攻,歼灭紫金县警察队。十二月下旬进至紫金、五华边的中坝地区,与中共后东特委(书记梁威林)取得联系。他们在后东特委武装的配合下,在五华县的黄村、白云嶂、长布、安流等地,歼灭五华县警察中队,重创敌第六十三军教导团,共毙伤敌一百二十余人,俘虏八十余人,缴获轻机枪三挺、长短枪一百二十多支。这是我们纵队在分散坚持中打得比较好的一次歼灭战。第四团副连长苏光同志在战斗中牺牲。留守稔平半岛的部队,在格木洞战斗后,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亦挺进到佐坑。一月底,东进指挥部的两支部队在佐坑会合,然后转移到乌禽嶂、九和一带进行整编。

为了继续执行党中央分散坚持的方针和根据部队减员

的情况,我们决定撤销第四团、第五团建制,第四团整编为四个连,第五团整编为一个独立营,由副团长赖祥任营长,直接归指挥部领导。部队整编后再度分兵。卢伟良、张持平同志率领独立营和一个连以及第六支队、独立第六大队,留在惠阳、紫金边的乌禽嶂、九和、蓝塘和东江河东岸的古竹以及海丰的北部,惠阳的多祝、高潭一带活动。独立营在国民党军进攻时,采取集中兵力猛击敌人,然后迅速转移的战法,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下旬、二月上旬、三月中旬三次击溃敌第一五四师和地方反动武装优势兵力的进攻(每次均为一千多人),并在东江河东岸古竹附近实行武装掩护收税,解决部队的给养。他们在艰苦的岁月中连续作战,不仅保存了力量,而且由四百多人发展到六百多人。第六支队在惠阳、海丰边的高潭、大安洞一带山区坚持斗争,在敌第一八六师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围攻下,部队经济、供应十分困难。他们除留下精干的武装骨干坚持斗争外,其余人员疏散回家或到城市去。在反围攻战斗中,支队政治委员卢克敏同志负重伤,在转运途中,他和爱人王农同志一起被俘,同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英勇就义。独立第六大队在中共多祝区委的密切配合下,在多祝地区胜利坚持到北撤。

黄布、李征同志率三个连继续东进,二月上旬到达紫金、五华边的中坝地区,派出一个连与后东特委武装合编,组建了“紫五人民自卫大队”。他们联合作战,多次击退敌第一五二师和紫金、五华两县警察大队的进攻。二月底,部队

继续东进,三月中旬到达五华、揭阳、兴宁边的八乡山地区,与潮汕韩江纵队取得联系,并肩战斗,直到北撤。

抗日战争结束一年来,由于我们纵队坚决执行党中央分散坚持的战略方针,和全体指战员艰苦卓绝的斗争,使国民党军始终找不到我军主力,反而遭到我军的打击,疲于应付,他们妄图三个月消灭我东江纵队的计划被彻底粉碎。在斗争中,虽然部队大量减员,但各个支队都保存了骨干部队。我们进行的这些斗争和所取得的成果,为我们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北撤谈判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后来解放战争中,在这些地区恢复武装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谈 判 斗 争

如以上所说,国民党军不论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都从未停止过对我军的军事进攻,而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蒋介石更大的阴谋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发动全国范围的大内战,妄图一举将我党我军消灭。只是鉴于我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强大,和国内外舆论的反对,才不敢轻举妄动。特别是他要完成全面进攻解放区的战略部署,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蒋介石经过同美帝国主义密谋策划,在继续向长江以南,特别是向华南解放区进攻和积极准备全面内战的同时,采用“和平谈判”的反革命手法,以欺骗人民,争取时间。并且妄图在谈判桌上逼迫我党交出军队和解

放区,以达到其吞掉革命力量的目的。为此,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蒋介石忽然戴上了“和平”的假面具,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一连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但与此同时,国民党又放出谣言,胡说什么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等向我党栽赃,进行欺骗。

对于蒋介石的阴谋,我们党中央早就洞察了。对于同蒋介石斗争的基本方针党中央也是早就确定了。还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之前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同志向延安干部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报告时,就明确指出:“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但是,对于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备战的反革命两面派真面目,还需要经过揭露和斗争,才能使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认识 and 了解。于是为了粉碎国民党的谣言,为了反映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要求,尽量制止或推迟全面内战的爆发,党中央毅然决定派毛泽东等同志到重庆谈判。

从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日,我党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为代表,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了四十三天的谈判,终于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这四十三天的谈判,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在谈判中,我党坚持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的坚定立场,而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



下作了必要的让步，同意将我党领导的广东、浙江、苏南、皖中、皖南、湖北、湖南和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解放区让出来，将上述地区的军队逐步撤退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我们东江纵队北撤的问题就是从这里提出来的。

“双十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反动派阴一套，阳一套，根本不打算执行。但是，由于它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大批军队还没有到达内战前线，其先头部队在向解放区进攻时又连遭失败，被迫接受了我党提出的无条件停战的建议，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同我党达成了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一月十日，国共双方颁发了停战令，并组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代表参加的“三人委员会”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令。但国民党反动派对停战毫无诚意，就在停战令下达的同时，蒋介石即令其军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并不断调动部队向我解放区蚕食、进攻。在这样的情况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先后派出了八个执行小组到内战最激烈的济南、徐州、大同、张家口、赤峰、集宁、罗山和广州等地进行实地监督和调解。派到广州来的是第八执行小组。该小组的主要成员是：中共方面代表方方少将，国民党方面代表黄维勤少校，美国方面代表米勒上校。米勒上校并任第八执行小组主席。

一月二十五日，第八执行小组抵达广州，和国民党广州行营开始接触。这时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正忙着执行蒋介石

石打内战的命令,决心要在一月底消灭中共广东部队,对执行小组则虚以委蛇。当执行小组问到关于广东中共武装北撤问题时,张发奎竟矢口否认广东有中共武装。为了掩人耳目,他采用先下手为强的卑劣手法,于二月五日下午召开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信口雌黄,说什么他们“从未奉到辖区有中共部队番号、驻地及驻军数目之通知,各方亦无此种情报”;在广东,只有“专事扰乱治安者,仅系地方零星土匪”,“不能承认其为军队”,“故本人无法应中共代表之要求,妄行承认此种败类为中共部队”。接着,他又大放厥词说,广东只有“剿匪”,不存在执行停战命令的问题,甚至还说对第八执行小组“此来甚感惊诧”。张发奎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施放烟幕,以掩盖其妄图消灭我东江纵队和在广东的其他我党领导部队的罪恶阴谋。

对于张发奎的造谣诬蔑,方方同志提出严正抗议,并建议第八执行小组到东江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广州行营开始是多方进行阻拦,在阻拦不住时,又急忙作出布置,使执行小组到达东江地区后,仍无法与我东江纵队直接接触,并布置一些假证人来出面作证。国民党的宣传机构也一唱一和地发表消息说,第八执行小组到现场视察后确认广东无中共军队,企图从舆论上来为张发奎帮忙。

针对上述情况,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首先是通过宣传工具大造革命舆论,争取社会支持。一月三十一日,新华社发表了华南抗日纵队发言人的谈话,公开驳斥广州

行营的谬论,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掩饰近几个月来大举进攻中共军队及摧残解放区人民的罪行”。二月十五日,香港《华商报》又发表了中共广东区党委发言人发表的重要谈话,用铁的事实阐明广东境内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确实存在,呼吁各界共同督促国民党当局停止进攻解放区,实现全面和平。二月二十六日,新华社又发表了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谈话,再次义正词严地驳斥张发奎的谰言,并要求重庆三人委员会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迅速采取必要的步骤,纠正广东国民党当局此种错误言行,停止对华南抗日纵队的进攻与诬蔑”。二月二十二日,《华商报》又刊登了方方同志在广州对各报记者的谈话,严正声明中央社发布的第八执行小组“调查东江确无中共部队存在”的消息,不能代表整个执行小组的意见。在此同时,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我方代表叶剑英同志又郑重地向重庆和广州方面交涉,“要求承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并指出“它的领袖是曾生”。

在此期间,延安的《解放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和香港的《华商报》等,都相继发表华南抗日纵队的抗战功绩,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反击国民党的造谣和诬蔑。

我方一次又一次的有理有据的发言和报导,揭穿了国民党的谎言,暴露了他们假和平真内战的丑恶嘴脸,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从广东到香港,舆论越来越倾向我们,而广州行营却处在一片斥责声中。

舆论上受到谴责，军事上对我华南各解放区的进攻又连遭失利，使张发奎陷入困境。他借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之机，只身飞往重庆。第八执行小组留在广州，谈判一时处于停顿。

但是，我党并未让国民党这样赖下去。为了迫使国民党广东当局坐下来谈判，我们又进行了一系列斗争。

三月九日，党中央电告林平，立即飞赴重庆，以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当日，林平同志抵重庆。十一日，按照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他在重庆曾家岩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会上他批驳了中央社的消息和广州行营的谰言，向中外记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南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情况，以及七年来抗日的功绩，揭露了国民党广东当局对此加以否认的阴谋。十八日，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再次让林平同志在会上详细介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广东当局在东江发动内战的情况。还向到会的中外记者散发了在抗日战争中被东江纵队营救过的盟国友人写的感谢信，以扩大东江纵队的对外影响。会上，周恩来同志还代表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盟邦朋友、各党派朋友维护并监督“双十协定”的全部协议的实现。这次记者招待会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赢得了国内外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支持。首先，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国内人民纷纷集会，要求停止内战，共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国民党元老何香凝、爱国将领蔡廷锴、

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部负责人李章达等先后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内战，停止对东江解放区的进攻；其次，得到香港各界和进步团体的支持。三月二十二日，中国民主同盟港九支部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通电呼吁停止内战，停止对东江解放区的进攻。惠东宝旅港各界促进家乡和平民主及救灾大会也在九龙举行，会上揭露国民党当局疯狂进行内战，到处屠杀掠夺人民，破坏和平民主的罪行，并向全国及海外侨胞发出通电，呼吁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促进和平民主的实现。香港的进步报纸用大量篇幅刊载东江纵队的战绩。宗教界人士撰文赞颂东江纵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丰功伟绩；再次，得到国际友人的有力声援。被东江纵队营救过的英美朋友发表公开谈话，声明东江纵队是一支英雄部队，表示坚决给以支持。在国内外强大舆论压力下，特别是在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遭到失败的形势下，国民党广东当局不得不同意与我们进行谈判。又经过一系列的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广东省有中共武装力量存在，并在重庆与我们签定了关于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华南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二、华南中共武装力量北撤二千四百人，不撤退的可以复员，发给复员证，政府保证复员人员的生命安全，财产不受侵犯，就业居住自由；三、北撤人员撤退到陇海路以北。撤退船只由美国负责。具体措施商定回广东再谈。

为了促使谈判取得更大成效，重庆三人委员会决定派

一个三人委员会军事代表团前来广州协助第八执行小组工作。这个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是：国民党方面代表皮宗阉上校，中共方面代表廖承志同志，美国方面代表柯夷上校。军事代表团于三月三十一日到达广州。林平、张发奎也同机到达。然后同第八执行小组一起进行谈判。

谈判伊始，张发奎又想食言，企图否认在重庆达成的协议，再次制造障碍，阻止东江纵队北撤。于是廖承志同志毫不客气地质问他：“你老是口口声声说广东无中共武装，那你们过去发了那么多限共、溶共、反共的密令，是针对谁的呢？”“目前你们又制定了绥靖密令，又是针对谁的呢？难道不是针对中共武装的吗？”几句话问得张发奎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柯夷上校和皮宗阉上校也不支持张发奎这样愚蠢地纠缠下去。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到四月二日，广州行营才与第八执行小组就东江停战和东江纵队北撤问题签署了联合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包括了三项原则，十项决议和一个决议附则。三项原则是：一、登船地点：大鹏湾。二、人数：两千余人（不得超过三千人）。三、时间：自开始调查之日起，至登船之日止，以一个月为限，不得超出。十项决议是：

一、广东省内和东江以南、东江以北、以及广东北部三地区的中共武装人员二千四百人（其中包括妇孺三百人），在大鹏半岛集中，用美国轮船运到山东烟台登岸。

二、上述人员的集中及登船的准备，自第八执行小组派出联络小组出发调查开始之日起，共一个月。距大鹏湾较远

的地区(粤北)人员,若不能及时赶到,须宽限时日,要呈报三人委员会决定。

三、在中共武装人员集中大鹏半岛期间,以及登船之前,大鹏半岛葵涌、王母圩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应撤离该区若干距离,以便供中共武装人员集中。

四、在中共武装人员集结及行军、登船过程中,广州行营要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并要特别令其所属,不得有任何攻击行为。

五、上述中共武装人员集中转移过程中,广州行营同意代购粮食或供款给他们购粮,广州行营方面并同意在运输、医药等方面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

六、为执行上述协议,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执行小组应以三人委员会代表机关的资格迅速组成并派出三个联络小组,分别携带电台到东江以南、东江以北、以及广东北部三个地区进行调查,及协助中共武装人员至大鹏半岛集中登船,各联络小组均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美国三方面的各一名代表。

七、广州行营派出宪兵若干人供第八执行小组及其联络小组使用,随同联络小组出发,其人数与任务均由第八执行小组决定。这些宪兵在随同联络小组执行职务期间,须接受第八执行小组及其联络小组之命令。

八、中共方面的林平少将于决议重要原则确定后,即乘飞机出发,于三日内陪同中共武装人员代表曾生少将及其

代表,以及中共方面的联络小组人员前来第八执行小组,以便和广州行营代表共同商讨撤退中共武装人员的具体细则。三日之后,即作为“调查开始日期”。国民党方面允许保证上述人员公务来往的安全及提供交通等方面的便利。

九、关于决议各点执行的具体细则,由第八执行小组与广州行营代表及中共武装人员代表共商决进行。

十、本决议经三方面签字后,即付诸实施。

决议附则的内容是:

一、中共代表廖承志提出广东省各地中共复员的武装人员及其家属,请国民党政府保证不受歧视,并且一律享受复员法的待遇,同时并保障其生命安全及居住、就业等一切自由,并要求广州行营发给中共复员人员复员证。广州行营代表王衡少将表示可以保证国民党政府不歧视奉公守法的中共复员人员。

二、中共代表廖承志说明:“中共领导下的东江武装问题,今已原则上解决,但并非说广东全省问题均已解决。中共领导下的琼崖纵队问题,希望能以同样的诚意及速度解决之。”对此,国民党代表皮宗阉上校说,柯夷上校曾说过:“此问题已由重庆三人委员会谈过,但尚未获得协议。本人此来乃为处理东江问题,无权处理海南问题。”柯夷上校作结论时说:“本人保证将海南问题提交重庆三人委员会讨论”。

三、中共代表廖承志提出第八执行小组中共方面的电



台最近受到破坏,希望广州行营保证以后不要再有此类现象发生,并希望广州行营迅速答复中共代表使用电台问题。广州行营代表王衡少将表示,使用电台问题已请示重庆,破坏问题则并无所闻。国民党代表皮宗阉上校答复到重庆后当负责催请政府迅速答复。柯夷上校说明:“重庆允许,即可使用”。

这样,东江停火和东江纵队北撤问题算是达成了协议,三人委员会军事代表团的工作也宣告完成,他们于四月三日飞返重庆。关于执行决议的具体工作,留交第八执行小组继续和广州行营打交道。因为我方的电台遭到破坏,廖承志同志临走时把他的电台留给方方同志使用,但不久又被破坏了。

按照决议中的第八条规定,四月三日,林平同志由广州到香港,然后同我一起去广州,共同以中共华南武装人员代表的身份参加谈判。四月四日,我和他一起在国民党广东当局选派的一名副官和几名宪兵的“保护”下,下午由九龙尖沙嘴乘火车动身,当晚到达广州。和我们同行的工作人员有戴机、林立、彭丰、林展四位同志。他们对外的名义:戴机、林立是通信官,彭丰是副官,林展是翻译官。(后来曾文、魏凌风等十位同志也陆续到广州参加谈判工作)。当时的广州,生意萧条,街道冷落,衣衫褴褛的乞丐和残腿断臂的国民党军伤兵遍布街市。昔日繁华的沿江路一带到处可以看到用破报纸、破草席掩盖着的饿尸,景象十分凄惨,目不忍睹。

第八执行小组和我们这些参加谈判的人员都住在沙面复兴路六十四号，原苏联领事馆内。美方代表住在三楼，我方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分住在二楼的左、右两边。最底下的一层住的是卫兵、勤务人员和国民党特务，这座红砖砌叠的三层楼被牢牢地监视了起来。

我们到了住地，和方方同志会了面。他告诉我们：“根据“双十协定”华南中共抗日武装北撤到山东解放区，第八执行小组的任务就是尽力使这一协议能早日实现。我们中共代表要起主导作用，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高度警惕国民党反动派的表面言和，背后捣鬼的惯技，要抓紧时间落实协议，以免夜长梦多。”林平同志接着方方的话说：“打来打去，国民党打不过我们，这才承认了我们，和我们签定了协议。但这只不过是纸上的东西，信不得！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恐怕还得作更艰苦的斗争。我估计他们不会让我们顺利北撤，因此我们不能三个人都捆在这里，一定要想办法走脱一个回去指挥部队。”方方和林平同志的一席话，把当时谈判的形势、斗争的目标和方针都讲清楚了。这使新参加谈判斗争的我，心里有了底。当时我考虑，三个人是得走一个，然而谁走得了呢？方方是走不了的，他是第八执行小组的成员。我也走不了，国民党当时的目标就是对准我，所以才叫我来的。林平是政治委员，按照国民党的认识，政治委员只会做空头的政治工作，不会打仗，若是他走，可能会容易些。林平同志同意我的分析，于是决定他想办法回到

部队去。我对他说：“你回部队后，要把协定上的条款原原本本地告诉大家，让大家提高警惕，千万别在集结时遭受围攻，要注意别让人家一锅端了。”方方同志也同意我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又研究了一些其他问题后，才分头去休息。这时，夜已经很深了，又坐了一天的车，本已很疲劳，但我却没有丝毫睡意，我思量着以后的斗争，想尽量把困难和问题想得更多、更复杂些。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后来的谈判，越是接触具体问题，斗争也就越尖锐、越复杂。

按照已达成的协议，我们开始和广州行营的代表就如何派出第八执行小组的支组同分布在广东各地的东江纵队部队进行联络，东江纵队各部队集结的行军路线与时间，北撤及复员人员的粮款供应等具体问题进行谈判。

但是，国民党广东当局仍顽固坚持真内战，假和平的反动方针，只是热衷于调集兵力向江南、江北及惠阳、紫金、海陆丰边境我军进攻，而把谈判只是作为拖延时间，配合军事进攻的手段，因此对谈判当然不会有丝毫诚意。尽管在谈判桌外还保持一点面子，彼此称兄道弟，请客吃饭，但一坐到谈判桌前就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有时坐下来还不到十分钟，便争得脸红脖子粗，拍枱拍凳，根本无法谈下去。碰到这种情况，作为执行小组主席的米勒上校就只好建议双方暂停接触，各自回去拟出实施四月二日决议的具体方案，交由第八执行小组与双方分别磋商后，再开会研究。

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在日常生活中国民党方面也处

处刁难我们。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们有两个工作人员看病回来，刚刚迈进住地大门，一个便衣特务便走上来盘问，不但责怪我们的同志外出看病事先不向他们报告，而且还用粗话对我方进行侮辱和攻击，我们的同志则据理反驳和给予斥责，于是双方吵闹起来，一直吵到国民党方面自知再吵无益时方收场。象这样无故寻滋闹事的情况时有发生。

在林平同志回香港的问题上，我们也经历了一场惊险的斗争。有一段时间，林平同志闹肚子，吃不了东西。于是就借这个机会，在一次谈判的会上他提出要请假到香港去治病。黄维勤和王衡都很狡猾，他们猜想林平此去一定不会返回来了，于是极为反对，坚持要林平在广州就地医治。方方同志知道和他们纠缠没有用，就径直去同米勒商量。他问米勒：“上校先生，在你们的军队中，病人是否有治病的权利？军队是否也要有人道主义？”米勒上校比较讲道理，他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同意了林平去香港治病。于是，林平同志决定乘火车从广州去香港，并按规定将所要乘的火车班次告诉了国民党方面，以得到他们的“保护”。岂料这个“保护”竟险些使林平同志丧了命。林平同志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火车站，看到火车站里人头涌涌，根本买不到车票，就当机立断改为乘坐轮船，结果安全到达香港。而他预乘的那个班次的火车行驶至增城县境时却翻了车。事后了解，制造翻车事故是国民党的“杀敌”大队大队长朱兆康干的。这就明

白不过了，国民党广东当局就是想把我们困在广州，使部队失去指挥，以便他们进攻消灭。但事情的发展不会按着他们的一厢情愿。

为了达到破坏谈判的目的，国民党的特务们又借广东当局请我们吃饭的机会，再一次破坏了我们的电台，中断了我们与外面的联系。从这以后，直到最终达成东江纵队北撤的具体协议，我们离开广州时，我们都不得不借用米勒上校的电台和外面进行联系。这样，当然很不方便。为了保持同外面的联系，有时只好轮流值班，派人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向外了望，看到有可靠的熟人从下面经过，便向他打信号，然后下楼去把他接上来，寒暄问候，私下里向他打听外面的情况，并把我们要发的消息托他带出去。我们这样做，国民党方面当然很恼火，但又找不到干涉的理由，也无可奈何。就是依靠这些曲折迂回的办法，我们才艰难地保持住与外面的联系。

经过一系列尖锐反复斗争，到了四月十八日，才和国民党广东当局就有关东江纵队各部队集中地点、国共军事分界线、北撤部队行军路线、使用通讯器材等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并发表了第一号新闻公报。

由于国民党广东当局的顽固滋扰和别有用心，不论四月二日达成的决议，还是四月十八日达成的协议，其中有很多条件对我们是很不利的。如集结时间只许一个月。我们纵队的部队分散在一千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要在一个

月内集中是十分困难的。外界的舆论也都看到了这一点。第一号新闻公报公布后，有的记者就问我，东江纵队能否在一个月內集中起来？我非常自信地对他作了肯定回答。我很了解我们的部队，我坚信他们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准时集结。

协议中还规定我们的宿营地必须经国民党方面指定，行军道路仅仅是由国民党军队撤开五华里的走廊，我们的部队在这种条件下行进，随时都有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的危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另外，还规定我们的部队不许散发标语宣传品，不许做行军以外的工作，不许与人民接洽任何事务，不许群众慰劳我们，不能将武器留给地方，等等无理的要求。

虽然协议的条件如此苛刻，但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不仅在协议上签了字，而且忠实地履行了协议。而国民党方面却完全相反。他们在谈判桌上也装模作样，信誓旦旦，而在执行协议时却不断寻找借口，滋生事端，进行毁约。

我们部队北撤需要粮款，这是个关键问题。对于这一点，连米勒上校也都承认，并为此连续两次致电重庆三人委员会，盼望能迅速解决，以保证协议得到真正执行。但正是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故意多方加以刁难。

按照四月二日的决议规定，东江纵队北撤人员的置装费、用粮费、伤病员的治疗费、复员人员的安置费等约需国民政府的“国币”十亿元，都应由广州行营供给，但他们只同

意借给二千四百个北撤人员的口粮款，至于其他款项，则不肯承担。我们多次据理力争，又经叶剑英同志出面干涉，他们才勉强答应借给我们“国币”七亿元，但也只是先交一亿元。而且还提出一个先决条件，即要求我方先在河北省的南口、石家庄、沧州等地向华北执行组送交他们所需要的粮食，解决那里的国民党军队的“燃眉之急”后，广州行营才向我们提供借款。我们当时都很清楚，这又是在玩弄阴谋。因为这时，国民党的内战部署已基本就绪，他们是企图借此拖延时间，等待全面内战爆发，把我们消灭在广东。广州行营始终在做“先消灭了再谈”的美梦。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阴谋，迅速北撤烟台，四月二十五日，方方同志将广州行营的条件电告叶剑英同志和党中央及周恩来同志。党中央为了照顾大局，采取了让步政策，按照国民党的要求立即派人向南口、石家庄、沧州等地送交了粮食。接着，又迅速从南京、上海寄来一笔款子，解决了我们的困难。

这样经过曲折反复斗争，克服了敌人设置的重重障碍，终于在五月二十一日，就东江纵队北撤的所有问题，同国民党广州行营达成最后协议。最后协议规定，五月二十五日派出三个支组出发到江南、江北和粤北解放区，调处中共军队北撤的各项工作；又规定广州行营发给我方复员费三亿七千五百万元，二十二日先拨付一亿元，其余在到达集结地点时拨足；至于米粮方面，广州行营同意沿途拨借。

二十二日，我们接到了广州行营拨来的一亿元，但是此后，直到我们离开广东再也未接到其他款项，国民党当局从来是说话不算数的。

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各项工作处理就绪后，我和方方同志到广州行营去见张发奎。他假惺惺地向我们表示，要保证我方的安全。我们当然也在礼仪上向他表示了谢意。当晚，我们在胜利大厦举行名流人士和记者招待会，介绍谈判情况。我们表示一定要忠实执行协议，同时也希望广东当局以大局为重，言行一致，为共建和平作出贡献，并希望美方代表和各界人士监督协议的实施。

二十三日，第八执行小组发布第三、第四号新闻公报，公布了最后协议的主要内容。同日下午二时半，以小组名义在广州行营招待所举行鸡尾酒会招待各报记者。会上，国民党代表黄维勤少校大言不惭地奢谈和平建国，顺乎民意，等等。听着他那虚情假意的发言，回味在五十多天谈判斗争中的所见所闻，一股蔑视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对于这些善耍手腕，具有两重人格的人，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能够轻信他们的花言巧语吗？

方方同志主持这次招待会，他向到会记者介绍了三个支组出发工作时的标志，中共北撤人员的标志，中共复员人员的复员证以及经费的出处和用途等问题。



## 胜 利 集 结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第八执行小组的三个支组由广州出发，分赴江南、江北、粤北三个地区具体调处东江纵队部队北撤的工作。各支组的主要成员是：

粤北支组：国民党方面：代表黎国熹中校，通讯官阮觉民；中共方面：代表杨康华上校，临时代表李大熊少校，联络官彭丰少校，译员郑平；美国方面：代表纳尔逊上尉、克利斯底上士，译员林祖贻。

江北支组：国民党方面：代表曾广燮中校，通讯官肖宴狱；中共方面：代表黄坚少校，联络官曾文少校、凌风上尉，译员王朴；美国方面：代表琼斯少尉、柯士德上士，译员赵国荣。

江南支组：国民党方面：代表罗绮皓少校，通讯官李华亭；中共方面：代表曾生少将，通讯官戴机中尉、林立中尉，译员任以沛；美国方面：代表伐塞门上士，译员林英机。

我们江南支组和江北支组全体人员同乘一条船离开广州，前往惠州。到达惠州后，江北支组转赴博罗，我们江南支组就留在惠州，住在国民党的“东江游击指挥所”。

当晚，东江游击指挥所的司令及其要员们在惠州西湖的游艇上设晚宴招待我们。这些反共老手虽多年与我们兵戎相见，但这时也故作姿态点头哈腰地表示“友好”，并口口

声声说要为和平尽力。但演员演惯了反面人物，演正面人物时总是不大象，反而显得滑稽可笑。与这些老奸巨滑的反面人物打交道，我们经验不多，因此格外小心，除了和他们谈谈惠州西湖的景色和有关苏东坡过去在惠州的故事外，没多少话可说。游艇在湖面上轻轻荡漾，但我的心却一点儿也轻松，我一直考虑着应该怎样尽快和部队取得联系。

到惠州后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的地方要员们争先恐后地请我们吃饭，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在宴会上，他们专挑好听的话说，而从不提及我们支组到惠州的工作。一旦我们主动谈及和部队联络的事，他们便推三推四，极力回避。在暗中，他们又组织了一帮反共分子到我们住的地方来请愿，控诉共产党的“罪行”，闹得乌烟瘴气。对于他们这些拙劣的表演，我们早有思想准备，所以并不放在心上，知道他们无非是造谣生事出难题，翻不了什么大浪。我着急的是，眼看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离集结的日子越来越近，却还没同部队联系上。我们的宝贵时间不能再这样白白浪费了！经过周密思考后，我径直向他们摊牌，提出寻找江南指挥部和与他们联系的要求。当时惠阳县有两个同音不同字的平山（用广州话讲是同音，用客家话讲则是不同音）。一个是“坪山”在淡水西南，距淡水镇约二十公里。这里是我们的根据地，江南指挥部常在此活动，而且不久前也约定好要在这里联络。另一个是“平山”（即现今的惠东县县城），在淡水镇东北面，距淡水镇约四十公里，当时那里没有我们的部队

活动。国民党方面明明知道这个情况，但为延误我们的时间，一定要我方到“平山”去寻找部队，结果又白白耽误了好几天。后来经过我强烈抗议，他们才不得不同意我们派人去“坪山”联络，这才与早就得到通知并在这里等待了很久的江南指挥部联系上了。由于国民党方面的拖延，我们在江南的部队直到六月十六日才到达葵涌。

后来我听到汇报，各个支组在调处北撤部队的集结中都遇到不少困难。江北支组五月二十八日到达博罗县横河，三十日与部队取得联系。但国民党军趁我们江北部队分散之机，以一个营的兵力袭击了我们驻在增江河畔沙塘圩的部队，打死我战士八名，抓去七名，并抢去机枪、步枪一批，现款二十几万元。支组的我方代表提出抗议，而国民党方面代表却置之不理，因此使我们部队集中的时间也拖延了好几天。在惠阳县东部地区，当我东进指挥部率领的部队集中到多祝西南牛皮嶂下的园潭时，国民党军保安第七团出动了两个营的兵力向我发动进攻，企图在这里将我们这部分部队一举消灭。国民党军驻多祝的一个营首先进入园潭，我东进指挥部早有准备，他们以独立营为主作好了伏击敌人的部署，待敌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后断其退路，从四面八方发起攻击，经过一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该敌。其驻平山的一个营在开进途中，见势不妙，掉头逃走。这次战斗，共毙伤敌人一百三十多名（敌营长被击伤后逃脱），俘虏敌两个连长及以下官兵六十多人，缴获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四挺，长短

枪七十多支。这次战斗，是我们纵队自抗日战争以来在反顽作战中第一次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营，大振我们的军威，严重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我军于集结途中的阴谋。国民党军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气急败坏地反咬一口，向第八执行小组诬告我们袭击他们，要求第八执行小组“火速调处”。但当第八执行小组派员前来调查时，我方代表当场把缴获的国民党军向我进攻的命令摆出来，驳得他们哑口无言。

集结北撤最困难的是我们在粤北的部队。当时，我们这些部队十分分散，北到湘南和赣南，南到从化，西到曲江、英德，东到和平、连平的九连山一带，要立即集中起来确是很不容易。当我方克服了重重困难，把队伍集中到龙口时，发现三个特务身藏短枪，企图暗杀王作尧和杨康华同志。我们把他们捉住后，进行审讯，他们供出这是国民党代表黎国熹布置的。这个黎国熹眼看丑剧被揭穿，恼羞成怒，竟动手打伤了我们看管特务的同志。我们的战士怒不可遏，要求严肃处理此事，否则不走。而国民党方面又赖着不认错，双方僵持不下，直到第八执行小组发来了调解电报，保证以后再不出出现此类事情。我们取得了斗争胜利，部队才又继续南进。

在粤北部队南移的全部过程中，国民党军的第一三一师和第一五三师一直紧紧尾随，企图趁我不备时加以消灭，或寻找适当的机会捕杀我方掉队人员，由于我们部队加强戒备，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粤北部队经过千辛万苦，终

于在六月二十三日——限定日期的前两天，胜利地到达葵涌。珠江纵队的部分部队、韩江纵队和粤中、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的部分骨干，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阻挠，也相继到达葵涌地区。这是我党领导下的华南各抗日武装（除琼崖独立纵队外）的领导骨干和东江纵队的主力部队的一次大会师。在抗日战争八年的艰苦岁月里，同志们分散在广东各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没有见面的机会，今天欢聚一堂，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

当然，现在聚集到葵涌来的，也只是除了琼崖独立纵队以外我党在广东的武装力量的很小部分。因为按照协议，北撤人数只是二千四百人，广东区党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部署东江纵队只保留班长以上干部和老战士北撤，大部分人员复员（其中不少人在分散坚持中已有计划地疏散回家），一部分人调派到广州、香港等城市工作。同时鉴于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发动内战的严重局势，在各地区仍保留了一批武装骨干隐蔽坚持斗争，以保卫复员人员和群众利益，并且作为全面内战爆发后，恢复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据不完全统计，粤北地区留下有二百多人，九连地区留下有六十多人，潞江地区留下有一百多人，后东地区留下有二十多人，江北地区留下有四十多人，江南地下留下有四十多人。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和粤中、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北撤的只是很少的部队或只是领导骨干，他们留下坚持斗争的人员更多。

另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原粤北省委领导人李大林、

饶卫华，原江西省委领导人谢育才等也到葵涌来和我们会合，随同我们纵队北撤，然后再去党中央。

北撤的人员集中以后，根据广东区党委的决定，组成了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北撤工作。军政委员会成员：东江纵队是我和王作尧、杨康华同志，珠江纵队是林锵云、谢斌同志，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是罗范群、谢立全、刘田夫同志，区党委指定由我担任书记。本来林平同志也已决定要北撤的，党中央鉴于全面内战必然要爆发的严重局势，又决定他留下来，和方方同志一起领导广东及华南的斗争。

部队集中了，领导机构组成了，但我的思想还是安定不下来，部队的安全问题不断在我的脑子里回旋，党中央指示我们要防止“皖南事变”的重演。我们了解到在惠州、淡水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就有两个师的兵力，并且对我形成了包围压迫的态势。前些时间我在惠州时，国民党东江游击指挥所那个司令悄悄地对我说：你们要抓紧时间走，他们（指国民党正规军）正在调动部队，想消灭你们。这表明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想我们走，不走他们不得安宁；而国民党正规部队则企图就地消灭我们。我们到达葵涌后不久，在香港的连贯同志又给我们送来情报：“顽军两个团又开向我区，拟歼灭我集中的部队”。（这个情报是以民主人士身分进行活动的我党地下工作者萨空了带给《华商报》转给连贯同志的）说明国民党反动派始终是处心积虑要消灭我们。

为了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从最坏的情况出发，作了对付

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向我们进攻的部署：江南指挥部和东进指挥部的部队部署在葵涌外围，担任坚决阻击国民党军进攻，掩护已集中的部队和人员突围和疏散的任务。他们在葵涌地区周围数十里布置了严密的情报网，在附近山岗的战术要点上构筑了工事，设置了地雷区；粤北和江北指挥部的部队作好分路突围的准备，突围以后返回各自原来的根据地坚持斗争；在沙鱼涌附近港湾，我们准备了三百多只小船，作为机关、各江干部等非武装人员向海上撤退之用。在国际方面，我们与英国人取得联系，他们承诺可以从海上掩护我们向香港新界地区撤退。另一方面由方方同志抓紧做第八执行小组的美方代表米勒上校的工作，不断地向他揭露国民党军企图向我进攻的阴谋，必要时请他出面讲话，作为对付国民党军进攻的一个手段。方方同志还警告国民党代表：我们已严阵以待，如果你们不守信义，你们就要受到惩罚。

六月十五日，第八执行小组经过香港到达葵涌地区。在一次小组会上，我们决定要揭露国民党广东当局的罪恶阴谋。我当时问米勒上校和黄维勤少校：“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总是尾随着我们，我们的安全究竟能不能得到保障？”黄维勤心中有鬼，不敢作声。米勒上校一再表明说，张发奎和王衡的保证是有效的，要我们相信他们，不要多心，不要毫无根据地忧虑，并说绝不能采取军事行动。方方同志和我向他解释说，我们不是无端地不相信张发奎和王衡，更不是庸人

自扰,而是有确凿的证据广州行营言而无信,阴谋把军事行动强加于我们。方方同志又列举了国民党军在葵涌附近的横岗和在霞涌增兵的事实加以佐证。他说,我方从来都是真诚希望顺利北撤的,对于这一点,上校应该是了解的。然而,事实并不以我们单方面的意志为准,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为了保证北撤得以实现,我们希望上校出面制止事态的发展。

在我方强烈要求下,米勒上校同意以第八执行小组的名义向张发奎发出了一封急电,要求他:在美国船只未到达大鹏湾以前的等待期间里,中共广东武装人员的安全应予以确实保证;在未接到第八执行小组关于中共武装人员已登船启航的通知之前,政府军队不得越过已商定的军事分界线。

该电由米勒上校签发,在电告张发奎的同时,也电告了在香港的广州行营代表王衡少将。

张发奎和王衡接到电报后,知道只要第八执行小组在葵涌地区,要进攻我们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企图调虎离山,把第八执行小组全体人员从葵涌地区调到香港去。王衡从香港发急电给米勒上校,邀请执行小组全体人员到香港商谈保证中共武装人员安全的“要是”。我们一眼便识破了国民党方面的诡计,方方同志首先提出反对意见,他说:“现在,除非是毛泽东主席下命令调我离开这里,我才走。否则,不管是谁的命令,我都不服从!”米勒上校眼看自己的工作即将结束,可以回国退休与家人去享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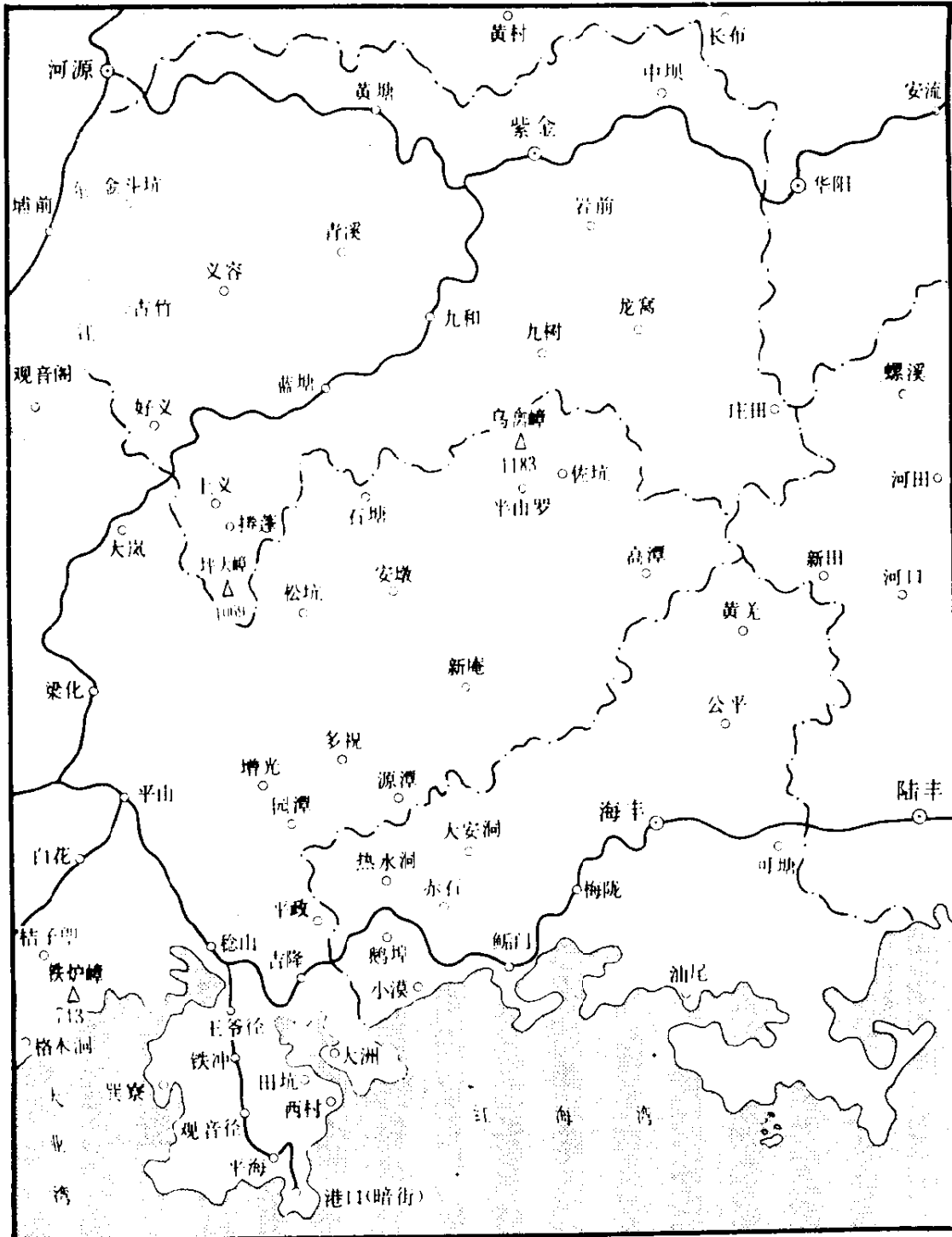
伦之乐了，他不愿功败垂成，所以也不同意离开葵涌地区。第八执行小组的三人中两人持反对票，王衡也就无可奈何了。加之这个时候我们在香港的报纸上也大造舆论，揭露广州行营在东江纵队集结中玩弄的一系列阴谋，得到了广东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及在香港的惠东宝同乡会的支持，他们纷纷发表宣言、声明，要求保证华南抗日武装安全北撤。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州行营不得不通过他们的中央社发表声明，表示要“保证中共人员安全北撤”

但是，在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反动派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向我中原解放区发起了进攻；在东北，战争也正在大规模地进行，事实上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开始了。我们北撤部队集中在大鹏半岛的葵涌一隅，面对茫茫大海，没有回旋余地，而国民党军始终在周围虎视眈眈，所以处境一直是很危险的。我们军政委员会当时也很紧张，一再告诫全体指战员，必须加倍警惕，随时作好应变准备，以防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



# 海陆惠紫五边略图

(图九)



## 第十四章

# 成立两广纵队

## 北 撤 山 东

从沙鱼涌到烟台。由于无隙可乘，加上害怕中外舆论的谴责，国民党军终于不敢冒然向我发动进攻。六月二十九日，是负责载送北撤部队的美国军舰到达沙鱼涌海滩的日子。这一天中午，北撤部队在严密警戒之下从葵涌开到沙鱼涌沙滩候船。各地，特别是惠、东、宝和港九地区闻讯前来送行的军属亲人们以及复员的同志们，也来到沙鱼涌海滩。下午四时，方方同志代表中央军委对全体北撤人员讲话，他说：“你们打了八年日本鬼，解放了大片国土，挽救了千百万同胞的厄运！然而，日本投降了，你们却不能不离开家乡”。“你们为了坚决执行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训令，你们终于决然毅然冲破一切困难——不怕牺牲，不怕艰苦，毫无反顾的英勇集中北撤，说明你们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怀抱的伟

大，不愧是人民优秀的儿女，不愧是毛泽东的好学生”。方方同志的这番讲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接着，我也讲了话，简要阐明北撤的意义，向乡亲们和复员战士们珍重告别。

之后，我代表北撤的全体指战员向米勒上校赠送了一面绣着“和平使者”的锦旗。米勒接过旗后，举起双臂高呼：“祝中国早日实现和平！”方方同志接着也举手高呼：“和平万岁！”“民主万岁！”跟着，同志们一齐呼喊起来。口号声犹如雷鸣一般在海滩上滚动，打破了沉寂的海空。

在与米勒上校一起工作的日子里，方方同志曾多次与他个别交谈，让他了解我党的方针政策，及我党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争取他能公正地处理国共之间的矛盾。米勒虽然信仰、政见与我们不同，而且许多方面受国民党影响很深，但在处理双方矛盾时，还基本上是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因此我们给了他“和平使者”的赞誉。

下午六时左右，美军 585 号、589 号、1026 号三艘登陆舰在一艘驱逐舰率领下靠近沙鱼涌海滩，北撤的同志们开始登船。按“北撤协议”规定以东江纵队名义北撤二千四百人，但经我们做了美军负责运输的指挥官德臣上校的工作，他同意只要船能装得下，可以不受二千四百人的限制，所以一批原已安排复员，但又坚决要求北撤的战士也随同登了船。到烟台后统计，我们实际北撤人数是二千五百八十三人。

我们登船完毕后天已经黑了，美军登陆舰即驶离沙鱼

涌海滩，停泊在大鹏湾中。现在，我们虽然已登上了美军登陆舰，但不等于安全无恙了。登船前军政委员会曾研究决定了应变的准备：军政委员分工负责各船的领导指挥，我们将美军的三艘登陆舰编为第一、第二、第三船，第一船由我和刘田夫同志负责，第二船由罗范群、谢立全、谢斌同志负责，第三船由王作尧、林锵云、杨康华同志负责；各船派出干部日夜在航海室值班，检查航线，以防万一；每一只船挑选数十名勇壮之士，各人暗藏短枪（按美军规定登船后武器要入库），准备在发生突然事变时夺回武器弹药，武装起来对付敌人。

三十日早晨，太阳刚从海平线升起，美军登陆舰即升火启航，徐徐驶离大鹏湾。我和同志们都登上登陆舰的甲板，深情地望着我们亲自从敌人手中解放的土地，怀念着留下来坚持斗争的战友和八年来艰险与共的东江人民、广东人民，思潮澎湃。我们都使劲地挥动手臂，很多同志眼中都含着热泪，高呼：“再见吧，战友们！”“再见吧，父老乡亲！”“再见吧，亲爱的故乡！”政治指导员们为了活跃情绪，拉开了歌喉，领着战士们唱起了《北撤进行曲》：“为了广东的和平呀！我们要离开战斗的故乡，我们要奔赴新的战场，辞别了亲人，告别了战友，漂过海洋到遥远的北方。……”这悲壮的歌声，伴随着海风在大鹏湾上空飘荡。

七月一日，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为了纪念我党诞生二十五周年，我给各船发去了电报：纪念党的生日，要发扬光荣

的革命传统，紧密团结，时刻警惕，随时准备战斗，保证胜利完成北撤任务。

运载我们的美军登陆舰，不久前曾从九龙运载国民党的军队到秦皇岛和青岛等地。国民党的军队带有军妓，供他们的军官和美军水手寻欢作乐。这次运载我军，美国人以为“共军”和“国军”差不多，因而各船都曾发生美军水手对我女同志耍流氓事件。对此我方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要他们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由于国民党的污蔑宣传，说我们是无组织的“土匪”，因此开始时美军舰上的人员对我们采取歧视态度。但是经过几天的实际接触后，看到我们组织坚强，纪律严明，上下团结，官兵打成一片，战士们活泼而有礼貌，他们的观点改变了。一个美军军官对我们说：“我们运载过日本俘虏、国民党军队，但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象你们这样活泼而有纪律的部队”。这可以说是我们北撤的副产品——在国际上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声誉。

七月四日下午，当舰队从黄海进入渤海接近烟台的时候，我又给各舰指挥部发去了电报：明日七时即可抵烟台，因为山东形势紧张，希望全体同志作好战斗准备。

七月五日晨，各舰相继抵达山东烟台港。同志们一早就起来，登上甲板，怀着极兴奋的心情，向烟台了望。我站在舰桥上纵目观看，美丽的烟台市和港湾尽入眼帘，心胸为之扩展，不觉喊出：“北撤胜利了！”我们撤出的人数虽然比较少，但这是我党按照“双十协定”撤出的八个解放区中所经路程

最远，而取得较为全面胜利的一个。这一胜利的取得，是党中央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同国民党反动派反复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和美、英等盟军联合作战，建立了战友感情的反映。

胶东军民热情欢迎。登陆舰停靠在烟台市浪坝码头，我率领第一船的同志们首先上岸，胶东行署曹曼之主任、胶东军区王彬副司令员、第六师刘涌师长和仲曦东政治委员及烟台市徐仲夫副市长等同志率领党政军民的代表早已在码头等候，热烈欢迎我们。抗战八年，我们孤悬在华南敌后独立奋战，今天和老大哥会师了，我紧握着曹曼之等同志的手，无限感慨。

接着，战友们在浪坝码头前举行了欢迎大会。王彬副司令员、曹曼之主任、仲曦东政治委员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对我们热烈欢迎，并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进攻抗日有功的人民军队，号召大家共同保卫和平。最后由我代表北撤的全体指战员致答词，热诚感谢胶东和烟台市党政军民的盛大欢迎，并表示，我们将继续用我们的血肉，和这里的战友共同为新中国的和平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

欢迎大会结束后，北撤部队在八路军老大哥的引导下，离开码头进入市区前往宿营地。烟台市群众倾城而出，在我们所经过的街道，夹道欢迎。街道两旁，密密层层地站满了干部、民兵、工人、农民、店员、学生、妇女、少年儿童，他们打着彩旗、横幅，敲锣打鼓，吹奏哨呐，扭起秧歌。歌声、欢呼



声，“热烈欢迎抗日有功的东江纵队！”“坚决保卫和平，坚决保卫解放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的口号声振荡市区，响彻云霄。老大娘们挽着筐筐，把鸡蛋、馒头塞到同志们的口袋里；姑娘们把桃、杏、苹果塞到战士们的垮包里。指战员们感动得热泪盈眶，频频高呼：“向烟台人民学习！”“向山东人民学习！”“向八路军、新四军老大哥学习！”“誓死保卫解放区！”欢迎大会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成了保卫和平，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动员和示威。

七月六日下午四时，烟台市外事办公室为我们胜利北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在会上代表北撤部队发表谈话，首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日本投降和停战令生效后，向我华南抗日武装发动进攻的情况，继之简要地谈了北撤的经过。最后庄严声明：“虽然历史斗争证明我们有力量在广东坚持下去，但我们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执行党的正确方针，所以我们忠实遵守了协议，我们是非常的光荣的，我们相信全国人民大众是会做出一个公正裁判。”

七月七日，胶东和烟台市党政军民联合举行纪念“七七”抗战九周年和庆祝东江纵队北撤胜利的大会。晚上，胶东和烟台市党政军负责同志在行署礼堂举行宴会，招待我们团以上的干部。晚宴后举行了联欢晚会。第六师文工团演出了许多精彩节目。这些欢迎活动，再次给了我们这些来自遥远的南方，在抗日战争中远离党中央的同志们以无限的温暖和很大的教育及鼓舞。

我们在烟台市区休息的几天,各行各业的慰劳队,不断到我们各个营房慰劳。水果店送来水果,茶叶铺送来茶叶,烟厂送来自制的香烟,市医院来收治伤病员,理发师挑着剃头担子来为同志们理发。胶东军区对我们的生活关怀照顾,无微不至。他们考虑到我们这些刚到北方的广东人尚未习惯吃面食,就专门给我们调拨来大米。还特地抽调了一百二十名胶东炊事员分配到我们的机关、连队担任炊事工作,使各个伙食单位很快学会了做北方面食的技术。胶东军区又给我们发了解放区自制的草绿色军装,换去了我们从广东穿来的杂色衣服,使部队在服装上整齐划一,面目一新。

七月十三日,北撤部队移驻烟台市郊芝水区和福山县。县、区、乡政府又展开了一次慰劳活动,发动各村群众到我们宿营地慰问。我们也开展了拥政爱民活动,反复深入地进行群众观点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发动指战员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充分发挥北撤的女干部、女战士勤劳能干和善于做群众工作的特点,她们每天都把驻地的街巷和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为群众把水挑满缸,得到广大群众的称赞,从而更密切了北撤部队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关系。

慰劳北撤部队的活动进行了一个多月,以中共中央华东局(下简称华东局)和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代表团的慰问为最高峰。代表团从临沂出发,路远迢迢,来到烟台芝水区慰问我们北撤的全体指战员。代表团团长是梁国斌同志,他是闽西的老红军,华东局保卫部部长。他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宝

贵的经验,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教育。总之,整个劳军活动的过程,就是对我们深入进行生动活泼的教育过程,极大地鼓舞了北撤指战员的斗志。

北撤部队到达烟台后,还先后接到了华东局,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热河军区司令员肖克以及山东省参议会暨山东省政府发来的贺电,对我们进行慰问和勉励,更使北撤的同志倍受鼓舞,感到莫大的光荣,更加坚定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北撤的干部战士进行学习提高。以东江纵队为主的华南抗日武装的北撤任务完成了。北撤以后怎么办?在抗战八年中,由于我们一直进行频繁激烈的战斗,没有时间进行系统的学习,现在到了老解放区,干部们迫切要求学习提高,有的要求到八路军、新四军老大哥部队中去锻炼,有的要求到延安、张家口去学习或工作;也有少数人表示不愿意再在北撤部队中继续担负工作,甚至还有个别人偏激地提出,情愿到八路军去当战士,也不在北撤部队里当干部。

我自己也深感到个人的理论水平不高,工作能力有限,缺乏组织指挥运动战、阵地战的经验,也迫切希望学习提高。此外,我还考虑到更多一些问题。虽然北撤部队是以东江纵队为主,也是以东江纵队名义北撤的,但里面还有珠江纵队部分部队,和韩江、粤中、南路的部分干部。抗日战争

中,同志们分散在广东省各个地区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多年来形成的山头观念一时难于消除,我深感领导棘手。加之我当时又还不了解党中央和华东局对北撤部队将采取什么方针。因此,曾准备在向华东局汇报情况时,建议北撤部队是否不再保留东江纵队的名义,把部队交给华东局处置,我个人则到华东党校或其他学校学习,然后再由组织另行分配工作。

九月九日,我到达华东局驻地(临沂县东高都),新四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同志亲切接见了。我向他报告部队北撤的情况后,谈了上述的想法。张副军长当即指出我的想法不对头。他传达了党中央和华东局的意图,指出东江纵队的名义还要保留,部队不但不能分散,而且经过学习提高后还要组建新的战斗部队,在华东战场锻炼提高,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将来打回华南去,解放两广、解放全中国。张副军长一席话,给我指明了方向,也给北撤部队指明了方向。

我们胜利北撤的时候,也正是全面内战爆发的时候。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以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接着,敌人于七月中旬对我华中解放区发起了进攻,粟裕、谭震林同志率领我华中野战军,一个半月内,在苏中连续地打了七次胜仗,共歼敌六个旅五万余人。

在此形势下,党中央明确地确定了对北撤部队采取“保

存华南骨干,提高干部质量”的方针。华东局根据战争形势和党中央的方针,决定全面培训北撤的干部和战士,为建立一支华南主力部队打好基础。为此,九月十日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张云逸、黎玉两位首长外,还有华东局机关的彭康、杨一辰、王尧山、魏文伯、张文韬、郭子化、华诚一、胡立教、黄若萍、匡亚民、叶超等同志。

在会上,我首先汇报了北撤前华南各抗日游击纵队的情况,以及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斗争,粉碎其消灭我军的阴谋,争取胜利北撤的经过。然后我着重汇报了北撤部队人员的组成,到达烟台后的思想、生活等情况。经过讨论研究,华东局确定了五条措施并于同日电报党中央批准。这五条措施是:(一)东江纵队名义保留;(二)战斗部队编为教导团,仍由东江纵队司政机关统率;(三)地方干部、技术人员分别送入党校及侦听、卫生、通讯学校学习;(四)军队干部编成一个队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五)东江纵队教导团统归华东军政大学统一指挥教育。

十月一日,北撤部队从烟台到达临沂城以北地区,进行入学人员的分配和学习动员。同志们对党中央和华东局培训北撤部队的方针和措施热烈拥护,精神振奋,纷纷表示坚决服从分配,努力学习,提高思想,为建立一支新的战斗部队贡献自己的力量。

十月下旬,我和王作尧、杨康华、谢立全、谢斌等同志率领军政干部、妇女干部和勤务人员一千一百余人以及编入

教导团的指战员约一千人，开向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的莒县大店地区编队入学。林鏘云、罗范群、刘田夫同志率领地方干部一百七十余人进入华东党校学习。此外，还有二百余名专业技术干部，分别进入各种专业技术学校或训练班学习。干部和战士们的学习安排就绪，我也暂时松了一口气，期待着同志们学习提高后，组建战斗部队，奔赴解放战争的伟大战场，和八路军、新四军老大哥并肩战斗。

当时，华东军政大学校长是由张运逸同志兼任，副校长是余立金同志。为了便于领导，我也被华东局任命为副校长，仍保留东江纵队司令员职务。校党委分工，由我掌管北撤部队所在的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团的学习及训练。

张云逸同志非常关心北撤干部和战士的学习，他分别接见了第四大队（团营干部队）的负责人王作尧、谢立全同志；第五大队（连排干部队）的负责人谢斌、杨康华同志；教导团的负责人邬强、陈达明同志。他在接见时指出：干部学习首先要搞好整风，端正思想，然后学习毛泽东主席的军事思想。团营干部着重学好战斗指挥和司令部工作；连排干部着重学好连排战术和五大军事技术。教导团的战士，将来是扩建部队的基层骨干，要在搞好思想教育的基础上，重点搞好军事训练，着重五大军事技术的训练。

十一月中旬，开学典礼开过后，学习全面展开，干部队开始了整风学习。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是旧历新年。热闹的过节情

景,使我不禁回想起在去年过旧历年时,“双十协定”虽然已签订了好几个月,但国民党军还在加紧对我华南各游击纵队进攻,同志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艰苦的反“清剿”战斗。今年我们托八路军、新四军老大哥的福,在后方安稳地过旧历新年,心中感到无限快慰。学校开展文娱活动和团拜,并向军烈属拜年,第五大队的同志们,按照广东的习俗,组成舞狮队到校部拜年。我和余立金副校长等接见了他们,我对余副校长说:按照我们广东的规矩,是要给红包的,我们没有红包也要给奖旗。余副校长立即交代政治部赶制了一面奖旗奖给他们,同志们兴高彩烈地扛着奖旗,舞着狮子回去了。

正当我们在华东军政大学进行紧张的学习和训练期间,国民党军继续向我东北、鲁南解放区进攻。华东我军在继宿北战役之后,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上旬进行了鲁南战役,歼灭了敌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五十一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国民党反动派灭我之心不死,又集中了八个整编师的兵力,由台儿庄、郯城一线北犯临沂;同时,又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三个军由明水、周村南犯莱芜、新泰,企图迫使我华东野战军(下简称华野)主力在临沂、沂水地区决战。华野首长决心率主力从临沂地区隐蔽而神速地北进,进行莱芜战役,歼灭李仙洲集团;另以两个纵队在临沂以南佯装决战态势,迷惑和阻击南面进犯之敌,以掩护主力在北线作战。

十二月二十日，我教导团奉张运逸副军长之命开往临沂城附近警卫军部，同时继续进行班的战术训练。一月下旬，又奉命参加在战役上迷惑敌人的行动，开往临沂城东南五公里多的埠前、兰墩一线构筑野战防御工事，装作要在这里和敌人大打的架势。我教导团的干部、战士虽然都是打游击出身，但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对土工作业已有一定基础，各连均能按实战要求完成了堑壕、散兵坑、轻重机枪掩体、地堡、掩蔽部等的构筑，从而使部队的土工作业水平有了切实的提高。同时也使我们这些南方战士得到了在北方冬天严寒的气温和冰天雪地条件下进行作战的锻炼。

随着莱芜战役的展开，二月中，教导团随华东军区总部向沂水县转移。我随华东军政大学及各干部队向莒县以北招贤镇地区转移，继续进行整风学习。

东江纵队和华南其他各纵队所有北撤的团级干部和部分主要的营级干部，都集中在第四大队第三、第四中队，他们是华南抗日武装的主要骨干，也是尔后组建战斗部队的主要骨干。他们在抗日游击战争中，为党和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但是将来要领导和指挥正规部队作战，就必须通过整风学习，克服山头主义、分散主义和游击习气，增强组织纪律观念，端正阶级立场。因此，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两个队的整风学习上。我和杨康华同志相继到这两个队去作民主集中制的报告，杨康华同志着重讲文件的精神，我着重对照文件检查过去东江纵队领导上的弱点，并批评干



部中间存在的不正确思想,启发他们进行自我反省。我们还参加他们的示范反省报告,肯定优点,指出缺点,推动全队同志深入地进行自我反省。

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到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经过八个月的作战,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整个军事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方面发展。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内人民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也空前蓬勃高涨。这两条战线斗争的胜利和发展,显示着中国革命新高潮即将到来。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二月八日党中央电示,要我们选调四五十个能回农村发动群众,领导武装斗争的同志回华南去。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方方、林平同志电告,广东现无国民党正规军,只有十余个保安总队维持统治,大有利于我之发展,留在香港的干部已有一部回广东农村工作,为创造新的根据地而斗争,望我们加紧教育北撤队伍中在广东各地有群众关系、有游击战经验的干部,准备调用。二月底,莱芜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以北撤部队为基础组建两广纵队。党中央、中央军委在这个时候作出这两项决定,对于华南的斗争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一方面是为了使北撤到山东的这批经过抗日战争锻炼的华南武装骨干,在学习提高后,少数派回华南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武装斗争;主要的部分则留在华东经过补充组建战斗部队,

参加较大规模的作战锻炼,壮大发展,成为将来进行战略进攻和进军两广、进军华南的一支野战部队。另一方面是发挥东江纵队等华南抗日武装同两广人民、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密切联系,鲜明地树立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的旗帜,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两广人民、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进一步开展爱国民主活动,号召两广籍的国民党军官兵起来反对内战、退出内战,为将来解放两广,解放华南创造有利的条件。

在广东恢复武装斗争及在华东建立华南主力部队这两件大事同时摆在我们面前,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这样的斗争场面和胜利的前景:我们留在广东的同志们,重新拿起武器,带领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进行英勇的战斗;在华东战场上,我们新组建的一支战斗部队,和八路军、新四军老大哥并肩战斗,经过艰苦的,又是胜利的斗争,最后这两支部队将在广东、在华南胜利会师。我感觉到,斗争虽然很艰巨,但对斗争的胜利前景却充满信心。

三月初,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同志找我去交代任务和研究工作部署。他指出现在形势逼人,时间紧迫,首先要抓好干部、战士的学习和训练。当前要做好两件事:一是部署从山东到广东的交通线;二是派干部去南麻接收在芜莱战役中解放的国民党第四十六军的广西籍战士二千人,准备组建两广纵队。

我和王作尧、杨康华、谢立全、谢斌等同志研究后,决定

了拟输送回广东的五十一个干部的名单,和派蔡国梁等四位同志布置由山东经上海、香港到广东的交通线;并决定从第五大队抽调一批连排干部、由教导团参谋长赖祥、政治处主任陈一民率领前往南麻接收解放战士。

输送干部回广东的任务几经周折。第一批共十多个同志出发后就遇到困难,他们经上海时交通站出了问题,交通中断,即暂时停止行动。尔后回广东的同志改由经大连乘船直达香港。从一九四七年五月至一九四八年四月,实际分批回到广东工作的只有三十人。这些同志在后来发展起来的广东各部队中,大多数担任团一级的领导干部,他们为建设和发展广东的武装力量,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广东,作出了贡献。

前往南麻地区接收解放战士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只接回了不到一千人。解放战士到达沂水县教导团驻地后,张云逸同志亲临视察。教导团的领导同志汇报了教导团和解放战士的情况,他老人家亲切地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十分关心部队的生活。他还给同志们谈了一些党的历史经验和当前形势,要求教育好、带领好这批解放战士。他亲自对全体解放战士和教导团的指战员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斥责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行,分析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指出我军必胜、蒋军必败,号召新老战士团结一致,在反蒋的革命战争中,在将来解放两广,解放华南的战斗中,为人民立功。

张云逸同志早年在广西军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邓小平等同志领导了广西的百色起义，在广西人民中有很高的声望。这些广西籍的解放战士，听了他的讲话，感到十分亲切，很受教育和鼓舞。接着我们对解放战士又进行了两种政府、两种军队和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教育，从而打下了革命的思想基础。以后又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等不断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从以后在华东战场作战的实践证明，他们经受住了严酷的战斗考验，成长为两广纵队的基层骨干力量，不少人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部分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宝贵的生命。

三月中旬，第四、第五大队在整风学习结束后，改编为军事队和政治队，分别进行业务学习。同志们在了解了党中央关于组建两广纵队的决定后，学习情绪更加高涨，决心抓紧时间学好本领，奔赴新的战斗岗位。在第四大队的团营干部，刻苦钻研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和作战指导原则；第五大队的连排干部，在提高了对毛主席军事思想认识水平的基础上，掀起了学习五大军事技术的热潮。他们学习特别刻苦，许多同志冒着刺骨的北风，练投弹、练刺杀，常常是汗水湿透了衣服。有的同志练习投弹，从二三十米提高到五六十米，个别达到八十米。有的同志练习刺杀的拼刺动作，从一百余次达到连续二三千次。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例。

蒋介石在其对我解放区全面进攻被粉碎后，不甘心失

败,又改为向我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先后调集了二十四个整编师的兵力,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下旬开始,首先向鲁南解放区进攻。华野在莱芜战役后,主力集中在以淄博为中心的地区的进行休整,准备迎击由鲁南北犯之敌。

在此形势下,华东军区决定华东军政大学等单位向渤海区转移,并指示我们转移到渤海区后,即开始组建两广纵队。与此同时,华东局于三月三十一日,任命我为两广纵队司令员、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渤海军区副司令员。

四月中旬,华东军政大学各干部队到达渤海区的惠民地区,继续进行学习。五月中旬,我们在第四、第五大队学习的干部毕业分配工作。除留下四百八十余名干部,准备组建两广纵队外,根据华东局的指示,为使干部得到全面的锻炼提高,共派出了五百九十余名干部到华东军区机关、华东军政大学、各野战纵队和山东省党政机关工作和锻炼。其中主要领导干部有:原东江纵队江北指挥部指挥员周伯明派往华野第六纵队;原东江纵队江南指挥部指挥员卢伟如派往华野第三纵队;原东江纵队东进指挥部指挥员卢伟良派往渤海军区。在我们到达渤海区惠民县的同时,教导团也带领解放战士到达渤海区的利津县,后转移到沾化县富国镇地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准备组建战斗部队。教导团中的北撤战士(其中半数以上是在广东斗争时期的班级干部),经过半年的训练后,战术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培养了

拥政爱民、学习团结的作风，绝大多数可以提升为班长，老的班长可以提升为排长，这就为组建战斗部队准备了坚强的基层骨干。

## 成立两广纵队

纵队的领导成员。根据党中央成立两广纵队的战略意图，华东局和华东军区考虑到北撤部队的历史情况，慎重地选配了纵队的领导班子。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任命林锵云为纵队副政治委员，姜茂生为纵队参谋长，杨康华为纵队政治部主任，刘田夫为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六月十六日，党中央同意任命雷经天为纵队政治委员。在我们这个班子中，我和杨康华是原东江纵队的领导人，林锵云是原珠江纵队的领导人，是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老同志，刘田夫是原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的领导人；雷经天、姜茂生同志是广西人，是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邓小平、张云逸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的老干部。雷经天同志还是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宣传科长，后来担任过广西省右江苏维埃主席和陕甘宁边区最高法院院长。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挑选这些同志来组成我们纵队的领导班子，是很有代表性和很坚强的班子，他们既包括有两广籍的同志，又包括有华南各抗日纵队的领导成员，又都经历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因此，我充满信心来迎接两广纵

队的诞生和在未来的战斗中,去完成党中央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组建教导支队。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根据党中央组建两广纵队要采取自力更生原则的指示,和考虑到北撤部队除调出的干部外,留下来作为组建战斗部队的骨干只有千余人,而且我们这些干部又还缺乏进行大兵团作战和领导部队进行正规建设的经验等情况,决定先以教导团为基础扩建为教导支队(下辖三个小团),进行训练和实战锻炼,待时机和条件成熟时,再正式成立两广纵队,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战斗中发展到一万余人,成为将来进军华南的一支战略部队。

根据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指示,我们于四月底在第四、第五大队抽调干部组成一个团的架子,由郑戈、邓汀同志率领到乐陵县完整地接收了渤海军区的一个一千多人的新兵补训团(大部分是乐陵县和宁津县新参军的战士)。同时,又派出人员接收了津南作战中解放的两广籍战士一百二十人。五月中旬,组成了教导支队的直属机关和下属的三个团,其中第一团九百余人和第二团八百余人是以教导团为基础,补充华东军政大学学习的北撤干部和两广籍解放战士扩编而成;第三团一千二百余人,是以渤海军区新兵补训团为基础,配备部分北撤的排级干部和全部连以上干部组编而成。华东军区任命我兼任教导支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邬强为副司令员,陈达明为副政治委员。第一团团长彭沃、

政治委员郑少康，第二团团长江布、政治委员陈一民，第三团团长江培、政治委员谭桂明。支队机关和各团、营、连的干部都是由北撤的原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和粤中、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的干部充任。党中央和华东局为了加强两广纵队的建设，又从八路军、新四军选调了十余名团级干部到教导支队的机关和各团担任军政领导工作。

教导支队组成后，一系列问题须待我们解决。如同志们对党中央成立两广纵队的意图和任务还不甚了解；干部、战士来自五湖四海，思想、作风、生活习惯不完全一样，搞好团结是个大问题；武器装备还很不足，等等。为了统一思想认识，我们在五月下旬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通过动员报告、学习讨论，弄通思想，提高认识，然后通过他们去打通全体干部和战士的思想。在会上，已经到职的纵队几位领导同志都讲了话。我作为主要发言，着重讲了党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成立两广纵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战斗中发展成为一支万余人的战略性部队，为解放华南而斗争。而目前，应在华东战场参加战斗，为华东人民服务。将来当解放大军打过长江之日，也就是我们进军华南之时。我们要发展，首先要搞好团结，要团结新解放战士，转变他们的思想，培养他们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要团结新参军战士，从生活上关心他们，接近他们，安定他们的情绪，从政治上教育和动员他们为解放全中国的劳动人民而战斗。北撤的各江干部之间和同新四军、八路军调来的干部之间，要团结一致，共同工作



和战斗,如有不团结的现象发生,北撤干部应负主要责任。目前我们只有一个团的武器,主要要靠我们自己打胜仗缴获敌人的武器来补充。我们的任务是光荣的、伟大的,又是十分艰巨的,必须服从全局,团结合作,克服一些同志向往到新四军、八路军去或急于回广东,而不安心在两广纵队工作的思想偏向,努力完成党中央给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在我们组建教导支队期间,华野于五月中旬,在鲁中孟良崮全歼了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迫使敌人不得不暂时停止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六月下旬,敌人经过整顿后,又集中了九个整编师的兵力,向鲁中我军进攻。六月底,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由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又通称刘邓大军,简称晋野)准备南渡黄河,然后直插大别山,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华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了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和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决定以第一、第四纵队和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向鲁南和鲁西南实施外线出击,配合刘邓大军的行动;以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继续在内线抗击敌人的进攻。

我们教导支队经过九个星期整训,军政素质有了显著提高,根据华东局和华东军区“一面训练,一面战斗”的指示,第一、第二团于七月分别奉命开赴华东前线配合兄弟部队作战,进行实战锻炼。这是我们组成战斗部队之后,第一次在华东战场参加战斗,同志们情绪十分高涨。北撤的干部

和战士，在山东解放区的后方呆了一年，前方打国民党军的捷报频传，早就想在华东战场上—显身手了。解放战士在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后，也想早些在反蒋战斗中考验自己，为人民立功。

第一团首先于七月二日南渡黄河南下，与渤海军区特务第一、第二团组成一个作战单位，由渤海军区廖容标副司令员及教导支队邬强副司令员组成临时指挥部指挥作战，相继参加了南麻、临朐、诸城等战役。第二团继第一团之后，也于七月中旬南渡黄河，开往济南外围的小清河地区（章丘、邹平、高青等县）配合渤海军区部队作战。第三团因为都是新参军的翻身农民，仍继续在惠民地区进行军事训练。第一、第二团在作战行动中，虽然只是参加了一些较小的战斗，但都得到了实战的锻炼，初步掌握了在北方平原进行正规作战的方法，和行军宿营、部队管理以及后勤保障等工作经验。

两广纵队正式成立。在刘邓大军于鲁西南突破了敌人的黄河防线，并胜利地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大反攻（也就是战略进攻）的序幕，华东我军粉碎了敌人对山东重点进攻的有利时机下，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成立两广纵队。这一天，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周年的光荣纪念日。我们在渤海区滨县曹家桥，举行了两广纵队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华东军区首长的通电，表达了我

们纵队全体指战员坚决完成党中央和华东局首长所给予的一切艰巨任务,和兄弟部队一起,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一直打回到两广去,解放两广,解放华南,解放全中国的坚定决心。大会同时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宣言》,全面阐述了两广纵队成立的宗旨和根本任务,号召两广同胞和民主人士奋起进行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斗争和发动武装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两广;号召海外华侨继续进行反对卖国、反对内战的斗争,为祖国的独立自由奋斗到底;号召两广籍的国民党军官兵,毅然退出内战,或放下武器,或战场起义。

两广纵队成立之际,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山东省政府暨参议会、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冀鲁豫军区暨边区政府、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等各解放区的领导机关相继致电祝贺。这些贺电指明了两广纵队成立的重大意义,表达了各解放区党政军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给了我们以极大的勉励和鼓舞。

九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纵队党委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纵队领导同志外,还有罗范群同志。这次会议是两广纵队建军史上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明确了纵队的建设方针和任务。第一天的会议,由我汇报部队北撤后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和纵队开始组建以来的情况;由罗范群、刘田夫同志汇报北撤干部在华东党校学习的情况;由林锵云同志传达刘少奇、朱德、叶剑英等中央和军委首长的指示;雷经天同志传达张云逸、邓子恢、舒同等华东局首长

的指示。第二天的会议，集中讨论领会党中央和华东局首长对我们纵队建军方针和任务的指示精神。

党中央和华东局首长对我们纵队建军方针和任务的指示，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两广纵队要从战斗中去发展，不是坐在后方等待，不要怕牺牲，要到战斗中去锻炼提高，主要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主要依靠别人的帮助来求得发展。

（二）两广纵队应把将来南下和目前的任务结合起来，南下是逐步推进的，目前不要提南下问题，不要作南下的打算，要求干部安心工作，在华东战场的实战中去锻炼。

（三）两广纵队的任务，一是瓦解国民党军队中两广籍官兵及溶化两广籍解放战士；一是要建立一支有三个师九个小团规模的两广主力部队，成为南下解放两广、解放华南的力量之一。但解放华南，中央有整个部署，不只是两广纵队单独执行的任务。

（四）两广纵队是有战斗力的，干部有八年游击战争的经验，但正规战的经验不够，要抽调干部到主力部队去锻炼，并要把部队推到前方去，在实战中学习和积累正规战经验。两广纵队应是机动部队，应随华东野战军行动，以便锻炼提高。

（五）两广纵队应加强思想作风的建设，纠正不正确的思想，消灭山头主义，树立敢于作战，不怕牺牲的作风，在战斗中进行诉苦教育，提高阶级意识。不打仗时要做群众工

作。

我在讨论党中央和华东局首长指示的发言中，着重谈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部队的锻炼与扩大的方针。党中央指示我们要在实战中去锻炼，通过锻炼靠自己去扩大。但是我们的干部中，普遍存在着扩大与发展不是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偏向，而是依赖外援，不愿意从战斗中去扩大，怕人枪少而不敢战斗，希望野战军送枪，上级补兵，等扩大充实后再去战斗。我们虽有八年游击战争的经验，但是今天的战斗和将来解放两广的战斗，都不能沿用过去的游击战，要进一步提高到大规模的运动战、正规战、阵地战。党中央是了解我们的情况的，所以要我们到大规模的战斗中去锻炼，进行“以战教战”，不能呆在后方“三操两讲”地锻炼。现在第一、第二团还在华东战场的内线进行实战锻炼，根据华东局的指示全纵队将要开赴华东战场的外线进行实战锻炼。我们要很好认识实战锻炼与发展扩大的关系和掌握好这个方针。当前不可能在后方主要靠上级补充兵员和装备来扩大发展。没有实战锻炼就不可能有发展扩大。在实战锻炼中当然会有牺牲，有损失、消耗，但主要的将得到锻炼，得到发展扩大，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目前应以锻炼为主，从锻炼中去逐步扩大。

（二）对于时局的发展和联系到南下的时间问题。党中央指示不要过早地提出南下问题，南下不是在很短的时间

可以实施的,但又必须作好充分准备。今天我们对蒋介石是实行“杀头政策”,也就是说要彻底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因此,如何壮大我们的力量,使革命胜利的旗帜插遍全中国,取得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胜利,是我们党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进行波浪式的反攻;另一方面要在解放区加紧土改复查,巩固与扩大解放区。这是党中央的两个拳头,是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坚实力量。今天我军的反攻是波浪式、“刘伯承式”的,如果这种反攻能跳跃得快,那么我们南下的时间就会早一些。但必须估计到困难的一面,要看到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和蒋介石的拚死挣扎。胜利到来的时间,可能如党中央估计的一年至二年。因此,今天我们应抓紧时机在华东战场学习锻炼,并作好南下的准备工作。我们队伍中,急于南下是目前主要的思想偏向,这种偏向会影响我们在华东战场学习锻炼的情绪,必须迅速加以纠正。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或迟或早南下的问题,而是如何学好本领的问题。党中央的指示同时指出,解决华南问题,党中央有整个部署,不只是两广纵队单独的任务。我们有的同志如果有这种认识是不对的。要看到我们两广纵队,目前只是由华南北撤的骨干和新参军及解放战士组成的一个不足数的纵队,还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纵队那样的斗争经验和战斗力,就是将来成为一个足数的纵队,也不可能只靠两广纵队单独解决华南问题。因此,解放华南,两广纵队只能负有一部分的任务。目前,我

们必须服从整体的需要，坚决地积极地在华东战场参加作战。

(三)关于思想建设问题。我们过去在广东时，只重视组织领导，而对思想领导重视不够。到烟台后，思想领导在我个人来说，确是一件新鲜事物。当时我个人是想去学习，对于北撤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问题，想等待上级来解决，故放松了思想领导。纵队组建以来，我个人虽然有了些进步，但还存在很多弱点，如没有从主要干部着手进行思想工作，和对一些思想倾向看得不深刻，等等。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注意和认真改进。

会后，纵队政治部对党员干部传达和组织学习了纵队党委的决议，澄清了干部中对两广纵队建设方针与任务的模糊认识，为扎扎实实在华东战场锻炼提高，打下了巩固的思想基础。

进军鲁西南和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十月十三日，中央军委电令我们纵队开往黄河以南，在冀鲁豫地区(即鲁西南地区)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和参加新区工作。经过三四个月锻炼后，视情况开过陇海路至淮西地区接受华野外线兵团第一纵队(叶飞纵队)指挥，并将随第一纵队南渡长江。

我理解中央军委指示，是要我们纵队在鲁西南前线经过短期的锻炼之后，即和第一纵队一起，逐步向南作波浪式的推进，最后打回华南去，把战争进一步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以加速蒋家王朝的崩溃。

在这期间，华东局通知我们，令林鏘云、杨康华同志到中央汇报工作，罗范群同志调到渤海军区政治部，王作尧同志调到华野第十纵队，谢立全、谢斌同志调到华野第六纵队和第三纵队。同时要我们派人到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接收兵员和武器。纵队领导同志研究后，决定由雷经天、姜茂生同志率领部队开赴鲁西南，由我率领接收人员前往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

部队经过一个月的准备，补充了冬季装备之后，十一月六日在滨县龙王庙举行了反攻誓师大会，雷经天政治委员宣读了誓词，我作了动员讲话，号召指战员们在伟大的反蒋自卫战争中，在我军举行大反攻的作战中，在华东和中原战场上为人民杀敌立功。同志们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十一月十日，纵队部率第二、第三团（第一团在东线作战尚未归建）和教导总队，由滨县曹家桥一带驻地出发，经惠民、商河、临邑、平原越津浦路，再经高唐、博平、聊城、阳谷，十二月五日在寿张之孙口南渡黄河。然后经郓城县之肖皮口、红船口、贾敬屯，荷泽县之沙土集、马楼，定陶县之王店，十二月三日到达曹县西北之魏湾一带，结束长途行军，进入了鲁西南前线。

从我们纵队正式成立前后到开赴鲁西南这段时间，华野为配合大别山区的晋野主力和已进到豫陕鄂地区的晋野太岳兵团作战，尽快开辟中原战场，华野司令部率领外线兵团的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纵队越过陇海路南下豫皖



苏地区，留下第十纵队和晋野第十一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旅组成北线兵团，在鲁西南地区牵制敌人，并保障晋野主力和华野外线兵团的后方交通补给线，同时相机进行小规模歼灭战。我们纵队进入鲁西南地区后，即归属北线兵团指挥。

部队向鲁西南开拔后，传来了晋察冀野战军解放石家庄的捷报。石家庄的解放，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在这个大好形势下，我们纵队由第二团抽调出来去晋察冀军区接兵接枪的干部出发了。我和第二团政治委员陈一民等同志乘汽车前往。我们先到河北省的河间，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和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司令员及罗瑞卿政治委员。朱总司令向我详细询问了两广纵队的情况，鼓励我们扎扎实实地在战斗中锻炼提高。他强调要十分注意搞好各方面的团结。他老人家还亲自批给了一门山西产的一三式山炮，并语重心长地说：“这门炮你们带回去，要好好学习使用，为建立两广纵队炮兵团打好基础”。杨得志司令员亲自安排拨给我们一个营的两广籍解放战士和步枪、轻重机枪等武器七百多件。随后，我到了当时中央工委所在地的河北省阜平县西柏坡，见到了刘少奇同志。他再次强调说，你们主要依靠自己从斗争中去发展扩大，在华东战场上学好本领，准备按党中央的部署打回两广去，打回华南去。他还针对我有过的思想问题，严肃地对我说：“党叫你当两广纵队司令，你就要尽最大努力把两广纵队建设好，如果党需要叫

你走，你就愉快地服从。”这是少奇同志对我进行党性、组织纪律性的教育。这个教育非常重要，在我的脑子里刻下了很深的印记。我回到部队后，把少奇同志指示的精神认真贯彻到整个部队的作风上去，因而我们纵队在华东战场和以后南下广东时，纪律都是很好的，没有出过大问题。最后，我到了晋冀鲁豫军区，见到了当时负责该军区工作的徐向前副司令员和薄一波副政治委员。徐向前副司令员在大革命时曾在广东战斗过。他们都很关心两广纵队的成长，从他们所属的冀南军区调拨了一个新兵团补充给我们。至此，我华北之行的任务顺利完成了。中央首长的亲切关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军区首长的热心支持，鞭策和勉励着我们努力做好工作，积极投入实战锻炼，为把两广纵队建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华南主力部队而不懈努力。

在我离开纵队期间，部队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旬，在考（城）荷（泽）公路上的毕寨打了一个小仗。一月十日，转移到成武县西北青固地区休整。这时，第一团从东线返回归还建制。部队会合后，开始进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和诉苦教育的新式整军运动。纵队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帮助纵队几个领导同志进行“三查”。当时我不在纵队，暂时缺了这一课。在休整期间，第三团由于非战斗减员严重，整编为特务营。主要原因是这批新参军的战士接受政治思想教育不深，乡土观念很重，害怕到南方地区作战，部队南下过黄河途中，

大批逃跑回家；其次是我们南方干部带北方兵，经验不足，巩固工作没有做好。

二月中旬，敌人为了切断晋野和华野外线兵团的交通补给线，以其整编第五师（即原来的第五军）为主，另以整编第六十八、第七〇、第八十四师等部相配合，大举向鲁西南我解放区进犯。我们纵队奉命配合晋野第十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华野第十纵队这时已西调平汉线，北线兵团由晋野第十一纵队统一指挥），在鲁西南进行宽大正面的运动防御，吸引敌人的部分兵力，掩护主力在南面作战。这时，我和林鏊云、杨康华等同志从华北返回纵队，正好赶上和指战员们一起参加抗击敌军主力的作战行动。为执行这一任务，我们纵队从二月十四日开始，到三月底北渡黄河止，几乎转战了整个鲁西南地区。有时构筑阵地阻击敌人，有时向敌人出击，歼其小部。我们纵队同志们的足迹遍及成武、定陶、鄄城、菏泽、金乡、巨野、郓城、东平、肥城、长清、平阴等十几个县。

我过去没有组织指挥运动防御的经验，通过这次实战，在参谋长姜茂生同志的帮助下，自己也得到提高，初步懂得了如何组织与指挥运动防御作战。部队通过这次实战锻炼，也树立了与国民党军主力作战的信心。

第五军是国民党自称的五大主力之一，全军有精良的美械装备，气焰十分嚣张。而我们两广纵队，虽然班以上干部都是经过抗日战争的严峻考验，但是它毕竟是一支以翻

身农民和解放战士为基础组成的新部队，没有经过大兵团作战的战斗考验，武器装备不但质量差而且有的连队还没有配齐，以这样的力量对付优势装备的敌人主力，开始时，干部战士都没有足够的信心。但是，经过一两个回合的交锋，打出信心来了。首先，第二团在太康县逊母口，以一个营的兵力抗击其第四十五旅(师)一个附有山炮的加强营的进攻，不但将其击溃并歼其一个连。接着，第一团在定陶以北，两次进击其第九十六旅(师)，也取得歼其两个排的战果。这样，敌人吹嘘的第五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不用说华野、晋野老大哥了，就是我们纵队胜利的战斗也把它打破了。

三月，中央军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以华野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和我们纵队，编成一个兵团，由华野粟裕副司令员率领，准备挺进江南，执行宽大的机动作战任务，开辟闽东南和浙、赣等省，继刘邓大军之后，进一步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我在得知这个决定后，心中盘算着，如果我们纵队随这个兵团一旦进到闽、浙、赣地区，那么打回广东去的日子就不会很长了，这是很令人高兴的事。但是，思想上又有一些矛盾，因为考虑到我们纵队目前还是一个不足数的纵队，战斗力还没有很大的提高，离开作为一个主力纵队的要求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因而又希望这个日子不要来得太快，以免准备不及。为执行中央军委这一任务，华野命令我们纵队继续在鲁西南抗击敌人，掩护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先行北渡黄河休整。

三月上旬,为了相机歼敌小部,我们纵队从巨野以北向南挺进,直插金乡以西,第一团于金乡城西郊歼敌整编第七〇师一部。敌人发现我们的行动后,从南面、西面、西北面、东面、东南面向我压过来,企图夹击我们纵队于巨野以南、金乡以西地区,我们以第一、第二团轮番抗击从南面进攻的敌第五军,迅速向北脱出敌人的夹击圈。三月十四日,全纵队到达郓城县的穆官屯一带。

我们住地距离两公里的梁山,因《水浒传》的传播而家喻户晓。我抽空和一些同志去观看了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但当时看到的梁山,除了还有宋江寨的遗迹外,只不过是一个约有二百米标高的光秃孤山了。据说古时“水泊梁山”是和东平湖连在一起的,由于地形的变化,东平湖缩小了,因而现在的梁山和东平湖已约有十五公里的距离,水泊没有了,山也变成了孤山了。凭眼前荒凉的景象,对《水浒传》中描述的梁山泊英雄好汉们劫富济贫,东打西杀,威武雄壮的斗争场面,已很难想像了,但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敢于造反,勇于斗争的精神,却是永远令人钦佩的。

三月下旬,由于敌人优势兵力步步紧逼,我们纵队向肥城、长清、平阴方向行动,相机打敌小据点,于三月二十三日到达平阴县城西北地区待命。三月二十八日,由于掩护任务已经完成,奉华野命令于石庄北渡黄河,至东阿县(桐城)以东和东南以任集为中心的的地区进行休整。

我们纵队在任集地区休整了两个月,继续进行“三查”

和诉苦教育的新式整军运动，并加强军事训练。对于“三查”，总的是按上级指示进行的，但也有个别同志企图在我们纵队搬用当时一度出现的“贫雇农当家”的口号。我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意味着要把北撤的大批骨干赴下台。我很清楚北撤的营以上干部，很大部分是非贫雇农出身的，但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经过艰苦环境和残酷战斗的考验，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是很有工作能力和作战经验的好干部。如果执行“贫雇农当家”的口号，两广纵队大部分的营以上干部都得下台，这就不仅伤害了这些干部本人，同时也伤害了两广纵队，伤害了党的事业。幸好在这个口号还来不及在我们纵队推行时，华野前委就及时制了这个口号的执行，从而保证了我们纵队“三查”的健康发展。对于军事训练，考虑到今后作战行动中阵地战、攻坚战的作战样式将不断增多，特别是我们纵队更是缺少这方面的作战经验和训练，因而纵队党委决定在进行新式整军运动的同时，以百分之五十的时间进行军事训练。三月三十一日，纵队司令部召开了各团干部会议，研究和部署了军事训练的内容，决定在总结前段实战锻炼经验的基础上重点进行连的攻坚战斗和阵地防御战斗的训练。我在会上着重讲了这次训练对于我们部队由游击战、运动战过渡到阵地战、攻坚战的重要性，要求各团抓紧在规定的时间内切实完成训练计划。在训练中，我和姜茂生参谋长到各团去检查他们的训练情况，观看他们进行实弹射击和夜间演习。指战员们的情

绪很好，动作都很认真。

四月十六日，我们纵队团以上干部到濮阳县田庄华野领导机关驻地，参加华野召开的干部会议，听取了华野各位首长的报告。从十七日至二十日，我白天听报告，晚上听取在党校学习的干部给纵队党委提意见。天天如此，受到很大教育，但也感到很疲劳。

华东军区兼华东野战军陈毅司令员十分关心两广纵队的成长，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对我们纵队的几个领导干部进行个别教育。他在个别谈话中深入了解纵队的情况，特别纵队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批评我们存在的缺点、错误，指出了努力方向。他还接见了我们纵队参加会议的全体团以上干部，作了极其重要的长篇讲话。他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两广纵队的工作方针；二是加强组织修养。他说：“两广纵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广纵队”，“有为全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责任”。“要强调全国性、统一性”，“反对地方观念、部落观念、山头观念、分江分派”。“两广纵队是对两广人民的号召，将来一定要起更大的、解放两广的作用，但只靠你们两广纵队是不够的，要靠全国解放军的帮助和配合，还要靠两广五千万人民的作用”。“今天两广的形势正在发展，你们不要只等着回去做老大哥，摆老资格，要和留在两广的同志进行比赛”，“你们要好好提高，在提高中去扩大，在战斗中去扩大”，“要争取变成一个主力纵队的地位”，“纪律你们是最好的，你们应向前努力。”陈毅司令员的讲话有批评、有

教育、有鼓励,对我们是极大的鞭策和鼓舞。

我们回到任集后,从五月六日至二十二日,共用了十七天的时间,召开了有营以上干部参加的纵队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陈毅司令员的讲话,并由纵队几个领导同志联系实际进行检查。我在纵队领导同志“三查”时缺了课,正好利用这次学习的机会补上这一课。我在检查中谈了个人家庭出身,历史情况和领导作风;联系陈毅司令员的讲话精神,着重检查了对建军方针的贯彻、团结统一和人生观及世界观上存在的问题。我检查后,与会同志给我提了不少宝贵意见,认为我的检查联系自己还不够,检讨还不够深入。随后,我又再次作了自我批评。这样全面的检查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教育非常深刻。会议结束后,五月二十五日即接到华野准备战斗行动的电令。



## 第十五章

# 转战华东战场

### 参加豫东战役

豫东战役是华野外线兵团于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在豫东广大地区进行的一场大硬仗、恶仗，是我们纵队首次参加的大兵团作战和首次经受的重大考验。

华野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以及我们纵队，在结束新式整军运动，并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后，根据中央军委暂不向长江以南作战略机动，而加入中原作战的决定，华野首长一声令下，各纵队从五月二十九日开始，在百余华里的正面上，浩浩荡荡横渡黄河，挥师南下，发起了豫东战役。

我们纵队于二十九日于魏山渡过黄河。经过新式整军运动，指战员们的思想水平和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个个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地奔赴鲁西南战场，从此参加豫东战

役的一系列战斗。先是再次经过梁山，直插巨野至金乡县。六月十日至十一日，在金乡以西参加阻击敌邱清泉兵团。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在杞县以东蓼堤岭等地，参加阻击敌区寿年兵团。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负责守备杞县城，参加阻击和牵制敌邱清泉兵团。七月二日至四日，在睢县以东尤旗屯、曹营等地参加阻击和合围敌黄百韬兵团。豫东战役结束后，紧接着又于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参加津浦路徐(州)宿(县)段破击战。

金乡和杞东阻击战。金乡阻击战，是华野遵照朱总司令“放长线钓大鱼”的指示，拟于鲁西南歼灭敌第五军(当时由整编第五师和第七〇师合编为整编第五军，后来又加入整编第七十五师编为邱清泉兵团)的部署。我们纵队奉命协同中原野战军(一九四八年五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为中原野战军，以下简称中野)第十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旅，于定陶至金乡一线进行运动防御，拟诱敌至巨野县以南歼灭之。六月九日，我们纵队于金乡以西以田集为中心，部署了二十公里的宽大正面与纵深的阻击阵地。十日 and 十一日，以边打边退的战术，抗击了敌第二〇〇旅和第九十六旅的进攻。这是我们纵队与第五军第二次交锋。敌在经过两天的进攻后，察觉了华野的动向，害怕被围歼，在大义集以南停止了进攻，靠拢兵力转采守势，企图等待其正在向鲁西南急进的五个整编师到达后，与我决战。大鱼没有钓上，为了避敌之长击敌之短，以创造歼敌战机，华野首长果断放弃在鲁

西南诱歼敌第五军的部署，改令进至杞县地区的华野第三、第八纵队就近攻占开封。我们纵队奉命掩护华野特种兵纵队从荷泽与东明之间南下，于兰封至民权间越过陇海路，二十日到达陈留以南之辛口待命。

六月二十二日，华野第三、第八纵队攻克开封，全歼守敌。我军的这个打击，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为了挽救败局，蒋介石慌忙命令邱清泉兵团（这时已取消整编第五军番号，辖整编第五师、第七〇师，另调出整编第七十五师，调进整编第八十三师）向开封攻击前进；同时又令新组成的区寿年兵团（辖整编第七十二师、第七十五师及新编第二十一旅）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企图在开封地区与我决战。华野首长抓住战机，决心先歼灭敌区寿年兵团于杞县以东地区。二十三日，我们纵队奉命在第一纵队指挥下向尹店集地区攻击前进，协同第四、第六纵队，对敌区寿年兵团实行战场分割。纵队党委决定，号召全体指战员紧急动员起来，竭尽全力打好这一仗，为歼灭敌区寿年兵团作出贡献。各团边运动边准备，向尹店集开进，当晚进至龙塘岗时敌已占尹店集。二十四日，我们纵队又奉命于白云寺、蓼堤岭等地进行运动防御，吸引敌整编第七十五师于阵地前，为兄弟纵队合围敌整编第七十二师创造条件。二十五日，敌整编第七十五师向我们纵队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我第一团在蓼堤岭的阵地首当其冲，该团指战员沉着应战，英勇地实施了阵前反击，粉碎了敌人多次冲锋，完成了阻击任务。二十六日，我们

纵队转移到裴村店一线继续抗击敌人。这一天，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继续向西南进犯，但在与我前哨阵地稍事接触后，即踌躇不前。华野首长抓住敌区寿年兵团因摸不清我军行动企图而犹豫徘徊的有利战机，着令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及中野第十一纵队从四面八方发起了猛烈进攻，将其分割包围于龙王店、铁佛寺等地，使敌人成了瓮中之鳖。

杞县守备战。杞县守备战，是我们纵队在豫东战役中所担负的一次最重要的，也是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正当我们在杞东阻击敌区寿年兵团整编第七十五师的时候，敌邱清泉兵团尾击我撤出开封的第三、第八纵队，进抵陈留地区后直扑杞县，企图与区寿年兵团配合，从东西两面夹击我军。二十七日凌晨，我们纵队紧急奉命守备杞县城，协同在杞县城西南褚皮岗至王堙集一线进行防御的第三、第八纵队，坚决堵住由西向东进攻的敌邱清泉兵团，以保障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围歼敌区寿年兵团。情况紧急，不容犹豫。我和雷经天、姜茂生同志迅速交换意见后，即令第二团跑步进入杞县县城。

杞县相传是明朝末年李信和红娘子造反起义的地方，城区面积约一平方公里，距城墙外围约一公里有护城大堤，堤内外有村庄，青纱帐连成一片。第二团进入杞县县城后，即在东、西、北护城大堤上紧张地修筑工事，并以堤外村庄为支撑点，构成第一道防线。刚部署完毕，十一时，敌整编第八十三师已进抵城西郊和北郊，对我第二团的阵地发起猛

烈的、连续的进攻，并以一部分兵力向城东迂回，企图从行进间一举攻下杞县县城。第二团的同志们奋起抗击，和敌人反复争夺护城堤外的村庄，粉碎了敌人多次冲锋。迂回城东郊的敌人也被我第一团击退。战斗一直持续至二十三时，敌人花了很大的代价，才占领了护城堤外的村庄。

为增强防御，华野命令我们纵队全力守备杞县县城，并增调第四纵队第十二师归我们纵队指挥，而我们纵队则归第四纵队统一指挥。我考虑，为了便于指挥，决定由姜茂生参谋长率领司令部部分人员在城内南大街开设前进指挥所，直接指挥城防各单位，我和雷经天政治委员坐镇城南郊马心庄的纵队基本指挥所。二十时许，我们纵队几个领导同志碰头研究了情况和部署，判断敌人明晨将会以护城堤外的村庄为依托，攻击我护城堤的阵地。护城堤阵地一旦被敌人突破，杞县县城将直接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对我甚为不利。为了改善防御态势，争取主动，我们决定在二十八日拂晓前向敌人实施反击，夺回护城堤外的村庄。第二团根据纵队的命令，全面进行反击，该团主要领导干部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迅速夺回了北大堤以外的所有村庄，并歼敌第四十四旅突击大队的一个连。第一团于西大堤外，逐村攻击前进，经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攻占距西门二公里的彭庄，也歼敌一部。该团第一营第三连副连长郑龙同志，率领突击排多次打退敌人的反扑，冲垮了敌人的前沿阵地，但他不幸中弹牺牲。

反击胜利后，我们调整了部署：以第一团守城西，第二团守城北，第十二师教导队守城东，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守城西南郊，与第三纵队衔接，特务营为纵队预备队。由于反击的胜利，士气更加高涨，指战员们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准备痛击再来进攻的敌人。

十二时，敌人得到增援并调整部署后，其整编第八十三师（辖第四十四、第六十三旅）倾巢出动，在整编第七〇师第九十六旅的协同，和飞机大炮猛烈火力的支援下，从北面和西面向我第一、第二团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刹时，城北和城西传来了轰轰隆隆的炸弹和炮弹爆炸声。敌人的主要攻击方向是指向第二团防守的刘庄、范庄（在通向北门的北大堤外）和第一团防守的彭庄、竹园（在通向西门的西大堤外）。此时，兄弟纵队正在向被我分割包围的敌区寿年兵团发起猛攻。蒋介石坐着飞机在战场上空指挥，严令敌邱清泉兵团火速前进，以解区寿年兵团之围。因而敌人拼死向我进迫，与我第一、第二团在北大堤、西大堤外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城北第二团方向战斗尤为激烈，敌人数次冲上北大堤，并占领了该团第二营的重机枪掩体顶部。在那里担任防守的第五连的同志们进行了顽强的抗击，该连第二排排长张清同志，率领战士们跳上掩体顶部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下了大堤。但是我们的英雄排长在第三次反击时，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战斗一直持续到十五时，第二团的北大堤阵

地岿然不动。这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该团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第二营三个营的干部都负了伤，而敌人则在大堤前陈尸数百具。城西第一团方向，敌占彭庄后，向城西南进击，我们当即命令特务营增援，协同第一团多次击退敌人的冲锋。特务营第二连副连长李官运同志不幸牺牲。

敌人攻不下北大堤，急得团团转。但是敌人也是很狡猾的，他们以部分兵力继续进攻北大堤，同时以一个团的兵力迂回城东第十二师教导队的阵地，突破了东大堤，于十五时三十分从东门攻进城内，然后再向北门迂回。我第二团遭到敌人南北夹击，背腹受敌，情况十分危急。当时我们纵队手上已没有预备队，特务营已在十三时增援城西第一团方向，第十二师的后续团虽已到达南郊，但该团连日来参加围歼敌区寿年兵团的战斗，部队伤亡很大而且极度疲劳，必须稍事休整后才能使用。而情况的发展已不容我们再等待。我与雷经天政治委员简要地商议后，即下令第二团撤出北大堤阵地向城西第一团方向靠拢。结果虽然第二团避免了重大损失，但部分勤杂人员和辎重来不及撤出而为敌俘获。十七时三十分，经向上级请求批准我们全纵队撤出城防转至南郊继续组织防御。是夜，又奉命南移荆岗一带待命。二十九日，由平汉路赶回的华野第十纵队在杞县以东田程寨至唐陵岗一线组织防御，协同第三、第八纵队继续堵击敌邱清泉兵团。

我们纵队守备杞县县城，参加抗击敌邱清泉兵团的进

攻,虽然为围歼敌区寿年兵团的华野主力部队争得了两天的宝贵时间,但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坚守到全歼敌区寿年兵团。战斗中,我第一团、第二团和特务营打得都不错,尤其是第二团,连续两天胜利地抗击了敌人优势兵力、火力的进攻,并在反击中歼敌一部。如果东门不失守,他们还可以继续坚守在北大堤上。杞县县城的失守,虽然主要是守备东门部队责任,但是我作为城防统一指挥的指挥员,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我对第十二师教导队的战斗力了解不够,赋予了他们力不胜任的任务;其次,使用纵队预备队的时机过早,和对第十二师后续团的情况事先估计不足,因而造成在关键时刻无机动兵力可调。

睢东阻击战和合围战。蒋介石为了挽救区寿年兵团,除严令邱清泉兵团继续东进外,又调来了黄百韬兵团(辖整编第二十五师、第三快速纵队、第二交警总队)经商丘西进。我们纵队又奉命急驰睢县以东帝丘店地区,参加对敌黄百韬兵团的阻击。七月二日,到达尤旗屯、柴寨一线,指挥华野司令部(下称野司)警卫团,协同在柴寨以北的中野第十一纵队,阻击敌黄百韬兵团,以保障围歼敌区寿年兵团残部的战斗。敌整编第二十五师,在坦克、飞机和大炮的支援下,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企图一举突破我阵地,以解被困于铁佛寺(相距只有十五公里)的敌整编第七十二师之围。防守柴寨的野司警卫团首当其冲,该团英勇顽强地多次粉碎了敌人陆空和步坦炮的协同进攻,并击毁敌坦克两辆。纵队指挥所



所在地的尤旗屯，遭到敌机轰炸，受了一些损失。特务营政治委员陈志强被埋在土中，挖出后进行抢救，由于没有经验和缺乏急救技术，终于未能把他救活。陈志强同志是红军老战士，曾任东江纵队第三支队政治委员等职。他是我们纵队在华东战场上第一个牺牲的团级干部，大家很痛心。

二日晨，敌区寿年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大部及新编第二十一旅被我歼灭。华野首长决定，除留下一部兵力继续围歼敌整编第七十二师残部外，转移主要兵力攻歼敌黄百韬兵团。二日晚，我们纵队奉命将阵地交给第一纵队，从右翼向敌人纵深的曹营攻击前进。三日晨与从左翼前进的第四纵队会合，完成了参加合围敌黄百韬兵团的作战任务。接着向西参加压缩战，实行昼间强攻。经过缴战，第一团和野司警卫团各攻占了几个村庄，并歼敌一部。第一团第一营副营长黄和同志在战斗中牺牲。这样，我们和其他方向的兄弟纵队一起，把敌黄百韬兵团压缩包围在以帝丘店为中心的南北约五公里、东西约四公里的圈子内。正当围歼敌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在全面展开之际（已歼其三个团），敌大量援兵从东、西、南向战场接近。为了保持主动，华野首长果断决定迅速撤出战斗。豫东战役到此胜利结束。

津浦路破击战。豫东战役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纵队的作战任务还没有结束。五日至六日，我们奉命统一指挥野司警卫团和骑兵团在宁陵县以东阻击西援之敌整编第七十四师。七日至八日，又奉命南开太康、西华一带掩护伤员南运。

开进途中,九日又奉命尾击敌邱清泉兵团,以牵制其对豫东战役后向北转移的华野主力部队的尾追。十二日,复又奉命东开,协同豫皖苏军区破击津浦路徐(州)宿(县)段,以配合华野山东兵团(即原内线兵团)的作战行动。

我们纵队从五月二十九日南渡黄河至七月十二日止,经四十五天的不断转移,连续作战,加上酷暑、淫雨天气,同时供应又十分困难,指战员们处于极度的疲劳状态,而今又要强行军四百多华里奔袭津浦路,问题很多,我们从关怀指战员的身体出发,曾向华野首长建议让部队休息几天。华野首长从全局需要出发,未批准我们的请求。我们当然要坚决服从命令。纵队党委开会研究了部队当前的情况,决定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纵队政治部派出干部和文工团员协同各团政治处,下到连队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动员指战员们“咬紧牙根,坚持下去”,坚决完成华野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十三日,我到了第一团,参加他们排以上的干部会。我在讲话中,号召干部、党员们,在这困难的时刻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动员和带领战士们,胜利到达津浦路,完成作战任务。实施长途奔袭,后勤保障是重要的一环,我们决定由参谋处长邬强统一领导供给处和卫生处的工作(那时纵队还没有统一的后勤部),严密组织好沿途的供应和收容工作。在完成了动员组织工作后,十四日,部队由睢县的张井出发,日夜兼程,日走五十,夜赶七十,经过四天的强行军,有时还是冒大雨行军,于十九日晨到达津浦

路徐州至曹村段，第一、第二团和野司警卫团，当即分别对曹村车站、孤山集、桃山车站实施攻击。由于敌人闻风先逃，因而没有俘获。接着在人民群众支援下，把铁轨来了个大翻身，并炸毁附近桥梁，吸引了徐州一部敌人南来，于是我们又在铁路以西的马路山、秤砣山一线，与敌整编第六十六师进行了两天的战斗，牵制了敌人，完成了配合华野山东兵团作战的任务。

我们纵队自五月二十九日南渡黄河到破击战结束，历时五十六天，共转移五十二次，行程一千三百余公里，足迹遍及苏鲁豫皖的二十二个县，连续参加了对敌人在战场上出现的三个兵团的作战，作战对象包括敌邱清泉兵团的整编第五、第七〇、第八十三师；敌区寿年兵团的整编第七十五师；敌黄百韬兵团的整编第二十五师、交警第二总队以及整编第六十六、第七十四师，部队在战役中日夜兼程，辗转苦战，十分疲劳，而且伤亡不断增大（共牺牲六十三人，其中排以上干部十一人；负伤二百零三人，其中营级干部三人、连级干部八人、排级干部十三人），但是部队自始至终，情绪高涨，斗志旺盛，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怕牺牲，顽强奋战，胜利完成了上级赋予我们纵队的各项战斗任务。

## 参加济南战役

济南战役是华野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

日，在山东境内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

华野山东兵团于一九四八年春夏间胜利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役，解放了东至青岛，南至临城的广大地区，使济南敌人完全陷于孤立，成为残存于山东腹地的一个孤立据点。同时造成了华野内外线兵团可以集中作战的有利态势。华野为了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在一九四八年八九月间，集中全力攻克济南，尔后南下，进一步打开中原战局，夺取徐州的指示，决定于九月十六日发起济南战役。

八月二十日，我们纵队的几个领导同志，在曲阜参加了华野召开的作战会议。在会上，华野首长部署了济南战役，决定以七个纵队组成攻城集团，其中以第三、第十纵队、鲁中南纵队组成攻城西集团；以第九纵队、渤海纵队组成攻城东集团；以第十三纵队为预备队；以两广纵队和渤海军区部队担任扫清济南外围之敌的任务。另以八个纵队组成阻援和打援集团。赋予两广纵队的具体任务是：在攻城西集团宋时轮司令员的指挥下，独立担负攻击长清县城。华野首长考虑到我们纵队兵力、火力不足，把第十纵队特务团和野司警卫团、野政警卫营都拨归我们统一指挥，并配属了特种兵纵队的一个野炮连。

长清县城是济南守敌的一个外围据点，位于济南西南约二十五公里，城墙坚固，四周有护城河，水深不能徒涉，敌人在城墙上筑有碉堡等防御设施。守备该城的敌军，有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特务旅的一部和周围几个县的反动地方武

装,共约二千人。

攻坚战,我们在广东打游击时也打过,但是那时只是攻击敌人设在村镇中的炮楼,规模很小,象这次集中五个团的兵力,在炮兵协同下攻击一个有较坚固设防的县城,我们还是没有经验的,因此这次作战对我们纵队又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和考验。华野首长分配给我们这个作战任务,目的也正是为了使我们得到较全面的锻炼,取得多方面的作战经验。

我们在曲阜参加会议期间,我们纵队已由河南省柘城县向北转移,九月九日到达山东省汶上县南站地区集结待命。会议结束后,我们即回到部队,向指战员传达了我们纵队受领的作战任务。华野政治部主任唐亮同志亲自到我们纵队来作政治动员。指战员们群情激昂,各连、各营纷纷要求赋予担任突击的任务,表示要坚决打下长清县城,为攻城西集团扫清前进道路。同志们还认为在豫东战役中,我们纵队主要是打阻击战,俘获甚少,部队伤亡消耗得不到补充,这次攻击长清县城,要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俘获敌人的人员武器充实部队。

九月十二日,纵队下达了作战命令,随即由汶上县向长清县开进。十五日晚,各团进抵长清县城以南约十公里的小屯地区,进入了进攻出发地域。十六日晨四时,各团进入各自的攻击出发位置,完成了对长清县城敌人的包围。四时三十分发起对城外敌人的攻击,至十四时敌人的外围阵地和城关全部为我攻克,各团从四面逼近城墙根,开始了攻城的

战斗准备。各团、营、连的指挥员，根据长清的敌情、地形和任务，把从老大哥纵队学来的攻坚战术、技术，同我们过去打游击时攻击敌炮楼的经验结合起来，组织部队进行了细致的战斗准备工作。

九月十七日下午，纵队召集各团团长、政治委员汇报准备情况，并确定了炮火准备和总攻击开始的时间。十七时三十分，各团集结部队进入攻击出发位置，我和雷经天政治委员、姜茂生参谋长进入了位于王庄的纵队指挥所。十八时，在纵队统一号令下，第一团于北门、第二团于西门、野司警卫团和野政警卫营于南门、第十纵队特务团于东门，同时向长清县城发起了总攻。顷刻间，野炮、山炮、迫击炮、六〇炮的炮弹向四个城门的敌人倾泻下去，压得敌人抬不起头来。不久，各团的捷报相继传到指挥所。在第二团的方向，配属的特种兵纵队野炮连和团属迫击炮连，猛烈轰击西门楼及其两侧的碉堡，迅速将其摧毁后，即向敌纵深延伸射击。担任突击任务的第一连的爆破组，在炮火和营连火力掩护下，迅速接近西门成功地进行了连续爆破，把西门炸塌，突击部队紧接着冲进西门，一阵猛烈的步机枪火力向溃退的敌人射击，部队跟着沿西大街直插城中心。在野司警卫团的方向上，纵队炮兵队的山炮（朱德总司令送给的一三式山炮），进入南关民房内，在距目标九十七米的距离上，进行抵近射击，准确地摧毁了南门楼及左右三个碉堡，打塌了南门，突击部队利用炮击的效果，在团的各级火力掩护下，也迅速突

入城内。在其他方向上,第一团和第十纵队特务团,靠自己的火力支援和成功的爆破,也相继突破北门和东门,攻入城内。

敌人在我各团的猛烈攻击下,无法招架,节节后退。我各团的突击部队很快就在城中心会合,余敌龟缩到城西北角天主教堂顽抗。我和姜茂生参谋长从南门进入城内,就地区分各团的任务。各团抓紧准备后,炮兵再次进行射击,各团又展开了猛攻,一部分敌人越过城墙企图突围,但都被淹死在西北角的护城河中。十九时三十分守敌全部被歼,战斗胜利结束。

对长清县城的攻坚战,由于我们准备充分,也由于敌人在我大军压境下斗志涣散,从发起总攻开始,仅用了九十分钟即攻进城内,全歼守敌。原来规定我们于九月二十日完成的任务,结果提前了三天半就胜利结束。同时,由于我们在战前反复进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党的城市政策的教育,部队攻下长清县城后,做到了秋毫无犯。但是在处理缴获上出了点问题,有的营干部未经批准,私自换了一些骡马。为了进一步加强部队的纪律建设,我除了进行当面的批评外,在十九日纵队召开的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上,又点名批评了这种错误的做法,要求干部们接受教训,从一点一滴来加强部队的纪律性。

打下长清城,我们纵队的基本任务胜利完成了,全纵队指战员欢欣鼓舞。在豫东战役中,我们进行了金乡、杞东的

运动防御战，杞县县城的阵地防御战和睢东的阵地进攻战，而今又胜利地实施了城市攻坚战，这使我们纵队在向坚强的野战军发展的进程中又迈进了一步。

长清县城的枪炮声停止了，但在长清的东北方向，炮声隆隆，攻城集团正在加紧对济南城攻击。攻城西集团于九月十八日攻占古城、仁里等地后，敌整编第九十六军吴化文部，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于十九日晚举行了战场起义。攻城西集团当即越过吴化文部的防区，于二十日拂晓攻占了敌人在商埠以西的阵地。我们纵队奉华野的命令加入攻城西集团，参加对济南城的攻击，为攻城预备队。我们除留下特务营在长清县城警备外，全纵队于二十一日开进济南飞机场待命，并负责监视吴化文部和警戒飞机场。

济南飞机场内敌人遗留的军用物资很多，由于在十九日的会议上给干部们敲了警钟，各团、营、连的干部都十分注意抓紧部队的纪律问题。因而在整个警戒飞机场期间，再没有发生过私自拿用军用物资的违反纪律行为。

九月二十四日，在我东、西攻城集团的猛烈夹击下，济南守敌被全歼，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被捉获。“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战役目标全部实现了。由于敌人垮得太快，我们纵队未能摊上攻击济南城的任务，感到有些美中不足。

长清攻坚战的胜利，是我们纵队指战员认真学习老大



哥纵队城市攻坚战的经验的一次实践，也是我们的干部将游击战争中攻击敌炮楼的经验，加以提高运用于正规攻城战的实践。这次战斗，共歼敌一千九百一十四人，缴获小炮二十九门、轻重机枪九十六挺、长短枪一千四百九十二支。我们共牺牲二十七人，包括第一团第二营机炮连连长黄洪同志等排以上干部四人；负伤一百一十六人，其中排以上干部二十二二人。

济南战役结束后，我们纵队于九月二十八日开到汶上县以东的白塔地区进行补充休整。华野首长很关心我们纵队的发展，除规定长清的解放战士全部由我们处理外，另外拨给我们解放战士一千名。为了实现党中央规定编制三个师的目标准备条件，我们以教导总队为架子，以特务营为基础，补充了新解放战士，恢复了第三团的建制（由黄明金任团长、曾源任政治委员）。另外组建了补训团（由冯扬武任团长），担负训练新兵的任务。

## 参加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华野和中野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战役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至海州、西至商丘、北至临城（今薛城）、南至淮河的广大地区联合进行的作战。这次战役，是我军有史以来所进行的持续时间最长（六十五天）、

敌我参战兵力最多(双方直接参战的兵力共约一百四十万人)、取得战果最辉煌(共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的战役,是我军在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中,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最大的一次战略决战,它连同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对埋葬蒋家王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影响之深远,在我国的战史甚至世界的战史上都是罕见的。我们两广纵队很荣幸地参加了这个伟大战役的全过程。我们纵队和我本人都接受了极其严峻考验。当时那些艰难曲折和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今日回忆起来,还是令人兴奋不已。

十月上旬,我和纵队政治委员雷经天、参谋长姜茂生、政治部副主任刘田夫等同志,到曲阜参加华野前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和华野司令部召开的作战会议,听取了党中央九月会议的决议,毛主席关于加强纪律性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关于进行淮海战役指示的传达,学习讨论了华野司令部拟订的淮海战役的计划和部署。华野首长决定让两广纵队从一开始就参加战役行动,使我们非常激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回顾我们这支由华南各游击纵队北撤到山东的骨干组成的两广纵队,得到了党中央和华东局的亲切关怀,和其他各大战略区的积极支持,按照“保存华南骨干,提高干部质量”和在战斗中去求得发展的方针,华野首长对我们实施精心的领导和指挥。纵队成立之初,先让我们在华东战场内线的南麻、临朐、诸城等战役参加一些较小规模的战斗,以及

在外线的鲁西南地区进行机动作战,进行实战锻炼。然后参加新式整军运动,进一步提高我们纵队的政治素质,接着南渡黄河参加豫东战役,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在济南战役中,又分配我们攻击长清县城的任务,使我们纵队在较短时间内顺利地经历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阵地战和攻坚战的转变,而今天又有机会参加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大决战,这对于我们纵队是一次更大的锻炼和考验,也是我们纵队的更大光荣。纵观当时全国的战局,解放战争已进入决定性的阶段,东北我军胜利地进行了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大军正开入关内,直迫平津,其他解放区我军也接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想到我们纵队成立时发表的宣言中提出的“配合华东人民解放军作战,坚决彻底干净消灭蒋介石进犯军,打回两广去,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黑暗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斗争目标,现在已经近在眼前,怎么不使人激动呢?

我们回到部队后,首先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纵队党委扩大会议,进行传达和研究。然后部署全纵队各级干部进行认真的学习和讨论。纵队政治部组织各团政治处进行了动员教育,向指战员介绍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和华东战场的胜利形势;讲解了中央九月会议的精神;要求全体指战员树立艰苦作战的思想,克服速胜南下和思家观念的思想偏向;要求各部队向驻地群众了解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苦难;对新补入的解放战士和新参军战士,进行诉苦教育,提高他们为解放全国人民而战的政治觉悟。经过传达和动员教育,极

大地激发了指战员的斗志,随即投入了热火朝天的战前练兵活动。大家决定抓紧时间,练好本领,迎接即将到来的规模空前的大决战。

从西面和南面威迫徐州。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中心目标,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位于徐州与连云港之间新安镇地区的敌黄百韬兵团。为了迷惑敌人,隐蔽我军战役意图,华野部署了几支有力的部队,从东北面、西面和东南面几个方向,同时威迫徐州,给敌人造成我军先夺取徐州的错觉,以控制徐州敌人的主力,使其不能有效地增援敌黄百韬兵团,为我主攻部队争取时间围歼该敌。我们纵队的任务是配合第三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由第三纵队统一指挥),从西面威迫徐州,牵制敌邱清泉兵团,使其不能轻易东援。

十月下旬,华野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着令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先于其他部队行动,迅速前出至商(丘)砀(山)线以北地区,作战役展开,但不要向商砀线攻击,以免使敌过早地察觉我军的佯攻部署,要在我军主力于新安镇地区发起对敌黄百韬兵团攻击的同时(或早一日),才可向商砀线举行牵制性的攻击,这样才能起到大的作用。中央军委还指示,中野在攻击郑州胜利后,应立即向东行动,并指挥华野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不但要牵制当时已放弃郑州,经开封撤往蒙城的敌孙元良兵团和已由商丘撤往蚌埠

的敌刘汝明兵团的全部,而且要牵制在徐州周围的敌李弥兵团和敌邱清泉兵团的一部,这对于保证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将有极大作用。

受领任务后,纵队党委立即进行认真的讨论,反复领会中央军委和华野的意图,统一认识,然后向团以上干部传达并进行深入的讨论。同时,纵队政治部进行了战斗动员,具体分析了淮海战场我军的有利态势和上级正确、稳妥的部署,要求全体指战员坚定胜利信心,发扬排除万难,英勇作战的精神,紧密配合华野、中野各老大哥纵队作战,坚决完成任务,为人民立新功。传达动员后,指战员们带着旺盛的斗志,百倍的信心,按着纵队颁发的由汶上县休整地区向商砀线以北鱼台地区开拔的命令,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向战场。

十一月二日,我们纵队前出到鱼台县西侧的孟店一带集结。到达后,即以假番号到处号房子,大张声势,造成大军压境的模样,然后断绝交通,严查行人,封锁消息,以迷惑敌人;并以三天时间进行战斗准备,以便在战役发起时,立即对位于商砀线上的敌邱清泉兵团实施攻击。

十一月四日八时,华野下达了攻击命令:东线各纵队决定在八日晚统一发起战斗;为了迷惑和牵制敌人,着令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协同中野主力,由中野统一指挥,于八日前在砀山、永城、肖县地区发起进攻。

十一月六日十八时，夜幕降临，战役的帷幕拉开了。东线我军主力以万马奔腾之势向预定目标迅速前进，西线我军则似猛虎下山，向在商砀线上的敌邱清泉兵团猛扑过去。

我们纵队兵分两路从孟店出发，按预定计划首先向马良集及以东地区之敌实施攻击；如敌溃逃，即沿砀山北面的周寨、唐寨一线实施追击，威迫徐州，协同第三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牵制敌邱清泉兵团。一路上，同志们两腿生风，向目标疾进，虽然星月俱黑，寒风刺骨，可是大伙心里热得象一盆火，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火速接敌，拖住邱清泉。夜半时分，穿过马良集，即进入砀山地区。七日凌晨，我先头第一团到达周寨。这里原是敌占区，但是敌人已于六日向东南撤退。原来邱清泉确实是被我西线大军压境的声势所迷惑了，错误判断这里是我军主攻方向，慌忙向徐州外围收缩兵力，摆出固守的态势。我军即趁机连夜挥戈东进，直逼徐州。

十一月八日晨，我们纵队和第三纵队由砀山向东实施白天追击，力求把敌人拖住。第三纵队沿陇海路两侧向黄口推进。我们纵队沿黄河故道两岸向唐寨、李寨搜索前进。到中午十二时三十分，我第一团终于在唐寨追上敌人，获悉为敌邱清泉兵团的整编第五师（即第五军）这个老对头。我们纵队在鲁西南地区和在豫东战役中已经几度和它交锋。真是冤家路窄，今天又在淮海战场上相遇了。我们即命令第一团展开正面攻击，第二团从北面配合。

攻击开始后,我第一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唐寨西北角突破敌前沿阵地,勇猛插向敌纵深。与此同时,我第二团攻占了北面小坊子。敌人遭我突然的打击,象是被捅破了的马蜂窝一样,嗡嗡乱叫,四散奔逃。然而敌人毕竟是训练有素、久经战阵的队伍,不一会便平静下来,重新组织兵力、火力向我反扑。当时是白天战斗,而且又是短兵相接,战斗异常激烈。我第一团的指战员们不顾一切地从缺口向寨里冲去,敌人则不惜任何代价拼命抵抗。我方占领了一个阵地,敌人就集中炮火向我猛轰。寨西北角我第四连占领的阵地上,仅一个多小时,就落下了一百多发炮弹,弹坑密密麻麻,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睛,但我指战员顽强作战,前面的倒下去,后面的接着跟上,步步向敌人进逼。

激战到黄昏,敌人的炮声突然稀落下来。原来这一天,整个战局起了变化,驻韩庄、台儿庄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三个半师战场起义,华野山东兵团抓住战机越过该部防区,直插徐州以东、大许家以西地段的陇海路两侧,切断了敌黄百韬兵团通向徐州的退路,同时也造成了对徐州的直接威胁。这一下,国民党徐州“剿总”慌了手脚,怕我军乘虚进攻徐州,急令邱清泉兵团向徐州近郊外围集结。因此,与我们对阵的敌人无心恋战,逐步向寨东南角退缩。

这时,第三纵队第九师第二十七团赶到,从寨东南拦击敌人,配合我第一团的行动。我们重新部署了兵力,两支兄弟部队从南北两路同时发起冲锋,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我第

一团即歼其一个连，敌被迫全部龟缩于寨东南角，伺机东逃。我乘胜进击，从西、南、北三面实施强攻，由于敌人损失不大，弹药足，火力猛，工事坚固，强攻一时难以奏效，双方成了对峙状态。

午夜一时，也就是九日凌晨，敌人突然倾尽所有炮火向我阵地作毁灭性轰击，并出动一个团的兵力进行反扑，来势凶猛。在接到第一团的报告后，我和姜茂生参谋长判断，敌人可能是以进为退，企图“金蝉脱壳”，即着令第一团沉着应战，坚决粉碎敌人的反扑，并大量杀伤敌人。战斗中，我们的部队打得英勇顽强。如与敌正面接触的第一团第六连，他们的工事全部被炮火摧毁，同志们从土里爬起来继续战斗，待敌人进至阵前二十米左右时突然开火，愤怒的子弹雨点似地射向敌群。敌人象被机器砍伐的灌木林一样，一排排地在我们阵地前倒了下去，敌群中发出了鬼哭狼嚎的叫声。在阵地左侧，一班副班长率领一个战斗小组，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冒着敌人的机枪火网冲出阵地，用刺刀捅倒了几个敌人，缴获了两挺轻机枪。三班班长端着轻机枪和敌人对着干，他忽左忽右，来回扫射，枪管打红了就摔手榴弹。我们的指战员们就是这样英勇地击退了敌人多次反扑，给了敌人重大杀伤。

到九日上午，这个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终于在我们的打击下，象受伤的狗熊一样，狼狈向东撤退。这时我东线主力已在碾庄地区完成了对敌黄百韬兵团



的包围，蒋介石和徐州“剿总”这时才弄清我军的主攻方向，仓惶将邱清泉兵团东调，协同李弥兵团去援救黄百韬兵团。

随着战场情况的变化，我们纵队和第三纵队在中野指挥下，挥戈南指，配合中野主力攻歼宿县之敌，切断津浦路徐(州)宿(县)段，从南面威迫和包围徐州，继续配合东线作战。

十一月十七日，我们纵队和第三纵队回归华野建制。中野集中全力于宿县西南阻击敌人由平汉路驰援徐州的黄维兵团。华野则准备合围敌人从徐州东援已进至大许家的邱清泉兵团，着令我们纵队由肖县东移，和第三纵队配合华野苏北兵团于陇海路苑山(在徐州东面)以西切断敌邱清泉兵团的退路。

十一月十八日，第三纵队从三堡向柳集攻击前进。我们纵队奉命接替第三纵队在三堡及其两侧的防地，作宽大正面防御，监视徐州之敌，以确保主战场侧后的安全。十八时，我第一团进至吴集，从青龙桥至老山口设防；第三团进至孤山集，负责防守两瓣山；第二团东进三堡，接替第三纵队防区，负责王楼至三堡以东山地的防守。

十一月十九日晨二时，第二团第一营进抵三堡车站，发现第三纵队未待我们前来接防已于十八日晚东进，即迅速部署第一连占领东侧的女娲山，但敌孙元良兵团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孙元良兵团由蒙城转至宿县，在中野攻克宿县前北移徐州)已乘隙先我占领了该山，第一连进行了两次

攻击,于敌阵前伤亡二十余人未奏效。拂晓后,敌第一二二师集中全力利用有利地形,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分两路向我第二团发动了进攻。我第二团立足未稳,工事未筑,全团暴露在敌火下,态势十分不利,但仍沉着顽强地进行战斗,多次击退敌人的冲锋。下午三时,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我和雷经天政治委员及姜茂生参谋长研究情况后决定,为使第二团摆脱被动不利地位,经请示第三纵队同意后下令第二团后撤,并命令第三团第一营进行掩护。黄昏,第二团全团撤至梁庄以西山地,而敌人也停止了进攻。(切断敌邱清泉兵团的行动,因情况变化也停止了执行)

这次战斗,虽然使敌人遭到约五百人的伤亡,但我们纵队亦伤亡一百四十人,其中第二团第一营第二连政治指导员叶德同志、第三连副连长曾桂林同志、团部爆破教员陈英同志、第三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钟生同志光荣牺牲。第二团第一营受到的损失最大。部队受到损失,我心中很不好过。我们纵队本来就兵力不足,战役还没有到关键的时刻就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以后怎么办?造成第二团被动有多方面的原因,我作为司令员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要是缺乏预见性,连日来敌人不断在攻击第三纵队的女娲山阵地,本应预见到第二团接防时可能出现最坏的情况,并根据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先行派出纵队侦察部队),但当时我们疏忽了,没有这样做。

十一月二十二日,敌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敌人东援的

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遭我顽强阻击于大许家地区，伤亡惨重。至此，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纵队和兄弟纵队一起，胜利完成了从西面威迫徐州，和从南面威迫和包围徐州的任务，达到了迷惑和牵制敌人，并切断徐州敌人南面通道的战役目的。在从徐州以西到徐州以南（下称徐南）的战斗过程中，我们纵队辗转与敌孙元良兵团作战多次，使部队的战斗坚韧性进一步得到了锻炼。

徐南阻击敌孙元良兵团。敌黄百韬兵团被歼后，蒋介石气急败坏，为了挽救危局，十一月二十四日命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沿津浦路向南突围，同时命令从西南赶来增援的黄维兵团和位于固镇、蚌埠的李延年兵团及刘汝明兵团北上接应，妄图三路会攻宿县，南北对进打通津浦路，尔后退守淮河以南，屏障南京。

对于敌人的这个行动，中央军委和淮海战役总前委已有预料，并指示华野、中野采取了有力的对付措施。还在最后围歼敌黄百韬兵团期间，中野主力已将敌黄维兵团阻击于南平集及浍河一线，并布置了“口袋”准备予以包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敌黄百韬兵团即将全歼之际，华野根据中央军委和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指示，作了在徐州以南的南北两线阻击敌人的部署：在南线，以苏北兵团阻击敌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在北线，由山东兵团统一指挥第一、第三、第十二纵队和鲁中南纵队、两广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

第三旅，在挨近徐州的南面，限于三日（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内构成纵深防线，堵击可能向南突围的敌杜聿明集团。第三纵队、冀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和我们纵队奉命组成西路阻击兵团（由第三纵队统一指挥），在津浦路两测至肖县以东地区堵击敌人。我们纵队奉命在津浦路以西，从班井至吴集一线十一公里宽的正面上组织坚强防御。右邻为第三纵队，左邻为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

受领任务后，纵队党委即抓紧时间，在孤山集召开扩大会议，分析敌我情况，领会上级作战意图，讨论如何完成作战任务。在会上，大家都认识到这次任务非常重要，也非常艰巨。我军在徐州以南如果堵不住敌杜聿明集团的三个兵团，让敌人三路会师宿县逃往淮河以南，将会影响战争全局的进程。华野在徐南北线遂行阻击任务的西路和东路阻击兵团共六个纵队，要担负八十公里的防御正面，兵力已在第一线全线摆开，两路阻击兵团的第二线已经没有预备兵力，而华野主力当时仍正在东边紧张地对敌黄百韬兵团进行最后的围歼，中野的部队正在南边阻击敌黄维兵团，一时都不可能机动过来，因而任何一个纵队的防线如果被敌人突破，就有如堤缺水溃，徐州的敌人就有可能达成其突围企图。我们纵队当面之敌为孙元良兵团，辖第四十一、第四十七两个军，配有六个炮兵营（兵团直属炮兵除外），而我们纵队仅有三个步兵团和一个只有三门老式山炮的炮兵队，而且第二团在十九日的三堡战斗中伤亡较大，元气尚未恢复，第三团

又是新建,前几天才发齐武器,新补充的兵员又都是刚从济南战役解放的战士,还未经过很好教育。以这样的力量来对付数倍于我的敌人,并要守住十一公里宽的防御正面,困难无疑是很大的,对我们纵队的考验是极其严峻的。根据我们纵队兵力的情况,要定下防御决心确是煞费苦心,主要问题是哪两个团作为纵队的第一梯队来担任第一道防线的防守?第一团毫无疑问要放在第一梯队防守主要方向,但是第二团战斗消耗后还没有得到补充,第三团新建还不巩固,放这两个团中的哪一个团在第一梯队较好呢?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最后确定把第三团放在第一梯队防守次要方向,第二团负责防守纵队的第二道防线。由二十一日起,全纵队包括直属机关和文工团等,全力以赴紧张地进行构筑两道防线工事的作业。

为了完成这一重要而又艰巨的作战任务,纵队党委决定动员全体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主观能动性,竭尽全力,坚守阵地,千方百计堵住敌人南逃通路。在构筑工事的间隙,纵队政治部和各团政治处分别向全体指战员介绍了战役当前的发展情况,表扬了在第一阶段中英勇作战的指战员;指出徐南阻击战的任务更加艰巨,必须树立艰苦作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此外及时调整了组织,合并了一些连队建制,派出一批机关干部到基层任职,并发展了一批党员,从而充实了连队的战斗骨干,保证连队连续作战的需要。敌黄百韬兵团就歼后,十一月二十四日,

我们又及时向指战员传达了中央军委的贺电和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指示，同志们欢欣鼓舞，战斗情绪高涨，一个个摩拳擦掌，决心在这场阻击战中，为党为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

十一月二十五日，敌杜聿明集团开始从正面向第三纵队防区，和从铁路以东向鲁中南纵队防区，发起了试探性的进攻。我们纵队当面之敌则狡猾地保持沉默，我们站在设在卢村寨的指挥所外面，听着东面隆隆的炮声，预感到大战的来临。

十一月二十六日，敌人全线向南发动进攻，邱清泉兵团在铁路以东，主要突击方向指向鲁中南纵队防区；孙元良兵团在铁路以西，主要突击方向指向我们纵队防区。由于第三团有不坚定的新解放分子投敌，敌人得以摸清我防御部署，避开我主要方向，首先以其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向我第三团东部阵地进攻。敌人来势虽凶猛，但在该地防守的第二营的同志们也不示弱，英勇地把敌人打了回去。黄昏后，敌人一路从正面偷袭我两瓣山前沿阵地，另一路经下班井袭占我两瓣山主阵地。第三团虽然组织了两次反击，但由于敌众我寡，敌人又占据了有利地形，伤亡了数十人而未能奏效。

情况来得突然而危急。当我们把情况全部弄清楚时，敌人的第一二二师已占领了两瓣山所有的制高点。仗刚开始就打得不好，我有些沉不住气，当即命令把第二团拉上去，在第一、第三团配合下进行反击夺回两瓣山。第二团奉命紧

急向孤山集开进。这时，我的心情已平静下来，和雷经天政治委员、姜茂生参谋长及邬强参谋处长等在一起冷静地考虑，认识到这时敌人已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控制了两瓣山，第二团要把它夺回来的可能性不大，即使把两瓣山夺了回来，而把第二团拼掉了，那么，我们还有多少力量来继续坚守这十一公里的防御正面呢？于是毅然决定改变决心：放弃第一道防线，集中力量坚守第二道防线。当即一面向第三纵队报告，一面命令第二团停止前进，第三团撤回整顿，第一团撤出前沿阵地，退守纱帽山和马路山主阵地，掩护第二团、第三团和纵队直属队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工事。以后的战斗充分证明，我们及时改变原来的决心是正确的。敌人攻占我两瓣山阵地得手后，又以其第一二四师乘势袭占了我第一团白虎山阵地，一时气焰嚣张。

十一月二十七日拂晓以后，敌第四十一军在两个野炮营和两个山炮营的支援下，并得到第四十七军一部的配合，向我第一团防守的纱帽山、马路山主阵地进攻，攻击重点指向第一营防守的纱帽山。第一营的同志们，在敌人猛烈的炮火轰击下（敌人共发射了一千余发炮弹），英勇地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冲锋，在阵前杀伤敌人二百余人。敌人志在必得，下了更大的赌注。下午在更猛烈的炮火支援下，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对我第一营实施夹击。我们考虑到纱帽山阵地突出，第一营伤亡很大，而掩护任务已经完成，遂于十五时下令第一团撤出纱帽山和马路山阵地。

疾风知劲草，激战显英雄。第一营撤出纱帽山阵地时，第三连的曾发班长率领全班掩护撤退，他负了伤，班里的同志要扶他退下火线，但他命令全班快撤，自己独自留下来坚持战斗，当敌人冲上来向他靠近时，他猛然拉响了两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消息传到指挥所，我们非常感动，立即发出命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学习曾发同志的革命英雄气概，坚守阵地，坚决堵住敌孙元良兵团。

激战了两天，我们吸取了由于兵力分散，因而未能守好第一道防线的教训，决定以第一团集中防守卢村寨及其前方约一千公尺的瓦房村；以第二团集中防守大方山和黄山（秤砣山北面的 233 和 252 高地）；以第三团防守秤砣山，并保障纵队的翼侧。要求各团在部署完毕后，连夜加修工事，以迎接即将来临的、更加残酷的战斗。

被局部胜利冲昏头脑的敌孙元良兵团，以为只要占领纱帽山，突破我们纵队第一道防线，就可以轻易地直插我们西路阻击兵团纵深的曹村、夹沟等地，与在东面进攻的敌邱清泉兵团会合，实现其南逃计划的第一个目标了。十一月二十八日一清早，敌孙元良兵团以其第四十一军为第一梯队，其第四十七军第一二七师为第二梯队，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又炮火连天地向我们纵队第二道防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从而打响了使敌人丧胆的卢村寨、大方山战斗。

敌第四十一军首先集中兵力向我第一团瓦房村阵地进攻，经过约两个小时的争夺后，我们考虑到瓦房村子小而又



突出，不利于防守，乃于九时命令部队撤回，集中兵力坚守卢村寨。

九时三十分，敌人对我卢村寨和大方山阵地进行了全面的炮击后，其第四十一军倾全力对卢村寨、大方山同时发起了进攻。

在大方山方向，敌人首先集中力量，攻击我第二团左侧山脚的前沿阵地，被我击退。随之敌人集中炮火猛轰该地，我们的工事全部被毁，防守该地的第四连伤亡很重（副政治指导员刘观胜同志牺牲，连长和政治指导员负了伤），被迫撤出了阵地。第二营旋即组织反击，未奏效。敌人站稳脚跟后，又以猛烈的炮火，实施逐次延伸射击，掩护其步兵夺占了大方山。

大方山失守的消息传来，我们感到情况严重。因为大方山是卢村寨的屏障，而卢村寨则是敌孙元良兵团南逃的主要通道，敌人夺占了大方山，就可以居高临下，和正面进攻之敌夹击卢村寨。如果卢村寨一旦失守，我们纵队的防御就有崩溃的危险，敌孙元良兵团就可以长驱直进（当时在我们纵队防线的背后直到宿县，还没有部队防守），配合其在津浦路以东的敌邱清泉兵团夹击我第三纵队，打开敌杜聿明集团南进的大缺口，从而影响战役的全局，后果不堪设想。我和雷经天政治委员及姜茂生参谋长交换意见后，当即命令第二团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大方山，并千方百计地坚守住它。

第二团受命后，迅速组织了第一、第二营四个连的兵力（实际上总兵力只有二百余人，其中第四连仅剩二十余人），团长黄布作了部署，政治委员陈一民作了简要的动员鼓动，并即与参谋邱特一起亲自到第一线组织指挥战斗。十时三十分，在团营炮火和第一、第三团各一个连的火力支援下，向占领大方山的敌人展开了强有力的反击。各连的干部身先士卒，战士们似猛虎出山，奋勇前冲，第五连连长曾福表现尤为突出，率领连队冲到最前头，负伤不下火线；副连长陈玉麟同志英勇牺牲。经过三十分钟的激烈战斗，于十一时夺回了大方山，并歼敌一个连，俘敌副营长以下数十人。大方山反击的成功，挽救了危局，稳定了防御。

敌人不甘心失败，整个下午，继续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地向大方山我阵地冲击。我第二团接受了上午丢失阵地的教训，在敌炮击时，防守部队隐蔽在棱线后的死角，待敌炮火向我纵深延伸时，又迅速抢占棱线，居高临下，以步机枪、冲锋枪和手榴弹火力猛击敌人，把敌人的每一次冲锋都打了下去。敌人的遗尸布满了大方山的北山坡，大方山阵地岿然不动。

在卢村寨方向，敌人在进攻大方山的同时，也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我发起了猛烈的冲锋。但是，在我第一团指战员的英勇抗击下，从上午九时三十分到下午三时三十分，敌人的三次冲锋都被我一一粉碎。

输红了眼的敌人，气急败坏地集中了更多的炮兵，并连

续出动野马式战斗轰炸机，对我实施轮番轰击，仅半个小时，我卢村寨前沿阵地所有工事全部被毁，全村房屋着火燃烧，每一平方米的地面平均落下一发炮弹，村子几乎全被炸平，到处是断墙瓦砾，烟尘滚滚，隔几步远就看不见人。位于村后沿约一百米的纵队指挥所，也遭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一度中断了指挥。

正当我们遭到敌人毁灭性的轰击，十分艰难地抗击着敌孙元良兵团疯狂进攻的时刻，山东兵团发来了电报，着令所有阻击部队必须坚决把敌人堵住，在现有阵地上不许后退一步。并决定调整部署，以第九纵队、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组成西路阻击兵团，由第九纵队统一指挥；另以第三、第八纵队和鲁中南纵队组成中路阻击兵团；以第一、第四、第十二纵队组成东路阻击兵团。同时，并通告我们，第九纵队将于二十九日上午进抵卢村寨增防。山东兵团的电报，如同久旱逢甘雨，它更加增强了我们坚守阵地的信心。我们迅速把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向各团通报。

第一团的指战员们听到第九纵队老大哥很快来增援的消息后，信心百倍地蹲在只有膝盖深的塹壕里，眼睛紧紧地盯着前方，决心顶住敌人的疯狂进攻，绝不让他们南逃的企图得逞。十八时，敌人紧接着持续疯狂的轰击之后，出动了两个团的兵力，铺天盖地地冲了过来，企图一口气踏平卢村寨。但我们英勇的指战员们临危不惧，沉着应战，在敌人接近到数十米的距离时，首先以轻重机枪和步枪齐射的火网

向敌人盖了过去，敌人一排排地倒下。接着手榴弹雨点般在敌群中爆炸，炸得敌人血肉横飞。部分敌人一度冲到寨墙边我阵地上，我们和敌人展开了近战肉搏。指战员们表现出惊人的英勇顽强。第二营有个班与冲上阵地的敌人拼杀，全班壮烈牺牲。第一营一个莱芜战役解放入伍的台湾籍排长，腰骨和双腿炸断了，全身血肉模糊，他对前来抢救的卫生员说：“我不行了，你去救别的同志吧！要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为阶级兄弟报仇！”说完才咽了最后一口气。机炮连连长霍桐同志，亲自用重机枪向敌人射击，牺牲在重机枪阵地上。

英勇的第一团的指战员们，就这样再一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在阵前数十米内，敌人遗尸累累。第一团彭沃团长在电话上向我报告了他们打退敌人情况后说：“我们团这两天打苦了，伤亡相当严重，仅营连干部就伤亡了十三人，全团除一个连还保存一个建制排外，各连只剩一至两个班，而且已经不是原来的建制了。再打一个回合，就没有多少战斗力了。”我回答他说：“老彭，现在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今天我们要和敌人“晒栏”（广东话，意思是和敌人拼到底），卢村寨绝对不能丢失，必须坚持到九纵来接防。”彭沃团长即以坚定的声音回答：“请纵队首长放心，我们团就是剩下一个人，也保证坚守在阵地上。”

彭沃同志是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老战士，是久经战阵的军事指挥员。在东江纵队时，他所指挥的中队、大队和支队，都是我们当时的主力部队。他今天发出的誓言，我相信

他是说得出做得到的。但是,要确保卢村寨,坚持到第九纵队来接防,没有一定的战斗力是不行的。我们纵队党委几个常委很快研究后做出了三条决定:(一)号召全体指战员要与阵地共存亡,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坚守在阵地上;(二)把纵队直属警卫连、侦察连、文工团及所有不直接担负战勤工作的机关后勤人员拨归第一团指挥,以加强卢村寨的防御作战和后勤保障力量;(三)派姜茂生参谋长到第二团、郭强参谋处长到第一团加强指挥。

警卫连和侦察连老兵较多,都是战斗力较强的连队,特别是侦察连,他们多次与敌人作战,战斗经验和战斗作风都不错。把这两个连队拉上去,使卢村寨的防御作战增加了宝贵的生力军。十九时三十分,我把两个连长叫到指挥所,在地图上给他们分析了情况,规定他们开到卢村寨后,归第一团第二营指挥(因为该营防守的阵地是敌人进攻卢村寨的主要方向),并要他们向陈石甫营长转达我的命令:“必须竭尽全力,坚决守住阵地粉碎敌人的进攻”。二十时三十分,我警卫连和侦察连到达第一团第二营阵地,正值敌人新一轮冲锋开始,他们即协同该营将敌击退,并实施了反击,使敌人又遗尸百余具,大大顿挫了敌人的气焰。但这两个连队亦付出了伤亡二十八人的代价。

从二十八日晚至二十九日晨,敌人的炮火通宵达旦地继续对我卢村寨阵地轰击,并四次出动部队利用夜暗向我偷袭,企图重演两瓣山的故技,以袭占卢村寨。但是,敌人的

算盘又打错了。我第一团指战员严阵以待，敌人每一次偷袭行动，都被该团的潜伏分队以突然短促而猛烈的火力击溃，并被歼灭一部。

二十九日晨，被我打得焦头烂额的敌孙元良兵团，在蒋介石和杜聿明的压力下，仍试图突破我们纵队的第二道防线，以达成其南逃的梦想。因而又在更为猛烈的炮火和航空火力的支援下，对我卢村寨和大方山阵地，开始轮番的冲锋。

在大方山方向，敌人的一个排曾一度攻上山顶，旋即被我第二团歼灭。此后，在该团强有力的抗击下，敌人不仅无法再接近山顶，而且也无法再占领该团的前沿阵地，只能呆在几百米以外“望山兴叹”！

在卢村寨方向，敌第四十一军集中了主要力量，对我第一团阵地实施连续的轮番冲锋，该团在纵直警卫连和侦察连的大力配合下，艰苦地进行抗击。敌人主要的攻击矛头是指向第二营设在寨西北角的两块有柏树林的小坟堆的前沿阵地。敌我反复争夺，战斗十分激烈，双方伤亡都很大。第五连第一排排长林权同志，率领本排两天坚守在一块柏树林中。经过几个回合的战斗，他摸到了敌人进攻的特点和规律。敌人新一轮冲锋开始了，他沉着地等待敌人步兵接近到二十米左右的距离时，指挥全排同时猛烈开火，他亲自用轻机枪扫倒一片敌人，随之又一口气打了几个手榴弹，杀伤敌百余人。当敌人被击退时，在友邻的配合下，林权排长一声

令下，率领全排跃出堑壕冲向敌人，不幸他被敌侧射火力击中，冲到阵前二十米的坟堆时倒了下去。这位英雄排长牺牲时，准备投掷的手榴弹仍紧紧地握在手中。

敌孙元良兵团一再从正面攻不下卢村寨，企图再占大方山从我右翼实施迂回的打算又不能得逞，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仍企图作拼死的挣扎。于是一面以其第四十一军继续加强对我正面阵地的攻击，一面把老本拿了出来，以其兵团预备队第四十七军第一二七师，增加到第四十一军的右翼，向卢村寨西侧的夏庄、青龙山方向突击，企图迂回卢村寨左侧后。敌人这一招来得比较突然，战场形势一下紧张了起来。当时我们手上已经没有机动兵力，第一团和警卫连、侦察连剩下的兵力对付正面进攻的敌人已很吃力，再抽调不出兵力来对付敌向侧后的迂回了，情况相当危急。就在这关键时刻，第九纵队老大哥的先头营及时赶到，他们立即协同第一团和纵直警卫连、侦察连击溃了正面进攻的敌人；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在夏庄、朱墟子、青龙山一带与敌第一二七师展开了激战，粉碎了敌人从我左侧迂回的企图。由于第九纵队后续部队不断到达，战至黄昏，敌人再也没有力量进攻了。但敌人的炮火，直到三十日晨二时，仍不停地向卢村寨轰击。

三十日晨五时三十分，第九纵队全部接替了卢村寨阵地的防御任务，我们纵队集中防守大方山、黄山、秤砣山阵地。此时，徐南阻击战已接近尾声，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宣

告胜利完成。

追击杜聿明集团。在我华野强大兵力的阻击下，敌杜聿明集团南下不成，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又北上不得，而黄维兵团则在双堆集陷入我中野的重围之中，蒋介石“南北对进”，“三路会师”打通津浦路徐蚌段，撤出杜聿明集团的计划彻底破产。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命令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避开华野徐南阻击阵地，改向西南方向撤退。

十一月三十日晚，杜聿明集团三个兵团共十个军，夹带着徐州军政机关人员和学生、家属约三十万人，开始撤出徐州。十二月一日，华野部署了十一个纵队的强大兵力，采取多层多路尾追、平行追击和迂回拦击等战法，展开了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追歼战。

十二月二日七时，我们纵队接到了西追逃敌的命令。要追击就要讲个“快”字。我们纵队几个领导同志迅速交换了意见，确定了部队追击的行进序列，部署了卫生干部护送徐南阻击战中的大批伤员向野战医院转送，指定邬强参谋处长率领后勤和民工队随后跟进，以保证追击战中的后勤供应。纵队司令部随即迅速用电话将纵队的这些决定通知给各团、各单位。指战员们虽在徐南经过连续四昼夜，对我们纵队来说是空前艰苦的战斗，但士气依然十分旺盛，听到纵队的命令后，精神振奋，很多轻伤员纷纷要求回队参加追击战。各团稍事准备后，八时许即按纵队指定的方向开进。我



们很快就加入了华野部署的追击行列。那时十一个纵队行进在辽阔的苏北和皖北平原上，铁流滚滚向前，分不清哪是头，哪是尾，确实是雄伟壮观。不知什么时候，第一纵队老大哥突然出现在我们纵队的右翼。不久，第九纵队老大哥又在左翼靠了上来。因为是同一个目标，随着距离的缩短，彼此间也就越靠越近了。三支兄弟纵队凑在一起并排前进，谁也不甘落后，你追我赶，都是为了尽快抓住逃敌。

我军追击的强大洪流，气势磅礴，雷霆万钧。敌人有如惊弓之鸟，坦克、汽车、人群急不择路，遍野狂奔。从徐州西郊开始的苏北、皖北平原上，被车马人群压出了几十条新路，遍地是敌人丢下的尸体、伤病员、妇女、小孩和金元券、花名册及坏坦克、坏汽车等军用物资，真是兵败如山倒，狼狽万状。

三日十三时，我们纵队挺进到张新集东南时，追上了敌李弥兵团第八军，当即展开攻击，敌不战而逃。

四日拂晓，我们的追击大军终于将敌杜聿明集团的三个兵团全部包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在北线，我们纵队在山东兵团统一指挥下，和第一、第四、第九等老大哥纵队，由北向南紧缩包围圈，向李石林、青龙集方向攻击前进，展开了边追边打的紧张的战斗行动。

当天中午，我第二团首先告捷。他们于屈王庄追上敌人时，敌第九军第一六六师正在掩护李弥兵团部向西南逃跑，该团邱特参谋长当即指挥第一营从正面发动攻击，敌人作

垂死的抵抗。该团即以第二营从南面迂回抄敌后路，敌人看到危急，放弃屈王庄逃窜，该团勇猛追击了三四公里，歼敌一个多营，但该团也伤亡了六十余人，第一营第一连连长卢照同志负重伤后牺牲。邱特参谋长和五个连级干部也负了伤。

我第三团转入追击后，组织了由第一、第四、第五连组成的精干队伍，由参谋长何通率领，迅猛追击敌人。四日下午，他们在张小阁子附近歼灭敌第八军的一个营后，追击溃敌至阎阁附近时，正遇到敌第八军为掩护撤退，以一个团的兵力，在五辆坦克和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对位于阎阁的我第四纵队的一个营发动进攻。敌人已进行了三次冲锋，该营伤亡甚大，阵地被敌人炮火和坦克摧毁，村庄在燃烧，而敌人又在进行第四次冲锋了，眼看着敌人就要攻入村庄，情况十分危急。行进在最前面的我第一连方泉副连长率领一个排，在第五连两个排的协同下，主动从阎阁以西向敌人出击，何通参谋长率领第四连也随后加入战斗。他们以勇猛快速的动作击溃了冲锋之敌，接着又再次粉碎了敌人的又一次冲锋，杀伤敌人百余人，并攻占刘楼，俘敌一部，从而解除了阎阁友军之危。支援友邻，这本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当晚第四纵队陶勇司令员来电致谢，并向华野为我第三团请功。第二天，华野来电嘉奖，随后颁发了嘉奖令。它给了我们纵队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激励我们更加奋勇战斗。

六日下午，我第三团又在锦桥与谢楼之间，截住了向南

逃窜的敌第九军第一六六师一部，敌人不惜代价要冲开缺口夺路南逃，因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该团第一、第四、第五连在何通参谋长的指挥下，迅速在洪河堤上占领了阵地，以猛烈的火力拦击敌人，并向锦桥村之敌发起了攻击。方泉副连长率领的第一连，在第四、第五连的协同下直插敌群，歼敌一部，余敌溃逃。但是我们这位无私无畏的英雄副连长方泉同志，则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他年青而宝贵的生命。在这次战斗中，何通参谋长也负了重伤。

从五日至八日，我第一团、第二团沿黄白楼、王柳园、李庄、王楼、魏庄、秦三官庄向南追击敌人，连续战斗，均有俘获。八日中午，这两个团在纵队炮兵队的支援下，协同攻击位于李楼已转入阵地防御之敌第五军第二〇〇师，杀伤了一批敌人。第一团副团长蒲公才在战斗中负伤。战斗进行中，我们奉命停止攻击，就地构筑工事，转采政治攻势。

追击战至此宣告结束。我们纵队在这次追击战中，以伤亡消耗很大又来不及补充的三个团进行作战，依靠指战员们的顽强奋战，取得一定的战果，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事情很凑巧，似乎战争对我们实行了“平均主义”，三个团各伤了一个团级干部。我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邱特、何通这两位同志。他们都是抗战初期参加东江纵队的“小鬼”，在抗日战争的烈火中，锻炼成长为英勇善战的年青指挥员。两广纵队成立后，他们虽然在团里任参谋长，但在战斗中，从来都是率领部队打头阵，成为指挥员的好榜样。

敌杜聿明集团被我军包围后,垂死挣扎,多次进行突围,均被我军粉碎,而且包围圈越来越小,到十二月十五日已被我军压缩于陈官庄、青龙集一带东西十公里,南北仅五公里的狭小地区内。

这时,为了配合平津战役,华野根据中央军委和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指示,令各纵队转入战场休整,并加强对敌围困,展开政治攻势。十八日,我们纵队奉命转至会亭集地区,并指挥野司警卫团、骑兵团及冀鲁豫三分区第五团,协同其他纵队在对敌包围圈以西构筑预设歼敌战场,同时进行战场休整。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下午,华野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对拒绝投降,困守待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十日拂晓,敌坦克一部向西南突围,我们纵队即以野司骑兵团及各团的一部实施追击,展开了一场有趣的骑兵在步兵配合下对敌坦克的追歼战。结果,缴获敌坦克八辆,俘敌坦克团副团长以下全部乘员。十日十六时,敌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伟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在淮海战役中,我们纵队由于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基本上完成了上级在各个阶段赋予的战斗任务。从所起的作用和对我们纵队的锻炼来说,以徐南阻击战最为突出。这次阻击战,我们纵队以十分劣势的兵力和火力,在第一道防线被敌袭占,工事大部被毁,伤亡严重而又无机动兵力的困难情况下,依靠指战员们的赤胆忠心,与敌血战四昼夜,顶住了

敌孙元良兵团绝对优势兵力和火力的猛烈进攻，英勇顽强地坚守住卢村寨、大方山阵地，和老大哥纵队一起粉碎了敌杜聿明集团向南突围的企图。

我们纵队所以能在战役中取得一些成绩，首先是中央军委，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以及华野、中野和有关兵团的首长对我们纵队实施了正确的指挥。功劳还应归于华东人民，没有他们的支援，在徐南阻击战中，我们的指战员就没有足够的弹药，特别是没有足够的手榴弹来粉碎敌孙元良兵团的进攻。功劳应归于流血牺牲的同志们，如果说我们纵队在淮海战役中占有一点点位置的话，这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争取来的。战役中我们纵队共牺牲一百八十四人（其中排以上干部二十四人），共负伤七百三十五人（其中连以上干部四十二人），伤亡约占作战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战斗连队连职干部的伤亡达百分之六十强。烈士们的牺牲，对解放华东、中原以及尔后南渡长江解放全中国都有重大的意义。烈士们永垂不朽！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们纵队于一月十五日转至虞城县休整。各团自下而上进行了战斗总结；并结合战斗总结，评选出一批在唐寨、三堡、徐南阻击战和追击战中英勇作战的同志为等级功臣或战斗模范，召开了庆功大会；各团还召开了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在战役中英勇献身的英灵。我参加了第一团的大会，和团长彭沃、政治委员郑少康等团的领导干部一起，为功臣模范们戴了大红花。我们号召指战员们在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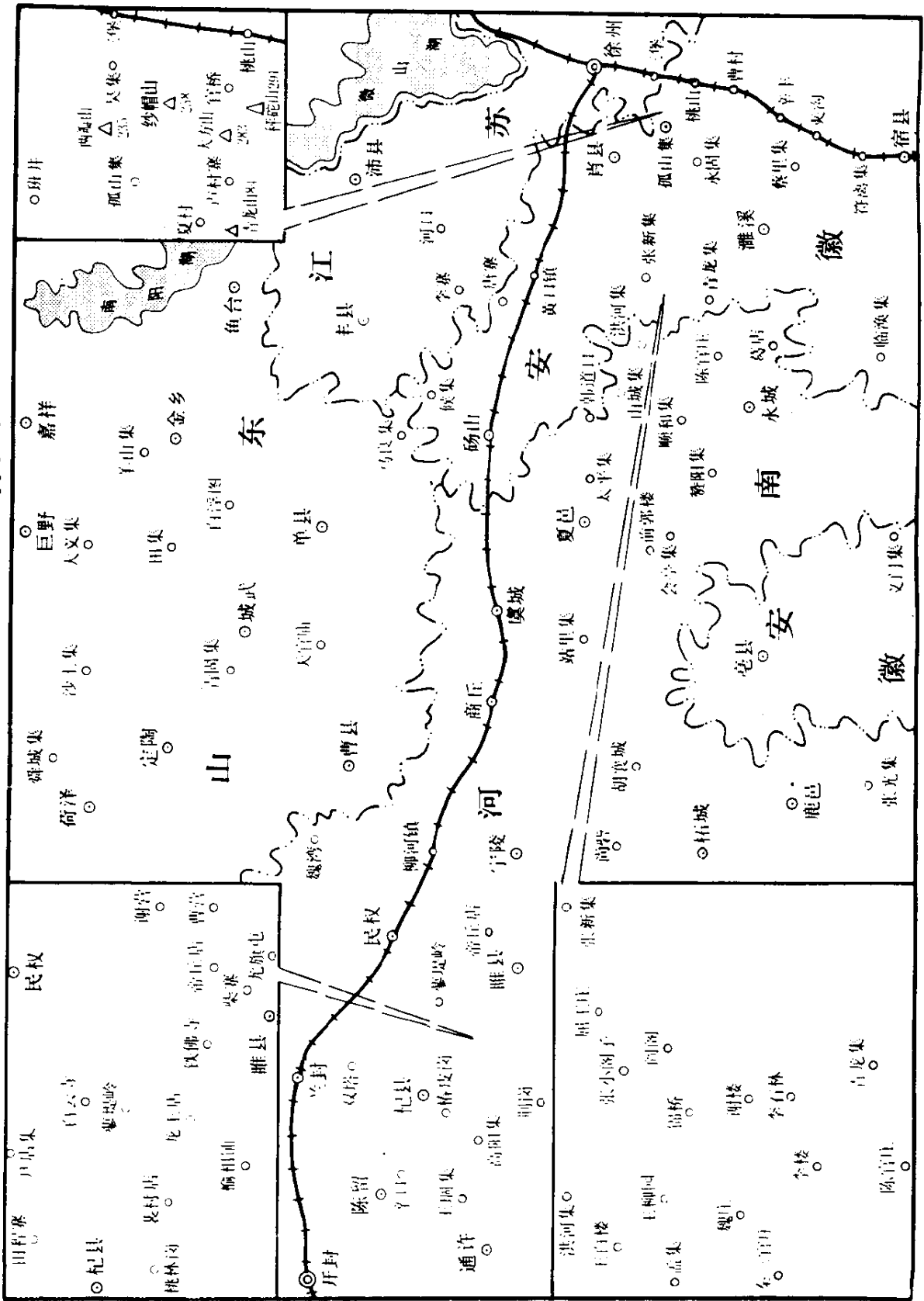
将进行的渡江作战中，在解放两广，解放华南，解放全中国的作战中，争取为人民立新功，继续完成方泉、曾发、林权、张清等先烈们尚未完成的事业。

华野首长非常关心我们纵队的建设，从兄弟纵队抽调了一千二百名两广籍解放战士，并从江苏省射阳县动员了近一千名翻身农民补充给我们。此外，还拨给美式山炮三门、化学迫击炮四门，把我们纵队的炮兵队扩建为炮兵营。

一月下旬，我们纵队几个领导同志，参加了华野前委在贾汪召开了扩大会议。听取了党中央关于一九四九年任务的传达，和粟裕副司令员关于淮海战役的总结报告。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给了我们纵队很多鼓励。陈毅司令员非常亲切地对我说：“在徐南阻击战中你们辛苦了，我们当时手上实在是一个预备队也没有了，所以未能及早增援你们。”这时，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军统一整编，华东野军改为第三野战军，各纵队改为军。有的人认为两广纵队的名义已不起作用了，可以取消。陈毅司令员在大会上讲话时根据党中央的意图否定了这种意见，明确指出：“两广纵队名义保留到两广，有号召作用，而且有了影响。可以归兵团指挥，也可以由野司直接指挥，可以补充一个师打回两广去。”

# 苏鲁豫皖边地区略图

(图十)



# 第十六章

## 进军华南

### 转隶四野和整编部队

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处于土崩瓦解之中。为了迎接全国的胜利，党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一九四九年要解放华东、华南和西北及西南各省的大部或全部。首先集中第二野战军（即原中原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即原华东野战军）在长江下游实施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地区，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第二、第三野战军随即陆续向长江下游北岸集中，进行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我们纵队奉命由虞城经徐州、淮阴，于三月四日前出到东台县，在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的序列内参加渡江作战。

三月八日，接第三野战军转来中央军委三月五日电令，为了解放华南，我们纵队转为隶属第四野战军（原东北野战



军)指挥,部队即开往河南省商丘,并指示将我们现有部队整编为一个师,另派出一个师的干部架子到北平,接收由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七师和平改编的独立第二十四师。同时指令我和雷经天政治委员到中央军委汇报工作。

中央军委的电令向干部传达后,同志们的情绪沸腾起来了。他们说,纵队的历史使命快要实现了,两广快解放了,全中国快解放了,我们同在华南敌后坚持斗争的老战友也快要见面了。随即,我们抽调了四百余名排以上干部,组成了一个师的干部架子,由邬强、饶璜湘同志带领,从新安镇乘火车经济南转往北平,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纵队则于三月二十六日转至河南省商丘县待命。

至此,我们两广纵队告别了战斗了二十个月的华东地区,告别了哺育我们的华东人民,告别了近两年来并肩作战的华野各纵队的亲密战友,告别了我们纵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长眠在华东大地上的烈士们,踏上进军华南,解放两广的征途。我们纵队从一开始成立,即在华东各首长的领导和指挥下进行作战和锻炼,和华野各兄弟纵队在协同作战中,建立了亲密的战斗友谊,现在一旦离开,我和同志们都有惜别依依之感。回想我们这支以华南各游击纵队为基础组建的部队,经过激烈的战斗锻炼,特别是经过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大兵团作战的锻炼,从游击战过渡到正规战,从小部队作战过渡到大兵团作战,学会了运动防御、阵地防御、野战阵地进攻、城市攻坚等

作战方法，锻炼成长为一支坚强的野战部队。我们十分感激为培育我们纵队发展成长而付出了极大心血的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的首长们。

我在商丘稍事准备后，即乘汽车前往当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雷经天政治委员已由东台直接前去）。到达后，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军委接见我，听了我的汇报后对我说，你在这里休息几天，准备和中央首长一同进北平，去见四野领导同志，完成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后，带回河南与你们原有的三个团整编为两个师，然后随四野南下参加解放两广的作战。在西柏坡，我还见到了廖承志同志，是他代表党中央派我回东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自一九四二年一月他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脱险，经我们东江游击区回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后，曾被国民党反对派逮捕入狱，受到非人的折磨。经过我党多方营救于一九四六年获释出狱。出狱不久，他作为重庆三人委员会军事代表团中共方面的代表，到广州来为东江纵队北撤问题同广东国民党当局谈判，但那时我没有机会和他见面。现在，在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见到了这位老领导，我格外高兴。我向他汇报了在东江八年的斗争，和两广纵队在华东战场战斗的情况。他给了我很多鼓励。我去看望了从两广纵队调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林展、邓汀等几位同志，勉励他们，在党和军委的最高机关，在毛主席的身边工作，这是很大的幸福，一定要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切

切实实地把工作做好。我还抽空去看了我的大儿子世平，他当时在中央机关小学读书。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决定迁往北平，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和中央首长一同乘坐专列进北平，我感到非常荣幸。离开西柏坡以后，周恩来同志要我和他一起坐他专用的吉普车前往，他很健谈，谈到他大革命时期在广东工作的情况，谈黄埔军校，谈东征作战，也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景，使我深受教益。在涿县候火车去北平时，周恩来同志介绍我见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见了我就问：“你就是在广东打教育厅那个曾生吗？”我回答说：“是的”。他老人家高兴地说：“打得好”。对于一九三六年打压制学生抗日运动的教育厅，过去广东党内曾有不同的看法，现在毛主席作了肯定，是对我们的极大支持。毛主席很关心两广纵队的建设。他问：“你们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后如何编法，要官还是要兵，还是官兵都要？”我答：“主要要兵，按周恩来同志指示整编为两个师。”上了火车后，毛主席又来到我的身边，和我亲切交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就在广东工作，对广东的情况很熟悉。他考问我：“你知道你们广东是什么时候开化的吗？”我当时答不出来。毛主席说：“你们广东开化很早。秦始皇时代，广东就是秦朝管辖的地方。河北人赵佗在广东做官，他对地方治理得不错。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他乘机扩占了粤西、海南岛等地方，自立为王。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派人去见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汉朝的管

辖。”我很惭愧，自己是广东人，但对广东的历史知道得不多。全国解放后，我在广州市工作时，查考了一下。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就设置了南海郡，治所就在番禺，即现在的广州市。赵佗是河北省真定（今正定）人。秦朝时，他初为南海郡龙川令，后为南海尉。汉高祖刘邦曾赞扬过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秦末，他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国，自封南越武王。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〇六年），臣服汉朝，“奉汉约”，正式受封为南越王，因而维护了国家的团结统一。毛主席当时和我谈赵佗的故事，意思就是要我们在解放广东后，要把广东治理好，建设好。

到达北平后，三月二十五日，我被安排跟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到西郊机场参加阅兵式，检阅胜利地进行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第四野战军以及华北军区的部队。场面十分壮观。我看到了已装备了坦克和大口径榴弹炮的胜利之师，军容强大，军威雄壮，心里无限激动。联想到第四野战军不久即挥师南下，向中南和华南进军，我们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的工作和整编部队的工作必须加快进行，争取早日加入向华南进军的战斗行列。

在北平，我住在北京饭店。在那里会见了第四野战军的领导同志，他们指定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同志负责安排我们去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四月十四日，陶铸同志和我以及邬强、饶璜湘所带领的四百余干部，到了北平市郊黄村独立第

二十四师驻地，陶铸副主任代表第四野战军，宣布了团以上干部的任职。师长和各团团长仍由原来的师长、团长担任。邬强任师政治委员，饶璜湘任师政治部主任。我们派下去的团、营、连干部，不管原来担任什么职务，一律任命为政治干部。排一级，我们采取了原来东江纵队的做法，任命我们的排长为政治服务员，和排长共同领导全排。他们的军官看到我们下去的干部都是政治干部，思想就安定下来了。广大官兵知道我们是两广纵队派来的，要带领他们打回两广去，都很高兴。我们的工作方针是：（一）对士兵争取团结；（二）对排连级军官争取改造一批；（三）对团营级军官择优争取；（四）对技术军官（如医生、炮兵、工兵等军官）尽可能争取改造；（五）对政工人员一律调出。我们从进入接收到把该师带到河南的整个过程中，由于党的政策的正确，接收人员的努力工作和模范作用，以及该师师长何宝松等一批爱国军官的积极配合，工作比较顺利，没有发生重大问题。

在北平，我还见到叶剑英同志。他询问了两广纵队的情况，谈了有关解放两广的问题。很感谢他借出一辆小车给我使用，否则，在北平这样大的城市行动就很成问题。

在我逗留北平这段时间，我们纵队由商丘开到洛阳市，担任了一个多月的警备任务。五月底转移到襄城一带待命。

五月底，我从北平回到纵队驻地襄城。同时，何宝松和邬强、饶璜湘等同志率领独立第二十四师也到达许昌地区。从六月初开始，纵队党委即研究和组织实施整编工作。六月

十四日向团以上干部传达了整编方案，六月二十一日整编完毕。整编后，我们纵队作战部队为两个师四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全纵队人数增至一万三千六百余人，从而实现了在我们纵队成立时中央首长关于建立一支万余人的华南主力部队的目标。纵队炮兵团的建立，也实现了朱德总司令送给我们第一门山炮时的指示。

部队扩编了，干部职务进行了一些调整，但调整的幅度很小。第一师由我兼任师长，邬强任副师长，彭沃任参谋长，江平秋任政治部主任；第一团翟信任团长，黄凯之任政治委员；第二团黄布任团长，陈一民任政治委员。第二师何宝松任师长，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兼任政治委员，李克明任副师长（二野调来），蔡国梁任参谋长，饶璜湘任政治部主任；第四团黄明金任团长，曾源任政治委员；第五团刘培任团长，黄乃宇任政治委员。炮兵团袁庚任团长，郑定立任政治委员；教导团谢阳光任团长，郑铮任政治委员；后勤部郑少康任部长，关山任政治委员。这样的一个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的阵容，看来是保守了。由于我们纵队领导兼任了师的职务，一层压一层，加上几个师的单位未设副职，因而尽管我们的干部北撤后经过华东军大的学习提高，又经过华东战场各大战役的战斗考验，但是绝大多数团的一把手，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原职，下面营的干部提为团职的，连的干部提为营职的，也只是个别的。这样，绝大多数北撤前就是团、营、连职的干部，还是保留着原职打回广东去。

从七月七日至二十一日，纵队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团以上干部参加），首先由我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第四野战军前委的电报指示。然后，在领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的基础上，根据四野前委的电示，着重解决纵队党委内部的团结问题。我们纵队的领导成员来自各个方面，有着不同的经历，工作中难免有不同的意见。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大家都能诚恳地、平心静气地把意见摆到桌面上来，明确地找出问题的中心环节，在全体与会同志的要求与监督下，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 赣 州 决 策

四月下旬，我军胜利地发动了渡江战役，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没。但国民党的残余军队尚有一百五十万人，分散盘踞在台湾和中南、西北和西南若干省分内。在中南地区，敌白崇禧集团据守湖南、广西，敌余汉谋集团据守广东。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在第二野战军一部的协同下，歼灭中南地区的残敌。

七月上旬，我们纵队奉命渡江南下，参加解放两广的作战。七月二十四日，我们在襄城召开了南下进军誓师大会。二十五日，部队开始分批出发，向南进军。部队沿平汉路经漯河、信阳，转罗山，越大别山进入湖北省，再经河口、新州、

浠水，于黄石港横渡长江，进入江西省，然后翻越紫荆山，过南昌、樟树，于九月二十七日进抵赣州以北待命。当时纵队领导分工，部队行军由王作尧副司令员和杨康华主任率领，我和雷经天政治委员、姜茂生参谋长则乘汽车到武汉，向叶剑英同志和第四野战军首长汇报工作和参加会议。然后我和雷经天政治委员由武汉乘小轮船经九江、鄱阳湖到南昌，改乘汽车于九月八日到达赣州，参加华南分局召开的扩大会议。

在赣州，我们住在省立师范学校。九月十一日，会议正式开始。会议由叶剑英同志主持，讨论和决定了解放华南的作战计划；党政军各级领导机构的组成和干部配备；支前工作以及接管城市的政策、外交方针和对付帝国主义的封锁等问题。

在会上，我见到了方方同志。他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在沙鱼涌送我们登船北撤后，留在广东坚持斗争，担任中共香港分局（后改为华南分局）书记，和林平同志（分局副书记）一起领导华南各地的武装斗争，三年来取得很大的成绩。先后建立了粤赣湘、闽粤赣、粤桂边区党委和琼崖、粤中及西江区党委，下辖二十四个地委、九十八个县委；建立了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粤桂边纵队、琼崖纵队和粤中纵队及西江两个支队，共有武装近十万人；解放了数十个县的广大地区，解放区人口约一千三百五十万人，等于当时广东全省人口三千二百万人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并在三分之一以



上的地区,初步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民兵、农会组织,青年团和妇女的组织工作也正在开展,并开始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会议通过的《关于过去华南及广东工作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分局和各地党委,自一九四六年以来领导广东及华南各省人民在开展武装斗争及其他各项工作中所取得了巨大成绩,指出由于取得这些成绩“就使得华南敌后人民战争得以坚持下来,配合了三年来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同时又给人民解放军主力进入华南及广东作战,最后完成解放华南及广东全省的任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会议结束后,叶剑英同志接见了我和执行人粤先遣组任务的何维、卢克华、曾小芳三位同志,方方同志也在座。叶剑英同志首先详细地询问了先遣组三位同志的经历和工作情况,并亲自做了记录。然后口头交待任务。他指出:百年来我们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侮辱,广东人民对帝国主义是很仇恨的。但我们当前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而不是帝国主义,告诉广东的同志不要把对象搞错了。他还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规定我们的部队不能越过樟木头一线。最后叶剑英同志口述了赋予粤赣湘边纵队的任务,要求先遣组的同志牢牢记在脑子里,见到林平同志后口头传达。先遣组的任务交代完毕后,叶剑英同志问我,两广纵队回到广东后有什么打算?我说:遵照党的指示办。他说:广东解放后,你们可以一部分集中驻守珠江三角洲,一部分

干部和部队分散到各区去，加强各区的工作。你们驻守珠江三角洲，面对香港、澳门，对内要搞好治安，对外要加强监视，但要避免发生涉外事件。这个问题很重要，一定要抓好。

九月二十八日，广东战役联合指挥部正、副司令员叶剑英、陈赓签发了广东战役“战联字第一号作战命令”，规定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为右路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为左路军；两广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粤中纵队为南路军，指定由我和雷经天、林平统一指挥。任务是于十月二十日进至广州、虎门之间地区，截断敌人南逃的退路。

## 解 放 广 东

九月三十日，我们纵队从赣州附近驻地出发，取道信丰、龙南进入广东。南下进军以来，我今天是第一次和部队一起行军，看到指战员军容整齐，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心中无限喜悦。北撤的同志们，和参加我们纵队的两广籍解放战士们，都怀着“打回老家去，解放乡亲父老”的兴奋心情，大踏步地前进；参加我们纵队的山东、河北、江苏籍的同志们，也不甘落后，他们怀着解放全中国的雄心壮志，怀着解放两广籍战友们故乡的心情，与两广籍的同志们并肩前进。在进军途中，欣闻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特大喜讯，指战员们倍感振奋，决心加快前进步伐，出色地完成作战任务，来庆祝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诞生。十月八日，进到

了广东省和平县地区，我们终于又回到了离别三年的广东革命老根据地，回到了哺育我们成长的故乡，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从进入和平县开始，我们进军经过的集镇，群众搭起牌楼，站立在路旁欢迎子弟兵的归来，部队还未到达宿营地，群众已做好饭菜等待着。

十月九日，我和雷经天同志率纵队司令部部分人员到达龙川，与粤赣湘边纵队领导机关汇合。汇合前，人粤先遣组已与他们取得了联系，我们的电台已沟通了联络。当我们从老隆通往龙川城的大路上行进时，林平、左洪涛等粤赣湘边纵队的领导同志，在大路上等着迎接我们，我连走带跑前去，大家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兴奋、喜悦的心情难以形容。抗日战争中，我和林平等同志共同带领东江纵队的同志们，进行了艰苦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分了手，我带领北撤的同志们到了山东，林平同志带领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同志们，组成粤赣湘边纵队，奋战在华南敌后战场。现在粤赣湘边纵队已发展到八个支队、五个主力团、三个县独立团，共三万八千多人的大部队，解放了湘南、赣南、粤北、潯江和东江的江北、江南、江东及珠江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今天在华南战场上，我们这两支兄弟部队的会师，两个纵队领导机关的汇合，就意味着广东即将解放，华南即将解放，我军即将取得全国性的最后胜利。进入粤赣湘边纵队司令部驻地后，我们立即召开了南路军前委（雷经天同志任前委书记）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以两广纵队司令部作为南路军指

挥部,并确定了作战部署:第一方案,如潮汕之敌胡璉兵团西撤增援广州,两广纵队于惠阳平山地区阻击该敌;粤赣湘边纵队挺进东莞太平地区,截断广州敌人南逃退路。第二方案,如敌胡璉兵团不向西撤,两广纵队则挺进东莞太平地区,粤赣湘边纵队则迅速进入番禺以南地区,截断广州敌人南逃退路。晚上,粤赣湘边纵队司令部设便宴为我们洗尘,林平同志知道我爱吃狗肉,吩咐伙房杀狗来宴请我们。在华东,为了执行群众纪律,我们纵队下了禁令,不许吃狗肉,因此已经三年没有尝到狗肉味了。在筵席上,战友们频频举杯,为我们别后重逢,为我军即将到来的胜利,为广东、华南即将获得解放而干杯。

十月十日,南路军指挥部根据前委的决议,发布了“战字第一号作战命令”。命令由雷经天、林平和我签署,并先行电告两个纵队的各师、团立即执行。从此,我又和林平同志在一起工作,指挥南路军参加解放广东之战了。

十月十三日,南路军指挥部进抵河源。十五日,第一师直取博罗,指挥部和第二师进驻惠州城。十七日,获悉国民党军第一〇九军第一五四师在博罗县的龙华墟一带。当即命令已渡过东江向樟木头前进的第一师和粤赣湘边纵队第六团回师北上,从南面和东面包围该敌,同时命令第二师第四团、第五团和纵队炮兵团,在第一师统一指挥下,从北面和西南对该师加以包围。部队开进中,第一五四师少将副师长郑荫桐派员前来联系,声称该师已向华南分局联系起义

事宜。我们当时因情况不明，即令该师收缩于龙华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以待上级命令。而我各师、团仍继续执行原作战计划，于十八日黄昏前完成了包围部署。二十日，广东战役联合指挥部来电指示，由我们纵队按和平解放方式接管该师，随后改编为独立师，仍由郑荫桐任副师长，我们派曾源同志去担任政治委员，叶基同志去任参谋长，归两广纵队指挥。

十月十九日，第二师占领虎门要塞。至此，敌人沿珠江南逃的通路被我截断，战役联合指挥部赋予南路军的任务胜利完成。

十月二十一日，指挥部和第一师进驻石龙。根据华南分局指示，雷经天政治委员、姜茂生参谋长和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江平秋、第四团团团长黄明金等一批广西籍的干部，率领第二师第四团第一营调离两广纵队，进军广西，参加广西的解放和建设工。作。

在我南下大军的迅猛进击下，原驻东江地区的敌军，除第一五四师于龙华墟和平解放外，其余均逃往中山县境。查悉，敌第一〇九军军部率第一九六师集结于唐家湾，第三二一师、保安第三师和第五师集结于前山、南屏、三灶等地。

这时，我们纵队奉命与粤赣湘边纵队组成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我为司令员、林平为政治委员、王作尧为副司令员、严尚民为参谋长、邬强为副参谋长、杨康华为政治部主任、刘田夫为政治部副主任，并根据华南分局决定，由上

述七人组成前委，我被指定为书记，统一指挥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和珠江三角洲地方部队，担负歼灭珠江三角洲残敌，肃清土匪，协助地方建立人民政权，并征筹粮食，接济广州市和支援西进部队。

十月三十日，我们纵队及粤赣湘边纵队第四支队，从东莞县太平镇乘船西渡珠江，十一月一日抵中山县石岐镇。二日晨，第一、第二师在邬强副参谋长统一指挥下，向南挺进追歼残敌。三日晨，我完全控制前山、坦州一线，敌第一〇九军等部已于我进入中山县以前乘船逃走。四日，我全歼南屏、湾仔敌保安第三师未及逃走的一个多营、击沉、击伤敌舰船联益号、清远号等三艘。十三日，攻占横琴岛，歼敌一部，缴敌运输船海宁号及一船武器弹药。六日，留驻宝安县的炮兵团攻占大铲岛全歼守敌。粤赣湘边纵队独立第一、第三、第四团在严尚民参谋长统一指挥下，从容奇经江门南进，三日攻占斗门，全歼守敌；十一日进占三灶岛，敌人逃走，缴轻型轰炸机一架。至此，我们进军珠江三角洲，消灭残敌的任务基本结束。回顾这一阶段的作战，虽然解放了珠江三角洲广大地区，但战果不大，未能抓住敌人，被它跑掉了。主要原因是我们纵队在完成作为广东战役南路军的作战任务后，奉命调整指挥机构，在东莞县停留了一句。如果在和平接管第一五四师后，立即挺进中山县，就有可能抓住敌人第一〇九军的个把师。

一九五〇年，我们纵队继续参加珠江地区沿海岛屿的

作战。一月六日，我第二师第四团并指挥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新编独立第三营，在炮兵团的支援下，对宝安县的三门岛进行登陆作战，全歼守敌国民党“人民革命军”挺进第一纵队。这是我军第二次解放三门岛。第一次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东江纵队海上独立大队从日本侵略军手上解放的，并一直坚守到北撤。从五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我们纵队炮兵团协同江防舰艇部队，支援第四十四军第一三一师，进行了解放万山群岛之战。十二月七日，炮兵团在江防舰艇的配合下，以警卫连和工兵连为突击部队，一举攻占敌人在广东沿海残存的最后的一个小岛——蚊尾洲，全歼守敌。至此广东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我们纵队自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于黄河之滨的河南襄城誓师南征，参加广东战役，挺进珠江三角洲而达南海之滨，行程近万里。进入广东以后，与兄弟的粤赣湘边纵队并肩战斗，截断了广州敌人南逃退路，解放了东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广大地区，共歼敌五千一百三十五人，缴各种炮八十六门、轻重机枪三百四十五挺、各种枪三千二百五十三支，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我们这支队伍中，原来东江、珠江、粤中等抗日纵队的同志们，在离别了三年多之后，随着战斗的胜利发展，又回到了可爱的家乡，会见了过去长期斗争中艰苦与共的人民群众和老战友，共享胜利的喜悦，感慨万分。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五〇年

六月,经过了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解放了除台湾省以外的全部国土,彻底摧毁了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在解放战争期间,党组织赋予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率领以东江纵队为主的华南各抗日纵队的骨干北撤山东解放区;在山东组建华南人民武装的主力部队——两广纵队,并在华东战场锻炼提高,然后率领两广纵队南下,参加解放华南的作战。因而我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是和两广纵队的斗争密不可分的。

两广纵队是遵照党中央解放华南,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意图,在解放战争期间,于华东战场建立的部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革命队伍。它是两广人民的子弟兵,它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野战部队。两广纵队成立后,在中央军委、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和华南分局的领导和指挥下,参加了华东战场的内外线作战,参加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和伟大的淮海战役,以后渡江南征,参加了广东战役和挺进珠江三角洲消灭残敌及解放沿海岛屿,英勇顽强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共歼敌一万九千五百四十七人,缴获坦克八辆、大小炮二百七十九门、轻重机枪一千一百二十八挺、各种枪三万二千一百七十六支。两广纵队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由南到北,由北到南;由游击队到正规部队;由游击战到运动战、阵地战;由小部队作战到大兵团作战的过程。

两广纵队所以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这样大的进



步,我深刻地认识到首先是由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华东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及华南分局首长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党中央和华东局为了组建两广纵队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准备工作。安排北撤指战员进入华东军政大学和华东党校学习提高,并由华东军区培训了机关的参谋和专业人员,为组建两广纵队打下了基础。从八路军、新四军调来一批团以上军政干部,加强两广纵队的领导力量。补充了解放区参军的翻身农民和两广籍解放战士,组建了作战部队。确定了艰苦奋斗,靠自己的努力,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原则,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接见了我们纵队的主要领导干部,给予重要指示。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的领导同志给予热忱的帮助。华东野战军首长对我们纵队的成长和发展更是倾注了心血。两广纵队进军华南后,又得到第四野战军,特别是华南分局首长的关怀和指导。正是由于有了领导上这样亲切的关怀和正确领导,两广纵队才得以较快地顺利地发展成长起来。

其次,是我们纵队注意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我们纵队各级党委,都是坚强的领导核心,各个连队的党支部,富有在抗日战争中独立作战的经验,在战役、战斗的重要关节,都能发挥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带领指战员去战胜困难,战胜敌人。党员都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哪里战斗

最激烈,情况最危急,哪里就有党员带领战士们英勇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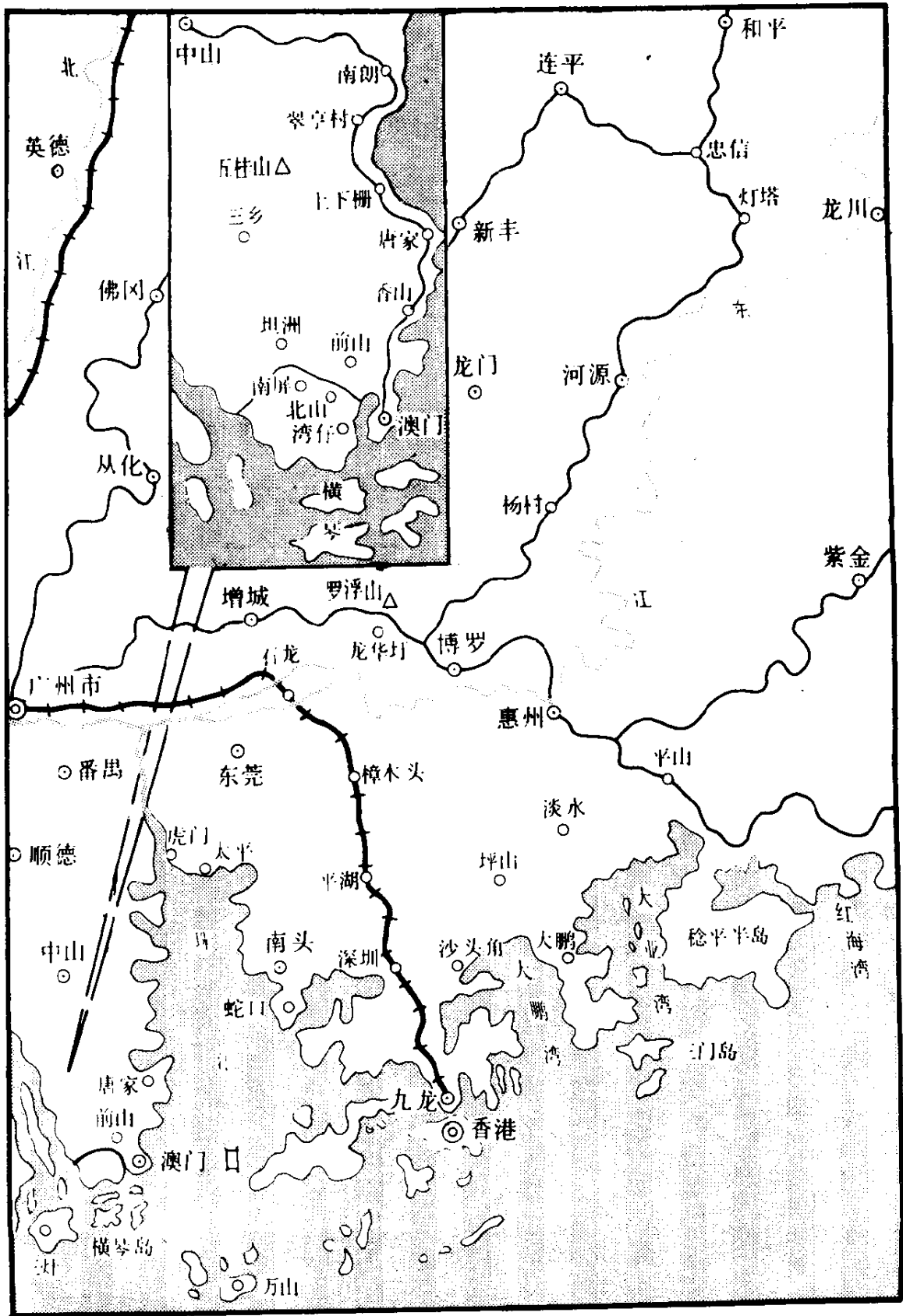
第三,我们有坚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作保证。华南各抗日纵队在坚持敌后的斗争中,就有优良的政治思想工作传统。纵队成立后,经过学习和实战锻炼,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又有了发展提高,各级政工干部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教育工作,使北撤的指战员、新参军的农民战士、解放战士,树立正确的思想信念,为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第四,广大人民群众和地方政府对我们纵队的大力支持。山东解放区的人民群众象爱护自己亲子弟一样爱护我们这些来自南方的指战员,华东地区各级政府对我们给以了热情的爱护和关怀。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我们要完成作战任务是不可想象的。

坚决服从党的正确领导;取得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全体同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和勇于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这就是我们两广纵队能够较快地成长发展和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经验教训。

# 广东中部地区略图

(图十一)



## 第十七章

# 坚守祖国南大门

### 进驻珠江三角洲

我和我的战友们率领两广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进军珠江三角洲，完成消灭残敌的作战任务后，部队集中在中山县，领导机关设在石岐镇，等待新的任务。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广东军区成立，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陈光、洪学智任副司令员（洪兼参谋长），我也被任命为副司令员（仍兼两广纵队司令员），赖传珠、林平、冯白驹任副政治委员，肖向荣任政治部主任，孔石泉、杨康华任副主任（杨仍兼两广纵队政治部主任），王作尧任江防指挥部副司令员（仍兼两广纵队副司令员）。

一九五〇年二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决定以两广纵队为基础，和粤赣湘边纵队第四支队及原第六军分区四个团合编成立珠江军分区。两广纵队番号仍保留，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撤销。我兼任了珠江军分区司令员和

政治委员，王作尧兼任第一副司令员，彭沃任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兼任第一副政治委员，陈祥任第二副政治委员，饶璜湘任政治部主任。两广纵队第一、第二师的番号撤销，下辖的四个团改为珠江军分区独立第一、第二、第四、第五团（后又改为独立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团）；独立师、炮兵团、教导团均改属珠江军分区。珠江军分区还管辖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三水、花县、东莞、宝安等八个县大队，全部兵力共二万六千五百余人。同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还任命我兼任中共珠江地委书记。这样，我在珠江地区，一身兼任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地委书记三职。一方面我深感到党组织对我的信任；另一方面，更感到责任的重大。我牢记一九四八年刘少奇同志在西柏坡对我的教导：要听党的话，党交给的任务要尽最大努力把它干好。

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赋予我们的任务是：肃清土匪、特务和反动地主武装，保护河道航行安全，巩固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严密封锁海边防，监视港澳英葡的行动，禁止粮食外流和港澳人员涌进；建立各级政权和群众组织，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总的来说，上级赋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守卫和建设好祖国的南大门——珠江三角洲。

## 巩固海边防

珠江三角洲地处广州外围，滨临南海，面对香港、澳门，是祖国的南大门。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是广东省的一个粮仓。区内河流交错，珠江口外岛屿星罗棋布，地形复杂。在历史上，这里是帝国主义侵略最早，阶级敌人统治强大，土匪为害最深的地区。解放前数十年来，这里号称“大天二”的大小股匪，同各个时期的反动统治者、外国侵略势力和地主恶霸互相勾结，横行乡里，强取豪夺，打家劫舍，鱼肉人民。（“大天二”的得名，来自赌具天九牌。在天九牌中，天牌十二点红黑各半，最大；地牌二红点，次之。“大天二”就是割地称雄，霸占一定地盘，进行打劫勒索的意思。）广大劳动群众在官、绅、匪层层压迫和剥削下，处于痛苦的深渊。我南下大军解放了珠江三角洲，消灭了国民党的正规军，但大小股匪仍散处广大农村，未受打击。据统计，大股土匪有二十六股，小股土匪有九十七股，共约有一万二千人。大股土匪装备有小炮、轻重机枪、电扒（电动小快艇）等。主要在中山、顺德、番禺等县活动。这些股匪，大部为国民党特务所控制，并与国民党军撤退时组织的地下武装、乡村封建势力相结合，有一些还受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操纵，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地下武装力量。他们依恃在这个地区长期盘踞，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采

取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公开对我袭击,时而隐蔽潜伏等手法和我斗争;并采取各种手段威胁农民群众,或派人打入我基层组织等,来和我们争夺广大农村的控制权。

叶剑英同志非常重视珠江三角洲的工作。每次见到我时,他都详细询问我们的工作情况。他指示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迅速剿灭土匪和国民党地下武装,肃清特务,巩固边防海防。珠江三角洲的匪特不除,广州就不得安宁。而要根绝珠江三角洲的匪特,就必须切断他们和港澳的联系。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叶剑英同志在欢迎港九观光团的晚会上指出:“今天珠江三角洲的特务、土匪,就利用港澳来买枪械,潜匿逃捕,而肆虐于珠江三角洲。因此,解决三角洲的治安问题,是巩固广州秩序的先决条件。”

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五日,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在中山县石岐镇召开了军事会议,研究和部署清剿土匪的战斗,参加会议的有各师、团参谋长或军事副职和机关科以上的干部。会议的目的在于:分析珠江三角洲敌我斗争的形势;研究对敌斗争的政策、策略和方法;分析存在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研究兵力部署和各部队的任务等。会议开始,先由我传达华南分局和叶剑英同志的指示。华南分局的指示指出:“广东解放后肃清土匪是开展广东工作的首要任务,必须在三个月左右时间内肃清大股土匪。”我还谈了我们部队进军珠江三角洲以来的概况和当前的敌情及匪情。接着,王作尧副司令员介绍了珠江水域敌我海军的情况;严尚民

参谋长介绍了匪情特点；杨康华主任作了有关政策的讲话。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结束时，经前委研究后，由我作了总结发言，要求各部队克服困难，努力完成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赋予我们的任务，并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兵力部署：珠江以西，中山、顺德、南海、番禺等县，以两广纵队第一师（附两个山炮连）和粤赣湘边纵队第一、第三、第四团及第四支队等部驻守；珠江以东，东莞、宝安等县，以两广纵队第二师、炮兵团（缺山炮两个连）和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第三团等部驻守。各部队所有马匹组成骑兵队，担任陆上交通线上的巡逻任务，严密封锁，禁止粮食资财外流。沿江河各镇驻军设检查站，监视来往船只，发现走私和偷运粮食出口船只，一律扣留查处。江防指挥部位于石岐镇，以八艘舰艇组成两个巡逻分队，在珠江和内河航道巡逻，负责护航和水上封锁。

（二）各团应在限期内剿灭辖区内的的大股土匪；深入发动群众，组建区乡民兵队伍，进行武装自卫和配合部队清匪肃特；区别对待政治土匪（有国民党特务在幕后操纵和指挥的土匪，或匪首与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的地方当权派武装）与经济土匪，匪首与匪众，土匪个人与其家庭成员；开展政治攻势，大力宣传我军胜利形势和对土匪的政策，分化瓦解敌人；派出干部掌握和改造愿意维持地方治安的地主武装，收缴反动地主武装的武器；党政军民组成治安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种自卫武装，编练愿意接受收编的土匪队伍。



(三)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克服指战员中要求调动或到其他地区工作的思想倾向;树立胆大心细,机警敏捷,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作风;在剿匪中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群众纪律和缴获归公的纪律。

(四)各团、各区普遍建立情报网,加强侦察工作,切实掌握好匪情;有条件的团应建立有十多艘汽船的水上部队,学会水上作战,密切水陆配合,进行水陆联合作战。

会议的精神向部队作了传达,和进行了政治动员后,经过讨论学习和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指战员们的情绪安定了下来,各师、各团进入了规定的位置,开始了清剿土匪的战斗。开始时,剿匪的势头并不大。这是由于我们对匪情的严重性认识还不足,加上国民党军仍占据着伶仃、万山群岛,在沿海进行骚扰;帝国主义在边境的挑衅还时有发生;区内城乡水陆交通还有待恢复;县区人民政权刚把架子搭起来,工作尚未走上轨道。因此,我们部队的重点首先是巩固海边防,和恢复城乡交通,尤其是各县至广州市的水陆交通,并大力的协助县区政府突击征粮,以支援广州市和西进兵团,而直接用于剿匪的兵力并不多,对土匪的打击还不够有力,到二月底才一共歼灭土匪一百四十四人。

进入三月分,粤赣湘边纵队各独立团他调,珠江军分区成立,两广纵队进行整编,剿匪工作因而放松,几乎陷于停顿。三月二十六日,珠江军分区召开了各团、各县大队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剿匪会议,统一了思想,重新研究了剿匪部

署。我代表军分区党委常委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强调了主力实行地方化和发挥工作队的作用。根据匪情重新部署了兵力,把剿匪重点首先放在珠江以西、番禺以南各县。实行包干制的剿匪方针,给各团划分了包干责任区,第一团于中山县第九、第十二区和第一区港口乡,第二团于中山县第五区和第一区一部,第四团于番禺县南部,第五团于中山县第八区和新会边,独立师于顺德县,炮兵团于中山县第四、第六区。各县大队也划分了包干责任区。各团、各县大队在划分的责任区内,实行“四包”,即包消灭土匪,包发动群众,包建立乡村政权,包执行政策纪律。既当战斗队,又当工作队,还要分出百分之十的兵力搞生产,当生产队。

各团、各县大队认真传达了会议的精神,深入进行政治思想动员,提高了指战员的认识,并以营、连、排甚至班为单位区分了包剿区,大张旗鼓地开展剿匪立功运动,掀起了剿匪的高潮。四月一日,在军分区统一号令下,全分区统一行动,向土匪展开了全面的进剿。指战员们斗志旺盛,行动积极,在地方党和政府的积极支持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经过两个月紧张的军事进剿和政治瓦解,土匪在我军强大的军政攻势下,开始土崩瓦解,股匪减至五十股,约仍有六千人,大股土匪基本肃清。这样,珠江三角洲长期以来的严重匪患基本上消除,社会治安、革命秩序由平稳逐渐走向好转,城乡水陆交通畅通无阻。但是,匪患并未根绝,他们变换了与我斗争的方式,采取分散潜伏,保存力量,伺机卷土重

来的策略；一部分打入我内部，特别是生产部门和群众组织；一部分以暗杀、放毒等手段，进行破坏活动。

五月下旬，珠江军分区再次召开了有各团、各县大队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剿匪会议，总结近半年来剿匪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进一步剿灭土匪的办法。接着，全体与会同志参加了中共珠江地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六月二日，我在会议开始时，代表地委常委作了珠江地区半年来工作的总结报告。在报告中，我根据军分区剿匪会议上同志们谈的经验和军分区综合的资料，为了根绝珠江三角洲的匪患，谈了八点意见：

（一）驻剿与机动出击相结合。在剿匪初期我们只驻剿，而不机动出击，土匪掌握了我们的行动规律之后，转向我无部队驻扎的地区活动。今后应抽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经常机动出击。

（二）进剿与发动群众相结合。部队在驻剿地区要组织剿匪工作队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特别是对土匪长期活动而有深固基础的地区。

（三）进剿与便衣侦缉相结合。在我大力进剿下，股匪分散潜伏，隐蔽活动，进剿部队以便衣侦察或伪装土匪侦缉，屡有成效，以后要继续采用。

（四）陆上清剿与水上出击相结合。珠江三角洲的土匪在水上活动极为猖狂，我们虽然装备了三个连的船队，但仍不占优势，还必须缴获和没收匪船建立强大的水上部队，结

合陆上清剿，消灭水上活动的土匪。

(五)部队与地方要密切结合。前段剿匪，凡是部队与地方结合得好的，就有成绩，如南海县。有的县结合不好，成绩就差。今后要更加密切配合，深挖匪根。同时，对非法武装的处理，部队和地方在认识上、步骤上要取得一致，克服过去的一些不协调的现象。

(六)包干制与消灭边沿地区土匪相结合。前段剿匪的实践证明，划分地区负责清剿的做法已有成效，但土匪利用各部队的接合地区或边沿山区活动。因此，各部队除继续执行包干制外，还要密切协同作战，加强接合地区和边沿山区的清剿行动。

(七)全面进剿与重点使用兵力相结合。珠江三角洲东南地区毗邻港澳，土匪活动最猖狂，他们利用港澳取得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的供应和逃避我之清剿。因此，我们首先是把兵力重点使用于东南各县，切断土匪与港澳的联系，以根绝匪患。目前东南地区股匪已基本肃清，可以把主要兵力逐渐向西北地区转移。

(八)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前段剿匪，在大力进行军事进剿的同时，大力进行了政治攻势，宣传解放海南岛的胜利和我们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土匪纷纷向我自新；并运用治安委员会的组织，改编自新投诚的土匪，取得瓦解土匪千余人的成绩。以后还应这样做，但要防止土匪利用治安委员会的名义，进行招摇撞骗。

各部队根据会议的精神和对剿匪工作的要求，又进行了三个多月艰苦细致的清剿斗争。到八月底，大股土匪全部被消灭，小股土匪尚余四股，共三十八人。此外，部分土匪逃往港澳，部分土匪仍潜伏在我基层组织和边远农村。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剿匪斗争又出现了反复。一九五〇年九月，美国侵略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同时英葡军舰、飞机经常侵扰我华南的领空、领海，造成海边防的紧张状态。珠江军分区的兵力部署，奉广东军区的命令作了改变。除第十四团（原第一团）的两个营和各县大队的部分兵力，继续执行剿匪任务外，其他各团和县大队的部分兵力，全部转为担任海、边防的任务。这时，逃往港澳的一些土匪又潜回珠江三角洲与潜伏的土匪会合，乘机再起活动，由四股三十八人上升为三十四股五百八十五人。十二月，珠江军分区召开了各团参谋长会议，决定重新组织兵力，继续进行全面清剿。这样，在一九五一年这一年中，一方面由于我们分区部队的反复清剿和政治攻势，匪数不断减少；另一方面匪情也不断反复，因此全年共歼灭土匪三千七百九十四人。到年底残存的土匪四股四十人，已不能在中心地区立足，只能在边沿地带流窜。至此，珠江三角洲严重的匪患基本肃清，土匪在乡村中横行霸道，在城镇里打单勒索，谋财害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社会治安空前良好，革命秩序完全确立。广大人民和港澳同胞对此非常称赞。在两年来的剿匪作战中，我们总共歼灭土匪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九人，其中俘

虏的五千二百零二人，自新和投诚的七千二百零四人，缴获（包括收缴黑枪）大小炮一百五十四门、长短枪二万七千四百三十五支、轻重机枪和冲锋枪八百四十四挺。部队涌现出功臣一千六百二十七人。在剿匪战斗中，我军共伤亡八十三人，其中负伤六十一人，牺牲二十二人，第一团第三营营长邓发同志光荣牺牲。

我们在一方面以珠江军分区部队为主，大力进剿股匪和清剿散匪的同时，另一方面以公安部门为主，大力进行肃清国民党特务的斗争。珠江三角洲解放后，国民党潜藏的特务与土匪相勾结，猖狂进行破坏活动。帝国主义侵朝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为实现其“反攻大陆”的梦想，又派遣特务潜入我区加强活动。在一九五〇年的一年中，杀害我地方工作人员九十七人，伤四人，破坏公路桥梁八座。

为了与特务作斗争，我们专门召开了全区的公安工作会议，研究加强公安工作。一九五〇年，在公安干警的努力下，共破获了特务案一百一十三宗，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嚣张气焰，保证了我地方工作人员的安全和交通运输的畅通。

在清匪肃特的同时，我们还在宝安县和中山县建立了边防管理委员会和边防部队，将大门看管起来，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把沿海千余艘渔船和六千多渔民组织起来，加强边海防的建设，以捍卫祖国的南大门。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激烈进行，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

党军不断以小股兵力，搔扰我东南沿海各地。因此，加强祖国南大门的边防海防，准备粉碎敌人各种可能的进攻和袭击的任务，又摆到了我们的面前。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军分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包括县大队干部）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加强边防海防和扩军等问题。我在总结发言时，根据广东军区的指示和同志们讨论的意见，就军事行动的指导思想 and 具体部署，讲了十个问题：

（一）敌人小规模进攻或袭击我沿海和岛屿时，我防守部队必须坚决反击，予以歼灭。如敌人大规模进攻时，我防守部队必须坚守阵地消耗敌人，阻止敌人前进。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国防的南大门，如不能坚守，广州就直接暴露在敌人进攻的面前。不论大打或小打，我们都必须坚守。基本上是防御战，但在战斗上要采取进攻战，决不容许敌人占我寸土。我们要有全局观念，如果我们不能坚守，就要影响全省；宁可牺牲我们的局部来保存全局，以局部的牺牲来争取全局的安全。我军分区武装是全省的一个小部分，以小部分的牺牲为全省争得时间，完成兵力动员和作战准备，就是有牺牲也是光荣的。否则虽然保存了局部，而伤害了全局，也是不光荣的。这一指导思想，党政军民都要深刻认识，贯彻下去。

（二）防御部署必须有重点，要分开主要地区和次要地区来部署兵力火力，在必须坚决固守的主要地区，应部署足够的兵力；在一些次要地区，主要用炮火来控制。

(三)海岸和海岛防御,必须争取把敌人消灭在滩头阵地前面。因此,必须很好运用炮火的威力,但也不是处处摆炮,而是根据敌人可能登陆的主要方向,有重点地部署火炮。

(四)解决任务与兵力的矛盾。目前我区兵力少,防守正面宽,海岛遭受敌人进攻的可能与危险性大,应如何补救呢?我们认为只有从县大队抽调兵力,首先要抽调兵力到海岛上去,思想要打通,共同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

(五)加强防御工事和演习。党政军民都应动员起来参加防御工事的构筑,多设暴露伪装工事,以吸引和消耗敌人的火力。各地区和海岛的防守部队应演习在各种情况下的反击战。

(六)守备部队要与海军江防部队密切配合,但要注意,我们不能对江防部队要求太高,因为江防部队的旧成分多,还没有很好改造,今天他们能参加守备已属不易。

(七)海岛守备部队本身要留有机动兵力,由于海上交通困难,海军少,因此不能依赖大陆机动兵力去支援。同时对各类船舰性能及火力控制等,要详细研究,并加强通信工作及注意保密工作。

(八)守备部队本身要充分进行政治动员,提高战斗意志,要把本身任务和保卫祖国南大门的光荣任务联系起来,树立必胜的信心。

(九)土匪还没有全部肃清,今后军分区应以防守边防



海防为主兼顾剿匪。由于主力团担负任务大，防守正面宽，今后剿匪主要依靠县大队和地方发动群众清剿。

(十)扩军备战。根据广东军区的规定，我军分区要新建三个甲种团，需兵员九千人，各主力团缺额，尚需六千人；县大队尚缺三千人，到明年二月底，要调出一千人；军分区教导团应经常保持千余人。这样，我们要完成两万人的扩军任务，要求在明年六月底前完成。任务分配如下：五个大县（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东莞）各负责扩军一千八百人；三个小县（三水、花县、宝安）各负责扩军八百人；余下的六千六百人由军分区机关负责完成。

会议精神和任务在部队传达后，深入地进行了政治动员，指战员们群情激奋，斗志高昂，决心在保卫祖国南大门的战斗中立新功。

## 建设人民政权

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建设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必须建设好民主政权和广泛的群众组织。今天我们要完成守卫南大门的光荣任务，也必须把各级政权建设好，把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发动和组织珠江三角洲的千百万群众，支援和参加斗争。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是首先派出民运工作队发动群众，组织起各种群众组织，然后再由下而上地建立各级

政权。现在情况不同了，解放大军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力量，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级政权。我们要先从部队和地方党抽调干部，并吸收知识青年和旧政权的部分工作人员，首先把县区政权建立起来。

县区政权建立以后，立即投入支前工作，征集了十万担大米和七十多艘船支援西进兵团。随之通过春耕渡荒、防洪救灾、退租减租等工作和斗争，发动和组织群众。据一九五〇年底统计，全区先后建立了农会三千八百八十八个，会员四十三万六千余人；妇女会二百四十一个，会员四万零七百余；工会二百五十五个，会员四万七千六百余人；青年团六千余人；民兵三万八千八百余人。

由于参加县区政权工作的同志大多数来自部队，对政权业务生疏；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和留用的旧人员也相当多，在工作中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普遍存在；侵犯中农和华侨的利益有所发生，因而影响了党群关系。为了解决上述的存在问题，地委决定从一九五〇年六月下旬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总结工作。全区参加整风的干部有二千九百五十七人，占全部干部的百分之七十二。通过整风，改善了上下级关系，团结了内部；对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不良作风，纠正违反政策的做法，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是，在部分干部中又产生了工作中缩手缩脚，怕犯错误的消极现象，经过教育后有所克服。结合总结工作，进行整风和不断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是对政府工作

人员进行思想作风建设的好方法。

珠江地区在发动和组织农民，建立农村基层组织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五〇年一月至三月。这个阶段农村的敌我斗争异常尖锐。土匪、特务从分散潜伏到公开集中，勾结地主、富农控制广大农村。他们主动向我进攻，抢仓暗杀，造谣破坏，煽动叛乱。我们虽然开始建立县、区的人民政府，但在乡以下的基层全是空白。加上我们工作人员在征粮工作中没有认真发动群众，在执行政策上又产生一些偏差，因而农民对我们仍抱怀疑观望的态度。在这一阶段靠命令主义建立起来的农会和民兵，存在着严重的组织不纯。其中老区的农会和民兵，一般素质比较好，发展了一些新成分。而在新区则多数是地主、富农和匪特，迎合我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为掌握我基层组织而建立起来的。经过合理负担斗争后，农民对我党的政策逐渐有所了解，开始敢于接近我们。因而，此时建立的农会和民兵也比较可靠。

第二阶段：从一九五〇年四月至六月。这一阶段，土匪在我军全面进剿下，其反革命嚣张气焰被打了下去。党和政府领导农民进行退租运动，展开了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全区直接参加退租运动的农民有十四万多人，退租所得的稻谷有十四万多担。经过退租运动，农民的阶级觉悟有了提高，更加靠近我党和人民政府。番禺县龙岗的农民在退租后高喊“共产党万岁！”有一个农民说：“我几贵（再贵）都要买幅

毛主席像返屋企(回家)挂起来”。农民初步发动起来了,建立了一批成分比较纯、比较可靠的农会和民兵。但由于发展过快,有一部分新建立的农会和民兵的成分还是比较复杂。尽管如此,我们开始在新区控制了部分农村。

第三阶段:从一九五〇年七月至十二月。在这一阶段,干部通过整风运动,改善了党、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剿匪肃特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反革命势力被大大削弱了。各县普遍召开了两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在这些代表会议上,讨论了肃特治安,减租反霸,完成公粮、公债任务等问题。通过农民代表会议,进一步密切了党、政府和农民群众的关系。党和政府又领导农民进行秋季的减租运动,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在这个形势下,我们对农村基层组织采取了不断整顿的方针:一方面,清除不纯分子,改造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农会和民兵组织;另一方面,发展新的农会和民兵组织。在这基础上,建立和改造了二百三十六个乡政权,二千六百四十八个村政权。我们在广大农村,开始树立了政治优势。

总的来说,我认为珠江地区农民的发动是比较慢的,但也是合乎规律的。当然,如果我们地委领导上抓得更紧些,工作做得更好些,政策上少出些偏差,是可以发展得更快的。一九五〇年底,广东开始进行土改试点工作,一场大规模地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在广大农村树立贫下中农政治优势的斗争拉开了序幕。

## 发 展 生 产

珠江三角洲地区虽然是鱼米之乡,富甲南粤,人民向来勤劳节俭,但是,解放前在外国帝国主义、国内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资本家和土匪的重重剥削和抢掠下,广大贫下中农和工人都过着贫困的生活。我们党的地委、县委、区委和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后,春耕迫在眉睫,广大农民面临着缺种子、缺肥料和缺口粮的威胁,部分工人失业,急待救济。党和人民政府竭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人民群众克服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全区发放了春耕农贷谷八万九千多担,蔗贷十三亿五千万元(旧人民币,下同),蚕贷二十四亿元,肥贷一百二十多万斤,失业工人救济粮十三万多斤,老区救济粮一万二千多斤。同时我们的部队还节约粮米,救济驻地的贫苦人民。我们的口号是:“不荒一亩田,不饿死一个人”。

这点救济粮款,虽然数量不太多,但它解决了广大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燃眉之急。接着,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又带领农民进行退租运动和发动社会互救(共得谷六十二万五千余斤,人民币三亿多元),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春荒和春耕生产的困难。

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不理人民死活,水利失修。一九四九年珠江区发生了严重的水灾,仅三水、南海、顺德三县共溃堤四十五条,缺口八十个,塌卸一百三十处,损失农作

物八十四万二千余亩，房屋倒塌三百二十座，受灾人口三十万。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在协助群众渡过春荒，胜利开耕后，又领导群众全力投入兴修水利的斗争。三水、南海、顺德三县人民深受洪水之害，积极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掀起了群众性的兴修水利热潮。三水县四十一万多农民上堤，南海县保证今年不崩一条堤围，顺德县实行群众性的“一椿一包”运动，三县共修堤围一百一十七万三千多土方，保证了全年不出险情，保护了一百七十万九千多亩农田，受益人口一百一十八万一千多人。此外，东莞县农民兴修了怀德水库，花县农民建设了清潭村水利工程，灌溉农田一万六千多亩，中山县第二区军民治理了横河水利。

经过生产渡荒，兴修水利，珠江区农民胜利完成了夏收、夏种，夺取了全年的好收成。广大农民夏收、秋收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减租运动，获得了利益，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南海县大沙村农民说：“今年割了禾，谷顶到楼板，真开心。在旧时割了禾，一船船谷都被地主撑了去，就算把谷担回家，也被土匪强借或抢光。放下镰刀就没有米煮。”

在工商业方面，各县进行了工商登记和改组各行业同业工会，成立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同时，进行公私关系的调整，扶助正当的工商业发展。若干行业签订了劳资集体合同，并成立了劳资协商委员会，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帮助资方克服困难，发展生产。

由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珠江区一九五〇年的财经任

务超额完成。税收折合米三百二十二万担，超额一百四十万担。全年征收公粮原配额五百一十八万七千担，征收到五百三十万七千担，超额十二万担。公债也超额完成五万份。

珠江区超额完成财经任务，对于加强守卫祖国南大门的经济实力意义重大。这是上级党的正确领导和我们全体干部的努力，以及全区人民积极支持的结果。尤其是在秋征中，任务大，人员少，全体征粮干部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确保秋征任务的超额完成。

一九五二年春，第十五兵团调走，广东军区改组为华南军区，叶剑英同志任司令员，谭政同志任政治委员，吴克华同志任参谋长，肖向荣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被任命为副参谋长。三月下旬，我离开了珠江军分区和中共珠江地委，到广州参加华南军区的筹建工作。

## 新的岗位

全国解放后，两广纵队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野战部队，和作为解放两广一面旗帜的历史使命也就胜利完成了。那么，两广纵队在建国后担负了什么任务，它的广大指战员被调派到哪里去了呢？这里要交代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和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一九四九年三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而且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工作队的作用更增加了，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为工作队。同年十二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布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解放军要担负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任务。

两广纵队打回广东以后，按照叶剑英同志在赣州所确定的“一部分集中，一部分分散各区”的原则，大部分干部和部队集中在珠江军分区，保卫和建设珠江三角洲；此外，除了一部分干部和部队已先和雷经天同志一起调往广西外，又先后奉命调出大批干部到广东军区的南路、西江、江门、北江、东江、兴梅和潮汕等军分区，担任军政领导职务和部队机关的领导干部，以加强各军分区的建设。

在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越过“三八线”，并继续向中朝边境鸭绿江和图们江进犯，同时以空军轰炸、扫射我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朝鲜人民处于危急之中，我国安全也受严重威胁的严重时刻，党中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两广纵队的指战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两次接受了抗美援朝的任务。第一次以原第二师第四团第二营为基础，和自愿报名的同志组成一个加强营共七百九十八人；第二次以第四团全部二千二百人，先后开赴朝鲜前



线,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同美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建国以后,我军即开始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随着抗美援朝的进行,我军更加快了现代化的建设步伐。两广纵队先后抽调了六千三百余人参加我军现代化建设,其中干部一千一百三十一人,参加组建广东江防指挥部及其辖下的江防部队,和海军万山水警区、炮兵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团、海岸炮兵团、广州防空司令部、空军航空兵第十八、第二十师等部队。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各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开展,需要大批干部和人材。根据国家的需要,两广纵队先后奉命调到地方和政府各部门工作的干部共一千零四十五人。其中师级以上干部八人,团级干部六十一人,营级干部一百四十三人,连级干部二百八十二人,排级干部五百五十一人。此外,第一师第二团(缺第二营)全部调到林业工程师,开赴高雷地区种植橡胶。

两广纵队的干部和战士们,奉命分别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执行新任务以后,各自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在党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努力工作,艰苦奋斗,联系群众,联系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不懈地努力奋斗!

## 第十八章

# 在海军的日子里

### 学员生活

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当时我任华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受命带领中南军区赴朝学习团,从武汉出发,到了朝鲜。全团有四十多人,住在上甘岭地区的志愿军部队里。第五次战役之后,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伪军妄图争取有利于他们的停战协定,不断发起所谓“局部攻势”(其中包括大规模的夏季和秋季攻势),战斗异常激烈。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军指战员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坑道工事,用“零敲牛皮糖”的战术,打了许多小歼灭战,给了美伪军以沉重打击。接着,美国侵略军对朝鲜北方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化学战、细菌战、大规模战略轰炸等,同样被中朝两国军队和人民所粉碎。

我们去后就住在坑道里,亲眼目睹了指战员们在极其

困难的条件下,创造的各种各样歼灭敌人的打法。他们为了保家卫国,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敌人飞机十分猖狂,频繁轰炸,搞所谓“绞杀战”。为了保证交通运输线的安全畅通,后勤工作的同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在朝鲜待了大约半年时间,回国时,沿途所见和我们去时就有了很大改变。我们走后不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上甘岭战役,在这场令敌人惨痛“伤心”的战役中,后勤战士的功绩同样是不可磨灭的。

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同前线的战友们握别,感谢组织上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通过这次学习,得到了一次实战锻炼,学到了现代条件下战争的经验,对于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侵略军,心中也有了底。虽然在回国的路上仍然非常危险,夜间行车,山路崎岖,加上敌机轰炸破坏,十分难走,听见空袭警报就得赶快闭灯,有一次,我们的吉普车差一点就翻下山去了,但谁也没把它放在心上。大家都很兴奋,抗美援朝的宏伟战场历历在目,许多感人的事迹在我们心头翻腾,对我们英雄的部队充满了信心和自豪。

回到北京的时间大约是八月份。听说叶剑英同志也调回了北京,我去见了。他关心地问起我们在朝鲜学习的情况,有些什么收获,我一一向他作了汇报。末了他问起我下一步的打算。当时,华南军区司令员是黄永胜。叶剑英同志知道我是受黄永胜排斥的。他沉思了一会,问我愿不愿意去海军工作。

提起海军,我就想起自己早年的海员生活,想起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在大鹏湾和大亚湾组建的海上中队、大队,忍不住兴奋起来。我向叶剑英同志表示,自己很愿意重返海洋。

叶剑英同志看透了我的心理,微微笑了。随即写了封信给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同志,介绍我去见他。肖劲光同志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先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说那里有个海军系,刚刚开办。我正发愁自己对海军业务不熟悉,一听,正对我的心思,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了。

我先到武汉中南军区汇报了赴朝学习的情况,然后回到广州办了手续,立即赶往南京,时间已经是十二月份了。

穿上了海军服,住进了学员宿舍,又开始了课堂生活。在我一生中,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在澳大利亚的商学院,第二次是在广州中山大学,但都不象这一次这样令人兴奋。一进学院,就见到了院长刘伯承同志。在学院听到了不少刘院长的故事,亲身体会到他高瞻远瞩,为我军的长远建设而努力。听说他是主动向毛主席提出要求,到南京来办学的。一切都是初创,困难很多,他夜以继日地操劳。刘伯承同志的这种奋斗精神,令我十分敬佩,也使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

海军系和空军系住在一起,地址是南京半山园,靠近中山门,过去是国民党政府的盐务总局。出中山门不远,就是明孝陵和中山陵。海军系有学员六十名。系主任是谢立全

同志，副主任是林遵。李东野同志任系的副政委。学习内容包括战略、战术、技术各个方面，有海军基本知识、水面舰艇、航空兵、海岸炮、潜艇等兵种战术、战役法，还有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几十门课程。每年都要到海上实习，我就曾经任过东海舰队的见习副参谋长。

相隔这么久，又重新当一名学生，而且是严格的军事生活，每天很早起来参加出操，排队上课，在一个食堂就餐。当时学习苏联军事学校的学习制度，每天十小时一贯制，上午六节课，下午四节课。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七点多，一直没有停息，不免感到有些紧张。加上自己年岁又大了一些，在班里算是“老大哥”，这几年由于职务关系，总是“教育”别人多，也很少过这样生活，开始时很不习惯。在海军系第一期象这样情况的，就我一个。在学习过程中，我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有的同志担心我能不能坚持下来。就连一些打扫宿舍卫生的老工人也感到惊奇，旧社会他们长期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没有见过象我这样职务的人过这样的生活，曾经悄悄地向其他学员打听我的情况。

然而，我对于自己能当上我们国家第一所军事学院的第一批学员，感到非常高兴，庆幸自己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决心认真坐下来学一点东西。祖国解放了，人民解放军又迈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新的历程，在陆军的基础上，创建了人民海军。自己既然立志要成为海军的一员，参加人民海军的建设，就应当放下架子，从头学起。这样，当组

织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的时候,才能克尽自己的职责,起码不讲外行话。因此,尽管学习生活中遇到过不少困难,都能想办法克服。

我到学院报到的时候,已经开学一段时间了,在我,就有个赶队的问题。我是班主任,要担负一些社会工作,又是人大代表,每年外出开会占去不少时间。这些,都给我的学习增加了难度。有一次去人大开会,开始讲,去就行了,不参加考试了,可是回来后改变了,又要参加考试,弄得我很紧张。只有赶快补课,自己找老师学,把丢失的时间补回来。想不到又得了肋膜炎,发烧,但为了抢时间,我作了些治疗,仍然坚持上课。那时学院要求很严,考试从不布置复习重点,也不作提示。不过这倒符合我的想法,真正能抓紧时间学点东西。朝鲜战场美帝国主义凭借所谓海空优势,妄图横行霸道,更增加了我们建设正规化海军的紧迫感。这就使我在几年的学习期间,点滴时间也不肯放过,而且越学兴趣越浓。

但是终究年龄大了,记忆力差多了。不过比起年轻人来,我也有个长处,就是打过不少仗,脑子里感性知识比较多。我在学习中总是联系实际加深理解,掌握原理来加以发挥,从来不去死背书。我还记得有个叫小李的学员,背书背得很辛苦,我就告诉他,不能死背,光靠死背反而会记不住。这是我的切身体会。运用这样的学习方法,我的学习成绩一直能够保持五分,成为系里的全优生。在我们这个班里,我记得连我在内有三个全优生。

四年紧张的学习生活转眼过去了。一九五六年夏季，毕业班举行了隆重的国家考试。教学大楼门口，挂起了一块横匾，上面是木刻金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国家考试考场。考场两个字很大。下面铺了红地毯，使人感到分外庄严。考试时间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吃饭也在考场。学员首先进入预考场。一次叫三个人为一组，到主考室接受考试。考题是封好的，盖了红绸子，当着学员的面，主考官下令开封。主考室有一张为学员准备好的桌子，备有铅笔纸张。每间主考室有三名考官。有的学员给取了个名称，叫做“三堂会审”，说明思想上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谁都想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家汇报。

这时正当南京酷暑季节。我和其他学员一样，服装整齐，正步走进主考室，举手敬礼：“报告主考同志，学员曾生前来应考。可以抽题吗？”主考答应后，又一个正步，从主考官面前一个圆筒里抽出三道题来，题是白硬壳纸铅印的。经过简短的准备，当面口答。主考我的是曾泉生同志。考过以后，分配我到海军南海舰队，他来看我，才知道他就是南海舰队司令部的副参谋长。

我以五分的成绩通过了国家考试，以全优结束了四年的学院生活。毕业典礼那天，刘伯承元帅来了，还参加了会餐，很高兴地欢送军事学院的第一批学员走上新的战斗岗位。

## 到南海舰队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总理下达命令，任命我为海军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八月，我回到了广州，曾泉生副参谋长和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等到车站接我。在爱群大厦住了几天，安顿了一下，就搬到石榴岗舰队驻地，正式开始了我的海军生活。

南海对于我，并不生疏。祖国的四大海，数南海的海域最为辽阔，东北靠台湾，西边是北部湾，与越南邻界，南边有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海岸线长达五千七百九十多公里，海区面积二百六十二万平方公里。珠江口又濒临港澳，斗争形势复杂。这里是我国与外国交往的重要门户，海运的主要通道。南海舰队担负着护渔护航剿匪，防止蒋帮窜扰和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荣任务。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人民海军建设只是刚刚起步，尤其是南海，力量就更弱一些，使得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但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组织过“土海军”，在苏北有个海上纵队，在广东也有过东江纵队的海上大队，广州解放后又组建了江防部队，尔后成立了中南海军，发展到今天的南海舰队。不少原东江纵队和两广纵队的同志参加了这一段很有意义的创建工作。中央还从各个野战军调来了大批老同志，作为骨干，部队的建设正在迅速向前发展。今天自己也终于成了其中的一员。四年前



我下决心到军事学院学习，目的就是要了解正规的海军建设，为舰队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而今这个愿望达到了。

在石榴岗见到了舰队司令员赵启民、政委方正平、副司令员齐勇、副政委桂绍彬、参谋长邵震、政治部主任肖平等同志。在机关礼堂组织了欢迎会，赵启民司令员介绍我和机关干部见面，特别讲到我在军事学院的学习。我认为，舰队的几位首长都是经过长期征战的老同志，干海军的时间比我长，情况的了解比我多，我在内心里很尊重他们，和他们在一起共事，感到很高兴。

这年的十一月二日至十五日，在广州湾西营基地组织了一次护航实兵演习。这是南海舰队执行护航任务以来，有计划有组织地，以日常战斗活动方式，进行保卫近海交通线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实兵演习，也是我到南海舰队工作后参加的第一次海上演习，感触很多。想起当年帝国主义的军舰在我国领海内耀武扬威，而今天登上我们自己的军舰在海上航行，内心是很激动的。可是我们现在的舰艇还为数不多，而且比较陈旧，吨位也小，海上突击力量主要还是靠两个鱼雷艇大队，而这些鱼雷艇也是属于近海小型的。一方面海区位置很重要，任务很艰巨；一方面部队的建设还处于初步，很不完备，从训练上来讲，也是刚刚开始走上轨道。这就是当时南海舰队的基本情况。

但是，部队的精神面貌很好。四项制度刚刚实行，大家

一心想着建设正规化的国防军,决心把海军建设搞上去。在西营基地参加护航实兵演习时,我就强烈地感到这一点。驱潜舰第七十三大队和远航鱼雷快艇第九十一大队命名典礼,更使人们振奋不已。

从苏联引进设备,在黄埔造船厂组装的六艘驱潜舰(后改称猎潜艇,下同),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份下水试航,由国防部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驱潜舰第七十三大队,和同时被命名的海军快艇第九十一大队,于同年十二月二日编入南海舰队战斗序列,在黄埔岛举行命名典礼大会。

南方的十二月,正是一年的最好季节。这一天的天气也特别好。早晨的阳光金灿灿地照射在宽阔明亮的江面上,在江心排成一线的崭新的舰艇,油漆成银灰色的舰体闪闪发光,衬托着鲜红的“八一”军旗,愈加艳丽动人。舰艇上都挂起了满旗,迎风飘舞。赵启民司令员、方正平政委和我,陪同广州地区党政军首长,还有苏联顾问,乘交通艇,一条舰一条舰地进行检阅。这时在第一条指挥舰上奏起了雄壮的军乐,舰长喊起致敬的口令,舰员们穿着全白的礼服,精神抖擞地列队在舰舷甲板上。当时,靠在岸边的几艘扫雷舰和登陆舰上的舰员们,都自动在甲板上观礼,船厂的工人纷纷跑到岸边观看,连正在江上撒网的渔民,也停下了紧张的劳动,笑咪咪地望着,大家都是兴高彩烈,笑逐颜开。

检阅结束后,舰艇徐徐靠上码头。我们又登上舰艇,一一看望,仔细询问舰上的设备情况。舰员们都很兴奋,因为

这是当时舰队中最新式的舰艇，谁个能够调到这里来，都感到非常光荣。晚上，舰队政治部文工团举行欢庆演出，整个黄埔岛一片喜气洋洋。

我来到舰队以后，在广东省委还兼有工作，经常送来许多信件，也经常有人来访，有不少事情要找我办。这是我和舰队其他首长不同的一个地方。赵启民司令员和方正平政委对此很重视，一再指示办公室：曾生同志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不能看成是他个人的私事，省委要曾生同志办的事，也就是省委叫南海舰队办的事，要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因此，司令部办公室化费了很大力量，作为一项大任务来安排，还要我的秘书刘瑞同志单独立了个本子记录。我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很受感动。我自己也从没有把它看成是我个人的事情，每逢地方上提出要求，我总是把问题提交舰队党委常委研究处理。例如有一年春节，广州市食盐紧缺，他们派人找到我，我立即报告常委，舰队马上派出船只，到龙门运盐，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通过我，体现了部队党委对地方党委的尊重与支持。当然，舰队有些困难，常常通过我去找地方党委，也都顺利得到解决。

## 对军事训练的思考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召开了第三次舰队党委全会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一九五七年度军事训练的方针

和任务。二月二日，召开舰队党委常委会，确定常委分工，由我负责作战、训练、舰船修造以及水面舰艇部队的建设。为了加强对各编队的领导，有重点地掌握情况和研究解决问题，决定我重点负责混合舰第一支队和快艇第十一支队。这是当时舰队主要的作战舰艇。三月十五日，召开了第四次舰队党委全会扩大会议，首先由方正平同志传达军委扩大会议和海军党委有关部队精简整编问题的报告，随后由我传达海军党委有关军训问题的报告。

在一月十二日的舰队党委全会扩大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1. 以军训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需要进一步明确；2. 必须坚决贯彻学用一致的方针；3. 要更广泛地开展群众路线的训练方法。这是根据几年来军训情况进行反思的结果。会议同时指出，几年来在训练中强调打好技术基础是正确的，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就为进一步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三月十五日传达海军党委有关军训问题的报告后，问题就更明确了。我们部队从来都是围绕着战斗任务和工作任务来计划和训练部队的，是从边打边建、边建边训、边学边做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学习苏联经验也要注意结合我军的具体情况。在这次会议上，根据一月份舰队党委扩大会议的讨论和海军党委有关指示的精神，我作了一个发言，着重讲了对军训方针的理解。我认为，要接受一九五五年的军训经验。这就是按照边建边训、边学边做的方针，围绕战斗任务和该年度的工作任务，来计划和训练部队的，成绩很大。

对如何按教范顺序又按任务需要进行训练的问题,我认为循序和跳跃是矛盾的,也是可以统一的。没有一定的基础则不能跳跃,在跳跃前进中又能巩固和提高基础,两者统一在要什么学什么,做什么学什么,统一在任务的需要。我还讲到,和平时期提高部队战斗力就在于苦练。必须多到海上去练,多在风浪大等复杂气象条件下、复杂海区和夜间去苦练。这是我们所处的环境、任务、敌我条件等情况所决定。我们必须训练出一支以弱兵胜强兵的部队。另外我还讲了一些具体的措施。赵启民司令员在总结中又进一步明确了一些问题。

这两次全会扩大会议,对舰队的军事训练工作有着重大的影响。会议结束后,就着手准备一次大规模的抗登陆实兵演习。从四月份开始,先是拟定课题,组织广州湾战役方向的实地勘察,编写演习文书。五六月份,以一个月的时间组织了抗登陆战役理论集训预讲。我亲自参加讲课和最后解答问题。随后进行了抗击敌人登陆战斗的图上作业。

这一年八月十二日至九月七日,在赵启民司令员亲自领导下,组织二十艘舰艇,进行了远航训练。一九五七年全舰队共组织了二十四次远航集训和锚地集训。这是对编队首长和司令部一次很好的训练。起初,一部分干部思想上还不大通,但实施中逐渐体会到好处,便变为积极的自觉的要求,而且迅速学会了组织计划的方法。回航时,编队的训练即交由各支队领导组织实施。在远航中,为了适应编队需

要,就得进行技术操作,而且要求严格适应战术的需要。例如,猎潜艇搜索潜艇,开始时声纳骚音非常多,搞得很紧张,他们被迫开动脑筋研究分析后,才辨明是编队各舰的机械声音。这样各舰均被迫详尽地研究了本舰运动的性能,否则就编不好队。这就说明首先必须抓好技术训练,为战术训练创造条件;而在战术训练中,又可以使技术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这也完全印证了舰队党委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观点和意见。

这次远航,为后来进行的抗登陆实兵演习打下了基础,特别在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上,为举行这次大规模的实兵演习取得成功,作了很好的准备。

## 广 州 湾 演 习

一九五七年十月,在石榴岗舰队司令部进行了抗登陆图上作业,由我讲评。接着成立了由我、邵震参谋长、肖平主任为领导的演习指导部,于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九日,在广州湾海区进行了鱼雷艇、护卫舰、猎潜艇与岸炮协同,在航空兵支援下,在雷炮阵地前,在敌人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的抗登陆实兵演习。

这次演习,是舰队几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是根据三月份舰队党委全会扩大会议所明确的军训指导思想进行的。几个月来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演习选择在广州湾硃洲

岛海区进行,以罗村港——水东港为主要突击方向,硃洲岛——东海岛为辅助突击方向。演习持续达三十天,参加各类水面舰艇近四十艘,二千八百余人。指导部设在湛江市郊的海滨招待所,相隔对岸,就是麻斜军港码头。

演习开始,首先由指导部召集参加演习的编队指挥员传达布置任务,明确各个阶段演习的指挥关系,然后各单位即投入紧张的制定基地防御、兵种合练文件及图上导演的准备工作。第二步实施兵种合练。进行了编队运动情况下的单舰和岸炮的测验性射击;猎潜艇引导鱼雷艇夜间攻击;护卫舰、鱼雷艇、航空兵协同攻击;护卫舰编队与岸炮协同对海上活动目标的实弹射击,护卫舰双舰编队对海上活动目标的实弹射击;登陆舰在岸炮掩护下布雷操练,等等。第三步是实兵演习前的室内导演,在湛江基地临时搭建的一个大草棚内进行。第四步实兵演习。

这是舰队第一次比较系统的从理论讲课到图上作业,到诸兵种合同训练的实兵演习。从技术训练、单兵种战术训练到合同训练、首长—司令部的战役训练,深入了一大步。这次演习有几个特点:

一是整个演习采取了“下放”和“提高”的方法,改变了过去由舰队一揽子包下来的作法,变为大家一齐动手,不但训练了指挥员,也训练了各级司令部和各勤务部门。敌情方面,也从出“死情况”变为“活情况”,比较切合实际。

二是要求比较严格,大家的积极性很高。南海的风浪一

般是比较大的,演习海区更是有名的风浪区。这次演习时,风浪就超过预先设计的浪二级,对鱼雷快艇来说困难更大,艇员们爬着去执行任务,演习效果没有受影响。部队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第171舰在琼州海峡刚完成布雷、捞雷、拖靶任务后,没有休息,连夜赶到湛江参加合练,还积极改进拖靶技术,任务完成得比较好。

再一个特点是贯彻了群众路线的方法。从一开始,在制定演习计划时,就吸收了大队一级指挥员和司令部参加。这样做,不但使这些指挥员对首长意图有了深刻领会,也在制定演习文书方面得到学习,给今后编队单独组织实施兵种合练奠定了基础。演习后,采取了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的群众路线的讲评方法,专门拿出几天时间,让各编队指挥员充分发表意见,最后才由我代表指导部进行讲评。我过去就习惯于先听取下面同志的意见,然后作出自己的决定,这次听了群众性的讲评,自己讲评时更觉得心中有数了。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条根本路线,也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它不但使领导者耳聪目明,而且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在这次海上演习中,又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这一次演习,也使地方上的同志和兄弟部队对海军生活增加了一些了解,亲身体会到海军必须克服许多自然条件的限制,才能与敌人作战,因此,需要经过不断的海上训练,来适应海上生活。地委领导再三表示,海军部队很辛苦,需要一定的物质保证,地方上一定做好这方面工作。对于舰



艇部队来说,也进一步认识到了在海上苦练的重要性。赵启民司令员后来在一次讲话中特别谈到:现代战争的特点,和我军的具体条件、战术思想,决定了我军必须在各种复杂条件、恶劣气象情况下驻泊和训练,把我军训练成有坚强革命意志,一口气能吞掉敌人的气魄和雄心,养成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吃苦耐劳精神,超人的技术,灵活机动的战术,对战区一切港湾、航线了如指掌,在任何恶劣情况下,都能运动和补给。能如此,我们就有战胜任何强大敌人的本领。我认为他讲得很对。

当然,演习中也还存在一些缺点,也出现过生搬硬套和形式主义现象。如第一次护卫舰、鱼雷艇、航空兵合练时,未能根据敌人可能规避的方向以及气象条件(风向)的变化,改变指挥决心,机械照搬演习计划,造成鱼雷艇施放烟幕时,挡住了护卫舰的视界,迫使舰炮停火,失去了对鱼雷艇的火力支援。

演习结束后,组织了水上校阅。所有参加演习的舰艇,都挂了满旗,由南到北,从湛江港内的栈桥码头,成一字排开,一个大队接着一个大队,排列得十分整齐。舰队第一次集中这么多舰艇,其中有些是服役不久的新式舰艇,雄壮威武,和我刚到舰队时的情况已有很大不同。经过三十来天的演习,不少同志都掉了体重,但演习取得了好成绩,舰炮对海打靶有了很大进步,水兵们一个个情绪高昂。我和赵启民司令员、方正平政委等人陪同地方领导同志和友军首长,还

有苏联顾问，乘坐炮艇兴致勃勃地向同志们问好。领导组织这样大规模的实兵演习，在我也是第一次，现在终于胜利结束了，我和大家是一样的高兴。

## 军 官 轮 训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南海舰队军官军事轮训队第一期开始了，由我兼任队长，舰队司令部训练处副处长尤春林任副队长。赵启民司令员、方正平政委和我一起参加了开学典礼，并讲了话。学员包括机关部处长、各编队首长和参谋人员共一百四十多人。学习内容为海军基本知识、海军战术和海军诸兵种特点及战术技术性能。这是根据舰队党委“三年完成海军党委五年军官训练任务规划”的决议开办起来的。军官训练是军事训练的中心环节，抓部队训练必须首先抓军官训练，这是我们在去年总结军训工作中深刻体会到的一点。必须下决心改变军官训练落后于部队训练的状况。但是，真正要把在职干部，包括编队领导集中起来，进行较长时间的学习训练，却是要克服不少困难的。

首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教员问题。我们决定自己想办法解决。从舰队各单位抽调了七名教员，这些教员有一定的专业，但有的是第一次讲课，有的还是“现买现卖”。其他就是从舰队司令部、舰队后勤部的各部门临时聘请的兼课教员。轮训队教研室自己制定教学大纲，由训练处协助审定。

我自己也参加讲课。一有时间,我就参加听课、作业、推演、讨论、试讲、教学研究等。每个新科目开始前,有计划地召开带有评教评学性质的学员座谈会和学员代表座谈会,根据学员的意见,举行教员座谈会,不断改进教学。在学习后期,学员还对教材提出了一些意见。在轮训队,学员之间、学员与教员之间,经常展开学术的讨论和争论。

再就是学员安不下心来。有的老同志认为自己年龄大,文化低,身体弱,基础差,学不好,学不了。海口水警区司令员万德坤是位老红军,没上过什么学,学习通知下达以后,不肯来。后来方正平政委亲自打电话给他,要他连夜赶来。来后经过做工作,思想搞通了,学习很认真,星期天别人出去玩,他不出去,把教员请到宿舍,买来东西请教员吃,自己盘腿坐在床上,要教员给他补课。队里学先进、赶先进活动挺热烈,坚持评比制度,公布成绩。我见万德坤同志学习成绩不错,就对他讲:“你学习得不坏呀!”他笑笑说:“要学不好,压力太大了!”有的同志测验打了三分,连饭都吃不下。对工作的牵挂和学习的信心,都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的。

这一期学员,年龄从二十二岁到四十五岁,文化程度从初小二年到大专,水平十分参差。在学习中,我们始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我是不主张读死书的,我讲授战史课时,联系讲到东江纵队和两广纵队过去的一些战例。我们部队的干部,特别是一些老同志,虽然文化比较低,但作战经验丰

富,只要打开思路,打消自卑感和“技术神秘论”,对理论的接受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们大力提倡独立思考。一次队里组织图上作业,我听说后赶去了,发现出的都是“死情况”,来标舰艇航向。我决定改变这种作法,把海图摆出来,临时出情况:发现敌机大编队从南越岬港出动,要大家判断。后来机群到了榆林港南边,突然转而向北,让学员根据情况定下决心。我带领大家量海图,判断情况。这对开阔大家思路,联系实际学理论很有好处。也解决了文化低,学习理论有困难的问题。学习的效果就说明了这一点:轮训队以七十五天六百六十五个小时授完了十二门科目,测验总平均达到四点六六分。作业成绩百分九十以上达到优秀。

当时,轮训队的条件比较差,编队首长也是两个人住一间房。本着勤俭办校的精神,一切教材、教具和教学设备,都因陋就简。全队工作人员(除炊事员外)仅十二人,仅化经费六百元左右。但学习空气很好,大家越学情绪越高。万虎要塞副司令员韩振江说:“以前不敢上舰,舰上把航行计划交来审查看不懂,开不了口。今后不会讲外行话了。”有的参谋讲:“一九五六年舰队让我们基地搞个布雷计划,几个人忙了几天也弄不出个名堂。如果今天再让我们搞这个计划就不难了。”

轮训队决定继续办下去。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在第一期快结束时,把训练团团长尉茂有调来任队长。尉茂有同志和我是军事学院同学,我在本科,他是高速班,我们在南京就

认识。我和他谈话说，我虽然不再担任队长了，但还管训练，有什么事情请随时来研究。

第二期抽调了舰队直属机关和各编队在职干部，也是一百四十多人。这时正在我军炮击金门期间，东南沿海形势紧张，于是改为到福建前线参战锻炼。由尉茂有带队，把学员分配在汕头、东山、厦门等地参战单位代职或下放当兵。队部设在镇海指挥所。这批学员到了前线，表现都挺好，有二十三人立功受奖。有一位同志，在敌炮射击中为掩护群众壮烈牺牲。在两个月的参战锻炼中，他们根据实践经验和国民党军舰、飞机活动规律、战术特点，总结了鱼雷快艇、猎潜艇、护卫艇、海岸炮兵和航空兵作战经验，摸索出一套比较适合我海军情况的具体战术。十月底，尉茂有同志曾经回舰队来汇报。听讲他由于休息不够，在中途等车时突然晕倒了。他们学习的紧张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在一九五七年舰队党委讨论军训方针任务时，明确提出必须坚决贯彻学用一致的方针，坚持做什么学什么，机关军官训练必须和部队担负任务相结合，部队军官训练必须和当前任务相结合，理论学习必须和本职工作相结合，既是工作，又是学习。肖劲光司令员风趣地比喻为：叫花子应该学会打狗。坚持学习理论是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一九五八年结合金马作战，组织了厦门作战经验介绍，汕头 507、527 护卫艇打击敌机敌舰战例的研讨，汕头机动编队对开展海上游击战的讨论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第

一期轮训队由于贯彻了这个精神，大家感到学习很“解渴”。第二期轮训队到金马前线参战锻炼，本身就是到基层到实际中去，对口学习，对本职工作有很大促进。在这期间，我曾到一些参战部队去过。鱼雷快艇部队在东山岛待机。我去那里检查时，遇到舰队司令部作战处的一位副处长，我问他，遇到情况快艇如何撤出，他按教材上的规定作了回答。我告诉他，只能给你两分半，连三分也不行，因为你是照书本回答的，没有结合这里的具体情况。作战情况千变万化，要根据哪个方向有利来处理。过了若干年之后，还有人提起这件事情，讲到当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军官轮训发展到后来，规模逐步扩大，专门组建了干部轮训大队，定期轮训。一九五九年底成立了联合学校，尉茂有任副校长。联校专设有干部大队的建制。

## 舰 船 修 理

舰队党委在抓部队训练的同时，把舰船修造工作也摆在了重要议事日程上，逐步加强部队的装备建设。这也是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华南工业基础薄弱，更谈不上有像样的造船工业，因此，南海舰队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在一九五〇年解放万山战役的垃圾尾海战中，我们用来突袭国民党舰队的火力船队，只有五艘小炮艇和一艘改装的步兵登陆舰，其中三艘只有

二十多吨,两艘是木壳艇。到一九五三年,执行经常性护航巡逻战斗勤务的主力,是四艘扫雷舰,两艘经过改装的炮舰和一艘猎潜艇。后来打捞抢修起一艘近千吨的护卫舰,成为舰队的“主力舰”。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猎潜艇第七十三大队和远航快艇第九十一大队编入舰队战斗序列,是当时最“现代化”的舰艇,其他多数是比较陈旧的船只。如何利用这有限的舰船,保证最大的在航率,培养干部,为海军发展积蓄力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根据工作分工,如何解决好舰船的修理问题,以保证最大的在航率,是我的责任。

当时,南海舰队有三个小型修船厂,分布在黄埔岛、榆林和汕头,此外还有几个码头修理所。当时舰船发出故障,舰员们有依赖工厂修理的思想,但修船厂建设还有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子承担全部修理任务,而舰队护渔护航、战斗值勤和运输任务又重,这就产生了矛盾。排队等待修船的状况比较严重,致使有的船只长年失修。通过调查研究,我发现一些舰船不必要地把一些修理项目推给工厂,造成时间和经费的浪费。同时,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舰艇在海上航行中,出了大的故障怎么办?为了保证舰船在复杂情况下能坚持战斗,就不能不考虑到如何提高舰船本身的自修能力问题。于是,我们开始从培训机电业务长入手。第七十三大队自修一部主机,发现有些修理项目,只要有掌握技术的人带头,再有几个懂点技术的班长,定出个标准,在工厂协助下,部队就可以自修。舰队机电人员中,就有人提出了这

个问题。我们就因势利导，组织了机电业务长的培训。这里既反映了我军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也说明了舰员们对海军建设的事业心，时刻准备打仗的思想和高度的责任感。

因此，当东海舰队关于舰艇小修不进厂的倡议传来时，同志们的心情是十分兴奋的。我也有水到渠成之感。海军党委就此发出了指示，海军召开了现场会，总部也作了肯定。舰队随即在 181 舰进行试点。一九五八年五月在黄埔召开舰队第五届舰船修理监用会议，主要议题就是交流小修不进厂的经验。我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

部队热情很高。经过一年多一点时间，自修的舰船接近舰队总船数的百分之五十。一九五九年五月，舰队第六届舰船修造会议对自修情况进行了检查总结。在会议结束时，我作了一个发言。首先讲了对小修不进厂的理解。我说，有人讲完全给工厂修，也可以叫小修不进厂；有人讲单纯舰员修，不要工厂协助，才叫小修不进厂。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我们说小修不进厂，是修理部门领导，工厂协助，各有关部门支持，以舰员为主的自修。特别强调了修理部门的领导，强调要审查舰船的修理工程项目，给予技术上的指导和决定。

在我的思想上，当时的着眼点主要在于解决部队执行任务的需要和舰船缺少之间的矛盾。一句话，就是要提高战斗力，适应打仗的需要。小修不进厂的优点很多，同志们总结



了许多条,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在这个方面。当时提出了口号是:拜工人为师。通过舰船自修,提高了舰员的技术水平,培养了一批尖子人才。有的机电人员,老远一听机器的声音,就可以判断出是否出了毛病和在哪里出了毛病。对机器的操作管理,心中更有数了。锻炼了舰员在复杂条件下也能坚持排除故障。有的舰船在海上摇摆度比较大的情况下,也能更换汽缸头。这些本领,在战时抢修都用得上。过去我总在考虑,舰艇出航,就要投入战斗了,突然坏了怎么办,怎么攻上去。我们的舰艇少,又陈旧,不能不作这样的打算。小修不进厂,我觉得就解决了个大问题,尽管它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然而成绩还是基本的和主要的。

当然,也要防止出现另一方面的问题。比如那时候轮机部门利用“强化器”乳化重油取得成功,在推广过程中,有个舰的副长,听了报告后,“发动”群众每人当天都要做一个“强化器”,到修理部要铜管,还买了许多刀片,连夜不睡觉,天没亮就去报喜。现在听起来象讲笑话了。可是有些事情不注意引导,就容易出现偏向。我在会上讲,一切事物的发展都要看具体条件,要科学分析,干了就得检查质量。我还提出来,小修不进厂的三种形式:即自修、厂修、舰艇为主工厂协助。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采取哪一种,特别要看作战任务的不同来决定。修船工作的领导,修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制度一定要坚持,这样才能保证质量。集中修理的时间安排,一定要符合舰队作战训练任务的要求。为了适应这个情

况,决定舰队各修船厂的任务,要以修船和制造配件为第一要务。

小修不进厂大大缩短了修船周期,为国家节约了大批修船经费,在培养人才和适应战备方面,都取得了良好成绩,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自觉性和创造力。但正如我在前面讲到的,一切事物都要具体分析,要看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小修不进厂的出现,也有着它历史的特定条件。在当时,它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把它放在条件已经变化的今天,就不一定合适了。当然,这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还是值得发扬的。

在建造方面,从一九五一年开始,逐步着手建造了一些小型辅助船只。一九五三年开始建造木壳护卫艇。一九五九年一月,由舰队修理部自行设计的第一艘高速护卫艇在黄埔修船厂开工,六月十一日下水,七月八日试航,我随艇出去了,还和工人进行了座谈。十月,在汕头海区进行各种战术性能测定验收。抗风能力试验那天,到了表角,阵风九级,摇摆度四十多度,全体人员穿上救生衣,准备翻掉,还组织了支援兵力。但是终于经住了检验,达到了设计标准。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终于迈开了艰难的一步。今天我们能够自行设计建造高速护卫艇,将来我们就能够进一步发展到建造现代化的大型舰船了。

## 保 卫 西 沙

一九五九年二月,南越吴庭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进犯我西沙永乐群岛,无理抓捕我在永乐群岛的琛航岛作业的渔民八十二人,渔船五艘,撕毁我岛上、船上的国旗,“勒令”我国渔民不得在西沙领海生产。后来又进一步侵占我琛航、晋卿、珊瑚、金银等岛。这是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对此,我国政府提出了严正抗议。为保卫我国领土主权,保护渔民正常生产,周恩来总理指示,组织海军巡逻西沙群岛。彭德怀国防部长提出了明确要求。南海舰队及时调整了兵力部署。三月初,舰队司令员赵启民到达榆林,在海军肖劲光司令员参加下,召开了舰以上干部会议,具体部署巡逻西沙任务。

东沙、西沙、中沙、南沙,是我国南海四大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方,距榆林港约一百八十海里,由三个小群岛(宣德、永乐和南部诸岛)共三十多个岛、礁、滩组成,是我国通往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国际航路要冲,在国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里地处北回归线以南,长夏无冬,雨量充沛,大部分岛屿植物茂盛,终年常绿。岛边银白色的珊瑚细沙,在阳光下分外耀眼。在我国文书记载中,这里自古就有“千里长沙”之称。岛的四围有环状礁盘,深蓝色的海水,在这里变成一片

片浅绿,分外妩媚。从飞机上远远望去,真仿佛是一把美丽的珍珠,撒在这辽阔的海面上。好几个岛上出土了大量的唐宋文物,说明我国人民很早就在这里劳动生产。这里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岛上栖息着数十种海鸟,海区盛产石斑鱼、马鲛鱼、鲳鱼、鱿鱼、鲍鱼和海参、玳瑁、龙虾、海龟、马蹄螺等珍贵特产。著名的梅花参,大的长有一米,重达二十多公斤。海龟一般都重约一百多公斤。岛上的鸟粪是很出名的。海底还蕴藏着石油和天然气。一九五九年我国渔民在这里生产的产值,即达两亿三千二百多万元。

正因为西沙群岛地理位置重要,物产富饶,各国帝国主义者都曾企图染指,历史上法国和日本都曾侵占过,并以这些岛屿作为侵略我国和印度支那的跳板。但西沙群岛之为中国领土,是举世公认的。苏联一九六八年以前出版的所有《世界地图》,都标明南海诸岛是中国领土。早在一九四七年,越南民主共和国电台就曾评论说:“法国之向中国争取西沙群岛,实属无理要求”。就连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出版的地图中,也标明南海诸岛隶属中国。南越当局妄想接过殖民主义者的衣钵,公然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引起了我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作为中国人民海军,保卫祖国领土主权,保护渔民安全生产,是我们的光荣职责,尽管这时我们舰队的力量还不大,深海航行的经验还缺乏,但在维护祖国尊严的神圣使命面前,我们责无旁贷。

我分工管作战,组织西沙巡逻,当然也是我的主要责

任。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我参加组织了舰艇编队首次西沙巡逻。同志们回来后向我讲述了当时的情景。那天遇到六七级的风浪，我们的舰艇吨位比较小，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员晕船呕吐，但大家始终坚持在战位上，谁也不肯休息。在这次巡逻中，美帝国主义的军用飞机，总是围绕着我舰艇编队低空盘旋，最近时距离仅约一百米，几乎是擦着桅杆飞过，同志们一个个义愤填膺，更加激起了昂扬的斗志。

这一年共完成了十六次巡逻任务。第四次巡逻时，舰队赵启民司令员亲自随舰出航，给大家很大鼓舞。特别是一九六〇年三月的一天，猎潜艇第七十三大队 274 艇，执行巡逻西沙任务后胜利返航，徐徐驶进榆林港内，列队在甲板上的水兵们意外地发现，在码头上欢迎人群的最前列，伫立着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仔细一看，原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只见他扬起右手，亲切地注视着远航归来的舰艇。“总理来了！总理来了！”水兵们十分兴奋地传告着。舰艇靠岸了，刚刚放好跳板，周总理就健步登上 274 艇，和指战员一一握手问好。握着总理温暖的大手，看着总理慈祥的笑容，同志们感到无限幸福。总理详细询问了巡逻的情况、岛上的建设、生产和军民关系等，并向大家指出了巡逻西沙的重要意义。水兵们后来才知道，周恩来总理是陪同著名的美国记者安娜·露易斯·斯特朗来海南岛参加视察的，曾专程到榆林港来检阅基地舰艇部队。这一天，当周总理得知 274 艇要从西沙巡逻归来，不待舰艇进港，又驱车来到榆林港，站

在码头上迎候。这个消息更加使同志们激动万分。

总理当时向大家郑重地说道：“西沙的岛子虽小，但每一个都是我们的领土。保卫西沙，同志们的责任重啊！”这难忘的接见和语重心长的话语，长久地留在同志们心头，鼓舞着舰队广大指战员，牢记自己的使命，前赴后继，勇敢战斗在保卫祖国神圣领海的岗位上。

西沙巡逻不单是军事斗争，主要的还是政治斗争。部队坚决执行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对敌斗争政策，不打第一枪，从政治上孤立了敌人，揭露了敌人的侵略真面目，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从军事角度来讲，随着西沙巡逻的开展，也给我们海军的战斗训练开辟了新的场地，书写了新的篇章。西沙群岛虽然距岸不是太远，但是这里的水文条件、气象条件基本近似大洋，为我们今后在大洋中的航行和战斗活动开拓了道路。

开始时，有的领导干部担心每月巡逻二至三次，任务太重，舰艇数量不足，出海风浪又大，算来算去，感到无法完成年度军事训练计划。但实践的结果却完全相反。执行巡逻任务不但没有影响军事训练，而且推动了战术技术训练。榆林基地原定计划全年进行十二次战术演习和合练，实际上完成战术演习八次、合练二十六次，超额完成任务的百分之二百八十三。并且有的课题还是反复演习。如五防训练，每次出航必然进行，因为敌机经常在上空盘旋，敌舰就在附近活动，潜艇、水雷随时可能遇到，只要敌人打出第一枪，我们

马上就要投入战斗。战术背景就是面前活生生的敌人,因此,从每个战术动作到具体操作细节,都不能容许有任何马虎。演习特别逼真。锚地防御,就是在西沙停泊中完成的,由于眼前摆着现实敌情,所以组织严密、细致。经过一年来的训练,新兵已熟练地掌握了专职操作技术,新调来的干部,已经可以单独工作。他们并没有过多地占用专门训练时间,主要是结合巡逻任务来完成的。因为巡逻本身既是复杂条件又是复杂情况,结合巡逻进行演习,就不仅学会了一般战术原则,也大大提高了指挥员的指挥能力。

航海方面的收获也比较大。在第一次巡逻之前,不少舰艇干部在思想上有很大顾虑,认为西沙岛屿低(一般不到八米高,最高的石岛也不过十二点四米,除少数目标外,没有助航设备),暗礁多,海区不熟悉,担心能否顺利航渡到目的地。为了确保航行安全,我们集中了十多名从海军司令部到大队的航海干部,共同研究“保驾”。经过三次巡逻,大家就习以为常了。航海技能显著提高,天文航海走上了实用阶段。过去几年来,无论是执行任务还是进行训练,没有远离过海岸,都是依靠地文航海。虽有部分干部懂得天文航海,由于不经常练习,技术生疏,天测舰位没有把握;原来不会的,对天文航海存在着神秘感,被一套公式、数字和理论所吓倒。历年来,这方面的学习任务都没有完成过。西沙巡逻,没有陆地标志可以依靠,天文航海便引起普遍重视,在领导组织下,掀起了群众性的学习热潮。172舰去西沙巡逻前,

只有五个人懂得天文航海,现在增加到十七人。全年舰艇部队参加学习天文航海的有一百七十六名,其中九十一名是新学的。同时,地文航海的技能也明显增强。第一次巡逻,发生舰位误差十八海里,主要由于过去完全依靠陆地标志,没有积累风浪压对本舰影响的资料,对仪器的误差没有很好掌握,对操舵的准确性要求不严,对于推算舰位和实际舰位发生的误差没有进行细致的分析,有的认为准确的海图作业、细致的航行计算是形式主义。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舰艇测位准确性有了很大提高。

通过西沙巡逻,舰艇人员在海上生活方面,也得到了很大锻炼。南海的涌浪大是有名的。巡逻西沙,不象沿岸水浅,又有高山和岛屿作依托,同样风力情况下,涌浪相对就大得多。如一次遇到六级风浪,两艘猎潜艇成单纵队航行,距离不过两链(一链一百八十五米),就前后互相看不到驾驶台,海水不时把鱼打上甲板,一次竟然捉到二十多条,舰艇的摇摆颠簸可想而知。晕船呕吐成为普遍现象。根据几次巡逻的经验证明,克服晕船呕吐的基本办法,就是要长期在海上生活,即便是多出海几次,但如果在海上停留的时间短,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一般的规律是:第一天光吐不吃,第二天不吐不吃,第三天不吐能吃。关键是要有坚强的毅力。舰员们能经受这样的磨炼,战胜风浪,力量来自保卫祖国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舰队调整兵力时,鱼雷快艇第九十一大队从厦门航渡榆林,当时部队处于前线,艇只分散,时间紧迫,还有



五艘艇要上排保养,而他们连续苦战,航渡前的准备工作只用了四天时间,安全航行七百四十多海里,就是一个证明。

西沙巡逻还提高了机关干部素质,提高了司令部机关的组织指挥能力。由于航程较远,中途没有岛屿可依靠,气象变化多端,并且随时有发生战斗的可能,这就对司令部机关的组织指挥、通讯联络,提出了特别严格的要求,尤其是及时性和准确性。这一年,对参谋人员是一次十分可贵的学习,也是一次非常实际的考核。司令部的各项工作,在这一年中都有很大改进。

## 中 越 友 谊

我在南海舰队工作五年,接待过不少来访的外宾,其中多次接见越南北方来参观学习的人员。我也曾率人员进行过两次出国访问,而这两次都是去越南。我亲身体会到了中越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一九五六年我调来南海舰队不久,十月八日,在广州石榴岗和舰队其他首长一起,接见了由我们代训的越南海军炮艇大队的领导干部,并宴请了大队全体人员。我们舰队是一九五五年四月接受代训任务的,一九五六年九月二日训练结束,十月二日该大队来广州参观,十月二十八日离海南岛回国。这次,我国无偿地赠送四艘炮艇给越南民主共和国。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日,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海防局参观组,在海防活动处处长阮葵率领下,由我们海军司令部一位科长陪同,从北京来舰队参观访问,商谈在广州建造的高速护卫艇接交问题,和了解护卫艇部队编组、指挥、训练等情况。下午,方正平政委、桂绍彬副政委、邵震参谋长和我接见了该参观组。后来,方正平政委又专门邀请他们座谈了一次,越方很满意。

正在广州建造的高速护卫艇,型号属 55 甲。这种新式巡逻艇刚造出来,在我们舰队还没有开始装备,为了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我国决定首先满足他们需要,由南海舰队负责监造、试航、验收和交接工作。舰队专门成立了验收委员会和接船训练大队。验收委员会由舰队修理部部长郭文声任主任。接船训练大队由张瑞任大队长,王兰芝任政治委员,共有干部战士七十五人。自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越南海军先后派来三批接艇人员共七百七十四人,在我舰队接艇和训练活动共十个月零二十一天,接回护卫艇二十四艘。整个活动历时一年零三个月。

训练先是在海南岛进行,后来搬到了东莞沙角。舰队所属各单位都象对待自己部队一样爱护和关怀接船部队,而且有过之无不及。这时,我们部队的条件较差,但对代训的越南人员是特殊对待的,有段时间主副食品比较紧张,我们就专门派人到各地方去联系解决。首批来学习的炮艇大队

一百三十余人,到达后第三天进行了第一次体检,发现患过疟疾的六十八人,患过痢疾的十一人,其他病的三十一人,体质多属较弱,平均体重五十二点六九公斤。经过一个月的防治与保健,第二次体检,消除了疾病,平均体重增至五十五点八三公斤,增加了三点一四公斤。参训人员和我们穿一样服装,从日用品毛巾、袜子、香烟、火柴、草纸到津贴费等,全部由我方供应,有的用不完就积存起来,准备回国后使用。积存的津贴费,走时根据他们的要求,都兑换成越币,供他们带回去接济家庭。记得有一次他们大队长提出来,家里母亲害病,希望能解决一点人参。下面不好解决,反映了上来。这是超出供应范围的,也没有先例。但是舰队考虑到中越友谊,作为特殊情况,按礼品来处理,还是解决了。虽然数量不多,可以体现出我们上上下下维护中越友谊的心情。

训练上完成了单艇第一、二、三科目和大队第一、二科目训练,进行了外膛枪射击、炮长射击、编队对岸射击、单艇对空射击以及爆破训练等,使他们熟悉本艇的各种武器装备器材的性能,指挥员能独立操纵、指挥单艇和编队执行任务和组织训练。训练大队的同志抱着满腔热情,手把手,包教保学,毫无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他们,想尽办法帮助他们学好。出海训练中,有的自己晕船,还积极照顾越方人员,送茶倒水,倒吐桶,拿出自己的水果给他们吃,使他们很受感动。越方人员学习也很认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初期,有的人在业务技术上和安全保证上还对我们有些不信任,如

508艇越方实习人员在黄埔练习离靠码头,不听从中国艇长右满舵的意见,而用左满舵,造成碰船事故;558艇机器烧坏离合器弹子盒,也是我们叫加油,而他们却没有加油所造成的。601艇他们提出机器冒烟,我们检查后认为没问题,他们不相信,坚持要试验,要求送工厂返工,后来我们又专门组织了试航,结果证明没有问题,他们也表示满意。通过实际行动,逐渐消除了不信任,更加密切了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种无私援助的精神,也体现在配件的供应上。所有我国赠送的艇只,除国旗、信号旗外,完全按照我们部队的配件规定,一一配发。越方人员表示自己国家穷,要求多给些东西。艇上排保养时,本来只计划保养水下部分,因为是新艇,舱内不需要保养,他们也要求再油漆一遍。火炮的高温油漆本来很好,也用普通油漆又油了一次。在返国装油时,想多装油,结果超出标准,油流出到甲板上。临走时,还开出好几页的物资申请单,其中不少是不属于接艇范围的。我们本着“尽量满足要求”的精神,只要合理的,能办到的都予解决。训练中的器材,更是保证需要什么就给什么,需要多少给多少。

每一批训练任务完成后,训练大队党委都要与接船大队党委交换意见,护送他们回国后与越南海军局领导干部交换意见,越方均表示很满意,还送给我们锦旗和相本等礼品。每次护送他们回国,舰队都要专门开会研究。我曾经主

持过这样的会议。接受训练的越海军人员，从干部到战士，和我们的部队相处都很好，认为中国是他们真正的后方，来到中国就如同回到了家一样。

第一次访问越南，是由我带领一些海军同志去的。我第二次去访问越南，是在接见了第三批越南接船人员之后去的。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奉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命令，组织赴越南军事技术组，空军的徐深吉同志任组长，我任副组长。任务是进行军事技术的考察和协助有关军队装备、边防、海防和空防等工作。

我们一行十多人，十一月八日由北京到达南宁，十日下午到达河内。在机场迎接的有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黄文泰、陈文光、总政治部副主任黎光道及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和我驻越使馆的参赞。十一日上午，越南人民军武元甲总司令接见我们，并举行晚宴。同日，黄文泰副总长代表越南国防部同我们商量和安排了技术组在越工作的计划，分三个阶段：听取情况介绍；参观；交换意见。十二日上午，胡志明主席和范文同总理在主席府接见我们军事技术组全体人员。徐深吉同志一个个作了介绍。我因为第一次访问时，胡主席已经接见过，认识我，未等翻译开口，他就向我点头致意。胡主席对广东很有感情，那次见面时，他就特别问道：“你们这里有没有广东人呀？”六十年代我任广州市长时，又接待过胡主席的来访，他还讲到这两次会面的情景，十分亲切。

十一月十九日结束了第一阶段工作。在出发参观前，我和徐深吉同志到武元甲总司令家里商谈，他的夫人出面为我们举行了家宴。

越方热烈欢迎我们去考察了解情况，要我们到各个军区都跑一跑，说他们需要援助的方面很多，量很大，希望我们了解以后，如实向中国党的军委汇报。这次我们在越南待了两个月零三天，除越北军区外，其他四个军区也都到了，参观了海军、空军、炮兵、军事学校、机场、港湾、工厂等。越方要我们多听多看，总的意图是说明他们国防力量薄弱，困难多，特别是在装备物资方面。范文同总理和我们谈话中，曾三次代表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对中国所给予的援助，寄予很大希望。上上下下，口都张得很大，除人民军总参谋部提出具体要求外，下面各个军区也提要求。我们每到一个军区都有宴会，司令政委都出面，来一次汇报，接着就提出要东西的清单。在军事学校，也提出清单来，主要是教材和设备器材。在河内以及和一些军区的接触中，给我们一个突出印象是越方准备和美国作战，许多要求都是按这场未来战争的需要提出的，要给他们装备多少部队，要把仓库修好，除了在边界附近修，还要在我们后方修。要求提供的物资数量，要比他们当时现有的部队的需要多好几倍。而且安排了时间，什么时候送多少，什么时间在哪里修建仓库，等等。

我们到越南来之前，张爱萍副总长交代任务时讲到，对

援助越南，中国的态度是，凡是他们需要的，只要我们有，就给。但技术组不承担具体任务，只听，不表态。

在河内我们住的宾馆，是原来法国的总督府，设备算是很不错了，就是洗澡盆小一点，坐进去就不能动。伙食也比较好，经常都有水果，如著名的龙牙香蕉，还有胡主席家乡的柑子，水特别多，一剥皮就流了。我注意看了一下，从使用的餐具到部队装备的大炮、机枪、步枪、手枪，都来自我国。我国新造的半自动步枪，我在国内还不曾见到，在那里先看到了。这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55甲高速护卫艇，我们也是首先送给越南部队的，说明我们对兄弟国家的真诚援助，大家都感到这是理所当然。越方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也不讲客气。虽然他们知道，我们也不是没有困难。在参观中还发现，一九五八年春交货的十二艘高速护卫艇，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已经有八艘进厂修理，水下钢板锈蚀得很厉害，说明保养很不够。还不按操作规程乱动机器，以致发生故障。其他装备器材的维修保养，也有不少问题。

去奠边府参观是副总长陈文茶陪同的。到达的头一天晚上开了个舞会，把地方干部也请来参加。后来到了傣族居住的地方，在一个大房子里开晚会欢迎，演唱的有少数民族的歌手。这里是山区，文化比较低，讲话跟广东话相似，很多地方有关帝庙、诸葛亮庙。这里妇女劳动很好，重活轻活都干。中年以上的妇女牙都黑得发亮，没事就嚼槟榔，和我国海南岛少数民族地区类似。我们参观了鸿基煤矿、南定纺织

厂。这个纺织厂的机器有老有新，新的都是中国援助的，所用原料棉花也由中国供应。因为工艺水平不高，织成的布卖不出去，又由中国买回来，给我们介绍的人说着笑了，我们也笑了。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一日上午，我们在越南国防部向越军委汇报，由武元甲总司令主持。汇报完毕后武元甲讲了话，大意是：听了你们的意见，我们很受鼓舞，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很重视这些意见，要在军委讨论，尔后报告越劳中央。当天晚上，范文同总理请我和徐深吉同志到他家里便宴。十二日上午，同武元甲总司令作了第二次交谈。晚上，武元甲为我们举行了欢送宴会。在越南活动期间，我们和武元甲总司令接触比较多，他和我们很友好，见了面随便谈。武元甲为人很活泼，很爱开玩笑。在欢送宴会上，他讲了许多感谢中国政府和军队的话。因为我们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去的，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三日离越回国，刚好占了两个年头，所以武元甲在讲话的末尾开玩笑说：“你们这次来，时间不长也不算短，刚好是两年、两个月零十三天”。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我到现在还忘不了当时那种友好的气氛。但谁能想到言犹在耳，竟反目为仇，拿我们援助的东西来打我们。不过我相信，越南人民不会忘记这一切。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是会长久存在下去的。



## 第十九章

### 在广州工作的七年

#### 受命于困难之际

一九六〇年十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约我谈话，说朱光同志决定调去中央某部工作，他推荐我接替朱光同志任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感到很突然，便强调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基本是在部队渡过的，对部队的情况比较熟悉，生活和工作方法也比较适应，而地方工作自己从未做过，情况比较复杂，责任重大而又缺乏经验，怕搞不好有失党和人民的期望。陶铸同志了解我的心情，进行耐心开导，反复讲明搞好广州市工作的重要性和有利条件，鼓励我勇敢挑起这副重担；并说推荐广州市市长的人选问题不是他个人决定的，而是经过省委报

党中央和国务院研究后定的。他还说我是广东人，对全省情况比较了解，在广东人民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中也有一定的影响，由我来当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是比较合适的，等等。服人组织分配，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组织观念。经过陶铸同志这么一说，我也不好再坚持己见了，于是答应先干一段时间试试看，不行，我再回部队去。陶铸同志听了高兴地说：好！先作借调吧。后来经过立法手续，由市人大选举，我当了广州市市长。我在广州工作期间，算是借调的干部，工资关系一直在南海舰队。原来说定是借调二年的，可是接任之后，我全力以赴地去抓工作，临时观念无形中被繁重的任务冲掉了。

初上任的时候，正是我国处于暂时经济困难的时期，真可谓“受命于困难之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但由于我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思想上理论上缺乏充分的准备，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主观指导上发生了失误。大家的头脑发热，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指导和群众热情的积极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不切实际地开展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左”的错误严重地发展起来，以致出现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甚为困苦。我到广州工作的时候，这种困难局面尚未结束。从一九六一年起，为了克服困

难,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广州的经济也进行了调整,压缩了基建和重工业。因而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工业总产值分别比一九六〇年下降百分之三十六点七和百分之四十五。这时,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全面紧张,什么东西都要票证。各机关团体在搞小球藻、“瓜菜代”,吃双蒸饭、甘蔗渣,不少人得了水肿病,还有数万名待业青年需要安置。见此情况,作为新上任的市长,心里是很难受的。我全面地分析了形势后,认为这些困难都是暂时性的,只要党纠正了“左”的政策,很快就可以恢复过来,搞好广州工作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首先是广州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它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北缘,南临珠江,北倚白云山,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文化较高,工商业发达,毗邻港澳,历来都是广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解放后,广州的地位更加重要了。当时帝国主义实行“禁运政策”,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广州就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对外往来的窗口,担负着祖国南大门的特殊功能,因此,广州的工作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的重视和支持。

其次,广州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从周夷王时候开始筑城算起,距今已有二千八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最早与海外通商和进行文化交流的港口之一。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不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有许多先进人物在

这里从事斗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也在这里发生。它既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摇篮,又是大革命的策源地。一百多年前,在这里就发生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英国侵略军的“鸦片战争”和三元里“平英团”的斗争。花县是著名农民运动领袖洪秀全的故乡,他那“太平天国”的理想和具有某些资本主义色彩的思想就是在广州孕育起来的。一九一一年在广州发生的“三二九”反清朝政府的武装起义,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前奏曲。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制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民党“一大”,从此以后广州便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和根据地。北伐战争从这里出师,震撼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也发生在这里。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党又领导人民举行广州起义,在东方建立起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所有这些光荣革命传统,都激励着人们去克服困难,奋发前进。广州流传着一句名言:“万般天下两件事,黄花开后又红花”。<sup>①</sup> 这反映了广州是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英雄城市,我也从这些光荣革命传统中吸取精神力量,增添信心。

第三,我对广州具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广州是我成长的

---

<sup>①</sup> 广州有一座黄花岗和一座红花岗。黄花岗中埋葬有辛亥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建有著名的黄花岗烈士纪念碑。红花岗中埋葬有我党领导的广州起义时牺牲的烈士,现在称为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摇篮。我的前任朱光市长，曾出版了一本《广州好》的诗集。他对广州的历史、人文、风貌作过具体的描写，反映出他对广州的一草一木的热爱心情。我拜读之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也勾引出我对广州的热爱与怀念之情。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六年，我是在广州中山大学附中读完高中后直升大学，在这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并从事过激烈的反帝爱国民主运动。现在又回到它的怀抱，真是思绪万千。正是这种对广州特殊的亲切的感情，鼓励着我勇敢地挑起市长的重任，决心要把工作搞好。

广州人民确实不愧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人民。在我上任之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但广大干部、人民和知识分子都十分体谅我党，与党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渡过难关。从一九六一年起，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压缩基本建设，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强农业战线，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动员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以后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新职工、干部家属、城市居民十三万人回农村参加生产，减轻了对城市的负担。经过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八字方针的指引下，终于使我们渡过了最困难时期。到一九六四年经济形势已全面好转。工业生产大幅度全面上升，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六三年增长将近百分之二十，超计划百分之十三；产品质量普遍提高，花色品种增多；农业连年丰收，农、林、牧、副、渔各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市场商品供应

增加,购销两旺,物价下降,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工业总产值都以递增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发展。农业增产,蔬菜、副食品增多,市场日益繁荣。

我当广州市长期间,在党内是任市委书记(一九六五年二月后为市委第三书记)。当时市委第一书记是王德同志,他身体有病,相当一段时间由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同志代理第一书记职务。焦林义同志任常务书记。一九六五年二月以后,第一书记由雍文涛同志担任,焦林义同志任第二书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则改由焦林义同志担任第一书记。在这期间任过书记处书记的,还有曾志、薛焰、杜祯祥、梁嘉、朱荣、薄怀奇、梁湘等同志。当时政治运动由市委亲自抓,工业生产由焦林义、梁湘同志具体抓,农业最初由我和胡楠卿同志抓,后来主要是由朱荣和杨毅(副市长)抓。我除了负责市政府的全面工作以外,还与主管城市建设的林西副市长一起抓市政建设。陶铸同志很重视城市建设工作,在一次广州市委常委会议上他明确指出:“广州是祖国南大门,把市政建设搞好了,对生产和人民生活有利,在政治上、经济上均有重大意义。”并规定:“广州的市政建设总的是市委挂帅,具体工作由曾生同志挂帅。”我还分管许多工作兼了许多职务。在省里,是副省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广东省分会副主席、外事办公室主任、出口商品交易会主任委员以及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广州体育学院院长等职,主管国防、外事和统战工作。在市里,还

兼任广州军分区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广州市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市政协副主席、市对外友协会长、中苏友协会长等。还分管政法、科技、文教卫生等战线的工作。另外,又有一些临时性的职务,如白云机场扩建工程总指挥部总指挥、以管外事副省长的身份参与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建设的领导工作等等。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工作最为繁忙的时期。有的同志说:“曾市长忙到头发都掉了许多。”情况确实如此。我上任时,头发长得很好,后来竟一度成为半秃子。但可以自慰的是,在这段时间,工作虽然很忙,心情却很愉快,工作也很有意义,与一起共事的罗培元、李广祥、焦林义、林西、杨毅、杜祯祥、梁湘、陈秋安、张瑞权、钟明、纪锦章等副市长合作得很好。特别是中央、省、市委对广州的市政建设给予特殊的关照和支持,每年大致能有四千多万元作为城市建设的费用(包括中央、中南局、省拨的专款,工商业利润提留百分之五以及商品出口交易会拨给一些外汇,等等)。这个数字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国家经济还很困难的情况下,能有这么一笔钱拨出来专搞市政建设,就算是很可观的了。正因为有了这么一笔经费,在我任期内,才办成了几件有益于人民的实事。

## 市政建设的八件大事

经过我亲自抓的市政建设项目,比较大的有如下八件:

第一件，是水上居民迁陆和改造木屋区。

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据解放初期统计，水上居民有一万四千六百六十五户，六万八千二百二十五人。他们房无一椽、地无一寸，以小船为家，主要靠捞鱼虾和搞运输为生，白天劳动，晚上就停泊在珠江上，点上微弱的煤油灯，成为闪烁在江面上的万家渔火。他们常年过着浪里沉浮的生活，遇到刮风下雨，只好听天由命，有时船翻人亡，遭尽劫难。孩子们不能享受上学的机会，为了防止他们掉进江里，父母便在他们身上系一条绳子，胸前背后还绑着一块浮木块。在旧社会，这些处于社会最低层的“蛋民”或“蛋家”，深受压迫和歧视。为了解除水上居民痛苦，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央和省市人民政府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一九五四年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归来，途经广州，专门乘船察看了黄沙、白鹅潭、沙面等沿江一带的小艇，了解水上居民的生活情况，并指示省、市负责同志一定要为水上居民兴建住宅，建设水上居民陆地聚居点和水上居民新村。一九五八年起开始拨出二十万元在仙村兴建住宅，一九五九年又拨出二百万元在河南基立村兴建水上居民住宅。在我接任市长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完成水上居民住宅建设和一系列配套工程。水上居民上岸居住，不仅要建筑住宅，还要兴建学校和商店，以及解决他们的就业、生活和教育问题。此外，还要做好思想工作。有些人习惯了泛宅浮家的生活，住在陆上反有“不自由”之感，上了岸又回去住艇



了。为了尽快完成全部水上居民上陆居住的问题，一九六〇年中央拨一千二百万元专款给省财政厅，到我离任前已基本上实现了基建计划，先后共建了基立村、荔湾涌、大沙头、二沙头、滨江东、南园、素社、石冲口、科甲村、仙村、如意坊、马涌、东望、腊德、塾头基等十五处水上居民住宅群，共建成房屋使用面积二十八万平方米。这项工作，在群众中造成良好的影响，水上居民同声称赞共产党好和社会主义制度好。他们说：旧政府只是向水上居民摊派苛捐杂税，根本不顾“蛋民”的死活，只有在新中国，人民政府才真正关心“蛋民”的疾苦，为我们排忧解难，上岸安居，结束了“世世水为乡，年年艇作家”的漂泊生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解决水上居民迁陆的同时，市政府还对简陋的木屋，集居的旧祠堂和书院进行了改造，以改善一部分市民的居住条件。据一九五八年的统计，分布在广州市各街区的木屋有二万四千四百一十八间，面积五十七万七千平方米，居住着三万二千九百户，十三万九千人。这些木屋十分低矮，多属危房。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市人民政府采取“自建公助”，即资金由本人自筹一部分，亲友帮助一部分，单位和个人帮助一部分的办法，把木屋改造为砖瓦房和混合结构的楼房，共改造了一万一千零一十八间，约占整个木屋的一半左右，使五万多人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其余的一半木屋，后来也被全部改造。与此同时，在新工业区如员村、河南、芳村、黄埔等地兴建了一批职工宿舍。此外，还建成了建

设新村、和平新村、凤凰新村、晓港新村等居民住宅区。但是,由于处于困难时期,总的方面市民的住房条件改善不多,欠帐较大。当时人平均住宅面积只有三平方米左右。还有,当时新工业区,边缘地区的生活设施很差,粮、油、煤、肉、菜等生活必需品要跑到市内来买,不少居民宁愿在市区挤住也不愿搬迁到新工业区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请准省政府拨给专款,增设了十八个商业网点,并兴建了一个商用冷藏库,从而缓和了供求矛盾,受到群众的欢迎。

第二件,是爱群大厦的扩建与广州宾馆的兴建。

爱群大厦原名爱群大酒店,建成于一九三七年七月,楼分十五层,高六十三米,矗立在广州市珠江边(长堤),是解放前华南最高的建筑物。解放后,为人民政府所接管,并作为接待外宾的一个重要单位。一九六五年中央拨了三百万元维修爱群大厦,我们用这笔钱扩建了一座新爱群大厦,附在旧爱群大厦的东侧。这项工程从一九六五年四月开始拆迁筹建,一九六六年四月全部建成交付使用,花了一年时间,新爱群分十八层,高六十七米多,十四楼有露天花园,十八楼有了望厅,整座大厦好象一艘巨舰停泊在珠江岸边。新旧楼溶为一体,共有三百八十一套房间,七百五十张床位,是当时广州接待条件较好的单位之一。

新爱群大厦设计的一个特点是采用框架剪力墙系统结构,既和原有旧楼有骑楼协调,又能有效地抵抗地震力,用钢材少(提高混凝土标号),与国外同类型的结构减少百分

之三十至四十的钢材,节约了投资,缩短了工期。

新爱群大厦建好之后,中央领导同志评价很高。周总理称赞把维修旧爱群大厦的钱用来兴建新爱群“很聪明”,花钱不多,又很实用。爱群大厦后来改称为人民大厦。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承建这个工程的并不是什么大工程队,而是广州市房管局住宅公司的修缮工程队。当这个小小的工程队负责承建这么重大工程项目时,有的同志便说这是“小鸡吃大米”(广州话,自不量力的意思)。但是,这个工程队不仅干劲大而且有科学精神,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按时按质完成了任务,从而获得了声誉。

随着我国对外往来的发展,一年春秋两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举行,来广州的外国朋友和港澳同胞越来越多,而宾馆的数量很少,远远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形势。特别是在交易会期间,住房十分紧张。有的外宾下飞机后要在机场等候几个小时才能安排到住所,有的到了宾馆也要在会客室等几个钟头,才能住进房间。广州市所有的旅馆住满了,连从化温泉宾馆、佛山的华侨大厦、白云山顶和统战部及工商界办起来的筲箕窝学习用房也都住满了,有的客商还在香港等候。这样给外宾和客商带来了许多不便,也影响了我国的声誉。外国朋友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们广州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房子住不好。”为了解决这个突出的矛盾,我们向省、中南局有关领导反映,建议新建一座专门接待外宾的宾馆。陶铸同志很支持。他于一九六五年底向周总理汇报,要求国

家拨一半钱，广州自筹一半钱，来兴建一座外宾旅馆。后来，经过周总理与陈毅、李富春副总理商量，同意兴建一座有五百个房间、一千个床位的大宾馆，全部钱由中央出，并拨给广州市六百万元，作为修建宾馆的专款。陶铸同志立即把情况告诉市委，要我们迅速做出几个方案讨论。我们还征得陶铸同志的同意，把原先已准备的钱也加进去，力求搞得更好一些。对宾馆的建设，贺龙副总理出了一些好主意。他在陶铸同志家里对我们说，中国用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高楼，要比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的要高，具体来说就是要比上海的国际饭店（原名百老汇大厦）还要高，层次也要多。还说，好马一定要配上好鞍，室内装修也要一流的，要搞空调，要搞美化，要有花园等等。于是我们就派人到上海去测量国际饭店的高度。最后，我们提出建二十七层（上海国际饭店才二十四层），总高度比国际饭店高三米多，地点选在海珠广场，取名为“广州宾馆”。

这是当时全国最高的建筑物，全部设计、施工都由自己解决。当时我们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我觉得责任重大，担心万一经受不住台风的考验会塌下来，便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召开广州宾馆（当时叫外宾旅馆）设计方案的讨论会，邀请了有关方面专家共同研讨。参加会议的有华南工学院院长罗明燏、教授罗松发、陈伯齐、厦世昌，广东省设计院总工程师黄远强，广州市设计院副院长余峻南，广州市建设局总工程师金泽光，广州市规划局结构工程师郑昭，以及省

市建筑科学研究部门和有关设计单位的建筑专家、结构专家共三十多人,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研究。这次会议由我和林西同志主持。我对与会的专家提出如下设计要求:一是绝对保证安全,要能经得住七级地震和十二级台风的考验;二是要反映我国建筑高层楼宇的水平,具有南方城市的特色。我们这里长年不下雪,不用暖气,但要通风明亮,有风生风,住起来舒适;三是要全面贯彻多快好省精神,在确保安全、结构稳固的基础上,节省材料,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讲速度,时间虽然紧迫,但各种科学数据一定要搞准确。还是这么一句老话:百年大计,质量第一。

这一次诸葛亮会议,与会专家经过各种方案进行认真的比较,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最后广州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再召开了多次小型的专门会议,对大家的意见进行认真研究,制定了一个设计方案:楼分二十七层、每层高三米,主楼总高度为八十六米,总建筑面积二万平方米左右,加上附属的低层建筑总共二万三千平方米左右,总的造价土建约四百五十万元,另加水电、设备、家具、装修等三百万元,总共约七百五十万元。为了能经受十二级台风和七级烈度的地震力,主楼底部共打下四百三十七根桩。这个工程由广州市房管局住宅公司房屋修缮工程队承担施工任务,争取一年之内完成。这个方案经陶铸和周总理批准后,立即施工兴建。

初时,工程进展很顺利,施工队的情绪很高,各方面配

合也很好。但当主楼升至二十四层时，麻烦的事就来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已发生，贺龙元帅、陶铸同志先后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陷害，受到批斗。不明真相的“造反派”，听说广州外宾旅馆专门用于接待外宾的，设计方案要建二十七层，超过上海国际饭店而成为全国第一的高层建筑，又是贺龙、陶铸的主意，因此，就给这项工程加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说什么这是搞“封资修”，为贺龙、陶铸“立碑”，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典型例子，要立即下马。如果就此停下来，总高度是低于上海的国际饭店的，怎么办呢？我们那时说话也不灵了，只好通过承建工程的工人代表向当时支左的广东省军区陈德政委汇报，陈德同志很支持工人的意见，认为应该继续按原计划完成工程任务。但鉴于这个问题很复杂，他的话“造反派”（多数是外地来的）也不一定听，就由他写报告向周总理汇报这个工程碰到的困难，建议由中央出面做工作。周总理接到报告后，马上找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开会讨论，大家认为这个项目是全国计划会议定的，应按原计划继续完成，就以周总理的名义批复下来，才使这个工程免于夭折，但完成的时间已受到影响。我未见到工程的剪彩，就被“打倒”了。从交付使用二十多年的情况来看，这个高层建筑质量还是好的。这也说明，中国人民是有能力自己设计，自己建筑高楼的。

第三件，是珠江两岸的整顿改造。

珠江是穿流于广州市中心的一条大动脉，它把市区分

成两半，南岸称为河南，北岸称为河北。解放初期，珠江两岸堤岸杂乱无章、残缺不整、市容不雅、交通不便，是个烂堤。因此，我们把整顿改造珠江两岸作为市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来抓。

北岸的大小码头很多，泊位很乱。从一九六四年起，我们首先对长堤凌乱码头进行了整理、合并，除保留天字码头等几处必要的轮渡码头外，其余的码头、泊位均予拆除。然后对长堤的马路及堤岸进行彻底的整治，把影响市容交通的建筑物通通拆掉，把下沉和毁坏了的堤坝修理好。整治路段从大沙头西船栏起至沙面东桥，长达三千六百米。并在沿岸建起了铁栏杆，种上路树，安上椅子，供人们小憩。还将沿江路的路面及行人道重新修平拉直，把沿江的电力、电讯线路全部埋设在地下，同时把沿江路的海珠广场、沙面、大沙头这三个地方建设成为绿化点。整治沿江路大概花了一年时间，于一九六五年完成。用去一百多万元。

珠江南岸原是一些修建小船艇的店铺、竹木业和铁器小手工业户、货仓堆栈转运临时竹木码头等云集的烂堤，沿岸还搭盖了不少水上人家的临时性竹木房子。为了配合珠江河道及两岸的整治，市政府决定兴建一条滨江大道，并将珠江河道理顺，在特别宽的河道砌石筑坝，在坝内填土修路。这一项工程原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动工的，后来在一九六一年由于贯彻“八字方针”而中途下马停工，到一九六四年十月才复工，一九六五年全部竣工。滨江大道全长四千九

百八十米，路面总宽度为三十六米，包括行车道十四米，内人行道六点五米，江边人行道（即外人行道）九点五米，绿化地带六米，工程总投资为一千一百五十万元。

珠江两岸经过整治改造后，成为美观畅通的长廊，给广州市增添了风采，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美丽的珠江。人们高兴地说：“一江流水增风采，两岸游人尽欢腾。”

第四件，是道路交通设施的整治改造和建设。

广州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市区道路大部分是低级路面，道路狭窄，弯曲不直，坑洼不平，基础薄弱。解放后，五十年代虽然作了一些整治，但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陈旧、落后的面貌。特别是老城区，人口密集，建筑密集，机动车辆密集，铁路又深入其中，经常出现车与人争路的矛盾状况，影响到市内交通的流畅。因此，对广州的道路交通进行整治改造是十分必要的。但由于财力有限，在我任期内只能按照轻重缓急来安排项目：（一）是新建、扩建和大翻修了一百多公里长的马路，其中比较主要的有南岸公路、河南工业大道、中山一路、芳村工业大道、黄埔大道（修至鱼珠）、大北路至机场公路、环市路和广花路等。在东风路将天官里与造币左路拉直扩宽（由原来的十二米扩宽为二十四米）。把市区的马路铺设沥青和三合土路面。用以工代赈的方法，把通向白云山的环山公路改造为沥青路面。（二）是在跨越铁路线的要冲地段建立起涵洞式的立体交叉，如德泥路立体交叉、大北路立体交叉、沙河立体交叉等，使之可同时通火车和汽



车,减少了交通阻塞现象。(三)是新建了一批桥梁,如人民大桥(即第二海珠桥)、山村大桥、从化神岗大桥等。特别是一九六六年开始施工兴建的人民大桥,花费我不少精力。当时由我担任大桥工程的总指挥,金泽光同志担任副总指挥兼总工程师。我们事先组织了有伍树人、冯海涛等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的十多人的设计小组,由伍树人担任组长。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和实地勘测,制定了一个建桥方案,包括两边引桥在内,该桥全长为一百八十二米,宽十二米,其中有三个跨度共七十米。整个桥面和桥梁都是用引力钢筋混凝土预制件。在最后审定方案时,金泽光同志提出两个问题,要我作出决断。一个是原设计方案北岸引桥的走向是往东穿过文化公园的,他提出改为沿沙基冲边向北走,这样可减少拆迁房屋又避免了把文化公园劈为两半。我同意这个改向意见,但是对金泽光等同志提出桥面宽度由十二米扩大为十四米的意见,因考虑经费问题没有接受,我说待以后再去扩宽吧!现在看来桥面确实窄了一点,金老的意见是对的。从总的来说,这座桥的建设是比较顺利的,设计合理,施工方法先进,即根据广州的实际情况,采取纵向横向分开整体吊装的方法,在一百吨的船上把预制件吊装上去。这种吊装方法比较新,我怕出问题,最初几天我整天都到现场观看,幸好一切都很顺利。工人和技术人员通力合作,干劲很大,原计划每天吊装两根梁,实际上提高了一倍,每天完成四根梁的吊装任务。因而工程进度大大加快,原计划要到一九六七

年底完工的，却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全部竣工，实际上提前了半年时间，质量完全符合要求，费用也节约了一百五十万元（中央建设工程部核准投资是八百万元，实际上只用去六百五十万元）。我预先测算到能有节余，便在一九六七年三月我离开广州前，把这笔钱拨给花县建氮肥厂，发展农业生产。（四）是在大力新建扩建和改造马路的同时，对交通工具进行改革。当时运输工具很落后，运货主要靠大板车、猪笼车。一九六二年周恩来总理在广州视察市容时，就觉得运输工具太落后了，指示要改变这种面貌，并亲自批拨了一些车辆指标。我们也买了十辆解放牌汽车和一批小型三轮汽车。从一九六六年起，广州市第三运输公司属下用作运货的大板车一千六百多辆全部淘汰，但替代的大型汽车远远不够，中央给的指标又迟迟未落实。为了此事，我又根据陶铸同志的指示亲自向中南局计委周光春同志打报告，要求尽快给广州二百辆大型汽车。另外，于一九六二年建成了文化公园——人民路——中山六路与解放北路相衔接的电车线网，和新辟了一条从文化公园到东山的二路电车。一九六五年广州市的无轨电车从一九六〇年的十三辆增至四十辆，并逐步以十四米的通道车取代了八点七米的小电车和挂车。（五）是新装、检修更换了十多万米长的路灯。经过这样一翻的整治和加强管理，不仅改变了道路不平、路灯不明的状况，而且市容和交通秩序也得到改善，提高了道路的完好率和利用率，也提高了对道路交通设施的管理水平。

第五件，是园林绿化建设。

园林绿化建设是市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市容和人民的健康。要使全市人民在舒适的环境里生活、工作，就要搞好园林绿化建设。这也是城市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广州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自然条件好，有利于园林绿化工作的开展。但解放前，广州的园林建设很落后，城市绿化复盖率只有百分之一一点五六，行道树仅五千二百株，全市的公园只有四个，即：永汉公园（现改为儿童公园）、中央公园（现改为人民公园）、黄花岗（现黄花岗公园的一部分）、观音山公园（现改为越秀公园的一部分）。这些公园大都荒芜残缺，设备简陋，总面积只有二十五公顷。解放后，人民政府很重视这一工作，我的前任朱光市长曾经提出过“绿化长堤，美化广州”的口号。陶铸同志也很关心广州的园林绿化建设，出了许多好主意，甚至在哪里搞个绿化点，种什么树都提出具体意见。还经常对我们说：“市容就是市政，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一定要把园林绿化工作搞好。”林西同志是这方面的专家，他领导园林部门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在我到广州以后，主要是做提高管理水平，采取专业绿化工程队与发动群众性的植树造林相结合的方针，巩固和发展原来的绿化点和绿化带，着重抓了对原有公园的改造、扩建和提高绿化面的工作。五十年代新建的白云山风景区、麓湖公园、流花湖公园、荔湾湖公园、东湖公园、动物公园、文化公园、晓港公园、港幢公园、广州起义

烈士陵园、华南植物园、森林公园(即东郊公园)、芳村公园(现改为人民公园)、黄埔公园、蟹山公园等十五个,加上原有的四个共十九个公园。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充实扩建,加强管理,增添设施,并成为重点的绿化地区。比如白云山,一九五八年市政府已决定为风景区,成立了白云建设管理处,在解放初期直播造林四十万株的基础上,再次发动群众种植果树三十万株,竹子七万多丛,开辟茶园五百亩,建设环山公路二十四公里,水库二十一个。一九六三年,我们又继续进行白云山风景区的建设,修复了一大批名胜古迹和园林建筑,如天南第一峰、白云晚望、云崖、白云松涛、明珠楼、松风轩以及双溪别墅、山庄旅舍、松涛别院、黄婆洞果园、松溪等旅游服务点,进一步修建环山道路和游览小道、避雨亭、廊,增设服务设施,成为名副其实的风景游览区。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一九六四年增建了一座中朝友谊亭,叶剑英同志为该亭题词,不仅在政治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增添了园内一景。其他各个公园也都增添了不少设施,使公园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还新辟了海珠广场、平英广场、陵园广场等九个广场,作为绿化点和风景点,供人们游览憩息。对沙面加强了管理。同时还建立了具有各种情趣、有地方特色的专业性公园、花园,如兰圃、西苑、海珠花鸟乐园等。

路树对美化市容、遮阳、挡雨、防尘都有积极作用。解放前仅有路树五千多株,解放后经过十几年的营种,到一九六三年,全广州市区(不包括市属县)二百八十多公里的道路

共种上了路树八十万株，并已绿荫如盖了。当时的黄埔大道、广从公路和先烈路等就有如绿色的长廊。此外，凡是新工业区、新住宅区的兴建，我们都抓住绿化工作，要求见缝插针，在房前屋后的空地种上花果树木，美化环境，使花城更加美丽。

绿化工作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事业，不仅要依靠专业队伍去搞，还必须发动群众去进行。因此，每年都要开展一次群众性的植树活动周，每年平均都得种上五十万株树苗，绿化荒山秃岭。但由于管理不善，成活率不高，初期往往是“上山一窝蜂，下山一场空”。关键是不懂科学种树，没有实行管理责任制。后来，我就提出划分地段，由各单位包种包管，并向群众讲明栽树的技术。要求种一株，活一株。为了加强绿化工作的管理，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发了“保护绿化奖惩暂行办法”，对保护绿化有功的给予奖励，对破坏绿化的给予惩处，并要求坚决执行砍树要经批准的规定，实行“砍一棵，种三棵”的制度，未经批准擅自砍树木者作为破坏绿化加以惩处。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绿化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到一九六五年，市区绿化复盖率由解放前的百分之一点五六增至百分之二十七点三，居全国各大城市的第二位。其中公园面积从一九五〇年的三十二点六公顷增至六百四十四公顷，为解放前的二十倍，平均每个市民占有绿化面积为五平方米。

第六件,是白云机场扩建工程。

这是中央交办的一项艰巨而紧急的任务。解放初期,广州民航使用的东郊天河机场设施很落后,一九六〇年才转到白云机场。白云机场原来是一个旧机场,位于市区西北面,距离市区约六公里。但当时机场规模很小,跑道只有二千米,房屋总建筑面积只有九千五百平方米,进场公路是路面狭窄的黄土路,候机室三千二百平方米,停机坪仅有四万七千平方米,是广州早期的军用机场,不能起降大型喷气客机。随着我国外事活动的发展,友好往来的增加,这种落后的机场设施和场地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了。因此,中央决定对白云机场进行大规模的扩建。要求建成为具有现代化的场道和通讯导航等设备,可供世界上各种巨型喷气客机起飞和降落的现代化国际机场,作为华南民用航空的枢纽和空中门户。

筹建机场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一九六三年十月底,周总理把空军后勤部一位部长从上海虹桥机场(当时正在扩建)调到广州参加筹建白云机场。首次筹备会议是在陶铸同志(这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家里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空后那位部长和我以外,还有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其中有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中南局书记李尔重、广东省省长陈郁、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广州市委书记曾志、广州市副市长林西、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部长孙兆溪等同志。经过讨论

决定成立白云机场扩建工程总指挥部，由我担任总指挥，汤国良（市计委主任）、孙兆溪、王雨青（民航总局局长）、戴机（市建设局局长）任副总指挥。而实际上总的领导人是周总理。

扩建白云机场，还有这么个背景情况：当时巴基斯坦的总统阿尤布·汗，与中国很为友好，在中国和苏联都要求与巴基斯坦通航的情况下，愿意先与中国通航。但中国的机场太小，不能降落大型客机，这样周总理才下决心尽快把白云机场作大规模扩建，要赶在苏联之前与巴基斯坦通航。正在我们筹建期间，周总理出访巴基斯坦，从阿尤布·汗总统那里得悉，苏联估计中国扩建机场起码需要两年时间，阿尤布·汗总统对周总理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等待那么长时间了，你们若能在一九六四年五月扩建好机场，我们就先与中国通航，否则，只好与苏联先通航了。周总理立即从巴基斯坦打电话回来，要我们作为一个政治任务去完成，指示无论如何都要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份完成扩建任务。周总理并指示有关物资部门，除了保证外贸出口和救灾外，都要服从机场扩建工程的需要。

白云机场的扩建是我国人民依靠自力更生搞起来的，整个工程全部由我们自己勘察、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工程总共划分为四个作业区：第一个工区是机场跑道；第二个工区是机场外的排水工程，包括上下坑、大金钟水库的加固等；第三个工区是大北立体交叉桥的兴建；第四个工区是修

建佛山沙堤机场候机楼，作为临时替代白云机场，以免影响航运业务。

除了机场主体工程由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负责设计以外，其余的机场外排水工程、大北立交桥、沙堤机场候机楼，以及通往机场的道路等设计，均由地方负责设计。

参加场道工程施工的主力，有空军和陆军工程兵部队三千人（包括广州军区空军第四工程兵纵队、武汉军区空军第六工程兵纵队的一个大队以及新组建的广州军区工程兵第五团），还有本市越秀、荔湾、东山、海珠和郊区的民工一万多人。其他通讯导航、下水道、排洪沟、进场公路、场内土木建筑等配套工程，以及为场道工程服务的铁路、供水、供电、搭棚等临时性工程，则由所属单位负责组织人力，前后参加过附属配套工程人员也有一万余人。因此，全部参加白云机场扩建工程的共有三万三千人。

经过紧急的筹备之后，机场扩建工程于一九六四年一月五日正式开始施工。这样规模巨大的扩建工程需要建筑材料的数量是很大的，光石头就需三万立方，木头一万多立方，以及大量的水泥、钢材等。这些紧缺的建筑材料，主要依靠全国各地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解决的。山西、河北、上海、天津、武汉、贵州、河南等省、市，运来许多水泥、钢筋、木材和其他建筑材料；石头供应问题，把广东省的樟木头、虎门、石山、英德等石矿场以及铁路沿线的石料厂生产的石料全部包下来还不够，又到广西、湖南、江西等省区去



组织石料。

为了抓好工程进度和质量，我们总指挥部每个星期汇报一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例如听到由于粮食困难，工人吃不饱饭而又要出大力气这个问题时，我就向陶铸同志反映，请他批转粮食部门给工人增加口粮。我怕不能按期完成任务，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要去工地转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而孙兆溪同志则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总指挥部处理日常事务。这里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作为配套工程的大北立体交叉桥，在建设过程中碰到了麻烦。这个立体交叉桥是处于机场进入市区的咽喉地带，可以同时通火车和汽车，实用美观，据说当时这样的立体交叉桥是中国的第一个，全世界的第五个。早在朱光同志任市长时（一九五七年）就组织金泽光、陈伯臻、陈树德等工程师设计了，由于经济困难没有建成，直到一九六三年才恢复建设的。当时我国经济还很困难，这个立体交叉桥需要三百六十多万元的造价显得高了些，因而报到中央建委审批时，李富春同志不同意，打电报给广东省停止这项工程的施工。这是陶铸同志提出要搞的项目，接到中建委的电报之后，他要我们不要收，仍按原设计施工，由他向李富春同志讲明情况，这样工程才上去了。后来，中央派人来检查，批评我们乱花钱。十多个人在沙面住了三个月，与我们算细帐。当 they 要离开时，才对我说：“你们这个工程的费用与上海的差不多，不算贵。”这样才算了结。

经过总指挥部全体干部的共同努力,参加这个工程的部队工程兵指战员和民工的日夜奋战,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按时按质完成了任务。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初开始筹建,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十日基本建成,前后只有五个月的时间,由一九六四年一月五日正式施工算起到交付使用,仅用了八十七天。这种建设速度是少见的。工程质量完全符合要求。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终于赶在苏巴通航之前,中国国际航线首次试航成功。巴基斯坦大型喷气客机在新建的白云国际机场安全着陆。随机试航的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机航经理加马尔和工作人员三十六人到达机场后,参观了机场的各种设施,对机场的设备表示满意,对我们建设机场的速度感到惊奇。

由于我们组织得好,这么大规模的工程,不仅速度快,质量好,而且什么事故都未发生,因而中央和省、市委均很满意。陶铸同志一九六五年在广州市委常委会议上,还特地提起这件事。他说:广州对外地的同志有老大思想,办事情总是慢吞吞的,今后抓工作,就要象抓机场扩建工程那样,既雷厉风行,又扎扎实实。

中巴通航,新机场启用,标志着白云机场的扩建工程基本完成。工程总指挥部也撤销了,但还有一些附属配套工程到一九六五年才陆续完成。

白云机场扩建工程全部投资三千六百多万元(包括大北立体交叉桥和机场路等)。改造扩建后的机场主跑道由原

来的二千米增加到三千八百八十米，宽六十米，完成了全部航道工程和国际通航所必须的配套工程。同时改善了机场通往市区的进场公路和连接机场公路的立体交叉工程。新建起三千五百平方米的候机大楼，附属房屋工程面积增加了九千五百平方米。一九六五年白云机场的营运总周转量，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二倍，创历史最高水平。

### 第七件，是新火车站的建设

广州火车客运站原址在大沙头，又称为东站，是英国人在一九一一年修建广九铁路时建造的，站房比较狭小，股道、站台很短，仅能容纳四至六列车。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经过多次扩建站场，延长股道、站台，但仍不能适应铁路客运事业的发展。一九六二年就提出要修建新火车客运站。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选定了广州流花桥地区，通称北站。计划建五层，总高度是三十二米，还有一个宽大的站场，铺二十四公分厚的水泥路面，东西三个广场成为半月型环岛，长二百四十米，宽一百九十米，在全国也属于大型的交通广场。一九六五年已经动工，原计划一九六六年完成。但是，当建到二层时由于发生了一场风波，工程被迫停了下来。这是由于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不让修建，理由是原设计方案的高度太高，会影响白云机场的飞机安全降落。当时，我和陶铸等人思想不通，认为不会影响飞机的安全降落，便要求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部长孙兆溪搞个数据，计算一下新火车站建成后，对飞机的安全起降究

竟有无影响。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孙兆溪同志才对我们说,现在掌握的数据不足,很难计算准确(后来才知道他也有难处,他曾把计算出来对飞机起降安全没有影响的结果,去上海向顶头上司刘亚楼汇报,却遭到一顿指责,回到广州后,只好以上述的话来应付我们,不敢说真话)。为了这件事,陶铸同志亲自打电报给刘亚楼同志,邀请他来广州一起商量。刘亚楼到广州后,我们就与他一起讨论。事前我作了周密计算,想在会议上说服刘亚楼。我说,桂花岗的山头比新火车站还高四米(即三十六米),它都不影响飞机的安全起降,新火车站只有三十二米,那就更没有问题了。但刘亚楼却坚持已见,生硬地说:山头可以削平,新火车站建好后就不能削平了,你们如果要建,总高度不能超过二十七米。陶铸同志和我都认为宁愿停建,也不能修改计划和图纸,就这样中途下马。直到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新火车站才按原计划继续兴建,到一九七四年竣工。建好后的广州新火车站,分为主楼和副楼两个部分,站前广场面积为四万三千平方米,是目前华南地区最大的铁路客运枢纽站。

第八件,是广州电视塔与人防九号工程等建设。

广州电视塔是在海拔四十五米的越秀山坡上建造的,塔身二百米,为当时全国最高的电视塔。广州电视事业是建国后才发展起来的。一九五八年开始筹建,临时利用座落在越秀山百步梯顶端的中山纪念碑,把发射机和天线安装在纪念碑上面。一九五九年九月建成,试播黑白电视节目,一

九六〇年七月一日正式播出。但发射功率只有一千瓦，不能适应广大群众更高的要求。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九六四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在中央和省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又拨出专款兴建新的电视塔，由中南化肥建设公司承建，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建成。

兴建这样高的电视塔是没有经验的，但当时我们十分注意工程质量。比如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一些法兰盘母材料有开裂现象，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就有可能造成倒塌的危险。因此，主管部门立即成立有设计、制造、建设三个单位参加的检查小组，对电视塔的工程质量进行详细检查，及时解决这个重大的技术质量问题。正好当时全国焊接学会的专家们都在广州开会，就邀请他们帮助检查和提出改进意见。检查小组在北京和广州地区共召开了十二次会议。全国焊接学会成员、北京建工部建筑机械金属结构设计研究所、华南工学院等单位的专家、教授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二十多份有关焊接质量的报告。终于解决了塔架主要焊缝（法兰盘焊缝）的安全质量问题，使之能够经得住由于高温、台风、地震等因素造成的压、拉、扭、震等力量的考验。

广州市地下工程即人防第九号工程是当时一项比较大的建设项目。原计划投资一千万元（市负责一半，中南局、广东省共负责一半），但实际上却花了一千七百多万元。这是一九六五年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对战争的严重性迫切性估计过高，加上对巨大工程没有进行科学化、民主化的

可行性研究,由少数人头脑发热而主观决定兴建的。整个工程由陈郁省长负责领导,我作为广州市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也参加了这一项工程的领导工作。现在回过头来看,建设这个工程是毫无必要的,纯属浪费,每年要一笔维修费用,却不能发挥效益。这是一个教训。

在我担任广州市长六年多时间里,城市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比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州城市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来说,那是小巫见大巫了。可是在当时经济困难的条件下能够办成这么几件事,也是很不容易的。我有如下几条体会:

一是要抓钱,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我充分利用广州是祖国南大门,是社会主义窗口这一特殊地位,争取中央、中南局和省的领导同志重视与支持,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给予一些特殊照顾。例如从上交的工商业利润中提留百分之五作为城市建设的经费,一些特殊项目如白云国际机场扩建工程、广州宾馆、水上居民住宅等重大项目,由中央直接拨专款。这样,我手中每年掌握着四至五千万元建设经费,日子就好过得多了。关于从上交工商业利润中提留百分之五作城建费用这一条,当时全国只有广州得到这个照顾,别的城市是没有的,五十年代也没有,只是在我任期内才有,“文革”开始以后不久,又被取消了,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恢复。

二是要抓物。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物资紧缺,钢材、木

材、水泥三大建筑材料更是统配物资，有钱也不一定能够买到。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除了搞好与外地的协作关系，争取各方面支持以外，还要有自己的原料基地，如增加钢材、水泥的自给率等。我们在花县的新华镇兴建了一个水泥厂，又在槎头建了水泥厂，产品基本上可以由本市支配使用。另外，从广州钢铁厂等工厂增产钢材，解决了一部分紧缺的材料。

三是要抓人才和建设队伍。当时搞城市建设还缺乏经验，人才更为宝贵，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下，一切重大建设项目的的设计只能依靠自己来解决。但是，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用人讲政治，对一些所谓出身成份不好或被怀疑有这样那样问题而又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敢不敢用，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如市建设局对建筑结构力学方面很有经验的工程师郑昭，桥梁建筑专家、工程师陈伯臻，他们都是一九三六年中山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但在“左”的错误思潮时期，不敢重用他们。我经过反复研究后，认为他们有真才实学，一贯从事建筑技术工作，表现不错，便大胆起用他们。新爱群大厦和广州宾馆等高层建筑工程，最初我是提心吊胆的，曾对建设局局长戴机说：最怕是基础结构不牢固，建好后经不起强台风的袭击而塌了下来。如果这样，我这个市长，你这个局长都得坐牢。戴机说，不用怕，郑昭是很有经验的工程师，他计算过签了字的工程，你完全可以放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郑昭、陈伯臻落实了政

策,提为三级工程师。广州许多大的建设项目,如白天鹅宾馆等,郑昭都参加了工程结构的设计(郑昭于一九八三年去世)。陈伯臻除了参加当时建造广州神岗大桥和大北立体交叉桥、沙河立体交叉桥等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之外,后来广州地区的许多桥梁建设都有他参加研究设计,对桥梁建设作出了贡献。珠江第三桥的建设方案,就是在陈伯臻生前设计方案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他于一九八二年去世)。

对于大胆使用郑昭、陈伯臻等一批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方面,还应归功于叶剑英元帅。这些曾一度被清理回乡的工程师,是叶帅听了我们的汇报之后,用他的名义叫林西同志去找回来参加工程设计的。他还说:“如果有人说什么,就说是我同意的。”这样就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支持,使得一批建设人才不致被埋没,解决了最宝贵的人才问题。

不仅要有一批高级的工程技术人员,还要有一支城市建设的队伍,才能按质按量地完成任任务。建国以后,广州市经过多年的组建,造就了一支比较有经验的市政工程建设队伍,我们的项目是依靠自己的工程队伍去承担的。特别是象建设新爱群大厦和广州宾馆等高层建筑,都是由广州市房管局修缮工程队负责承建的。初时很多人都在议论,怀疑这样的工程队能否建造这样高质量的工程项目。结果,事实作了很好的回答。



## 公安政法战线的建设

广州毗邻港澳,处于对敌斗争的前线,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不断派遣特务潜入本市进行破坏活动。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台湾国民党当局利用大陆经济生活出现暂时困难这一时机,企图窜犯大陆沿海地区,派了九股武装特务,在我沿海地区偷渡登陆,被我全部消灭。与此同时,还秘密派遣一批又一批的特务,阴谋破坏铁路、列车、公路、桥梁,纵火焚烧戏院、粮仓,搜集我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情报,散发反动传单,制造谣言,挑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等等。一九六三年,台湾国民党当局又派遣六股武装特务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登陆(均被我全歼)。潜藏在内地的反革命分子也蠢蠢欲动,遥相呼应,对敌斗争一度比较尖锐。广州市更是首当其冲,在全国发生的美蒋特务案件中,广州就占了一半。因此,我与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广祥同志密切配合,紧紧依靠政法战线的广大干部和民警,抓好对敌斗争工作。广州市的公安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回忆起来,这一时期我对公安政法战线主要抓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一、妥善处理了“东站事件”。

一九六二年六月六日,发生了大批群众冲火车站(即东站)的事件。这是由坏人煽动起来的。由于三年经济困难,社会上人心浮动,政治案件很多,敌人也很嚣张,甚至把反

动传单撒在沙面大街和公安局长的门前,大肆造谣说:为了庆祝英国女王生日,边境开放三天,不用通行证可以去香港,等等。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误信谣言,一批又一批地往火车站冲去,争先恐后地爬上开往香港的火车,造成了交通阻塞,秩序混乱。但由于我们采取了果断的措施,进行妥善处理,事件很快就平息了。我是自始至终都在负责处理这个事件的。

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一九六二年六月五日)晚饭后,我接到市政法委员会副主任陈恭同志打来的电话,说东站秩序很混乱。听后,我要他马上跟我一同去东站看看。为了不让群众认出我,便戴上一个大口罩,把帽子拉得很低。从现场走了一趟之后就到广九铁路派出所,听取了情况汇报,觉得问题很严重。便先挂电话给陈郁省长,向他简要地汇报了情况。之后,又打电话给李广祥同志,他不在。我们就驱车到陈郁同志家里,详细谈了东站情况。陈郁同志听了汇报后也觉得问题很严重,便问我怎么办好?我回答说:“要采取紧急措施,否则就不好办了。”陈郁同志马上打电话约赵紫阳同志、林李明同志和广州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以及赵武成、李广祥等同志到他家里,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共同研究对策。人还未到齐,就接到广九铁路派出所的电话报告说,聚集在东站的群众越来越多,已达万余人,前往维持秩序和做宣传的警车被推翻,有的警察被打或被抓走。人到齐后,由我向大家汇报群众冲东站的情况,然后,提出实行军事戒严

的紧急措施。经过研究后，与会的同志统一了认识，都同意实行军事戒严，要求广州军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在广九车站实行戒严。同时，市政府派出宣传车，揭露不用通行证可以自由进入香港是敌人造出的谣言，劝群众切莫轻信。并成立了一个维持秩序的临时指挥机构。

由于我们采取了紧急有力的措施，六月六日就把这一事件平息了。事件平息后，我又建议，应该认真总结这一事件的经验教训。为此，召开了两个会议：一是公安政法战线的敌情分析会，通过东站事件的发生，全面分析了敌人的动态，采取有力的措施，侦破了一批大案，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另一个会议是市委领导会议，先在市委常委统一对东站事件的看法，认为发生事件的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有经济困难的原因，敌人趁机从中插手，进行了煽动破坏。然后，召开市委、市人委局处级以上干部会议，陶铸同志和陈郁同志都亲临指导，由赵武成同志向全市中高级干部作了报告，把市委常委对东站事件的分析和处理情况向大家传达，要求各级干部积极做好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教育群众不要轻信谣言。经过这次妥善处理，收到比较好的效果。我们也从中吸取了教训，防患于未然，引起大家对公安政法战线工作的重视与支持。

## 二、从各方面加强政法战线的建设。

“东站事件”既是对政法战线广大干警的一次严重考验，同时又是对政法工作的一个有力的推动。从这次事件

中,暴露了一些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一是政法战线的人员不足,与其所肩负的任务不相适应;二是队伍的业务水平有待提高;三是技术设备过于落后;四是干警生活上的困难;五是劳教场所不足。根据政法战线存在的问题,我与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反复研究,认为从总体上加以解决,搞好政法战线的各项建设,才能保证不出大乱子。我们关于加强公安政法战线建设的意见,得到中央和省、市委的大力支持。

一是经我向周总理提出要求后,由中央给广州市公安局再增加二千人的编制(原有五千人左右),以加强充实公安政法队伍。这在困难时期,同各个机关都在压缩人员精简机构相对比,是一个特殊的照顾。为了提高公安政法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我们采取几个措施:首先把由于各种原因调离公安部门而又熟悉业务的骨干如苏青等同志,调回公安政法部门工作,把一些有成绩的公安干警提到领导岗位上来;其次,在继续从复员战士中吸收一批人员的同时,还从机关、企业中抽调一批懂得本地方言的青年党员、团支部书记来充实公安政法队伍;再次,在小学、中学中挑选了二百多名十三至十六岁的学生,送到江村新洲等训练基地训练,学习公安业务,效果很好。这批当年被称做“小八路”的公安幼苗,现在已四五十岁了,他们都成了公安政法战线上的骨干。经过这几项措施,公安政法队伍不论数量或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增强了战斗力。

二是增加了一批新的技术设备。当时技术设备很落后,

外线侦察无汽车,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加强侦察工作的效能,市政府拨出专款购买了一批摩托车,成立了摩托车队,加强了交通民警的机动力量。同时用外汇进口了二十部“汉堡”牌汽车拨给市公安局,并进口了一批先进的技术设备,使公安侦察手段得到加强。

三是解决公安战线干警的实际困难问题,例如,八处原来办公的地方是一个危房,人员增加了,办公地方就显得很拥挤。许多干部民警住房很困难,有的想离开公安部门到有住房的单位去。为此,我们又拨了一笔钱,给八处建了一座一万二千六百平方米的办公大楼,还在桂花岗建了一批家属宿舍,专门解决政法战线干警的住房困难。我们考虑到公安干警日夜值勤,风里来雨里去十分辛苦,就给他们每人每月增加半斤食油(当时只有高、中级知识分子、老师才能得到这样的照顾,一般机关干部是没有的),增加一些粮食定量,还每人发了一双皮鞋。这些措施普遍反映良好。直到现在,见到了一些“老公安”时,他们还对此津津乐道。

四是加强基层建设。即整顿和加强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的工作,健全居民委员会的组织,依靠这些基层组织维护社会治安,协助广大公安干警管理好城市。

五是增加管教场所。当时由于经济困难,往港“偷渡”的人比较多,这些人被抓回来后,一般是先进收容所,进行一段政治思想教育,然后遣送回原籍。另外,由外地盲流到广州的人员也不少,他们露宿街头或进行“乞讨”,或有轻微的

违法行为。对这些人也要收容起来进行管教，然后送回原籍。这样，就需要有安置的场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市政府又拨出一笔专款，由公安部门与民政部门相配合，对民乐、沙田、石门等五六个国营农场进行扩建，作为安置劳动教养的场所。

经过上述措施，整个公安战线的干警情绪提高，工作成绩显著，对维护社会秩序，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除了上述措施之外，经省委和广州军区批准，成立了广州警备司令部，由我兼任司令员，广州军分区司令员刘远生、市公安局局长李广祥担任副司令员。把军队武装与公安民警两种力量结合起来，共同维持广州的治安秩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民政是政法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主管政法战线时，也经常抓民政建设，特别对拥军优属和老区的建设，花了不少精力。每年都要参加军政座谈会，听取各方面对政府工作的意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解放后，进了大城市，但我的心还总是惦记着在战争年代支持过我们革命斗争的革命根据地的人民，逢年过节我总要代表省、市政府带领歌舞团、粤剧团到惠阳、东莞、宝安的老区去慰问，了解老区人民的生活状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尽可能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有一次，我陪送朝鲜金光侠大将到深圳出境之后，便回到惠阳坪山一带去看望乡亲父

老。回到省里,我把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生活困难情况向省政府作了汇报,省政府决定由民政厅拨出三十万元救济款帮助解决这些地区人民的生活困难。我还和老区建设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商量过如何加强老区建设,多办实事的问题。

## 市 容 卫 生

卫生工作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状况,也反映了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甚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科学水平和精神面貌。地处祖国南大门的广州,搞好卫生工作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此,管好市容卫生是人民政府的一项基本任务,我作为市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更应义不容辞地把这一工作抓好。

我在广州工作期间,主要是根据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所提出的“大搞卫生,除害灭病,移风易俗,改造世界”这个口号,依靠卫生战线的干部、职工,持续地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的。每年都要抓几次大行动,如春节、春夏季之间、国庆节和交易会开幕前,动员全市人民进行大扫除,用飞机喷杀虫药,统一行动烟熏蚊虫等。平时则通过各级卫生组织和街道办事处,采取定期检查与突击抽查相结合的办法,开展评选“卫生之家”、“卫生五好街道”的活动,严格执行“卫生奖惩条例”,使群众养成讲文明讲卫生的良好习惯,形成新的风尚。由于对这个工作持之以恒地抓,措

施比较得力,效果亦较为显著。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环境卫生面貌明显改观,卫生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全市已完成了粪肥统管,消灭了过去破烂粪车粪桶沿街漏粪的现象。绝大部分街道已经做到煤灰、垃圾不落地,大街小巷比以前清洁了。大部分中小蚊蝇孳生基地得到处理,蚊蝇密度锐减,许多街道成为无蚊街,晚上睡觉可以不挂蚊帐。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广州的蚊子是很出名的。三十年代初我在广州读书时,晚上被蚊子咬得无法学习。挂了蚊帐还会钻进来,要点着灯进行拍打。机关单位和宿舍的卫生状况也有了很大改善,许多工厂内部和四周环境的清洁卫生工作都有了显著的改进,对生产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三年间,香港、澳门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生霍乱,对我市造成严重的威胁,但由于我市的卫生防疫机构与各有关部门紧密配合,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终于防止了霍乱从海外传入,保障了人民健康。这个时期的广州成为整洁、美丽、清静的城市,不仅为广州人民所称颂,而且受到许多外国朋友的赞扬,为祖国争得了荣誉。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对管理好城市的卫生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1. 实行粪便统一管理。这是搞好城市卫生重要的一环。我到广州工作不久,在巡视市容时,就有不少市民投诉粪便管理很乱,清粪工具落后,木粪桶、木粪车既破烂又无盖,一边推一边漏,搞得街道臭气熏天,苍蝇满地,极不卫生,要求



市人民政府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广州市在解放初期的粪便清运工作(主要是公共厕所和居民马桶粪),均由市环卫处清粪工人统一清理后,用汽车运至码头卸到粪船上运往农村作肥料,近郊农村的农民也可以进城清理化粪池的粪便。公社化后的“大跃进”年代,农业生产需肥量增加,当时又适逢经济出现了极大困难,无法增加清运粪便汽车,原有为数不多的几辆汽车也没有汽油,改为烧木炭。在此情况下,只好将公共厕所、居民马桶粪、化粪池的粪便分片划给农业部门(即当时的公社)清理,由各社队自行组织社员进城清理粪便。当时,不但有市郊的三元里、新滘、石井、鹤洞、东圃、沙河、江村、罗岗、人和、竹料公社的农民,还有顺德、南海、增城、东莞、新会、花县和佛山市郊的农民也来市清运粪便。常驻市的郊县清粪的农民有七千多人,加上即来即走的共有万人以上,用肥季节可超过两万人。由于农民进城清运粪便的工具简陋,均为木粪桶,木吊桶,木粪箱,手拉车,大板车,脚踏三轮车,加上农民只顾清粪,不讲卫生,不守秩序,荡漏十分严重,街巷、马路都被漏洒的粪便污染,臭气熏天。加上农民不遵守清粪卫生的管理规则和交通规则,比较集中地进出城区几条马路,如大北路等每天一到下午三时后就被蜂涌而来的进城清粪农民所堵塞,交通受阻,车辆无法通行。而且农民在清粪时又未严格按计划地段清理,争清粪便的情况十分普遍,经常为此而引起互相扣压清粪工具、斗殴、打群架等,严重影响到市容卫生和社会秩序。为了改变

这种混乱现象，我便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反复研究后作出决定，对粪便实行统一清运管理。

实行统一清运管理，首先要解决运输工具。当时汽车是紧缺物资，我便去找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同志，请求从国家计委调拨二十辆解放牌汽车给广州市，得到了批准。后来我们又改装和购买了一些车辆及清粪工具。这样运输工具总算解决了。

当时肥料很缺，农民害怕粪便统一管理后，肥源供应减少，不愿退出清粪行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又召开驻穗积肥办公室的负责人会议，保证按原来核实的产量进行合理分配，反复耐心地做思想工作，才说服农民退出去，不要再进城清粪便。

农民退出以后，全市各街道共约组织起三千二百人的清粪队，共建了粪便码头、水运的粪便中转池四十四四个，还在西郊白沙河、西南郊石溪和东郊猎德的珠江河畔，兴建起三个粪便码头。水运粪便在码头供粪，陆运的粪便则由各社队到中转池提粪后带车直接送到田头。这样做，既保持了市区的整洁卫生，又方便了农民。

为了把环境卫生搞好，我建议（并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原属卫生局领导的环卫处升格为环卫局，划归市城建委领导。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广州市的环境卫生面貌大大改观，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处于先进行列，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好评。

2. 结合下水道工程建设,消灭蚊蝇孳生基地。广州是个水网地带。解放前,市区又没有科学的排水系统,每逢暴雨,白云山洪水倾泻,经常淹浸城北地区;沿江一带地势低洼,夏季也常常受水淹浸;一些地区处于大雨大浸,小雨小浸,无雨则积水生蚊的境况。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下水道进行系统的整治,对包括西关冲在内的一些濠冲进行改造和对内街沟渠进行全面整治,还修建了麓湖、东山湖、流花湖、荔湾湖四大人工湖,新建了一批排水干渠,使排水系统有明显的改进。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我们又着重改造了包括西濠冲、司马冲、东濠冲、漱珠冲在内的一批濠冲和大北路、德泥路两个立体交叉的排水工程,建设了荔湾冲截污工程,填平了一些污水塘,清除了一些大中型的蚊蝇孳生基地。西濠冲是市中心区的四大排水明冲之一,由南至北贯穿全市,全长二点六公里,集雨面积二点二四平方公里,流域人口约二十一万。濠冲狭窄,淤塞严重,环境卫生恶劣,是蚊蝇孳生基地之一,经过改建后,把明渠改变为暗渠,使昔日的臭水沟,变成平坦畅通的西濠街。这时期总共投资三百五十万元,新建和改造了排水干渠十点八公里,使环境卫生进一步改善。

3. 动员群众除害灭病。由于爱国卫生运动是为人民造福的事业,只要向群众讲明重要意义,是能够得到广大群众和干部拥护和支持的。当时我们在消灭蚊蝇搞好卫生,杜绝病媒方面,还作了一些规定,采取了一些措施,使之制度化,互

相监督,共同遵守。主要的规定有:(1)人手一拍,见蝇就打;(2)对蚊蝇孳生、宿藏及聚集的地方,由各单位每月用药物喷洒或烟熏一次;(3)饮食店、肉菜市场、副食咸杂店、酱园、水果店等重点单位,每周或十天喷射或烟熏一次,并常设灭蝇点;(4)各单位及街道,划分地段包干管理,负责检查并处理蚊蝇孳生基地;(5)近郊地区农民积肥的粪池、粪缸都要密闭,垃圾堆要定期用药物喷洒;(6)人人宣传和遵守“六不六要”的爱国卫生公约,坚决改革不讲文明卫生的一切陋习。并根据执行情况,进行评比,好的给予表扬奖励,差的给予批评处罚。经过评选共有六万五千户获得“卫生之家”的光荣称号,有十六条街获得“卫生五好街”的荣誉。到一九六五年,卫生专门机构已达一千个以上,大大增强了防病治病的力量。

## 发 展 体 育

体育运动是增强人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的一项重要工作,它不仅关系到国防与生产的发展,而且也关系到祖国的声誉。在旧中国,由于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封建统治的腐败,造成国弱民贫,体育事业衰落不振,被称为“东亚病夫”。为了洗刷这一奇耻大辱,解放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特别是周总理、贺龙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重视体育工作。贺龙同志到广州检查工作时,曾多次语重心

长地对我们的体育工作者说：“你们要守住南大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是对广东体育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与鞭策。因而，广东的体育运动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在各项运动的大赛中，一批优秀选手取得了好成绩。如一九五六年，陈镜开打破了最轻量级挺举的世界纪录，成为我国第一个世界纪录创造者（此后还八次打破世界纪录）。一九五七年，戚烈云创造了男子一百米蛙泳世界纪录。穆祥雄也打破了世界纪录。一九五九年，容国团获得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成为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同年，胡克明等获得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乒乓球女子单打、双打、混合双打的三项冠军。游泳运动员莫国雄、航空模型运动员余灼志也分别创造了世界纪录。

一九六〇年创办了以培养体育师资为主的广州体育学院。广州市还成立了十三所业余体校，四十二个市级业余运动队，四千五百零六个基层业余运动队。同时，群众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也空前高涨，约有六七十万人参加各种体育锻炼，特别是广播操、太极拳、太极剑、武术、气功、游泳、乒乓球、羽毛球、跑步、爬山等运动项目，参加的人很多，出现一派兴旺的景象。可是，随着国家经济困难的出现，体育运动也受到影响，经历了一个困难的时期。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七年初，我担任广东省体委主任、广州体育学院院长期间，体育事业也处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阶段。不仅没有发展，还作了某些收缩，除了东莞县的举重选手陈镜

开、叶浩波、陈满林等人在国内和国际的比赛中打破世界纪录之外,其他方面没有取得惊人的成绩。而且有些项目,如羽毛球等还出现倒退现象。但我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把体育队伍、机构、场地保存下来,不让散掉就是胜利。这就是俗语所说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考虑到,建国以来好不容易才组建起一支体育队伍,如果在我手里给搞跨了,怎么向人民交代?因而想尽一切办法去克服困难,终于渡过了最困难时期,当经济形势好转之后,体育事业也跟着得到恢复和发展,没有受到重大的损失。如果这也可算作成绩的话,就是为后来广东体育运动的腾飞保持住基础,积蓄了力量。

当时我们的方针,是以城镇为重点,以训练为中心,着重抓好巩固与提高,搞好培训工作。

这个时期广州的重点体育设施和运动场所不仅没有被挤占,而且还扩建了二沙头体育训练中心。二沙头体育训练中心,是在周总理、贺龙元帅直接关怀下,于一九五五年由国家拨款一百二十一万九千元建起来的,一九六一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尽管国家有很大困难,但考虑到体育事业的需要,仍拨出二百万元作为扩建的经费。这个占地面积十四万一千平方米,位于珠江二沙头岛西部的训练中心,设有室内外训练场地三十个,主要场地有风雨操场、两个田径场(含草地足球场)、跳水池、游泳池以及附属建筑等。由于二沙头是珠江中的一个孤岛,进出都得靠船,既不方便,又

不安全，一九六一年扩建时，根据体育工作者的意见，建了一座桥把这个小岛和北岸连接起来，作为出入的通道，这样就方便多了。这是解放后新建的第一批体育训练基地之一。它不仅为广东省运动员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提供了条件，而且为国家运动队伍的集训作出了贡献。以后国家还进一步投资扩建，使这个训练中心更为完善。

在抓了对二沙头训练中心的扩建工程之外，我还帮助解决了西村工人体育场的场地纠纷，克服了扯皮现象，使这个场地能够建成使用，为体育运动增加了一个场地。同时，还为广州体育学院（下简称广州体院）的扩建而奔波。广州体院于一九五八年成立，一九六〇年正式搬到沙河顶，最初归广州市管，一九六一年之后归广东省管。但是，体院搬进沙河顶时，正处于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基建被迫下马，当时只有一幢宿舍、一座办公楼、一个游泳馆。学生宿舍不够用，就临时在游游泳馆的过道上搭床。其他生活设施和训练场地都未搞好，要开展正规化的教育，确实遇到不少问题。学生和教职员工都迫切要求能够解决一些最紧迫的校舍问题。我了解情况后，觉得这是全省唯一的高等体育师资培训基地，为了今后广东省体育事业能够有较大的发展，必须决心把它办好，有些实际困难，应当帮助解决。但体院的基建投资属广东省高等教育局（下简称省高教局）管，于是我亲自去找省高教局领导人袁溥之同志，向她汇报体院的实际情况，要求高教局帮助解决最迫切的校舍问题。后来经彭溥

之同志批准,从省高教局的基建费用中拨了一笔钱给广州体院。有了钱还碰到征地上的扯皮,我又去找陈郁省长汇报,由他出面做有关方面的工作,解决了体院征地问题,这样才兴建了一批校舍。

解决了校舍扩建问题之后,体院还碰到办校的方向问题。在当时强调突出政治和参加劳动生产的情况下,学生的业务课被挤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体院不讲体育业务课,把大部分时间去搞劳动生产,这不是个正确方向。我就这个问题向全体师生讲了一次话,明确体育学院办学方针必须是一专多能,又红又专;劳动与教学的矛盾问题,应该以读书锻炼为主,适当参加劳动生产。要求体院的毕业生,既要会教学,又要出成绩,成为有理论有实践受欢迎的体育老师。学院内也成立了运动部、体工队,培养了一批国家运动健将级的人才。

一九六〇年体育体制作了一些改变,把属于广州市体育委员会管的广州体育学院和体育专业队伍划归广东省管,因而广州市有意见,反映到贺龙同志那里去,一九六一年初,贺龙元帅到广东,在二沙头召集省、市体委有关负责同志开会,谈到这个问题,批评省体委。为了完满地解决好这个矛盾,我就提出帮助广州市重新组织体育专业队伍,已划给省管的专业队就作为广州市向省输送人才。这样处理两全其美,大家都很高兴。

重新组建广州市体育专业队伍,我提出要不拘一格地



选拔人才,不限于本市、本省,可以到全国各地去物色一些好苗子。但基本来源还是从本市的业余体育队、业余体校中输送。如篮球队,基本上是以市公安局业余前卫队为基础的。棋队、羽毛球队则由省下放来的专业队组成。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很快就组织起包括足球、乒乓球、篮球、羽毛球、游泳、棋类、划船、航模等在内约二百人的专业队伍。一九六一年底队伍组建起来之后,困难很多,设有训练场所,没有运动员宿舍,购置运动服又需要申请布票,粮食、副食品不够吃又影响训练,足球队由于没有车,只好走路去场地训练,甚至运动员穿的鞋、打的球等等一大堆具体问题都要求解决,真是“万事起头难”呵!现在看起来这些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当时都是大事情,非由市长出面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我专门召集各有关单位的领导一起开会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如由粮食局给运动员增加口粮、食油,由市属东平农场供应副食品,由机关调给一辆旧客车,以及在拨出外汇购买一批羽毛球和球拍(当时国产的羽毛球和球拍质量未过关)的同时,责成二轻局研究试制高质量的羽毛球、球拍和高质量的运动鞋等。新组建起来的专业队伍刻苦训练,情绪高涨,进步也很快,特别是足球队。一九六四年十月在广州举行全国甲级足球队联赛期间,我作为东道主参加了这次赛事的组织领导工作。这次联赛将根据各队比赛成绩来决定升降级。当时广东队成绩不佳,由甲级队降为乙级队,这时我的心情很紧张,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新组建起来

的广州足球队身上，期望他们能取得好成绩升为甲级队，以保持广东省有一支甲级足球队。结果，不失所望，广州足球队有如初生之犊，竟然战胜了国家队，被晋升为甲级队。这时，全市人民为之振奋，我从主席台上高兴地下到球场去与浑身泥巴的广州足球队员紧紧相抱。赛后，由我们广州市六位正副市长联名设宴招待足球队的全体队员和教练，热烈祝贺他们的胜利。这次的胜利给了广州运动员以很大的鼓舞，已被载入广州体育运动的史册。

但也出现过一些问题。羽毛球队本来是我市的一支强队，但从一九六四年起，在国际比赛中成绩下降。我心里很着急，觉得这样下去，这个项目就有衰败的危险，便召集教练和队员一起研究找原因。据他们说，外国选手上场前都吃人参，精力充沛，而我们的运动员则由于体力不支，以致影响到竞技，还听说著名中国象棋大师杨官璘，也因比赛时精神不佳而输棋。对此，我认识到运动员要出好成绩，必须有强健的体质和充沛的精力，于是就批准在比赛时给运动员吃人参，运动健将级的运动员每月还增加二斤油、十斤粮食。这一件事当时对运动员鼓舞很大，他们都感谢党和国家对运动员的关怀。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被说成是“物质刺激”，作为我搞“修正主义”的一条罪状。

六十年代体育方面的重大赛事不多，规模最大的是一九六五年九月间参加全国第二届运动会，广东代表团派出了二百多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由我担任代表团团长。我为

向运动员进行思想教育、强化赛前训练以及解决装备等问题而忙碌着。由于广东保留了一批运动队伍，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也搞得比较扎实，组团后抓紧赛前训练，运动员临场表现也较好，因而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第二届全运会比第一届全运会来说，广东体育代表团有了较大的进步，总成绩仅次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和上海代表团而居第三名，在全国各省中名列前茅。举重运动员叶浩波先后两次打破了最轻量级抓举的世界纪录。另外是一九六三年九月，为出席在印尼举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的中国队、越南队、朝鲜队提供了赛前训练场地和装备，为解决运动员的食宿问题做了不少工作。他们在广州集训了一段时间，于同年十一月上旬一起搭船前往雅加达参赛。中国队在这次运动会上表现不凡，显示了力量，共获得三百零三枚奖牌，打破了十八项全国纪录，射箭选手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

我几年来主管体育工作体会到，一定要解决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我们在战略思想上，必须明确从普及到提高又由提高来促进普及这是一条规律，一定要处理好，做到两者不可偏废。普及就是要求各个县都要成立体育委员会，有专门的体育机构，有条件的县市应办些业余体校、业余训练班等，经常做好宣传发动工作，传授有关体育知识，组织好群众性的各项体育运动。提高就是要组织专业体育队伍，抓好训练和科研工作。只有这样，两个轮子都一齐动起来，才能出成绩，出人才，为体育的腾飞作出贡献。

## 文 化 艺 术

我这个市长管的事情确实很多,除了上面所谈到的以外,我还管理过一段时间的农业,工人、青年、妇女的群众工作等等。一九六四年在薄怀奇同志调到市委任文教书记之前,我又抓过一段时间的文化教育工作。这里着重谈一下关于文艺方面的情况。

广州市民对文艺的需求是比较高和多方面的。六十年代初,虽然我国社会还是处于封闭状态,但由于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每年的出口商品交易会又在这里举行,因此,文艺团体交流也比较多,有省内、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作为管理外事的副省长,我很自然地要把抓好文艺专业队伍的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因为,外宾来广州访问时,作为东道主,我总要陪同他们去看文艺演出,如若演出的水平太差,就会影响我国声誉。

当时全市已有一支三千多人的专业文艺队伍(省管的和业余的未算在内),人数算是可观的了,但问题却不少。主要是由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过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运动之后,挫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文艺界出现了极不正常现象。这就是被人称做“五子登科”的套框子、抓辫子、扣帽子、挖根子、打棍子,妨碍了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一九六〇年冬我到广州市工作之后,

党中央已重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此，我坚决执行。但我对于文艺工作是外行的，于是，就以小学生的姿态到各文艺团体去观看彩排，了解情况。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我还在越秀宾馆召集八十多位文艺工作者开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那时给我的一个突出的印象是思想不解放，不敢讲话，不敢创新，安于现状。针对这种情况，我就勉励大家：“要争取做张飞和李逵，不要永远满足于做廖化。”经过一段时间深入了解，特别是参加了市文化局在从化召开的休整会议后，对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心中比较有底了。我就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市文化局召开的第三次党代会上，根据周总理一九六一年六月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广州文艺队伍存在的实际问题作了长篇讲话。除了肯定成绩以外，着重讲了关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广州文艺事业的若干问题：一是关于除毒草问题。当时有一种很不好的做法，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乱扣帽子，特别是对一些娱乐性强的文艺节目，或不同的流派，便斥之为“毒草”，加以铲除。音乐曲艺团还建立了所谓“打靶”制度，把节目公布后，只要有人认为它是不好的，用红笔一勾，就被作为“毒草”把它“枪毙”了。这样，危害性很大，实际上是搞一家独鸣，搞得文艺界冷冷清清。当时木偶剧团有个老艺人郑寿山，原来他有几百套木偶戏，但在“左”的文艺政策下，绝大部分被“枪毙”掉或自己不敢再演了。我指出这种错误做法之后，要他们坚决纠正。二

是关于正确处理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在三千多人的文艺队伍中,党员占百分之十,主要是各文艺团体的领导人或搞政工的干部,而百分之九十的非党群众,则是各方面的业务人员,其中有许多是名演员。由于当时在强调阶级斗争,突出政治的情况下,有的非党名演员挨批受整,而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则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对非党群众态度粗暴,不懂业务又诸多干涉,造成党群关系紧张,压抑了非党群众的积极性。对此,我着重要求党员改变作风,与非党群众交朋友,关心他们的疾苦,规定文化局做演出团队的后勤部,演出公司、戏院要为演员服务。不能象过去那样,演员演出完了之后,没有水洗脸,没有茶水喝。党员领导干部不要包办一切,横加干涉,要支持业务人员。三是关于搞好舞台风气问题。当时有些节目政治化、口号化,粗制滥造,演出时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演古装《绣衫记》时却摆设现代生活中的衣架,使人感到不真实,布景也很杂乱。针对这些不正的舞台作风,我向他们指出后,要求做到不论是剧目的编排、唱词、舞台布景,后台工作都要严肃认真,还引了梅兰芳总结的一条经验,即对戏剧服装“宁可穿破,不可穿错”的话作为座右铭。四是关于如何使文艺丰富多彩的问题。为了扭转文艺节目贫乏单调,光有政治性,而无艺术性的状况,我向大家提出创作的题材要丰富多彩,既要有地方性,也要有全国性,既要有传统的历史节目,也要有现代的节目。风格要多样,不同艺术流派要发展。考虑到广州市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有北

方人,有南方人,还有外国人,因此,既要有电影、音乐、京剧、话剧、歌舞等艺术团体,还要有地方特色的粤剧、潮剧、汉剧等,以满足各种不同爱好者的需要。同时还要根据广州的特点,通过举办百花会、花灯会的形式以活跃、繁荣文艺园地,使广州的文艺百花园多姿多彩,长盛不衰。我指出以上都是方针政策的问题,如不解决好,文艺就很难发展繁荣起来。我还认为领导不但要掌握好政策,提出要求 and 目标,而且还要帮助下面解决实际困难。当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演员吃不饱,做戏服的布也紧缺,有些剧团连排练场所、办公室和宿舍都没有,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十分差。再加上政治上的干扰,硬要演员放弃专业训练去从事体力劳动。所有这些问题,在我任职期间,我都想办法尽力帮助解决。比如一九六四年搞群众文艺汇演,没有钱,我就批了一笔经费解决了困难,使汇演能顺利进行,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解决羊城话剧团(后改为广州话剧团)的场地问题。那时演员向我诉苦说,既无办公地方和宿舍,又无排练场地,要我帮助解决。然而,当时财政确是很困难,由政府拨款是不可能的。这使我很为难。后来文化局一些同志提出建议,可否把废置的中山电影院给市工艺公司,作为交换条件,由该公司出钱兴建羊城话剧团的办公室和排练场地。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要解决问题,只有走这条路了。于是我亲自找市手工业局副局长曾珍同志商谈,结果促成手工业局与文化局双方达成了协议,文化局把拆空的中

山电影院交给市手工业局作为南方玉雕厂的厂房,而由手工业局拨给文化局五万元,在桂花岗建起了办公楼、宿舍和排练场地,这样才解决了羊城话剧团的困难。此事,对双方都有利,可谓皆大欢喜。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在中央领导同志如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反复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贯彻“双百”方针的情况下,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广州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渡过了惨淡的时期,得到繁荣和发展。一九六五年在广州举行了中南文艺汇演,推出了一批新节目,还演出了革命史诗《东方红》,许多港澳同胞也回来观看,这时的广州文艺百花园呈现丰富多彩的景象。

## 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

这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间,党中央和国务院基于对香港同胞的爱护和关怀,为了帮助香港同胞解决食水的困难,从援外专款中拨出三千八百万元人民币,交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兴办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现在二十几年过去了,但许多香港同胞见到我时,仍以感激的心情提及这件事。他们说,如果不是广东人民政府兴建了这条给香港人民带来幸福的供水工程,香港就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水荒的威胁,也不可能有今天的繁荣景象。他们这种“饮水思源”的骨肉同胞的深情,使我久久不能平静。这说明我们党和人民政



府的确是办了一件大好事。我当时作为主管外事的副省长，有幸自始至终参与了这项工程的领导工作，对兴建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

这个工程项目的提出应从一九六三年的天旱谈起。自一九六二年九月至一九六三年五月长达九个月时间，广东没有下过透雨，水塘干涸，江河断流，不少农作物枯死，有些地区连食水都成问题。这是五六十年不遇的大旱年，广州的水也变咸了。香港和九龙地区水荒更为严重，居民每天只供水几小时，提着水桶等水的长龙长达数里。香港当局不得不派船到日本等地去运水。水！在奇旱中的淡水，对于被包围在苦咸海水中的香港，犹如甘露。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省省长陈郁发表谈话，对香港同胞的困难表示十分关切，欢迎他们派船到珠江就近汲取淡水，并从各方面给予方便。于是，香港当局便派船到莲花山汲取淡水，从一九六三年六月到一九六四年三月共运去淡水三十多亿英加仑，解决了燃眉之急。在此之前的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广东省宝安县人民政府与香港当局已签订了每年自深圳水库向香港供水五十亿英加仑的协定。尽管最高的一年供水达八十亿英加仑，但仍远远未能满足需要。我国政府本着关怀港九同胞的精神，进一步想办法帮助香港解决水荒威胁，便决定兴建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以增加对香港和九龙地区的淡水供应。我们在研究具体方案过程中，曾对几种意见进行了比较。当

时有个德国专家为了做一笔生意,建议由香港出钱沿广九铁路线铺设水管,从珠江引淡水到九龙。这个方案没有被接受,因为水管容易被压破,而且有一定限度,还涉及到所有权等问题不好处理。另一种意见是从东莞开运河到太平,经南头进入九龙,这个方案的好处是灌溉农田多,但缺点是难于管理,线路过长,对解决供水这个主要问题不理想,因而也被否定了。经过认真讨论后,大家对利用自然地形,从东莞县桥头镇引东江水,通过八级抽水站把水泵到四十六米高的雁田,然后倒入雁田水库,再通过人工渠注入深圳水库。这个方案受到赞赏,它既可以解决向港九地区供水的问题,又可以使十一万亩农田免受干旱。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八日,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路过广州,在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家里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具体方案。出席的有陶铸、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省长陈郁、副省长林李明、曾生、广东水电厅厅长刘兆伦、广州市建设局局长戴机和计委的同志等。周总理听了大家的汇报后,同意第三方案,并要国务院计划委员会从援外经费中拨出三千八百万元人民币作为这个项目的专款,还指示物资部门大力支持,尽快设计施工。为了研究尽快解决向港九供水的具体问题,广东省人民政府同香港英国当局,派出代表进行了两次商谈。广东省代表由刘兆伦、杨可忠、叶明华三人组成;香港代表由毛瑾、罗彤、孙德厚三人组成。我虽然不直接参加谈判,但一直都在指导这一工作的进行。经过友好协商,双方取得一致意见,

便于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广州市广东迎宾馆举行签字仪式,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代表、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厅长刘兆伦,香港英国当局代表、香港副工务司兼水务局长毛瑾在协议上签字。我出席了签字仪式,在签字前会见了港方代表毛瑾、罗彤、孙德厚等人。他们对这样快就达成协议表示十分高兴。签字后,我还设宴招待了双方参加会谈的代表和出席签字仪式的各界知名人士,气氛非常融洽。根据这个协议,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将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开始增加供水给香港九龙地区,每年供水六千八百二十万立方米(折合一百五十亿英加仑),如香港英国当局需额外增加供水量,广东省人民政府视供水设备能力适当增加;额外增加的供水量由双方代表另行协议决定。供水期由每年十月一日至下一年六月三十日,共九个月。水费标准每立方米人民币一角。此外,协议还规定: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广东省宝安县人民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签订的关于深圳水库向香港供水的协议书,自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起即行失效。

协议签字之后,我们即抓紧组织设计和施工。整个工程在中央、中南局和省委的领导下,除了由陈郁省长负责抓全面以外,主管农、林、水战线的副省长林李明和我亦协助抓。刘兆伦同志与工程总指挥部的同志则具体负责日常的组织领导工作。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从广州市动员了五千多待业青年,又从东莞、惠阳、宝安等地动员了民工五千人,总共

投入劳动力一万人以上。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全长八十三公里，由六个拦河坝、八个抽水站、两个调节水库和十六公里长的人工渠道组成。工程非常艰巨、复杂。因为自古以来，东江都是从粤东山区流向西南汇合西江、北江注入南海的。它与深圳水库的最近距离也有八十多公里，而水位却比深圳水库低二十多米。引东江水供应香港，就得开凿运河，让东江水翻山越岭源源不断地流进深圳水库，然后经过巨型钢管输送到香港方面去。这就意味着要使东江之水升高倒流。为了多、快、好、省地完成这项艰巨的工程，设计人员爬山涉水，披荆斩棘，进行了大量的钻探、测量和科学试验。只用了半年多一点时间，这项工程就由规划进入施工。

按照设计要求，要从东莞县桥头镇的东江河边开挖一条底宽八十米、长三公里的新河道，把东江水引进桥头镇附近的抽水站，将河水提升五米，然后流入东江支流的石马河，再经过司马、妈滩、塘厦、竹塘、沙岭、上埔、雁田等七个逐级提高的抽水站，倒流入东莞、宝安两县分界岭下的雁田水库。然后在两县交界的分水坳和宝安的白泥坑之间开凿一条两公里长的人工渠道，使东江水从雁田水库流经沙湾河注入深圳水库。为了逐级提水，还得在旗岭、妈滩、塘厦、竹塘、沙岭、上埔等地建立五个孔以至十七个孔的拦河坝。这个工程的施工是在夏秋之间的多雨、台风频繁的季节进行的，在施工期间连续受到四次强台风的袭击，特别是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三日的那次强台风，把妈滩工段的两条围

堰冲垮了。但民工们毫不气馁，台风暴雨过后，又把它重新筑起来。一万名工人经过整整一年的奋战，终于在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按期完成，交付使用。整个工程所挖的土方就有二百多万立方米，如堆成一条一立方米的堤坝，长度相当于广州至深圳路程的十多倍。当时珠江电影制片厂曾拍了一部《东江之水越山来》的纪录片，详细反映了建设这个工程的真实情况。

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可以说是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又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成果，是全部由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自己安装施工的。在施工过程中，得到全国和省内各有关部门及工程所在各县的大力支援。上海、西安、沈阳、广州等城市为工程赶制了各种电机设备，运输部门又为运送这些大型电机设备开放绿灯。

当工程进入了关键时刻，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到十二月二日，我曾前往工地去全面了解工程进展情况，并带去齐齐哈尔市马戏团，向工地一万多工人作了三场慰问演出，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在我去慰问之前，陈郁省长、林李明副省长已经去视察过，对工人的情绪鼓舞很大。这次同我一起去的有刘兆伦同志和《羊城晚报》的总编辑杨奇同志以及香港新华分社副社长梁上苑同志等。我们在工程总指挥曾光同志的陪同下，饶有兴趣地沿着八十三公里长的各工段视察了全部工程，包括引进东江水的新开河道、喝令石马河和雁田水倒流的六处拦河坝、八个抽水

站、两个扩建加固的水库,以及变电站、高压线路等。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地区都是我们东江纵队活动的地方,经常在这里行军作战,如今旧地重游,另有一番兴味。我们每到一地总要到民工和当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检查工程质量,征询意见。在塘厦,还召开了有工程总指挥部各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工作会议,听取他们有关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使我更为高兴的是,工人、干部情绪十分高涨,我们走到那里都受到建设者们的热烈欢迎,他们表示坚决保证按时按质完成工程任务。当我们在广州市民工集中的旗岭慰问时,民工们正在大球场打完篮球比赛,顷刻间整个工地都沸腾起来了。他们纷纷围拢过来,大家互相问候,那种亲热的景况,至今难忘。特别是他们得知齐齐哈尔市马戏团要来为大家表演的消息后,更增添无比的欢乐。因为齐齐哈尔市马戏团是我国一个著名的马戏团,曾到朝鲜和越南演出,获得胡志明主席颁赠的一级劳动勋章,并参加过影片《春燕展翅》的演出。民工和当地群众是很难得有机会看到这种高水平大型马戏表演的。这次由团长崔庭桓率领,热情地为参加建设的民工们演出了精彩的节目,有武术和各种杂技,还有生动灵巧的小狗、猴子,黑熊的表演。民工们不时为他们精湛的表演鼓掌喝彩!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胜利完工,经过验收,全部工程质量良好。我又和林李明、郭棣活、邓文钊、黄洁等副省长到东莞县塘头厦参加落成庆

祝大会。出席大会的还有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张醒村、冯燊、谭天度、萧隽英、蚁美厚、黄友谋、罗明、罗浚、王越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惠阳专署和东莞、宝安县的负责人。这次庆祝大会热烈隆重，来自香港、澳门的同胞就有二百多人，他们当中有高卓雄、何贤、郑铁如、王宽诚、费彝民、陈耀材、梁培、李子诵、刘敬仪、黄新彦、陈丕士、吴楚帆、梁上苑、汤秉达、叶若林、马万祺、石慧等各界知名人士。由林李明同志主持剪彩后，我在大会上讲了话。我着重讲了我国政府一贯关怀港澳同胞，这个工程的建成将更加密切内地人民与港澳同胞之间的骨肉情谊；赞扬工程的建设者们体现了“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的英雄气概；感谢各方面对工程建设的大力支持。与会的人士一致高度评价这一工程建成对解决香港水荒的重大意义。香港工联会长陈耀材在大会上激动地说：“感谢祖国的爱护关怀，从此港九便可免除制水之苦，对百业大有裨益。”在香港，各界人士也举行了庆祝活动。

这个供水工程建成后影响很大，受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的一致赞扬，一些国际友好人士也纷纷前往参观，作了大量的报道。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要去看看，她说准备写一个详细的报道，向世界人民宣传这一盛举。我专门陪她前往视察和采访，驱车走完了八十三公里的全程。

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不仅使香港同胞得益，而且也给沿途地区人民带来好处，使十多万亩农田免除了旱

患,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这也是为东江老根据地的群众办了一件大好事。随着香港人口的增多和各业的迅速发展,对东江水的要求也大大增加,因而后来工程又进行了扩建。在一九八七年五月纪念工程建成二十周年的时候,已基本完成了第二期扩建工程。一九八六年共向香港、九龙地区年供水量将近四亿立方米,相当于初建成时年供水量的六倍。据说现在正计划进行第三期的扩建工程,到一九九四年向香港的供水量将增至六亿二千万立方米,相当于初建成时供水量的九倍多。

## 外 事 活 动

广州是我国对外的窗口,在六十年代,国际友人到中国访问,多数经这里进出。这样,我的外事活动就特别多了,迎来送往从未间断,有时一天几趟。看来是属于应酬的工作,但对提高我国的声誉,增进友谊和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不管多么繁忙,我都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务求把接待工作做好,不出或少出差错。

在我接待过的外宾中,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各方面的友好人士。比较主要的有:柬埔寨王国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首相宾努亲王和夫人,越南人民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总理范文同和武元甲大将,以阮文孝为团长的越南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亲王,尼泊尔马



亨德拉国王和王后,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阿富汗国王穆汗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和王后,马里共和国总统莫迪博·凯塔和夫人,乌干达总理奥博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苏联宇航员季托夫少将,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松村谦三、高崎达之助,美国作家安那·路易斯·斯特朗,等等。他(她)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胡志明主席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青年时曾经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会讲广州话,对中国人民具有特别深厚的友好感情。他经常来广州休息、访问,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总是一见如故,十分亲切。他在从化温泉住过,在白云山的山庄旅舍也住过。有一次在山庄旅舍,胡志明主席还邀请我和工作人员一起举行联欢晚会,他亲自表演节目。平时在谈话中,他总是说:“广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到了这里就象回到自己的家一样。”还经常回忆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支持,感谢广州市为越南商品打开销路提供了场所(在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旧址对面的愉园,作为越南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场所),以及各种支持。并以“同志加兄弟”来形容中越两国人民的亲密友谊,要大家都来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友谊。除了胡志明主席之外,还有许多越南领导人访问过我国,有的是秘密来的,如武元甲大将就曾秘密来广州访问休息,我与他早在抗日时期就认识了,后来我任南海舰队副司令员的

时候,又两次应邀去越南访问,都是武元甲大将接待的。他到广州后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很亲热。通过友好往来,增添了彼此的了解和情谊。

阿富汗国王穆汗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和王后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情谊,也使我不能忘怀。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间,他来广州访问,我陪同他们游览了市容和参观广州植物园。国王盛赞植物园美丽的景色,在园内亲自种下了一棵友谊树,并高兴地说:“我把我的感情都种在这里了!”国王的新闻顾问更是高兴地朗诵起来:“今天种下友谊树,心中结下友谊果。”我便接着说:“这象征着中阿两国人民友谊牢不可破,万古常青。”这些友好的话语激起周围群众的热烈掌声。现在,这棵象征中阿友谊的树,已经长到几丈高了。

增进中日人民的了解,争取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当时我国对外活动的方针。这时多是民间往来,许多日本的朋友为增进中日友谊作出过重要贡献,如西园寺公一、松村谦三、高崎达之助、黑田寿男、冈崎嘉平太、宇都宫德马等。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了解到广大的日本人民都真诚地希望与中国人民友好,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我对他们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精神十分敬佩。在接中,我们之间也增进了友谊和了解。当我知道松村谦三先生喜爱兰花和动物时,我陪他去兰圃参观,并赠送一只果子狸给他。对此,他十分感激。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一九六四年春来广州,在小岛住了几个月,我经常

去看望他。当时正值春节,他对广州的花市感兴趣,我就陪同他去看花市,回到住所他很高兴,便赠送一支钢笔给我作纪念。一九六六年我去日本访问时,宫本曾热情接待我,黑田寿男先生还专门陪送我回广州。我邀请他去“利口福”饭店,品尝蛇、猫等野味。

在接待任务中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比较深:第一件是,一九六五年四月阿联(埃及)副总统萨布里来华访问。他原来计划在访问广州后去越南访问的,但由于美国空袭越南北方,局势非常紧张,河内许多机关已疏散,在这种情况下,胡志明主席派越南内务部长雍文谦前来广州,向萨布里介绍抗美斗争情况,建议取消去越南访问计划。萨布里到广州后一直由我出面接待,安排他的活动,由于情况有变,只好根据越南方面的要求,改变原来计划,在广州参观后回国。由于安排得比较周密,越南和阿联两方面都表示满意。第二件是,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一行八人,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入境抵达广州,二十九日中午就离广州回国。国务院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提前两小时由北京飞抵广州迎候。在客人到达前半小时才决定在白云山的山庄旅舍双方举行会谈(而往常是在迎宾馆举行)。这样,准备工作是十分紧迫的,接到电话后,我就立即通知各有关方面以最快速度、最佳的服务做好准备。周总理指定陶铸和我参加会谈,内容主要是有关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由于时间紧,内容多,有些问题意见还不完全

一致，只好日夜连续会谈。晚上，大家只休息两个小时，又继续会谈了。山庄旅舍地方小，除了安排客人在那别墅里住宿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陶铸同志则到双溪别墅休息，我和其他工作人员就在双溪别墅的会议室里打个盹。虽然这次会谈地点临时改变给我们工作带来困难，但没出什么漏洞，因而受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赞扬。

除了上述迎来送往的接待工作外，我们还根据中央的指示举行过许多次声援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帝斗争的群众集会，如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广州二十万人抗议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杀害刚果总理卢蒙巴的群众大会；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广州各界三十万人在中山纪念堂和各区数十个分会场举行大规模集会，支援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广东省和广州市各界五千多人集会支持巴拿马人民收回运河主权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最强烈地声讨美国侵略者轰炸河内的罪行，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爱国斗争，等等。以上这些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都是由我代表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发表讲话的。当时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组织纪律性也很好，几十万人的大会，安排得井井有条，按时开按时散，没有超过时间。这一点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在对外关系方面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接运难侨。一些国家出于其政治斗争的需要，与中国的关系恶化，制造反华

排华事件。因而我国政府不得不派船把一部分受迫害而又愿意回国的华侨接运回来，以解除他们的困境。例如，一九六二年十月至十一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挑起武装冲突，我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因而，印度政府便大肆迫害华侨。我国政府为了维护华侨的权益，除了发表声明对印度当局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以外，同时还决定派船去接运受迫害的华侨。当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六月七日、八月十二日连续三批受迫害的数千华侨乘我国派往的“光华轮”、“新华轮”，抵达广东湛江港时，我和黄洁副省长以及侨务部门的领导同志一起前往迎接、慰问，并进行妥善的安置。这些难侨非常感谢祖国政府的关怀，一登上国土便热泪盈眶地愤怒控诉印度政府对他们的残酷迫害，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严重折磨的情况。这些华侨中，有的是在印度已经居住了几十年的老人，也有非中国血统的家属，有印度、尼泊尔、锡金的妇女。广东是华侨最多的省份，这些难侨绝大部分都是广东籍的。我们对他们的遭遇表示十分同情，妥善地把他们安置在华侨农场。

一九六五年，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九·三十”政变，尔后，也掀起了反华排华浪潮，甚至发展到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的严重地步，许多华侨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为了解决这些难侨的痛苦，中国政府又作出决定，派船分批接运一些受迫害而又愿意返回祖国的侨胞。从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第一批遭受迫害的印尼难侨抵达湛江港起，以后又陆续接

运了多批印尼难侨回国,并进行妥善安置。这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祖国是华侨的坚强后盾,在广大的华侨中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改变了过去那种华侨任人凌辱,而无援无靠的悲惨景况。

在对外友好交往中,我还多次率团出国访问,多数是参加开航典礼的。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六日,我率领中国友好访问团乘搭中国——巴基斯坦直达民用航空线正式开航首次航班前往巴基斯坦,参观访问过卡拉奇、白沙瓦、拉瓦尔品第、拉合尔、达卡等城市,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友好接待,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接着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我又率领十五人的代表团访问柬埔寨。这是应柬埔寨王国王家航空公司的邀请,搭乘中柬(广州——金边)首航班机前往的。先后到过金边市、西哈努克市和白马市等地访问。与我同去的有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黎明、广州市副市长纪锦章等。

一九六四年六月至七月,我率领黄埔港和湛江港的领导人 and 一名翻译共四人,到阿尔巴尼亚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我出国访问时间最长的一次。当时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很好,是“天涯若比邻”的亲密战友。我们援助阿尔巴尼亚的物资大多数是从广东的黄埔港和湛江港运出的,阿尔巴尼亚在广州有一个航运小组,因此,阿方邀请广东省派代表团到阿访问。我高兴地前往这个山鹰之国进行友好访问,几乎遍访了阿尔巴尼亚的各个主要城市。所到之处,均受到阿

尔巴尼亚的党政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友好接待。最使我难忘的是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七月十日受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的接见,并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接见时在座的有阿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黑塔·马尔科和都拉斯区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主席萨利赫·维里纳。中国驻阿大使馆临时代办王鲁明也在座。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我又率代表团,在印尼共主席艾地的陪同下去印尼访问,同样是为参加中国——印尼民用直达航空线通航首航仪式活动而去这个千岛之国访问的。我们访问了雅加达、万隆等重要城市,受到印尼政府和华侨的热烈欢迎。

我最后一次出国访问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至六月中旬,率领中国广东友好代表团一行十人访问日本。除我之外,尚有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杜埃、省农科院副院长黄继芳、广州市友好协会秘书长刘绍先、共青团广州市委书记司徒梅芳、省外事局对外部副主任方靖、省外办翻译姜志新及工作人员等。当时是根据中日友协的协议书,我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广州分会会长的身份担任代表团团长的,是民间的友好团体。到日本后,在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城市进行了友好访问,加深了对日本各友好团体间的关系,受到了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共产党、社会党、公明党以及各界人士、旅日华侨的热情接待和欢迎。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还为我们的访问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大阪友协会长、大阪

外国语大学校长金子二郎对我们的来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许多日本知名人士陪同我们到各地参观。虽然那时中日还没有邦交关系,但从我们所接触到的各方面人士和群众来看,他们对中国都是非常友好的,强烈要求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友好情谊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正是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强烈愿望,推动着日本当局在后来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显示了人民外交的巨大作用。

## 统 战 工 作

统一战线是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我在广州从事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在香港从事海员工作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进行武装斗争中,对此都有极深刻的体会。解放后的十多年中,我虽然主要是在部队工作,但仍然很明显地认识到统一战线工作(下简称统战工作)同样是我们建国的一个大法宝。所以我历来重视统战工作,尊重党外人士,乐意同他们交朋友。由于我曾在中山大学读书,校友很多,我又在香港、澳大利亚读过书,做过海员,所以和广东省、广州市的许多上层民主人士,以及港澳同胞和侨胞中的许多上层人士相认识,有一些还是我在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中和在东江从事抗日游击战争时就直接间接得到他们帮助的老朋友,象邓文钊、陈汝棠、肖隽英、方少逸等,



一见面就好象久别重逢的亲人，无所不谈。有的人，我或者不认得，或者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但由于我当过“东江纵队司令”，他们却都认得我，一见面就亲切地同我握手言欢，一见如故。五十年代，在省委、省府举行的节日聚会或重要的外事活动中，我作为一个部队的首长，也常有机会和许多党外上层人士接触、聚会。所以当他们的知道我要转业到地方来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和广州市长时，不论相识与不相识，都对我表示欢迎，这也增加了我做好工作的信心。

在广州市，党的统战工作，是市委第一书记王德同志亲自抓的，他兼任市政协主席。但鉴于在市政府内从副市长到各局、处，都有不少党外人士担任负责人，市委也就要我协助王德同志管管统战工作，还要我兼任市政协第一副主席。王德同志因病或因事请假时，就要我担负起政协的主要工作。市委还决定由统战部部长罗培元同志担任常务副市长、市府党组副书记（我任党组书记）来协助我。市委作出这样的安排，对于加强全市统战工作的领导，把各方面，各部门的统战工作，组成一股绳，无政出多门之弊；其次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抓统战工作，又不离开全局的、整体的目标，收到了良好的分工合作的效果；再次是，统战工作中遇到全局性的问题，或一些较困难的问题，也不难解决，工作效率是比较高的，没有遇到什么扯皮和久拖不决的大事，更没有几方面的领导互相抵销力量的现象。例如，政协没有足够的办公用房，我就支持市房管局给盖房子加以解决；又如罗培

元和一些工商界头头要我去察看他们在筲箕窝修水库的工程,要求市府支持,我都乐意去办;再如统战部提出把筲箕窝农场移交给农委的补偿款,应交由政协建脱产学习宿舍。王德同志一答应,我马上就办了。党外朋友就是十分看重我们这样高效率地,用行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市委要我兼了这么多党的工作,我作为市委的书记之一,是义不容辞的,可是这样就使我忙上加忘了。加上陶铸同志在广州召开广州地区的以至全中南地区的党外人士座谈会,省、市接受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党外人士来广州地区检查、考察工作等,往往也要我参加一起做工作。这样一来,我当然更加忙了。但是,我觉得这样做,有利于团结好党外人士,也有利于发挥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同心合力把政府工作做好,所以我也十分乐意从事这些工作,真可以说是忙得“不亦乐乎”了。

六十年代初期,党中央指示统战工作要估计到党外人士在过去许多改造运动中,在经济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都考验过来了,是“大有进步”的表现,思想改造的弦不要绷得太紧,要“松一松”,要多搞“神仙会”,要多摘去所谓“右派分子”的帽子,在生活上给近两千人以特需供应的照顾,等等。这是在行动上初步改变了五十年代从上到下对党外人士的受国心和进步程度估计不足,和初步纠政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左”的偏差和错误的表现,效果是好的,对于调动党外人士的积极性是有利的。但是,由于并没有认真提高到理论上、政策上来总结五十年代的“左”的偏差和错误,吸

取深刻的教训，所以在政治、经济状况稍为好转的时候，头脑又发热又强调起阶级斗争来，接着“四清运动”就来了。虽然这次运动没有普遍烧到党外上层人士身上，但是，由于这把火在党内、在干部中烧得十分猛，搞人人过关，广大群众也惴惴不安。整个党外人士又给国际共运中“反对修正主义”和国内升起的“兴无灭资”的浓重气氛弄得十分紧张，更加感到人人自危了。这是十分不利于调动党外人士的积极性的。对于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不良反响也是很大的。我当时对这种状况感到很不妙，但全国自上到下都这样搞，自度无能为力，也只好保持沉默了。

“四清运动”的“左”的错误不但没有停止下来，反而变本加厉，发展到了要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果导致一九六六年搞起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浩劫。初时，只是在党内揪所谓“走资派”。不久，党外人士也都给戴上“资产阶级分子”或者“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帽子，当作敌对势力来加以批斗。当时市委还讨论过统战部的意见，要保护这个保护那个。可是不久，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被诬称为投降主义、修正主义，所有负责统战部门工作的人都被戴上投降主义者的帽子来批斗，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也难保。而被作为“走资派”来揪斗的，就更加厉害了。市委、市府被打倒了。“庙堂”被拆掉了，“菩萨”被打倒或被赶跑了，统战部及统一战线各单位成了“文革”的重灾区。市委中担任党的政协统战工作主要负责人包括王

德、罗培元和大批统战工作领导干部都被无休止地批斗游街，固然不用说了，有的还被抓去劳改、坐牢。

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这是我们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可是由于一九五七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产生了“左”的错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仅没有认真保护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在内地家属的合法权益，甚至在许多方面伤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有所谓“海外关系”的干部和群众，受到歧视，不予信任，入党和提拔干部都因此而受到影响。并且把广州和广东省沿海地区毗邻港澳，华侨众多，作为阶级斗争特别尖锐复杂的不利因素来看待。当时不仅不敢引进外资，就连一些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捐助兴建公益事业、开办学校的钱和物资都不敢要，甚至把它说成是不坚持“自力更生”原则的表现，要加以批判。其实，做团结和争取海外侨胞及港澳同胞中的知名人士的工作，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我接触联系比较多的港澳知名人士有何贤、霍英东、马万祺、费彝民、陈大球等。解放初期，我担任珠江军分区司令员兼珠江地委书记的时候，就与何贤、马万祺等澳门的爱国人士有交往。我到广州工作之后，照样常与他们往来。我对他们爱国爱乡的精神甚为敬佩。香港的建筑界著名实业家陈大球先生，是我的同乡，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和我们东江纵队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东江纵队曾经驻过他在坪山的新屋，那时病疫流行，陈大球得了痢疾，我便叫东江纵队的医生给他治病。从此，他对东江纵队很感

激,给予很大支持,与我来往也较多。解放后,他一直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把自己的儿子陈忠林(即陈志强)留在内地学习。由于我们之间关系密切,“文化大革命”时期,竟成了整我的一条罪状,追查我与陈大球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一直把陈大球先生作为爱国人士、统战对象来对待。

我对爱国起义人士向来也是很重视的。从台湾驾机起义飞返祖国大陆的原国民党军上尉飞行员徐廷泽,一九六三年九月到广州参观访问时,一直由我接待他,进行过多次交谈,请他吃饭,介绍广州的情况,对他的爱国主义行动表示钦敬,鼓励他在保卫祖国的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徐廷泽也谈了他回大陆的经过,表示今后要更好地报效祖国。大家谈得很好,很亲切。

然而我也是“在劫难逃”。这不仅是由于我也长期参与和领导过统一战线工作,而且我早就受到林彪、黄永胜等人的排斥,所以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闹起来不久,我就在工作岗位上被非法逮捕,秘密押送北京。

## 第二十章

# 十年浩劫中的遭遇

### 盲目“紧跟”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五·一六通知》在党内干部中传达后，全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十年之久的大动乱，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一场浩劫，我也成了其中的一个惨重的受害者。但在“文革”开始时，我一方面对为什么要开展这场政治运动很不理解，一方面又在盲目地“紧跟”。

一九六六年六月，我率领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回来后，红卫兵运动已经开始了，学校已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组织纷纷成立。这些所谓“造反派”已行动起来，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对大批干部和老师进行“批斗”，甚至体罚。他们把文化古迹当作封建主义的东西进行毁坏，后来又发展到揪斗侨属、归侨、高级知识分子以及老干部，有的还

被抄家,拿走各种字画、财物、高级家具等。接着全国掀起“五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各地政府要无偿地给学生提供交通、食宿和写大字报的用品等条件。每日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广州串连,滞留在广州的外地人员由几万激增到二三十万。市政府成立了一个外地师生联络接待站,专门负责安排这些来市的外地师生的食宿。把大学、中学、小学的课室腾出来做接待站仍不够,后来把一部分的机关、招待所都用上了,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的,出于对毛主席和党的信赖,初时我是把支持红卫兵和“造反派”作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标志看待的。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广州市劳动人民代表会议上,我根据中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的精神,作了《当前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讲话;九月二十日,又在全市干部大会作了题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夺取革命和建设的双胜利》的报告,要求干部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党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精神,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在这之后,在林彪一伙的操纵下,广州出现了“三忠于”(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中国共产党)的热潮,整个广州市很快就成了一片“红海洋”,凡能写标语的建筑物都被红

色的标语、口号、语录所覆盖，红色颜料一时供不应求。与此同时，在反对封资修，反对资产阶级权威，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叛徒、特务、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从文化界、教育界到党政机关的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批判和冲击。初时，我还未受到冲击，尚能主持工作，出面讲话。只是接受学生的要求去体育学院看大字报，应街道干部的要求，参加他们的会议，回答一些问题。但到了一九六六年底，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我的老同事、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广祥同志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罗瑞卿同伙的罪名抓去北京审查之后，给我的震动很大，预感到自己不久也可能会遭到厄运。所以，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我在广州军区后勤部礼堂代表市委向全市局处级党员干部作题为《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时，已言不由衷。这是我在广州市工作岗位上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 被 秘 密 逮 捕

一九六七年春，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之后，全国形势急转直下。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而掀起的一股所谓揪“叛徒”之风，很快波及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单位，一批批老党员、老干部被当作藏得很深很深的“叛徒”揪出来审查、批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通过他



们的死党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及他们在广东的亲信，制造了广东地方党为“叛徒、特务党”的冤案，迫害大批老干部，株连广大干部和群众，搞得人心惶惶。又有人公开散布“东江纵队是叛徒、特务、土匪部队”。广东的局势已很混乱，很紧张。

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夕，我参加在越秀宾馆举行的市委会议，正在发言的时候，黄永胜派广州军区保卫部一位科长到会场来找我，说周恩来总理要我去北京汇报工作。我想：总理要我去北京，为什么不直接通知市委呢？感到疑惑，所以没有理睬他，继续发言。但他又在催促，并强调说，这是军区首长要他来接市长去的，不去是不行的。我只好结束了发言，跟着他下楼。这时，大门口已有一辆小车在等着。我想去北京见总理，要穿得整齐些，就站在大门口，没有上车，招手叫我的警卫员回家去取衣服。在这一刻间，那位科长说一声：“不用了！”立即把我推上了车，并不准我的警卫员上车。我一上车，就完全由他们控制了。小车快速地向白云山方向驶去。在半路上他们又要我下车，换乘一辆吉普车，将我送到了白云山庄广州军区司令部一个机关，在那里已有一群人在等着。他们把我带进一间预先准备好的房子，把我看管起来，不准与外面联系，也没有人与我谈话。我问看管我的排长：“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不知道。”

## 关押在北京近郊

在白云山庄住了几天，他们又派了一位科长和四名警卫人员把我押上专门为秘密押送我去北京而准备的，从广州至北京火车上的一个软卧车厢。全车厢就只有我们六个人。途中，我问他们去北京有什么事？他们都说不知道。这时我已很明白：是假冒周总理的名义，把我秘密逮捕、秘密押送的。

列车到北京后出了车站，他们要我坐上一辆吉普车，两边坐着警卫把我夹在中间，直接送到通县北京卫戍区的一个团部，把我关押了起来。吕正操、张学诗等同志也已被关押在这里。我们每个人一间房，但见面时互相都不敢讲话。在这里，团政委、正副团长和团部的干部对我的态度还比较好，让我看报纸，可以出房外散步，到团首长洗澡的浴室去洗澡。团长碰到我时还同我讲话。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不要怕，你是周总理请来的，和吕正操、张学诗他们不一样。”我心想：这位团长心肠是好的，但未免太天真了。

到了通县一段时间，我从报上了解到“揪军内一小撮”之风已大刮起来，鼓德怀、贺龙等老帅都受到了冲击。我意识到局势的严峻，心急如焚。这批久经战火考验的开国元勋，难道他们都会起来推翻自己已为之浴血奋斗了几十年，亲自创建的人民共和国吗？这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事。联

想到自己几十年一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工作，党组织对自己的历史是清清楚楚的，他们为什么要假冒周总理的名义，把我秘密逮捕呢？无缘无故地把一个人民政府的副省长、市长抓起来，符合宪法吗？无缘无故地把一个共产党员抓起来，符合党章的规定吗？难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的是无法无天，连国家的宪法，党的章程都不要了吗？时局发展下去又会怎么样呢？这一连串的问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这时，我想得很多很多，但百思不解，唯有相信我们的人民会明辨是非，相信我们的党最终会把问题搞清楚，中国革命的航向，最终会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通县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住的房间也换了三次，到一九六八年五月中旬，已被关了一年多时间，一直未见到专案人员来找我谈话。一九六八年五月中，据说香港有人造谣，说“曾生已逃跑到香港去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立即命令专案组派人到通县找我谈话，看我是否真的“逃跑”了。其实这只是他们为了整人找借口。我没有任何罪过，根本就不怕党组织审查，为什么会“畏罪逃跑”呢？但他们就借此对我采取了更严厉的看押，在五月十八日将我关进了北京附近的一座监狱。从此，我就过着监狱犯人的生活了。

## 在秦城监狱

这所监狱的代号叫秦城，是解放后修建起来关押和改

造国民党战犯的地方。据一些在这里被关押过的国民党战犯写的回忆录说,他们在这里被关押和接受改造时,监狱安排他们进行读书学习,参加各种自感兴趣又力所能及的劳动,生活上享受较好的待遇,还经常组织文化娱乐活动。但在我被关押进来时,已完全享受不到国民党战犯所能享受的人道主义的待遇了。

在秦城,我被关在一栋楼房二楼一间约十平方米左右的牢房里。牢房的铁门上下都开了个小门。铁门关上以后,从上面的小门可以清楚地看到房内的每一个角落;不开这个小门时,通过在小门上方安装的“猫眼”,也可以看清房内的动静。下面的小门,是供水供饭的窗口。靠门处有抽水马桶和洗脸池。房门对面有一张矮床,约半尺高,床上有一床被子,开始时连枕头也没有,我只好鞋子当枕头。靠床的墙壁上方开了个小窗子。在房子的天花板正中吊了一盏60瓦的电灯,外边用铁丝网包着,晚上不许关灯。过去正常的生活是熄灯睡觉的,现在要在亮灯照射下睡觉,能睡得安祥吗?对我身体影响最大的是,过去高床高枕,现在是矮床矮枕;过去坐在凳子上,膝部弯成90度的直角,现在坐在矮床上,膝部只能弯成45度角,有时还要把腿伸直,腰部要弯下去。这样,久而久之,脊椎变形,走起路来腰腿酸痛,十分难受,并且使我的整条脊椎的关节骨质增生,疼痛异常,一直到现在还无法治好。

在这里,吃的经常是咸菜、窝窝头,一个星期吃一次大

米饭。加一次菜也只是几片肉。审讯时，我说的都是老实话，但却说我坚持反动立场，不老实交代，就只给一点点饭菜，饿你一顿。开始两年时间，不准看书报，外面的情况全然不知。到了一九七一年才准许看报纸和马列毛主席的著作。这种长期与外界隔绝的孤独处境，对一个人在精神上是一种折磨。由于多年没有机会，也不准与别人讲话，我口头表达的功能大大减退了。到我被释放时，和战友、亲人见面，竟然只是紧紧握手，但口不听使唤，老是讲不出话来。这种思维和讲话迟钝的现象，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恢复正常。

而对我精神折磨最大的是毫无事实根据，完全不讲道理，而又没完没了的提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把我关押，直到一九六八年五月把我关进了秦城监狱一个月之后，才正式开始对我提审。到同年底，提审了九十六次。一九六九年这一年提审我的次数最多，共达一百二十八次。一九七〇年亦提审了八十多次。一九七一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覆没之后，提审的次数才逐渐减少。到一九七三年才基本停止提审。

每次提审都在审讯室进行。提审时审讯室中央一排横桌坐着三个审讯员，另一张桌子坐着两个记录员，我坐在他们对面的一张圆凳上。审讯我的都是穿军装的专案人员。差不多每一次提审开始，都是他们先读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叫我老实交代关于东江纵队和我个人的历史问题。我如实交代之后，他们总要训斥几句，说我态度不老实，要我好好

考虑，回去把今天讲的内容写出来。如此重复了十几次之后，他们才开始提出另一些问题要我交代。几年间，他们向我追问得最多的是东江纵队的发展与骆凤翔的关系；东江纵队与盟军合作建立情报站这两个问题。围绕这两个问题，专案人员反复一百多次逼我“老实交代。”我虽然反复地实事求是地说明了事实的真相，并详细向他们提供了进行调查研究、弄清问题的线索，但仍然遭到训斥。在长达五年的时间，三四百次的提审中，我不仅受尽了训斥，而且在精神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种长期的精神折磨，对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创伤。

## 无中生有的罪名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我关押之后，由于事前没有掌握到我的任何材料，所以拖延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开始正式对我进行审讯。这种“先抓人，后立案调查”的做法，显然是违反党纪国法的。因为他们早就抛出了“东江纵队是叛徒、特务、土匪部队”这顶大黑帽子，当然想在我的身上打主意。但是我的革命历史是清楚的，他们抓不到什么辫子，就只好乞灵于造谣手段。为了欺骗群众，他们竟无中生有地伪造出所谓《曾生——日本大特务》的黑材料，编造了我一九六六年五月率领“中国广东访日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因玩日本妓女，中了日本特务的圈套而出卖中国海军情报，充

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特务的无耻谎言。这件事，专案人员从未提问过我。我在监狱中一无所知。但他们将这个黑材料以小报的形式大量印刷，在广东、天津、上海、北京等地广为散发。更可耻的是，在这小报上，他们采用换头术的手法伪造所谓曾生“罪证”的照片。真是险恶无耻之极！原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杜埃同志，是我们赴日访问代表团的秘书长，当他看到这份栽赃陷害我的黑材料之后，非常愤慨。他到北京时即向廖承志同志汇报了这个情况，并写了报告给廖承志转叶剑英同志交周恩来总理，用铁的事实证明“中国广东访日友好代表团”在日本访问期间，曾生和代表团的成员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类事情。

关于到日本进行友好访问的情况，我在本回忆录的上一章已作了简要的叙述，当时我任“中国广东访日友好代表团”团长，杜埃同志任代表团秘书长，一行共十人，在日本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友好访问。我们代表团在日访问期间，受到日本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由于那时中日尚未建立邦交，日本政治环境比较复杂，接待我们的“日中友协（正统）”（下同）负责人对我们的保护特别严。我们代表团的访问活动都是集体进行的。我们外出活动，都有“日中友协（正统）”的人员陪同。我个人从未单独外出活动。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他们包了宾馆半层楼的房间来接待我们。一般是靠楼梯的几间房，安排“日中友协”负责人宫崎世民等正副理事长、日方翻译人员和负责保卫工作的人员住宿；我们代表团十人，

安排在靠内面的房间住宿。凡来访的日本人要进我们的住处时,必须经过“日中友协”的随团人员审查同意,由我们代表团人员陪同才能进入。记者或社团的代表来访,由代表团的秘书长杜埃同志接见;一般客人,则由我们代表团的华侨翻译接见。在这情况下,不论是我或其他同志,都根本不可能发生单独与日本女人同居的事件。正因为我们这次在日本的友好访问活动组织得这样严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无把柄可抓,所以不敢提出来“审问”我,也不敢去向杜埃等同志进行调查,就只好指使一些人偷偷摸摸地编造无中生有的黑材料来蒙骗群众。

据我出狱后了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编造我充当“日本特务”的黑材料散发后,确是在群众中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但是谣言毕竟是不能长久的,在人们了解了事实的真相之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就更增加了愤慨和仇恨。

## 颠倒黑白的诬陷

前面已经说了,在秦城监狱中,专案人员对我提审最多的两个问题之一,是东江纵队和骆凤翔的关系问题。这当然也是为了要证实“东江纵队是叛徒、特务、土匪部队”,“曾生是叛徒、特务、内奸”来找材料,找证据的。说我是“日本大特务”,纯属无中生有,是为了对外欺骗群众而捏造出来的,所



以不敢拿这个问题来审问我。而我和骆凤翔确是有过两次接触，他们就以为找到了“宝贝”，要深挖猛追。当专案人员一提到我和骆凤翔的关系时，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心中很坦然。因为我和骆凤翔的两次接触都是按照党组织的布置去进行的。党组织完全了解事情的经过。所以不管专案人员提审几十次、上百次，也不管他们如何训斥、责骂、威吓，我的“口供”都是一样的。

我和骆凤翔的第一次接触，在本回忆录第四章已作了叙述。骆凤翔是广东省博罗县一名土匪出身的国民党军官。一九三九年初任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司令。一九三九年春，我陪同“南洋英荷两属惠侨救乡委员会”的代表到惠州和博罗慰问时认识了他。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我向他提出发给我们部队一个番号。大约过了一个月，番号发下来了，叫做“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但是不给粮，不给饷，只是一个空头的番号，而且还限定只能有两个中队的编制。本来我们就不依赖他发粮饷，但在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形势下，有一个合法的番号，对于我们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还是很有好处的。至于我和骆凤翔的第二次接触，那时主客之势就完全不同了。一九四〇年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司令部被撤消，国民党给了骆凤翔一个中将参议的虚衔。一九四四年冬，骆凤翔受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委托，以他私人的名义写信给我，要求同我会面。我和东江纵队政治委员林平同志研究后，认为和他会面

没有什么坏处,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做做他的工作。于是回信同意他来,并在坪山竹园村接见了。会见时,骆凤翔提出国民党方面可以收编东江纵队。我当即拒绝。当时,我这样讽刺地对他说:你是国民党领导下的,五年前,你是一位少将纵队司令。那时,你有两个支队,还有几个独立大队,又有惠阳、博罗两个县的地盘,很是威风!但是,现在你仍然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却是个无兵司令,光棍一条,真是今非昔比呵!五年前,我在你那里当个大队长,限定只能有两个中队,还要饷械自筹。一九四〇年三月离开你们之后,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要兵有兵,要枪有枪,还有很大的地盘,能发展多大,便发展多大。现在我当纵队司令了,人民群众很支持我们。你看我们多么威风!你说由共产党领导好呢?还是由国民党领导好呢?我说还是由共产党领导好。我劝你认清形势,今后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骆凤翔听了我的话后脸都红了,默默地点头,表示赞同我的意见。停了片刻,他说:那个问题不谈了;国民党乱七八糟,包私走私,发国难财,贪污腐化,以后我也不想干了,将来和你们去抗日。最后,装出了一副可怜相,向我诉说他的生活困难,希望给他一些钱作路费和生活费。会见后,我问林平同志该不该给他一点钱?林平说:“给,当作和他交个朋友。”他离开坪山时,我叫人给了他一点钱,以后就再没有联系了。

我在坪山与骆凤翔会见的事,林平同志曾将经过向党

中央作过报告。一九四六年春，中共广东区党委发言人为了驳斥国民党广东当局散布广东没有中共武装的谰言，在香港《华商报》发表谈话，还谈到余汉谋派骆凤翔来和我会谈的事。上述的这些情况，我不知反复了多少次向专案人员作了陈述，并写了书面“交代”材料。如果是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的话，这个问题是很容易搞清楚的。可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办案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弄清问题，而是要把水搅混，造出“罪证”。

这里要说一下，“曾生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他们服从组织分配，进行内查外调，工作确是也很辛苦。有的人出于盲目的“忠诚”，按照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阴谋家的意图办事，为了使专案出“成绩”，就不惜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把我定为“叛徒”、“内奸”。但是也有的同志保持清醒的头脑，比较实事求是地办事，就能看出事情的真相。下面摘录曾经参加“曾生专案组”工作的、原公安部一位同志于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央专案人员轮训班写的《哲学学习小结》，和一九八四年三月写的《整党自我检查提纲》中的几段话，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当时办案的内幕。

“我一九七一年五月中旬从干校回来，学习一段时间，六月上旬分配去中央专案三办。专案审查对象是原广州市市长曾生同志，这时已经关押近五年。原来的两个组长和组员都是广州军区的干部，我们同时来的共三位同志。从六月中旬开始工作，到九月下旬约一百天时间，我做了三件事：

一是翻阅材料和参与研究案情。大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看了‘曾案’的所有材料。研究案情时，原专案组长介绍说：‘曾案’叛变投敌问题已肯定，内奸问题也基本肯定……二是跟随副组长参予一次‘询问’……三是去广州索取骆凤翔的‘证明’材料。骆凤翔原是国民党少将，他供认曾生‘叛变投敌，充当内奸’，被专案组认为是专案定性最关键的证明材料。”

“我去广州后，看了骆所有的交代材料，发现前后交代截然不同。后来交代说曾生‘叛变投敌，充当内奸’，‘明着是共产党的人，暗地里是国民党的人。’”“前一阶段从来未谈投敌叛变问题，后来急转变，甚至说是内奸。原因在那里？经深入了解，原来是专案组有人向骆指出：不老实交代，要停发你的工资。骆一家四口，靠他的十四级工资生活。这样，他哭了，说要老实交代。从此，要什么有什么，步步升级。”“专案组整理出材料，不管问题大小，他听了都说是他的交代。”“经和骆接触，这位八十二岁的老人，说话已颠三倒四，一会说曾生在船上接见他，一会说曾生出海打鱼。问他‘曾生是共产党、国民党？’他说：‘是国民党。’再问他‘曾生是国民党、共产党？’他又说：‘是共产党。’这样的‘交代材料’怎么能作证据使用？为了进一步弄清问题，我又同骆凤翔专案组长李××等人去粤北，找被关押审查的原广东省委书记，前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同志作调查。他说，当时曾生同骆谈后曾向他报告过，商谈没有结果。他还向中央作过报告，并

给我们写了书面材料。我于九月二十七日晚回到北京，第二天知道已传达林彪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叛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摔死的事件。不久，我向组里简要汇报了上述材料和看法后，就到中央林彪专案组去了。”

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专案审查是为了什么目的，还是看这位同志在经过学习以后怎样说吧。他在《整党自我检查提纲》中写道：“我在中央专案三办曾生专案组具体工作过程中，总的看还是实事求是的，但是也有问题，有值得吸取的教训。问题就是把林彪、‘四人帮’对老干部的迫害，当成一般审干去看待，只注意了解审查的‘问题’有无事实根据，没有注意这些同志该不该审查，该不该这样审查；对这种‘先定性后调查，先抓人后调查’违犯党的政策原则的作法，虽然也有些看法，但没有认识到是错误的，而只当作‘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情况下出现的特殊问题。”“后来在办理林彪专案、‘四人帮’专案过程中，多次接触到原一、二、三办的受害人员、受害人员的家属以及林彪、‘四人帮’一伙插手专案审查，残酷迫害老干部的事实和材料，逐步认识到专案审查中的不少问题，如随意抓人，栽赃诬陷，摧残人身，株连无辜等，但还认为这种严重问题只是局部性的。认识到专案审查是林彪、‘四人帮’迫害老干部，篡党夺权的工具，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两案审判之后。特别是六中全会决议发表之后，专案审查的性质进一步明确了。这种专案确是为林彪、‘四人帮’迫害老干部服务

的，是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工具。”“我对于党中央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重大决策是积极拥护和支持的。这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必不可少的措施。”

## 追查的背后

在专案审查中，提问我最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东江纵队和盟军合作，建立情报站的问题。其目的就是要罪上加罪，除了要把我打成“叛徒”、“内奸”、“日本大特务”之外，又要加上“美国战略情报特务”的罪名。

关于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和盟军合作，允许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派陆空作战技术研究人员到东江纵队来建立情报站的问题，我在本回忆录第十一章已作过详细的叙述。这项工作，是事先请示党中央批准，并在党中央具体指示下进行的。美方所需要的日军在香港的机场、机关、油库、船坞等情况和广九路沿线日军据点和工事等情况，我们都是请示党中央同意后才提供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根据我们提供的情报，多次准确地轰炸了日军的军舰和机场等目标。我们还因此多次得到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驻华美军司令部和华盛顿方面的赞誉，说“第十四航空队驻东江纵队的情报站是美军在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认为我们所提供的情报是“在质与量都经常优越”，“对美军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成

功，有着决定的贡献。”

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驻华美军司令部派出美海军甘兹上尉率领一个工作组到东江纵队，要求我们协助进行广东沿海的测量工作，为美军拟在广东沿海进行登陆作战准备资料。我们请示党中央同意，派了部队掩护和协助他们完成了测量任务，获得了所需的情报资料。甘兹上尉为此给我们写来了热情的感谢信，说我们给予了他们以“光辉的合作”，并赞扬我们部队“能力高强，纪律甚好。”

事实说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和盟军合作，共同抗日是很有成效的，它为我党我军在国际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九日，为了驳斥国民党反动派对东江纵队的诬蔑，我们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了东江纵队营救国际友人和与盟军合作建立情报站的有关材料，说明东江纵队和盟军互相配合，打击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贡献，从而更进一步扩大了我党我军在国内外的影响。

以上这些事实，在专案人员提审中，我已经反复地、如实地交代过，并写出了书面材料，还提供线索，请他们去调查。由于他们不是要真正查清问题，而是要“制造罪证”，所以完全不听取我的陈述，而是一股劲地训斥我：“不要狡辩”，“必须老实交代”。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只是审查我一个人，还把当时东江纵队与这项工作有关的人员，几乎全部抓了起来。特别是把当年在东江纵队司令部电台和联络

处工作的杜襟南、戴机、袁庚、林展等同志，关押起来后，还抄了他们的家。逼令他们交代东江纵队向“美帝国主义”“出卖”了多少情报，并追查是谁布置他们这样干的？然而他们都是忠诚的革命同志，除了老实交代根据党中央指示进行的工作以外，还能“交代”别的什么呢？

以上讲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我诬陷为“叛徒”、“内奸”“日本大特务”、“美国特务”，都是和他们诬陷东江纵队是“叛徒、特务、土匪部队”有密切关系的。他们出于反革命的目的，在全国各地掀起抓“叛徒”、“特务”的黑风，捏造罪名，揪斗、关押许许多多的革命干部，把全国搞乱，以便乱中夺权。而广东，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是他们阴谋另立中央的地方。所以他们在这里排除异己，必然更变本加厉；对于忠诚于党，被他们看作会妨碍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人，必然心狠手辣，无情打击。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广东的死党黄永胜一伙，将数十年来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领导广东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作出光辉业绩的广东地方党诬陷为“叛徒、特务党”，制造了大批冤案，将林锵云、饶彰风等革命老干部迫害致死，并株连七八千人；在东江地区的惠阳、东莞、宝安、和平等县，捏造“反动地下党成员”、“叛徒”、“特务”等罪名，先后将一千多人关押审查。他们还公开诬陷东江纵队是“叛徒、特务、土匪部队”，随之将我秘密逮捕，押解北京，将林平同志扣押，关在粤北山区。接着，在广东和全国各地工作的原东江纵队成员，一批批地被隔



离审查或关押揪斗。在广州，原东江纵队的干部杨康华、周伯明、陈一民、李征等同志；在北京，原东江纵队的干部叶锋等同志，先后被隔离审查或关押揪斗，甚至投入监狱。我的妻子阮群英和女婿宋惠林，也被关押审查。

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迫害原东江纵队的干部，由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专门成立了“东江纵队专案组”，在全军范围内“审查”原东江纵队的干部。我出狱以后，不少同志和我谈了这方面的情况。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的一位领导竟然对该院炮兵教员何通同志宣布：“你在东江纵队的经历不能算军龄，你的军龄只能从你北撤到山东参加八路军时算起。”在解放军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任训练处处长的叶青茂同志对我说，他们学校的“造反派”被授意贴出了一张题为《曾生、林平是美国战略情报特务》的大字报，引起全校的轰动。这些情况说明，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全军范围内迫害原东江纵队的干部的。在武汉军区空军担任副司令员的王作尧同志，被关押在当阳空军基地隔离审查。在广东省军区工作的邬强、黄布、何清等同志和在湖南省军区工作的彭沃等同志，都被扫地出门，进行隔离审查。在广东省军区和广州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工作的原东江纵队成员，和已转业到广东省或广州市各机关部门工作的原东江纵队成员，很多也被立案审查或隔离审查。据了解，在广东、在全国和全军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查、关押、迫害的原东江纵队成员达一千多人。我老是在思

付,我个人无端被审查,坐监狱,固然是很痛苦,但想到这么多原东江纵队的同志,因为我和东江纵队的无端罪名而受到牵连,心中更感到难过和不安。我还想到,东江纵队是我们党建立和领导的部队,为华南抗战作出了贡献,被党中央誉为“华南敌后抗日战场的一面旗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东江纵队说成是“叛徒、特务、土匪部队”,就是对我们党,对党中央的极大污蔑,是对曾经为挽救祖国的危亡,对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一万多名东江纵队指战员和为国为民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的极大污蔑,也是对积极以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东江纵队坚持抗战的东江和广东人民、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的极大污蔑。而且我还听说,在一九四一年底日军占领香港时,被我们东江游击队抢救回内地的文化界人士,在“文革”中,有的人也因此而受到审查。想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造成的这些罪恶,我更是义愤填膺,难以抑止。

对于我被关押审查,我还深想了一层。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东江纵队是受党中央领导的,而对我们部队一些具体问题的领导,党中央常常是通过由周恩来同志任书记的南方局来实施的。关于东江纵队 and 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合作,建立情报站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电报党中央请示,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审阅后,由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于十三日电复我们,说和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派来的欧乐义博士会谈,“可表示欢迎合作。关于建立

电台,搜集情报,侦察气象,训练爆破可以答应,如有其他要求,可先电延安请示”。我们就是完全遵照这个电报指示的精神进行工作的。还在秦城监狱时,我就一直暗中考虑,专案人员对这个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进行的工作,究竟想追查什么?出狱后,我了解到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要立案审查我的时候,已经派人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了有关东江纵队的所有材料,包括上述周恩来同志复电的原件,他们也已经看过。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审问我以前,已了解了东江纵队和盟军合作建立情报站的全部情况,但为什么仍然把它作为一个重点问题,对我进行几十次、上百次的提审?而且还把当时和这项工作有过联系的原东江纵队的成员几乎全都抓了起来,追问是谁布置向“美帝国主义出卖情报”呢?更使我疑虑的是反革命阴谋家康生也直接插手这个案子。他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亲笔批示要将当年负责和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情报站进行工作联系的、原东江纵队司令部联络处处长袁庚同志逮捕,批称:“此人问题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审讯。”可见他们对这个问题何等重视。明明知道这是党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由周恩来同志具体负责指示进行,并已经由历史证明取得了显著成果的工作,竟然作为重点的要案来审查处理,难道仅仅是为了把我和袁庚等几个执行这项任务的人“搞臭”,“打倒”吗?联系到当时正在刮起的所谓“揪叛徒集团”,而明里暗里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的妖风,我不能不怀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以审

查我们和盟军合作，设立情报站的问题作为借口，来达到他们更大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但是历史已作出了公正的裁判，他们的政治阴谋彻底失败了。他们是以害人开始，而以害己告终。

## 回到革命大家庭

自从一九六七年二月被关押审查以后，我便和家人以及同志们完全断绝了联系。我的命运如何？被关在什么地方？他们一直不知。同样，我也无从知道他们的情况。到了一九七三年三月，我的女儿克南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写信，告诉我被秘密逮捕的情况，要求周总理告知我被关在什么地方，并允许家属去探监。不久，周总理通知克南，允许到秦城监狱来探视我。在监狱，我第一次和亲人见面，真是悲喜交集，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激动得两行热泪往下流。克南写信回广州，叫她妈妈来北京看望我。经过七年多渺无音讯的隔别，现在和妻子相见，自然非常高兴。但一想起横祸飞来，七年多遭监禁，又很痛楚。当我听说林彪叛国外逃摔死，他篡党夺权的阴谋彻底败露，其党羽被一网成擒之后，内心说不尽的欢快。我想，我的问题到了解决的时候了。一天天盼望解放的日子早些到来。

一九七四年夏天，我因为长期住监狱，活动太少，加上身心受摧残，身体十分虚弱，腰膝酸痛，骨关节增生等毛病

丛生，被送进了康复医院治疗。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是我重见天日的日子。这一天，专案人员到医院来对我说：“你的问题已查清楚了。现在，你的家人可以接你回去了。”既然要我出狱，我就要他们给我写出审查的结论。因为不论说我是“叛徒”、“内奸”，或者是“日本大特务”、“美国战略情报特务”，都是无中生有的事，加上江青反革命集团当时仍在台上，专案组无法给我写审查结论。过了一段时间，才由根本没有参与审查我的问题的广东省公安厅写了一个令我莫名其妙的所谓“审查结论”，说什么国民党委任我为一百军军长的事，现已查清。真是把我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经过了解，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是我还在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期间，有一个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穷极无聊，为了向上级特务机关骗钱，伪造了一份“对曾生策反成功”的假情报送到台湾。台湾的特务机关和国防部信以为真，发出了“曾生任反共救国军第一百军军长”的委任令。那个携带这份委任令的特务，一进入大陆边境即被我公安人员逮捕，经过调查，弄清了真相。我公安部和海军政治部作出结论：“此事与曾生无关。”当时组织上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我，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现在竟然由广东省公安厅又翻出这件事来给我做“审查结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我出席了周总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会上，我高兴地见到了许多老同志，同志们对我十分关心，向我握手问

好,劝我安心休养,把身体搞好。我心情万分激动,深深感到我又回到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原东江纵队的同志们和许多老朋友,听说我解放出来了,纷纷前来探望,问寒问暖,处处关心。经过这场浩劫之后,战友之间的深厚感情,更感到珍贵。我决心按照同志们的嘱托,尽快养好身体,争取早日参加工作,加倍努力,以补偿被关押审查而耽误了的为革命工作时间。

## 第二十一章

### 在交通部

#### 整顿直属企业 发展远洋船队

从一九七四年十月至一九七五年十月，我住在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老战友、老部下不断来看我。七年多的铁窗生涯，使我与外界完全隔绝，同志们向我介绍了七年多来我们党和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倾听了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之苦，庆贺我党一举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一九七五年虽然“四人帮”仍在横行，但由于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对各个部门和企业进行全面整顿，努力把经济搞上去，社会主义建设又出现新的局面。

一九七五年十月，我被任命为交通部副部长。在一九七五年一月，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在“文化大革命”被合并的铁道部和交通部重新分开办公，交通部主管海运、公路和内河

航运。我虽然当过海员和中共香港海委书记，但不懂航运业务，对于交通部的工作仍是外行，我是服从组织分配抱着边学习边工作的态度到交通部的。

经过两年的学习和熟悉工作之后，一九七七年十月到一九七九年二月，我担任了交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协助叶飞部长抓全面工作。一九七九年二月，叶飞同志调去海军工作，我接任部长、党组书记，直到一九八一年一月调任国务院顾问，在交通部一共工作了五年。前三年，我主要是协助叶飞同志工作，支持和协助叶飞同志整顿企业、发展远洋船队和开发蛇口工业区；在后两年，我主要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安排和开展交通部的工作。

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交通运输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由于批判唯生产力论，人民的思想被搞乱了。当时上海有人贴出“要做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的大字报，在广大运输工人中影响很坏，造成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许多技术骨干被视为“业务篓子”、“臭老九”，被下放到班组劳动或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因为大都被批判过，对工作不敢抓、不敢管。各项规章制度破而不立，导致生产无章可循，生产逐年下降。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后，同“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从整顿铁路运输入手，



开始了全面的整顿工作,从而比较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三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党中央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发九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叶飞同志有胆识、有魄力,他看准了形势,在交通部全面贯彻中央九号文件和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的精神,雷励风行地对交通部的直属企业进行整顿。

解放战争期间在华东和中原战场上,叶飞同志在豫东战役、淮海战役中曾多次指挥过我们两广纵队;一九四九年三月,我们两广纵队编入了叶飞同志任司令员的第十兵团的战斗序列;因而我对叶飞同志比较熟识。我到交通部工作后,整顿工作正全面展开,我学习和了解党中央的精神之后,坚决支持叶飞同志在交通部进行全面整顿的主张,并在具体工作中积极配合。

经部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对部直属企业分期分批进行整顿。第一批整顿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青岛等华东和华北各主要港口;同时,派出工作队配合长江航运局党委整顿所属的武汉、芜湖、重庆三地的企业。为此,交通部机关工作人员实行三班制,即三分之一人员蹲点,三分之一人员跑面,三分之一人员留机关坚持日常工作。经过半年的努力,第一批整顿的企业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从作业区到港务局,大都建立起了比较坚强的、敢抓敢管、有能力的领导班子,初步解决了“软、懒、散”的问题;发动群众同资产阶

级派性作坚决斗争，增强了广大职工的团结；认真落实了老工人、老模范、老干部和技术骨干的政策，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恢复和建立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并建立起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

交通部直属企业经过整顿，“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受到了揭露和批判，正气开始上升。广大干部敢于抓工作了，动荡不定的局面逐步安定下来，生产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但是，整顿企业刚刚收到一些成效，又遇到了从一九七五年底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干扰和破坏。“四人帮”逼交通部承认整顿企业是“复辟”，是“右倾翻案”，是“管”、“卡”、“压”，是“矛头向下”，硬要交通部作检讨。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严峻的，面对“四人帮”的压力，以叶飞同志为首的交通部党组坚持原则，坚决顶住不作检讨。交通部的实践证明，整顿使我国的交通运输业得到恢复，是完全正确的，我作为党组的一员，坚决支持叶飞同志不检讨的主张。“四人帮”垮台以后，整顿企业很快又继续开展下去，并结合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提出新的要求，根据不同情况，努力把部属运输生产单位逐步办成大庆式的运输企业。

远洋船队是对外贸易运输的主要力量。一九七五年以前，我国远洋船队的规模还很小，远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对外贸易运输的需要。一九七五年世界航运业萧条，一些航运公司倒闭，不少船东低价出售船舶。叶飞同志有远见，善于

把握时机，他认为这是个好时机，应抓紧这一时机买进一些船舶，以壮大我国的远洋船队。叶飞同志在部领导小组提出了买船的主张后，我和其他同志都支持他的意见，决定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购买远洋船舶。

交通部的买船报告，经党中央政治局批准后，叶飞同志提议，并经部领导小组决定，由我担任买船组组长，具体负责买船工作。我和买船组的同志们一起，认真按照党中央指示的精神和叶飞同志的意图，抓紧时机，加快速度，尽量多买一些船。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经过调查研究，买船组的同志们准确地掌握了信息，又经过四处奔跑和艰苦的谈判，一共买了各类船舶三十二艘，九十四万载重吨，使我国的远洋船队由四百五十万吨发展到五百三十八万吨，从而壮大了我国的远洋船队。我国远洋船队的集装箱船和滚装船等，就是从那时开始发展起来的。

由于“四人帮”的横行，买船工作也受到了干扰。他们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攻击买船是卖国主义，使买船工作不得不停下来。在一九七六年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四人帮”逼交通部就买船问题进行检讨，承认买船是错误的，气焰十分嚣张。叶飞同志顶住了“四人帮”的压力，他明确提出，别的问题可以商量，唯独买船问题不能检讨，因为买船是经党中央政治局批准的，交通部是执行问题，无权检讨。我支持叶飞同志的意见，也明确表示买船问题不能检讨。在我国造船工业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我们抓住资本主义世界

远洋运输业不景气的时机,以低价买进船舶来发展我国的远洋船队,这是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事,有什么错呢?“四人帮”逼交通部检讨买船问题,只不过是打击交通部以叶飞同志为首的一批不愿跟随着他们指挥棒转的同志。

## 招商局和蛇口工业区

招商局是我国近代设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它于一八七二年三月开始筹办,一八七三年一月十七日正式对外开局营业。招商局的设立,开创了我国民族航运业的先河,打破了外国航运业对中国江海航运的垄断,使中国的轮船活跃在祖国最大的内河长江和近海,出现在东亚、南亚港口,并横渡太平洋、大西洋,远航英美等国。招商局还将它的经营范围逐步扩大到许多经济领域。当第一批中国近代企业相继创办时,招商局进行数额不等的投资,包括开滦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钢铁煤炭公司等。招商局在旧中国走过了七十七年的坎坷历程,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招商局,招商局从此成为人民的企业。

一九七八年九月,交通部党组决定由我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我提议由交通部外事局局长袁庚担任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的日常工作。袁庚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担

任过东江纵队的联络处长，在解放战争期间担任过两广纵队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炮兵团团长，是一位经过考验，有胆识、有能力的干部，我相信他能把招商局的事情办好。

为了贯彻党中央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交通部党组于一九七八年十月研究确定了对香港招商局经营的方针：“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以便加强我国在港澳的经济实力和发展远洋运输事业。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招商局根据党中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和香港招商局的经营方针，提出了筹建工业区的构想。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袁庚在广州把这个构想向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田夫介绍后，刘田夫同志立即表示予以支持。十二月中旬，叶飞同志出国考察回国路经香港时，听取了袁庚的汇报后，亦当即表示支持。十二月十八日，叶飞同志和我在广州与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王全国商谈筹建工业区的问题，国家经委副主任郭洪涛和招商局的同志参加了会议。在会上主要讨论了工业区地址的选择和初期用地面积；原材料、产品购销和国外技术人员进出工业区；初期所需非技术工人数额等问题。刘田夫同志的态度很积极，他表示：凡是在广东省革委会的权力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省革委会负责解决。关于工业区的地址，商定到宝安县的沙头角、蛇口、大鹏三个公社实地察看后，根据三处的地理、经济条件及水电供

应情况再作决定。接着招商局和广东省革委会办公厅的同志,先后到了蛇口、沙头角、盐田、大鹏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认为选择蛇口兴建工业区有利条件较多。刘田夫同志和我听取了汇报后,都同意这个选择。我们研究并起草了由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的报告,我作了一些修改,经广东省革委会刘田夫等同志同意后,即派专人送到北京交通部,叶飞同志审阅后,召开部党组会议通过,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上报国务院。

一月三十一日,李先念副总理批准了我们的报告后,交通部派出一名总工程师带领了一个三十四人的工作组,于二月十一日到蛇口进行实地勘察,拟定了工业区的总体规划和“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航、通车、通讯、平整土地)的工程方案,认真研究了第一期工程的各个项目。二月二十八日,招商局和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签订了蛇口工业区“五通一平”设计的委托书,开始了蛇口工业区的筹建工作。在筹建过程中,叶飞同志还多次邀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到蛇口视察,取得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

我作为交通部第一副部长兼招商局董事长,自应责无旁贷地大力抓好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工作,落实党中央和部党组的决定。为此,我三次到蛇口进行调查,并组织有关人员座谈,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

在一九七九年春,我国对如何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来开

办工业区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蛇口开办引进外资的工业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没有开拓精神是不敢这样做的。引进外资必须解决“五通一平”，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这就需要大量投资。投入了大量资金，如果外商不来办厂，就收不回投资，在我国资金短缺的条件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社会上以至交通部内对我们开发蛇口工业区的做法议论纷纷，有的同志认为交通部是搞交通运输的，搞工业区是不务正业。在叶飞同志调离交通部后，这种议论就更多了，主管工业区开发的袁庚同志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一度使工业区的筹建工作受到影响。我接任部长职务后，继续执行党组的决定，排除各种议论，坚决支持招商局把工业区办下去，明确指出必须全力办好工业区，支持袁庚同志的工作。指出袁庚同志有水平、有能力，工作是胜任的，筹建工作是有成绩的。并要求交通部有关单位，把支援工业区的开发工作做得更好。随着工业区的筹建不断取得进展，各种议论也就逐渐少了。

在开发建设过程中，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拓荒者们顶住压力，集中主要资金，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终于在八平方多公里的土地上兴建起三百多家三资企业（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昔日的一片荒滩秃岭，如今变成厂房星罗棋布，高楼鳞次栉比，港湾桅杆林立，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的现代化海港工业小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被社会舆论誉为

“蛇口方式”，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个率先对外开放的窗口。

## 关心地方交通 增进友好往来

交通部是全国交通运输(除铁路、航空外)的领导机关，既从方针政策上领导地方的交通，又直接管理着一大批直属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着重直属企业，轻地方交通的倾向。这是一个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也是地方交通部门对交通部意见最多的一个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部党组认真进行了研究，深深感到在指导思想上需要进行调整。

我国地方交通，包括公路运输和内河航运，它像人体的微血管一样，遍布祖国大地每一个角落，是重要的循环(流通)系统，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当时地方交通存在很多问题。以公路密度来说，每平方公里只有九公里，仅为印度的五分之一，美国的七分之一，日本的三十二分之一。而且公路标准很低，一、二级公路不到百分之二，大城市周围和重要经济干线，交通运输量已超过设计能力的几倍。以内河航运来说，一九六一年全国内河航运旅程曾达到十七万公里，到一九七八年底却缩短到十三万公里，二十年减少了四万公里。不少地方在开发内河资源时，没有贯彻综合治理、综合利用的方针，兴修水利、建设



电站不考虑通航,以致闸水断航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交通部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扭转忽视地方交通的倾向,加强对地方交通的领导,切实为地方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办实事,协助地方政府搞好地方交通运输发展的规划。增加对地方交通的投资,加强对地方交通的技术指导,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一个比较合理的、水陆联运的交通运输网络正在形成之中。

交通部是外事活动较多的部门。我在交通部工作的几年间,曾多次接待外宾来访和出国访问。在外事活动中,不论是接待外宾来访,还是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签订双边航运协定,或是礼节性的回访,我都很注意严格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遵守外事工作纪律,努力把事情办得好些。有一件事至今仍记忆犹新。一九七五年秋天,我率领中国海运代表团去英国伦敦参加国际海协会议。在会议期间,英国三叉戟飞机制造厂为了表示友好和拟向我国推销他们的飞机,特邀请中国代表团参观他们的工厂和观看飞机表演,并邀请我乘坐他们的小型客机。在我乘坐的小型客机刚起飞不久,不料一群海鸥撞入飞机的发动机内造成机械故障,飞机紧急降落。幸得驾驶员是一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他镇定地驾驶飞机在机场外的一条汽车公路上降落。他叫我在飞机一着陆,就立即打开机舱门往外跳。我和他就是这样办了,在飞机一着陆,就打开飞机舱门从机上跳下,摔在公路旁的草地上。飞机在公路上滑行 20 多米就

爆炸了，随着一声巨响，掀起熊熊烈火。我们幸得及时跳出来，才免于难。因为乘机时安全带扎得较紧，我跳下时把腰扭伤了，行动很不方便。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影响工作，仍继续参加会议，按计划进行外事活动。我坚持到餐厅吃饭，坚持一切生活自理。这在客观上起到了稳定同志们的情绪，继续做好工作的作用。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去新疆参观核爆炸试验，由于对试验地区的环境不适应，加上经过长途旅行，过度疲劳，得了脑血栓病，被紧急送回北京，在北京医院治疗了三个多月。出院以后，虽然多少还带有一些后遗症，但为了促进我国海运事业的发展，以适应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〇年，由我率领中国交通代表团，先后到法国、意大利、泰国和菲律宾进行访问。我们和这些国家的交通部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了谈判，坦诚地交换了意见，沟通了思想，取得了互相信任，为我国和这四国发展海运事业铺平了道路，对发展我国的国际贸易往来，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 为“三通”而努力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它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对台湾骨肉同胞无限关注和怀念。台湾同胞对祖国也十分热爱和向往。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全中

国的统一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志愿和神圣使命。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公报号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华侨，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事业作出积极贡献。接着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并提出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双方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等一系列具体建议。

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为了贯彻台湾与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为了便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经济贸易交流，我于同年八月十八日以交通部部长的名义，就迅速恢复和发展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海上客、货运输业务问题，以及同台湾航运界进行协商的问题，回答了新华社记者和中国新闻社记者提出的有关提问。我首先说明：“大陆和台湾之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已经三十年了。我们伟大祖国未能统一，骨肉同胞无从团聚，生活在大陆的父老儿女，无时不在思念远方的亲友；台湾岛上的同胞又怎能不想早日与亲人共叙天伦之乐！台湾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无不殷望

尽快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早日实现探亲、访友，同时开展贸易，进行交往，促进大陆和台湾的经济相互发展。为此，我交通部愿意就这个问题与台湾交通部门进行协商，希望台湾航运界给予合作。我们热烈欢迎台湾交通部门能约定时间，派出代表到北京或其他地方同我们进行协商。”随后，我谈了我们交通部在恢复和发展大陆同台湾在海上运输业务方面的一些具体设想：“为了能迅速恢复和发展双方的海上运输，我交通部已准备了一批客轮，一旦双方达成协议，我们就在上海，广州、厦门等港口恢复同台湾的客运业务。在货运方面，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我们既准备了驶往台湾的货轮，也准备接待从台湾驶来大陆的货轮。”“大陆沿海各个大小港口，如上海、广州、青岛、天津、大连、宁波等，只要船舶吃水合适，随时准备欢迎台湾商船到来。同时，台湾的商船如果需要燃料、船用物料和船员生活所用物品，我们将予以协助解决。”此外，我还回答了记者们关于台湾在海上运输方面是否享受特殊照顾的问题说：“台湾是我国神圣的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在海上运输方面，当然可以享受与大陆航运界平等的权利。在旅客运输，煤炭、油料或其他货物的运输方面，我们将予以特殊照顾。”这个谈话，充分表达了我們谋求迅速恢复和发展大陆与台湾的海上运输事业，以促进台湾和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真诚愿望。我的这个谈话，全文登载在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九日的《人民日报》。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全国人大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其中第二条是：“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叶剑英委员长的谈话，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大陆与台湾实行“三通”，即通邮、通商、通航的问题。接着在十月，邮电部、外贸部和交通部，就随时准备和台湾实行“三通”的问题，分别公布了各部的决定。我们交通部《关于准备随时与台湾通航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准备从上海、厦门、广州开往台湾基隆、高雄港的客运班轮，为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学术、文化、体育交流和旅游、探亲、访友等交往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二、准备货运班轮从沿海港口开往台湾港口，发展海峡两岸的商业往来和物资交流。

三、台湾船舶在海峡航行或渔船作业，如遇海难需要救援时，我海上救助单位和船舶将随时前往救援；同时将为台湾船舶到大陆沿海港口避险提供方便。

四、欢迎台湾交通部门和航运界人士来大陆港口参观和渡假。

五、随时准备同台湾交通部门和航运界协商大陆与台湾的通航事宜，具体时间、地点愿意协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国和英国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国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此后，我们党和政府领导人多次公开表明，对台湾也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对台湾实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由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实现“三通”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获得了大陆人民和台湾同胞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也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赞扬。在此情况下，台湾当局逐步采取一些变通的措施，允许台湾人员通过第三国或地区，和大陆进行通邮通电、通航和通商。近几年来，大批台湾同胞到大陆来探亲访友，参加旅游；大批工商界人士到大陆来投资设厂，兴办企业；大批文化艺术界和体育界人士到大陆来进行文化体育活动。实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实行“三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坚信终究有一天是能够完全实现的。

## 第二十二章

# 探望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

### 重访香港忆当年

由于我家乡坪山地区有不少人在香港当海员，我父亲是华侨和我小时候先后在香港，澳洲悉尼读书的缘故，我很早就与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有密切的联系。我在广州读书，担任惠州同学会会长时，海外华侨就捐款赞助我出版进步刊物《铁轮》。我参加组织和领导中山大学和广州地区的“一二九”反帝爱国运动，被广东国民党反动当局追捕出走到香港时，香港的海员组织给我安排工作，并热情地支持我开展海员工人运动。日军入侵华南之后，我回家乡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时候，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不仅在政治和道义上，而且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我们大力支持。我从亲身的经历中，深深感到爱国爱乡是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光荣传统。每当我回忆往事之时，就想起了支持我进行革命工作的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由于这个原因，当

我离开第一线的工作岗位之后,就想趁身体条件许可的时候,能亲自到海外去探望他们。一九八三年十月,回国参加国庆观礼的美国惠州侨胞到我家来看望我时,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们。同年底,美国纽约的客籍侨胞就以纽约惠州工商会的名义,邀请我到美国访问。加拿大、日本和香港、澳门的亲友,获悉我要访美的消息之后,也向我发出了邀请。

我接到这些邀请之后,立即到国内有关部门办理出国访问的手续。一九八四年春,我和妻子阮群英,随行秘书黄慰慈三人的出国护照办好了。五月中旬,我们一行三人从广州出发,先后到了香港、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澳门等几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近五个月时间的访问。我们所到之处,受到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热情接待,一幕幕动人的情景,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通过在各地的参观游览,增长了不少知识,开拓了我们的视野。

香港地区位于珠江口东侧,由香港、九龙半岛、新界以及二百三十五个大小岛屿组成,总面积一千六百八十平方公里,人口约六百万。香港和九龙半岛之间港阔水深,是世界上优良的天然海港之一。香港是自由港,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基本上是一个无税口岸。今天已发展成为世界最繁忙的货柜(即集装箱)港,世界第三大黄金交易市场,并成为世界第三大银行金融中心。对世界各地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出访的第一站就是到香港地区。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三日晨,我们一行三人乘坐广州至



九龙的直通火车，中午抵达香港九龙尖沙嘴终点站。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下简称“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叶锋同志到车站迎接我们，安排我们在香港皇后大道东三百八十七号新华社大厦住宿。

香港，对我来说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区。在这里，我渡过了难于忘怀的峥嵘岁月，留下了战斗的足迹。但是，时隔数十年，过去熟悉的地方现在都已经变了样，认不出来，成了一座陌生的城市了。三四十年代，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和香港同胞有比较广泛的接触，和一批爱国人士建立了联系，得到了他们很大的支持。六十年代，我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长的时候，主管广东的外事工作，又与港澳人士有较多的接触。在香港，我不仅有許多曾经支持我工作，关心我生活的亲戚朋友，还有许多曾经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和并肩战斗的战友。他们知道我到了香港，纷纷打电话来问好，并要求我安排时间和他们会面或出席他们的宴会。在香港期间，我们先后接受了霍英东先生和任锡伍、钟庭基、王志亨、王仲铭、张念平、王华生、陈元堪、郑伟明、邓焜、黄球、陈志强、赖玉祺等先生的宴请；和王光英、廖安祥、叶锋、陈达明、袁庚等一批老朋友、老同事、老战友相会。大家久别重逢，分外高兴。

我到了香港之后，就计划安排时间到九龙和新界当年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活动的地方旧地重游，拜访那里的群众。新界西贡乡的同胞听说我到了香港，乡事会专门派人来新

华社与我们联系,要求我们安排时间到西贡和新界地区当年东江纵队活动的地方访问。我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五月二十一日,我们在永富国际有限公司主席赖玉祺先生的陪同下,到新界的西贡、乌蛟腾、九华径等地参观访问。上午九时半,我们的车开到西贡时,在那里等候的新界西贡乡事会主席钟盘先生、副主席刘运喜先生、前任主席李秉礼先生,乡长老、乡委员李鹤屏先生、李奕明先生、陈木生先生、赖彬先生和村民们立即拥上来迎接我们。村民们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放鞭炮。顿时,西贡圩热闹起来。我们下车后,在乡主席的陪同下,到一间大酒楼的会客室休息了片刻,就出席西贡乡为欢迎我们而举行的盛大宴会。乡事会包了酒楼楼上的全部席位,参加宴会的有一百多人。香港政府西贡政务署西贡政务专员陈瑞璋先生专程来参加宴会。宴会的气氛非常热烈,宾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之后,频频举杯。录相机、照相机一一录下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

席间,乡事会的领导向我们介绍了西贡乡建设发展的情况,一位老人还讲了当年我们港九大队在西贡地区英勇杀敌的故事。乡副主席刘运喜先生提出要为抗日英烈建一座纪念碑的建议,马上得到大家的赞同。西贡政务专员陈瑞璋先生也表示支持。大家要我为纪念碑题字,我也只好从命了。

香港新界是我们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活动的地区,当年新界人民积极支持和参加我们的抗日游击队。日军投降后,

新界的抗日游击队员除少数人参加北撤队伍到了山东，大部分人都回来新界。后来，在新界的东江纵队队员，大部分人又去了英国，仅伦敦一地就有原东江纵队人员几百人。光阴似箭，不觉几十年过去了。但是，新界的原抗日游击队员和新界人民，仍以他们曾经支持和参加过东江纵队进行抗日斗争而感到自豪。老一辈的抗日游击战士一直用东江纵队为抗日救国而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教育和激励年青一代。我到新界时，一批年青人围着我，亲切地叫我“曾司令”，说他们是东江纵队的人，我乍听之下莫名其妙。他们即解释说，他们是原东江纵队队员的子弟，立志要象父辈们那样热爱和报效祖国，所以一直以东江纵队队员的子弟感到光荣。我听了很高兴，也很感动。

筹建抗日英烈纪念碑的消息传出之后，西贡在国内外的原抗日游击队员踊跃捐资筹款。西贡乡事会和原西贡抗日游击队员经过几年的努力，一九八九年一月，西贡的抗日英烈纪念碑终于正式落成。西贡乡事会邀请我参加纪念碑的落成典礼。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前往参加，真感遗憾。

午饭后，我们到当年港九大队活动过的地方进行了参观，然后告别了西贡乡的负责人和群众，前往乌蛟腾参观。下午二时半，我们抵达了沙头角南面不远的乌蛟腾。

乌蛟腾位于香港北部的山区。它北面靠近梧桐山，南面离香港、九龙市区较远，是我们抗日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

区,东江纵队的领导机关曾经驻扎在这里。一九四三年二月底,广东省军政委员会在这里召开了重要的干部会议,即著名的“乌蛟腾会议”。我们到达乌蛟腾村时,原港九大队的游击队员李汉先生热情地接待我们。他邀请了几位老人和我们座谈,带领我们去看当年游击队住过的房子。可惜,由于整个环境变化很大,我们未能找到乌蛟腾会议的旧址。李汉先生告诉我们:“当年乌蛟腾的村民积极支持和踊跃参加东江纵队,在曾司令的领导下,和日本鬼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有几名游击队员在抗战中牺牲了,乌蛟腾村民为缅怀先烈,前两年建了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经常有人到纪念碑前献花。”我提出要去瞻仰烈士纪念碑时,李汉先生劝我不要去。他说纪念碑建在有四十五度斜坡的半山上,通往纪念碑的路还未修好,你老人家去不好走。还说,去年从国外回来的原游击队员看了纪念碑之后,认为纪念碑太小,没有写上碑文,建在偏僻的半山上,人们去瞻仰都没有一条象样的路好走。提出无论如何要把纪念碑修建好。李汉先生提出,你老人家不来,我们要上北京拜访你。现在你来了,我们请你给纪念碑题字,帮我们找人写个碑文,准备把纪念碑迁到公路旁的一块空地上。我问他当初为什么不把纪念碑建在公路旁呢?他说现在建纪念碑的地方是政府指定的。我的秘书黄慰慈向李汉先生建议,下次写报告要求迁建纪念碑时,把建“革命烈士纪念碑”改为建“抗日英烈纪念碑”,会有利于争取港英政府的批准。我答应给纪念碑题字,碑文请他们去

找香港新华社的副社长陈达明同志写，他是原港九大队的政委，了解情况。

下午四时，我们在回程的中途到了新界近葵涌货柜码头的九华径村。抗日战争前，九华径村大多数人家姓曾，许多人去当海员。该村有一间由海员支持办的，招收海员子弟读书的“养正学校”。一九三六年春，我在香港从事海员工运时，接受任务到了“养正学校”教书。这里的村民和师生对我非常热情友好，这里的人情山水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我们的汽车开到村前时，村民们热情地迎了上来。我们说明来意之后，一位村民带我们找到了四十八年前和我一起“养正学校”教书的曾老师。七十五岁高龄的曾老师获悉我们来访，他十分高兴，请我们到他家里作客，带我们到“养正学校”旧址的门前和我们一起照相留念。他兴奋地告诉我，抗战前，你在这里教书时，“养正学校”办得最好。香港沦陷之后，你教过的年纪大的学生有部分人参加了你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大多数学生也都有长进。现在有些人在内地当干部，大部分人到了外国。前几年有几位从英国回来的学生，还向我打听你的情况，他们想去北京或广州拜访你。可惜，我们没有联系，不知道你的住处。

下午五时半，我们到九龙一间酒家吃晚饭。七时许，回到新华分社大厦，结束了一天的访问活动。

这一整天的访问活动，虽然安排得很紧，但我只觉得兴奋，没有半点倦意。从所到各地人民群众对我们的热情接

待,以及人民群众对革命先烈的怀念与崇敬,使我深深感到:无论是一个政党、一支军队或者是一个人,只要是为国家民族,为人民大众做了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人能够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而献身是最大的幸福。使我又进一步领会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千古传诵名句的深刻涵义。

香港海员工会获悉我到了香港的消息,就邀请我安排时间到香港海员工会同部分香港老海员和工会工作者叙会。我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香港海员工会的前身是二十年代初期蜚声中外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一九三七年复会后,改名为“香港海员工会”。抗战胜利后于一九四六年第二次复会。三十多年来,他们坚持热爱祖国,关心海员权益,全心全意为海员服务,深得广大海员的拥护。该会会员最多时达二万四千多人;一九八三年会员人数一万九千多人。

六月二日下午三时,我和阮群英、黄慰慈在一位工会干部的陪同下,来到香港九龙佐敦道香港海员工会会所。香港海员工会主席麦灿、副主席梁球、任文钜、秘书主任许旭明陪同我们巡视了工会会所,介绍我们与工会工作人员和当时在工会的海员见面之后,随即进入茶叙会会场。会场正面挂着“热烈欢迎本会老前辈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曾生先生重临工会叙会”的字幅,主席台上摆着鲜花,其余各张台上

摆着水果、饮料和其他食品，整个会场坐满了人，气氛热烈。麦灿主席介绍我们给到会人员认识之后，向我们介绍了出席茶叙会的人员。其中有香港海员工会主席麦灿、副主席梁球、任文钜，常委许旭明、丁锦源、潘硕良、张满全，执委路华、高九、关耀、郑旭；香港老海员及工会工作者前辈吴理广（吴业光）、欧阳维、杨国池、汤超、刘添、李发、李汉、赖生、曾文、曾威、廖福、何容；现职工会工作人员罗彦文、麦洪、李顺、梁惠娟、韩泳仪等。麦灿主席向我们介绍海员工会的近况时说：“广大海员对祖国将要恢复行使香港主权感到鼓舞，他们衷心拥护中国政府提出恢复行使主权，实行港人治港、社会制度不变，保持稳定繁荣的方针。认为这是既尊重历史，又照顾现实的正确决策。”他表示，今后我们海员工会“将结合实际，贯彻港九工会联合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的扩大工人团结，争取合法权益，关心香港前途，支持祖国建设的方针。在香港将要回归祖国怀抱的过渡时期里，加强海员团结，加强与各行业工人和各阶层人士的团结，为保持香港的社会安定、促进经济繁荣、推动香港政制改革，为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安定、繁荣的新香港而努力奋斗！”

在茶叙会上，我作了简短的发言，感谢香港海员工会安排这个茶叙会，让我和四十多年前的老同事、老海员和在坐的工会领导叙会；向到会人员介绍了祖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的新景象；希望香港海员工会为香港的今日与未来多作贡献。

我发言之后，茶叙会进入轻松愉快的座谈。出席茶叙会的老海员和海员工会工作者前辈中，吴理广、欧阳维、杨国池、汤超、李发、李汉、赖生、廖福等，都是“余闲乐社”的成员。其中，吴理广是我任香港海员工会组织部长时，他担任组织部干事。欧阳维抗日战争时期回内地参加抗日斗争，曾在大鹏乡抗日民主政权工作。这批久别重逢的老同事、老朋友，踊跃发言。大家畅谈别后情形和对未来的祝愿。在茶叙会上，我还见到了原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短枪队队长、著名战斗英雄刘黑仔（刘锦进）的哥哥刘添和原海华学校的学生、现任香港海员工会常委、秘书主任的许旭明。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正谈得心欢的时候，麦灿主席站起来说：五点钟了，今天的茶叙会就开到这里，请曾老和我们照相留念。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六时，我们出席了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在香港黄竹坑深湾道珍宝海鲜舫欢迎我们的晚宴。

霍英东先生是我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他热爱祖国，希望祖国早日繁荣富强，关心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之后，他积极支持和参加祖国的经济建设，慷慨捐资发展祖国的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随着他在国内投资创办企业和捐资发展教育、体育和祖国福利事业的增多，我们的接触更多了，我对他的了解和认识也加深了。霍英东先生是一位事



业有成就、有胆识的企业家。他多谋善断，办事认真，具有实业家的气质；他性情耿直，待人以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席间，我们互相问好之后，我向他了解他在内地投资创办的几个企业的情况。他高兴地告诉我，情况很好，比他当初想象的情况还要好。当初他决定在广州兴建白天鹅宾馆时，主要是想在广州建一间象样的高级宾馆，以带动广州的宾馆旅业的发展，没有想到办起来之后，经济效益和各方的反映那么好。他在中山县办的温泉宾馆，前些时候的营业额竟达到北京饭店的水平，这也是他当初没有想到的。他说：“广东这几年的情况表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和集中力量搞建设这条路子走对了，这样坚持搞下去，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会很快的。有好的政策和投资环境，不愁外国人不到内地投资。”霍英东先生爱好体育运动，热心发展体育事业。他向我们介绍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筹备的情况，还谈了他对发展中国象棋运动的想法。

霍英东先生对我们这次出国访问很关心。他多次问我们准备得怎么样？如需要他提供方便的话，请不必客气，打电话到他办公室就可以了。我说，华侨和亲友已为我们的旅程作好了安排，谢谢老朋友的关心。霍英东先生是很细心的人，他考虑到我们对这次旅游去处的情况还不够了解，便将我们要去的各个国家和城市的介绍资料复印好了交给我们，他考虑我们饮白水会不习惯，在美国喝茶不方便，就专

门买了两个方便携带的电茶煲和各种茶叶送给我们。

席上，宾主频频举杯，充满热烈友好的气氛。晚宴九时结束。霍先生派车送我们回香港新华分社。

## 丰富多彩的访美活动

六月九日至八月十日，我们在美国先后到了夏威夷、三藩市(旧金山)、洛杉矶、纽约、费城、华盛顿、大西洋城和哈佛大学等地参观访问。在访问过程中，会见了各地的乡亲、朋友、中山大学的校友、当年香港的老海员和东江纵队的战友，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

六月九日，我们三人和我的表弟、振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庭基，我的侄孙曾日升一行五人，从香港启德机场乘泛美航空公司 747 航机飞赴美国檀香山，开始了我们到美国、加拿大、日本三国参观访问的旅程。钟先生为了使我们的参观访问活动顺利进行，专程陪同我们到各地参观访问。他的英语很好，又熟悉各地的情况，出钱出力，为我们的参观访问活动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六月九日下午三时，飞机从香港起飞，由于时间差的原因，我们到达夏威夷檀香山机场时，当地时间还是六月九日早晨八时半。我的表妹钟玉兰女士和旅行社的吴小姐在机场迎接我们。我们被接到檀香山威记基海滩附近的丽晶大酒店住宿。

檀香山是美国夏威夷州的首府。夏威夷州位于浩渺无际的太平洋中央,是由二十多个岛屿组成的群岛。总面积约六千四百四十一平方公里。大的岛屿有夏威夷岛、毛伊岛、瓦胡岛和考爱岛等。各岛以瓦胡岛为群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而檀香山又是瓦胡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

历史上,夏威夷群岛是一个封建领主制的王国。长期以来,美国对这个美丽富庶,具有极大军事战略意义的群岛垂涎三尺,千方百计一步步加以控制。到一九五九年终于得手,使它成为美国的属地,成了美国的第五十个州。整个群岛约有一百万人口,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华人、华侨约有五万多人,广东中山县人最多。

夏威夷的华侨富有热爱祖国、支持和参加祖国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夏威夷的华侨踊跃参加,有一百二十六人入会。这里的华侨不仅踊跃捐资,为革命筹集经费,而且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参加了武装起义,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夏威夷的华侨在檀香山华人社区建造了一座孙中山的塑像,使这位时代的伟人能常为世人瞻仰。

夏威夷气候温和,四季常绿。人们赞它是“红云带日秋偏热,海雨随风夏却凉”的好地方。常年的气温象广州和香港秋天的气候。白天阳光充足,适宜游泳和日光浴;夜晚凉风习习,适宜安睡。这里的环境宁静幽雅,人们悠然自在,乐天好客,笑面迎人,没有一些西方城市那种紧张气氛,是个

理想的休假地方。所以，每年都吸引了不少各地的游客，观光旅游业十分发达。据一九八二年统计：全年从世界各地来夏威夷旅游的人数有一百八十万，全岛的旅游收入达六亿五千万美元，超过全岛农业和畜牧业的总收入。

在檀香山，我们停留了八天的时间，参观了市容、商场，到威记基海滩游泳、散步，并先后参观了珍珠港、国家坟场、大风山、文化村、多尼菠萝罐头厂等旅游点，使我们对檀香山的自然美景、历史文化、民族风情和经济发展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增长了很多见闻。檀香山这个举世闻名的游览胜地，给我留下了美好的难忘的印象。

参观了夏威夷的檀香山，不禁使我想起了祖国的海南岛。六十年代我在南海舰队工作时，很熟悉那里的情况。海南岛三亚市风景优美，有鹿回头、天涯海角等名胜，气候和海滩近似檀香山。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旅游事业的发展，我希望，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东方的夏威夷将会在中国的海南岛出现。

参观珍珠港。凡有点近代史知识的人，对珍珠港的名字当不会感到陌生。参观珍珠港，不仅使我欣赏了它美丽的风光，更勾起了我对历史的回思。珍珠港是檀香山附近的一个天然良港。它的入口处不大，但一进入就是一个湖形的大海港，水深四十多米，可容巨舰。一九四一年以前，这里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就发生在这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夏威夷

时间十二月六日),正是美军官兵的“神圣周末”,整个檀香山市一片娱乐升平的景象,官兵们象往常一样沉浸在尽情的玩乐之中。但是第二天(夏威夷的星期日)早晨,一百八十架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从已秘密驶近夏威夷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向着预定目标瓦胡岛檀香山市上空飞去,而美军毫无所觉,一切照常。七时十五分,如同晴天霹雳,突然出现的轰炸机群俯冲轰炸,五分钟内瓦胡岛的美国空军陷于瘫痪。与此同时,大批日军鱼雷飞机,对珍珠港的美军太平洋舰队进行了轮番攻击,整个珍珠港成为一片火海。这次日军的突然袭击,使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和檀香山的空军几乎陷于全军覆没。这个损失,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空军损失的总和还要大。日本帝国主义袭击珍珠港的侵略行径,固然要受到谴责,但这也是当时美国政府执行反动的绥靖政策造成的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军事上来说,日军所以能偷袭成功,也是由于美军麻痹大意,丧失警惕所致。我们到达檀香山的第二天,六月十日上午即乘专车前往珍珠港参观,十时到达。昔日的军事要地,如今已成了美丽的游览胜地。美国政府在港口种植了奇花异草,树木成荫。但他们也未忘记历史教训,在珍珠港建立了一个纪念馆,展出了许多有关珍珠港事件的文物和照片,放映了介绍珍珠港事件的电影,帮助游客对珍珠港事件的了解。当年被日军击沉的三万吨级的“亚利桑那号”军舰,美国政府把它打捞起来修理好,仍停泊在珍珠港中,以作纪念和供游客参观。四十

年过去了，虽已事过境迁，但导致日军偷袭的惨重教训永远值得人们记取。

在檀香山期间，我们拜会了一批华侨、华人和亲友，应东西方中心主任李浩博士的邀请，参观了东西方中心。还先后出席了夏威夷州副州长约翰·希尔先生和夏威夷著名颅脑科专家温华俊医师的宴请。

参观东西方中心。六月十二日上午，东西方中心主任李浩博士到旅店来看望我们，给我们送来水果，邀请我们共进早餐。李浩博士是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李汉魂将军的儿子。李汉魂将军的夫人吴菊芳女士是我们中山大学的校友。她在纽约获悉我们到达檀香山，即电示其子李浩博士来会见我们。李浩博士当时正要动身去华盛顿开会，不能陪同我们进行参观活动。但他邀请我们到他主持的东西方中心参观，并安排了接待工作。

十三日中午，有专车来接我们到东西方中心，该中心的传播所副主任朱谦先生热情接待我们。他向我们介绍了东西方中心的情况，给我们放映了中国领导人访问东西方中心时的录象片。

东西方中心是美国国会于一九六〇年创办的一所教育机构。创办时属于夏威夷大学的一部分，一九七五年开始，成为独立机构。它的宗旨是致力于“亚洲、太平洋地区各国和美国在学习、训练和研究方面的合作，以达到增进互相了解，改善互相关系的目的。”目前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六十

一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联系。每年接受二千名学生和研究人员,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亚太地区,三分之一来自美国各地。过去二十三年中,共有三万多人参加了东西方中心的研究项目;这三万多人中,也是三分之二来自亚太地区,三分之一来自美国。

东西方中心有五个研究所,它们是资源制度所、人口所、环境和政策所、文化知识所和传播所。具有多种学科的专家小组在这五个所内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东西方中心还广泛邀请该地区内的学术界、政府方面、工商界、新闻界以及公众领导人物参加在职人员小组,共同探索和讨论带关键性的问题,并设法提供解决的方法。它着重研究的课题,对各地区乃至世界未来都具有重大影响,如煤的使用不断增加的二氧化碳对环境的影响,人口剧增和移民所产生的影响,能源、食物和矿产资源的管理,等等。这些研究课题是针对各地区的需要,由中心研究人员和有关国家的专家共同确定的。

东西方中心毗邻夏威夷大学马诺校园,占地二十一公顷。它的办公大楼内有三百个办公室,供来自各国的二百五十名研究和行政人员使用。还有三座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宿舍楼。另外它还有一个会议中心,会议室内都设有同声翻译和全套录象设备。

东西方中心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美国国会每年二千万美元的拨款,占全部经费开支的四分之三。其他由亚太地区

二十一国的政府、私人基金、公众机构、社团及个人捐助。一九八四年，中国有二十人在这里参加学习和研究，其中新闻人员六人，是来学习写美国式的英文新闻报导的。中国在这里学习和研究人员的费用是由东西方中心提供的。

东西方中心决定科研课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对重大课题进行研讨，并设法提供解决的方法，使研究成果迅速变成社会效益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副州长约翰·希尔先生的宴请。夏威夷州的副州长约翰·希尔先生获悉我们到达夏威夷的消息，即通过李浩博士与我们联系，要宴请我们。六月十三日，我们接受了希尔先生的友好邀请。

十四日下午，希尔先生派专车来接我们去参加他欢迎我们的晚宴。他请了夏威夷大学校长的特别助理程秦家德博士当翻译，还专门请了美籍华人、夏威夷大学的法律博士刘光强先生和两位中国学者与我们一起共进晚宴。

希尔先生非常热情、坦率。他举杯向我们祝酒问好之后，就自我介绍：他祖母是中国人，可能姓曾。他的夫人是在夏威夷出生的日本人。他说：“华侨早在一七八六年就来到这里，长期以来对夏威夷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一九八六年我们要举行华侨移民夏威夷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夏威夷的华侨绝大多数是广东人，我们州政府希望夏威夷同广东结成姐妹省，檀香山和广州市结成姐妹城市，以加强两地经济文化的联系和交流。我们计划在一九八六年纪念华侨移民



夏威夷二百周年的时候，邀请广东的人士到夏威夷来观光访问。”他还很客气地对我恭维说：“曾生将军在广东德高望重，又曾荣任广东副省长兼广州市长，请曾将军帮助促成此事。”

我感到这是一件好事，就表示我们回国后一定向广东省和广州市的领导转达副州长先生的建议，我们很愿意为增进两地人民的友谊尽一分力量。希尔先生得到这满意的答复之后，高兴地站起来举杯致谢，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宴会上充满亲切的情谊，最后宾主一起照相留念。

回国后，我们分别与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有关同志汇报此事，并将信息反馈给希尔副州长，使希尔副州长的建议不久就成为事实。希尔副州长一九八六年曾率领代表团访问广州，受到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和广州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

希尔副州长对我的热情宴请，引起了我的遐思：小时候我和我的父辈在香港和澳洲时，受尽了洋人的嘲弄和凌辱，如今美国的州长先生对我们以上宾相待，真是今非昔比啊！能有今日的此情此景，当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本事，主要是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在世界民族之林站起来了，我们的祖国强大了，外国的有识之士，自然对我们以礼相待。想到这里，我感到自豪和快慰。

照相后，我们和希尔副州长等人握手告别，程秦家德博士送我们回丽晶大酒店。秦女士是历史学博士，和黄慰慈秘

书是同行，他俩人都在研究华侨历史，所以，谈得很投机。秦博士告诉我们，她的弟弟秦家聪在国内工作，现正在写秦氏宗族的历史。她很想有机会回祖国一行，看看祖国的新变化，同时收集华侨史的研究资料，到时要来看望我们。她还告诉我们，现任的夏威夷大学校长要退休了，她这个校长特别助理就要离开这里，准备到波士顿王安电脑有限公司去任职。我要黄秘书商请她到王安电脑有限公司任职后，建议该公司到中国设立办事处，她可争取以王安电脑有限公司驻中国办事处人员的身份回中国工作。如果到北京、广州设办事处的话，我们可以为她提供方便。秦博士要求继续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把到纽约后的联系电话告诉了她。不久，秦博士就与黄慰慈同志取得了联系，告知王安电脑有限公司已决定到北京设立办事处，她就要动身去北京工作了，希望在北京能得到我们的帮助。现在，王安电脑有限公司已在我国投资兴办了一批企业，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六月十六日中午，我们告别了夏威夷的亲友，乘飞机赴三藩市。

六月十六下午八时，我们抵达三藩市时，三藩市的崇正会、惠东宝同乡会的乡亲们已在机场等候我们的到来。谢乔远先生等中山大学的校友和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两位董事也到机场迎接。我们选择在唐人街附近的假日旅店住宿。

三藩市，华侨、华人都习惯叫它为旧金山，是位于美国西部太平洋沿岸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一座著名的城市。市

内人口八十多万，华侨、华人约有二十多万人。三藩市的唐人街，是华侨、华人集中居住和经营生意的地方。街道屋宇整齐，建筑物的门前和室内的装修设计有凉亭宝塔、龙凤浮雕，保存了东方的色彩。商店出售中国物品。酒楼茶室布置辉煌，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我们在三藩市停留四天，观光了市容，参观了联合广场和富有西班牙色彩的多利士教堂，以及世界闻名的金门大桥和屋仑大桥。访问了旧金山崇正会，出席了惠东宝乡亲欢迎我们的宴会。应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邀请，参观了该公司的实验中心。会见了褊曼禾、谢乔远、李永协等中山大学的校友和胡荣栋、谭文让先生等好友。

与旧金山客籍乡亲欢聚。六月十七日下午，旧金山崇正会为欢迎我们，在该会礼堂举行了热烈亲切的欢迎会。崇正会是海外客籍同胞的民间组织，总会设在香港，台湾省和侨居世界各地的客籍同胞，都成立了各地的崇正会。欢迎会由旧金山崇正会会长傅其敏先生主持并致欢迎词。傅会长出于对祖国和对家乡的热爱，对我讲了一些推崇的话。他说：“我们能够欢迎来自祖国大陆的乡亲、著名抗日将军曾生先生，是我们客家人的光荣。我代表旧金山崇正会和参加欢迎会的乡亲热烈欢迎曾生将军和夫人阮群英女士、秘书黄慰慈先生的到来，并预祝他们旅途愉快。”我在欢迎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感谢乡亲们的盛情接待，介绍了祖国和家乡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之后的新面貌，希望乡亲们能够回家乡观

光,更希望能够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和乡亲们再会。

出席欢迎会的有旧金山崇正会前会长陈福祺、中文书记王昌泉、英文书记江爱廉、楼业部李九、妇女部王燕芬,会董池奕钦,议员陈开源、李观进、谢捷秀、李马田、董新,元老叶永、骆生、魏炳坤、刘平、刘庚、李基、范南。参加欢迎会的会员有李新泉、谭润谦、罗伟光、钟国平、邱惠兰、叶群、曾松兰、李煌等数十人。乡亲们热情和我们握手问好,纷纷要求我和他们照相留念。

欢迎会后,有一位原东江纵队的队员送我们回假日旅店。进入我们的住房之后,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地对我说:曾司令,今天见到你我真高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老人家,和你老人家握手。我是穷人家的子弟,是你带领我们抗日打日本鬼子,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我虽然受极“左”路线所迫不得不出走异国他乡,但是我的心还是红的,爱国的。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多么想见到你,向你诉说我不幸的遭遇。后来,听说你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也被打倒了,我心里真是十分难过。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泣不成声,两行热泪往下流。我劝慰他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好了,我们今天有幸相会,应该高兴才对,在方便的时候可以回祖国看看。慢慢地他的情绪安定下来之后,向我们诉说他受迫害的不幸遭遇,介绍这里华侨、华人社会的情况和他们向侨胞们进行爱国宣传的情况。

六月十八日下午,惠东宝的乡亲在唐人街利园酒家设

宴欢迎我们。出席欢迎宴会的有三藩市中国总领事馆杨宗良领事和夫人、古华明领事和夫人、严小明领事的夫人,以及惠东宝乡亲六十多人。宴会上宾主频频举杯,互相祝贺,气氛十分热烈,生动地反映了乡亲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珍重同乡情谊的赤子之心。

参观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实验中心。香港东南资源公司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有密切的业务关系。该公司董事长郑伟明先生在香港已和我们联系,要求我们到美国之后;安排时间到标准石油公司参观。当我们抵达三藩市机场时,郑先生和标准石油公司的两位董事已在机场等候,热情迎接我们,并商定我们在六月十九日上午到该公司参观。

十九日上午八时半,标准石油公司派专车来接我们到该公司的接待室。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和实验中心的负责人热情接待我们。他们首先向我们简要地介绍了该公司的概况,然后详细地向我们介绍该公司研制的高级改性沥青的特性及其用途,并放映了加拿大应用高级改性沥青建筑公路取得很好经济效益的电视录相片。据介绍,五六十年代,加拿大采用了该公司用高级改性沥青筑路的技术,收到了很好的效益。下午,我们到该公司的实验中心参观。实验中心专门给我们表演了用改性沥青建筑人造蓄水池和铺筑公路。经过参观访问,我感到这是一项既可节省能源、节省投资,又可减少大气层环境污染的先进技术。

参观完实验中心之后,公司负责人向我们提出要求中

国政府在内地提供一段公路给他们做示范试验,如试验成功,他们愿意提供这项技术为发展中国的交通事业服务。我表示回国后向政府有关部门转达贵公司的建议,将有关资料送有关部门研究,衷心感谢贵公司的盛情接待。后来,由于考虑到这项技术虽然好,但应用起来需要国家相当大量的外汇资金。在国家外汇资金从严掌握的情况下,能自力更生建筑公路,就无需动用国家的外汇资金来采用外国的技术了。所以,用高级改性沥青筑路这项技术一直没有采用。

二十日上午,拜访了和我一起参加“一二九”爱国运动的老同学褙曼禾先生及其夫人,回顾了当年为抗日救亡而奋斗的情况。下午,我们告别了三藩市的乡亲们,即乘飞机去洛杉矶(广东的华侨习惯称为罗省)观光游览。

洛杉矶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大城市,人口有二百万人左右。市区范围广大,马路长直宽广,有的大道长达二十多公里,路旁房屋的编号达一万多号,可见市区面积之广大。我们在洛杉矶停留三天,纯粹是观光游览,没有安排访问活动。

市区的游览活动。在洛杉矶三天,我们尽情游览,大饱眼福。我们游览了市中心的保盛广场、市政府大厦和卫索大道,荷里活道、保华利山岗、好莱坞碗型音乐场、中国戏院以及新唐人街,参观了好莱坞影城和迪士尼乐园。

在洛杉矶,如果说卫索大道是一条现代化街道的话,荷里活道则是新旧时代建筑相结合的街道。在荷里活道,有大

得惊人的餐馆,乘车的人可以将汽车驶入餐馆内,餐馆的服务员便供应你所需的食物,放在车上吃喝,十分方便。同时,还有大得惊人的戏院,银幕很大,可以坐在汽车上远看,如同在戏院看戏一样清晰。保华利山岗环境优美,是好莱坞电影界大亨聚居的地方,洛杉矶人以能住此地为荣。好莱坞碗型音乐场是一个露天的音乐场,由于音乐台的建筑设计象一个巨碗覆盖的形状而得名,可容纳二三万人的观众。中国戏院的大门有石狮、有丹漆红柱,外型设计是东方色彩,别具一格。它是洛杉矶著名的娱乐场所,凡新影片首次放映仪式多在此戏院举行,故营业兴盛。在戏院门前的空地上镌有电影明星的签名和他们手足的印迹。意思是将杰出艺人的足迹留存于世,以作纪念。有的影迷专来此地,脱去鞋子将脚踏在明星的足印上而引为荣幸。由此可见美国的影迷对明星崇拜到何等程度。

洛杉矶的新唐人街自成一区,虽然是现代化的设计,但其建筑风格纯粹是东方色彩。街内餐馆林立,外国顾客如云。餐馆以万珍楼、太白楼和华玉楼为最。美国一般商人在傍晚六时就休息了,而这里营业直至深夜二时。足见中国人勤俭创业的拼搏精神。数年前,新唐人街举行开幕典礼,洛杉矶市长亲临主持,洋乐队助兴,来宾众多,盛况空前。现在华侨、华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已大为提高,确实不同于往日了。我们到万珍楼吃晚饭,店主知道我们来自祖国大陆,特别热情接待,把我们看作是祖国来的亲人。万珍楼的菜色,

名不虚传,十足中国风味。

参观好莱坞影城。六月二十一日,钟庭基先生带我们去参观世界闻名的好莱坞影城。

好莱坞影城是美国电影业的发祥地,也是世界著名的制片场所。由于场地广阔,游客需要乘游览车进行参观。场内布置得象一座城市,场内的布景从美国开国以来的各种屋宇形式,到其他地方色彩的建筑物,一一照原来尺寸大小和颜色布置设计,造成了大规模的实物模型,排列在场内的大街两旁,从外表观看和真屋宇没有差别。门前还有花圃草坪、路灯、喷泉等。在拍片时需要哪个地方景色的建筑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寻,从罗马的宫殿,到威尼斯圣马广场,种种齐备;各种布景,分门别类,按图编列整齐,木板批荡加以粉饰,使用时将各种材料拼合,可以做成凡尔赛宫、伦敦古塔或牧场村舍,远望和近看都如真景一般。室内的布置如厅堂、家具等,另有专室处理。郊外景色、原野森林、瀑布溪流,都是在空地上堆砌起来,用电力激成溪涧流水,或河流波涛,十分逼真。这些布景耗资巨大,绝非一朝一夕可以造成,所以每次拍完影片,均妥善保管。一则,为日后拍片提供方便,省时省钱;二则,开辟旅游点,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真是一举两得。

美国开辟好莱坞影城旅游点的做法,对我国如何选择和开辟旅游点,发展旅游事业,是一个值得借鉴范例。

参观迪士尼乐园。迪士尼乐园是美国大制片商米老鼠



动画片创始人和氏尼精心设计建筑的。其内容之丰富多彩，规模之宏大，可算是世界一流的游乐场。全场占地面积一百六十亩，于一九五五年投资上千万美元建成。开业后游人满园，据闻每年获利润数百万美元。该园最大的特点是把教育和娱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它把过去的历史和现在与未来的典型景象，用各种娱乐设施精彩地表现出来。通过游览，启发人们领会科学知识，启示将来的原子太空时代人类的生活。最有兴趣的是特有的潜水艇和激流戏船。乘上潜艇沉下湖底，纵目四周，如在海洋深渊中，可以见到海底各种奇观。乘上激流戏船，船冲进地下河道，密西西比河两岸的景色即展现在眼前。由于这两个节目惊险迷人，非常刺激，参观的人特别多，都需要排队等候。娱乐园的节目，不仅富有趣味，而且具有科学价值，使人在游览之时，缅怀过去，目睹现实，憧憬未来，启迪人们的想象，使人们在娱乐中得到教益。目前，我国发展娱乐设施，迪士尼乐园这一特点，值得学习和借鉴。

· 六月二十四日上午，我们在洛杉矶机场乘飞机前往美国东部的纽约。下午六时，我们到达纽约机场时，惠州工商会会长方成、秘书曾水生、纽约崇正会会长曾庆安，纽约华人联合会名誉会长梅子强、副会长黎法兴，纽约华人协会副会长梁树金，中山大学校友林趁和夫人柳淑媛医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孔浩洲领事等数十人到机场迎接我们。乡亲们、校友们、朋友们和我们热情握手，亲切问

好,给我们送鲜花。照相机、录相机,一一录下了这亲切动人的情景。

我们被安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住宿。曹桂生总领事和领事馆的同志热情迎接我们。

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和全国经济、文化中心。无论金融、建设、文化、交通运输,都属世界一流。联合国会址也设在这里。市区占地三百二十平方英里,人口约八百万。华侨、华人三十五万。

我们六月二十四日到达纽约,八月十日离开这里,前后四十八天。这期间,我们还先后到了费城、华盛顿、哈佛大学和大西洋城等地参观访问。

在纽约,我们参观了市容、商场和著名的旅游点,广泛地会见了各侨团的负责人、惠东宝的乡亲、中山大学的校友和曾经一起工作的同事,及并肩战斗的战友们,受到他们热情的接待和隆重的欢迎,到处洋溢着真挚的同乡、同窗的情谊。同胞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珍重同乡、同窗情谊的赤诚之心,实在感人。

与纽约客籍侨胞欢聚。二十五日下午二时,我们应纽约的惠州工商会、崇正会、福建同乡会、华人协会、大陆总商会等侨团的联合邀请,出席了他们在惠州工商会欢迎我们的茶话会。上述各侨团的负责人和元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孔浩洲领事和惠东宝的乡亲们一百多人出席了欢迎茶话会。当我们的汽车到达唐人街纽约惠州工商会所

的门前时，乡亲们敲锣打鼓，放鞭炮，舞狮子，热烈欢迎我们。顿时间，唐人街热闹起来，场面十分动人。我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走进了会场。

惠州工商会会长方成主持欢迎会，并代表纽约的乡亲们致欢迎词。我用客家话致简短的答词。感谢纽约华侨乡亲对我们的盛情接待，转达祖国大陆同胞对纽约华侨同胞的问候，介绍了祖国和家乡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的发展和巨大变化，希望乡亲们有空能回去看看家乡的新面貌。

孔浩洲领事也讲了话。他说：“当年曾生将军领导东江游击队在敌后与日本侵略军斗争时，东江人民和海外华侨是游击队的坚强后盾。纽约华侨曾汇款支持曾将军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曾将军领导东江人民进行抗日救国斗争的业绩，是与海外华侨的支持分不开的。今天，曾将军和东江人民在海外的父老乡亲欢聚一堂，实在是一件喜事。”在座的侨胞们听后深有感触，以热烈的掌声回报孔领事的发言。

七月二日下午六时，我们应邀出席了纽约惠州工商会在纽约唐人街喜相逢酒家为欢迎我们举行的盛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领事馆副总领事纪立德出席了欢迎宴会。参加欢宴的除了惠州工商会和崇正会的负责人外，还有纽约华人联合会名誉会长梅子强、副会长黎法兴、大陆总商会会长沈卓培，华人协会负责人刘耀、梁树金，美东福建同乡会会长郑忠高，美国费城崇正会会长杨维善和纽约东安公所、纽约大鹏同乡会、纽约华人会馆联合会等侨团负责人和

林趁先生等中山大学的校友，共二百五十多人。

应邀参加欢宴的还有纽约市警察局副局长莫虎，纽约市警察第五分局局长屈士琪和局长助理雷柏锐以及华人策划会总监王碚等。

宴会由惠州工商会会长方成致欢迎词。方会长说：“曾生伉俪来美，在百忙中前来看望海外侨胞，说明祖国对侨胞的关怀，中国政府与海外侨胞手连着手，心连着心。我们要团结一致，努力促进祖国实现统一，共同振兴中华。”我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答词，向出席宴会的乡亲们、校友们和朋友们问好，感谢大家的盛情接待。

七月三日晚，我们应宝莲酒家总经理李俊辉的邀请，参加李先生在宝莲酒家为欢迎我们举行的宴会。参加宴会的除李先生的家属、亲友外，还有纽约市的客籍侨团负责人、华人联合会、华人协会的名誉主席或负责人和我中山大学的部分校友共约六十多人。李俊辉先生是香港新界的客家人，中学毕业后到英国伦敦跟叔父学经商，两年后到美国读书。大学毕业后，在纽约开办成衣厂和酒楼，是一位年青有为，热情好客的青年人。由于他家乡是我们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活动的地区，他小时候就从父辈那里听说过我们港九游击队英勇抗日的事迹，也听说过我的情况。前几年他在纽约崇正会任部长时到北京观光，曾到我家来看望我。这次我们到纽约访问，他立即向我们发出邀请。

宴会上，李先生和夫人热情接待来宾，频频向我们敬酒

问好。由于绝大多数来宾都是客籍同胞，李先生举办的这次欢宴，成了客籍乡亲的一次欢聚。

七月四日上午，应纽约崇正会的邀请，我们出席了该会欢迎我们的茶话会。美东纽约崇正会，是纽约最大的客籍侨团，拥有三四千会员，在全美国的侨团中，有一定的影响。出席欢迎会的有纽约崇正会负责人和元老曾庆安、黎法兴等近百人。曾庆安会长主持茶话会并致欢迎词。我致了简短的答词之后，茶话会开始了亲切的交谈。我们用客家话向乡亲们问好，共叙乡情。

会后，我们和崇正会的负责人和元老共进午餐。

七月九日下午，我们应邀参加了纽约大陆总商会在唐人街高陞酒楼欢迎我们的晚宴。该会会长沈卓培、元老黎法兴等人出席宴会。

七时半，宴会在亲切而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我们在纽约与客籍同胞欢聚的活动，纽约几家中文报刊，以《曾生伉俪抵纽约访问，惠州工商会热烈欢迎》、《曾生周一访问华埠，与乡亲欢聚惠州工商会》、《惠州工商会宴请曾生伉俪》、《客籍侨胞欣逢欢聚——欢迎抗日将军曾生》、《他乡遇故知，举杯话亲情》、《当年同饮东江水，今日异乡迎亲人》、《纽约大陆总商会在华埠欢宴曾生》等醒目标题大量报导，在纽约唐人街引起了很不寻常的反响。

小型记者座谈会。我们到纽约活动的消息，引起了各报记者的浓厚兴趣。七月初，几个报社的记者来联系，要我安

排时间接受他们的采访。考虑到我们参观访问活动的日程安排很紧,只好用半天时间,举行一次小型的记者座谈会。到会记者七八位。

首先,我接受记者的提问,简单地谈了我个人的经历和东江纵队的战斗历程。然后我让黄慰慈秘书向记者介绍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美国华侨对祖国抗战贡献的情况,和祖国在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新景象。黄秘书着重介绍了中央的对外开放政策,给广东的经济带来了全局性的五大好处:1. 工农业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点一,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水平快了一倍;2. 对外经济交流,大幅度增长。外贸出口一九八三年比一九七八年增加了一点二四倍;一九七九年以来四年间,同外商共签了各种合同三万二千多件,总金额达四十六亿点四美元,其中已使用的达十一亿点五美元。3. 特区经济建设飞跃发展。到一九八三年底,深圳已完成了人民币十九亿元的基本建设。目前,已利用外资达港币二十九亿元。四年间,工业增长十一点七倍,财政增长十一点八倍。中央已肯定了深圳的经验。4. 市场繁荣,物价基本稳定。一九八三年商业零售额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一倍多,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五。一九八三年全省物价增长百分之零点七;5. 人民生活提高,四年多来,全省新增加就业人数三百五十四万,职工工资增长百分之六十;农民收入增长百分之一百零四。这五方面的成就,说明广东现行政策是正确

的。广东实行中央的开放政策在全国先走一步。随着这个政策在全国的贯彻执行,祖国的发展必将会是很快的。

最后,针对一部分华侨担心现行政策会变,担心走回头路的思想,我补充说明了现行政策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制定的,现在已经深得人心。国家政策,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的,某个领导人的变动,也不会改变现行的好政策。如果说变,那就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使现行政策不断完善,越变越好;而不是变坏,不会走回头路。

记者座谈会以后,报刊反映很好。《纪念‘七七’访问抗日将领曾生》、《曾生纵横戎马半生》、《鏖战沙场屡立奇功,脱下征袍从政为民——访问抗日将领曾生》和《中央对外开放政策,广东取得五大好处》等标题的文章,七月上旬,先后在纽约的报刊上发表。与此同时,我还让黄慰慈秘书在纽约《华侨日报》发表《中美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友谊——东江纵队营救美国飞行员》的文章,并在三藩市的《时代报》和纽约的《华侨日报》发表了他和许肖生合写的《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美国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几篇学术论文。在广大的华侨、华人和美国友人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的日美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教授,在报上看到了我们在纽约访问活动的报导和文章之后,立即通过我国驻美使馆,热情地邀请我们到哈佛大学进行访问。

与美东中山大学校友的欢聚。七月十日下午,我们应美

东中山大学校友会的邀请,参加了在唐人街银宫大酒楼举行欢迎我们的宴会。参加宴会的有美东中山大学校友会会长蒋如龙,纽约华人联合会名誉会长梅子强,李汉魂将军的夫人吴菊芳女士和林趁、谢蔼明,方木林等校友五十多人。

宴会由蒋如龙会长主持,并致欢迎词。蒋会长说:“今天,我们美东中山大学校友会的校友们,在此薄宴欢迎来自祖国大陆中山大学校友会名誉主席曾生先生、夫人阮群英女士和黄慰慈秘书一行到纽约观光访问,以表我们对曾生校友的敬意和同窗的情谊。预祝他们旅程愉快。”我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答词,感谢校友们的盛情接待。

据谢蔼明校友介绍,在纽约,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的校友有数千人,居住纽约各区,从事各行各业。为加强联系,增进情谊,校友会每周在银宫大酒楼组织一次聚会,自由参加,自费设宴,很受校友们的欢迎。

宴会上,气氛十分热烈,充满同窗手足之情。校友们不论过去认识与否,一见如故,都情同手足。特别是有六七位阔别四十多年的老同学,异国重逢,分外高兴。他们仍亲切地叫我“曾大哥”!要我讲述别后情形。光阴似箭,我们这批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成了白发银须的老人。时光的流逝,并没有冲淡我们同窗的情谊。四十多年间,虽然世事沧桑,往日各奔前程,如今异国喜相逢,仍是情谊至深。大家相互话旧,回顾同窗岁月,一起学习和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动人情景,似乎缩短了时空的距离,又回到了青年时代。



宴会上亲切动人的场面,印记在校友们的心中。

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四天时间,应费城崇正会的邀请,我们到费城和华盛顿进行参观访问。

访问费城崇正会。费城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在独立战争期间,它是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大陆会议的所在地,一七九〇年至一八〇〇年是美国的临时首都。

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代表会议,美国独立战争的领导机构大陆会议,在费城通过了由资产阶级思想家杰弗逊、富兰克林等人起草的《美利坚合众国十三州共同宣言》(简称《独立宣言》)。宣言宣布“解除对于英王的一切隶属关系”,建立自由组合的美利坚合众国。宣言的通过和发展,标志美国的诞生。因此,七月四日,被定为美国的国庆节。美国独立战争领导机构的所在地费城,就成了美国的临时首都。现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是一八〇〇年从费城迁去的。

费城是美国的历史名城。我们参观了独立大厦和自由钟。独立大厦原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州议会大厦,大陆会议曾在此举行会议,并通过《独立宣言》,因此,成为美国独立的象征。自由钟是一七七六年七月八日,大陆会议向费城人民宣读《独立宣言》时敲响的大钟。参观者在钟旁边设置的小孔投进硬币,即可听到关于自由钟和美国独立历史的录音介绍。

费城有许多客籍华侨、华人,其中宝安人不少。最近这

三四年间，费城有不少华侨、华人回国观光，有的侨胞还到我家来看望我。我到纽约访问的消息传到费城之后，费城最大的客籍侨团费城崇正会就邀请我们到费城和华盛顿参观访问。二十六日下午，我们在纽约惠州工商会、纽约崇正会负责人方成、曾庆安和梁树金、曾水生等人的陪同下，到达费城崇正会会所。费城崇正会会长杨维善、副会长张和以及毛伟雄等一百多客籍同胞热情迎接我们。杨会长陪同我们参观了该会的会所、费城的中国街和国会大厦、自由钟之后，在会所休息片刻，我们就去参加费城崇正会欢迎我们的盛大宴会。

参加这次欢宴约有一百五十多人。除了费城崇正会的负责人外，费城中华文化社区中心理事张天德和纽约崇正会会长曾庆安、纽约惠州工商会会长方成和纽约华人协会副主席梁树金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由费城崇正会会长杨维善代表费城客籍同胞致欢迎词。在宴会上，我送了一幅画给费城崇正会留念，并对乡亲们的盛情接待表示感谢。宴会上，宾主举怀祝贺，充满乡亲情谊。

宴会后，几位坪山的乡亲拉着我夫妇到他们家里作客。我们去探望了几家乡亲之后，陪同我们去登门拜访乡亲的费城崇正会的负责人怕我们一天劳累过度疲乏，要我们回宾馆休息。主人要求我给费城崇正会题字留念，我回到纽约之后，就写了“黄炎子孙要团结，共同努力振中华”的题字，

托人送交费城崇正会，再次向乡亲们表示感谢！

到华盛顿参观。六月二十七日，费城崇正会的负责人按预定的计划，吃完了早饭，就陪同我们去华盛顿进行参观活动。中午到达华盛顿，在休顿酒家住宿。

华盛顿是美国的首都，也是美国的政治中心。美国整个国家机器的要害部分，包括总统府（白宫）、国会、国务院、国防部（五角大楼）等国家机关都设在这里。有人称它为美国的“心脏”。华盛顿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是世界一流的，它风景如画，有不少公园和园林，有“花园城市”之美称。华盛顿也有唐人街，全市的华侨、华人有一万多人。

下午三时半，我们一行十五人，应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章文晋同志的寓所，出席章大使欢迎我们的晚宴。章文晋大使和夫人热情接待我们。

章文晋大使是一位头脑冷静，思维敏捷，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出任我国驻美国的大使，很受美国人民和广大华侨、华人的欢迎和尊敬。章大使热情地和我们握手问好之后，就和我们在会客室进行轻松愉快的交谈。他向我们介绍了近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情况之后，非常诚恳地向我们和纽约、费城的几位客籍侨领了解美国各地海外同胞对祖国、对我们大使馆和各大城市总领事馆的要求和希望。有几位侨领谈到，这几年来，祖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之后，发展变化很大，祖国亲人来信反映很好，广大华侨也深受鼓舞。当纽约惠州工商会会长方成谈到计划组织侨团回国观

光,以促进在美国的同胞对祖国的了解和联系时,章大使说,这很好。希望各地的侨领多做这方面的工作,以加深海外同胞对祖国的了解,加强海外同胞和祖国亲人的联系,促进和加强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的联系和友谊。

五时,晚宴开始。章大使举杯欢迎我们到大使馆作客,祝我们旅程愉快,访问成功。宴会在热烈、亲切的气氛中结束。

章大使和夫人陪同我们观看了寓所的内外环境,并和我们在寓所大门和花园照相留念。

二十八日,我们游览了华盛顿的市容和商场,参观了白宫、国会大厦、五角大楼、水门酒店和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弗杰逊纪念堂、科学技术历史博物馆、美术馆、宇航博物馆和唐人街。在唐人街我们遇见一位八十三岁的老华侨,每天还要到安良工商会上班。老人家听我们讲广东话,就高兴地走上来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告诉他是从祖国大陆广东来的。他说:我们是老乡。我是广东台山县人,到美国五十年了,今年八十三岁,说来惭愧,还没有回过老家。听说近年来家乡变化很大,很想回去看看。我们鼓励他早日回去看看家乡的新变化,和家乡的亲人团聚。他说:老家和我同辈的人都不在了,回去也不认识什么人,主要想看看自己出生的家乡。

晚上,我们到华盛顿附近探望我同宗的侄子曾世强。二十九日上午,我们怀着愉快的心情回纽约。

在纽约期间，我们还出席了纽约华人协会名誉主席梅子强先生、纽约东方文化事业公司总经理刘振翼先生等好友欢迎我们的宴请。我同宗的侄子曾繁强专程接我们到世界著名赌城——美国大西洋城参观。

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应哈佛大学日美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教授的邀请，我和妻子阮群英、在美国留学的女儿曾克南，秘书黄慰慈一行四人到哈佛大学访问。

傅高义博士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的教授，美国研究东亚问题著名的专家。他对日本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的专著《日本名列第一》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已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发行，我国也已翻译成中文出版。

傅高义教授是一位很有战略眼光的学者，他认为中国必将在世界上发挥它的作用。因此，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为了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问题，他学会了中文。他可以阅读中文书报，会讲普通话。五十年代，他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收集了不少关于广东和广州的资料。后来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广东和广州》的书，是讲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七年间广东和广州情况的著作。当他在报刊上看到我们在纽约活动的消息之后，就邀请我们到哈佛大学访问。他的夫人艾秀慈是人类学博士，研究老年人问题的专家。她写了一本研究香港老年人问题的专著。艾秀慈博士为了研究香港的老年人问题，曾经在香港一位居民家里住

了一两年时间，一边学习广州话，一边进行调查研究。现在，她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广州话。所以，我们和傅高义夫妇交谈用普通话和广州话就可以，不必用英语，也不必翻译。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我们到达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夫妇和他的秘书苏伟热情接待我们，把我们安排在他的家里住宿。主人的盛情接待，使我们有宾至如归之感。

二十三日上午，傅高义教授安排我们和他座谈。首先，他向我们介绍他个人和哈佛大学的情况。他告诉我们：他是犹太人，祖辈曾侨居波兰，后来才到美国来的。他一九五八年在哈佛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并在该校任教。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是他的同学。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前，他曾经陪同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访问中国，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会见过。中美建交后，他多次到中国来进行考察，他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确实发生了令人兴奋的巨大变化。西方世界不少人由于长期对中国缺乏了解，对中国的看法是不全面的。有一个时期，把中国说成一无是处；前段时间，在美国兴起了一股中国热，又把中国说得太好了。目前，中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中国还有许多问题。只有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才能对中国有正确的态度。他希望美国人都能够对中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这样，两国人民的友谊才能够健康发展。

他向我们介绍哈佛大学的情况时说，哈佛大学是美国

一所著名的大学。它不仅开办的时间早,更重要的是它为美国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先后为美国输送了一批国务卿或部长级的官员。傅高义教授介绍完之后,就向我们了解东江纵队和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七年间广东和广州的情况。我们用了一上午的时间,向他介绍了东江纵队的整个战斗历程,并向他提供了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坚持华南敌后抗日战场一面旗帜》的文章,和黄秘书在纽约《华侨日报》发展的《中美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友谊——东江纵队营救美国飞行员》的文章。

下午,傅高义教授陪同我们去波士顿郊区列克星敦参观北美独立战争的一个战场。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凌晨,波士顿的民兵在列克星敦伏击前来搜查民兵的军火武器,并逮捕爱国者领导人的英国军队,揭开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的序幕。在这个揭开独立战争序幕的战场上,有一座保尔·瑞维尔的巨大塑像。保尔·瑞维尔是一位及时通知各地民兵准时前往列克星敦和康克德伏击英军的民兵。我们观看了战场旧址的碑文。美国独立战争胜利的历史告诉我们: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支持和参加革命战争的人民群众,是取得独立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二十四日上午,我们参观了哈佛大学的校园。下午,我们继续介绍广东抗日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广东和广州的情况。双方还交换了对国际上若干问题的看法。虽然,我们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并不妨碍我们

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的共同探讨。晚上，傅高义教授和五位来自中国北京、上海和台湾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三位华裔教授，到他家里来和我们聚会，并一起共进晚餐。席间，留学生和教授们向我们谈了他们在哈佛大学学习工作的情况和他们对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期望。我们也向他们介绍了祖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变化发展的情况。希望他们努力掌握先进科学技术，为振兴中华作出贡献。

二十五日，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傅高义教授、艾秀慈博士和苏伟秘书，乘车回纽约。傅高义教授驾车送了我们很长的路程，才和我们握手告别。

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的后裔，都是炎黄的子孙。美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华侨、华人在美国约有一百二十万。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在美国的华侨、华人曾遭受到种族歧视和迫害，美国政府甚至曾经通过了各种《排华法令》，包括禁止华人在白人聚居区定居。随着历史和形势的发展，华侨、华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起了变化，这反映在华侨、华人聚居的唐人街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十年代初期，美国各地的唐人街呈显停滞、衰落的状态，美国人称它是被忘记的社会，将逐渐消失。其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歧视和迫害华侨、华人的法令。这情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才发生变化。美国为了联合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并动员华侨、华人参加美军对日作战，美国国会才废除了《排华法令》，但



移民还受配额的限制。到五十年代,歧视华侨、华人的条例陆续取消。华侨、华人在美国的地位逐步得到改善。一九五六年美国修改移民法,放宽移民限额,从中国和世界各地流入美国的华侨才有较大的增长。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之后,有大量中国人赴美与家人团聚并定居,尤其一九八二年美国政府再次修改移民法,又使大批华侨涌入美国。今天,唐人街一改过去衰落的面貌,显现了蓬勃发展之势。纽约的唐人街正向毗邻的意大利移民区扩展,意大利移民区的房地产,约百分之七十落入华侨、华人之手。纽约唐人街三十年代只有三四万人,现在已超过了三十万。过去美国的《排华法令》是妨碍华侨、华人在唐人街范围以外的地区居住的。现在,华侨、华人已越出唐人街区域,迁到郊区,或在城区其他白人聚居的地区建立自己的住宅了。

早期的美国华侨绝大部分是中国南方沿海农村的农民,文化水平较低。而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之后的新移民,相当大部分是城市人,素质已大不相同,特别是一批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赴美深造,然后又定居美国,使华侨、华人社区注入了新的血液。华侨、华人的后裔不同于先辈,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大都可以从小学、中学读到大学毕业。由于他们比较勤奋,一般的学习成绩都比较好。现在,在美国的总人口中,华侨、华人中学生和大学生的人数,按各民族的人口比例计算,居美国各民族之冠。

早期的美国华侨,从事淘金、修铁路,垦荒到开洗衣馆、

餐馆,基本上是从从事比较简单的体力劳动。而今,华侨、华人的职业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中当教授、工程师、律师、医生的已大有人在。三十年代,美国所有大学没有一名华人教授,现在美国比较著名的大学都有华人教授。在十万左右的华侨、华人高级知识分子中,一流的科学家达三万多人,他们中有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四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阿波罗登月工程标志着美国当今的科技水平,而参加这项工程的华侨、华人工程师和专家就有一千四百人,占参加这项工程的技术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美国机械工程学会一半以上的分会主席是华侨、华人。华侨、华人对美国科技的发展,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美国华侨、华人地位的变化,还表现在他们已进入工商企业界、金融界,并且颇有成就。电脑大王王安,其公司的产品在美国市场居于称雄地位。金融界的蔡志勇以其财务管理和证券交易方面显露才华,被称为“金融魔术师”,成了华尔街瞩目的人物。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林同炎,是美国建筑界的权威。在政界和军警界中,美国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美国政府交通部特别顾问、能源委员会和总统亚洲事务顾问陈香梅,特拉华州副州长吴仙标,加州州务卿江月桂,荣特利市市长李琬若,喜瑞都市市长黄锦波,美国空军少将、加州麦克里兰空军基地后勤中心司令刘国英,美国联邦巡回法庭大法官邓心平,纽约警察总局副局长莫虎等华人脱颖而出,崭露头角。

过去多少年来,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一直把中国人看成是“劣等民族”,“东亚病夫”,对我们中华民族白眼相待。即使对美国早期的建设包括兴筑铁路,发展农业等方面,中国人作出了连美国政府也不能不承认的巨大贡献,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一位三十年代到美国的留学生这样痛苦地回忆:那时由于我们的祖国贫穷落后,我们中华民族都被人看不起。我虽然是个留学生,但有民族偏见的人还是看不起我,甚至讨厌我。在公园的长椅上,我坐下之后,原来在旁边坐的美国人便不高兴站起来走开了。想去租间房住,我去敲有空房出租者的门,主人一见我是中国人,立即把门关上。这种民族的偏见和歧视,给我的心灵无限痛苦。许多象我这样的华侨多么希望祖国强盛。作为个人,我默默地下决心奋斗,希望以自己的勤奋和才智,改变西方社会对我们的看法。如今情况不同了,我们的祖国强大了,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华侨、华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美国已显露出无比的才智,在各方面都出现了出类拔萃的人才,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九八二年,就有二千七百一十五名炎黄子孙被载入美国的名人录。他们中有博士学位的占百分之八十三,有硕士学位的占百分之六。从职业看,政界占百分之三,商界占百分之二十一,学术界占百分之六十二,医学界占百分之十二,法律界占百分之一,艺术界占百分之一,其他占百分之三。他们已成了美国社会前进中不可缺少的人才。现在,每逢春节(中国的旧历

新年),美国总统都要向华侨、华人表示致意,称颂华人为美国作出的贡献。中国人被视为“劣等民族”,“东亚病夫”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美籍华人的后裔大部分已不懂华语,但尽管如此,他们中许多人还是意识到自己是炎黄子孙,对祖国有特殊的感情,对中国的振兴寄以厚望。近年,美国华人出现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组织,这不仅表明在美国的炎黄子孙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也说明了实现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

## 加拿大侨亲的情谊

应林活先生、罗耀汉先生和黄云仪女士的邀请,我和妻子阮群英、秘书黄慰慈、表弟钟庭基一行四人,从八月十日至八月二十日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地参观访问,我们所到之处,受到乡亲们、校友们和朋友们的盛情接待。

八月十日上午十时,我们离开纽约唐人街,乘车前往飞机场。纽约惠州工商会主席方成,纽约崇正会主席曾庆安、纽约华人联合会名誉主席梅子强,副主席黎发兴,纽约华人协会副主席梁树金,中山大学校友林趁,惠东宝乡亲曾水生等数十人到机场送行。中午一时三十分乘机飞赴加拿大多伦多。二时三十分,到达多伦多飞机场。黄云仪女士到机场迎接我们,把我们接到她家里住宿。

加拿大是西半球最大的国家，世界上第二大国，面积约一千万平方公里，仅次于苏联。首都渥太华。蒙特利尔（华侨习惯称为“满地和”）、多伦多、温哥华是加拿大三个最大的城市。全国人口约二千三百万。在加拿大的华侨、华人约有五十万，一半以上聚居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两个大城市。

罗耀友、黄云仪夫妇是一年前从香港到加拿大的新移民。他们在多伦多买了一幢房屋。罗先生和朋友联合经营一个大商场。罗先生夫妇热情好客，对我们的生活和参观活动的安排十分周到。他们的三个小孩兆彝、兆雄和兆德，天真活泼，十分可爱。

八月十一日，罗先生夫妇放下了工作，亲自驾车送我们去参观世界十大奇景之一——尼亚拉加大瀑布。尼亚拉加大瀑布位于加拿大和美国交界的尼亚拉加河上。尼亚拉加河是伊利湖和安大略湖之间的一条水道。由于两湖的地势相差很大，水势湍急，分流后在断崖上形成两大瀑布，加拿大境内的称马蹄瀑布，美国境内的称亚美利加瀑布，统称尼亚拉加大瀑布。面对瀑布的雄姿和绮丽的美景，我们兴致勃勃地站在气势磅礴的瀑布的对岸，欣赏那雄伟神奇的景色和水流倾泻的奔腾咆哮，赞叹这雄伟壮观的奇景。晚上，我们去参观加拿大国家大塔，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塔，顶端高五百五十三米。我们乘每秒升降六米的电梯到三百五十二米的塔层，纵观多伦多市的全貌。无数的电灯把多伦多市打扮得多姿多彩。

十二日，黄云仪女士陪我们游览多伦多的市容。我们参观了市政府大厦、唐人街和一个商业大楼。

多伦多是加拿大的第二大城市，有华侨、华人十九万。唐人街规模比较大，一片繁荣景象。星期天市区的其他街道冷冷清清，行人甚少，而唐人街则顾客如云，热闹非常，别有一番景象。大小的餐馆酒楼，席无虚座。我们到一间餐馆吃中午饭时，尽管店主热情接待，还是站了二十分钟后才能给我们安排到席位。唐人街是多伦多的一个参观旅游点。它吸引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里不仅可以购买到精美的中国制品，还可以品尝花式多样，美味可口的中国佳肴，是各地游人的一个好去处。

午饭后，我们在商业区参观了一间商业大楼。这幢巨型的商业大楼外面是密封的，装有中央空调，冬天外面冰天雪地，一进入这幢商业大楼立即温暖如春。冬天，多伦多气候寒冷，人们都喜欢到这里购物。大楼的建筑面积很大，货物齐全，管理井井有条，是一幢现代化的高级商场。

十三日晚，应黄振辉先生的邀请，我们到黄先生的大厦作客，出席他欢迎我们的晚宴。黄振辉先生夫妇和女儿、女婿盛情接待我们，和我们共进晚宴。

黄振辉先生是经营房地产的殷商，他在香港和加拿大等地均有产业。近年来，他在多伦多经营房地产，可谓得心应手，产业发展很快。黄先生热爱祖国，积极投资祖国的四化建设，希望中国早日富强。席间，我们畅谈了对祖国四化

建设的展望。

八月十四日中午，我们一行四人乘机飞赴温哥华。下午四时到达温哥华机场时，林活先生夫妇、儿子和阮慧娟、阮慧贤夫妇到机场迎接我们。林活先生接我们到他家里住宿。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温哥华总领事朱毅和夫人来看望我们。

温哥华是加拿大东南部卑诗省太平洋沿岸的一个大城市。有四十一万人口，华侨、华人有十五万。温哥华市隔海东面有个温哥华岛，岛上南端的维多利亚市是卑诗省的省会。

林活先生，宝安县人，是中山大学的校友。他早年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后到非洲经商。前几年才到温哥华定居。林活先生为人忠厚，办事老练，能写出很好的文章。他夫人是一位很能干的贤内助。林先生夫妇热情好客，为我们在温哥华的参观访问活动，作了非常周到的安排。

八月十七日，朱毅总领事夫妇陪同我们到卑诗省的省会维多利亚市参观访问。维多利亚是英国女皇的名字，相传英殖民主义者最先到达这里，觉得这个地方很好，就以英女皇的名字命名为维多利亚。这里风景优美，气候温暖，阳光充足，英国的有钱人喜欢到这里居住。维多利亚市有七万人口，华侨、华人约有七八千人。在维多利亚我们参观了卑诗省政府大厦、蜡像馆和拔卓特花园。

维多利亚蜡像馆的规模很大，蜡塑艺术的水平很高，各

类人物的塑像栩栩如生,配上了电子装置,人物的眼睛会动的,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题材有反映童话故事,世界名人形象,内容丰富。在世界名人中有英国的女皇、首相,美国的总统,苏联的领导人列宁、斯大林,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反面人物如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日本的东条英机和中国的林彪,都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蜡像馆里。我们看到游客站在英女皇像旁边照相留念。传闻有的江湖骗子拿着和英女皇或某国家领导人的蜡像一起照下的相片,欺骗不明真相的人,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拔卓特花园是加拿大的一个有名的旅游点。这花园是鲁别罗拔特在他的旧石矿场原址创设的。鲁别罗拔特是加拿大美国拨伦水泥业的创始人,他在这里建起了一间水泥厂,自任总经理。他的夫人爱好园艺,在这旧石矿场上悉心经营,种植花卉,以美化住宅周围的环境,日将月就,发展成今天世界著名的风景区,每年吸引了不少游客到此参观。

这花园一年四季,百花争艳,景色宜人。整个布局有独特的风格,每一景致都是精心设计的。由于花园面积不大,游人参观完了即赶回温哥华市区住宿。为了吸引游客在维多利亚留宿,以增加旅业的收入,主人想尽办法。一方面专门设计了整个花园的夜间游览景色,按设计要求装置彩色灯光,使花园的上部空间,有如天上星光闪耀;同时使园里的花草树木,更加鲜艳。每当夏日黄昏,千百灯光,隐约于千红万绿之中,令人迷目。另一方面,在一个面积不大的人工



湖上,建设了一座大型的喷水池。白天,喷水池不开放。夜晚,由于七彩灯光照射,喷水池喷上七十米高空的七彩水花,雄伟壮观。调整彩灯,可将喷上高空的水花复造成一条弧形的水彩虹,像海市蜃楼,非常好看。经过一番努力,果然吸引了不少游客在维多利亚留宿。

论自然条件,广州的越秀山远比拔卓特花园好得多。鲁别罗拔特夫人可以在一个旧石矿场上建设一座世界闻名的花园,我相信广州人民在不久的将来,也可以把越秀山建设成一个具有南国特色,吸引中外游客的人民公园。

中午,我们应邀访问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华侨联谊会。该会的负责人热情接待我们,陪同我们参观了该会会所、维多利亚唐人街和卑诗省政府大厦,并照相留念。二时三十分,联谊会在一间酒楼设宴欢迎我们。朱毅总领事和夫人参加了宴会。席间,主人告诉我们,维多利亚的华侨、华人已有人在国内投资办企业,有一位祖籍广东的华人已在北京投资办起了一间餐馆。如果他们开办的企业发展得顺利的话,随后还会有更多的华侨、华人要回祖国大陆投资办企业的。我向主人介绍了祖国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希望他们回国观光,并感谢主人的盛情接待。

我们在林活先生的寓所住下之后,中山大学的校友李特裁、熊恒浩、郑顺麟、黄超声和曾文英等来访。十八日晚,林活先生在他的寓所宴请李特裁、黄超声等校友。朱毅总领事和夫人也应邀出席我们校友的聚会。这次小型的聚会中,

不论是久别重逢的同学,还是初次相见的校友,都是一见如故,侃侃谈心,一起回顾同窗生活,畅谈别后情况。祖籍广东省梅州市的黄超声先生,是清朝末年的知名外交家和爱国诗人黄遵宪的后辈,他虽然久未回乡,但从乡亲寄来的书信和报刊上,了解到祖国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政策之后,家乡发展变化很大。他老家的祖屋由人民政府帮助维修,国家领导人前往瞻仰黄遵宪的故居,看望黄遵宪的后辈。国内的文史学者研究黄遵宪的历史和思想,已发表了不少文章。黄超声先生告诉我们,他和在美国、加拿大、香港及台湾等地的黄遵宪的后代,非常感谢祖国人民政府和学者对黄遵宪的正确评价和对黄遵宪后辈的关怀。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回祖国看看家乡的新貌。

十九日上午,我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参观,朱毅总领事邀请我们和温哥华的几位侨领共进午餐,安排我们和温哥华的侨领聚会。

十九日下午六时半,我们应温哥华中山大学校友会的邀请,出席了该会在温哥华市汉乐酒家欢迎我们在宴会。朱毅总领事和夫人、贺克强领事,温哥华中华会馆主席雷威、副主席华雁,中华文化中心副主任余国定和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校友余惠霖、林活、黄超声、曾文英等数十人也参加宴会。

宴会由中山大学校友会主席余惠霖先生主持并致欢迎词。我在宴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感谢校友们的盛筵款待,

转达国内中山大学的校友向温哥华校友们的问好；向校友们介绍祖国和家乡发展变化的情况，希望大家回国观光，看看祖国家乡的新貌与亲人团聚。

席间，校友们告诉我们，近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间，温哥华的华侨、华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有很大的提高和发展。现在从医生到律师，从旅游观光业到房地产业，华侨、华人均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温哥华的华医学会有医生四百多人，牙科医生二百多人；华人律师八十多人，其中黄星翘是卑诗省的最高法官，是参加加拿大国家宪法修改工作唯一的华人。近年来，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的华商在温哥华大量投资，发展旅游观光业和房地产业。一九八二年新加坡华商以三千二百五十万加元购买了温哥华市观光旅馆。由于香港华商大量投资房地产业，现在温哥华市的房地产百分之三十属华侨、华人所有。华侨、华人经济实力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加拿大其他民族极大的关注。

黄超声校友告诉我们，加拿大的华侨、华人姓黄的人数最多，加拿大黄江夏宗亲总会有十多万人，温哥华有三万多人。这里的汉升体育会是黄姓宗亲的组织。这个组织很爱国，它是北美地区第一个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的华人组织。汉升体育会最近组团回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代表团三十三人，由黄文伟先生任团长。

宴会上，窗情浓郁，校友们频频举杯，互相祝愿。宴会后照相留念。

## 难忘的日本之行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宋之光的邀请，八月二十日下午，我们一行四人在温哥华机场乘泛美航空公司747班机飞赴日本东京参观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温哥华领事馆总领事朱毅、温哥华中山大学校友会主席余惠霖和曾文英、林活等校友乡亲到机场送行。日本时间二十一日下午四时抵达东京附近的成田国际机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林海同志到飞机场迎接我们。我们被安排在大使馆住宿，受到宋之光大使和夫人热情的接待。当晚，宋大使在大使馆宴请我们。包玉星先生夫妇、我表弟钟庭基夫妇和孙美荪先生也应邀参加了晚宴。包玉星是香港航运企业家包玉刚先生的弟弟，包先生向我们介绍了世界航海运输业的情况。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位于日本关东平原南端，东京湾的西北岸，面积二千一百四十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一百六十万。是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我们在日本停留了七天。这期间，我们游览了东京市容，参观了市区著名的旅游点。应横滨上乡医院院长、医学博士刘自觉先生的邀请，先后到了横滨和富士山等地游览。在日本度过了轻松愉快的七天，增长了不少见闻。

二十二日早上，宋之光大使夫妇和我们共进早餐，并和我们商量在日本的行程和参观访问的计划。我们对宋大使的盛情接待表示感谢之后，即提出考虑到在日本我们不有少亲友，他们经常到大使馆来看望我们，会给大使馆的工作增加不少麻烦。所以，我的亲友决定明天接我们到东京都大旅店住宿，他们会安排我们的活动了。宋大使的盛情，我们心领了。

二十二日上午，刘自觉博士全家到大使馆来看望我们，并陪同我们参观了银座和几个繁华的商业区。二十四日，我们又乘旅游车游览东京市区。经过两天游览，我觉得东京的市政建设搞得不错。在我的印象中，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整个城市建设的布局比较合理，设施比较齐全；二是能够把现代化和日本本民族的传统巧妙地结合起来。这个特点体现在皇宫及其周围的景物之中。

在东京都中心千代田区高地的皇宫，是皇室居住活动的地方，占地约一平方公里，到处绿树成林，芳草如茵。现在在皇宫周围，建起了新的现代化大厦，整个皇宫被包围在崭新的现代化建筑之中。环顾皇宫和它周围现代化大厦的景象，使人深深感到这里是现代化和民族传统巧妙和谐的结合。

在二十四日的游览中，我们参观了东京塔、皇宫公园等几个旅游点，东京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高耸入云的东京塔，矗立在东京市内，姿态雄伟，气宇

非凡。塔高三百三十米，比举世闻名的巴黎艾菲尔铁塔高出三十米，全部钢铁结构，使用钢材四千吨，可承受比一九二三年九月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地震还大的地震。

建筑东京塔的主要目的是：发射电视、广播和通讯的电波。它不仅发射七个电视台的电波，还发射电视台中继用的波道二十一个，收音机用的电视波道二个，国营铁路及公共通讯用的波道三十多个。

日本是很讲经济核算的国家，他们非常明白东京塔的经济价值。为了充分吸引国内外游客的参观游览，他们充分利用了铁塔的每一寸空间和地方。

东京塔的塔身五层，加地下室一层，共计六层建筑。地下室有保安室、事务室、医务室和食堂。一楼是水族馆、餐厅、土特产纪念馆。二楼是百货商店和餐馆、茶馆和咖啡室等。三楼有吸引观众的蜡人像馆。四楼是日本政府广告展览室。五楼是电视台、发射台等用房，对外不开放。

一楼水族馆的规模，据说是现在世界上第一流的。总面积八百二十五平方米，设有七百个养鱼水槽。有世界上美丽、珍贵的形形色色的鱼类八百多种，五万多条。

三楼蜡人馆的规模和艺术，可与美国洛杉矶和加拿大维多利亚的蜡像馆比美。馆里陈列有世界著名的领袖人物的塑像，如毛泽东、胡志明和卡特等。蜡人的形状大小与真人同等，形象逼真。还有根据传说或电视塑造的动人场景，如美国的著名童话《白雪公主》的人物形象等。此外，还将日

本十九名歌手塑造成像,这些歌手的大部分人现在仍活跃在舞台上。

离地面一百五十米的高处,是一个四方形的大展望台。展望台分两层,都设有小卖部、喝茶室和放进钱去才能看的望远镜。离地面二百五十米高处又设一个特别展望台,这是东京市的一个制高点。登上特别展望台,用望远镜一看,整个东京市的繁荣景象一览无遗。

耸立于万里晴空的东京塔,是东京市政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招来国内外游客的一个重要的游览区。丰富多彩的东京塔,给我们提供了如何把重大城市建设工程和开辟新的游览点结合起来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横滨是日本的一个海港城市,人口二百六十万。它是日本最大的海港之一。四十八年前,我在“日本皇后”轮船当海员时,曾经到过横滨港。今天,横滨已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再也想象不出它当年的原貌了。

二十三日上午,应刘自觉博士的邀请,我们到横滨市游览。十一时,我们到达座落在横滨市区松影町、山下町的“中华街”。街的两头建有五彩雕花牌坊,上面书有正楷“中华街”匾额。进了五彩牌坊,犹如进入了一个中国的世界。大街两旁的商店,都是两三层高的中国式建筑。有的饭店红檐绿瓦,款式古雅;有的商店装饰华丽,光艳夺目;有的商店古色古香,悬挂中国字画,使人仿佛来到了旧中国的某一个城市。中华街的华侨、华人约有四千人,从数量上看仅次于东

京和神户。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人民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人旅居日本，远从秦汉开始，经历隋、唐、宋、元、明、清各朝代，以至今日，人数众多。至一九八四年三月底，居留日本的华侨、华人为六万三千九百多人。他们从事商业、工业、餐馆业、旅馆业、娱乐业到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及蒸汽室、婴儿用品、花卉种植和医疗业等。多数是小型企业。过去都是家庭独自经营的古老方式，现在少数中、大型企业正逐步发展成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个别的甚至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大企业。另外，也有一部分旅居城市的华侨、华人，因感到城市谋生不易，近年转居农村，从事农业或农副业生产。

日本的华侨、华人社团，最大的是设在东京的日本华侨联合总会，它是日本综合性的华侨社团。日本的华侨社团，除综合性团体外，还有同乡、同业、社会、文教方面的团体。在横滨地区的华侨社团，有东北、福建、山东、广东等地同乡会馆和神奈川县中华料理公会、旅日中华医师公会等同业侨团，以及横滨华侨妇女协会、横滨华侨青年会等华侨妇女、青年团体。

我们参观完中华街之后，即在广东菜馆“万珍楼”吃中午饭。“万珍楼”的陈设古色古香，如同解放前广州、佛山酒楼的一般装修。我们在“万珍楼”吃到了广东的风味。在我们称赞该店的饭菜风味的时候，店员告诉我们，“万珍楼”风



味在日本是算有特色的。一九八一年他们在东京日比谷富国生命大厦开设了“万珍楼”分店,规模比这里大得多,很受顾客的欢迎。

午饭后,我们参观了横滨市的市容,并到横滨港参观海港码头和港湾大厦。港口设施先进,港湾大厦的建筑布局很好,环境优美。我们到海港参观时,几艘货轮在码头装货卸货,港口一片繁忙景象。

下午四时,刘自觉博士接我们到他家里作客。刘博士原籍广东省宝安县龙冈镇人。五十年代初期到日本读书,在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加入了日本国籍,在日本政府的卫生部门任职。几年前,他除了公职,自己到横滨开办上乡医院,亲自任院长。由于我们是乡亲,又有亲戚关系,平时有通讯联系,所以,我们到达东京的第二天,他全家即到大使馆来看望我们。邀请我们到横滨、富士山等地游览。刘博士在东京和横滨地区认识许多日本人和华侨的知名人士。他接我们到他家之后,立即开车去接日本知名人士西园寺公一先生来和我们共进晚餐。

西园寺公一先生是前日本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的后代,在日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长期间在中国居住,为改善中日关系,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大量的工作,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熟识周恩来、廖承志等国家领导人,对周恩来总理和廖承志副委员长十分尊敬和怀念。我在广州市当市长时,和他认识。

以后，我去北京或他来广州时，我们总安排时间叙会。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期，他才回日本居住。我们多年未见，老朋友久别重逢，分外高兴。西园寺公一先生高兴地告诉我们，他已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九月底到北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十月，我们在北京再会。他说，他从报刊上了解到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之后，经济建设发展很快。这次到中国，他要看看中国发展变化的情况。听了我们介绍中国近年来发展变化的情况之后，他老人家激动地说：中国地大物博，又有勤劳勇敢的人民。我相信中国人民经过不懈的努力，一定可以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我希望中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能够长期稳定地发展，共同为亚太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贡献。

二十五日，刘自觉博士亲自驾车接我们去游览日本的旅游胜地富士山和箱根游览区。

富士山游览。富士山被誉为“日本的象征”、“民族的骄傲”。它座落在日本静冈县境内，是“富士山箱根伊豆国立公园”的中心，山高三千七百七十六米，是日本第一高山。富士山原是一座火山，山顶远看呈平状，四周倾斜向外延伸。它的形状既雄伟，又优美，山体均匀，不论从哪个方向去看，都象一把倒着的折扇。山峰终年积雪，景色变化万千。从飞机上看，一片云海中富士山冠于群峰，高耸云际，山头的白雪和白云交织在一起，映着红日，分外娇艳。

富士山下树木茂盛,品种繁多,一路上绿荫遮路,似乎置身于绿色的海洋。我们的车一直开到两千多米高的新五合目区休息处。这是富士山半山的一块平地,四周有停车场,便于观光的车辆停放。靠平地的一头建有旅馆,可以休息;建有饭店,可以进食;建有百货商店,出售与富士山有关的纪念品。出了商店门,在附近的空地上有马夫牵马,供游人骑玩;有古色古香的马车,供游人乘坐;设有观望台,用望远镜观赏富士山的雄姿。当然,所有这些都是需要钱的。我们在商店买了一些刻有富士山标志的纪念品,到观望台看了富士山的景色之后,就到饭馆吃午餐。

富士山地区天气变化莫测,一时天气晴朗,富士山的雄姿清晰可见,几分钟之内,就一片云海。我们在五合目区等了好久,希望等到天气好时,以富士山顶为背景照一张相片留念,可惜,富士山象娇羞的少女,几次都是稍一露面,就隐没有白云之中。每次一露面时,我们刚站好了位置准备拍照,又给云雾遮住了,始终未能如愿。

下午,我们到河口湖、山中湖游览照相。晚上,到箱根游览区的汤之花旅店住宿。

箱根游览。箱根,在日本静冈县和神奈川县交界的山地。这里风景优美,有山有水,温泉如注,是日本有名的游览区。箱根只有两万人,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上千万人。在一九七九年共接待了一千八百六十三万人次,平均每人接待九百三十一人次。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

汤之花旅店是一间很有特色的山庄旅店。有温泉浴池、数百床位和洋式、和式、中式餐厅。在每个房间都有温泉浴盆、电视机、电话、和服、装满饮料的冰箱和每天更换洁白的床上用品。可惜，和式的“榻榻米”住室，我们住起来不习惯。

汤之花旅店的服务质量是第一流的。八月二十五日是日本学校放暑假最后一天，参观富士山、箱根的人特别多，沿途堵车。我们电话订了房，原计划五时半到达，由于交通堵塞到八时半才抵达。

来到旅店，刚一下车，就受到热情接待。服务员笑脸相迎，热情接过行李，请我们脱下鞋袜交给他们保管，叫我们穿上新的袜子；随即送热毛巾给我们抹手抹脸。然后，把我们领到各自的房间。到了房间又送来一盆放有毛巾的温水，请我们洗脸，又送来一双新鞋子，是洗完澡之后穿的。服务员检查了房间的电视机、浴室灯光和水龙头之后，给我们送来和服，建议我们先洗个温泉澡消除疲劳，再进晚餐。

我们洗完澡，穿好和服之后，已九点半钟了。服务员带我们到餐厅吃晚饭。我们一进餐厅，餐厅的服务员迎上来带我们就席。很快就端上准备好的丰盛的热饭菜。我们吃的是日本餐，每人一份，每份二汤七菜。端菜的托盘是一条龙船，各种菜放在龙船上，端放在餐桌上十分好看。菜的式样虽然多，但每种菜只是一小碟。我们一天游览，中午吃过快餐已有七八小时未进食，肚子饿了，胃口特别好，吃起来美味可口。由于我们来得晚，整个餐厅只有我们四个人吃饭。

已十点钟了,本来餐厅早收工了,关照我们吃饭的两位服务员非常热情,服务十分周到。我们吃完饭离开餐厅时,服务员送我们出餐厅,并恭恭敬敬地向我们鞠躬,说声“谢谢!”我本能地转身也向她们说了一声出自内心的“谢谢!”

服务人员热情的接待,周到的服务,使我们到了汤之花旅店,就象回到自己家里那样温暖。我们洗了个温泉浴,吃了一顿美味可口的晚餐,一天的疲劳消失了。我深深感到:到箱根游览确实是一种享受。箱根这个仅有两万人的小山区,每年能吸引一千八百多万人次的游客来游览,主要不在于它的环境和设备,而在于它第一流的服务质量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富士山和箱根游览区,为我国办好旅游业提供了一个可供学习的榜样。

## 宾至如归在澳门

八月二十八日,我们从日本回到了香港。霍英东先生考虑到我们旅途疲劳,在香港停留又会整天忙于应酬,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于是,建议我们到澳门休息一段时间。

澳门是由一个主要的半岛和氹仔、路环两个附属海岛组成的葡萄牙国的殖民地。它位于南海珠江口北纬二十一度一分和东经一百一十二度三十三分的交界处,北面与广东省的珠海市相连,东南面相隔四十海里就是香港。人口五十余万人,其中百分之九十八是中国人。面积约十七平方公

里。以旅游、赌业和出口针织业、制衣业为经济支柱。近年来,电子工业、光学仪器制造和塑料工业稳步发展,朝着从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的方向发展。

八月三十日上午十时左右,我们乘喷射飞翼船前往澳门。十一时许,抵达澳门的水翼船码头。我们一上岸,就看到我的老朋友柯正平同志来迎接我们。我们被安排在霍英东先生为我们安排的房子住宿。霍英东先生派了公关部的陈小姐负责安排我们的生活和参观娱乐活动。

我们在澳门休整了九天。这期间我们不仅参观了澳门的旅游胜地,还先后会见了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副总经理王文彬、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常务副会长陶开裕,澳门日报社社长李成俊等澳门的知名人士。

柯正平是广东海丰县人。我们是抗日战争时期相识的老朋友、老战友。他三十年代初期到了香港,一九三八年,在香港参加组织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积极支持祖国抗战。香港沦陷后,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和我们一起进行抗日救国斗争。一九四三年他到澳门开办诚益行、新中行,并任经理。一九四九年任南光公司经理、总经理。一九五八年创办《澳门日报》,任董事长,并曾先后担任南通银行、澳门中国旅行社董事长、全国人大第四、五、六届代表。一九八六年六月至一九八七年三月,为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谈判的中方代表之一,在澳门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知名人士。以往我们都有公务在身,难得有机会共叙友情。这次我到了澳门,我

们都比较超脱了,能有时间在一起回顾我们半个世纪以来的人生历程,展望美好的未来。

一天,柯正平同志和他的夫人约我和阮群英去镜湖医院检查身体。提起镜湖医院,我不禁想起了柯正平同志的哥哥柯麟同志。

柯麟同志是一位革命老前辈、著名的医学教育家。他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无私的奉献。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五一年,他在澳门生活、工作了十七个年头。根据党的指示,十七年中,他一方面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同时,在事业上奋发进取,由一个普通开业医生,一跃成为澳门镜湖医院的院长,并把这所很不起眼的医院办成了澳门规模最大、管理最好,医疗水平最高的著名医院。他也成了深得澳门各阶层爱戴的知名人士。十几年来,他以镜湖医院为基地,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抗战时期,他利用医院的有利条件,开办“青年战地救护团”,为抗日前线和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输送医务人员。镜湖医院还秘密地接收了我抗日游击队的伤病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大批来不及从香港撤离的著名进步文化人如夏衍、梁漱溟、金山等,在党组织的护送下,经澳门撤出。柯麟领导的镜湖医院就成了这批人脱险的一个中转站。同时,许多党的干部和家眷以及社会进步人士如罗明、张天翼等,都曾在镜湖医院居留、养病。六十年代我在广州当市长时,柯麟同志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中山医学院院长

兼党委书记，我们经常来往。他那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高尚追求和克己奉公，宽仁大度的品德，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九月五日下午五时，我们出席了马万祺先生欢迎我们的晚宴。

马万祺先生是澳门的实业家、知名爱国人士，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人大委员。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同何贤、林柄炎等澳门经济界实力人物，支持柯麟同志发展澳门的医疗卫生事业，开展抗日救国运动。长期以来，他为澳门人民、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做了不少努力。我们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他那谦虚谨慎，坚定沉着，一丝不苟，诚恳待人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开席，主要首先向我们举杯祝贺。我即举杯向马万祺先生及其夫人、女儿祝贺，感谢他们的盛情接待。席间，马万祺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近年来澳门的经济发展和他最近在广东几个地方所看到的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到处欣欣向荣的情况。他谈到澳门发展的历史时告诉我们，抗日战争时期，澳门同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并先后派出了“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澳门中国青年回国乡村服务团”等抗日救亡团体的成员数百人，回内地参加抗日斗争。他还谈到了我的老朋友，曾任澳门中华工商总会会长的何贤先生为澳门同胞、为祖国的爱国统一事业，长期兢兢业业地工作的动人事迹。我们都为何贤先生在澳门和祖国正



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人间而感到可惜和难过。

在澳门期间，我们还接受了澳门南光公司等企业单位的宴请，会见了一批在澳门的老朋友、老战友。我们所到之处，都有宾至如归之感。

## 后 记

应解放军出版社之约,撰写了这本回忆录。我力图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主要记述各个革命历史阶段,我所经历的工作中党所实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在党领导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过去的斗争中,和我一起战斗的许多战友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了。这本回忆录,也是为了对这些革命烈士的深切悼念。

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共广东省委、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人民武装斗争史编纂委员会、中共广州市委、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南海舰队、交通部的大力支持。中共宝安县委、中共布吉、龙华、坪山镇委等单位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原东江纵队的许多老战友和地方及部队的党史工作者,为帮助我完成这本回忆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对于支持和帮助完成这本回忆录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

回忆录写的是过去几十年的往事,由于记忆力不好,加上搜集资料有限,难免有不够准确的地方,欢迎读者指正。

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

封面  
目录  
正文